

经典史料珍藏版

冯自由著

上

革命逸史

孙中山机要秘书回忆录
中华民国史第一书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TONGRENGE MEDIA

同人内 文化传媒

南海冯自由与同盟会最久，又尝为稽勋局长，以其所见，又遍访故旧，而作《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虽未周悉，然阿私之见少矣。

——章太炎

冯自由先生为吾党之先进，博闻强记，著作等身，年逾舞勺，即加入兴中会，亲炙总理，从事革命，于总理创业垂统之伟绩丰功，嘉谟嘉猷，以及诸先烈先进经邦纬国之精神，致命遂志之奇节，莫不亲见亲闻，参与其事……今者将其近年著述，辑为《革命逸史》多集，内蕴丰富，与前相埒，彰善癉恶，正谬补阙，一人一事，均堪为景仰先烈之资。

——孙科

他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著作，并不是为个别领袖树碑立传，而是忠实地记录了革命史上无数无名英雄抛洒热血、舍生取义的业绩。在举世滔滔、数典忘祖大有人在，沐猴而冠、粉墨登场的年代，他以革命的亲历者、以严肃的史家态度，编写革命史，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信史。

——傅国涌



革命逸史

上

冯自由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革命逸史 / 冯自由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155-1040-8

I. ①革… II. ①冯… III. ①辛亥革命-史料 IV.
①K25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65144号

革命逸史

著 者 冯自由
责任编辑 李 健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65
字 数 985千字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上元柏昌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040-8
定 价 98.00元 (全三册)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2号院(东区)14号楼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中國革命同盟會總理孫文
特委托本會會員

馮君自由李君自重文在香港
粵省城澳門等地聯絡同志
二君熱心愛國誠實待人足堪
本會委托之任凡有志入盟者可
由二君主盟收接特此通知仰祈
察照是荷

中國革命同盟會總理孫



天運歲乙巳年八月十日發



出版说明

冯自由（1882-1958），原名懋龙，字健华。广东南海人。出生于日本横滨的一个华侨商人家庭，自幼就学于日本。1895年，兴中会在日本成立支部，他随父亲冯镜如一同入会，成为年龄最小的会员，有“革命童子”之称，自称“马前一小童”。1900年因反对康有为而改名“自由”；同年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此后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活动；和郑贯一等创办半月刊《开智录》，倡导自由平等学说。与李自重、王宠惠等粤籍留学生成立广东独立协会，提出广东应宣布独立，反对法国势力侵入广东；翻译出版《政治学》，介绍当时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冯自由成为首批会员，被孙中山派往香港、澳门、广州等地开展党务工作，次年任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同盟会机关报《中国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积极宣扬资产阶级革命，影响颇大；期间曾多次协助孙中山在潮州、惠州等地发动起义。

1910-1911年，冯自由前往加拿大为广州起义筹款，所筹资金为海外各埠第一；随后前往旧金山，联络华侨支持革命。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冯自由被派往协助建立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参加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典礼，此后一直任总统府机要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于1914年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冯自由被派往美国支部负责党务。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冯自由首先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简称，积极拥护孙中山的政策纲领。

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1924年1月，国民党实现改组，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冯自由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但却反对国共合作和新三民主义。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冯自由被开除出党，此后一直投靠蒋介石。1935年，冯自由恢复国民党党籍。1948年底移居香港。1951年奉蒋介石电召偕妻赴台，担任“国策顾问”，1958年病逝。

综观冯自由一生，他不失为一个知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有功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但他又是一个反共的国民党右派，给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极大的阻力。因此，其一生功过需要客观评价。

由于反对孙中山的国共合作，冯自由作为国民党右派，亦不被南京政府重用，他的兴趣遂从政治转到历史，“发愤搜集三十年来所宝藏之各种书札、笔记、表册、报章等，并广征故旧同志所经过之事迹”，撰成《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鉴于中国历史上有正史、逸史之别，他又参考革命运动初期的人物及事件的私人回忆录、轶闻等，历时十余载，于1948年完成《革命逸史》，使之成为一部正式的革命党史。该书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只是“暂以革命逸史名之”。

章太炎曾高度评价冯自由治史“阿私之见少矣”。鉴于国民党掌权以来，对于开国前和开国时流血牺牲的大多数无名英雄未给予应有的抚恤，因此《革命逸史》并没有为革命领袖树碑立传，而是记载了无名英雄们为革命献身的业绩。总之，作者以革命亲历者的身份，以严肃的史家态度，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信史。

《革命逸史》共六集，解放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五集。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内部发行”的全六集。这次我们参考了解放前后的版本，重新校勘，分三卷出版，以供国内对民国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和历史局限，书中有些污蔑早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内容，对此读者必须有所鉴别。

孙科序

吾党之有革命机构组织，肇端于檀香山之兴中会，弹指星霜，已易五十寒暑，在过去悠久期间，义愤所激，精诚所贯，冒锋镝，掷头颅，以与异族政府及官僚军阀相击搏，壮志毅力，炳如日星，在在皆为可歌可泣之事实。开国以还，坊间革命史籍，出版虽如雨后春笋，不下百数十种，然求其确征无讹者，则百不得一二焉，寻因探绪，则以史实浩繁，整理不易，老成凋谢，追述维艰，于是好事者或摭拾无稽澜言，或无从辨别史料之真伪，或随所好恶铺张压抑，或将己名付入藉此邀功，有一于此，则是非颠倒，黑白难分，寢假史迹淹没，习非成是，遂使开国至今三十余年，汗牛充栋之书，几成为恒钉黷祭之本，言念及此，感慨系之。

冯自由先生为吾党之先进，博闻强记，著作等身，年逾舞勺，即加入兴中会，亲炙总理，从事革命，于总理创业垂统之伟绩丰功，嘉谟嘉猷，以及诸先烈先进经邦纬国之精神，致命遂志之奇节，莫不亲见亲闻，参与其事。其于南方及国外之党务报务与军事活动，躬为主持者，历有年所。民国成立，出长稽勋局，旁求博采，访查考订，于海内外同志效忠党国之勋劳事绩，更深明晰。襄年以所搜集数十年资料与访问耆旧所得，证之本身之见闻经历，著成《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各二集，均属吾党珍贵史料，取材精审，考证确切，依历史之演变，辨性质之异同，发潜德之幽光，揭清政之黑暗，或显或晦，经其笔述，莫不趣味盎然，历历如绘，感人至深。出版以来，不胫而走，一版再版，风行遐迩。今者将其近年著述，辑为《革命逸史》多集，内蕴丰富，与前相埒，彰善瘅恶，正谬补阙，一人一

事，均堪为景仰先烈之资，加强国人对本党之认识，了然民国缔造之艰辛，阅历之险阻，确立共同之信念，而振发其爱国保种之心志，奠定民族复兴之始基，则其直接间接贡献于党国者，诚不浅矣。谨书数言，以为之序。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六月下浣孙科序于陪都

目 录

第一集

本书大意	(9)
弁言	(10)
自序	(11)
“革命”二字之由来	(15)
孙陈剪辫易服	(15)
亡命客之日本姓名	(16)
横滨兴中会	(16)
陈少白之辞章	(16)
杨衢云事略	(17)
黄咏商略历	(18)
孙总理行医广告	(19)
兴中会四大寇订交始末	(20)
孙总理之医术	(20)
革命初期之宣传品	(21)
兴中会之讨满檄文	(22)
区凤墀事略	(22)
圣教书楼	(23)
孙总理之文学	(23)
檀香山兴中会	(24)
中华民国旗之历史	(26)
郑士良事略	(29)

尤列事略	(30)
尤列事略补述一	(32)
尤列事略补述二	(35)
三十九年前之东亚时局形势图	(39)
邓荫南事略	(40)
余育之事略	(41)
谭发事略	(42)
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	(43)
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	(44)
横滨大同学校	(45)
章太炎事略	(46)
章太炎与支那亡国纪念会	(49)
章太炎等之护党救国公函	(51)
横滨《清议报》	(52)
梁启超介绍周孝怀书	(53)
陈少白时代之《中国日报》	(54)
东京高等大同学校	(58)
毕永年削发记	(59)
刘学询与革命党之关系	(61)
沈云翔事略	(63)
郑贯公事略	(64)
秦力山事略	(66)
李纪堂事略	(70)
横滨《开智录》	(72)
东京《国民报》	(72)
东京《国民报》补述	(73)
广东独立协会	(73)
励志会与《译书汇编》	(74)
王宠惠轶事	(75)
壬寅东京青年会	(76)
青年会与拒俄义勇队	(77)
河内博览会之中国志士	(79)
东京军国民教育会	(80)
广东报纸与革命运动	(82)
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	(84)

陈梦坡事略	(86)
横滨华侨学校	(87)
野鸡大王徐敬吾	(88)
秦毓璠事略	(89)
大阪博览会侮辱中国事件	(93)
日教员窃皮蛋之笑话	(93)
癸卯孙总理在日本状况	(94)
张能之与黎焕堦	(95)
上海《国民日报》与《警钟报》	(96)
美洲致公堂与《大同报》	(96)
苏曼殊之真面目	(112)
新加坡《图南日报》	(115)
林义顺事略	(118)
乙丙两年印行之革命军债票	(120)
朱少穆事略	(122)
未入革命党前之胡汉民	(124)
未入革命党前之胡汉民补述	(125)
胡汉民之谐诗	(126)
《中国日报》征联之大观	(127)
《中国日报》与菲律宾清领事涉讼记	(128)
李煜堂事略	(128)
庚戌新正广州新军反正记	(133)
李海云事略	(141)
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革命军起义实录	(143)
黄花岗一役旅加拿大华侨助饷记	(149)
武昌起义与黄克强	(156)
辛亥武昌起义之革命团体	(160)

第二集

本书第二集大意	(167)
自题《革命逸史》十首	(168)
孙眉公事略	(169)

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	(173)
孙总理被囚伦敦使馆之清吏笔记·····	(178)
老兴中会员谢纘泰·····	(181)
程奎光事略·····	(182)
程璧光与革命党之关系·····	(183)
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	(184)
记章太炎与余订交始末·····	(187)
女医士张竹君·····	(189)
《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	(192)
《革命军》作者邹容·····	(195)
兴国州人曹亚伯·····	(198)
日知会首领刘敬安·····	(200)
刘敬安与刘家运·····	(202)
记上海志士与革命运动·····	(206)
孙总理癸卯游美补述·····	(221)
《新湖南》作者杨笃生·····	(235)
《猛回头》作者陈天华·····	(237)
留欧学界与同盟会·····	(238)
二民主义与三民主义·····	(243)
中国同盟会史略·····	(246)
水牛将军田桐·····	(252)
田桐事略补述·····	(254)
杨卓霖事略·····	(258)
新福州建设人黄乃裳·····	(260)
鉴湖女侠秋瑾·····	(261)
丙午靖州禹之谟之狱·····	(264)
胡汉民入党时纪实·····	(269)
邓师爷十国请医生·····	(270)
谢逸桥事略·····	(270)
东军都督许雪秋·····	(272)
心社创作人刘思复·····	(276)
国会议员流血第一人伍汉持·····	(279)
南军都督王和顺·····	(281)
香港陈杨三家与革命党·····	(284)
《新世纪》主人张静江·····	(287)

记刘光汉变节始末·····	(289)
光复军司令李燮和·····	(290)
民国前之李登同·····	(292)
广东戏剧家与革命运动·····	(294)
缅甸华侨与中国革命·····	(297)
南洋请教员之笑话·····	(305)
上海《神州日报》小史·····	(306)
谢英伯之殛声·····	(309)
新小生李是男·····	(310)
关外大侠蒋大同·····	(312)
湖南都督焦达峰·····	(314)
邝佐治事略·····	(317)
温生财事略·····	(319)
清季之西北革命运动·····	(322)
鄂党人三盗金菩萨·····	(325)
女监学荣升监印官·····	(327)
彭家珍事略·····	(329)
旅美华侨组织空军始末记·····	(331)
粤记者陈耿夫被害始末·····	(333)
唐少川之生平·····	(336)
章太炎阴司听讼述异·····	(340)

目 录

第一集

本书大意	(9)
弁言	(10)
自序	(11)
“革命”二字之由来	(15)
孙陈剪辫易服	(15)
亡命客之日本姓名	(16)
横滨兴中会	(16)
陈少白之辞章	(16)
杨衢云事略	(17)
黄咏商略历	(18)
孙总理行医广告	(19)
兴中会四大寇订交始末	(20)
孙总理之医术	(20)
革命初期之宣传品	(21)
兴中会之讨满檄文	(22)
区凤墀事略	(22)
圣教书楼	(23)
孙总理之文学	(23)
檀香山兴中会	(24)
中华民国旗之历史	(26)
郑士良事略	(29)

尤列事略	(30)
尤列事略补述一	(32)
尤列事略补述二	(35)
三十九年前之东亚时局形势图	(39)
邓荫南事略	(40)
余育之事略	(41)
谭发事略	(42)
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	(43)
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	(44)
横滨大同学校	(45)
章太炎事略	(46)
章太炎与支那亡国纪念会	(49)
章太炎等之护党救国公函	(51)
横滨《清议报》	(52)
梁启超介绍周孝怀书	(53)
陈少白时代之《中国日报》	(54)
东京高等大同学校	(58)
毕永年削发记	(59)
刘学询与革命党之关系	(61)
沈云翔事略	(63)
郑贯公事略	(64)
秦力山事略	(66)
李纪堂事略	(70)
横滨《开智录》	(72)
东京《国民报》	(72)
东京《国民报》补述	(73)
广东独立协会	(73)
励志会与《译书汇编》	(74)
王宠惠轶事	(75)
壬寅东京青年会	(76)
青年会与拒俄义勇队	(77)
河内博览会之中国志士	(79)
东京军国民教育会	(80)
广东报纸与革命运动	(82)
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	(84)

陈梦坡事略	(86)
横滨华侨学校	(87)
野鸡大王徐敬吾	(88)
秦毓鎏事略	(89)
大阪博览会侮辱中国事件	(93)
日教员窃皮蛋之笑话	(93)
癸卯孙总理在日本状况	(94)
张能之与黎焕堦	(95)
上海《国民日报》与《警钟报》	(96)
美洲致公堂与《大同报》	(96)
苏曼殊之真面目	(112)
新加坡《图南日报》	(115)
林义顺事略	(118)
乙丙两年印行之革命军债票	(120)
朱少穆事略	(122)
未入革命党前之胡汉民	(124)
未入革命党前之胡汉民补述	(125)
胡汉民之谐诗	(126)
《中国日报》征联之大观	(127)
《中国日报》与菲律宾清领事涉讼记	(128)
李煜堂事略	(128)
庚戌新正广州新军反正记	(133)
李海云事略	(141)
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革命军起义实录	(143)
黄花岗一役旅加拿大华侨助饷记	(149)
武昌起义与黄克强	(156)
辛亥武昌起义之革命团体	(160)

第二集

本书第二集大意	(167)
自题《革命逸史》十首	(168)
孙眉公事略	(169)

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	(173)
孙总理被囚伦敦使馆之清吏笔记·····	(178)
老兴中会员谢纘泰·····	(181)
程奎光事略·····	(182)
程璧光与革命党之关系·····	(183)
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	(184)
记章太炎与余订交始末·····	(187)
女医士张竹君·····	(189)
《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	(192)
《革命军》作者邹容·····	(195)
兴国州人曹亚伯·····	(198)
日知会首领刘敬安·····	(200)
刘敬安与刘家运·····	(202)
记上海志士与革命运动·····	(206)
孙总理癸卯游美补述·····	(221)
《新湖南》作者杨笃生·····	(235)
《猛回头》作者陈天华·····	(237)
留欧学界与同盟会·····	(238)
二民主义与三民主义·····	(243)
中国同盟会史略·····	(246)
水牛将军田桐·····	(252)
田桐事略补述·····	(254)
杨卓霖事略·····	(258)
新福州建设人黄乃裳·····	(260)
鉴湖女侠秋瑾·····	(261)
丙午靖州禹之谟之狱·····	(264)
胡汉民入党时纪实·····	(269)
邓师爷十国请医生·····	(270)
谢逸桥事略·····	(270)
东军都督许雪秋·····	(272)
心社创作人刘思复·····	(276)
国会议员流血第一人伍汉持·····	(279)
南军都督王和顺·····	(281)
香港陈杨三家与革命党·····	(284)
《新世纪》主人张静江·····	(287)

记刘光汉变节始末·····	(289)
光复军司令李燮和·····	(290)
民国前之李登同·····	(292)
广东戏剧家与革命运动·····	(294)
缅甸华侨与中国革命·····	(297)
南洋请教员之笑话·····	(305)
上海《神州日报》小史·····	(306)
谢英伯之鼾声·····	(309)
新小生李是男·····	(310)
关外大侠蒋大同·····	(312)
湖南都督焦达峰·····	(314)
邝佐治事略·····	(317)
温生财事略·····	(319)
清季之西北革命运动·····	(322)
鄂党人三盗金菩萨·····	(325)
女监学荣升监印官·····	(327)
彭家珍事略·····	(329)
旅美华侨组织空军始末记·····	(331)
粤记者陈耿夫被害始末·····	(333)
唐少川之生平·····	(336)
章太炎阴司听讼述异·····	(340)

革命逸史

林森



第一集

本书大意

一、本书系将《逸经文史》半月刊三十六期内所载拙著《革命逸史》汇集而成。除前刊七则仍依照《逸经》第一期原本不失真外。其余概根据事实、时期、人物三者。分别先后。重行编排。

一、本书可与中华民国十七年出版之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中二编互相印证参考。盖《开国前革命史》乃载述每次革命运动之本末。而本书则特重个人传记及轶事。足以补《开国前革命史》所未及。二书体例可谓纯然不同。

一、《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下编编辑略已就绪。各地人士敦促出版之函牍，高逾盈尺。著者以环境及时势关系。未能早付剞劂。良用歉然。今特从下编内抽出可以发表之事实。先在《革命逸史》次第披露。以供快睹。

一、本书所载史料。除就著者记忆力所及分别录出外。其余概以香港《中国日报》及著者历年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为底本。惟挂一漏万。仍恐不免。海内外诸老友如能列举所知。匡其不逮。至所欢迎。

一、本书仅为《革命逸史》第一辑。尚不及著者身历及见闻种种事实十之一二。此后仍当陆续纪述。汇编付梓。以补正史所不及。

一、本书所载均属最有根据及最有价值之正史材料。以民国至今尚缺乏清季革命时代的正史之公布。故暂以“革命逸史”名之。

弁 言

白头宫女谈天宝，古董山人说晚明，
今古兴亡多少恨，狂歌当哭万千声。

民国肇建，迄今已二十有五载，查考昔年参与革命事业之关系人物，属于乙未兴中会时代之志士，固已零落殆尽。即乙巳以至辛亥前之同盟会员，生存者亦复寥寥可数。余前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迭出上中二编，已将清季海内外革命党人起义建国事实逐一纪述。自谓比之出版以前之任何记载为翔实。然是书专重史料，而于个人言行事迹及团体构造活动，则语焉不详。兹复列举余四十年来所记忆之旧闻轶事，或庄或谐，笔之于书，题曰“革命逸史”，用供正史稗史之助。昔唐室宫女闲谈开元天宝遗事，时人播为诗歌，方今寇患甚于安、史，将材谁是李、郭？作者不敏，亦自等于白头宫女云尔。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冯自由识于申江之不自由斋。

自序

吾国清代之有革命党，以兴中会为嚆矢。在兴中会以前，非无革命党也。如：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台湾朱一贵之中兴会，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台湾林爽文之天地会，嘉庆元年（一七九六）鄂、皖、豫、湘各省刘松、聂杰人、齐王氏等之白莲教，嘉庆十八年（一八一三）燕、鲁、晋、豫各省林清、李文成等之天理教，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洪秀全之太平天国，皆可谓之革命党。然其宗旨止限于反清复明之单纯的民族主义。而所企图，所建树，均不外夫以暴易暴一家一姓之帝王系统，于近代进化之民权主义无与焉。是只可谓之狭义的及私人的革命党而已。若夫揭橥民族民权两大主义，而开吾国历史之先河者，厥惟兴中会。

兴中会之发起，在于甲午（一八九四）秋冬间，及乙未（一八九五）九月重阳广东之失败。发起人孙中山先生偕陈少白、郑士良二君于是月下旬亡命至日本，首访余父镜如于横滨山下町五十三番地文经商店，商榷组织兴中分会事宜，时中山先生固与余父尚无一面之识也。溯余父之早年经商横滨，亦有故焉。余祖展扬世业儒医，清咸丰初年太平天国洪秀全遣部将陈金刚等谋在粤举兵响应，各府县从之者大不乏人。各以头裹红布为识，时人以“红头贼”三字称之。余祖即以交结“红头贼”嫌疑被清吏逮捕系狱，瘐死南海县狱。余父以是抱恨终天，愤然间关走日本谋生活，居横滨数十年。甲午中日构衅，清军败绩，余父益愤清政不纲，毅然剪除辫发。时旅日华侨无去辫易服者，有之独余父一人耳，故同国人咸称余父为“无辫仔”焉。是岁冬，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归国，舟过横滨，尝在船上向乘客及登轮侨胞演讲逐满救国。中有贩卖杂货商陈清者，听演说后异常惊奇，亟趋告余父。余父大为倾倒，立使陈清邀请中山先生登陆，共商国是。中山先生答谓该轮启碇在即，未便登陆，嘱陈清携兴中会章程及讨虏檄文一大束，交余父代为派送，借广宣传。且谓广东不日可以大举，约陈清回粤相助。是即余父与中山先生互订神交之经过。厥后陈清卒回粤参加乙未九月广州之役，其旅费即由余父所赠予者也。余父既接见中山先生，对于组织兴中分会事，极表同情。即召集余叔紫珊及有志侨商谭发、黎炳垣、温遇贵、陈才、黎简卿、赵明乐、赵峰琴、温炳臣等十余人，在文经商店二楼讨论立会事。旋设会所于山下町一百七

十五番地。众举余父为会长，赵明乐为司库。赵力辞，乃改推余叔紫珊。分会成立后一月，中山先生向各会员筹措赴檀香山旅费，各会员多以无力对，余父兄弟二人乃合筹五百元应之。中山先生得资，即与陈少白同时剪发易服，以百元赠郑士良，使回香港预备再举。另以百元给陈少白充用度。少白于中山先生离日后，即从余父言移居文经商店，其下榻之室，即余幼时所居者也。

当横滨兴中会成立时，余年甫十四耳。是岁夏余以母疾自粤莅日，余父命余夜习英文，日中无事惟读小说消遣，于国事实毫无所知。一日，有久未剃头发长逾寸之长衫客二人来访余父，余父引之至楼上客室，密谈多时乃去。余后始知来客姓名为孙逸仙、陈少白。嗣兴中会成立后约一星期，某日中山、少白、士良三先生在余家午膳，余侍末座。中山先生询余好读何书。余曰，好读小说。中山先生曰，好读哪部小说？余曰，《三国演义》。中山先生曰，《三国演义》人物汝最喜欢何人？余曰，孔明。中山先生笑曰，汝知喜欢孔明，即是明白古今顺逆之理。我等之兴中会便是汉朝之刘备、诸葛亮。今之满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马懿。我等之起兵驱逐满洲，即如孔明之六出祁山也。因谓余父曰，令郎能熟读《三国演义》，何不令其入会？余父遂命余填写誓约，此余以童年加盟革命党之原因也。时兴中会之宣传品仅有二种：一为《扬州十日记》，篇末附以清摄政王多尔袞及明阁部史可法来复二书；二为黄梨州《明夷待访录》选本之《原君》、《原臣》篇。均由余店代为印刷。余初读原君原臣，不甚了解，至《扬州十日记》则作小说读之，篇末之多尔袞、史可法二书，更能背诵不遗一字。此外足以增余知识之报章，仅有上海《时务报》及澳门《知新报》两种，然亦止倡导维新变法之论，于革命保种之真谛，固无关系。至己亥（一八九九年）秋，余始游学东京，渐博览《东华录》、《明季稗史》、《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卢骚《民约论》、孟德诗鸠《万法精理》诸书。遂于平等自由天赋人权之学说及世界革命民族自决之源流，豁然贯通。更印证以兴中会宣誓之宗旨，若合符节，益觉实行本会宗旨之职责为刻不容缓矣。自庚子至壬寅（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二）之三年间，余在日尝发起四事：一为与郑贯公等创刊之《开智录》，二为与李自重、王宠惠等组织之广东独立协会，三为与沈云翔、戢元丞、秦力山等合办之《国民报》，四为与章太炎、秦力山等召集之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此四事，均得中山先生为赞成人。于海内外之宣传，收效至巨。及壬寅以后，陈少白更聘余任香港《中国日报》驻东^①记者，美洲致公堂机关之《大同日报》，亦以该报驻东通讯员见委，此外东京之革命军事学校，及檀香山之《檀山新报》，新加坡之中和堂与《图南日报》，概由余传递消息，联络党谊。在同盟会成立以前，余之横滨寓所，不啻为革命党各方交通线之枢纽焉。

① 东，指东京。编者注。下同。

乙巳（一九〇五）七月，中山先生联合全国革命党各派兴中会、华兴会、日知会、光复会等，组织中国同盟会于东京，余亦第一日发起人之一，吾国革命党之采取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党纲者自兹始。然此三大主义之名称，仅初见于中山先生手撰是岁十月二十一日出版之东京《民报》发刊词，而同盟会誓约所明白规定者，只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之十六字而已。是岁八月初十日，中山先生以中国革命同盟会总理名义首派余归国设立分会于香港、澳门、广州各地，并专任《中国日报》记者。丙午（一九〇六）《中国报》改组，余任社长，自是南方各省之党务军务多由余主持之。就中直接指挥者，有丁未（一九〇七）四月潮州黄冈之役，及惠州七女湖之役，五月刘思复在广州谋炸李准之役，九月惠州汕尾运械之役；间接参与者，有丁未七月钦州防城之役，十月广西镇南关之役，戊申（一九〇八）二月钦州马笃山之役，三月云南河口之役，庚戌（一九一〇）正月广州新军反正之役，辛亥（一九一一）三月二十九广州黄花岗之役。当庚戌正月新军一役失败之后，余旋赴北美加拿大，任温高华埠《大汉日报》总撰述，并向旅加侨胞筹措军费，作辛亥三月广州革命军之供应。迨黄花岗一役既败，余复役于美国，协助旧金山洪门筹饷局募集资金，为辛亥大革命各省起义之需。武昌举兵后二月，旅美致公堂及同盟会洪门筹饷局等三团体公推余为美洲革命党总代表，回国参加组织共和政府事宜，并代携筹饷局两年内发行之革命军债金代币券收支总册向革命军政府缴呈报销。及归抵上海时，适在中山先生莅国之前数日。尝偕南洋革命党总代表吴世荣结伴赴宁，拟列席各省代表之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嗣以该会尚无华侨享受参政权之条文，仅能厕身旁听席而已。至民元正月一日遂随中山先生莅宁参与临时大总统就职盛典，旋委任府中机要。迄统一政府成立而止。此余民元以前历年奔走革命经过之大略也。

民元五月，余以孙前大总统及黄前陆军总长克强之推荐，受任为临时稽勋局局长。在职十五月，至民二七月下旬为袁世凯逮捕系狱而止。此十五月间，经本局及各省分局之剴切调查，对于海内外革命党人之大小事迹，搜罗征集，极为详尽。不幸中途为亡清帝制余孽所破坏，未克贯彻崇德报功养生恤死之大业，至为憾事！及民十七，国民革命军进驻北平，余乃致书行政院长谭延闿，谓查民元稽勋局档案尚由国务院分别保存，请其于派员接收旧政府卷宗时，一并妥为收管。后得谭院长复函，称已派秘书杨熙绩将此项档案移送南京行政院保管等语。民二十六冬，首都沦陷敌手，此项关于开国勋劳之重要文书，能否事前妥送安全区域，无从知之；万一亦随政府机关而付一炬，则真国家莫大之损失矣。

民十七春间，余以民国肇造既历十七星霜，而国人对于革命开国之往事，茫无所知，实足以影响国运之兴亡。乃发愤搜集三十年来所宝藏之各种书札笔记表册报章等等，并广征故旧同志所经过之事迹，笔之于书，凡一百万言，题曰《中

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以余在开国前十七年间之经历而言，自信此书实较出版以前之任何记载为翔实。此书上篇刊于民十七年十一月，中篇刊于民十九年十一月。下篇虽已脱稿多年，以时势及环境关系，至今未能付梓，良用歉然。然今日距此书上篇之出版又十年矣，环顾国内出版之开国记载，仍复浅陋不详，而国人对于辛亥前革命伟业，亦多数典忘祖，喜谤前辈，此真民国盛衰存亡之大关键也。余有鉴夫此，因续有《革命逸史》之作。

史有正史逸史之区别，吾国自周秦迄今三千年来，除官书而外，举凡民间记载及历代相传之遗闻轶事，皆逸史也。逸史又称野史，其所以异于正史者，则正史以简约明达要言不烦为主，而逸史之旨趣，则在于搜罗世闻之典章、故实、嘉言、懿行、旧闻、琐语、奇谈、艳迹，一一倾囊倒篋以出之。体例无须谨严，记载不厌琐细，既可避文网之制裁，亦足补官书之阙漏。如汉代刘向之《烈士传》，皇甫谧之《高士传》，伶玄之《飞燕外传》，刘歆之《西京杂记》，晋代裴启之《裴子语林》，唐代颜师古之《南部烟花录》，刘昫之《隋唐嘉话》，某氏之《大唐传载》，桃源居士之《唐代丛书》，郑处海之《明皇杂录》，王仁裕之《开元天宝遗事》，柳宗元之《龙城录》，李德裕之《次柳氏旧闻》，李浚之《摭异记》，宋代王君玉之《国老谈苑》，徐度之《御扫篇》，徐铉之《五代新说》，叶绍翁之《四朝闻见录》，欧阳修之《归田录》，道山先生之《道山清话》，某氏之《宣和遗事》，元代某氏之《三朝野史》，刘祁之《归潜志》，明代文秉之《烈皇小识》，徐昌国之《剪胜野闻》，陈继儒之《太平清话》，彭大翼之《山堂肆考》，余澹心之《板桥杂记》，清代某氏之《明季稗史》，王秀楚之《扬州十日记》，吕留良之《惟止录》，王士禛之《池北偶谈》，礼亲王昭槤之《嘯亭杂记》，宋荦之《筠廊偶笔》，薛福成之《庸庵笔记》，王韬之《洪杨纪事》，某氏之《清秘史》诸作，皆此类也。余前撰《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初拟毛举开国前十七年间所身历目睹革命党人可歌可泣之大小事迹，不拘庄谐雅俗，一律公诸于众，期使后学青年探本求源有所取法。顾以格于史律，有愿未偿，今兹《革命逸史》之作，即采古今笔记丛谈之微意，而补前著所未及者也。海内外诸同盟，咸有阐幽显微光先裕后之责，倘能抽取往日见闻，匡其不逮，余百拜谢之。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冯自由香江之大风社

“革命”二字之由来

在清季乙未（清光绪二十一年）年兴中会失败以前，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革命”二字为名称。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党人均沿用“造反”或“起义”、“光复”等名词。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总理、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总理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按日人初译英文 Revolution 为“革命”，但揆诸易所谓汤武革命之本义，原专指政治变革而言，故曰革其王命，又曰王者易姓曰革命。自译名既定，于是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之大变革，咸通称曰革命。今国人遂亦沿用之。

孙陈剪辫易服

余父镜如少经商日本横滨，营出版业，有商店在横滨山下町五十三番，曰文经活版所。甲午之战，旅日华侨多避难返国，及马关和议既成，侨商渐次东渡，余父仍有戒心，以生长香港，遂剪辫易服，求英国领事保护营业。旅日侨商之解除辫发者，实以余父为嚆矢。乙未余随父居横滨，时年十四。一日，见有久未剃头之长衫客二人来访余父，谓有密事相谈，良久始出。后乃知来客为孙总理、陈少白。盖余父素以任侠好义闻于时，总理初识船上行商陈清，及洋服商均昌号主人谭发，复由陈谭介绍来见余父。不数日，总理、少白同在余店解除辫发，衣服由谭发代制，与总理同行之郑弼臣，则因被派回国办事，暂未易服。

亡命客之日本姓名

最初留日之支那亡命客，多用日本姓名，以避日人歧视。陈少白留日较久，初取名服部次郎，丁酉（清光绪二十三年）孙总理自欧洲至日，亦取名中山樵，后数年复增称高野长雄。盖日本维新志士中有医士号高野长英者。总理以中山二字多为世人所知，故易新名以便秘密通信。高野之名称是由日友平山周代拟者云。甲辰以前通函署名多用中山，甲辰以后则改用高野。同时梁启超亦称吉田晋，盖慕日本汉学名士吉田松阴之为人云。

横滨兴中会

兴中会日本分会设于横滨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会员二十余人，众举冯镜如为会长，赵明乐为司库，赵峰琴为书记，冯紫珊为干事，谭发、温遇贵、温芬、黎炳垣、梁达卿、郑晓初、陈才、陈和等俱为会员。成立未久，总理提议向各会员商借五百元作赴檀香山旅费，明乐、峰琴为出口商永乐和号东主，资产颇富，与总理有同属耶稣教徒之谊。及闻总理提议筹款，乃大为反对，且不再莅会所，其余各会员多一筹莫展，遂由镜如、紫珊分任此数。总理乃以一百元给少白，一百元给郑弼臣，余充渡美川资。总理抵檀未久，即以五百元汇还冯氏昆仲，旅日侨商咸称总理言而有信云。

陈少白之辞章

陈白字葵石，又号少白，粤之新会人。丰姿俊美，才思敏捷，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有风流才子之号，惟度量褊狭，出语尖刻，人多惮之。与尤列（号少纨）性情不合，每相见即舌战不休，然辄为少纨所胜。兴中会初期缺

少文士，文告多出少白手笔，总理在香港雅丽士医学校与之同学，曾相拜盟为兄弟，故通信皆以吾弟称之。总理对同志中如此称呼者，少白一人而已。据少白所谈，在乙未前读书时期，一日自香港赴广州，同舟有鼻悬眼镜而蓄须之长衫客，自称李杜复生，谓当向客前题诗献技，一显身手。于是蹀躞众中，哦声不绝。旋得句云：萍水相逢未有期。良久不能赓续，众敦促之，则作色谓诗以思虑久而愈工，非不通文墨者所能置喙。少白至是不能复忍，乃起言曰，先生佳句久不赓续，容小弟代为续貂可乎？于是吟曰：怜渠颠蹇学吟诗。指其须曰：胡须八字成官样，复指其长衣曰：三尺咁长光棍皮。（广州土语之咁即这样之义，又粤人恒嘲长衣为光棍皮。）长衫客羞愧无地，连声小子荒唐不已。举座为之大笑。少白才思于此可见一斑。

杨衢云事略

兴中会最初发起人为孙总理，人皆知之，而其第一任会长则为杨衢云。杨名飞鸿，原名合吉，字肇春，又号衢云，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三都乡人。少在香港国家船厂学习机械，因失慎断右手中三指，乃改习英文。毕业后任香港湾仔国家书院教员，旋充招商局总书记，及新沙宣洋行副经理等职。其为人仁厚和蔼，任侠好义，尤富于国家思想。尝习拳勇，见国人之受外人欺凌者，辄抱不平。初与谢纘泰等创设辅仁文社于香港，以开通民智为务。乙未春孙总理自檀岛返，衢云与之志同道合，遂加入兴中会，设总机关于士丹顿街十三号，榜其名曰乾亨行，时为乙未正月二十七日。未几孙杨共商起义进行工作，总理任广州军事运动，衢云则驻香港，任募集死士及筹划饷糈。是年秋事机渐成熟，众议选举会长为建国时合众政府大总统之预备，衢云素有大志，坚欲得总统，谢纘泰等复拥戴之，总理不欲因此惹起党内纠纷，表示谦退，衢云由是当选。及重阳发难之役既败，衢云乃漫游越南、新加坡、印度、南非洲各埠，所至皆设兴中分会。以南非尊尼士堡，及彼得马尼士堡二处为成绩最优。丙申（清光绪二十二年）十月闻总理从欧洲至日本，乃东归访之。总理自乙未失败，颇咎杨当日措置失当之非，及闻衢云抵横滨，乃约至山下町修竹寄庐相见。是处为同志温炳臣、梁麒生等所设之俱乐部，总理少白常假之作会客所。时总理对杨责难备至，衢云俯首无辞，遂相好如初。自是衢云遂挈眷移居横滨，以教授英文为生活。己亥（清光绪二十五年）湘人毕永年与哥老会龙头李云彪、杨鸿钧、辜天祐诸人有联合全国各秘密会党，奉总理为首领之议。衢云于是辞退兴中会会长职，并荐总理自代。未几兴中、三

合、哥老三会代表在香港开会，同举总理为总会长。及己亥岁杪，总理谋在广州、惠州继续发难，衢云亦自告奋勇归香港大肆活动。庚子八月，惠州革命军起义于三洲田，连战俱捷，清吏震恐，南海县裴景福乃派属员植槐轩偕旧日党人陈廷威到港谒衢云，提出和议三事：一、招降党人各首领，以道府副将任用。二、准带军队五千人。三、给遣散费若干万。衢云以为有机可乘，乃以函电报告总理，谓此乃吾党莫大良机。如接纳清吏所求，此后有所凭借，大可为李世民之续等语。时总理驻台湾，复电拒绝此议。无何革命军败退，将领多匿居香港，清吏乃集矢于衢云，侦知衢云设帐于结志街五十二号二楼，教授英文，乃于是年十一月二十日暗买凶徒陈林刺杀之于教授室。先是粤督德寿尝出示悬赏三万金购杨首级，同志多劝衢云出洋暂避，衢云慨然曰：男儿死则死矣，何避为。吾宁授徒以养妻子，不忍虚糜公款，俾立一好模范为同人先云云。卒罹于难。诸同志葬其遗体于香港公共坟场第六千三百四十八号，遗一子二女。总理在横滨闻之，异常哀恸，乃于十二月初七日召集同志开会追悼于永乐楼，并募集捐款千余元，以恤其遗族。

黄咏商略历

兴中会会员黄咏商，粤之香山人，世居澳门。父名胜，任香港议政局议员，与大律师何启有戚谊。兴中会成立，总理以何为香港法律界前辈，关于法律外交事件多就商之。何介绍咏商于总理，咏商由是入党，大得众信任。咏商好读易，研究甚深，尝言物极必反，汉族已有否极泰来之象，清祚覆亡在即，吾人顺天应人，此正其时云。兴中会机关部命名“乾亨”，即咏商所定，盖取乾元奉行天命，其道乃亨之义也。广州重阳之役，咏商鬻其苏杭街洋楼一所，以充军费，得资八千元，及败挫，诸领袖多亡命海外，咏商独匿居澳门，未几以病去世。其子庆修，少经商南洋，民国后任商办广东银行暹罗分行经理，从未干谒当道，盖无人知其为建国勋旧之后云。

孙总理行医广告

孙总理在香港雅丽士医学校毕业后，初在澳门创设中西药局，悬壶问世，以外科解剖术蜚声于时。曾在镜湖医院剖一砂淋，大如鸡卵，权之重一两七钱有奇，时人诧为罕见。因营业日盛，大招葡国医生所忌。澳门例，非在葡政府取得行医执照，不得在当地操业。总理受葡医所排，遂不能在澳门立足，旋复设东西药房于广州洗基。以存心济世，赠药施医，所业较澳门尤为繁荣，乃添聘尹文楷助理诊务。由是交游日广，药房资本渐挪作别用，次年复以入不敷出，迫而收束。从此奔走上海、天津、檀香山各地，更无暇涉及医业矣。兹附录距今四十四年前癸巳十二月广州《中西日报》所载鸣谢广告及行医广告二则于次。

其一

孙逸仙先生学宗孔孟，业绍岐黄，合卢扁而擅专门，内治与外施并美；统中西而探奥旨，针砭并刀割兼长。其平生医学精纯，业经大绅诸公合词称颂，登诸岭南诸报矣。余也不敏，质朴无文，偶罹牙齿之灾，竟彻晨宵之痛，疾俨不伸之指，秦楚寻医，患同如捣之心，星霜屡易。诸医罔效，累月经时，幸遇先生略施小技，刀圭调合，著手成春，数月病源，一朝顿失。复荷先生济世为怀，轻财重义，药金不受，礼物仍辞。耿耿私心，无以图报。谨将颠末，爰录报端，用志不忘，聊摅微悃，不特见先生医学之良，抑以表先生人品之雅云尔。

武泌谨启

其二

春盎仙城 敬启者，本局敦请大医生孙君逸仙来省济世，旧岁底因事返澳度年，今已由澳回省，谨择月之初十日开办，所有赠医出轿规矩，一律如前。每日十点钟至十二点钟在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求医者，须在十点钟以前来局挂号，午后出外诊症，西关收轿金一元，城内南关西门河南等处轿金加倍，谢步随意致送。凡延诊者预早到局挂号，先生素以济人利物为心，若有意外与夫难产服毒等症，报明危急，无论贫富，俱可立时邀致，设法施救，幸毋观望，以免贻误，此布。

洗基东西药局谨启

兴中会四大寇订交始末

四大寇者，革命时代孙总理、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四人之绰号也。杨为广东香山翠亨村人，生于澳门，家世豪富，性不羁，喜谐谑，与总理结识最早。有商店在香港歌赋街曰杨耀记，尝在店内独辟一楼，为友朋聚集谈话之所。总理至港，恒下榻其间。尤列，字少纨，顺德人。自幼好与洪门会党游，久有兴汉逐满之志。当总理习医于广州博济医院时，有尤裕堂者，早年在博济医院毕业，悬壶于顺德乡间，偶因事偕其族人尤少纨至博济访旧，道经十三行，见有博济学生孙逸仙、郑弼臣、邓景晖等，因购荔枝事与水果店有所争执，裕堂遂向前劝解，相偕回博济叙谈，并介绍少纨与总理及弼臣相识，是为孙、尤二人纳交之始。陈少白原名夔石，后改名白，字少白，粤之新会人，广州格致书院（即今岭南大学）开创时为第一期学生。其父子桥之友区凤墀以其少负奇气，乃介绍之至香港雅丽士医学校访总理，少白从之。晤总理后，一见如故，总理劝其改入医校，以便晨夕切磋，少白于是迁港，同学二载，以天性不近辍学，在此期内，少纨亦在港任华民政务司署书记。故孙、陈、尤、杨四人每日在杨耀记高谈造反覆满，兴高采烈，时人咸以四大寇称之。乙未（一八九五年）九月广州失败之后，总理奔走海外，力谋举兵，百折不磨。少白在香港主持《中国日报》，宣扬革命，不遗余力。少纨创中和堂于南洋群岛，且发刊《图南报》，开南洋革命报纸之先河。独鹤龄蜷伏澳门，无所表见。民十，总理修治广州观音山文澜阁，特招少白、少纨、鹤龄三人居之，盖不忘兴中会前四大寇之旧谊云。壬辰（一八九二年）十月十五总理于医校毕业后数月，曾与少纨、少白、鹤龄、关心焉等合摄一照。关号景良，与总理同学医校，后总理一年毕业，至今尚在香港行医，即站立四人背后者是也。

孙总理之医术

孙总理在香港肄业之医学校，乃香港议政局员何启律师为纪念其英籍亡妻雅丽士所设。总理在校五年，各科考试，均满百分之数，以第一人毕业，其证书经

校长及教员十三人试官八人及牧师书记署名，由香港总督罗边臣于一八九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给发。既毕业，遂在澳门创设中西药局，悬壶济世，诊治贫困，概不取值，人咸德之。当地有镜湖医院为华人公立，向用中医中药施治贫病，总理屡请其兼用西医西学，以济中医所不及，并愿充当义务，不受薪金，该医院竟破例从之。由是中外人士多就总理诊治，莫不著手成春，称为国手。对于解剖术，尤为精妙。其师简地利恒到澳门助其工作，辄为赞叹不置。次年，中西药局迁于广州，总理遂借医术以纳交于官绅之门，为革命之运动。清吏以其名高学博，无疑之者。及乙未事泄，亡命海外，从此专心国事，不复从事悬壶生活，然有时偶为亲友治病，有发必中。据其母舅杨文炳所谈，癸卯（一九〇三年）总理由日至夏威夷岛，旧日亲友，每有疾病，辄就之求诊，强而后可，惟一药便瘳，众咸惊为神奇。故其太夫人杨氏尝有言：革命目的在救人，行医目的亦在救人，等是救人，何必东奔西跑；其兄德彰曰：行医只能救少数人，革命则能救多数人，吾弟奔走革命多年，应始终一贯，岂可轻易变更，前功尽弃云云。闻者咸奉为至言，戊申（一九〇八年）居新加坡时，中兴报记者□□□眷恋粤妓金屏，偶患口疾，总理一观其容颜，便知其所染何病，即为诊治开方，一星期而愈。总理毕生平时不服补药，余居东时偶见其服次亚磷，谓凡患神经衰弱者及多用脑者最宜服之，且劝余试服。余时适患脑疾，服之一年，竟获奇效。余当日尝叩之曰，先生如再行医，须补习若干年而后可。总理答曰，必须用功一年，始敢问世云。

革命初期之宣传品

兴中会初期，文人墨士极感缺乏，所用宣传工具，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单行本数种。同时康有为派所出版杂志，风行内外。戊戌前有上海《时务报》、澳门《知新报》；戊戌后，有横滨《清议报》、《新民丛报》、神户《亚东报》、新加坡《天南新报》、檀香山《新中国报》、旧金山《文兴报》、纽约《维新报》、澳洲《东华新报》等等。革命党对之，实属相形见绌。因是素恃为兴中会地盘之横滨、檀香山二处，竟为保皇党所夺。己亥秋总理始遣陈少白至香港组织《中国日报》，是年十二月出版，是为革命报纸之滥觞。然因操笔政者，短于欧美新思想，颇不为学者所重视。庚子以后，东京留学生渐濡染自由平等学说，鼓吹革命排满者日众，《译书汇编》、《开智录》、《国民报》缤纷并起，《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新湖南》、《江苏》各月刊继之，由是留学界有志者与兴中会领袖合冶为一炉。革

命出版物，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在壬寅（清光绪二十八年）上海《苏报》案前后，已渐入于革命书报全盛时期矣。

兴中会之讨满檄文

乙未兴中会曾预印讨满檄文及英文对外宣言，准备于发难时颁布中外。檄文由朱淇起草，对外宣言则由何启及英人邓勤（Chesney Duncan）黎德（Thomas H. Reid）等任之。此项印刷品，于此役事泄时，已为党人毁弃无余。檄文底稿藏于双门底王家祠云岗别墅之石壁内，后竟失之。尚有党人名册及他种文告，储双门底圣教书楼后之福音堂，亦为耶稣教徒左斗山等投诸井中。朱淇字棗孙，粤之南海人，长于文学，故总理以草檄事属之。朱之兄颀生向任西关清平局书记，知乃弟名列党籍，虑覆其家，乃使其所属勇目向粤吏告密，期将功赎罪，是为此役事泄原因之一。事后党人咸集矢于朱，指为变节卖友。独区凤墀力代申辩，谓于失败之日，曾与朱父子同舟赴香港避难，足证其冤云。朱后于光宣间，至青岛创办《胶州报》，党人避难青岛者，多倚为东道主。辛亥复移至北京，改名《北京日报》，因持论不务新颖，殆无人知其为革命先觉也。邓勤时任香港《士蔑英文报》记者，黎德则任《德臣英文报》记者，当日两报均抨击满清政府，不遗余力，兴中会于外交事件颇得其助。

区凤墀事略

孙总理之汉文教师区凤墀，为广州有名之基督教宣教师，总理在檀香山基督教学校毕业后，返香港乃拜区为师，发奋学习国文。当其在港教会受洗礼时，名籍下尚署孙日新，盖取大学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其后区为之改号逸仙，而逸仙之名逐渐轰传于世界。区长于文学，尝在德国柏林大学担任汉文教授数年，归国后寄寓广州河南瑞华坊其婿尹文楷家。总理时亦同居，所创农学会宣言即出区手笔，大意以改良农业、挽救中国贫弱为旨，载诸甲午（一八九四年）广州《中西日报》。乙未（一八九五年）重阳失败之次日，区亦避居香港，旋充英政府华民政务司署华文总书记。己亥（一八九九年）陈少白

在香港发刊《中国日报》，颇得其助。其婿尹文楷初与总理同操医业于广州洗基东西药局，后因党祸牵涉，乃迁寓香港。

圣教书楼

广州双门底圣教书楼为基督教徒左斗山所设，其司事曰王质甫。总理初在广州业医，以同教之关系，假该楼为诊察所。左笃信新学，而病重听，有大聋子之称，凡属上海广学会出版之西籍译本如林乐知、李提摩太所译泰西新史揽要，西学启蒙十六种，万国公报等类，皆尽量寄售，实为广州惟一之新学书店。店内后进为基督教礼拜堂，每星期讲道由王质甫兼任之。左又于卫边街租一大厦，名曰“大光观书楼”，陈列古今中外图书及新旧约圣经，供人观览，延苏复初主其事。左王皆先后为兴中会员。乙未广州重阳之役，杨衢云在香港以长短枪六百杆，伪装胶坭，寄圣教书楼王质甫名收，为海关破获，左斗山因是被捕，得美领事保释。先是粤督谭钟麟因闻党人多属教徒，密令王道台存善会同西牧师香秉文到轮船码头截拿，王质甫得香牧师密通消息，步行赴韶关入江西走脱。王原籍江西，乙未后避地日本，旋返广州谋事，与官场中人颇有往还，谣传已被粤吏买充密探，使侦伺党人行动，故党人遂避之如蛇蝎云。

孙总理之文学

总理自幼读于故乡翠亨私塾，稍长至檀香山，肄业于基督教学校，于英文虽获优奖，而于国学自嫌浅薄。归国后初拜区凤墀为师，勤读不辍。及至博济医院习医，乃延一汉文教师陈仲尧，每日到寓教授。次年转学香港医校，陈亦同行，遂仍日就陈读。至港校毕业时，所学亦已大进，人咸讶其进步之速，迨后迭在澳门广州业医，仍手不释卷。甲午（一八九四年）尝草上李鸿章书，过上海时，就正于太平天国状元（？）王韬，王为易数语而已。丁酉（一八九七年）在横滨撰讨满宣言，分派华侨商店，有“侵三江而踞两湖直捣燕京”之句，殆脱胎于王勃《滕王阁序》。甲辰（一九〇四年）在檀香山与《新中国报》笔战，特撰《驳保皇报》一文，载于《隆记报》，又在旧金山为洪门致公堂手订致公堂重订

新章要义，及新章程八十条，皆自出心裁，不假人手，为海内外人士所传诵。总理生平不喜读小说，而于小说之章回目则颇娴熟。丙午（一九〇六年）居东京时，尝效小说体，戏撰一联赠邓慕韩、陈和二人云：“邓师爷厨房演说；陈和叔冷巷失鞋。”盖邓绰号师爷，时章太炎、张溥泉、田桐、胡汉民等日在总理寓所高谈革命，邓在座无从置喙，乃入厨下，向厨子陈和及日本下女大讲时政，兴高采烈，声震户外。陈和亦属同志，性好赌，常以买菜钱供一掷；有一次因赌输金尽，乃扬言在冷巷失其鞋，欲总理给资再购。冷巷系粤语，即俗称走廊，日本建筑，走廊设于室内，日俗席地而坐，鞋履均置室外，走廊决无失鞋之理。厨房演说及冷巷失鞋二事皆属罕见，故总理以此嘲之。

檀香山兴中会

檀香山为兴中会发源地。总理于癸巳年在广州广雅书局抗风轩尝与尤列、陆皓东、郑士良等有此建议，惟无具体组织。甲午秋，因至天津上书直督李鸿章条陈改革，为李所拒，遂重游檀岛，向旧日亲友求助。总理少在檀岛基督教学校肄业，同学及故旧至众。其兄孙眉（号德彰）为夏威夷茂宜岛大畜牧家，富甲全岛，有牛千数百头，土人咸以“茂宜王”称之。其时华侨风气尚未开通，闻总理有作乱谋反言论，咸谓足以破家灭族，虽亲戚故旧亦多奔避不遑。总理居檀数月，苦心孤诣，仅得同志数十人；初假卑涉银行经理何宽宅开会，参加者有何宽、李昌、邓荫南、邓金、黄亮、钟木贤、刘祥、刘寿、黄华恢、曹彩、李禄、刘卓等十余人，即由总理提议定名曰兴中会。众举总理为会长，李昌、何宽、黄华恢等分任干事。总理提议发行革命债券，规定成功日加倍偿还，前后约得香港银数万元。是年冬，总理归国，将有事于广州。檀岛同志随行者有邓荫南、陈南、宋居仁等数人。己亥冬，梁启超奉康有为命赴檀岛开办保皇会。时总理与梁方谋联合改组新党，友谊至笃。梁矢言此行决不违反初衷，必于改组新党事大有裨益，特求总理作函介绍其兄德彰及兴中会同志。总理坦然不疑，竟从所请。梁于是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檀，持总理介绍书谒李昌、何宽、黄亮、邓金、卓海、钟木贤诸人，颇受欢迎。梁是时有书致总理云：“逸仙仁兄足下：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檀，今已十日。此间同志大约皆已会见。李昌兄诚深沉可以共大事者。黄亮、卓海、何宽、李禄、邓金，皆热心人也。同人相见，皆问兄起居，备致殷勤，弟与李昌略述兄近日所布置各事，甚为欣慰。令兄在他埠，因此埠有疫症，彼此不许通往来，故至今尚未得见，然已彼此通信问候矣。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

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匆匆白数语，余容续布。此请大安。一月十一日”云云。（原书现由余保存）梁复赴茂宜岛访孙德彰及总理母舅杨文炳。德彰招待优渥，且令其子昌执弟子礼。梁至檀数月，即提议组织保皇会，因对兴中会员不易措辞，乃诿称名为保皇，实则革命。李昌等以彼为总理介绍，不知其诈，竟为所愚。于是兴中会员多变为保皇会员，大势为之一变。先是檀埠疫疠盛行，美国官吏纵火大焚疫区，以杜传染，华人财产损失不赀，因而仇恨外人之观念日炽。梁知人心可用，乃昌言惟保救光绪复辟，始能拒御外侮，侨商信之，捐助勤王军饷者大不乏人。梁居檀半载有余，募得款项华银十余万元，另招上海广智书局股银五万元，至七月十八日始启程返日本。总理初闻梁专心组织保皇会，尝驰书责其失信背约，梁竟无辞以答。及孙眉使其子昌随梁至日留学，总理惟有深悔无知人之明耳。甲辰（一九〇四年）春，总理自日本渡檀。时兴中会员多已变节，存者寥寥可数。保皇会有机关新闻曰《新中国报》，主笔政者为前澳门《知新报》记者陈继俨，攻击革命，不遗余力。同时该埠有一旧式报馆曰《檀山新报》，又号《隆记报》，为总理戚属程蔚南所主办。总理感于势孤寡助，乃自撰论文，与陈继俨大开笔战，尝为《驳保皇报》一文以警告保皇会员，并助程将《隆记报》重新改组，特函托余介绍《中国报》记者陈诗仲至檀担任笔政。适陈诗仲已就新加坡《图南日报》之聘，乃改延张泽黎（号孺伯）任之。总理以将赴美国，虑为保皇会作梗，妨碍入境，知美洲洪门致公堂势盛，遂在檀加入洪门，藉为进行革命之助。檀埠致公堂职员，时列名保皇会籍者颇众，竟有提议阻止总理之加入者。洪门老叔父钟水养斥之曰：“洪门宗旨在于反清复明。总理未入洪门，已实行洪门宗旨多年。此等人应招纳之不暇，何可拒之门外，致貽违反宗旨之诮乎？”反对者不能对，总理遂获入闾（洪门称加盟曰入闾），由主盟员封为洪棍（洪门称首领曰洪棍）。其后总理自檀渡美，保皇会竟勾结关员阻其登陆，羁留木屋者数日，赖旧金山致公堂设法营救，始获入境，则洪门会员患难相扶之力也。总理此次到檀，复印制一种美金十元之军需债券，载明“此券实收美金十元，俟革命军成功之日，见券即还本息百元。西廿纪〇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发”字样。因兴中会地盘已为保皇会蚕食过半，购者寥寥，全数仅得二千余元，以视梁启超所筹之数，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矣。

中华民国旗之历史

清季革命党所用国旗之方式有数种：最初为兴中会所用之青天白日旗，次为中国同盟会所修订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迄辛亥武昌举义，更有共进会所用之十八星旗、上海光复所用之五色旗、惠州陈炯明所用之井字旗。兹分别叙述其源流及沿革如次：

兴中会之青天白日旗 乙未（一八九五年）春，孙总理杨衢云等日在兴中会香港本部乾亨行商议攻取广州策略，据兴中会员谢纘泰英文笔记所载，是年阴历三月十六日（旧历二月二十日）兴中会干部开会，议决挑选健儿三千人由香港袭取广州之方法，及采用青天白日为国旗之方式，以代满清之黄龙旗云云。纘泰为衢云密友，每次会议恒参与机要，其言至有根据。此旗之方式系陆皓东所设计，皓东即殉于是役，为民族革命流血之第一人。自乙未重阳日广州失败后，青天白日旗初用诸军事者，为庚子（一九〇〇年）闰八月惠州三洲田之革命军，其后尤列至南洋各埠创立中和堂，令各会所均悬挂青天白日旗，海外华侨团体以革命党徽号为标帜者自此始。当时旗上所排列叉光，多寡不一，缝制者多莫名其妙，后经总理解释，谓叉光即代表干支之数，故叉光应排作十二，以代十二时辰，自是旗上叉光之数始确定不易。

同盟会之红蓝白三色旗 乙巳（一九〇五年）七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翌年冬，同盟会召集干事会编纂革命方略，并讨论中华民国国旗方式问题，总理主张沿用兴中会之青天白日旗，谓乃陆皓东所发明，兴中会诸先烈及惠州革命军将士先后为此旗留血，不可不留作纪念。各党员亦提出他种方式，有提议用五色，以顺中国历史上之习惯者；有提议用十八星，以代表十八行省者；有提议用金瓜钺斧，以发扬汉族之精神者；有提议用井字，以表示井田之义者；黄克强对于青天白日，颇持异议，谓形式不美，且与日本旭旗相近。总理争之甚力，且增加红色于上，改作红蓝白三色以符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之真义。仍因意见分歧，迄未解决，后经章太炎、刘揆一设法调解，暂搁其议。于是各种方式均由庶务干事刘揆一保存，作为悬案。然自后丁未（一九〇七年）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钦州防城、广西镇南关，戊申（一九〇八年）钦州马笃山、云南河口，庚戌（一九一〇年）正月广州，辛亥（一九一一年）三月广州诸役，党军咸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三色旗为革命标帜。克强迭任主帅，从无反对之表示，故在革命历史上，青天白日旗之为中华民国国旗，实无疑义。

潮惠革命军之国旗 同盟会干部制定革命方略之后，依革命方略第九章因粮规则第二节丁项军事用票第一条之规定，革命军所发行军事用票，一律冠以国旗，并绘成国旗方式，颁发革命军各都督及同盟会各埠分会长使用。丁未春，总理以总理名义任许雪秋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又任邓子瑜为东军惠州司令，以余时任同盟会香港分会长，特令赞襄潮惠军务。余接受本部颁到新定国旗方式后，乃使余妇李自平在《中国日报》四楼依样密缝制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四挺，分给许雪秋、邓子瑜各二挺，备举义时应用。是年四月十一日，余丑、陈涌波等仓卒举义于潮州饶平县黄冈城，许雪秋时在香港，不及往。革命军既克黄冈，余丑等率众誓师并拍照纪念，照中右侧有人手持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立于其旁者陈涌波也。考清季革命军起事者二十余次，其能从容拍照纪念者，只有潮州黄冈一役，是役所用国旗即余所颁发。

镇南关炮台上之革命旗 丁未十月二十七日，黄明堂、关仁甫、李祐卿率革命军占据广西镇南关炮台，镇南镇中镇北三台均高悬青天白日旗，十一月初四日以弹药告罄，粮食不继，不得已下令退却。时清军取包围式，向山上环攻，明堂等率众冲围而出，及至半山，军中有一小童回顾台上青天白日旗未撤，虑为敌军所得，竟以一人冒险，重登山巅，取回此旗，全军将士咸为称赏不置，诚国旗史上之一佳话也。

庚戌新军反正之红旗 庚戌正月元旦日，倪映典率新军反正于广州东郊，先是香港同盟会机关部以倪运动新军渐臻成熟，乃于己酉（一九〇九年）十二月赶制青天白日三色旗百具，以供军用。秘密制旗之地所有二，一在九龙城孙寿屏（总理之兄）农场，寿屏与其友杨锡初任之，一在湾仔东海旁街七十六号四楼冯宅，卢桂屏（余之庶母）及陈淑子（胡汉民夫人）李自平数女士任之。寿屏之农场原假诸陈少白，邻接少白寓所，少白虑为英警吏侦悉，再三向寿屏警告，寿屏乃将布料缝车等件尽移至冯宅，合力缝制，数日内成三色旗百余幅，由徐宗汉（后为黄克强夫人）等藏于卧具中，密运至广州各机关备用。及元月初三日新军反正失败，倪映典死之，当日报载倪身穿蓝袍，手持红旗，驰马督队前进，即此青天白日满地红之国旗也。又革命党人事前在城中预设机关数处，拟于举兵时分头纵火，以乱清吏耳目，迨新军发动，高第街宜安里机关于纵火后旋即扑灭，徐宗汉探悉所贮藏国旗之被褥为警吏移至区署，乃托女友庄汉翘取回原物。诎该被褥为火毁去一角，红布外露，警吏已查悉为党人用旗，时汉翘尚未入党，绝不知被褥中藏有危险物，茫然投警局报领。警吏谓必须物主到署亲领始可发还，宗汉至是始知事情败露，乃挈汉翘逃往香港。于此可知当日警吏不欲遽兴党狱，否则跟踪探索，徐庄何能免耶。

革命军债券面之国旗 辛亥三月黄花岗一役之前，总理到美洲筹募饷糈，尝用中华革命党本部总理孙文之名，由旧金山筹饷局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券之正

面刊有青天白日满地红之三色旗，反面刊有青天白日旗，均由总理亲手绘样，交会计李公侠印制，美洲华侨之认识革命旗章自此始。及八月武昌革命军兴，所揭橥者为共进会之十八黄星旗，而非青天白日旗。保皇党报纸乃借口引为抨击革命党之资料。余时主旧金山《大同日报》笔政，因为中华民国旗之历史一文以解释之，且说明三色之意义曰：红者血之色，言必流血而自由可求也；青者天空之色，即公正之义，言公正即平等也；白者清洁之色，言人心清洁乃能博爱也。此文后为上海《民立》、《天铎》二报及商务印书馆印行之革命小册先后转载。

辛亥革命军旗章之异同 武昌起义之后，各省革命军所用旗章计有四种，（一）为共进会焦达峰、孙武等之十八黄星旗，即武汉义师所用。（二）为上海江苏军政府之五色旗，乃宋教仁、陈其美所提议。（三）为广东军政府之青天白日三色旗，此为革命军历次所常用。粤为革命策源地，人民认识此旗已久，广州光复之先，粤绅江孔殷率清防营败民军陆领、谭义所部于顺德乐从墟，夺获青天白日旗多具，其后江说张鸣岐李准反正，欲悬革命军旗以示无贰心，各界匆遽觅革命旗不得，江乃出其俘获品以赠，即其时高悬于谘议局之上者是也。（四）为陈炯明在惠州举兵之井字旗，此旗式原为丙午年廖仲恺在东京所提议，廖陈同隶惠州籍，陈闻同盟会本部尝有此提案，遂采为己军之标识，嗣会师广州，始废置不用。要之此四种旗章均不出丙午年东京同盟会本部提案之方式，青天白日旗在事实上虽已屡用于粤、桂、滇三省义师，然当日干部会议，各省代表咸参与其间。迨辛亥革命，各省有力同志多根据旧日悬案，逞奇立异，各树一帜，此十八星旗及五色旗井字旗所以随青天白日旗而纷然并起也。

总理对于国旗之新方案 总理以黄克强有青天白日旗形式不美之批评，故戊申居新加坡时尝将此旗内容再三润饰。拟将旗上青红二色增加小方格，且于红色上横添白线，以示美观。曾指导陈淑字女士（张永福夫人）绣制新旗式，以示同志，其图案今尚由张永福保存之。民元南京政府成立时，发生国旗问题，总理乃于总统府办公室内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新图。旗中红色之上横添白线若干，每一线即代表一行省，总统府职员及宾客多见之，惟此新旗式尚备而不用，总理始终未向政府提出之。

青天白日用作海军旗之原因 民元南京政府建立后，鄂、湘、赣三省用十八星旗。粤、桂、闽、滇、黔数省用青天白日三色旗，江、浙、皖及各省多用五色旗。各省派出之援鄂军及北伐军，旗章各异，颇为复杂。时海军部请示大总统应用何种旗式，总理令用青天白日三色旗，并派海军部员邓某（邓世昌之子）慰劳沿江舰队，向海军将士说明青天白日旗与历次革命之关系。由是全国各军舰一律以青天白日三色旗为国徽，更在旗内红色之上横添白线若干，另定为海军旗，至今尚沿用之。

参议院折衷制定国旗之经过 参议院既迁北京，为国旗方式问题，尝发生剧

烈之争议，最后乃采纳折衷派意见，议决以沪军都督府所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足以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最为普遍，确定为中华民国国旗。武昌起义之十八黄星旗为陆军旗，同盟会之青天白日三色旗为海军旗，由政府正式公布之。总理闻之颇为不怿，然是时同盟会员在参议院不能占过半数，且院内共和党内之同盟会分子徒知拥护武昌起义之纪念品，不愿为母党之助，结果能予保留而制定为海军旗，已属幸事矣。

中华革命党党证之国旗 癸丑（民国二年）各省讨袁军失败后，总理组织中华革命党于日本东京，遂恢复同盟会旧制，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党旗，所颁发党证及委任状奖状即用此项国旗党旗各一交加于上。乙卯（民四）起义于山东潍县及广东各地之中华革命军，亦概用此种标帜。迨民九粤军自漳州返粤，总理再由非常国会当选大总统，始公然宣布废止五色旗及十八星旗，而分别制定青天白日为国旗军旗。民十，陈炯明、叶举等叛变，总理避地上海，陈炯明一反总理所为，青天白日旗亦同遭此厄。

中华民国旗之确定 民十二年总理在粤重组织大元帅府，就职日正式举行阅兵授旗礼，青天白日旗复飞扬于广州。适是年全国学生会在广州召集大会，请总理于开会日莅场指导，行礼时，总理见堂上悬五色旗，竟不为礼。演说间，乃说明青天白日旗与五色旗之异同，及在革命史上之价值，众始了解。民十三，总理乘中山舰北上，道经香港，舰上悬青天白日旗。英吏遣人相告曰：如改悬五色旗，当以礼接，盖青天白日旗之为国旗尚未经国际承认也。总理毅然不恤。及民十六，革命军攻克南京，平津旋亦底定，无何，张学良且拒绝日人警告，令东北四省尽改悬青天白日旗，由是中国国民党统一全国，各国虽欲不正式承认，不可得矣。

郑士良事略

郑士良字弼臣，广东归善县淡水墟人。少有大志，尝从乡中父老练习拳技，颇与邻近绿林豪侠及洪门会党相往还，渐具反清复汉思想。及长至广州求学，初负笈于油栏门德国教会所设礼贤学校，遂皈依基督教。毕业后入博济医院习医，与孙总理、杨襄甫、廖德山等同砚，因总理与之志同道合，引为知己。未几，总理转学香港，郑亦辍学归惠州，开设同生药房于淡水墟，专从事联络三合会党，为举事之预备。乙未总理归自檀岛，决计大举，初以运动香港九龙新安等处会党之责委郑任之，后以杨衢云自告奋勇，乃使郑专任联络省城附近会党事宜，准备

发难时克期齐集。迨事机渐熟，众拟在香港乾亨行选举总统，为临时政府领袖。杨衢云坚欲得总统，尝亲对总理言，谓非此不足以号召中外。郑大反对，声言此席众咸属意总理，如有他人作非分想，彼当亲手刃之。总理深恐因此发生内哄，力劝郑勿暴动，以顾存大局，而总统一席卒为衢云所得。及重阳发难之役顿挫，郑随总理亡命日本。庚子奉总理命经营惠州军事，所有惠、潮、嘉各属会党及绿林首领黄福、黄江喜、梁慕光、黄耀廷诸人俱受节制。因久候日本船运载军械不至，再三愆期。至是年闰八月三洲田革命军司令部渐为粤吏侦知，特派提督何长清率兵围剿，统将黄福以清军步步压迫，不能复忍，遂于是月十五夜率死士八十人暗袭何长清所部于沙湾镇，大破之。初拟乘胜进取广州，会郑士良从香港来，宣布总理自台湾来电所述船械被阻原因，遂变更计划，改途东北以向厦门，冀于沿海岸迎候总理运械接济。当郑未来之先，军中事权暂由黄福主持，黄耀廷则任先锋。迨郑既到，遂由郑发号施令，旗垒为之一新。二十二日大军至镇隆，擒清营管带杜凤梧及敌兵数十人，掳获军用品无算。二十四日与清将马维骥、刘邦盛、莫善积所部五六千人大战于永湖，邓万林中枪堕马，清军溃退。革命军追击至白芒花始收兵回。二十六日清军据守崩岗墟，数约七千人。革命军先以小队袭敌，继乃绕道包抄，清军首尾不相顾，遂狂奔而逃。二十八日进至三多祝，四乡归附者日众，有众二万余人，声威大振。方拟厚集粮食，取道梅林东向，忽接香港经海丰来使传达总理命令，谓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云云。时革命军正缺乏弹药，得电知事无可为，大为懊丧。郑等遂解散所部，分水陆两路退回三洲田大寨，旋先后避地香港。辛丑（一九〇一年）郑复奉总理命，自日本返香港有所活动，是年七月某日与《中国报》记者郑贯公同志陈和等饮于水坑口宴琼林酒楼，忽觉不适，贯公陈和送之回寓，道经永乐街《中国报》，贯公扣门欲入，则郑已毙于手车上，乃直送赴警局。其夫人钟氏闻讯请官检验，医言验无伤痕，系中风所致，一说谓实由清吏购使郑友郑梦唐下毒食品中杀之云。

尤列事略

兴中会成立以前，孙总理、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四人恒假香港歌赋街杨耀记商店（鹤龄先代所遗）高谈造反讨满，故有四大寇之号，时人辄称造反作乱者曰寇。杨耀记店伙闻总理等放言无忌，遂以此名称之，而四人亦居之不辞。尤列字令季，又号少纨，别号吴兴季子，粤之顺德人，少肄业于广州算学馆，历充

广东舆图局测绘生，香港华民政务司署书记等职。杨鹤龄亦舆图局学生，尤一日至杨耀记访鹤龄，初识总理，时有友多人在座，尤指总理语座客曰：此君之头脑大似洪秀全。总理应之曰：你是游智开。盖尤游同音，而当时广东巡抚即游智开也，满座为之粲然。岁癸巳（清光绪十九年）总理设东西药房于冼基，尤亦设兴利蚕子公司于顺德。旋由尤假得城南广雅书局内抗风轩为同志谈话所，总理与程耀宸、程奎光（璧光昆仲）、陆皓东、魏友琴、郑士良（号弼臣）等预焉。总理提议曰，吾人既同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经发起一会，名曰兴中会。众赞成之，而未有具体之组织，是为兴中会倡议之第一声。甲午冬（清光绪二十年）总理自檀香山归国，乙未正月二十七日与杨衢云、黄咏商诸人成立兴中会机关部于香港士丹顿街十三号，榜其名曰乾亨行。是年九月九日广州事泄失败，同志殉义者，有朱贵全、邱泗、陆皓东、程奎光等四人，即所谓朱、邱、陆、程也。尤于事后出亡越南西贡，戊戌夏闻广西游勇李立亭举兵反满，乃率同志宋居仁、邓荫南赴桂应之。迨抵藤县，而李已败逃，庚子夏总理使郑士良经营惠州军事，尤任运动长江会党事务。是年闰八月惠州革命败挫，鄂督张之洞通缉党人首要，中列尤名。时清参将颜梓琴呈报张之洞，谓在麻城拿获革命党尤列一名，张令解回武昌就地正法，而不知真尤列已出亡日本矣。尤至横滨，与总理同寓前田町一百二十一番馆，与留学生戢翼翬、沈云翔、秦力山、程家桎等往还颇密。是时横滨大同学校教育权操于康有为门人徐勤、梁启田之手，侨商泰半倾向保皇会，尤乃联络工界陈才、杨少佳、鲍唐、翟美徒、陈和诸人组织中和堂，至民国后尚能屹然独存者，尤之力为多也。辛丑后尤至南洋，初在新加坡牛车水单边街悬壶问世，精医花柳杂病，男妇咸称其能。尤志在运动工界，恒于烟馆赌徒中宣传革命排满，遂亦渐浸染阿芙蓉癖，久之，每有所得，辄购阿芙蓉膏若干，烧肉面包各若干，归寓闭门停业高卧不起，必俟黑白二米（时人称鸦片曰黑米）俱尽，然后重理旧业，然就诊者固门庭如市也。时南洋华侨多醉心保皇，粤商七大商店朱子佩等号称七家头，视革命如蛇蝎。闽商领袖邱菽园发刊《天南新报》，大倡天王圣明之说。尤知侨商受惑者众，不可与争，乃号召工界同志，组织中和堂于星洲及吉隆坡怡保坝罗庇能各埠，且高悬惠州革命军所用之青天白日旗，以壮声势，于是从者日众。《天南新报》记者黄世仲、黄伯耀、康荫田亦加入中和堂为会员，复由黄伯耀介绍闽人陈楚楠潮州人张永福与尤相见，陈张皆星洲富商，极有志于革命，设俱乐部曰小桃源。癸卯闰五月苏报案起，尝联名致电上海英领事，请援保护国事犯条例，勿引渡章邹。时方合资组织《图南日报》，至是遂请尤介绍主笔，尤初荐郑贯一，郑以事辞，乃改聘陈诗仲。郑陈皆香港《中国日报》记者也。《图南报》至甲辰春始出版，第一日尤撰发刊词，署名吴兴季子。孙总理时由日本抵檀岛，得《图南报》阅之，大喜，乃函询尤以一切经过，尤具报之。乙巳六月总理自欧洲东渡，预电尤囑介绍《图南报》诸同志相见，

迨船抵星洲，尤引陈、张诸人登轮求谒。翌年春遂有星洲同盟分会之设，英、荷二属各埠继之，革命思潮由是弥漫于南洋群岛。戊申（清光绪三十四年）镇南关河口二役相继失败，革命军士卒多避地星洲，以给养困难，人庞品杂，因而聚众闹事行险杀人等事，层见迭出，尤以身居陋巷，与若辈伍，亦被牵涉入狱，期满驱逐出境。民国建元后，尤至云南。滇督蔡锷礼之颇优，旋至北京，袁世凯以为革命元老，谓足与总理抗衡，欲羁縻之，使为己用，特馆之于东厂胡同荣禄旧宅。民三后，尤知袁有异志，乃移居天津避之，旋复东渡神户，日以著书为事。有《四书章节易解》及《四书新案》等作，先后在日本出版。民十总理开府广州，命许崇智斥资三千元修治观音山文澜阁，复忆及兴中会前之老友四大寇，乃招尤及陈少白、杨鹤龄居之。尤至广州未久，因与少白语言不合，遂仍居香港，以教授蒙童为生活，其学塾设于油麻地弥敦地五〇一号三楼，穷苦一如当年。去岁值其七十寿辰，同志亲友等特为之称觞设庆。余亦赠联云：“汉室中兴，谁忆钓鱼严处士；香山大会，同拜单骑郭令公。”

尤列事略补述一

尤列，字令季，幼名季博，学名其洞，原字惟孝，别字少纨，号小园，居日本时自署西名曰 Euclid，居南洋时号吴兴季子，晚号钵华道人。生于广东顺德县北水乡新基坊。顺德县志园林传称漱芳园在北水西，邑人尤光彦建以娱亲。广东按察使题其堂曰松溪别墅，即少纨故居也。家世攻读，而代有明德。乃祖禹亭有遗著《十三经注疏前文音释》一卷，其父云纨有遗著《尚友草庐文集诗集》及《四库窥斑录》四卷，《四史诏令》十卷，咸为士林称颂。五岁即从师读，能过目强记，迥异常童。凡口所曾读者，至垂老尚能默记其半。孙总理于同居日本横滨时，尝面笑其为“石龟肚”，即以其记忆力特强也。十岁就外塾，与三兄六弟同受业于同邑名儒陆南朗。南朗号蒲泉，在八股时代以写作俱佳著名。其兄皆科甲中人物，独南朗则读书而不应试。每晚课毕，招诸生环立讲授历史一段，复命每生覆讲昨受者，方许休息。所讲者皆前后五代、宋、元、明、清交替时事及荆驼逸史诸种。每至五胡乱华、朱石篡唐、崖门失玺、煤山自缢等类，则必潸然堕泪，习以为常。至于三月十九日，则跪诵《太阳经》，诵毕放声大哭，问之则无辞以对。尤氏兄弟时尚年幼无知，相对茫然，惟记有此印象于脑中而已。又尝读易至“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南朗以界方猛扑少纨之首曰：“我要尔毕生记此一句。”少纨忍受，亦莫名其妙。

岁壬午（一八八二年）少紈年十七，初游上海，继至长崎、神户，次年往来于杭、嘉、湖、苏、常、镇间。是年冬，由上海乘招商局兴盛轮船一至高丽仁川，返时上陆既晚，乃至天仙茶园访友，径入内进。诂该友不在寓，而人多汹涌，欲出不许，询之则洪门开会也。即缴费参加行礼入闾，宣誓听训，种种仪式既竟，天将晓。事毕归寓，车辍然以思，乃知洪门宣誓宗旨之“反清复明”四字，与幼年受教于陆南朗师者如出一辙。于是往游南京，观太平天国遗迹，以当时人皆讳言，所得无几。癸未（一八八三年）二月，北上至燕京，欲至东三省一览关外风景，以事不果，乃从梁杭雪读书于报房胡同之法华寺。逾年（一八八四年）自十八站南下，由苏、常溯江而上，历游汉口、长沙、衡州、永州、桂林、梧州各地，熟览山川形势，浩然归粤。乙酉（一八八五年）正月又复北上，往北京南城仙城会馆，仍从梁杭雪读书。是岁十一月又归粤。此数年间，俄有伊犁之役，法有安南之役。少紈蒿目时艰，慨然有匡复之志，遂于是腊末求学于广州之算学馆，留馆三年。

丙戌（一八八六年）夏偕族人尤裕堂医生至博济医院访友，获识孙总理、郑士良等，是为孙、尤二人订交之始，然以友谊不深，均未敢披沥肝胆引为同志也。戊子（一八八八年）冬充广东沙田局丈算总目。翌年充广东舆图局测绘生，旋被派委中、法、越南定界委员。因于政界有所感触，决然舍去。适闻香港华民政务司署有招考书记之举，以欲借此谄习外情，遂毅然至港投考。同考者四十余人，竟获入选。因忖香港乃言论自由之地，就此为排满鼓吹，计亦良得。一日至歌赋街杨耀记商号，访算学馆学友杨鹤龄。时孙总理方学医于雅丽士医院，与鹤龄为同乡，亦常到杨耀记叙谈。二人相遇时，有友多人在座。总理方高谈时事，意气激昂。少紈曰：“诸君未见洪秀全。”指总理云：“此人之头脑即与洪秀全同样矣。”总理指答之曰：“你是游智开。”盖尤游同音，而当时游智开为广东巡抚也。满座皆粲然。次日总理遇少紈于道，乃邀至威灵顿街杏讌楼西菜馆小叙。总理曰：“昨日之言，幸暂守秘密。我前在檀香山教人造反，因民智尚未开通，无从著手，今幸相遇，便是同志，彼此次第斟酌进行可也。”少紈曰：“既如此，我只望成事，谁居其功不计也。”自是二人交谊有如胶漆，频往来于广州、香港、澳门间。孙设中西药房于澳门康公庙前，又设东西药房于广州洗基。尤设兴利蚕子公司于顺德。每事相酌后行，相爱有如手足。乙未（一八九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共创兴中会总部于香港士丹顿街十三号门牌，榜其门曰乾亨行。是年九月九日广州大举之计划以事泄失败，孙总理偕郑士良、陈少白出亡日本，少紈则逃往西贡，随潜返香港或澳门。戊戌（一八九八年）夏率宋居仁、邓荫南至广西藤县。庚子（一九〇〇年）则来往长江一带，均有所活动，一无所成。于是再渡日本，与孙总理同寓于横滨前田桥百二十一番馆。议定革命进行二种计划，一联络学界，一开导华侨。居东时首先接洽者，文学生有张继、戢翼翬、沈云翔、

秦力山、王宠惠、程家桢诸人，武学生有吴禄贞、刘百刚、吴念兹、蔡锷诸人。迨至南洋群岛，则华侨之首先接洽者，有邝艺良、黄康衢、陈楚楠、张永福、何德如、胡伯骧、林义顺诸人。在乙巳同盟会成立以前，南洋英属各地均有工界革命团体之组织，名曰中和堂，即为少烝所发起。及同盟会成立，中和堂遂归并于同盟会。

民国建元后，少烝不务仕进，惟以著书教读为务。民二十年秋东三省失陷，国民政府召开国难会议于洛阳。少烝被征为国难会议议员，以病不克就道，尝数电当局条陈救亡御侮意见。民二十四值其七十一寿辰，各地兴中会同盟会诸老友以其年高德劭，特举行祝寿大会，为其称觞设庆。诂有老友朱少穆、黎萼、李天德等即因发起是举遭粤当局之忌，本年三月七日同被逮警署，经胡汉民及各同志多方营救，黎、李幸获开释，少穆以家藏祝尤寿发起人名册，锻炼成狱，竟于四月二十四日惨遭横杀。少烝在港闻之大恸，愤恨成疾，因不忍粤民颠连无告，数电各方当局，主张统一御侮，且力辟西南割据之非，两粤将士多为感动。迨余汉谋率先附义，少烝以全国统一有望，遂扶病晋京。九月二十六日晨偕余同赴陵园谒祭孙总理陵墓。行礼献花后，乃亲捧读所撰祭文曰：

维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尤列谨献花致祭于孙总理我兄之灵曰：曩者公挈陈、杨，并及于列。革命倡言，晨夕快悦。意气相期，满腔血热。鼓吹游扬，大义斯揭。初事广州，密谋竟泄。奔走海外，含辛茹蕖。再接再厉，不可屈铁。志士从风，洒几许血。染成民国，清社以灭。维公之功，人谁敢窃！护法军兴，开府南越。邀参大计，遭谗咀啮。仅一相见，顿成永诀。窀穸奉安，恨未临穴。抱玉悲号，知音弦绝。鹤龄少白，相继摧折。抚兹一身，形单影孑。矧丁国难，严重日切。觐闵既多，气弥蕴结。紫金含烟，松楸凌雪。今来哭公，曷胜感咽。谨献好花，其歆芳洁。

读未及半，声泪俱下。无何，蒋委员长介石自粤返京，特宴少烝于私邸，慰问备致。少烝在席上面陈救国方略四事，蒋氏为首肯者再。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十时，余谒之于南京芦席营一三九号寓所。尝殷殷问余以外寇侵略情形，闲谈一如平日，诂余行后一小时，即进午餐，未及终，乃笑语同座曰：“余其归矣。”语毕喘疾复发，几仆地。其家人乃延西医程立卿，中医叶古红相继诊治，金称病势沉重，恐将不起。延至夜七时三十五分，遂于孙总理诞日随清季孙、陈、杨三大寇而与世长辞矣。余作联挽之曰：“严子陵罢钓归来，还与光武共生死；介子推耻言利禄，遂教狐赵作元勋。”

尤列事略补述二

民元后北上纪实 民元同盟会与其他五政团联合改组为国民党。旧同盟会员因政见不合，与母党分裂者，颇不乏人，如民社统一党共和党等团体皆有此项分子；就中湖北革命党人所组织之民社，其最著者也。时御用党领袖王揖唐、汤化龙知袁世凯嫉忌孙总理最甚，乃献策曰：闻有南洋中和堂首领尤列党徒极众，向与孙某齐名，若招之来，必足与孙某相抗衡。现彼正穷无立锥，大可收为我用。袁从其言，特派代表至香港卑辞邀请，尤初以袁为具有诚意，乃于民二春偕吕信之、朱耀明、何伯袞数人北上。既莅京，袁以石驸马大街之旧醇王府馆之，礼遇优渥。共和党更大开欢迎会于虎坊桥党部，未几赣宁讨袁军起义失败，国民党横被查封，袁氏帝制自为之真相逐渐暴露，尤知事无可为，不欲为所傀儡，遂托故赴津，并谢绝袁之一切供应。袁派蔡廷干极力劝驾，尤婉辞却之。居津数月，以资斧断绝，拮据万分，赖同乡印刷商人温德泽、任少荃等解囊相助，少济其困。迨洪宪一幕将次揭晓，尤乃避居日本神户，以教读著书自给，旅日侨商多敬事之。所著《四书章节易解》及《四书新案》二书，即向侨商假资印刷，先后在日本出版者也。吕信之于辛亥前尝任香港《公益报》记者，民二随尤北上，凡尤与袁氏委蛇始末概所与闻。今录吕所笔述当日“尤列与袁世凯往还经过”如次：

近粤、港各报纷纷登载革命先进尤列先生轶事，多有出入，且未尽其详。尤奇者，谓当日尤先生曾承袁世凯召京，有毁孙降袁嫌疑，以为尤先生诟病。此种违反事实之谰言，实不可以不辩。余自香港《公益报》停版后追随尤先生有年，当日尤先生之入北京，余幸在趋从之列，故于此事经过，知之独真，兹仅就民国二年后袁氏窃国一段述之。当民国二年袁在总统任内已孕育窃国之阴谋，辛亥之后，祸变相寻，人民厌乱，恒视民党为乱党。袁氏利用民众之弱点，遂不惜言甘币厚，罗致民党各派领袖入京供奉，而对其他失意者，更威迫利诱，务求达到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之目的。且故作空气，诋毁孙、黄，使失人望，以遂其分化之毒计。知尤先生乃党中耆宿，乃委曲招致，居以石驸马大街醇王府邸，待遇优渥，有逾曹瞒之笼络关羽。一日袁径询尤先生曰：老兄与孙某共事久，当知其为人，究竟如何？尤不假思索，遽答之曰：孙公不只为中国之伟人，殆世界之福星。其为人魄力雄厚，天纵聪明，吾人不敢稍望其肩背，直谓之为现代人杰可也。袁氏聆毕默然久之。继

谈及国家大计，尤先生除谈政治军事外，并以实业救国为袁三致意焉。大概谓我国地大物博，富藏甲天下，惜当轴不注意开发，利弃于地，致引起外人觊觎，时存问鼎之心。总统开前继后，复兴有志，深望注意及之。袁听毕莞然而笑，一若以为迂阔不近功者。两日后，袁使总统府外交处长蔡廷干到访，谓总统拟以三省筹边使相屈，特差某前来征求同意（外传南洋宣慰使者误）。尤即答曰：某某来此非有所图，以总统美意相邀，某不惜一得之愚以为贡献，今总统弃国是民生而不言，徒斤斤于余个人之出处，殊非尤某始愿所及，恕不敢奉命，请公善为辞之。蔡怏怏而返。更数日后，突有朱通孺过访（朱淇之侄，朱淇曾入兴中会，时充《北京日报》记者），寒暄毕，朱袖出一卷，其首页大书孙某罪恶史，呈于先生而足恭致词曰：总统有求于公，拟求公斧正，事竣之日，总统当以万金为润笔之资，并以优越地位相许，愿先生留意及之。朱又曰：孙某之失人望，公之所知矣！公与交久，当知自处，明哲保身，毋自累也。尤聆毕，强作笑颜答之曰：总统厚惠，固所欲也。惟尤某砚田久荒，恐不足以当大雅之一盼。且君家学渊源，当此珠玉在前，尤某何敢向佛头著粪耶。虽然，佳作仍请留下，俾资拜读可也。朱兴辞而出。尤先生送客后，旋目示信之，随同入卧室。尤四顾左右无人，乃郑重而言曰：信之，此处再不可居矣，迟行尚恐变生不测也。今晚吾借故先出津门，候兄于法租界大安栈，请兄及各同人俟机而来可也。是晚饭后，尤借访友为名，便潜出正阳门，搭夜车赴津。翌日信之等分帮先后赴津，同行者只何伯袞、朱耀明两人耳。为撙节旅费计，合四人同居一房，不胜齟齬之至。两日后，袁知尤遁津，即派蔡廷干来津劝驾，并馈以旅费二千元。尤婉却之，诡称在津稍事休养便即回京，而事实上吾人倾囊所有，亦仅得二百元之微耳。曾几何时，便尔告竭，积欠旅费二百余元，欲行不得，每日如楚囚之相对，惟赖黄酒一杯熏鱼半尾度此苦遘日子耳。但吾曹虽穷而精神尚不觉痛苦；所最难应付者，莫如每隔一周，袁必遣其所谓顾问咨议等辈来津劝驾。并赉袁氏亲笔函，媵以支票，恭恳尤先生哂存。而尤先生回京固是梦话，受赉又羞饮盗泉，处此势力之下，又不能不虚与委蛇。此种勉作虚伪，痛苦盖万状矣。某日信之踈蹊紫竹林，偶经一印刷店门前，忽闻店中人操鹤山土音，精神为之一振，遂入店，借故以土音扳谭，晋接之际，始悉该店主人温德泽，鹤山人，前在南洋经商，已隶中和堂籍，对尤先生极度推崇，闻先生在津，坚请介见。温固热心革命者，自离南洋来津营印务业，近虽大有所获，然仍念念不忘党务者。余约翌日偕同见尤先生。浅斟深谈，备知先生窘状，乃慨然馈赠旅费八百元，吾人获此意外接济，不啻大旱之逢甘霖。尤先生即决定派朱、何二君先行返粤，余与尤先生仍留津以俟时机。扰攘月余，旅费又已告乏，乃不得已离去津门。尤先生赴日，而余返港。旅费仍赖温馈赠五百元，余取一百四十

元，余则留作尤先生赴日盘费。于是多时雌伏，始告鸿飞。以上所述，均余耳闻目睹，缅怀往事，深佩尤先生磊落胸怀，大义凛然，惜狭隘者以耳作目，反以此为先生诟病，事之不平，宁有甚于此也！年来为此事郁结于心，久思一吐为快。因尤先生正思韬养，发表似非其时，今先生墓木将拱，身后是非，不可不明，特表而出之，使世之关心尤先生者亦知其梗概焉。

民十六对时局之政见 尤少炤于民十六年五月十七日为国民党容共及清党问题，尝发表《对时局之宣言》，载诸香港《大光报》。原文录之如下：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奇观哉！连日自朝至暮，纷至沓来，或通函，或面晤，寓于目者无非尤列当对时局发表宣言之劝勉书，接于耳者亦无非尤列当对时局发表宣言之敦促语也。莫名其妙！尤列宣言有何重轻！徒以国事螭蟾，至斯已极，国亡族灭，捷在目前。四十余年之革命个人，不应袖手旁观，而置身局外也。充其义亦不过如是而已耳。夫革命毒药也，病已则药停，不轻尝试。且善用之足以救人，误用之适足以杀人。古之圣贤非至万不得已时不行革命。孔子赞易至革，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孔子制定革命二字之名称之原起，吾人不可不知。其托始于汤武，肇基于天人。事至重大，非以革命为投机品也。满清季叶，政治腐败，外侮纷乘，国成病夫，奄奄垂毙。事势至此，不能苟且偷生。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列于是与我至友孙中山先生，纠合黄咏襄、杨衢云先生及诸同志创立兴中会，从事革命，以为国民之先导。其时春云初展，风雨飘摇，团体幼稚，而会员无多，又复时聚时散。光绪乙未九月广州之役，朱、邱、陆、程诸同志就义，会员之逃亡海外者过半。其仍留内地者，依然继续工作，嗣因兴中会相隔路远，领导无人。丙申十月花县盘古庙之役，张环、陈开诸同志就义，每诿谓无人指挥之过。而一时风气稍开，朋从来相告语，谋加入革命者渐众，于是丁酉三月不得已而组中和堂，群推列就近主持之，以济兴中会之不逮。然论其实际，兴中会之与中和堂，盖分而合二而一者也。乙巳之后，种族革命之说大明，震动中外，是以同盟会乘时成立，举孙中山先生为会长，而列则为该会主盟于南方。当此之时，中和堂之党员无不加入同盟者，是中和堂之与同盟会，犹是分而合二而一者也。此列于辛亥革命民国成立时，所以有中和堂发源于兴中会，而混合于同盟会之通告也。虽然，满清倒而民国告成，革命初次成功，端赖国民之力，我党人不过负矢之劳耳。国人以中山劳苦功高，推为临时大总统，一切建设，赖总其成。列亦以为负责有人，从此息肩林下，乐观太平而已，不必为滥竿政客也。民二一至京师，即以中和堂党章交内务部立案而止，他非有所求也。

不料自中山让位于袁，而袁氏日谋称帝。中山再次出亡海外，列亦三岛遁居。革命事业旧案重提，又不得已而有救世军之组织。迨至袁氏丧灭，重奠国基，结束救世军，而列复为闲云野鹤之游。我中和堂同志不作享鼃染指之思，而各归正业，非矫情也，可止则止耳。岂知忽忽十年，我之老友孙中山遽尔魂归天国；乃国民党不幸有人竟受共产党之诱惑，四分五裂，赤化毒焰蔓延四方。列触目伤心，不忍其以孙中山艰难缔造之革命根据之广州，败于垂成，复使神明华胄之沦陷于赤祸。良心自问，终夜难安。六十老翁，再为冯妇，明知事体重大，独力难支，而见义勇为，虽老夫不敢落后，非见猎心喜，效投机革命者流也。去年四月通电海内外同志，集中实力，为讨赤之进行。顾以当时之国民政府，乃我老友孙中山所遗留之绝无仅有之地盘；当事诸人又尽是革命同源之辈，投鼠忌器，爱屋及乌，是以不能不审顾徘徊，慎重将事也。今国民党诸君自起清党，姑无论纯粹的觉悟，抑一时冲动的觉悟，但能自知讨赤，则中国尚有生机。君子与人为善，断不能以政见不同，阻人为善之路。敬告邦人君子及中和同志：如国民党能清除共党，亦复何求？政治问题当付诸国民公决。总之，列为数十年之革命旧物，偶悼未死耳，皆不得已而为之，适可而止，原非以革命为能事也。邦人君子，必能谅之。犹有进者，去年三月二十日广州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整理党务集中，有谓第三国际及中国共产党对于跨入国民党中之共产党党员，如有命令，须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又谓凡跨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党员，如有与纯粹国民党党员发生冲突之事，须开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以管理之，等语。按此，他不具论，一则曰国共两党，是共产党为敌体矣。则彼已根深蒂固，而党员之众多也可知。近北京俄使馆事件发生，得悉彼之宣传，遍我全国。只就本月五日北京警厅公布苏俄用于京、津、粤、汴及口外之宣传费共十七万美金。是一次之清单亦有如是之巨，则彼实财雄势大，而深入我之重地也又可知。以彼党员众多，而又深入我之重地。今粤方各路多有肃清共党之报告，事诚可喜。但论其实际，谓之为肃清共党，无宁谓之暂挫其锋，姑勿计彼有极其坚固伟大而势难扑灭之后援也。凡有国民党所到之处，即是共产党所到之处，则肃清云者，肃清其国民党中之共产党则可；若欲肃清其国民党外之共产党，虽数十年亦有所不可，此稍涉党会状态者之所能知之者也。今各地数以枪毙共产党闻，列以为殊非善策。盖此能杀之，则彼之结合之力愈坚，其势然也。例如我革命同志，自朱、邱、陆、程以至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经一度之杀戮，必增一度热烈之进行，共产党亦犹是耳。故莫如以浙之三门湾及粤之东西沙诸海岛圈出置之，即任彼在诸岛中行其共产。其有挂名共籍，未经逮捕而愿往者，亦听之。列为此言虽无甚深意，一者无知妄作，误入歧途，其愚可哀，杀不胜杀。一者彼在岛中实行共产，不过数年必知窒碍，由

是觉悟，可警世人，冀此恶风于焉永息。仍有不能已于言者，当今北伐进行，不但箭在弦上矣。勿论湘鄂之事未平，而各地共党余波，处处时时皆有可虑，即一鼓而黄龙直抵，保无有报北京俄馆事件之怨者，挥兵南下，得直接与南方制裁共党者相周旋。果至此时，则五国环伺于长江上海，以自卫之兵，又谁能使之袖手于旁以观战？螳螂黄雀，譬喻真切。全国鼎沸，较今甚焉。此我国从古未有之危机，而不可不深长思者也。思之如何？我民国成立既十六年，宪法未有成就，频年变乱，端在此点。今国民政府奄有全国之大半，亟宜召集宪法会议，务使人中至正，先行制定草案，通布全国，人心厌乱，必获欢迎。南北可借此而罢兵，反动者亦借此而镇慑，而无穷之外侮亦将借此而融和。昔刘邦入关，约法不过三章，卒定天下。可知宪法草案，胜于百万雄兵多多矣。列近者略编学说，甚欲发挥其伦理救国主义，正待此宪法为之保障，若必谓削平大难之后，方可从事宪法也，人寿几何？河清难俟，我老友及诸先烈之遗志，何时已乎？夫复何言！

民国十六年五月中浣

到京后预作遗嘱 尤少纨于去年十月到南京后，自知病势沉重，恐将不起，故于是月二十七日预作遗嘱，命其随员马白眉、尹治纯笔录，而自署名其上。

三十九年前之东亚时局形势图

谢纘泰，字圣安，号康如，广东开平人，生长澳洲，长于英国文学。其父日昌为澳洲著名侨商，隶三合会籍，时以满虏吞灭华夏之历史训迪其子纘泰、纘业二人。故纘泰幼承家训，恒以承先继志为务。兴中会成立前六年庚寅（一八九〇年）识杨衢云于香港，知衢云蓄志反清复汉，遂与订交，极为相得。时民智闭塞，世人惮言改革，二人乃于壬辰年（一八九二年）二月以开通民智为号召，发起辅仁文社于香港百子里第一号二楼，得同志刘燕宾、陈芬、黄国瑜、罗文玉、周超岳、温宗尧、胡干之等十六人，是为旅港我国人新学团体之滥觞。乙未（一八九五年）孙中山先生自檀香山返国组织兴中会，知衢云、纘泰均热心排满，乃邀之入会，二人从之。旋密设总部于士丹顿街十三号，榜其名曰乾亨行，决议在广州实行大举。是年八月二十二日众拟选举总统，纘泰拥衢云最力，中山先生亦表示谦退，衢云遂获当选。及重阳之役败挫，衢云远游南非洲，纘泰则在英文《南华早报》任助理编辑。丁酉戊戌间（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与康有为

之弟广仁谋联合各党一致救国，以有为师徒鄙视他党，运动无效。戊戌六月缙泰感慨时事，特绘制一“东亚时局形势图”，以警世人。图中以熊代俄国，犬代英国，蛙代法国，鹰代美国，日代日本，肠代德国。其旁题词曰：“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庚子（一九〇〇年）正月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因与蔡元培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联名通电反对清那拉氏废立光绪，为清廷下令通缉，经逃至澳门，复为清吏控以卷逃公帑之罪，下诸葡国监狱。缙泰闻其事于兴中会员徐善亭，遂力托香港天足会长英妇黎脱尔夫人设法营救，黎复请香港总督卜力夫人相助。澳门葡督得港督电，立释经出狱。经得免于引渡清吏者，缙泰斡旋之力也。是年十一月，衢云被清吏派凶徒刺杀于香港，缙泰哀悼逾恒，为营葬抚恤及缉凶等事，异常尽力。壬寅（一九〇二年）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之从侄全福与缙泰之父日昌谋在广东起兵反清，而缺于财。是年八月缙泰乃介绍纪堂与二人相见，纪堂允担任运动费全部。缙泰生平最礼重老博士容闳，故提议于革命政府成立之日推举容为大总统，众无异议。及除夕举义之计划事泄失败，党员被逮者十余人。洪全福与缙泰之弟子修，乔装出险，绕道澳门至香港。其后全福日昌以愤极成疾，先后逝世。缙泰仍与英人克银汉同任《南华早报》笔政，不再参与党务。民十三尝追述其革命见闻，题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刊诸《南华早报》。今年近七十，有时尚投稿港报发表政见，尝屡向当局陈请归葬杨衢云遗体于本国，以慰忠魂云。

邓荫南事略

邓荫南，广东开平人，原名松盛，字有相，行三，故又称邓三。人以其年事高，多呼之曰三伯。幼赴檀香山经商，兼营农业，以善居积，所入不赀。性慷慨，好施与，乡人多敬之。与孙总理之兄德彰友谊至笃。甲午（一八九四年）冬，总理莅檀岛倡设兴中会，邓率先加入。自谓生平好猎，善枪法，能从背后反射击鸟，百不失一，又能自制炸药炸弹，大可回国参加反清复汉。盖邓与其兄灿均三合会员，乃兄为檀埠致公堂执事，兄弟同笃信民族主义也。总理以邓热心而多能，甚为赏识。乙未春，总理归国，数月后，邓鬻其私产，得资万数千元，亦返香港，时来往香港、广州间为义师尽力。迨乙未重阳一役事泄失败，兴中会诸首领纷纷亡命海外，邓亦匿居澳门。戊戌夏，闻广西游勇李立亭举兵反满，乃偕尤列、宋居仁赴桂应之。及抵藤县，而李已溃逃，遂折回港。庚子，史坚如谋炸督署之役，邓先期领同志苏焯南、吴羲如、练达成、张硕臣、温玉山、宋少东等

同至羊城，担任运动军队及附城绿林马王海、区新等，以作响应。苏焯南，番禺人，基督教徒。其乡黄埔近海，为港轮所必经。党人私运军械，每由苏预雇小艇，在黄埔附近从港轮卸下密移至省城。吴羲如，顺德人，向任营弁，是役负运动防营兵士反正职务。练达成出身河南船户，基督教徒，与旗人关系甚深。坚如在旗满街租屋及各种布置，多赖其力。时邓等雇大花舫（俗称紫洞艇）一艘，泊于沙面江边，日在其中指挥策划。有英国人摩根者，素有志于东亚维新事业，丙申（一八九六年）总理至伦敦识之。尝约其来华相助，遂于己亥莅华访总理。总理命陈少白、李纪堂招待之于香港。庚子，总理往来日本、香港、南洋之间，摩常追随之，颇为得力。至是少白命其到粤助邓史诸人办事。邓等以花舫为机关，来往人物品类不一，赖有摩为护符，警吏不敢过问。吴羲如挈摩出入营伍及虎门鱼珠车尾各炮台，辄以引道外宾参观为词，守兵无阻拦者。是年七八月间，军队与绿林之运动将次就绪，而军械逗挠弗至，大势几为瓦解。邓、史二人力斡旋之，使静候机局开展。詎惠州三洲田之军以清兵渐取包围，势不可复遏。轰然一声，义旗高举。邓、史等思急起响应，而期缓莫济，不得不谋暗杀一二权要，以解惠州义军之围。先是坚如尝从邓学制炸弹及爆裂方法，故独愿担任轰炸督署职务，遂由邓与黎礼二人密运到炸药二百磅及药线雷管各件，而使苏、练、温、宋等助坚如布置掘地埋药诸事。九月初五夕，督署后部被炸，只后围墙坍塌十余丈。总督德寿于梦中自床堕地，未受伤损。坚如以从容回出事地所察视被逮，死之。（事详拙著《开国前革命史》）余人先后避往香港澳门。邓于是役失败后隐居英属新安屯门，以农为业。己酉，黎仲实尝至屯门访之，并假其农场试验燃放炸弹诸法。民国建元后，邓弃农场不耕，移寓广州，嗣讨袁、护法、逐莫诸役，民党中人组织民军者，恒假其名以资号召。民九，陈炯明率粤军自漳州回粤，邓先后受任东莞开平二县县长，以赋性忠厚，常为属吏所欺，居官数月，赔累逾万，遂急自请辞职，借轻担负，而其属吏则各积资甚丰。民十一，陈炯明、叶举等举兵叛变，邓退居澳门，以忧愤死，年已七十余矣。其兄灿，至民十三尚生存。时段祺瑞召集国民代表大会于北京，邓灿负檀岛华侨某团体代表任务返国，年已八十内外。其后国民政府以荫南历年奔走革命，勋劳卓著，特明令褒扬，追赠陆军上将。

余育之事略

凡曾至香港乘坐电车者，莫不知有愉园。然斯园今已改称养和疗养院；故址尚存，而园名已易，仅电车站仍不改旧称耳。园之旧主人余姓，号育之，为日昌

银号东主，四十年前之富商也。乙未广州重阳之役，由杨衢云介绍入兴中会。时国人视谋反大逆如蛇蝎，育之独慨助军饷万数千元，密约衢云、黄咏襄等至红毛坟场交款，虽同志中亦鲜有知者。甲辰（一九〇四年）日俄战起，育之与同志李纪堂均以营业失败，家道日以中落。丁未（一九〇七年）张静江偕周柏年至香港养病，由李纪堂、冯自由介绍与育之相识，遂下榻于愉园数月，时尚未易主也。民国后，育之以所营贸易相继歇业，乃供职于祺昌洋行，借资糊口。民八尝引港商刘铸伯谒总理于上海。铸伯极致企慕，愿在港筹饷襄助革命，归港未几即以病逝世，事遂不果。民二十李纪堂任职四会县长，邀育之助理庶务。及李去职，育之乃至上海充冠生园酒家招待员，月恃薪金数十元为活；凡老友至冠生园品茗者，莫不招待优渥，相与话当年兴中会及光宣遗事，大有不堪今昔之感云。

谭发事略

兴中会员之被人上皇帝尊号者，有二人焉，谭发李纪堂是也。谭发字奋初，粤之三水县人，在日本横滨业洋服商，名均昌号，英字招牌大书 Cock Eye（华言鸡眼）二字。所制洋服，精巧妥适，西人多光顾之。谭兄弟五人，发列第三，少有帝王思想，遇人有称其生具异相者，辄喜而不寐。甲午冬总理自檀岛返国，舟过横滨，谭闻售物商陈清言某轮有搭客高谈造反，异之，遂登舟访总理，一见如故。总理于乙未秋亡命至横滨登陆访友，第一人即谭也。兴中会成立，谭任干事，丙申（清光绪二十二年）某月余年方十五，与谭之幼弟赓同肄业于东京晓星中学校，时陈少白居余家文经商店二楼，佐余父编译《华英字典》，闻驻横滨清领事通令侨商店户纳资领取牌照，属维新派各店咸拒绝缴纳，独谭店均昌号有阿附清吏自往领牌情事，深为不悦，乃为匿名传单以嘲之。口授数韵语，使余录之邮片曰：“可笑均昌号，吮领事屎□。签名去领牌，歌功又颂德。领事得了钱，识你系老也？（读如密，广东土语犹言那个。）甘做满洲奴，均昌真笨□！”（广州土语与《水浒传》呆鸟之义同）。谭疑为少白所为，乃诿其责于乃兄，少白一笑置之。庚子惠州革命军败挫，郑士良等避地横滨，群向均昌号定制洋服，为数不貲，谭乃列单向总理索债，时总理方在窘乡，竟无以应，于是谭足迹不履总理户者多载。迨《东京民报》出版，留学界盛极一时，谭乃分设店号于东京，专招徕学界生意，学生中黠者知其有皇帝瘾，故投其所好，借图啖，谭引为知己，解衣推食，无微不至。未几洋服资本为之一空，不得已仍返横滨，设一小肆自活，然皇帝之尊号由是传诵一时。民国建元后，谭家道日窘，洋服店旋亦歇业，

遂归国闲居，总理时协济之。民十七余与陈少白、邓慕韩等向当局老友某提议，欲募资数千元助谭复兴洋服店于南京，某漠然置之，事遂无成。后由孙哲生代向政府请恤，政府许月给谭百元为养老金，谭现税居广州芦荻巷新宁里九号，犹日唱其大风歌不置云。

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

康有为原名祖诒，号长素，少有创立新教、取孔子而代之志，其自号长素，即取凌驾素王之义。其门人陈千秋号超回，梁启超号轶赐，麦孟华号驾孟，曹泰号越级，韩文举号乘参，均取此义。时人以康立论怪僻，自称圣人，咸以颠康呼之。康初讲学于长兴里，号长兴学舍，好浏览西学译本，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取。长兴学舍旋移于广府学宫，改名万木草堂，与双门底圣教书楼相距甚迩。时总理初假圣教书楼悬牌行医，因康常在该书楼购书，知其有志西学，欲与结交，爰托友人转达。康谓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总理以康妄自尊大，卒不往见。乙未总理倡议农学会于广州，尝请康及其徒陈千秋等加入，陈颇有意，以格于师命而止。是年春，陈少白以事至上海，居洋泾浜全安栈，闻康与其徒梁启超晋京会试，亦寓同栈，乃赴邻室访之。康庄重接见，正襟危坐，仪容肃然。少白向之痛言清朝政治日坏，非推翻改造，决不足以挽救危局。康首肯者再，且介绍梁启超相见，谈论颇欢。总理在广州败挫之后，康徒梁启超、徐勤、麦孟华、欧榭甲诸人于丙申丁酉（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间，先后发刊《时务报》、《知新报》于上海、澳门，倡言改革，名重一时。同时杨衢云、谢纘泰等亦与康广仁（有为之弟）何易一商谈两党合作事宜久无成议。丁酉冬，横滨侨商邝汝磐、冯镜如等在中华会馆发起组织学校，以教育华侨子弟，欲由祖国延聘新学之士为教师，以此就商于总理。总理以兴中会缺乏文士，乃荐梁启超充任、并代定名曰中西学校。邝汝磐持总理介绍函赴上海，谒康有为了旅次。康以梁启超方主持《时务报》笔政，荐徐勤承乏，并助以陈默庵、汤觉顿、陈荫农等，皆康门优秀也。又谓中西二字不雅，特为更名大同，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徐勤既抵日本，初与总理少白时相过从，互讨论时政得失。迨戊戌（一八九八年）夏秋间，清帝光绪锐行新政，康有为骤获显要，以帝师自居，徐勤等皆弹冠相庆，虑为革命党株连，有碍仕版，遂渐与总理少白疏远，而两党门户之见，从此日深。

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

戊戌八月，清西太后下令废除新政，大兴党狱。康有为得英国军舰保护，避地香港。王照、梁启超匿居日本公使馆。孙总理在日闻此消息，乃商诸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平山周等，请其到中国救助康等出险。宫崎遂赴香港迎康至东京。平山则到北京，使王、梁二人易日本服至天津，乘轮赴日。时进步党领袖大隈重信任总理大臣，犬养毅任文部大臣，均主中、日亲善政策，对于中国维新党异常优待。康、王、梁三人起居费用由日政府供给。大隈内阁倒后，则改由进步党供给。总理陈少白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借敦友谊，爰托宫崎平山向康示意。康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竟托故不见。事为犬养毅所知，雅不欲中国新党人，因此意存隔阂，遂约孙、陈、康、梁四人同到早稻田寓所会谈。届期除康外余人俱到。梁谓康有事不能来，特派彼为代表。是日，三人各抒意见，讨论合作方法颇详，至翌日天明始散。数日后，总理派少白偕平山至康寓访谒，康、梁出见，在座有王照、徐勤、梁铁君三人。少白乃痛言满清政治种种腐败，非推翻改造无以救中国，请康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少白反复辩论三句钟，康宗旨仍不少变。谈论间，王照忽语座客，谓：“我自到东京以来，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亦被拆阅检查，请诸君评评是何道理”等语。康大怒，立使梁铁君强牵之去，并告少白谓：“此乃痴人，不值得与之计较。”少白疑王别有冤抑，乃嘱平山伺机引王外出，免为康所羁禁，平山从之。果于数日后窥康师徒外出，迺携王至犬养寓所，王遂笔述其出京一切经过及康所称衣带诏之诈伪，洋洋数千言，与康事后纪述多不相符。由是康作伪之真相尽为日人所知。康以为少白故恶作剧，因而迁怒及于革命党，而两派更无融合之望矣。王照任职礼部主事，尝上书请清帝出洋游历，先往日本，以次继往欧美各国。摺为礼部堂官阻隔不上。王面斥其违旨，堂官始为代奏。清帝怒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沅、溥颐颐、曾广汉等六人壅塞言路，令褫其职，嘉王照不畏强御，赏给四品京堂，王以是名动一时。康到东后，深虞王举发其假托衣带诏之秘密，故严重监视，不许私自见客。王不能堪，因与吵闹多次。康友梁铁君精于技击，康特使之强制王之行动。王赖平山之助，得脱离康之约束，遂遍向日本当道陈诉所苦。日政府以康王水火，虑生事端，乃给康以旅费九千元，令其克日

离境。康之远游加拿大，实以此故。徐勤在康徒中，反对与总理合作最力，自是与总理少白等日益疏远。横滨大同学校会客室贴有“孙文到不招待”之字条，适总理到访见之，遂向徐诘责；徐否认为己所为。有教员陈荫农直认己作不讳，因与总理驳论激烈，相持不下。校董冯镜如闻之，乃到校极力劝解始止。事后，各校董多不直徐、陈所为，有数人提议辞职。学校基础为之动摇。犬养以学校解散为可惜，特亲莅横滨，邀请各校董维持现状，且愿任名誉校长，以资提挈。各校董感其热肠，咸允照旧担任。当时徐勤曾致书宫崎，道谢援助康、梁出险及犬养允任大同学校名誉校长，并力辩无攻讦总理等事。

横滨大同学校

丙申，余年十五，余父遣余偕谭赓（谭发之弟）同肄业于东京晓星学校。校为法国天主教会所立，以法文为主，英、日文副之，生徒约二百人，旅横滨欧美儿童占三分之二，余为日人，华人则余二人而已。西童因吾国人少，以为可欺，恒歌中国人污秽 Chinese people, too much dirty 一语，以示侮辱，且于运动场中屡向余等寻衅殴击，余不能堪，为自卫计，尝以爪伤西童，致为校长惩罚。因是西童多呼余为猫，对余等益恣狂殴。余二人不得已每于休息期间，匿于厕所附近之小院避之。西童凶者求余不得，乃扬言华人多患腹泻。余在此校四月，卒以不堪西童帝国主义之压迫，退学归横滨。余父乃托陈少白力劝余回校，余有苦难言，但云不愿习法文而已。丁酉冬，大同学校成立，余遵父命入学，徐勤（号君勉）任校长，专以救国勉励学生，每演讲时事时，恒慷慨激昂，闻者莫不感动。教室上黑板及课本书面皆大书标语曰：“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勸哉小子”十六字，师徒每日罢课时必大呼此十六字口号始散。又编短歌曰：“亡国际，如何计；愿难成，功莫济。静言思之，能无慙愧！勸哉小子，万千奋励！”使学生逐日诵之。事为日本报纸所知，乃将大同学校标语揭载报端，谓支那人觉悟国耻，即于日本不利，唤起彼国人注意。时学生受此兴奋教育之熏陶，咸具救国思想。余为校中高材生，每试均列前茅，因而志大言大，有扶危定倾舍我其谁之概。尝榜一联于书室左右曰：“大同大器十七岁，中国中兴第一人”，为余父所见，斥余为大言不惭。余有和同学方庆周诗云：“漫天阴雨夕阳沉，一片弦歌万木森。七十门人闻大道，三千诸佛听梵音。众生普渡师尊志，社稷匡扶弟子心。同学少年多努力，我言时事泪沾襟。”徐勤于讲学之暇复承康有为命，以振兴孔教为务，每星期日，生徒须对孔子像前行三跪九叩礼。有基督教学生赵子彬

因拒绝拜跪，被教员陈荫农迫令退学，因此与华侨基督教徒大生恶感。徐闻帝国大学文学院长根本通明博士为日本孔教徒领袖，乃盘辫发于顶，易西服，赴东京访之，使学生方庆周任译事。根本为日本第一流汉学家，素蓄长发，效汉代装束，见徐易西服而来，大异，肃然曰：“贵国崇奉孔圣人者，亦效夷狄之服乎？”徐赧然不能对，遂于此协商中、日共同阐扬儒道之法，横滨侨商亦多和之。遂于戊戌年（一八九八）孔子诞日，假中华会馆大举庆祝，日本名士莅会者数十人。会场孔子像旁悬一联曰：“同种同文复能同教相联未许西欧逞虎视；大清大日从此大成并合遥看东亚庆麟游。”自兹而后，康徒在横滨之势力益根深蒂固矣。是年夏间，清帝下令变法，康、梁俱特受知遇，言新学者咸以为中国中兴在此一举。大同学校教师亦沾沾自喜，所出课题，均属歌颂圣君誉扬新政之作。余早列名兴中会籍，居家复饱聆总理、少白、衢云诸人革命排满论调，至是乃于论文中痛言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理。略谓清主愈英明有为，则汉族愈不利，彼之厉行新政，实一种愚民政策，吾人有志救国，应从根本设想云云。徐勤读余文，深滋不悦，乃传余大加申斥，并再三诫余勿为邪说所惑。无何，清帝变法顿挫，康、梁同亡命日本，校中更采用戊戌政变记康梁诗集为教材。己亥（一八九九年）春，康有为将赴加拿大，徐勤以余略谙英语，爰商诸余父，欲使余随行。余知康为人专制怪僻，故谢绝之。是年夏，梁启超拟向横滨侨商集款创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特于大同学校选优级生数人，至其小石川寓所讲学，余与冯斯栾、曾广勤、郑云汉预焉。时章炳麟初至东京，亦下榻梁宅，余之识章自此始。九月高等大同学校成立，余遂转学该校。横滨大同学校自是永为康党根据地。直至民国十二年遭遇大地震之厄，始无形解散。

章太炎事略

章炳麟原名绛，字枚叔，又号太炎，浙江余杭县人。少从游于浙省大儒俞曲园（樾）之门，尝一度应县试，以病辍业，遂专心研究国学。因读《东华录》、《明季稗史》诸书，备悉满虏虐待汉人惨状，乃绝意仕进，渐涉猎西籍译本，知非实行新法无以立国。岁甲午，年二十七，闻有粤人康祖诒集公车上书陈请变法，诧为奇士。会康所发起之强学会向浙省各书院征求会友，章乃纳会费十六元报名入会，间或投稿上海报馆发表政见，文名由是日显。岁丙申（一八九六年），夏曾佑、汪康年发刊《时务报》于上海，聘章及梁启超分任撰述，章梁订交盖自此始。戊戌（一八九八年）春，鄂督张之洞耳章名，特电聘章入幕，礼

遇颇优，以言论过激，与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不合。梁语张督，谓章某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辞，不宜重用，张使幕僚钱恂、夏曾佑讽章辞职，并馈以贍仪五百两。时梁启超方与汪康年争管《时务报》，梁被摈，汪乃改组《时务报》为《昌言报》，表示与梁决绝，闻章由鄂返沪，遂仍聘章任《昌言报》主笔。梁以争《时务报》失败，情有不甘，故于是年八月政变之前，力请其师康有为向清帝前自求派往上海督办官报。其意即在借官报名义以强收旧《时务报》，借以报复私怨。康从之，故清帝有派康督办官报之命。诿康甫离北京，而党狱大起，凡曾在《时务报》任笔政者均在通缉之列。章避祸至台湾，日人慕其文学，诗人山根虎雄特介绍之于《台北日报》，被聘充该报记者，台湾学务官馆森雄亦延章修改文字，章在台北文名藉甚，尝为文忠告康梁，使勿效忠异族，谓孙文稍通洋务，尚知辨别种族，高谈革命，君等身列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殊为君等惜等语。己亥夏间，梁启超主办横滨《清议报》，与孙总理时相过从，遂致函邀章赴日，谓当介绍孙某与之相见。章至东京，下榻于小石川梁寓，初以不谙日俗，误在室内坐席无心涕唾，致为管家日妇所窃笑（时著者亦下榻梁寓，故知其详，日妇名太田，康徒罗某之情妇也）。梁引章同访孙总理、陈少白于横滨，相与谈论救国大计，极为相得。时钱恂任留日学生监督，与章为旧识，亦主根本改革之说，彼此往还，殊不寂寞。庚子六月，唐才常发起国会于上海张园，旅沪名流被邀莅会者有容闳、文廷式、马良、严复、吴葆初、宋恕、戢元丞、张通典、沈荃等数百人，章亦预焉。公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为总干事，章以会章有“务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忠君救国之实”一语，指为不合时宜，劝唐勿为康党所用。唐志在利用康有为保皇会款，以举大事，故不能从，章乃愤然剪除辮发，以示决绝。是年七月汉口自立军于期前失败，唐与同党被杀者二十余人。清吏对于列名国会者，一律悬赏通缉，章不得已托庇于基督教所设之苏州东吴大学以自固。在该校讲学将一载，因所出论文题目有《李自成胡林翼论》，为守旧派所指摘，苏抚恩寿派员谒该校西人校长，谓有乱党章某借该校煽惑学生作乱，要求予以逮捕，章遂再赴日本避难。辛丑夏间，梁启超募集华侨资本创设广智书局，延请留学生翻译东文书籍，特聘章润饰译文，章在穷途，因亦恃以为活。壬寅（一九〇二年）章与秦力山、冯自由等十人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于东京。手撰宣言书分布旅日商学各界，文辞悲壮动人，留学生多为感奋，孙总理、梁启超均署名为之赞成人。清公使蔡钧闻之，乃请日政府禁止开会，然此举影响于各省留学生绝巨。其后留学界中爱国团体纷纷并起，即导源于亡国纪念会也。癸卯（一九〇三年）苏人刘师培（申叔）粤人邓实（秋枚）等创设《国粹学报》于上海，章与黄节（晦闻）分任撰述，倡导民族主义，异常透辟。是年夏，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因反抗教员之专制，相率退学，向章及蔡元培、黄宗仰（乌目山僧）黄炎培诸人求助。章、蔡、黄等时正主持上海教育会，乃组织

爱国学社以收容退学诸生，校内师徒皆大倡革命，放言无忌。会康有为漫游欧美十七国毕东归，著一书曰《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专抨击革命排满之说，章乃为驳康有为《政见书》一文以斥之，辞严义正，传诵一时，逐日掲載于上海《苏报》，与邹容著《革命军》，同受海内外人士热烈之欢迎。清商约大臣吕海寰因此授意苏抚恩寿，令向租界当局要求逮捕革命党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邹容、黄宗仰、陈范诸人，蔡、吴、黄、陈等闻耗先后亡命海外，独章一人留爱国学社被捕，邹容则自向捕房投到。当租界会审公廨审讯之日，清吏指摘章著内有“载活小丑”一语为大逆不道，研讯经月，而案始定；结果判章监禁西牢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章在狱中常为香港《中国日报》撰著论文，世人读之如获拱璧，邹于出狱前一月病死，章至丙午年（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期满出狱。留东同盟会已预派邓家彦、龚练百二人至上海迎候赴日。章出狱时面白体胖，友人咸诧为毕生所未见，盖章生平不脱名士风尚，视沐浴为畏途，幽囚后西狱吏每日强之澡浴，故体魄因而日健也。章至东京，留学界于七月十五日开欢迎会于神田锦辉馆，莅会者二千余人，《民报》社自第六号起改推章主任笔政。时总理寓东京牛込区筑士八幡町二十一番地，与新小川町二丁目《民报》社相隔不远，章与胡汉民、汪精卫诸人每日恒至孙宅叙谈，以好学深思之故，来往数月，仍不识道路。有一次因只身独行返报社，竟误投日人家宅，经《民报》社派人四索始觅得之。又章对于自用衣袜，亦常杂乱善忘，闽人林时爽（号广尘，即辛亥三月二十九一役殉义之林文也）尝为之检点一切，此在世界文学家恒不免有此种特性，往古希腊七贤轶事犹为后人称道不置，固无足深异也。丁未（一九〇七年）正月，日政府徇清公使杨枢之求，馈总理赙仪数千元，令之出境，总理因此取途赴南洋，濒行留给《民报》维持费二千元。章与宋教仁、谭人凤、张继、田桐、白逾桓、日人平山周等对于总理受日人赙金事，大起非议，经黄兴、刘揆一、何天炯等多方排解，风潮始息。《民报》出版至第二十四号时，清公使向日政府交涉，以封禁《民报》为请，日政府从之，《民报》以是停业。黄兴、宋教仁与章谋，欲将《民报》迁往美国出版，旋因他事所阻，终不果行。及辛亥武昌革命军兴，章始归国。民元南京政府成立，总理派秘书但焘迎章至南京，章应召而行，相见颇形欢洽。及总理让位袁世凯，黄兴主张迁都南京最力，深为章所不满。是年三月同盟会员在南京大开死难同志追悼会，章作挽联曰：“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

章太炎与支那亡国纪念会

庚子七月汉口唐才常一役失败后，自立军诸将领湘人秦力山、朱菱溪、陈犹龙等先后避地日本。章太炎因列名上海张园国会，被清吏悬赏通缉，初托庇于基督教所设之苏州东吴大学，继以苏抚恩寿指名逮捕，因亦亡命东京。时湘人周宏业（号伯勋）、王思诚、浙人王家驹（号伟人）及余同寓东京牛込区早稻田大学附近榎木町。菱溪、犹龙（号桃痴，后易姓名曰左仲远）莅东后，与周王等有同乡关系，亦移居榎木町周寓。力山与王宠惠同居。太炎则居某旅馆为广智书局修订译文。众以周寓为谈话机关，每日恒在此讨论革命排满之宣传方法。壬寅（一九〇二年）三月初旬，太炎提议谓欲鼓吹种族革命，非先振起世人之历史观念不可。今距是年三月十九日明崇祯帝殉国忌日未远，应于是日举行大规模之纪念会，使留学界有所观感云云。众赞成之，即推太炎任起草宣言书，并定名曰“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其文曰：

夫建官命氏。帝者所以类族。因不失亲。天室由其无远。故玄黄于野者。战之疑也。异物来革者。去之占也。维我皇祖。分北三苗。仍世四千九有九载。虽穷发异族。或时干纪。而孝慈千蛊。未坠厥宗。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渐灭。迴望皋渚。云物如故。维兹元首。不知谁氏。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民今方殆。寐而占梦。非我族类。而忧其不祀。觉寤思之。毁我室者。宁待欧、美。自顷邦人诸友。怒然自谋。作书告哀。持之有故。有言君主立宪者矣。有言市府分治者矣。有言专制警保者矣。有言法治持护者矣。岂不以讐谟定命。国有与立。抑其第次。毋乃陵躐。衡阳王而农有言。民之初生。统维建君。义以自制其伦。仁以自爱其类。强干善辅。所以凝黄中之烟燭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悲夫。言固可以若是。故知一于化者。亦无往而不化也。贞夫观者。非贞则无以观也。且曼珠八部。不当数郡之众。雕弓服矢。未若飞九之烈。而薊丘大同。鞠为茂草。江都番禺。屠割几尽。端冕沦为辮发。坐论易以长跼。茸兹犬羊。安宅是处。哀我汉民。宜台宜隶。鞭捶之不免。而欲参与政权。小丑之不制。而期扞御晰族。不其忸乎。夫力不制。则役我者众矣。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岂无骏雄。愤发其所。而视听素移。民无同德。恬为胡豢。相随倒戈。故会朝清明者鲜睹。而乘马班如者

多有也。吾属子遗，越在东海。念延平之所生长。瞻梨州之所乞师。颖然不怡。永怀畴昔。盖望神丛乔木者。则兴怀土之情。睹狐裘台笠者。亦隆思古之痛。于是无所发舒。则春秋思王父之义息矣。昔希腊陨宗。卒用光复。波兰分裂。民会未弛。以吾支那方幅之广。生齿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国寡民乎。是用昭告于穆。类聚同气。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凡百君子。蝉嫣相属。同兹恫瘝。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告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别生类以箴大同。察种源以简蒙古。齐民德以哀同胤。鼓芳风以扇游尘。庶几陆沈之痛。不远而复。王道清夷。威及无外。然则休戚之藪。悲欣之府。其在是矣。庄生云。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丘陵草木之缙。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耶。嗟乎。我生以来。华鬓未艾。上念阳九之运。去兹已远。复逾数稔。逝者日往。焚巢余痛。谁能抚摩。每念及此。弥以腐心流涕者也君子。

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启

宣言书既成，留学界初署名发起者十数人。有署名后中悔者数人，故仅得十人，即章炳麟、秦鼎彝（力山）、冯自由、朱菱溪、马和（君武）、王家驹、陈犹龙、周宏业、李群（彬四，湖南人）、王思诚等是也。定期在上野精养轩举行纪念式。留学生报名赴会者达数百人。太炎更征求孙总理、梁启超为赞成人，并将宣言书邮寄横滨《清议报》，托梁启超代派送当地华侨，借广宣传。孙、梁均复书赞成，惟梁于数日后再函太炎，谓此事只可心照，不必具名，请将彼之赞成人名义取消云。会期原定三月十九日，诂清公使蔡钧据使馆学生报告，知留学界有此举动，极形恐慌，乃持此会宣言书亲访日本外务省请求禁止开会，以全清日二国友谊。日政府竟徇其请，特令警视总监解散此会。太炎等十人于开会前一日各接到牛込区警察署通知书，谓有要事待商，请于是日某时至该署一谈。太炎等如约偕行，时衣华服者只太炎及陈桃痴二人。太炎长衣大袖，手摇羽扇，颇为路人所注目。既至神乐坂警察署，警长首问各人籍贯为清国何省人。太炎答曰：“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警长大讶，继问属何阶级：“士族乎？抑平民乎？”太炎答曰：“遗民。”警长摇首者再，乃以严厉之态度发言曰：“诸君近在敝国设立支那亡国纪念会，大伤帝国与清国之邦交。余奉东京警视总监命制止开会。明日精养轩之会，应即解散”云云。太炎等以争之无益，无言而退。翌日，留学界多未知开会受阻事，不约而赴会者有程家桢、汪荣宝等数百人。然是早上野精养轩门前及不忍池附近已有无数警吏监视，声言禁止中国人开会。学生到轩门者均被日警劝告而散。孙总理亦自横滨带领华侨十余人来会，及询知清使馆借外力干涉情事，乃在精养轩聚餐，以避日警耳目。是日归抵横滨，即邀集同志多人在永

乐楼开会补行纪念式。香港《中国日报》得宣言书即载诸报端，大事宣传。及期，陈少白、郑贯公等举行纪念式于永乐街报社，同志莅会者极形踊跃。香港、澳门、广州各地人士闻之，颇为感奋云。

按民十六余有著述《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之举，尝向太炎征求史料。太炎乃亲自手写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原文以赠。顾余本藏有三十六年前此会宣言书印刷旧稿；两相校勘，则太炎所赠者较旧稿已易数字。如支那易为中夏，延平易为大木，梨州易为太冲，婣媯相属四字且复删去。余以前后意义虽同，究以不失本真为善，故仍袭用旧稿。然新稿乃太炎亲手写赠，弥足宝贵。余珍藏至今，视同国宝。今太炎遽归道山，万方同悼。考太炎生平墨迹虽多，而关于光复故物之文字，此为第一；虽不尊为国宝，不可得矣。爰亟制版登报，公诸同好。

章太炎等之护党救国公函

民十三，国民党改组容共，旧同盟会员某等以共党首领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等立心不轨，于民党根本及国家前途将有不利，尝屡列举共党祸国殃民种种事实，请求孙总理设法取缔，希图挽救。及民十四三月总理在北平逝世，共党篡窃民党之阴谋，益复暴露无遗。章太炎、田桐、居正、周震鳞、马君武、管鹏、但焘、焦子静、谢良牧、茅祖权、刘成禺及余等事先已惄然忧之，乃于民十三冬假上海南阳桥裕福里二号章寓开会讨论挽救之策，咸主张非号召同盟旧人，重行集合团体，不足以匡济危局。群推太炎撰稿领衔，该函叙述民党源流及失败原因颇详。录之如次（原函现存余手）：

敬启者。吾国原始民党以同盟会为最先。当时羁栖学舍。手无斧柯。只此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之誓言。发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以澄清中国。不惜躯命。前仆后继。虽建置职员。而实归平等。虽分布群策。而各无异同。虽片时纷争。而不蓄私憾。故能树之风声。为全国军民所信仰。其时同盟支别。又有共进光复诸会。名虽小异。体实大同。众志成城。赫然振发。于是有辛亥光复之役。议者或以光复为易事。苟非忠信相孚。亦乌能应于万里乎。在会同人，志多恬退。大勋已就。而乘车戴笠者各不相猜。虽环堵萧然。亦无怨悔。追怀旧雨。实令人叹慕无穷。嗣后旗帜渐分。始有共和国民二党。其时同盟余烈犹未全衰。癸丑金陵失败。

民气日消。及袁氏覆亡。民党已四分五裂。幸各党皆有同盟旧友为之纲纪。间招时俊。颇亦得人。相与支持不坏。然政党相猜。易破道义。淳朴之气。日渐浇漓。甲是乙非。争端无已。自六年护法至今。虽西南孤峙。存此予遗。而各省意志。常非一轨。甚乃抗兵相攻。自生仇衅。一时利用。旋即乖离。曩无尺寸之藉。而能取中夏于满洲之手。今有数省之力。而倒授军阀以主器之权。则知诚信日衰。转相携贰为之也。某等以国是不定。由民党涣散之故。所以犹有余烬者。则同盟会精神未尽磨灭。阴与维持。而受之者身不自觉。向使同盟尚在。凡民党在朝在野者。必不为尔寂寂。虽有桀黠之徒。亦不得递司神器矣。为是感念旧交。力道来轸。冀以同盟旧人。重行集合团体。稍就次。乃旁求时彦熔于一冶。以竟往日未伸之志。而为将来匡济之谋。将伯频呼。反思不远。执事夙同大义。勤劳廿年。阅事既多。德慧日进。惟望赞成此志。加以匡扶。则死友得酬。存者知感。膏沐天下。为泽无穷矣。特书申意。不胜惓款之至。专此布达。

敬颂

□□先生冬安

周震麟 管 鹏 焦子静 茅祖权

章炳麟 田 桐 居 正 冯自由 同启

马君武 但 焘 谢良牧 刘成禺

通讯处上海南阳桥裕福里二号章太炎先生寓

民国十三年 月 日

横滨《清议报》

戊戌政变后，康、梁师徒同亡命日本，梁启超感觉有设立言论机关之必要，遂于己亥春（一八九九年）向侨商募资，在横滨发刊《清议报》，大倡保救清帝光绪之说，推冯镜如任总理，而自任总撰述，麦孟华、欧榭甲等佐之。出版数月，除歌颂光绪圣德及攻击西太后、荣禄、袁世凯诸人外，几无文字；所载谭嗣同著《仁学》，及译述日本柴四郎著《佳人奇遇记》，内有排斥满清论调，为康有所见，遽命撕毁重印，且诫梁勿忘今上圣明，后宜谨慎从事。及康离日赴加拿大，梁与欧榭甲等渐与总理、杨衢云、陈少白等相往还，意气日盛，因而高唱自由平等学说，自号饮冰室主人，题其学说曰《饮冰室自由书》，颇为世人欢迎。梁有别号曰任庵，至是亦改称任公，以示脱离康氏羁绊之义。盖康门徒侣多

以庵字相称，即为源出康门之标记，梁此举即所以表示其决心也。欧榘甲亦有一文阐扬汤武革命，语极动听，事为康所知，深恐梁、欧等改弦易辙，于彼不利，遂令梁赴檀香山创设保皇会，欧赴旧金山主持《文兴报》，而使麦孟华专任《清议报》笔政，凡有革命自由独立自主等名词，一律禁止登载。梁自檀岛尝以其赠何蕙珍女士诗二十首寄登报末，康来书切责编辑陈镛，谓卓如（梁字）荒淫无道至此，汝等乃公然刊其淫词，实属有玷师门云云。《清议报》于庚子年（一九〇〇年）冬骤遇火灾，因保险单误书总理人姓名为林北泉，西人保险行不允赔偿损失，遂致停版歇业。

梁启超介绍周孝怀书

诸暨周善培，字孝怀，历任各省督抚幕僚及四川、广东官立学堂督办提调等职，思想新颖，议论豪爽，日以提倡新学为务，极为岑春煊所器重。己亥秋奉川督命至日本考察学务，因与梁启超有旧，时至横滨清议报馆访梁叙阔，梁对周极致倾仰，认为当今豪杰。尝先后为书二通介绍于孙总理，第一书曰：“昨得刚兄（著者按：刚即梁子刚）由横滨寄上兄一书约践旧游，刚兄有事不能赴约，令弟自往，而其信至礼拜日正午始到，因已不及，故未能就谈为歉。今有四川一豪杰来此间，弟欲约其与兄相见。若能以本礼拜六晚仍赴前地相会最幸，可否请即回一示。弟晋顿首。”（梁有日本名曰吉田晋）第二书曰：“今日寄上一书，想已达。有四川一豪杰周君孝怀，弟欲与之同见足下商量一切事务，何时可约见，请即回示为盼。逸仙仁兄，名心叩。”时梁及同门梁子刚、韩文举、欧榘甲、罗伯雅、张智若等与总理往还日密，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咸主张革命排满论调，非常激烈，因有孙、康两派合并组党之计划，拟推总理为会长，梁副之。梁诘总理曰：“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总理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故周孝怀甫至日，梁即引见总理，共商救国大计，周闻孙梁言论，颇表同情，并愿相机协助。未几，梁忽奉康有为命即赴檀岛办理保皇会事务，一切计划尽成泡影，殊可惜也。癸卯（一九〇三年）余任香港《中国日报》驻东记者，总理尽以旧日与康梁来往函牍付余保藏，梁介绍周函二通亦在其中。民四余与林子超同主持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事务，钮永建亦至美游历。时中华革命党与国民党别派之欧事研究会因对日外交问题主张各异，有急进缓进之分。林钮等认为非团结一体，不足以应付时局，遂推余至日本任双方调解之责。余既抵日，适民党两派亦有此项之合作运动，欧事研究会及南洋水利速成社

一派同奉岑春煊为领袖，岑之驻日代表为周孝怀、章行严。某日，孙总理招宴周、章于灵南坂头山满宅，藉敦友谊，并邀余及头山满、萱野长知、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谢持、邓铿诸人作陪。谢、邓均孝怀授业弟子，谢时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次长，邓则任中华革命军粤军总司令。孝怀至门，即令两旧学生代卸外衣，别主人时亦令谢、邓服务衣帽，盖仍不脱旧日师长对学生之尊严也。余于是日赴宴之前，偶检行篋，忽发见己亥梁启超介绍周孝怀见总理之函二通赫然在焉，乃携以俱往，于席间出示座客，众皆咄咄称异，即总理亦为愕然，诚不料此十七年前无关紧要之函牍，竟突然出现于宾主二人之前也。民十一，孝怀从上海至广州，邓铿方佐陈炯明任粤军参谋长，闻其师来，特驱车至广九铁路车站接候。事前为陈炯明部将某等所知，以邓不恤陈党反对，力助总理北伐，衔之。遂购使凶徒狙击之于车站。邓以伤重身死，孝怀闻耗，为之悲痛不置云。

陈少白时代之《中国日报》

自乙未广州一役失败后，孙总理久在日本规划粤事，重图大举，知创设宣传机关之必要，乃于己亥（一八九九年）秋间派陈少白至香港筹办党报，兼为党务军务之进行机关。少白莅港后，先向老友何启、区凤墀查探地方官吏对于我国革命党人之态度。时区方任华民政务司总文案，何则任议政局议员，在香港政界均有相当之信用，因悉禁止总理五年入境之期仍未满限，而少白则可不受拘束。于是租定中环士丹利街二十四号门牌为报馆发行所。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义，定名《中国日报》。所有机器铅字，概由总理在横滨购办。初出版时，少白自兼任总编辑。先后助理笔政者，有洪孝充、陆伯周、杨肖欧、陈春生诸人。英文翻译则为郭鸿逵、周灵生等。经营数月，至是年十二月下旬始告出版。初以不审英人对华政策所在，一时未敢公然高唱革命排满之说。半载后措辞始渐激烈，乃惹起中外人士之注意。从前各地中文报纸排印俱用直行长行，不独香港一地为然。独《中国日报》始仿日本报式作横行短行。初时人多异议，《中国日报》毅然不屈。未几，香港、广州、上海各报陆续改用横行短行，是亦报式之革命也。此报除日报外，兼出十日刊一种，定名《中国旬报》。篇后附以鼓吹录，专以游戏文章歌谣杂俎讥刺时政，由杨肖欧、黄鲁逸任之。是为吾国报纸设置谐文歌谣之滥觞。时革命党财政并不丰裕，开办数月已感困难。任厨役者为横滨同志陈和，报中买菜钱亦时由陈代垫。陈复假诸编辑部中人，其拮据可知矣。翌年（一九〇〇年）总理派少白及杨衢云、郑士良、史坚如等经营广州、惠州军事，

报中来客顿形热闹。在馆下榻者有史古愚、史坚如、苏卓南、张硕臣等。时到谈者有杨衢云、郑士良、宋少东、黄福、练达成、邓荫南、冯镜如、冯自由、李自重、梁麒生、杨襄甫、李纪堂、毕永年、钟荣光、陈典方、王煜初、伍汉持、李竹痴、方毅父、区凤墀、朱通儒、张智若、日人原口闻一（东亚同盟会员）、宫崎寅藏、平山周、山田良政、福本诚、伊东正基、清藤、末永、英人摩根等，可谓一时之盛。及庚子惠州、广州二役相继失败，义师将士群至机关部狼狽求助。报中经济能力大受影响，殆有不支之势。幸是时富商李纪堂早由杨衢云介绍入党，于接济军饷外，尚能担负报馆度支。《中国日报》赖以维持不坠者，李之力为多焉。

辛丑（一九〇一年）春，报社迁移至永乐街。时郑贯公适因发刊开智录，为横滨《清议报》所摈，总理特介绍至《中国报》充任记者。郑归自日本，介绍欧美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学说于读者，持论新颖，极受社会欢迎。时距庚子汉口失败一役未久，留日志士沈云翔、朱菱溪、秦力山、苏子谷（曼殊）及余等次第至港，多在报社下榻。沈与粤督陶模之子拙存（葆廉）友善。陶督笃信新学，葆廉更以新党自居，延吴敬恒、钮永建为幕僚，大兴教育。沈每至广州，陶父子礼之甚优。父子均喜阅《中国报》，其黜陟属吏，恒以《中国报》之评判为标准。故《中国报》在粤销场以是时为最佳，仅督署一处，销售至二百余份。清季督抚在粤政绩，以陶为差强人意，《中国报》与有力焉。有一次，陶因阅《中国报》而将县官二人撤职，其后乃知此二人实为好官，不过《中国报》误载外界投稿而受人所愚耳。又有广西志士余化龙者，因事系南海监狱，屡寄稿《中国报》，揭示监狱黑暗，狱吏畏之如虎，事事恒迁就之。化龙竟借势强奸狱吏之妇，尤属罕闻。及为《中国报》所知，因据实加以纠正，化龙卒不免伏法。是年十二月初九日，总理由日本乘日轮八幡丸至港，挈眷寓报馆三楼。自乙未广州失败以后，港政府即不许总理入境。此次适禁限期满，故总理得暂寄居。不数日，警长亨臣奉命讽使总理出境，总理遂于是月十五日赴越南参观河内博览会，前后居港仅一星期耳。

郑贯公为人豪迈不羁，交游日广，与少白意见颇不相投。是年七月，因与郑士良、陈和等饮于水坑口宴琼林酒楼，士良卒然暴毙，深为少白所不满。故郑任笔政不及一载，即辞职另创《公益报》，继之者为陈诗仲及黄世仲。

壬寅（一九〇二年）陶模解职离粤。十二月，洪全福、李纪堂、梁慕光、谢缙泰等，谋于除夕日在广州举义，不幸事泄失败，梁慕光等八人殉焉。是役，李纪堂独任军饷数十万元。总理、少白均不与谋。事后，广州《岭海报》主笔胡衍鸷竟大放厥词，痛诋革命排满为大逆不道。《中国报》陈诗仲、黄世仲等乃严词辟之。双方笔战逾月，粤垣志士纷纷投稿为《中国日报》声援，而革命书报在粤销场为之大增。《中国日报》因拥护革命与他报笔战，此为第一次。

癸卯（一九〇三年）春间，《中国日报》以留日学界之革命思潮异常蓬勃，特聘余为驻东记者，故国内各报留学界消息以《中国日报》为最详。是年闰五月，上海《苏报》案起。《苏报》主人衡山陈范（梦坡）亡命至港，少白款之于《中国报》。陈嗜酒如命，一夕夜起觅酒不得。乃取案头医生给予少白之药酒作鲸饮尽之，一时传为笑谈。章炳麟入狱后，时作政论寄登《中国报》，读者视同拱璧。甲辰（一九〇四年）康有为命徐勤发刊《商报》于香港，大倡扶满保皇主义，《中国报》乃向之痛下攻击。是时郑贯公主办之《世界公益报》及《广东报》先后出版，民党在言论界渐占势力。惟《中国报》以维持困难，乃由容星桥介绍与文裕堂印务公司合并，迁于荷理活道。公司设总理三人，以李纪堂、容星桥、陈少白三人分任之。李司财务，容司印务，陈司报务，报社组织为之一变。此三年间，陈诗仲已赴南洋就星洲《图南日报》之聘；黄世仲亦改任《公益报》记者。在《中国报》先后承乏笔政者，自王君演、卢少岐、丁雨宸、梁襄武、何冰甫、何雅选、卢信、廖平庵诸人。时有伍宪子者，藉卢信介绍，将入《中国报》为主笔，后乃致书卢信，谓因康党《商报》多出每月笔资五元，故已改就《商报》之聘云。可见当日新学志士对于革命保皇二说，尚多未能划分界线也。

乙巳（一九〇五年）七月，中国同盟会东京本部成立。总理以庚子后内外党务久已停顿不振，而少白与港、粤诸同志复不能融洽一致，遂于八月初十日特派余至香港组织同盟会，兼任《中国日报》记者。时任笔政者为卢信、廖平庵、陈春生三人，翻译为冯扶，余有长篇论文曰《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凡二万余言，为我国言论界畅论民生主义之嚆矢。东京《民报》第四号及旧金山《大同日报》均转录之，香港同盟分会即于此时成立，众推少白为会长，郑贯公为庶务，余为书记。是年下半年港、粤间革命派报纸异常发达，香港《中国日报》之外，有《公益报》、《广东报》，及郑贯公新创之《有所谓报》、黄世仲新创之《少年报》、广州有《群报》、《亚洲报》、《时事画报》。适是时美国新颁禁制华工苛例，冯夏威自杀于上海美领事署前，以警国人。于是港、粤人士大愤，商工学报各界同组拒约会，以抵制美货相号召。美国商会乃举派代表与港、粤各界会商修约问题，经何启、陈少白二人从中斡旋，略具端倪，即世称十二条款是也。十月，总理偕黎仲实、胡毅生、邓慕韩等赴越南西贡，船过香港，假法邮船，约诸同志开会讨论党务。其时，《中国日报》与《有所谓报》因抵制美约事意见不合，互相攻击。余多方调处无效，总理乃约少白、贯公至法轮，劝令和解，二人从之。十一月，黄克强自日本来，下榻《中国日报》，旋赴广西桂林，访巡防营统领郭人漳有所活动。十二月，《中国日报》复由荷理活道迁至上环德辅道。

丙午（一九〇六年）春，粤督岑春煊宣布将粤汉铁路收归官办，为粤路股

东黎国廉等反对，遂捕黎下狱，并禁止粤中各报登载反对言论。香港股东陈席儒、陈赓虞、杨西岩乃在香港组织粤路股东维护路权会，函电清廷及各方极力抗争。香港各报均力助股东，攻击岑春煊之违法占权，尤以《中国报》最为激烈。盖陈、杨等深佩少白才识，特聘充保路会顾问，故陈、杨等一切策划皆少白为之谋主也。岑于莅粤之初，颇重视《中国报》，对于行政用人之批评，间有采纳，及为港报反对，遂下令禁止各报入境，《中国报》在粤之销场由是断绝。识者以《中国报》被禁之原因，不在于高谈革命，而在于维护路权，咸引为绝大憾事。陈、杨等初语少白，谓《中国报》如有困难，当以万金助少白向文裕堂承购该报，以酬该报协助之力。其后竟食言而肥，民党中人咸不直之。未几，黄克强在桂林以郭人漳与陆军小学监督蔡锷不睦，屡劝二人合力反正，均不见听，遂怏怏归香港，仍寓《中国报》，旋赴南洋。鄂同志吴昆时奉日知会刘家运、冯特民命至港，欲访黄协议鄂省军事。因黄未返，乃在《中国报》守候两月。黄回，以餉项不足，令吴返鄂传语各同志静候。黄此次赴星洲，仅筹得千数百元，《中国报》时在窘乡，竟向黄借资购买纸料，其困状可见一斑。

丙午七月，文裕堂以营业不佳，宣告破产。余于事前预向文裕堂以五千元购取《中国报》，故得免于此厄。先是，《中国报》尝于乙巳冬记载康有为之女同璧在美洲行骗华侨事。康乃委托保皇会员叶恩在香港法院，控《中国报》以毁谤名誉之罪，要求赔偿损失五千元。此案涉讼经年，迄未解决。《中国报》搜罗康有为师徒棍骗证据，极为充足，颇有胜诉之望。惟英律凡被告无能力延律师抗辩，即等于败诉，讼费例由被告负担。《中国报》原属文裕堂印务公司产业之一部，文裕堂如破产，则《中国报》亦须拍卖，以供讼费赔偿之需。少白初以陈赓虞、杨西岩等曾有斥资万元协助《中国报》之约，至是重申前义，竟为陈、杨所拒。一说谓陈、杨前允协助之万元，乃以之酬报少白两年来策划争取路权之劳，并非以之协助《中国报》。故少白是时不便向陈、杨进言，以免损及个人权利。后一年，陈、杨三人合酬少白九千元，即是此款云。余以《中国报》势濒危殆，于民党名誉关系至巨，乃商诸外舅李煜堂，得其助力，事前以五千元向文裕堂购得之，始得免于拍卖。新股东为李煜堂、李纪堂、伍耀廷、伍于簪、吴东启、麦礼廷、李亦愚、潘子东诸人。众举余任社长兼总编辑，新报社于八月迁于上环德辅道三〇一号。时总理在南洋，对于康同璧讼案主张继续抗诉，特汇款三千元于少白，使延律师力争。少白以讼事牵缠费时失事为辞，不欲再事兴讼，故此案结果遂为无形之失败。

东京高等大同学校

己亥（一八九九年）九月，梁启超向横滨华商郑席儒、曾卓轩等募款三千元，创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牛込区东五轩町。从学者有前湖南时务学堂旧生林锡圭（述唐）、秦鼎彝（力山）、范源濂（静生）、李群（彬四）、蔡艮寅（松坡后改名锷）、周宏业（伯勋）、陈为璜、唐才质（法尘）、蔡钟浩、田邦璇、李炳寰等十余人。横滨大同学校学生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曾广勤、郑云汉、张汝智等七人。梁自任校长，日人柏原文太郎为干事。时梁方与总理、杨衢云、陈少白诸人往还颇密，且有联合组党之计划，故所取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诸生由是高谈革命，各以卢骚、福禄特尔、丹顿、罗伯斯比尔、华盛顿相期许。是时我国留东学生全数不满百人，以主张排满之戢翼翬（元丞）、沈云翔（虬斋）等为最激烈。戢、沈每至大同学校访友，恒流连达旦。此外尚有北洋官费生黎科、金邦平、蔡丞煜、郑葆丞、张煜全、傅良弼诸人亦持革命论调，与总理、梁启超时相过从。庚子（一九〇〇年）夏秋间，唐才常谋在汉口发难，预约留学中有志者返国相助。大同学校湘籍学生与唐有师生关系，闻命赴义者有林锡圭、秦力山、田邦璇、李炳寰、蔡钟浩等。校外留学生则有傅良弼、吴禄贞、蔡丞煜、黎科、戢元丞、郑葆丞等。是役以期前事泄失败，除力山、禄贞、元丞走脱外，余人先后就逮被杀。先是，梁启超因在《清议报》渐发挥排满言论，深为康有为所不满。康于己亥十二月派叶觉迈携旅费至日，立逼梁即赴檀香山设保皇会，另派麦孟华代理校务。麦以诸生咸心醉民族主义，与保皇会宗旨不合，遂废止汉文讲席，而改为攻读日文之专修学校。及汉口之役失败，校中经费不继，势将解散，乃由日人柏原向日政党募款，在小石川区建筑新校舍，易名曰东亚商业学校。除旧生外，新生由本国来者颇不乏人，王宠惠、蒋尊簋、蒋方震，其最著者也。此校续办二年，复以无法维持，改由清公使蔡钧接办，更易名清华学校，盖表示大清统治中华之义云。

毕永年削发记

毕永年，号松甫，湖南长沙人，拔贡生也。少读王船山遗书，隐然有兴汉灭满之志。遇乡人有称道胡、曾、左、彭功业者，辄面呵之曰：“吾湘素重气节，安得有此败类？”闻者为之色变。弱冠与浏阳人谭嗣同、唐才常相善。谭、唐亦夙具种族观念，金谓非推翻异族政府无以救国。永年闻论大喜，遂日与商议救国大计，更从事联络会党之运动。戊戌（一八九八年），湘抚陈宝箴力行新政，创办时务学堂，以广育人才，延唐才常、梁启超等为教授。督学使江标亦高谈新学，大为湘绅王先谦、孔宪教、叶德辉、黄鋈隆诸人所反对。新学派以王先谦等受清帝严旨斥责，气焰大张。谭嗣同在京任军机章京，尤有致君尧舜之想。独永年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说，日往来于汉口、岳州、新堤、长沙之间，与哥老会诸首领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辜天祐、师襄、李堃等谋匡复事业，且投身会中，被封为龙头之职。闻谭嗣同居京得志，乃北上访之。嗣同引见康有为，有为方交欢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有兵围颐和园擒杀清西后之阴谋。以司令艰于人选，知永年为会党好手，遂欲委以重任，使领兵围园便宜行事。永年叩以兵队所自来，则仍有赖于袁世凯。而袁与有为本无关系，永年认为此举绝不可恃，遂拒绝其请，且贻书嗣同历陈利害，劝之行，嗣同不果，于是径赴日本，求谒孙总理于横滨，愿加入兴中会为会员。未几，清帝变法失败，长沙时务学堂被封，唐才常亦避地日本，永年乃介绍之见总理于旅次，对于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之起兵策划有所商榷。毕、唐同主张孙、康两党联合进行之义。总理曰：“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才常闻之大悦，愿约梁启超同向有为进言。总理知有为性情固执势难合作，乃派永年偕日人平山周赴湘、鄂各地视察哥老会实力，居湘、鄂逾月始东渡复命。平山语总理，谓：“所见哥老会各龙头多沈毅可用，永年所报告金符事实。”总理遂力主湘、鄂、粤同时大举之策，因使永年二次内渡，偕各龙头赴香港谒陈少白、杨衢云等商量合作方法。永年遂于己亥（一八九九年）冬领杨鸿钧、李云彪、辜天祐、辜鸿恩、张尧卿、师襄等数十人至港。鸿钧乃金龙山堂龙头，云彪乃腾龙山堂龙头，均为湘、鄂哥老会各山堂之势力最巨者。陈少白乃介绍粤、港各三点会各大佬（首领之称）与杨、李等相会。是为湘、鄂秘密会党与广东秘密会党结合之嚆矢。同时，永年提出兴中、三合、哥老三大团体公推孙总理为总会长之义。三会各代表均无异议，遂特制总会长印章，由日人宫崎寅

藏赆往横滨，上诸总理。杨、李等居香港两月，复由永年导往日本，谒总理请示方略，均由总理分别遣之回国候命进止，庚子（一九〇〇年）夏，永年挈杨、李诸龙头居沪，日促总理克期大举，以乏饷械故，迟迟未得确讯。时才常亦奉康有为命经营勤王军事，先在上海发起正气会以为活动机关，继复以挽救时局为辞，邀请海上名流容闳、严复等开国会于张园。其宣言书有曰：“低头腥膻，自甘奴隶。”又曰：“君臣之义如何能废？”永年以才常为自相矛盾，且违背向日宗旨，特以此相驳诘。才常借口须恃保皇会款接济，为权宜计，不得不措辞如是。永年大非之。适杨、李、辜、张诸人株守申江，浪用无度，闻才常方面富而多资，遂纷纷向才常报名领款，愿为勤王军效力。永年复力劝才常断绝康有为关系，才常坚不肯从。永年受种种刺激，且以会党诸友见利忘义，不足共事，遂愤然削发，自投普陀山为僧，易名“悟玄”，仅贻书平山志别，其后不知所终。遗书尚存平山手中，录之如次：

平山仁兄足下。弟自得友仁兄，深佩仁兄义气宏重，常思运雄力为敝国拯生灵，可谓天下之至公者矣。弟惜吾中国久成奴才世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贍身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今将云游，特来告别。仁兄一片热肠，弟决不敢妄相阻挠，愿仁兄慎以图之，勿轻信人也。弟于日内往浙江普陀山，大约翌年华三月，由五台、终南而入峨眉，从此萍踪浪迹，随遇可安，不复再预人间事矣。临颖依依，不尽欲白，龙华会上或再有相见时乎？官崎仁兄晤时乞为道意，恨此番未得叙别也，劳思如何？释悟玄和南上启。

永年入山后，所部尽归于才常、林锡圭二人。圭号述唐，湘阴人，有干才。才常联络会党全赖其力，亦永年挚友也。锡圭常驻汉口，大发富有票，借哥老会之力，散放于湘、鄂、皖、赣各县，为数甚夥。才常在上海待款发动，屡电海外，促康有为、梁启超汇饷接济，均无以应。以是各党目对康、梁感情日恶。杨鸿钧、李云彪率先离异。辜洪恩则发贵为票，李和生则发回天票，各自为谋。固不俟汉口事泄，而会众已先后解体矣。总理在日闻永年愤世远遁，如失左右手，尝四处访寻不获。自庚子至乙巳（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长江流域各省之运动一时为之停顿云。

刘学询与革命党之关系

刘学询字问刍，又号耦耕，粤之香山人，少登甲榜归广州为大绅，交结权要，势倾一时，有土豪之称。时粤垣有一种官督商办之公开赌博，号闹姓者，每届科举皆以投考士子之姓氏为赌，政府度支及试官私囊均恃为收入之大宗。刘包办闹姓多年，其金钱势力足以左右士子之成败，及官吏之进退，典试者莫不仰其鼻息。总理于乙未春在广州创办农学会，尝以医术纳交于政绅各界，绅士中署名为农学会发起人者，颇不乏人，刘及潘宝璜兄弟预焉。总理与刘有同邑之谊，往还尤密，因知刘平素蓄志非常，遂与商榷起义大计。刘大悦，引总理为同调。然刘夙抱帝王思想，绝不了解欧美民权学说，故总理相与协议多次，刘均以朱元璋、洪秀全自命，而以总理为徐达、杨秀清。总理以其思想陈腐，势难合作，遂渐疏远之。及九月重阳之役，刘事先亦略知情，曾告总理，谓是时正值官厅收解闹姓饷银，为数甚巨，大可取作军用，借以表示好感。故事后粤督谭钟麟奏拆内称：“据陆皓东供：香山县人，与福建人在香港洋行打杂之杨衢云交好，因闹姓厂在省城西关收武会试闹姓费数百万，该处为殷富聚集之区，欲谋抢劫”等语。虽与事实不符，然所说亦有自来也。刘自是与总理不通音讯者多年。至庚子夏，总理在日本忽接刘自粤来书，谓粤督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时总理方经营惠州军事，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然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遂偕杨衢云日人平山周宫崎滔天等乘法轮烟狄斯赴香港，抵港之日为西历一九〇〇年六月六日。先是何启、陈少白已由香港总督卜力斡旋，劝李鸿章乘机宣告独立。李幕府中有刘学询、曾广铨二人亦极力从旁怂恿，闻总理等将由日本至港，遂预派安澜兵轮来迎，邀总理、衢云二人过船开会，总理得香港同志报告，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诱捕孙、杨之计划，更有谓刘实为之主谋者，故不欲冒险入粤，仅派宫崎随刘乘兵轮晋省，代表接洽一切，而已则乘原船赴法属西贡。宫崎至广州，寓刘宅密谈一夜，刘述李督意，谓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嘱宫崎向总理转达，宫崎遂失意返港。未几，联军攻陷北京，清廷电召李督北上议和，特派招商局轮船安平至粤延接。李督遽受清廷恩遇，遂决计北上。舟过港时，港督重申前议，李坚不允。刘、曾二人时亦随行，陈少白尝登安平轮访之，刘谓傅相意志坚决，无法劝阻，事遂绝望。及惠州革命军起，总理时在台湾，闻刘独留上海，未随李督赴津，遂使平山周持密函至沪访刘求助巨款，并约与合作。原函现

尚存平山手中，录之如次：

耦耕主人足下：前次会议已决行事之法，一为车驾回京之办法，一为车驾西迁之办法，今据明文，迁都已实，则惟有其后之办法耳。数月以前，已令部下分途起事，先占外府，以分省城兵力，并令城内外正军，一俟兵力稍单，则乘机袭城，以为基本。袭城之道，亦分二法：一为部下日前布置之法，据报城内外各要地已种烈雷，一燃可陷官军八九，但此法伤残太甚，因知所种之物，大拿米已有四万余磅，银粉亦有百余磅，若一燃之，则恐羊城虽大，片瓦无存也。此又焉能借为基本之地哉？故力戒勿行，且飭俟便陆续起回，免以自伤，未审能照命而行否？其二为弟亲率大队，从乡间进迫省城，在内部众，同时起应，此法较为妥善，今已约部下待命矣。今惠军已起，日内则肇高北江等处必继之，省城之兵不能不外调，城中不能不单薄，一击必下，计属万全矣。弟已与镜海当道密商，已蒙许借其道地为进取之途矣。今拟日间乘邮下南洋荷属，另雇轮直至镜海也。未行之前，欲先将内外局面布置妥当，以为万全中之万全也。今特遣深信人周君平山来见足下，面托足下主持内局，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其余内政一人，外政一人，财政一人，此三人由足下择人当之。弟意以杨君文优当财政，李君伯优当外政（未知此人与公同气否），盛宣君足当内政，兵政一人弟自当之，先行攻取土地，然后请公等来会也。外局则宜先发代理使职人于外国，此等人弟自能择之，如何容皆可各当一面也。今日事机已发，祸福之间不容发，万无可犹豫，且清廷和战之术俱穷，四百州之地，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势，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以毅然命众发之。今欲计出万全，转祸为福，第一要著为厚雄资财，速办外局之事，欲保全苍生，瓦存羊石，则欲速雇舟直渡内地，以慰众心，而一众志成城，否则玉石俱焚，生灵涂炭，列强瓜剖，华夏陆沈，弟固蒙不仁之名，足下亦恐难逃奇祸，故求足下及杨、李同志等，即速代筹资百万交周君汇带弟处，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也。勿以斯言为河汉，幸甚幸甚。又主政一节，初欲托足下央李相为之，惟彼已拜全权和使之命，恐未必肯从吾请，且于理不便，故决推足下当之，已传语反正军中，俟到可扬布之日，则照扬布之矣。江、鄂两督趣意如何？如不以此举为不是，可致意力守，遏外人侵入。如不以此举为然，则弟取粤之后，即当亲来吴楚，与彼军一见也。内局布置妥当之后，足下宜预备行装回粤相会可也。余事不尽，周君面述之，此致，即候筹安不一。

弟长雄谨启

按此书命意含有种种作用，总理鉴于乙未之役，知刘素抱帝王思想，故即以主政一席许之，而自揽兵政，其用意无非欲得其资助巨款而已。函中所举姓名，耦耕即刘字，周平山即平山周，长雄即高野长雄，总理别号也。杨文为杨衢云，李伯为李纪堂，盛宣为盛宣怀，何容为何启、容闳，时平山谒刘备述总理推戴之意，惟刘虚与委蛇，平山竟无所得，遂电告总理复命，总理于是即由台湾乘日轮至上海，舟泊黄浦码头，使平山约刘至日轮相见，刘托故不往，平山再三强之始行。孙、刘会谈数时，终无结果，自后刘与革命党人遂不再发生关系。清季贝子载振至浙江，刘以馈献巨金，得圈用杭州民地数百亩，营造刘庄别墅于西湖，民国后浙政府据乡民举发，特将刘庄封禁充公，其后经刘多方设法，卒获取消封禁，领回原业云。

沈云翔事略

沈云翔，字虬斋，浙江乌程县人。少有大志，肄业于武昌自强学堂。己亥（一八九九年）鄂督张之洞遴选优秀学生派送日本留学，云翔预焉。时孙总理、陈少白、梁启超先后亡命日本，彼此往还，相与研究革命方略，至为透辟，云翔偕同学戢翼翬（元丞）、吴禄贞（绶卿）访之，一见如故，对总理尤倾倒备至。己亥庚子间，各省留东学生渐增至百数十人，湘之秦力山、林述唐、李炳寰、蔡松坡、田邦璇、蔡钟浩；鄂之刘百刚、吴念慈、傅慈祥；粤之黎科；闽之郑葆丞；燕之蔡丞煜；皖之程家桎诸人，均属有志之士。云翔一一引见总理，共商天下事，总理深得其助。庚子（一九〇〇年）七月唐才常谋举自立军于武汉，留东学生慷慨赴义者二十余人。事败，或死或逃，云翔时在上海，仅以身免。张之洞以参加是役者，多属鄂省官费学生，因驰书东京，剴切劝告，令勿蹈死者覆辙。学生不服，谋报书绝之，属云翔起草。云翔乃痛陈革命理由，词意皆妙。中叙唐才常、林述唐、傅慈祥被戮之事，有句云：“既欲避亡国大夫之谥，而又蒙羞杀士之名。”之洞固畏清议，得书后窘不可支，汗如雨下，即欲作答，而难于下笔，乃将原书分之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学生，令各撰驳文一篇，同情于云翔者多告假。有某生遵命为文数千言，极言革命足以亡国，之洞击节称赏，令印刷万纸，分寄留东学生传观。云翔读之，乃宣言曰：吾国亡于满族已二百六十余年矣，岂至今日始言亡国耶？闻者罔不感动。先是云翔尝偕戢翼翬、金邦平、章宗

祥、吴振麟、黎科、傅慈祥等发起励志会，以砥砺志节为宗旨，庚子后会中分子渐趋向拜官主义，云翔思有以救正之，乃于辛丑（一九〇一年）春，约秦力山、戢翼翬、王宠惠及余等创刊《国民报》月刊于东京小石川区白山御殿町百十番地。留学界倡导民族主义之杂志，以是为嚆矢。余任发行兼编辑人，经费多赖孙总理接济，以维持困难，仅出至第四期而止。云翔深感经济压迫之苦痛，遂南游星洲，谒闽商邱菽园，力劝其抛弃保皇主义，皈依革命真理。菽园款之于《天南新报》，久久无所表示。云翔乃至香港《中国日报》访陈少白。闻陶模时任粤督，以素与陶子葆廉（拙存）相善，爰至广州督署谒之，葆廉待以殊礼，且引见乃父，凡遇新政兴革事件，辄就之请益，故清末各督抚之政绩，以陶模为比较优良，云翔与有力焉。壬寅（一九〇二年）以后，《国民报》诸友星散，戢翼翬开设作新社于上海，秦力山南渡缅甸，王宠惠游学美洲，云翔不知何所杳触，竟倦伏故园，韬光养晦者多载，生平友好，多莫知其踪迹。辛亥武汉光复，陈其美组织沪军都督府于上海，云翔始再出参与帷幄，其美礼之甚优。嗣民元南北统一，仍遁迹乡居，绝意仕进。民二赣、宁讨袁军失败，民党耆旧株连者众，云翔乃迁上海租界避之。袁世凯令沪军使杨善德大兴党狱，侦者探悉云翔寓处，诡为车夫伺于门，候云翔出，侦者遽拉之直向华界，投之于狱。云翔移书王宠惠求援，宠惠多方营救，奉无以应，云翔寻见杀于沪军署。

郑贯公事略

郑道，字贯一，广东香山县人，少颖悟好学，过目成诵，有神童之目。初读书乡塾，年十六，以家贫辍业，乃东渡日本，依其族人寿康。寿康久任太古洋行横滨支店买办，使贯一在办房服役。贯一耻与厮走伍，恒郁郁不乐。时旅日华侨风气渐开，侨商颇有购读《时务》、《知新》等报者，贯一于工作余暇，辄向友人假读《新学书报》，隐然具国家思想。岁戊戌（一八九八年）横滨大同学校成立，教员康徒徐勤、汤觉顿、梁启田等大谈新学。逾年梁启超发刊《清议报》旬刊，徐勤倡设孔教会。一日，大同学校出联曰：“自信美人犹未暮”。贯一代其族弟对曰：“要倡孔教亦非迟。”徐、梁等询悉为贯一捉刀，知其有志向学，乃特许充免费生。己亥（一八九九年）秋，梁启超得侨商郑席儒等资助，组织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从游者俱湘、粤籍学生，余及贯一与焉。此外尚有秦力山、林述唐、蔡艮寅（后易名锷）、冯斯栾、范源濂、李炳寰、唐才质等二十余人。校中功课，除日、英二国文字外，专讲授欧、美各国革命历史及希腊先哲与

法儒卢骚、孟德诗鸠，英儒达尔文、斯宾塞等学说，故诸生莫不志大言大，各以古代名贤自况。贯一自称中国之摩西，尝著述《摩西传》以见志。庚子（一九〇〇年）七月，唐才常谋起自立军于汉口，事泄失败，高等大同学校湘籍学生林述唐等殉难者十余人。是年冬学校以款绌改组，贯一乃改就《清议报》编辑之聘，时梁启超已改其别号任庵为任公，秦力山亦改其别号遁庵为遁公，均示脱离康氏羁绊，故贯一亦易名贯公，以明一致。《清议报》原为保皇会机关报，南洋美洲各埠凡有华侨之地即有保皇会，亦即《清议报》之代销处，贯一以华侨中毒已深，乃倡设《开智录》半月刊，专发挥平等自由天赋人权之真理，欲以革命学说灌输海外保皇会员，为拔赵帜易汉帜之计，特邀余及冯斯栾同任撰述。贯一号自立，斯栾号自强，故时人有三自之称。出版之后，风行一时，保皇会员因之豁然觉悟者，颇不乏人，梁启田乃自加拿大移书横滨保皇会告变，《清议报》经理冯紫珊以是免贯一职。时孙总理寓横滨前田桥一百二十一番馆，与贯一及余等早有往还，至是乃介绍贯一于陈少白，使任香港《中国报》记者，此辛丑（一九〇一年）春间事也。维时香港新闻界尚极幼稚，主持笔政者多旧学中人，立论陈腐，颇为新学士子所齿冷。贯一至港，乃尽量阐发其新名词及新思想，旗帜为之一新，大为读者欢迎。港中青年慕贯一名，多愿与之结交，贯一赋性不羁，遂与诸纨绔游，宴饮殆无虚夕，渐为少白所不喜。一夕与同志郑士良（庚子惠州革命军首领）陈和等饮于水坑口宴琼林酒楼，士良猝暴病身死，贯一意不自安，未几遂向陈少白辞职，旋与林护、谭民三等创设《世界公益报》，癸卯（一九〇三年）夏间偕冯活泉、苏焯南、崔通约三人至横滨定购印机铅字等物。贯一任总编辑，而通约则充驻日访员，是为香港维新派报纸之第二种，是报资本全出自基督教徒，立言宗旨须受资本家所统制，贯一以议论缚束，大违初衷，出版不及一载，即自行辞职，而另创《广东报》。《广东报》言论较《公益报》为开展，惟资本不足，发刊年余，便已歇业。乙巳（一九〇五年）夏复组织小报，题曰《惟一趣报》，又名《有所谓》，专以小品文字牖导社会，粤中文士助任撰述者，有胡子晋、王君演、王斧、陈树人、卢伟臣、卢星父、骆汉存等十余人，销路之广，驾各大报而上之。时当美国公布华工禁约未久，各省抵制美货之潮流，风起云涌，尤以广州、香港二地为最。粤督岑春煊徇大绅江孔殷之请，严令解散拒约会，且逮捕马达臣、潘信明、夏重民三志士置之于狱，各界人士大愤，贯一乃联合粤、港各报，对暴官劣绅口诛笔伐，义声震于一时。香港美商会以彼国商业损失不资，遂延律师何启出而调处，以转请华盛顿政府改善商约为条件，即世称十二条款者是也。是年七月，东京同盟会本部成立，孙总理派余至香港组织分会，余既莅港，乃召集同志开成立会于《中国日报》，众举陈少白任会长，贯一任庶务干事，余任书记干事。丙午（一九〇六年）夏，贯一妇马氏忽患恶疫，赖贯一多方护持，得不死；而贯一以侍疾之故，竟为侵染。淹缠数日，遂以不起，年

仅二十有六。寻马氏亦仰药以殉，闻者莫不惜之。后一月，诸同志为开追悼会于杏花楼，友好及各界人士参与者二千余人，极一时之盛。《有所谓报》自贯一逝后，维持乏人，乃易名《东方报》，刘思复、谢英伯、陈树人等同任撰述，至丁未（一九〇七年）春停刊。

秦力山事略

秦鼎彝一名邨，号俊杰，又号力山，别号遁公、巩黄，湖南长沙人。赋性豪侠，好与会党中人游。戊戌（一八九八年）湘抚陈宝箴创办时务学堂，延梁启超、唐才常掌教，力山与湘阴林锡圭、邵阳蔡艮寅（后易名锷）、慈利李炳寰、田邦璇、武陵蔡钟浩、浏阳唐才质等，同为学堂高材生。己亥（一八九九年）秋，梁启超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函招时务学堂旧生从学，应之者二十余人，力山预焉。力山既莅日本，日读法儒福禄特尔、卢骚等学说，及法国大革命史，复结识孙总理、章炳麟、沈云翔、戡元丞诸人，渐心醉革命真理，种族观念油然而生。是年冬梁启超赴檀香山，延力山分任横滨《清议报》笔政，力山借以发抒政论，文名由是渐显。庚子（一九〇〇年）五月义和拳祸作，时爱国志士中颇有主张乘时游说拳党首领，使改扶清灭洋标帜为革命排满者，力山亦此议之一人。遂只身至天津，求见拳党大师兄痛陈利害，拳党斥力山为二毛子，命牵之出，力山以拳党顽固无可合作，乃至汉口访林锡圭，参加长江自立军运动。因与安徽抚署卫队管带孙道毅友善，愿独担任池州大通发难之责，由唐才常委自立军前军统领。及至大通，赖孙管带密助以军械，水师营弁亦多受约束，又由皖省哥老会头目符焕章在大通、芜湖、太平、裕溪和悦洲等处散放富有票，招人入会，大通及附近居民附和者充塞于途。原与汉口机关部约期七月十五日同举，詎唐才常以待海外保皇会汇款，展期数次，力山因长江沿岸戒严，未管军报，仍进行不辍，至七月十三日事为大通保甲局委员许鼎霖所闻，立督局勇拿获党人七名，铜陵县魏令更电皖抚王之春告警，王先派武卫副前营傅永贵督勇一哨附江轮前往弹压，继闻盐局已被党人占据，乃续派武卫楚军及定安军七八百人赴援，并令沿江各地戒严。力山知事机已泄，遂令党人于十五日立即起事，并四处张贴汉口所预印之安民告示，文云：

中国自立会会长以讨贼勤王事，照得戊戌政变以来，权臣秉国，逆后当朝，祸变之生，惨无天日。破己亥十二月念四日立嗣伪诏，几欲蔑弃祖

制，大逞私谋。更有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名，贼臣载漪刚毅荣禄等阴助军械，内图篡弑，不得则安然与中立为难。用敢广集同志，大会江淮，以清君侧，而谢万国，传檄远近，咸使闻知。

“宗旨”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二清光绪帝复辟。三无论何人凡系有心保全中国者准其入会。四会中人必当祸福相依，患难相救，且当一律以待会外良民。

“法律”一不准伤害人民生命财产。二不准伤害西人生命财产。三不准烧毁教堂杀害教民。四不准扰害通商租界。五不准奸淫。六不准酗酒逞凶。七不准用毒械残待仇敌。八凡捉获顽固旧党应照文明公法办理不得妄行杀戮。九保全善良革除苛政共进文明而成一新政府。

先是力山运动沿江水师略已就绪，水师参将张某闻变，立派炮划四艘率兵渡江防堵，诂所部多与党通，甫至岸即与党人联合一气，张参将竟投江而死。于是水师尽入力山掌握，随以火炮轰击督销局，据之，局员钱绶甫逃。继占领货厘局，释放被逮党人七名，驻大通防营管带萧镇江则守中立。皖抚王之春初派傅管带永贵率兵赴援，因见党人势盛，不敢渡江，乃加派省城防营管带邱显荣及芜湖防营管带李本钦各领所部会攻，仍未得利，被党军以火炮击沉炮艇八艘，小火轮一艘。十七日芜湖吴道续派衡字军三营应援，清军势力顿加，力山挥兵奋攻三次，卒以兵少不敌。乃率余众向九龙山方面退却，旋探悉汉口中军事泄失机，唐才常、林锡圭等均遇害，遂解散所部，潜至南京谋焚毁马鞍山军械局，事亦不成。于是买舟至新加坡，访康有为、邱菽园计划再举，因而尽知汉局之隙，罪在康之拥资自肥，以致贻误失事，遂对康宣布绝交，愤然再渡日本。时湘、鄂志士陈犹龙（桃痴）、朱菱溪诸人于事败后多亡命东京，群向梁启超算账，梁不胜其扰，竟移寓横滨避之。力山乃与戢元丞、沈云翔、雷奋、杨荫杭、王宠惠等创刊《国民报》月刊，高唱民族主义，风行一时。壬寅（一九〇二年）三月复与章炳麟、马同（君武）、朱菱溪、陈桃痴、王家驹、周宏业、李群等及余十人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孙总理、梁启超咸署名为赞成人。清公使蔡钧闻之，遂向日政府要求禁止开会，此会卒被日警署临时解散，《国民报》以款绌停刊。力山乃至上海助戢元丞续办《大陆报》，复与同志筹办《少年中国报》，以短于资本而止。甲辰（一九〇四年）至香港，寓《中国报》，日与陈少白、郑贯公、黄世仲等谋，欲运动驻粤湘籍防军反正，尝往来广东三次，是年十二月被清提督李准派兵搜索，狼狈逃港。乙巳（一九〇五年）春，乃至南洋访尤列、黄伯耀（黄世仲之兄）于新加坡。尝至《图南报》谒陈楚楠，以病不果。居坡两月，遂赴缅甸，谋取道入滇有所活动。既至仰光，寓陈甘泉宅。先是康有为于数年前曾率其徒侣至缅，设保皇会于仰埠五十尺路，华侨误信其说者，颇不乏人，闽人庄银安其一

也。既而保皇会棍骗之真相次第暴露，侨胞亦因而觉悟前非，陈甘泉、庄银安、徐赞周、杜诚浩、林国重、陈金诸人于癸卯（一九〇三年）冬组织一中华义学以教育华侨子弟，后二年复创设《仰光新报》以启迪民智。闻力山自祖国来，众咸招待优渥，一如旧好，陈、庄、徐等乃请其修订中华义学章程为民族主义教育，力山于修订章程外，复为选序文三千余言，阐扬民族主义，透辟无伦，此文旅缅华侨至今犹有多人能琅琅朗诵也。力山又著说革命二十四章，凡六万余言，皆经验有得之谈，登诸《仰光新报》，仅刊至十六章，余稿八章，竟为该报顽固派股东所毁弃，读者罔不引为憾事。是年春三月，力山自仰光至缅甸新都满德礼，与滇人李瑞伯筹商云南起义方法，居数日，再进缅边蜡凤，投张石泉处。张任英官译员，富有民族思想，与力山极为相得，力山在蜡凤赋诗多章，均寄登《仰光新报》，录其一二如次：

蜡凤杂感十首

力山遁公稿

三字微名五尺身，亦儒亦墨亦新民。年年蛮烟触天地，野马尘埃了一生。
山残水剩万民屠，国脉亡之命矣夫。亿兆同胞齐俯首，卅年三百作囚俘。
载鬼一车皆素识，独留荆棘一铜驼。可怜名士多如鲫，何异秋灯扑火蛾。
半生猿鹤又虫沙，缺恨弥天待女娲。食到菟鲋魂一断，终身无刻暇思家。
唇焦舌敝命都磨，说法其如不听何？可是众生根器浅，鲁阳无计为挥戈。
石烂海枯性不改，声声舜日与尧天，东胡王气依然在，禹甸茫茫匝地毡。
几辈风云付散流，有时闻报更虔刘。不堪人鬼多游侣，独对天风泣马牛。
蛮荒草不长忘忧，猛忆昭王此旧游（永历帝死于缅甸）。即问菖芽肠已断（缅甸为明之附庸），史编亡国溯从头（自永历死而明祀遂斩矣）。
一死难拼万姓生，何如姑剩苦吟身！愿身化钻穿金石，手创球东大帝民。
虫声唧唧屋之下，唤醒诗魂惊五鼓。收笈蘸笔梦共和，一瞑不视万万古。

是年六月力山得孙总理自巴黎来函，言六月间东归，约在新加坡相见。其时力山已离缅甸赴滇边干崖担任教务，不暇他适，来函告陈魏楠请向总理代达意见。先是力山由蜡凤返仰光，拟即变装赴北京实行暗杀，行程未定，而吴樾炸五大臣之事发，且得同志蔡鸣岐函告各地戒严情形，切嘱慎勿轻进。适滇边腾越干崖土司刁安仁（沛生）倡办军国民学堂，特派卢若连至仰物色专任校长，徐赞周以力山荐，力山欣然就道，学生陈仲赫、陈守礼、李贞壮、陈仁和、谢玉兔等五人随行，刁土司得力山助，乃使其弟摄理政事，自率男女学生十余辈东渡日本留学。力山自刁去后，深觉办事棘手，颇有去志，时移书陈甘泉、庄银安、徐赞周三入云：

春元（即甘泉）银安赞周诸兄鉴：顷接五月二十四日手书，敬悉一切。诸子（即随行五学生）颇能恪守规则，此皆仲赫之力居多，惟不甚笃学，然思想已略开辟。所恨陈仲平不践前约，竟不肯来（兵操教员）。据沛兄（安仁）来函，所需之教习亦未聘定（因觅人甚难也），想不久即有人与若连来也。巩（力山又号巩黄）自入夏以来，两足因手指抓伤，延烂甚宽，经九十余日而始愈，近日此间气候不佳，瘴气逼人，雨水甚多，偶晴则亢热异常，故功课亦听诸子之自便。盖寻常此刻原为暑假时期。此间既不放假，故功课亦暂取其轻，俟入秋以后再行加重可也。此间沛既远去，其弟绝无主张，有幕友彭某顽固陋劣，而又加之以贪鄙，此人与老宣抚（沛之父）为至友，在此已十数年，故对沛生等居然为一老前辈，遇事把持甚力，是不独有阻文化进步（一言难尽），且将来难免崖地终陷于危。东家暗弱，既不能因彼之把持而信任彼，故巩自彭来后，对于政界之事，始终未尝尽一言，故现在此间无事不现其黑暗与草昧，即此人阶之厉也。此间学子大半长于巩者甚多，虽稍识数字，而略知文理者绝无而仅有。至于学理事理又未尝一经梦见，而风俗习惯又非常败坏。故欲望学生之一二能成立，犹之北往而南其辕，巩在此盖度日如年也。夫既当此无谓之责任，又不得即时而解散，天下至难之事未有过于此者也（其中曲折非寸楮所能达也）。沛生景况亦甚不好，而贸然任铁路股东二百万金，伊意欲仗海外义士之力，然路权谁属，尚未确立，即定矣，究为官办耶，抑商办耶，亦未可知。而彼乃遽以托公等而代招股，是可见中国人无条理之一左证，贤者如此，况其他耶？（云南路权即内属，亦决不能为商办，因云南商力至小，见识亦绝无，断不肯出而任事，终不免为官办。则恐吾侪同志未见肯入股者。）公等不妨一函询其办法。

巩顿首六月初三日

徐赞周等于是年秋七月组织一调查会月刊，以鼓吹民族主义为主，拉兴实业为辅，初延滇人张石泉、闽人萧少珊主持笔政。以风气闭塞，销数寥寥，及得力山书，知干崖地僻人愚，不能行其道，乃函邀力山返仰担任该报总编辑。力山得书，遂别择教员代其职务，将行时，忽染重病，因误投药饵，竟成不治之症，冬十月十一日逝世于干崖，享寿二十有九。同行学生陈仲赫等为营葬后，同返仰光报丧，旅缅同志咸为哀悼不已。力山未娶，有聘妻谢氏，闻力山凶耗，竟守贞母家不嫁，力山仅有一同母弟，曰钧彝，生一子名修竹，现充南京军医处药剂师。民二十一年六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以力山奔走革命，死事惨烈，特赐给一等一次恤金一千元，以慰忠魂，生平事略宣付史馆。

李纪堂事略

清季革命党员捐助历次起义军饷最巨者，以李纪堂为第一。李名柏，号纪堂，新会人，香港富商李升之第三子也。性任侠，好与秘密会党游。港地富商子弟多不脱纨绔结习，独纪堂活泼好动，事无巨细，恒喜躬亲执役，不假手他人，尤善行猎，枪法至精。某岁香港政府征募义勇军，尝一度应募，受任为队长。弱冠任日本邮船公司港分行华经理。乙未九月（一八九五年）兴中会失败于广州，孙总理、郑士良、陈少白三人拟乘日船赴日本。纪堂在买办室闻之，以总理为奇人，亲登轮拜访，备致倾慕之意。逾年，其父逝世，分得遗资百万，益挥金如土。会庚子拳匪乱起，举国鼎沸，以国势岌岌，非从事根本改革不足以挽救，心焉忧之。是年二月初五日，偶访开平人谢纘泰畅谈时事。纘泰为兴中会员，与杨衢云友谊最密，因劝纪堂加入兴中会合力救亡。纪堂从之，遂于三月二十三日由杨衢云主盟入党。时总理方筹划惠州军事，六月间自日本过港。衢云、少白等引纪堂登舟相见，总理大悦，立给以二万元，令充驻港会计主任。未几惠州三洲田之革命军败挫，纪堂于是役前后所耗不资，益以香港《中国日报》经常费之供给，亦逾巨万。总理自惠州失败后，得以漫游欧、美，无后顾之忧者，纪堂之力为多焉。壬寅（一九〇二年）十二月总理应越南总督韬美之邀，赴河内参观博览会，约少白往会。纪堂乃赠少白旅费二千元，以壮行色。壬寅（一九〇二年）八月，谢纘泰之父日昌与太平天王洪秀全之从侄全福谋在广州发难。日昌少经商澳洲，为三合会前辈。全福幼随天王于广西，转战湘、鄂、皖、浙诸省，晋封左天将瑛王三千岁。天国败，逃香港，佣洋船为庖丁，航行四十年，始隐居香港悬壶自给。二人同抱种族思想，相知最深，久有匡复之志。纘泰以纪堂为可用，乃于八月十四日介绍二人与之相见。纪堂自惠州失败，仍雄心勃勃，相见后，全福提议筹饷五十万元，召集洪门兄弟克期大举。纘泰提议推举容闳老博士为临时大总统，纪堂均无异议，且允独立肩任军饷全额。议既定，全福即委任党员梁慕光、李植生等在广州企图大举。筹备既竣，遂定期十二月除夕起义，相约俟全城文武官吏齐到万寿宫行礼时，放火为号，即各路并起，炸军装库，据万寿宫，然后占领各衙署，宣布共和政治。詎是月二十六七等日已有奸人向清吏及香港警署告密。清吏据各方报告，遂于三十日分头破获城中及芳村各机关，捕杀党员梁慕义等十余人，搜获军械旗帜军衣食品无算。慕光、植生二人仅以身免，全局为之瓦解。是役，纪堂预定偕全福谢氏父子等于除夕由港赴省组织大明顺天国革命新

政府，及闻事机败露，始临时中止。（事详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总理时在越南河内，事前并未与闻，仅由友人函告略知大概。少白以纪堂毅然独力经营此伟大事业，绝不求助于兴中会干部，讥为不脱帝王思想。纪堂经此役后，其家业因之耗费过半，渐呈竭蹶之象。至甲辰（一九〇四年）《中国日报》以维持困难，亟图改组，乃由容星桥介绍与文裕堂印务公司合并。除《中国报》及文裕堂两基本作合资本若干外，余由纪堂独斥资五万元助成其事。此数年间，纪堂以商业拂逆，丧资甚巨，然对于社会事业上之创作，其志迄不少衰。所经营略具成绩之事业有三。一为九龙新界之青山农场，辟地数百亩，以举办种植畜牧等事业，出品优良，中西人士咸称美不置。二为李升格致书院。李升有子八人，各得遗产逾百万，独纪堂拨款十万元创设格致书院，以纪念亡父，延邝华太博士为掌教。开办二载，以其兄弟均不之助，独力难支，遂致辍业，教育界莫不引为憾事。三为“采南歌”剧社，甲辰乙巳间，教育家程子仪以改良粤剧宣传革命为己任，以此就商于少白、纪堂二人，纪堂愿助资二万元，而少白则任编辑戏剧，所制《黄帝征蚩尤》、《六国朝宗》等剧本，均足发扬民族主义。虽维持不及二年，然此举实开革命新剧之先河。后此“振天声”、“优天影”、“琳琅幻境”诸剧团缤纷并起，于主义宣传，收效绝巨，即“采南歌”为之倡也。丙午（一九〇六年）秋，文裕堂公司以营业不善，宣告破产，李煜堂、冯自由等乃集资向文裕堂承购《中国报》，使免拍卖之厄。时纪堂家渐中落，尚有余款三千元附贮于文裕堂，遂以此款改充新《中国报》股本。丁未（一九〇七年）以后，所开设益隆银号负债累累，因而宣告破产，每月惟恃青山农场售品所得以赡养家室，然对于党人行险募款涉讼外交诸事，仍奔走效劳，惟恐不力。如丁未黄冈革命军首领余丑被清吏逮捕之讼案，及己酉（一九〇九年）汪精卫、黎仲实在屯门作爆裂品之试验，辛亥清提督李准之投诚，均得其助力匪鲜。辛亥九月粤省光复，都督胡汉民征为交通司长。自民元以至于今，尝数度任职县长，均以郁郁不得志而去，而家况乃益困乏。革命前所居为炮台道自建之崇楼大厦，今则仅月租三十余元之九龙塘何文田之一层楼耳。其长次兄二人均拥厚资，富甲香港，以鄙吝闻于时，纪堂以志趣不同，过从甚鲜。迨辛亥革命，两兄以乃弟功成名就，富贵可得，待遇较前优异。无何，时移势易，昔之开国元勋，几于身无立锥，求一饭而不可得者，比比皆是，纪堂其一人也。

横滨《开智录》

己亥冬，梁启超自日本赴檀岛，横滨《清议报》笔政由麦孟华摄理。报中文字则由湘籍学生秦力山、蔡松坡、周宏业诸人分任之。粤籍学生郑贯一亦驻该报任助理编辑，时《清议报》言论大受康有为直接干涉，稍涉急激之文字俱不许登载。诸记者咸以为苦，而莫敢撓其锋。郑乃约同学冯懋龙、冯斯栾同创《开智录》，专发挥自由平等真理，且创作歌谣诸谈等门，引人入胜。郑号自立，二冯，一号自由，一号自强，故世有三自之称。是报为半月刊，即假《清议报》为发行及印刷机关，以是凡有《清议报》销流之地，即莫不有《开智录》，各地华侨以其文字浅显，立论新奇，多欢迎之，尤以南洋群岛为最。美洲保皇会因党务颇受此报影响，特致书横滨保皇会，质问宗旨不同之故。《清议报》经理冯紫珊遂不许《开智录》在该报印刷，并解除郑编辑之职。《开智录》出世仅半载，以无所凭借，由是告终。

东京《国民报》

庚子冬，湘人秦力山在安徽大通起兵失败，遂亡命至东京，与沈云翔、戢元丞、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王宠惠、张继诸人发刊《国民报》月刊，大倡革命仇满学说，措辞激昂，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初虑清公使馆干涉，爰就商于余，余乃介绍力山、云翔谒余父镜如于横滨，以余父生长香港，可用英商名义避免清吏鱼肉。余父允之，故《国民报》遂以英人经塞尔（Kingsell）名义为发行人。经塞尔即余父之西名，中西人士凡曾侨居横滨山下町者，无不知此名为谁何也。报中文字由力山、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执笔，篇末附以英文论说，王宠惠任之。是时汉口失败诸志士多逃亡日本，群责康、梁拥资自肥及贻误义师之非，力山尤形激烈。故此报列举康、梁种种罪状，最为翔实；寻以资本告罄停版，出世仅七八月而已。戢元丞于《国民报》停刊后，辛丑（一九〇一年）在上海发刊《大陆报》月刊，仍延秦、杨、雷诸人担任笔政，鼓吹改革，排斥保皇，尤不遗余力，实为《国民报》之变相。其批评梁启超文中有警句曰：“娇妻

侍宴，群仙同日咏霓裳，稚子候门，共作天涯沦落客。”闻此文后为张之洞所见，大为击节称赏云。

东京《国民报》补述

《国民报》发刊于辛丑（一九〇一年）五月十日，事务所设在日本东京小石川区白山御殿町百十番地，编辑所设在麹町区饭田町六丁目二十四番地。各记者常驻编辑所内者，有秦力山、王宠惠、卫律煌、唐才质等四人。编辑室中，四壁悬挂庚子汉口殉难之傅慈祥、黎科、蔡丞煜、郑葆丞四烈士遗照。报中内容类分八门：一社说，二时论，三丛谈，四纪事，五来文，六外论，七译编，八答问，各门作者咸不署名。篇末英文论说后，载有秦君力山著《暴君政治》不日出版之英文广告一则。略谓本社总编辑秦君力山，自庚子七月在安徽大通起兵谋倾覆满清事败逃亡日本后，现与本社各记者编著《暴君政治》一书。内容计分八类：（一）中国必须彻底革命。（二）叙述满人虐待汉人历史，举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证。（三）批评清朝九代谕旨。（四）满清刑罚之黑暗。（五）暴虐政治之史实。（六）满洲详纪。（七）中国人之特性。（八）自传。不日可以出版云云。英文论说出王宠惠手笔，中有批评中国刑法一文极为精彩。此报仅出至四期而止，访诸各地老友均已无存，只王宠惠手存第二期一册，诚革命史中秘宝也。当时《国民报》秦力山、戡元丞、沈云翔等，因励志社及留学界中优秀分子渐醉心利禄，时为清吏所收买，遂拟发起一国民会以救其腐败。其宗旨在宣扬革命仇满二大主义，拟运动海外各埠华侨与内地志士联合一体，共图进行。即以《国民报》为主动机关，及报既停刊，会亦因之搁浅，至壬寅（一九〇二年）冬，留学界始有青年会之继起。

广东独立协会

辛丑（一九〇一年）春，东西各报忽有清廷将割让广东于法国之风说，留日粤籍学生闻之大惊。遂由冯斯栾、郑贯一、李自重、王宠惠、冯自由、梁仲猷诸人发起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向满清政府宣告独立之议，留日华侨入会者大

不乏人。总理时居横滨，赞助此举颇力，冯、郑、李、王等因是常至横滨前田桥孙宅筹商进行方法，总理与兴中会员黎炳垣、温炳臣、陈和等招待殷勤。郑贯一恒在孙宅流连竟日，大招《清议报》同事之忌，粤籍留日学生与兴中会合作自此始。

励志会与《译书汇编》

励志会为庚子（一九〇〇年）东京留学界所组织。其时各省学生东渡留学者不过百数十人，尚无何种结合，此会实为留学界创设团体之先河。有会章五条，不外以联络情感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惟是时革命思潮已风起云涌，会员中主张光复主义者大不乏人。激烈派如戢元丞、沈云翔等均任会中干事，故亦不啻一革命宣传机关。庚子七月汉口一役殉义之黎科、傅慈祥、蔡丞煜、郑葆晟及脱险之戢元丞、秦力山、吴禄贞诸人，皆此会会员也。一九〇一年阳历一月一日，励志会开新年庆祝会于上野精养轩。莅会者有来宾菲律宾独立军代表鹏西，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横滨兴中会员尤列、翟美徒及该会会员戢元丞、张铎绪、钱承志、富士英、曹汝霖、王宠惠、沈琨、陆世芬、吴振麟、张奎、夏循罔、冯阅模、稽慕陶、雷奋、高淑琦、陈槐、吕烈煌、张廷栋、叶基贞、金邦平、张继、薛锦标、唐才质、廖世纶、章宗祥、王宰善、关炳荣等三十余人。特拍照以志纪念，甚盛事也。辛丑（一九〇一年）七月，清政府忽下诏废止八股文，改试策论，并选派学生出洋，且有酌用东西洋毕业学生之议，留学生之热衷利禄者多认为仕途捷径，励志会会员乃亦渐次解体。同时留学界之有志者尝发刊一种杂志，曰《译书汇编》，庚子下半年出版。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杨、雷亦励志会会员。此报专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如卢骚之《民约论》，孟德斯鸠之《万法精理》，约翰穆勒之《自由原论》，斯宾塞之《代议政体》，皆逐期登载。译笔流丽典雅，风行一时。时人咸推为留学界杂志之元祖。自后各省学生次第倡办月刊，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不得不谓《译书汇编》实为之倡也。

王宠惠轶事

王宠惠字亮畴，粤之东莞人，少在香港皇仁书院读书，其父煜初为基督教老宣教师，与区凤墀、左斗山、孙总理、陈少白均属旧识，道气盎然，有老师宿儒之风。宠惠少聪颖，而思想日新，尝与乃父驳论宗教哲理，乃父怒极，欲施以夏楚，宠惠奔避不遑，旋至上海任南洋公学教习。庚子秋秦力山在大通起兵失败，逃而之沪，时租界得清吏照会，搜索党人甚力，宠惠密收容之。旋由宠惠送力山登轮他适。辛丑（一九〇一年）春，力山与戢元丞、沈云翔创刊《国民报》于东京，函邀宠惠担任英文部撰述，宠惠由是东渡。时梁启超方自檀香山返日本，耳宠惠名，特函约赴小石川东亚商业学校（高等大同学校改名）叙谈。宠惠复书责梁失礼，谓梁既任一党魁首，理应礼贤下士，今乃欲以一纸书使人奔走，殊令受者难堪云云。梁卒为书谢过。又梁在檀时，尝从何惠珍女士习英文数月，东归后乃倡言已深得习读英文秘诀，特条举所读英文法初阶前项十余类，编著英文汉读法一小册，以惠初学。谓凡读此书者，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宠惠闻而大异，乃于晤谈时详询此书内容及其构造方法，梁大惭，自后遂不提及英文汉读法只字。《国民报》既出版，大倡民族主义，篇末附以英文论说，由宠惠担任之。宠惠向与力山税屋同居，宠惠寓楼上，力山则寓楼下。所佣日本下女貌颇妖冶，爱宠惠少年英爽，屡向之调戏，宠惠以告力山，请其相机制止。某夜，日下女竟伺宠惠熟睡，赤身俯就。宠惠大骇，连声呼力山不已，力山应曰我来我来，日下女始狂奔而去，一时留学界闻之咸为捧腹。（著者按：此事发生时余方以事返国后力山为余言之）翌年宠惠赴美国入耶路大学，甲辰（一九〇四年）孙总理至纽约，尝约宠惠、薛颂瀛等相见。时撰一告欧、美人宣言书，题曰《革命潮》，又曰《中国问题之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即宠惠为之润词。戊申（一九〇八年）总理居新加坡，忽得宠惠自欧洲来书，谓方投考某国际法学研究学院，有事需款，爰向总理求助。总理乃使侨商陈楚楠、张永福等筹措一千五百元汇往伦敦济其急需。时当河口革命一役前后，党人需索饷糈，急于星火，同志中多以总理此举为不急之务，颇怀不满。总理乃向众解释曰：“昔甲午中日之役，英轮高升号为日本海军击沉，日方大受各国抨击，赖有日本驻欧某国际法学大家根据法例为己国辩护，各国始不起非难，英国亦无从借口干涉，王君法学渊邃，且为吾党健者，吾党此时助其成功，即为将来革命政府建立之预备也。”众闻此论，始为释然。民十七，宠惠赴欧洲就海牙国际法庭法

官，舟过新加坡，张永福、林义顺及国民党员设宴饗之。席间张致欢迎词，并举当地同志二十二年前曾奉总理命接济其旅欧学费为谈资，宠惠至是始知当日筹款之不易，为之感谢不已。宠惠在清季与孙总理结识甚早，尤于对外之革命宣传多所尽力，但未正式加入革命党，至辛亥光复，始在广州同盟会照章宣誓云。

壬寅东京青年会

留日学生最初组织之团体为励志会，其宗旨仅在交换智识联络感情二事，会中有激烈稳健二派，沈云翔、戢元丞、程家桢、杨荫杭、雷奋等属前一派，庚子（一九〇〇年）八月，汉口唐才常之役，曾有数人参与其事。后一派如章宗祥、曹汝霖、吴振麟、王璟芳等，凡遇政府派员到日考察，章等辄为之翻译引导，因是渐与官场接近，而以稳健自命。激烈派渐鄙其行，诋为官场走狗，两派积不相能，遂成水火。壬寅（一九〇二年）三月，章炳麟、秦力山等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激烈派群起和之。是年冬，留学界之有志者鉴于励志会日就腐败，遂有叶澜（清漪）、董鸿祎（恂士）、汪荣宝（袞父）、秦毓璠（效鲁）、张继诸人发起一新团体，明白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惟对于团体名称，颇费斟酌。初有人谓意大利独立之前，先有少年意大利，故主张定名少年中国会。后经再三研究，卒以少年中国四字易招满清当局注意，不利进行，乃隐约其词，名曰青年会，实即少年中国之意。发起人有叶澜、董鸿祎、张继、秦毓璠、汪荣宝、周宏业（伯勋）、谢晓石、张肇桐、蒋方震（百里）、王家驹（伟人）、嵇镜、吴绛章、钮翔青、萨端、熊垓、胡景伊、苏子谷（曼殊）、冯自由、金邦平等二十余人，中以早稻田大学学生为多，是为日本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成立未久，金邦平以不禁章宗祥等明哲保身之劝告，竟正式宣告脱会，余是时介绍苏子谷入会后，即以事返国。及癸卯（一九〇三年）夏至东京时，则青年会会员多已从事于拒俄义勇队工作矣。是会编译之新学书籍，计有《法兰西大革命史》及《中国民族志》数种。

是会成立之初，余亦发起人之一，成立之日，在东京全体会员咸齐集会所拍照纪念。事前余适因事返国，故未参与。无锡秦毓璠（效鲁）为是会之主要分子，宝藏当年青年会成立日照片，有逾拱壁。民二十六年四月五日以病逝世，余于是月二十一日赴无锡小簋巷秦府吊丧，并致挽联曰：“忆昔年扶桑设会，长沙设学，无锡设府，原期国复民苏，谁料破碎河山有今日！”“与吾子辛丑同硯，壬寅同盟，民元同事，忽告山颓木坏，此后搜寻史实向何人？”承亡友遗嗣鉴源即以三十七年前

之青年会照片及亡友手撰各种革命笔记为赠，诚于民国缔造史料，增助不鲜。

此青年会会员合影，时在壬寅冬间，翌年各省同乡会成，各会员被举为编辑员者甚多，多鼓吹本会宗旨。旋发起拒俄义勇队，未几因日本政府干涉，阳为解散，阴结同志为军国民教育会。近年来为国流血者，均此中人也。而操政权握军符执学界之牛耳者，亦不乏人。顾青年会之名已不复闻于世矣。余自癸卯秋初归国，奔走数年，迄无所成。展览此图，辄有无穷之感。戊申养痾在家，独居寡欢，私念蒲柳之质，未秋先衰，必不能久视人世，恐一旦淹化，而后之得此图者不知合影之由，或且疑余以结纳贵人为荣者，是厚诬吾当时设会之心矣。吾无能一言以记之乎？爰信笔书之。时戊申六月二十三日也。

青年会会约之第一章曰，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其详章于甲辰去湘时毁去，不复省记。呜呼！事之成败不可知，要之吾青年会于中国前途不无关系，可断言之矣。效鲁志。

青年会与拒俄义勇队

癸卯春，俄国进兵东三省，且向清廷提出七项新要求，留东学生闻之大愤，各省同乡会纷纷开会研究对策。钮永建（惕生）时在东京，忽发奇想，欲发起拒俄义勇队，走告留学生会馆干事章宗祥、曹雨霖等，请其以会馆名义召集全体学生组织学生军，以拒俄人侵略。章、曹等以学生手无斧柯、决无所成，且易引起政府之疑忌，拒绝其请。叶澜闻之，乃话同乡秦毓璠等曰：青年会揭橥民族主义，留学界中赞成者极为少数，欲图扩张，至为不易，吾人盍赞成惕生组织拒俄义勇队之主张，借此题目结一大团体，以灌输民族主义乎。青年会员均以为然，惕生既说章、曹等失败，愤懑不胜，一日访秦毓璠，滔滔述其主张，秦及叶澜等赞成之，且允联名为发起人。永建大喜，即在秦寓草传单，定期开大会于神田锦辉馆，各省学生到者五百余人，有蒯寿枢（若木）、钮永建、叶澜、林长民、王璟芳等演说，激昂慷慨，鼓掌如雷。全体通过组织拒俄义勇队，举陆军士官学生蓝天蔚为队长，日日操练，备赴疆场，先致电于北洋大臣袁世凯，请其拒绝俄人，否则与之决绝，且告以学生军之组织，请隶其麾下，求其援助。今录其所订立规条如左：

第一 定名 学生军

第二 目的 拒俄

第三 性质 (甲) 代表国民公愤 (乙) 担荷主战义务

第四 体制 在政府统治之下

第五 组织 (甲) 本部职员 (乙) 队中职员

本部职员 部长一人经理科长一人书记科长一人运动科长一人参议科长一人其余运动员经理员会计书记参议等均无定员

队中职员 队长一人副队长一人分队长三人特务长一人参谋员每十人选一人计编全队为一中队

第六 会议 为全军之总机关其议员以二种人员组织之 (甲) 本部部长及诸科长 (乙) 队中队长副队长分队长及特务长会议中应立议长一人临时选定

第七 军纪 (甲) 谨守秩序 (乙) 服从命令

第八 筹款 (甲) 出版款项预先运动临时取款 (乙) 寻常款项学生义务捐特别捐

第九 讲习 (甲) 操习 (乙) 讲课每日均各一吋以上

第十 出发 俟特派员得确实警信复信之后即行出发

第十一 解队 (甲) 目的已达 (乙) 目的消灭

第十二 附则 (甲) 编队秩序每日照常在校上课课余编班至讲习所讲习 (乙) 退校次序出发既有定期即当报告监督及校长退学

规程公布后，复通电本国各省，唤起国人同情，并公推钮永建、汤尔和二人为特派员，回国说袁世凯出兵抗敌。上海学生亦开会响应，有湖北学生王璟芳，阳表同情，阴向驻日清公使蔡钧告密，谓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蔡钧据报，乃致江督端方电云：“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又清廷密谕各督抚云：“前据御史参奏，东京留学生已尽化为革命党，不可不加防备。又日本蔡钧来奏，此间革命业已组成军队，将托拒俄一事分奔各地，前岁汉口唐才常一事，则托勤王以谋革命，此间则托拒俄以谋革命，其用意与唐才常相似。而党羽较密，编练尤严各语，不胜诧异。国家养士数百载，自祖宗以来，深仁厚泽，姑置勿论，即如近年各直省地方，遇有水旱偏灾，无不立沛恩施，普行赈济，顷者乱离虽构，而乡会试亦不忍遽停，况本年于复试以后，又创行经济特科，国家待士既优，予以进身，又欲广其登庸之路，凡在食毛践土，具有天良，而乃不思报称，以言革命，似此则国家果何所负于该革命党？前已饬蔡钧、汪大燮，于在日本东京留学生举动，务加详察。各直省地方官于留学生之返国者，亦暗为防堵，遍布耳目。昨据袁世凯密折，内言东京留学生若干人编练数军，希图革命，其电该督臣之意，则又谎言俄患日深，求该督助其军火，在日本东京各学生便可至东三省与俄人决

战。情形叵测，就使本为忠义，然距义和团之日未久，亦深虞其有碍邦交。朕以为该学生等既反叛朝廷，朝廷亦不得妄为姑息，蔡钧、汪大燮与在日本东京留学生，即可时使动静。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然亦须分别首从，不得诬陷善良，此为朕万不得已，保全国本以固邦交至意云云。”于是蔡钧乃请日政府勒令解散义勇队，制止留学生练习兵操，学生等以报国无路，莫不义愤填膺，痛哭流泪。至是青年会同志乃分向各省同乡会大倡革命排满之说，由秦毓鎰起草意见书发挥民族主义，痛诋清廷之媚外虐民，义勇队员咸为感动。叶澜、董鸿祯、程家桢、秦毓鎰等更联合队员中之宗旨坚定者，秘密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是为拒俄义勇队之变相。

河内博览会之中国志士

壬寅（一九〇二年）冬，越南河内有博览会之设。吾国官商受法国驻越官吏邀请赴会者，颇不乏人。两粤官吏奉督抚命至越参观者，有惠潮嘉道秦炳直、知府庄蕴宽、知县姚绍书、曾□□等四人。时孙中山先生亦有河内之行，盖中山先生早年已与越南总督韬美相识。韬美屡托驻日法公使招中山先生往见，有所商洽，中山先生以事迟迟未往。是年遂借参观博览会之机会克日就道。迨抵河内，则韬美已因事请假返国，预嘱其秘书长哈德安善为招待。哈德安因之礼遇殷勤，并偕中山先生拍照以志纪念。中山先生更致书香港约陈少白往会。少白乃用日人服部二郎之名赴越，在海防登岸时，得免关吏滋扰。及莅河内与中山先生同寓一三等法国旅店。华侨来会者，有杨寿彭、黄隆生、甄吉亭、张奂池、甄璧、曾齐诸人。黄隆生语少白，谓有中国道员而兼营古董商业之黄中慧其人，言谈极为开通，现寓法国一等大旅馆，盍往访之？少白遂偕隆生往见。少白以其谈话豪爽，且系北京景泰厂出品与赛之代表，竟以真姓名告之。中慧闻言甚喜，招待弥殷，并留午膳。席间粤吏代表秦、庄、姚、曾四人亦在邻座。中慧一一介绍四人与少白相见，诡称少白为日人服部，相与纵谈甚欢，其后过从日密，看会观剧，昕夕与俱。一日庄、姚二人突至旅店访少白，遇中山先生在座。中山先生取帽覆额而出，二人颇形骇异，问为谁何？少白以星洲华侨答之，未几，中慧得少白同意，告庄、姚以少白姓名，二人闻而恍然，谓因少白之谈吐书法不类日人，初已疑为康徒之梁启超，今乃知为《中国日报》主笔陈少白。吾等在粤日读贵报，获益良多，每日论说中精到透辟之语，尚能背诵一二。庄蕴宽更纵谈革命，痛言非革命不能救国，吾等以官为食，欲罢不能，如有机缘，亦可相机反正，他日革命军

到广东时，吾二人当先引领就戮，毫无反悔云云。少白以二人有新思想，欲中山先生见之。中山先生不欲人知其与法国官吏发生关系，故不允见。未几中山先生离越赴欧洲，少白亦归香港，秦等四人适与同舟，至香港而别，秦炳直始终仍信少白为日人也。中慧至癸卯（一九〇三年）夏始由越南假道香港北上，少白尝偕余送至招商局广利轮。余之识中慧自此始。己酉（一九〇九年）冬，李书城偕龙州道庄蕴宽自广西至香港取道赴沪。书城访余于《中国报》，求见黄克强，蕴宽偕行，谈次殷殷问少白近状，并细述当年在河内订交情事，以行期匆匆，未获与少白一见，深以为憾。辛亥九月，上海及苏州相继光复，蕴宽以参加义举，后尝被举代理江苏都督，其为少白早年感化之力欤！

东京军国民教育会

军国民教育会与义勇队性质不同之点，后者属于拒俄御侮，而前者则属于革命排满，此其宗旨悬殊者也。义勇队既解散，学生之卑怯者，以畏惧政府干涉，不敢再预闻政治运动。湖北学生王璟芳因举发义勇队志在革命有功，清廷嘉之，特旨赏给举人，叶澜、董鸿祯、秦毓璠诸人不为少屈，乃于癸卯夏间发起军国民教育会。群推秦毓璠起草立会意见书，兹录原文如左：

发起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

论题 不可不表明宗旨

哀哉义勇队，自成立至今，降心下气，仰人鼻息而不辞，受人唾骂而不惜，果何为也哉？为吾民族图独立欤？抑为彼满洲保私产欤？此不辩而明。凡吾同胞当无不曰：满洲杀我祖宗，夺我财产，已二百余年，今且迫我同胞，割我土地，遗之外人，致吾有灭种之惨。满洲吾之世仇也，吾覆之亡之且不懈，乌乎言为彼保产也。

然则拒俄胡为欤？曰俄据东三省，各国必与之争，争必出于战，无论孰胜孰败，吾之土地终非吾有矣。东三省亡，不足忧，东三省亡，而吾之土地皆随东三省而俱亡矣。一俄不足忧，各国皆随俄而瓜分我矣，呜呼！吾族亡于野蛮满洲，犹有独立之希望，若亡于文明各强国，真为万劫不复之奴隶地矣。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斗而死，此吾军国民教育会之所以起，凡吾同人当无不知也。

然则运动满洲政府又胡为哉？曰组织学生军必求出发，欲求出发，必先

除阻力，满洲政府在今日犹是为吾之阻力也明甚。苟使吾军能至北方，则凡合吾宗旨之举动无不可为，有此机缘，不可坐失，此所以不得不用手段，而希达我目的于万一也。上海志士之讥我毁我，岂为知我者哉！

故第一次开大会商议组织学生军，叶澜等即表明宗旨，演说之末，大声问曰：吾军此举为国民乎？为满洲乎？钮君永建曰：为国民。叶澜曰：是矣。遂退。诸君皆鼓掌。吾会宗旨固已表明，人人心中无不了然，徽章制黄帝之像，宗旨所在，不言而喻。特欲达目的，不可不用手段，故先时章程中措词含浑，未将民族二字大书特书以揭明宗旨者，职是之故。

然宗旨不明，其害不可胜言，吾会成立后，国中响应者甚多，故吾会之举动大为国人所注意，若误以手段为宗旨，互相仿效，势将率吾四百兆同胞为效力异族之奴隶，此大有害于中国前途者也。且欲举大事，必立一正大之名，使会外同志闻风兴起，为我辅助。使会内同人心目所注，并攻一途，而后事克有济。今吾会以宗旨不明之故，致贻人以口实，在清廷早洞见吾肺肝，于国民反助长其奴性，必至两无所得，而本会之基础，终无以自固，本会之发达，亦终无可望，借令发达矣，此会之于中国前途果有何影响也。

因是之故，某等拟于今日开会，定本会之宗旨，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宗旨既定之后，皆当坚守此旨，以维持本会于无穷，鼓吹此旨以唤醒国人之迷梦。祖父世仇则报复之，文明大敌则抗拒之，事成为独立之国民，不成则为独立之雄鬼，凡吾同志，谅有同心！

或者曰：宗旨表明，则满洲政府必多方摧残，懦弱国民必从此退沮，不如养晦以待时机，此讐言也。吾辈之举动，无论如何顺从，吾会之宗旨，无论如何腐败，彼终不信也。思所以防我贼我者，固未尝一日间也。吾国民奴隶根性深，习惯于满洲政府压制之下，忘其杀父之仇，将遭灭种之惨，吾辈日夜唤醒之，犹恐不及，今复设一奴隶之模型悬于国民之前，吾恐满洲政府不受吾欺，而吾四百兆同胞已远至绝地，无复生机矣。故或者之言，不足欺人，适足以自欺耳。

然则宗旨之不可不表明也，既如此，而某等之所以默而不言者，徒以特派员未回，此旨畅明，恐遭不测。今则势异曩昔，较量利害，计之已熟，用敢布其愚见，以俟公决。谨述刍议，伏希钧鉴。

军国民教育会会员秦毓鎏、萨端、周宏业、贝镛礼、叶澜、张肇桐、华鸿、陈秉忠、董鸿祯、翁浩、陈定保、胡景伊、程家桢、王家驹、郑宪成提议。

军国民教育会成立时，以本身性质属于秘密团体，须预防破坏，且须计及破坏后之安排，故定名颇费斟酌，而招收会员，概取严密，人数不多，咸能恪守规章，

保存机要。开会无定期，会场无定所，故自癸卯成立起至乙巳合并同盟会止，迄未破坏。会员徽章镍质圆形，大如墨西哥银圆，一面镌黄帝轩辕氏像，像系采自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一面镌铭四句，铭曰：“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乃出秦毓璠手撰。是年五月间，上海《同文沪报》等忽传学生军北上特派员钮永建、汤尔和在天津被清吏杀害之说，各会员闻之，愈为激昂，决定进行方法三种，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更推举同志返国分省运动起义，名曰运动员，黄軫（改名兴）、陈天华即被派回湘之运动员也。其他秦毓璠、程家桢、苏子谷等先后返国讲学，董鸿祯、王家驹等亦赴南洋群岛，各负相当任务，于革命进行。收功非鲜。

广东报纸与革命运动

在清同治初年太平天国盛时，香港已有报纸之出版，初为《中外新报》，乃英文《孖喇报》之一种副刊，故又名《孖喇报》。次为《循环报》，刊于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法人占夺安南东京即在此时。再次为《华字日报》，乃英文《德臣报》之副刊。此三报仅《循环日报》一家纯属吾国人资本耳。甲申（一八八四年）中法战役前后，广州有一报馆产生，名曰《广报》，其方式略同港报，均作直行长行。首载上谕宫门抄等类，新闻记事各以四字题目冠其端，记载至为简陋。出版数年，因刊刻某大员被参一折，为粤吏封禁，报中职员以先期遁走，仅乃得免。《广报》被封后，官绅士子仍流行一种京钞，以传达政治消息。无何，复有一报继续产生，名曰《中西报》，其始以沙面为发行所，盖鉴于《广报》之覆辙，乃托庇沙面租界外人势力下，欲以避免官吏鱼肉。后乃迁至朝天街，该报主持笔政者，有劳亦渔、武子韬、陶檀庵诸人，皆当时知名之士，亦颇畅销。乙未（一八九五年）孙总理杨衢云等谋在广州起义，即《中西报》最风行时代也。其后复有《博闻》、《岭海》各报继起，《博闻报》最初编辑为钟荣光，后改名安雅，而《岭海》则纯由著名赌商苏星衢（绰号苏大阔）者出资，有副刊曰《天趣报》，专谈花事，为粤省花界小报之嚆矢。是时广州、香港各报只记载琐碎新闻及转录沪报消息，绝不知新学为何物。嗣丁酉（一八九七年）上海《时务报》、澳门《知新报》相继出版，竞言新学，香港各报稍稍和之，广州报纸始敢略谈时事。己亥（一八九九年）冬，革命宣传机关之《中国日报》，初刊于香港，抨击满清恶政，不遗余力，粤人纷纷购读，尤以政界销路为多。广州各报以相形见绌，遂亦渐以提倡新学为言。庚子（一九〇〇年），拳乱后，粤

中满吏亦稍知新学之必要，颇以振兴教育设立学校为务，时任《安雅报》编辑者为詹宪慈（菊隐），任《岭海报》编辑者为胡衍鸿（汉民），均以鼓吹新学闻于社会。壬寅（一九〇二年）粤督陶模派吴敬恒率领学生数十人渡日本习速成师范，詹、胡二人同在被派之列。癸卯（一九〇三年）正月，洪全福、梁慕光等在广州发难之计划失败，《岭海报》著论排斥革命排满，指为大逆不道，香港《中国日报》驳之，双方笔战逾月。《岭海报》操笔政者为胡衍鹗（清瑞），即汉民长兄。《中国报》操笔政者，为陈诗仲、黄世仲，是为革命扶满两派报纸笔战之第一次。同时粤垣有《时敏报》发刊，乃倡办时敏学堂诸人所设，因出版适在洪全福失败后数日，故记载党事极详，颇受世人欢迎。癸卯后香港有《世界公益报》、《广东报》、《商报》、《有所谓报》等先后出版，除《商报》属保皇党机关外，余三报均为党人郑贯公所组织，阐扬民族主义，不亚于《中国报》，一时革命派报纸之声势为之大张。甲辰、乙巳（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间，粤中风气顿开，学校报馆缤纷并起，如《羊城报》、《七十二行商报》、《国是报》、《亚洲报》、《群报》、《时事画报》、《二十世纪报》等相继出版。适有华侨冯夏威为美国新颁华工禁例，自刎于上海美领事馆门外，举国大愤，各省志士纷纷组织拒约会以保国权，粤港各报莫不极力提倡，以伸正义。香港《公益报》因载所绘龟扛美人图，为英政府逐其主笔出境。丙午（一九〇六年）粤督岑春煊以官力强收粤汉铁路于商人之手，粤绅黎国廉率各界人士奋起抗争，岑乃派兵置黎于狱，广州各报处于积威之下，噤若寒蝉，独香港各报齐声反对，极论岑督攘夺路权之非。新出版之《维新报》、《东方报》、《少年报》、《日新报》等同一论调，岑督乃下令禁止港报入口以泄愤。丁未、戊申（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间，湘、皖、滇、赣、粤、桂各省革命军陆续举事，排满怒潮，震撼全国，粤中各报亦渐仰首扬眉批评时政得失。庚戌（一九一〇年）前后出版各报，广州有邓悲观等之《国民报》，潘达微、邓慕韩等之《平民报》，陈耿夫、李孟哲等之《人权报》，卢谔生等之《军国民报》，陈炯明等之《可报》，杨计白等之《中原报》，邓警亚等之《齐民报》。汕头有谢逸桥、叶楚伦、陈去病、林伯杞等之《中华新报》。新宁有刘少云等之《新宁杂志》，□□等之《四邑》旬报。香港有潘飞声、陈自觉等之《实报》，洪舜英之《妇女星期录》。就中如《国民报》、《人权报》、《可报》、《平民报》、《军国民报》、《齐民报》、《中原报》、《中华新报》、《实报》等，多与革命党人有关。以是对于辛亥三月二十九黄花岗之役，及孚琦、李准、凤山之被刺咸记载周详，赞扬备至。及武昌革命军兴，清吏张鸣岐、龙济光、李准等初欲负隅自固，诟沪电谣传“京陷帝崩”四字，港、粤各报相率登载，全城人士欢声雷动，张督知人心已去，无可挽救，始仓皇出走，龙、李遂亦卑辞乞降。使广东省城，得以不流血而获光复者，报纸之力为多焉。

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

在辛丑、壬寅（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两年为上海新学书报最风行时代，盖其时留东学界翻译之风大盛，上海作新社、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新民丛报》支店、镜今书局、国学社、东大陆图书局等各竞出新籍，如雨后之春笋。壬寅春，旅沪志士余杭章炳麟、常熟黄中央（释名宗仰别号乌目山僧）、山阴蔡元培、阳湖吴敬恒诸人，以译本教科书多不适用，非从新编订完善，不足以改良教育，因联络海上有志之士，发起中国教育会为策动机关。倡议诸子，均属热心民族主义之名宿，故此会不啻隐然为东南各省革命之集团。其会所设于泥城桥福源里，即今跑马厅对面。筹划数月，至是年秋冬间，始告成立。癸卯（一九〇三年）驻日清使蔡钧忽电请清廷停派留东学生，免为革命邪说所中，且照会日政府请禁止中国学生肄业陆军。国内外志士因之异常激昂，教育会乃谋集资自设学校，培植人才。正计划间，而南洋公学适发生全体罢学之风潮，盖该校教习不许学生谈论时政，压抑过甚，乃有是举。退学生之有力者何靡施（梅士福州人）、穆湘瑶（藕初）、计烈公、胡敦复、敖梦姜（嘉兴人）、俞子夷、曹梁厦、何震生、贝寿同等，初拟凭自力组织学校，继以资力不足，乃求助于教育会，章、蔡、黄、吴等允之，黄宗仰为言于罗迦陵女士，承慨助巨款，而学校始得成立，即爱国学社是也。未几南京陆师学堂学生亦因事多数退学，该校学生中以章士钊（行严）、林砺（后名懿钧号立山）为最激烈，均先后加入爱国学社，而声势乃益张。当时中国教育会为募捐经费事，尝致书海外各地华侨求助，录之如左：

中国教育会全体会员顿首寓书海外同胞：韩婴有言：磐石千里，不为有地，愚民百万，不为有民。岂惟不自有而已，权利竞争，归于强桀，固将有乘蠖抵要，夺其所据而吮膏肉者，荒荒大陆，蚩蚩横日，欲保此于终古，殆理势之必无者也。比年以来，前知之士，固尝发教育改良之议矣，盖我民诚智，彼虽欲役，固有不能者，我民诚愚，彼虽欲事，亦有不得者，此固强弱之总因，抑亦盛衰之枢纽也。而政府亦尝仿行一二，以塞众望。顾斯事艰巨，生死存亡，系于绵绵若存之一线。乃微观深察，则见其大谬不然，盖往往以形骸聋盲，当此巨任，是无异望近死者以复阳也。呜呼，海外同胞热心侠力，日日望宗国兴学校出人才者，而诘知宗趣若彼，孤我同胞之望者，至如此极耶！庄生曰：“天之穿之，日夜无降，而人故塞其窦。”今日穿之之

力犹逊于塞，然则莽莽前途，其将长夜以漫漫乎？禹域山河，其真际于末劫，而为毗蓝风中之腐草乎！抑将有偃兴者，濯乎整理，以新我日月，光我宇宙乎？凡此绝大之疑问，推往观来，执因求果，皆可于今日教育之现状而稽决之也。请为同胞重一言之：专制之毒痛于学界，递积递演，则国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残，一也。外人利我教育权者，将阴施其狡狴，益深我奴隶之资格，二也。循斯二者，已足以夷吾族姓氏矣。况丰祸之交乘而迭至者乎！同胞同胞，吾侪不自振拔，偷懦惮事，失今不图，必无幸免之希望矣。乃者旅沪同志殷忧不辍，爰有教育会之举，发起于壬寅之春，至其秋冬之际而组织乃粗备，请为同胞道其概略：我国今日学界最缺乏者为教科书，教育会发兴之始，即欲以此自任。继因八股方废，承学之士，于一切新名词，意义既未习闻，恐难沟贯，乃议仿通信教授法，刊行丛报，方欲出版，而驻日蔡使阻遏留学之风潮以起，于是乃谋自立学校规制，尚未底定，又有南洋公学学生不胜教习之虐待者相率出学，求济于教育会，遂成今之爱国学社，此敝会历史之大凡也。然敝会同志无权无势，一切建置皆白地起造，无有凭借，学生社会，家乏者十之七八，即稍有资力，而束缚于父兄，不得逞志，爱国学社财用之困难，遂有逾于寻常者。国内僭陋，稍有一二同志慷慨捐助，然一切费用不足者犹极巨，此所以不能不呼将伯于海外同胞也。海外同胞睹外族之强盛，身婴虐待之惨酷，爱国之诚，浸昌浸炽。近年凡有举动，极为同志所钦服，比来各省官学多有由同胞资助以成者，此足以表爱国之盛心矣。然官学生之宗旨，不过造软骨派之奴隶，爱国学社之前途，虽不敢决其如何，而学生固多志趣不羁，向学甚笃，俨如昔日英民移居北美者。具此善因，或有胜果，可以慰我同胞者也。伏希同胞各仗愿力，襄此善举，实为厚幸。谨布腹心，惟祈垂鉴。其他规则，别详敝会及爱国学社章程，与敝会机关之《苏报》，同胞取而览之，必更详知其情状矣。

爱国学社既成立，中国教育会诸董事蔡元培、吴敬恒、章炳麟、黄炎培（任之）、蒋智由（观云）、蒋维乔（竹庄）等皆任教员，一反以前南洋公学所为。校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出版物有《学生世界》，持论尤为激烈。湘人陈彝范（梦坡）所设之《苏报》，向称革命言论之枢纽，率先自承为教育会之附属机关；其女公子撝芬，亦有爱国女学校及女学报之设，两者均于妇女界智识之进步，增助非鲜。教育会更派遣会员分赴江浙各省组织支部，兴办教育。已成立者有江苏常熟及吴江之同里等处，常熟支部为殷次伊、丁初我、徐觉我等发起，附设有塔后小学。同里支部为金天翮（松岑）发起，延柳弃疾（亚子）、林砺、陶虞熊等相助。由林砺教授兵操，成绩斐然。附设有明华女校，章程略仿爱国女校，湘乡张通典之女公子弘楚、驾美、振亚及阳湖孙济扶等皆来就学，声誉颇

著。此外刘季平（又称刘三）、刘东海（季平从兄）、秦毓鎰等，亦在上海华泾乡创设丽泽小学，校址即刘季平住宅。又苏州有吴中公学社，杭州有两浙公学社，规模悉仿爱国。是时东南学子，咸知振兴学务为救国保种之惟一途径，此倡彼和，盛极一时，学生之趋向激烈论者，所在多有。爱国学社之组织，本为南洋公学退学生所策动，颇以主人翁自居，对于中国教育会之指导，间存漠视，章炳麟等乃主张渐加以制裁之说，吴敬恒则左袒退学生，意见各殊，会与学社之争潮遂起。虽经黄宗仰多方调处，卒难复合。癸卯五月二十四日爱国学社忽以社员名义，登载《敬谢教育会之意见书》于《苏报》，表示与教育会脱离关系，至闰五月初一日黄宗仰亦以中国教育会会长名义揭《贺爱国学社之独立》一文于《苏报》以答之，由是教育会会员之任教职者遂多谢去。内潮方急，而满清政府已控告革命党于租界会审公廨，封闭《苏报》馆，逮捕诸重要分子，蔡元培走青岛，吴敬恒走伦敦，黄宗仰、陈彝范、陈颢芬走日本，章炳麟被逮入狱，爱国学社亦闻风解散。中国教育会在风雨飘摇之中，仍勉强挣扎，迁其机关部于爱国女学校，由武进蒋维乔、吴县王季烈、四明钟宪鬯诸人支持之，后此亦不能有所活动矣，上海革命运动，至此遂受一顿挫。

陈梦坡事略

《苏报》主人陈范，原名彝范，字梦坡；有数别号，曰：梦逋、忆云、叔柔、锡畴、瑶天；晚年自更名曰蛻，号蛻龢。原籍湖南衡山，嗣迁江苏阳湖（即今之武进），故又为阳湖人。少笃志向学，精通诗古文词，以累试不第，遂纳粟为令，谒选都中，复就试，得己亥乙科举人。旋出任江西铅山县知县，因教案落职，移居上海。愤官场之腐败，知非提倡新学不足以救国，渐与当世志士相往还。会庚子拳匪祸起，全国鼎沸，梦坡怒然忧之。而《苏报》适有招顶之议，是报向为日本人所创办，以营业不利，亟谋出脱。梦坡以友人怂恿，遂出资承办，而使其妹婿阳湖汪文溥佐之。初力主变法，颇为读者欢迎，嗣复中于康、梁学说，高唱保皇立宪之论，时人多以康党目之。壬寅、癸卯间（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桂抚王之春有向法国借兵借款平乱之议，而俄国更进兵东三省，强逼清廷签订新约，国内外志士纷纷开会，主张抗敌御侮，清廷均置弗恤，且有拘捕留学生代表之命令。梦坡至是始知异族政府之不可恃，因而改倡革命排满之说，延聘吴敬恒、章炳麟、章士钊、蒋维乔诸人分任撰述，措辞激昂，大为清吏所嫉视。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均假《苏报》为宣传机关，每周演说讲稿，恒在此

发表，崇论横议，震撼一世。其女公子撝芬，亦另创女学报，鼓吹女权，与父齐名。癸卯夏间，苏抚恩寿遂照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要求逮捕《苏报》陈范及爱国学社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邹容、黄宗仰诸人，租界当局徇之。梦坡先得讯，乃挈眷走日本，二女撝芬、信芳从之行。是案《苏报》馆职员被逮者，仅梦坡长子仲彝及司账员程吉甫而已。梦坡既抵横滨，始谒孙总理于山下町寓所，时总理方与黄宗仰（乌目山僧）、廖翼朋等同寓，余之获识梦坡亦在此时。是年冬，余与梁慕光、胡毅生、廖翼朋组织洪门三点会于横滨，梦坡遣其姬人纁芬莅会加盟。未几梦坡自赴香港访陈少白于《中国日报》，少白礼之颇优。梦坡性嗜酒，一夕夜起觅酒不得，竟举案上少白所贮药酒一巨瓶作鲸饮尽之，时人引为笑谈。次年以室家已毁，贫困几无以自给，乃复来上海，为警吏所陷，系狱年余，赖友人营救得脱。闻妹婿汪文溥时任醴陵县令，乃至湘依之。文溥亦《苏报》案中人物，丙午（一九〇六年）萍乡、醴陵之役，保全善类甚众，后卒以是失职去，留长沙观变。梦坡则往来长沙、醴陵间，与刘泽湘、史良、傅尊辈游。时宁调元以萍、醴党案被逮，判禁长沙狱三载，梦坡与调元为诗文知己，乃时时携酒就狱中赋诗痛饮。偶识新军协统刘玉堂，遂语汪文溥，谓此勇士缓急可用，使其图湘中发难事，会文溥以事被逮，乃与史良辗转营救。辛亥武昌革命军起，梦坡欲使文溥说湘都督焦达峰，遣玉堂率兵援鄂，议未定而达峰为贼所杀，玉堂卒以所部驰赴，一日夜战死，汉阳遂陷。梦坡闻耗，为诗文哭之恸，旋与文溥共参湘桂援鄂联军事，以司令沈秉堃无远志，并去之上海。既而南北统一，任《太平洋报》笔政，继至燕京，主《民主报》事，未几以病南归，以民国二年正月十六日卒于沪，年五十有四。遗稿有《映雪轩初稿》、《烟波吟舫诗存》、《东归行卷》、《九嶷云笈》、《卷帘集》、《题襟集》、《庚申集》、《残宵梵诵》、《夜梵集》、《息庵诗》、《沧波听雨集》、《梦楼续雨集》、《寄舫偶存》、《闲情香草诗》、《为谁存稿》、《蛻僧余稿》、《瓣心词残稿》诸作，存佚参半。其长女撝芬适蜀人杨儒，同留学美国，次女信芳毕业横滨基督教女学。梦坡逝后二十四年，国民政府追怀先烈，特予明令褒扬，用彰潜德。

横滨华侨学校

戊戌（一八九八年）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徐勤等先后逃亡日本，有大同学校及《清议报》为其宣传机关，实为旅日保皇党徒之全盛时代。是时横滨兴中会员多受康、梁煽惑，存者无几，只有尤列所创中和堂尚能别树一帜，此

外三江帮及基督教徒因其子弟为大同学校所排斥咸怀不满。盖大同学校原属全体侨商集款建设。教员徐勤、陈荫农等囿于地方主义及孔教思想，遂有排斥他省及基督教之行动。于是江浙派之郭外峰，基督徒之赵峰琴、赵明乐、关国义，中和堂之翟美徒、杨少佳、廖翼朋，中立派之鲍伟昭、卢荣彬诸人，乃募款另创华侨学校，与大同学校互相对立。总董为华俄道胜银行买办郭外峰，而赵峰琴、廖翼朋副之，前后所延教员有廖卓庵、杨计伯、胡毅生、桂少伟、梁博君、陆霭云诸人，均与兴中会略有关系。迄民国告成，此校遂成为国民党之教育机关。民三、四、五年间任教员者，有黄伯群、李熙斌、陈树人、陈萝生、陈自觉等，华侨子弟受培植者大不乏人。及民十二，日本发生地震巨灾，华侨生命财产损失过半，是校与大同学校同遭焚毁。事后侨商乃收集余烬，合力重组国民小学，已无复有党见存矣。

野鸡大王徐敬吾

在清光绪末年，凡住上海稍久者，莫不知有野鸡大王其人。大王徐姓，号敬吾，广东香山县人，上海《苏报》案前后最摇旗呐喊之革命宣传家也。尝手撰《野鸡花榜》揭载小报，时人遂以野鸡大王称之。大王专以出售革命书报为业，是时各种革命书报虽受社会欢迎，但各书局制于官力，咸有戒心，不敢直接出售，有志购读者，多无从问津。大王恒挈其女公子宝妣出入于福州路青莲阁等茶馆，叫卖各著名犯禁之书报，如《革命军》、《黄帝魂》、《驳康有为政见书》、《孙逸仙》、《沈荃》、《自由血》、《女界钟》、《俄罗斯大风潮》、《猛回头》、《警世钟》、《扬州十日记》、《孔孟心肝》、《〈苏报〉案纪事》、《三十三年落花梦》、《廿世纪大舞台》等书，不下百数十种，行人趋之若鹜，至为畅销。又每于星期日假味莼园演说革命，听者如堵，海上耳目，为之震骇。其女公子亦议论风生，批评时政，淋漓痛快，大王之得力助手也。章太炎尝戏以《水浒传》人物作《上海志士梁山泊点将录》，号敬吾为鼓上蚤时迁。南洋公学退学生之组织爱国公学，敬吾父女均为之奔走甚力，人多称之。《苏报》案发生后，敬吾依旧到处演说，志不少懈，事为清吏密探所闻，乃设法诱致南京，欲借以罗织党狱。有某吏谓其人名不雅驯，必非真正革党，遂责其立功自赎。纵之回沪，诸志士闻之，颇怀戒心。然敬吾自是韬光养晦，不复如前此之狂热，亦不屑为清吏所用，后竟不知所终。

秦毓璠事略

秦毓璠，字效鲁，江苏无锡县人，系出高邮宋龙图阁直学士秦观之后。少勤敏好学，喜浏览新学书报。年二十，至上海考取南洋公学，时在戊戌（一八九八年）六月。以在校倡议举行孔子诞生纪念，见恶于美人福开森，遂自请退学。辛丑（一九〇一年）肄业于江南水师学堂，与同学翁友巩、何海樵、赵声、郑仲劲等最为相得。赵声后改入陆军学堂，即辛亥三月二十九黄花岗之役以忧愤病死香港者是也。是岁同邑吴敬恒归自日本，劝使东渡留学，从之。抵东数月，即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国人同学者，有余及董鸿祎、金邦平、周宏业、张肇桐、嵇镜、苏子谷、萨端、刘崇杰诸人。壬寅（一九〇二年）驻日清公使蔡钧以防范革命排满为辞，禁止各省私费学生肄业陆军。适有顾乃珍九人欲入成城学校，蔡不允咨送，吴敬恒与之力争，蔡乃嗾使日本警吏拘解吴敬恒回国，各省学生咸动公愤。毓璠由是渐知异族政府之不足与有为，遂约同学王家驹、张继、金邦平、汪荣宝、董鸿祎、叶澜、张肇桐、潘赞化、周宏业、苏子谷、熊慕遽、吴绛章、蒋方震、谢晓石、董缉堂、萨端、钮翔青及余等发起一民族主义之结社，采“少年意大利”之遗意，定名“青年会”。其会章第一则，规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是为留学界组织革命团体之嚆矢。是时各省学生多创办同乡会杂志，鄂人刘成禺、李书城等发刊《湖北学生界》，湘人梁焕彝、杨守仁（笃生）等发刊《湖南游学译编》，浙人蒋智由、蒋方震、申江东等发刊《浙江潮》，江苏同乡会亦举毓璠为江苏杂志总编辑。倡导民族主义，不遗余力，销行颇广。次年癸卯俄兵进占奉天，举国大愤，毓璠乃与钮永建（惕生）、叶澜（清漪）、蒯寿枢（若木）等发起留学生拒俄义勇队，号称拒俄，实则借此名义以扩大革命团体。初开会于东京神田锦辉馆，留学界莅会者逾千人，全体通过义勇队章程。举蓝天蔚为队长，并公推钮永建、汤樵（尔和）二人为特派员，回国说袁世凯出兵抗敌；事为清廷所闻，遽命驻日公使蔡钧转求日政府解散义勇队，且密令逮捕钮、汤二代表。当义勇队宣布解散时，主席叶澜首言此后义勇队应改宗旨实行革命，闻者震骇，多缴徽章散去。于是毓璠乃约队员中志向坚定者另组军国民教育会，手撰发起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洋洋数千言。内分实行革命之法，为鼓吹暗杀起义三部，组织愈益严密。会员有程家桢、叶澜、王家驹、张继、周宏业、陈定保、贝镛礼、翁浩、郑宪成、胡景伊、董鸿祎、翁友巩、桂少伟、陶成章、卢少岐、萨韵坡、陈天华、黄軫（克强）、刘揆一诸人，会员徽章镍质圆

形，大如墨西哥银币，正面镌黄帝轩辕氏像，背面镌铭四句曰：“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亦出毓璠手笔。该会成立后，推举同志返国分省起义，名曰实行员。黄軫、陈天华、刘揆一被派为湘省实行员，毓璠及张继等旋亦回国分途活动。是年七月在上海创设国学社，编译革命书籍，兼为同志运动机关。甲辰（一九〇四年）正月与刘季平、费公直等发起丽泽学社于上海华泾乡，以养成革命基本人才为宗旨，尤注重精神教育及本国武术。五月应黄克强、胡元倓、翁友巩等电招，赴湘省讲学，任高等实业学堂教务监督，并兼任明德、经正二学校历史教习。时黄克强主讲明德学校，教员张继、翁友巩、周震鳞等皆老同志也。其后湖南革命人物多出自上述各校，毓璠与有力焉。湘中学风经诸志士循循善诱，民族思潮一日千里。黄克强、刘揆一、陈天华、杨守仁诸人以时机渐熟，遂集合诸同志创立华兴会，众举黄克强为会长，毓璠副之。会所设于省垣连升街，假名曰林公馆，又曰旅湘俱乐部，先后加入华兴会者四五百人，以学界分子为多。其革命方法，从联络哥老会入手。以刘揆一曾获交于哥老会大龙头马福益，即畀以联络会党之责。另设一同仇会以支配之，使哥老会党徒与华兴会总部不相直接，由刘介于其间，盖防泄漏机密，致碍大计也。哥老会员相继入会者不下十万人。至是年夏秋间，遂决定大举，预定十月初十日在长沙、岳州、衡州、宝庆、常德分五路起兵，是日适为清西太后七十寿辰，拟预埋炸药于长沙万寿宫下，俟全省文武百官朝贺时一网打尽之，乘机占领长沙。不意华兴会员有武备学生朱某，误泄其事于巨绅王先谦；王向湘抚陆元鼎告密，于是缇骑四出，机密渐泄，会员被逮者大不乏人。是为九月十八日，毓璠与黄克强适赴胡元倓之宴，未终席闻耗散去。黄克强本寓湘垣紫东园，因是避居基督教圣公会，由牧师黄吉廷同志曹亚伯、张继等陪同出险，毓璠亦秘密离湘。当时各同志通讯隐去真姓名，而另以店号代之。毓璠之店号为乾大，非心腹同志不知也。乙巳（一九〇五年）任安徽高等学堂西史教习，因表彰欧美诸国革命历史，致学生时起风潮，不容于皖省大吏，遂去职。旋赴广西任浔州府中学堂监督，复以邀结学生组织革命团体，见嫉于当道，不安于位。丙午（一九〇六年）应广西边防督办庄蕴宽之邀，任龙山边防法政学堂监督兼历史教职。时钮永建亦任龙州将弁学堂监督，数延毓璠为陆军步兵教导团演讲历史，毓璠特为编《中国历代兴亡史略》二卷，尤注重民族主义，听者莫不感动。是年春，黄克强易名张守正，从香港至桂林，力说巡防营统领郭人漳率所部反正。适郭与陆军小学监督蔡锷（松坡）不和，克强调处无效，知郭有所戒惧，必无所成，乃之龙州，访钮永建及毓璠商榷运动边防兵士反正事。以庄蕴宽缺乏实力，克强旋赴越南，濒行以制造枪械机件事委托毓璠、永建，此丙午（一九〇六年）二三月间事也。未几庄蕴宽以丁忧去职，毓璠、永建先后离桂。丁未（一九〇七年）应杨守仁之招，任上海《神州日报》编辑，嗣以肺病咯血，返籍养痾，由是息影林泉者数载。迄辛亥秋

间，闻杨守仁以忧愤自沈于英伦，乃为文吊之，辞甚哀恻。是岁八月武昌起义，遂再去沪锡间，密谋响应。九月十三、四、五、六等日，与陈其美、陈汉钦、钮永建等相约举兵，先后占领上海、松江、无锡各地。先是上海既光复，毓璠即由沪返锡，在小娄巷私宅，密招同志钱鼎奎、吴千里、孙保圻、吴廷枚、许嘉澍、钱基博等数十人，漏夜计议在锡起事，阴招敢死队四百人，分布四境，复结集商团同志为光复团，联合民团同志为守望队。策划已定，待时而动。时无锡知县孙友蓴，金匮知县何绍闻，均效忠虏廷，戒备严密。毓璠先诱说各防营队官刘秀宽等，晓以大义，遂于九月十六日誓师公园，命日本士官毕业生华承德督率光复团敢死队，进攻无锡、金匮两县署。清兵均弃械出降，于是兵不血刃，而两县光复焉。众举毓璠为锡金军政分府司令，分设军政、民政、财政、司法四部，召集地方人士公开会商。其安民布告略谓：“满族窃据中国，逞威肆虐，已二百八十余年。乃者武昌起义，薄海响应，将欲登斯民于衽席，振大汉之天声。无锡为泰伯端委之区，文物声名，夙著南国；允宜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用举义师，匡复兹邑。用仍汉字之旧，而扬民族之光。”云云。秩序整然，地方安堵，民咸德之。无锡既下，复派员力劝江阴炮台反正，并筹饷二万元济之，该炮台卒允投诚。镇江都督林述庆会师金陵，以饷绌求助，亦由无锡接济。未几南京政府成立，孙大总统委毓璠为总统府秘书，仍兼锡金军政分府司令，编练锡军，令第二营营长顾乃珍率所部开赴南京，加入北伐军。及四月初南北统一，政府北迁，仍奉委为无锡县民政长。民二，应余邀北上，任临时稽勋局审议员，专任江苏革命勋绩审议之责。是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北车站，袁世凯帝制自为之形态日益显露，毓璠遂于六月回南，谒孙总理、黄克强商议讨袁事。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倡义江西，孙总理命南京军界同志举兵应之。毓璠随黄克强赴宁，召集同志开会于李相府。七月十五日由陈之骥、章梓、洪承点、王允恭各师长要求都督程德全通电独立。程不敢不从。黄克强以无锡地当冲要，命毓璠回锡策应，县知事严伟凤知毓璠系全邑人望，闻风遁去。克强遂以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名义委毓璠为江苏讨袁军临时筹饷处处长。毓璠因邑人力挽，乃以无锡为筹饷之根据，兼摄县政。无何，义师败挫，沪宁铁路交通全断，毓璠尚欲借无锡一隅支持危局。诿程德全且密令第四营管带汤麓柯设法逮捕，毓璠遂于七月二十四日被逮，至九月九日被判处二等有期徒刑九年，移入苏州陆军监狱。张勋任江苏都督，复籍没其家，以是全家荡析离居。二母忧思成疾，其继母过孺人病中闻耗，卒致不起。毓璠在狱闻之，痛不欲生。尝得句云：“柝声敲断还家梦，灯影独窥怜母心。”又云：“反省寸中无愧怍，幽居斗室亦逍遥。”又成书二卷，名《读庄穷年录》。至民五八月始脱稿。是年袁世凯死，帝制取消，孙总理、黄克强、吴敬恒、张继及余等电请总统黎元洪依法释放，于十月十二日出狱。即旧历九月十六日，与辛亥光复无锡之日相同，亦云巧矣。附录民二程德全上袁世凯核复毓璠判罪电文如左：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案查从受伪命为无锡县知事之秦毓璠，前经德全等密飭军队拿获解苏，交军政司看管，听候查办。当有无锡县议会议长浦斯涌，市总董俞复，县教育会侯鸿鉴，商会华文川，联名具结请保未准。并有商民具呈控告，现经派员赴锡确实查复，特开军事裁判。据秦毓璠供认，与黄兴、钮永建均系同学素识，此次南京肇变，严知事辞职，伊为维持治安会会长，旋赴南京收受知事委状，并提取银行钱庄所存忙漕各款，接济乱党，动用不讳。并称黄兴托为筹饷等语。核与商民所控，及委员所查，情形相符。由审判员判决，以秦毓璠附和乱党，供证确实，应照暂行新刑律内乱罪第一百〇一条第三款定拟处二等有期徒刑监禁九年，呈送判决书前来。德全等复查，内乱首魁，及执重要事务者，得照第一百〇一条第一第二两项处断。秦毓璠附和乱党，从受伪命，核与本条第三项附和随行者，情罪吻合。现照第三项最长刑期，处以监禁九年，判断尚属允当，除指令执行外，谨此电陈。程德全、应德闳叩阳。

民十三，国民党改组，江苏省党部成立，中央选任毓璠为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因是往来沪锡间，密策各县秘密工作。九月二日，齐燮元、卢永祥交哄，以是时江苏在军阀淫威之下，不能公开活动，乃与叶楚傖、钮永建、柳亚子、陈去病等发起江苏民治建设会及江苏自卫团，为国民党统治江苏之准备。民十四孙总理逝世后，国民党事权为共产党把持，同盟会老友多怒然忧之，因有联合反共之议。民十六二月毓璠应张继之邀，赴沪筹商清党事。旋以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乃仆仆沪锡，密谋响应。是年三月二十一日北伐军抵锡，毓璠领党部及民众团体应之。由军民共推任为无锡县县长，旋以共党捣乱，应付困难，在职半载，遂以操劳得疾辞职。民十七三月又由江苏省政府委充无锡县长。此为其长无锡县政之第四次。是时四乡共匪滋扰愈甚，民不聊生，乃筹款购械，编练公安队及各乡自卫团，严密搜获，因而匪势顿戢，邑人颂声载道，然匪党以是衔之刺骨，初纵火焚其庐舍，八月九日有匪徒陈采兰伺毓璠自署返家，预伏道左，掷一炸弹，未中，而匪徒反自伤毙命。十二月复以病辞职，呈再三上，始获批准。民十九，中央党部征为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委员，对于搜集昔年革命史实，补阙正谬，献替实多。民二十，四月五日以病卒于无锡府第，春秋五十有九。

大阪博览会侮辱中国事件

癸卯（一九〇三年）三月，日本开博览会于大阪，遍邀我国各省官商赴会，中国留学生秦毓蓁、侯保三（鸿鉴）、秦平甫等亦自东京往游，见福建省出品附设于台湾馆中，而台湾馆则为博览会中特设之馆，建筑仿台北府署，馆中陈设如小足妇人吸鸦片烟等种种陋俗，均侮辱吾国国体特甚。秦等以中国各省出品，如湖北则设湖北馆，独福建出品竟置诸台湾馆，实为有意侮辱，遂向会中执事质问理由。彼谓因福建出品无地可容，故置于此。秦等乃访湖北省出品委员侯补道桑宝，请其向日人交涉。桑谓中国国势弱，不可因些些小事开罪邻邦，种种推诿，不肯负责。秦等以此等巧官不足与谋，一面致电东京留学生会馆，属推代表前来抗争；一面见博览会高级办事人，声言我等学生年少气盛，不顾利害，此福建出品应即移至湖北馆中，如实不能容，宁可撤回，君等设不纳吾言，吾等当敲碎玻璃橱，自动移出，贵国开此盛大博览会，万国观瞻，若因此事致与吾辈留学生冲突，貽笑列邦，窃为贵国不取等语。日理事初尚推诿，谓须请示总裁；后见秦等主张坚决，始允将福建出品一一检出，移置湖北馆中。桑宝初作壁上观，及见日人为留学生所折服，大出意外。秦等语之曰：“君等官僚，利禄心重，成败之见亘于胸中，故与外人交涉，着着失败；吾辈留学生一片赤忱，一般勇气，故能不为所屈。”云云。桑宝羞愧而退，此留学生与日本交涉第一次胜利事也。同时该博览会中特设人类学馆，内置一二中国人，表演我国腐败旧俗，以代表我国民全体，而与各地野蛮人种并列，亦为留学生所见，群起提出抗议。驻神户领事蔡勋因此亲赴大阪向当地官吏交涉，要求取消此种侮辱国体之陈列，日人初亦互相推诿，久未解决，留学生会馆乃公函致贝子载振及预备派往观会各官商，谓日人以无理辱我，止其勿来。日本政府闻之，惧因此伤害两国感情，卒令大阪府撤去之。是年夏间余自粤返日，亦作大阪之游，已不复见该博览会有此种陈列。

日教员窃皮蛋之笑话

中国派学生至日本留学，自己亥（一八九九年）始。是年上海南洋公学派

留东学生章宗祥、雷奋、杨廷栋、杨荫杭、胡初泰、富士英等六人，鄂督张之洞派三十余人，其他各省亦有之。既至东京，以言语不通，普通科学不完，无从入学，日本文部省乃特创设日华学校，专为中国学生教读语言及补习科学。惟设备简陋，所延教习皆下驷，卑鄙不堪，常就留学生乞食品果腹。有某生自中国带去皮蛋数十枚，日人不识为何物，再三探询，告之可食，犹不信，及见中国人用以佐餐，乞少许尝之，大赞不止。一日骤去其半，后乃知为教员兼舍监某所窃。又该校宿舍所佣日本下女常偷留学生牙粉涂面，浓淡不匀，有同丑鬼，为诸生所见，笑话百出。其时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三人税居牛込区早稻田附近土首三番町，即当日雷等为《译学汇编》及《国民报》撰文之所，留学生恒假其地作聚会集中点，尤以日华学生为多。时有人戏为小说回目曰：“偷皮蛋舍监尝异味；搽牙粉丑婢卖风流。”亦趣闻也。

癸卯孙总理在日本状况

癸卯（一九〇三年）夏间，孙总理自安南河内至日本横滨，时横滨兴中会员日渐零落，与总理仍旧往还者，仅有黎炳垣、张果、陈才、温遇贵、廖翼朋等十数人。惟东京留学界方面，自拒俄义勇队及军国民教育会相继成立后，革命思潮，一日千里，各省学生之有志者纷纷创办杂志，多以发扬民族主义为号召。如《湖北学生界》、《游学译篇》、《江苏》、《浙江潮》、《新湖南》等月刊，先后出版，咸受国人欢迎。余方肄业早稻田大学兼任香港《中国日报》驻东记者，总理自辛丑（一九〇一年）后与留学界之关系不断，即由余为之连锁。总理既莅横滨，旋在山下町本牧桥附近租一洋房，楼上总理自居，楼下则由廖翼朋、黄宗仰二人分居之。廖翼朋为广州博济医院学生，甲午前曾与总理同砚，时方在横滨经商，总理特介绍香港文裕堂书店，使代贩运文具，以助其营业。宗仰又号中央，即《苏报》案通缉有名之乌目山僧，尝任上海中国教育会董事。《苏报》案发生后，逃亡至日，善画花卉，尤以能写大幅梅花著称。其卧室四壁遍悬所绘梅树，枝干挺秀，横斜纷披，真大观也。各省留学志士先后访谒总理者，有程家桢、刘成禺、叶澜、董鸿祯、翁浩、郑宪成、杨度、时功玖、李书城、程明超、吴炳枏、马君武、杨守仁、姚芳荣、李自重、胡毅生、桂少伟、伍嘉杰、黎勇锡、区金钧、卢牟泰、郭健霄、刘维焘、饶景华、李锡青、卢少岐、朱少穆、廖仲恺、张崧云等数十人。《苏报》案主人陈范及女公子撝芬亦居横滨，日访总理畅论时事；一时京滨道上往还频繁，总理所居，座客常不空也。先是清政府鉴于

留学生多浸染革命思想，尝命驻日公使蔡钧设法禁止自费学生学习陆军，故自费之有志兵事者咸无从问津，总理以诸同志有愿未遂，乃商诸日友日野熊藏少佐请其相助。日野为有名之军事学家，于最新式之南非洲波亚人散兵战术，最有心得，曾发明日本式之盒子炮及木炮，极为军界所推重。总理时亦研究波亚战术，谓此法最适用于揭竿起事之中国革命军，特购致英文关于英波战史及图册百数十卷，日夕观摩，孜孜不倦；曾检赠余二部，余至今尚保存之也。日野因与总理同研究战术，闻总理言，愿悉力以助，遂秘密组织革命军事学校于青山。日野自任校长，延其友小室健次郎大尉为助教，规定学期八个月，学科有普通兵事学及制造盒子炮木炮各种火药等门，尤注重波亚散兵战术及以寡敌众之夜袭法。第一期报名入校者，有黎勇锡（仲实）、李自重、胡毅生、桂廷銮（少伟）、刘维焘、饶景华、区金钧、卢少岐、卢牟泰（可峰）、郭健霄、伍嘉杰（少魏）、李锡青、翁浩、郑宪成等十四人。入学时诸生一律宣誓服从革命党首领及本校规则。诸生皆自费，独胡桂二生由众供给之。是年冬，总理有檀香山之行，以资斧不足，向黄宗仰商借二百元，始克就道。濒行以党务委之于余，而家务则托诸老友法国邮船公司横滨支店买办黎炳垣。革命军事学校于总理离日后，不及半载，即因内部发生意见宣告解散。总理时在檀岛，方改组《檀山新报》，向保皇党之《新中国报》大开笔战，且函嘱余速延聘主笔赴檀主持，嗣闻军事学校无端闭歇，为之惋惜不置。

张能之与黎焕墀

孙总理居横滨时，有契友二人：一曰张果，一曰黎炳垣。张字能之，香山县人，任日本邮船会社买办，有养女名阿娥，聪慧绝伦，尝拜总理为谊父，年十三即夭亡，总理甚惜之。黎字焕墀，南海人，任法国邮船公司买办，老兴中会员，总理每次漫游欧美南洋，凡照料眷属及收寄书信等事皆委托之。旅日兴中会员与总理友谊深厚始终未尝间断者，黎一人而已。余于庚戌（一九一〇年）夏间，自香港渡美，舟过横滨，登陆访之，则已逝世数月。为之怆然。近闻其子以家计困乏，在横滨某茶馆充当侍役，良可慨也。

上海《国民日日报》与《警钟报》

自癸卯闰五月《苏报》案发生后，海上著名革命党人除章炳麟、邹容已入狱外，余多亡命他国，然革命思潮益风起云涌，长江沿岸各省之志士及已解散之爱国公学学生仍多散放宣传小册及日本出版之各种书报，为《苏报》之代。是年十月，遂有《国民日日报》继续出版。是报初由章士钊、张继、何靡施、卢和生、陈去病等筹办数月，因虑易招清政府仇视，乃以广东东莞人卢和生为发行人。盖卢系英国海军工程毕业之老留学生，自幼生长香港，曾任《上海西报》记者有年，《国民日日报》可用其名在英领署注册，以避免清吏鱼肉也。担任是报文字者，除章、何、张、陈外，尚有苏曼殊、陈由己、金天翻、柳弃疾诸人。主张与《苏报》同，而篇幅及取材则较《苏报》为新颖。发刊未久，风行一时，时人咸称为《苏报》第二。未几报中经理编辑两部，忽因权限问题，大起争执，卒致各向外国公堂提出诉讼，经在沪同志冯镜如、叶澜、连梦青、王慕陶诸人奔走调处，仍难收效。香港《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闻之，以同党内哄，有碍大局，特亲至上海设法和解，并设宴邀集沪上诸同志联络感情，卒由双方各允息事而止。然《国民日日报》经涉讼风潮，竟致停刊。和解后虽欲重整旗鼓，亦已大伤元气，更无复版之望矣。甲辰（一九〇四年）冬，俄兵进驻奉天，中外震动，时蔡元培已由青岛返沪，因与诸同志发起《俄事警闻》，专录载俄人侵满消息，以唤起国人注意。旋扩大篇幅，改名《警钟日报》，渐借外交失地事件，攻击满清政府，实继承《苏报》与《国民日日报》之系统。主笔政者有刘光汉、陈去病、林獬、林宗素诸人，销路亦殊不恶。至乙巳（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日以批评外交失败，为清吏所忌，卒被封禁。此外陈去病（佩忍）所办之《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林獬（白水）所办之《中国白话报》，亦先后为当道干涉停刊。上海革命党人之喉舌，自是缄默者数载。

美洲致公堂与《大同报》

洪门团体之历史 致公堂为旅美华侨洪门团体之总称，洪门即天地会，哥

老、三合等会皆其支派。哥老会蔓延于长江沿岸各省，三合会又称三点会，闽粤两省最为盛行，在南洋、美洲各地通称义兴公司。考其历史，则在清初康熙年间已有此种秘密社会之组织。其时距明亡未远，明之忠臣义士如张煌言、瞿式耜、陈邦彦、郑成功辈先后起兵抗满，迭受败挫，三数遗老知清祚已固，匡复大业非一时所能成就，乃创设一种秘密团体，为传播种族思想之导线，欲使后人历久不忘亡国之惨痛，因而徐图光复，是即洪门团体之所由起也。洪门惟一之宗旨曰“反清复明”。其会员将满洲之满字写作“洒”，清朝之清字写作“汨”，即明示不承认满清有头之义。据洪门秘册所载，洪门真主为朱洪竺，军师为陈近南，大将为万云龙诸人。最初发起于福建，以少林寺为主动机关。其初少林寺以武技名于世，清帝康熙嫉之，命寺僧远征西域，及战胜回朝，乃借端戕害功臣郑君达，复派兵焚少林寺，僧众逃生者无几。其遗臣陈近南遂组织天地会，潜植势力以谋复仇。遣其所部五大将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等设立支会，是为前五祖云云。所举事实，似摭拾说部，附会而成。盖欲借民间流传之通俗故事，以博取中等以下社会之信仰也。是会自康、雍而后，二百年来潜滋暗长，长江沿岸及西南各省星罗棋布，异常发达；惟以流品日杂，对于种族观念之表现，渐失本来面目。独于会章所载“手足相顾患难相扶”之要旨，尚能遵守勿替，久而益彰。此其所以能固结团体，日久弗坠，终为满清政府之大敌也。

致公堂之政治思想 清季咸丰、同治间（一八五一至一八七四），广东三合会人物以不堪清吏压逼，适逢海禁大开，美国招募华工之便，遂多乘帆船至旧金山，另创基业。初在旧金山设立洪门机关，命名致公堂，又曰义兴公司，复在全国各埠组织分堂，借资联络。凡有侨胞所到之地，莫不有之，华侨列籍堂内者占十之八九。及太平天国失败，洪秀全、陈金刚（在粤太平军首领）诸部将亦多亡命美洲，参加致公堂团体，为之提挈指导，因之旗帜鲜明，势力日盛。华侨非厕名会员而能施用秘密暗号者，殆难立足。然久而久之，故老凋谢，后人多不了解本会宗旨，“反清复明”之口号，仅于入会宣誓时之仪式见之而已。乙未（一八九五年）孙总理在广州举义失败，丙申（一八九六年）春，自檀香山渡美时尚未加盟于洪门团体，故檀岛及美国各埠致公堂视同路人。总理以洪门与兴中会宗旨略同，在粤时因与郑士良等交游，于该会内容，亦知大概。莅美后，乃奔走各埠，向致公堂职员极力劝导，使与内地革命党联合进行，共举大事。惟彼等对于民族主义早不了解，虽经总理苦心孤诣，舌敝唇焦，均难收效。仅在旧金山结识何柏如、唐琼昌及基督教徒陈翰芬等数人，毫无所得。迨戊戌（一八九八年）政变后，康有为于己亥（一八九九年）岁游美，初在英属加拿大域多利温高华两埠发起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华侨闻彼曾受清帝密令起兵勤王之衣带诏，多人入彀中。域埠致公堂职员林立晃、吴俊等且任保皇会董事。未几旧金山、纽约、芝加哥、沙加缅度、檀香山各地保皇会相继成立，会中职员多属致公堂分子。康徒

梁启田、欧榘甲、陈继俨、梁启超、徐勤、梁朝杰诸人先后至美，知洪门缺乏文士，大可利用，有数人特投身致公堂党籍，阴谋夺取其事权，洪门中人不知其诈，颇为所愚。徐勤、梁启田始创《文兴报》于旧金山，大倡保皇扶满之说，延何柏如、唐琼昌同任译员。旋康徒复假商业救国美名，创设香港振华实业公司，墨西哥华益银行、纽约琼彩楼餐馆、上海广智书局、广西天平山金矿公司等，向各地华侨募集股金不下华币千数百万元，其中属于致公堂会员者实非少数。

《大同报》之发起 康徒欧榘甲字云樵，惠州归善人，历任《时务》、《知新》、《清议》三报主笔，文学优长，议论豪放，极受时人所称赏。己亥在横滨结识孙总理，与同门梁启超、韩文举（树园）、张智若、罗伯雅等共心醉民族主义，遂在《清议报》高唱汤武革命应天顺人之说，康有为读之大怒，特移书严厉督责。壬寅（一九〇二年）欧赴美任《文兴报》记者，以少在惠阳结交三合会中人，获知洪门秘密，遂运动致公堂职员唐琼昌、朱三进、邓幹隆等另创《大同日报》于旧金山，为洪门党报之元祖。资本多出自富商朱三进，欧任总编辑，唐任总司理，邓任司事。欧别号太平洋客，初著《〈大同日报〉缘起》，发挥洪门改革之理由，极为动听，复撰一长文，痛言广东独立及脱离满清之必要，分载数十日，凡五六万言，大为读者欢迎。后由《清议报》汇辑作单行本出售，即当日脍炙人口之《新广东》是也。复为康有为所闻，更严辞谴责，有“云樵离经叛道应逐出门墙”之语。欧自是论调一变，不敢再作急激语矣。又欧所作《〈大同日报〉缘起》中，有警句曰：“国事既定，宪法既定，则我义兴者，将与某大政党为两大政党，并立于二万方里之禹域。”又曰：“于各会党中，而联其势力至大，人才至众，章程最善，财力最厚之大会党，与之并辔联镳。”又曰：“立大同之基何？”曰：“在迫朝廷改专制政体而为立宪政体。”所谓某大政党，即指保皇会而言，而其进行方法亦不外师承保皇会请愿清廷实行立宪之故智。在明眼人观之，已知其别有用意矣。该《缘起》全文万余言，择录如下：

《大同日报》缘起

《大同报》何为而作也？曰：中国数千年无会党，以是数千年无政党，群杰万雄，起于盗贼，起于游牧，拥千万无业之众，铲名城，屠豪杰，乘时之疲弊，民之憔悴，无力抗拒，彼能多杀人窃神器者，则自称为应天顺人之王者，攘太祖高皇帝之尊号，以天下为其私产矣。所谓乘龙之彦，附凤之英，大都迫于饥寒，窘于乡里，铤而走险，以谋衣食。一旦得志，大者王，小者侯，群以开国元勋相贺，分茅胙土，带砺山河，爵禄世袭罔替，彼亦视天下为其王之私产矣。然而此开创之主，或得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或盗据九鼎于降将叛竖之手，物由盗来者，不能不虞盗去也。天下既定，盘据私

产之心愈固，欲为子孙万世帝皇之安愈深，思前虑后，中夜自惊，于是大封功臣，立之盟誓，以弭远方离贰之心，而惧天下久安，后嗣暗弱，法律废弛，草泽之士，难免有法吾之故智，起于盗贼，起于游牧，拥千百无业之众，铲名城，屠豪杰，多杀人，窃神器，取天下于吾子孙之手，而称太祖高皇帝者，则不得不务为强干弱枝之谋，布其所谓从龙之彦，附凤之英之子孙，柴立于各省都会，日夜伺察降奴之举动，使无敢异心而后即安。又惧有陈涉、吴广其人者，联盟结会于潜滋暗长之中，仰指天，俯画地，招聚壮士，议论朝政，腹诽心谤，幸天下有变，而以创大业，其所攘窃以传子孙之私产将不稳，于是思为断绝人民报复之路。得国之初，首严立会结社之刑，俾人民各不相通，各不相结。声气各不相通，体志各不相结，人民虽极受暴虐，而欲诉诸干戈，决乎有所不能。盖防之綦严，散之綦至，霸天下者之术，固日精如是哉！然而天下之事固有出于霸天下者所料之外，防之愈严，散之愈至，而会党之萌芽遂发起于其间，日增月盛，乃至党众达于千余万人之多，党所布于二十行省之广。党朔经乎二百数十年之久，膨胀于南洋，蔓延于美、澳、非、墨而未有已也。此会党何欤？岂非当世所称为义兴公司者欤！

义兴公司起于明亡之岁，而秦亡、汉亡、蜀亡、晋亡、唐亡、宋亡，未有会党起焉，何也？以前此主中夏者皆中国汉种，即或有如五胡之乱华，金、元之盗夏，亦不过数十年而已，未能久奸天位，践踏黄龙之裔于裘毡之下也。明太祖传檄四方，曰去毡酪之陋俗，复汉官之威仪。又曰，胡虏无百年之运，民族思想略见于斯，然及其末造，昏主失德，张李横行，外患遂巨，满洲部落乃乘间而取中国，屠江淮，翦闽粤，汉人全部受诛锄而屈服，无复可延残喘之地，而为九世复仇之策之豪杰，乃诡辞诡实，托于子虚乌有之事，以激其忠愤，以广其流传，以冀后世有大英雄起而推广其意，变通其法，以合至大至多至久之会党，一变而为极有思想极有组织极有基砥之政党，此非为私一党计也，实欲为复兴中国计。《大同报》者，实本斯意以布告我同胞汉种者也。

泰东西名哲之言曰：凡欲兴国强王者，必有会党，必赖会党，无会则无团体，无党则无主义。室之无墙也，不可处也；器之无轮也，不可转也；人之无群也，不可立也。故其国之无会党者，其民必散漫，必懦弱，国虽大必蹶，一蹶则不可复振，是故爱国之士莫不以创会立党亟亟焉。夫会也者，所以团众体也，团众人之财以为财则财大，团众人之力以为力则力厚，团众人之心以为心则心广，团众人之才以为才则才多。党也者，所以树主义也，树激烈之义则必思破坏，树和平之义则必思建设，树竞争之义则必思改进，树国粹之义则必思保存，国势有异，政俗有异，故会有万殊，党有万态，然而

不论其会之如何团体，其党之如何主义，而皆与其国家兴亡盛衰之故有大关系焉，非虚垂一会党之名号，而绝无表见于天下者也，以视我义兴则如何？

我义兴何所表见于天下乎！不独他人言之惭愧，即自己言之，亦觉汗颜无地也。夫焉有党人数千百万之众，会所二十余省之广，立党二百数十年之久，其会党如是之大之众之长年，为地球万国所无，而竟无一可表见于天下者乎？岂不负此会党之美名，而辱先祖经营之苦心乎！此其故，在于年久而忘宗旨，尤在于散处而不知联络，一言以蔽之曰：有会党之基础，无会党之喉舌；既无喉舌，不独外人不齿之，即会内人亦无复齿之，于是遂成此不识不知若梦若觉之会党而无所事事。

此非独我义兴之罪也，亦时势使之然也。使非生于今日有数十国交迫于中土，携其文明而至，则会党之名不见重于世界，人将以会党为畏途，而我祖先创造此会之苦心必不著，民族思想政治主义亦徒托之盟誓空言，而不视为要义，所谓数十世之仇人，将认为重生父母，舐他痂，吮他痔，不以为耻，反以博其一盼以为荣者，咸以为天经地义之所在矣。幸也当兹二十世纪湍急之潮流，政治界思想之发达，人有同情，民族界竞争之剧烈，国有成说，会党之名，尤为明目张胆，横行无忌，我义兴爱国爱种之宗旨，遂不复可以久匿而不彰，久稳而不发，于是《大同日报》出焉。

《大同日报》之宗旨有二：

一曰改良义兴本党之组织，由私会而升为公会，由民党而进为政党。二曰联合义兴会外之各会，凡有志于救中国者，不论其会之大小，其党之众寡，皆联络之，以期收提携之益，响应之功。

改良义兴之方法甚多，此刻不能明言之，然他时必详著一书，以饷吾四方之手足焉。夫吾义兴昔者处于满洲朝廷之下，潜踪匿影，屏气隐息，切齿于国仇之莫报，痛恨于非种之必锄，惟赖秘密之口说，得以此传于彼，彼传于他，辗转相传，延绵无已。倘一经春风之泄漏，缇骑立至，鸡犬不宁，欲羽毛之丰满，以待高飞，其势有所不可。固必隐隐隆隆焉，冥冥渺渺焉，深深沉沉焉，从事于相结之途，使其一人焉而无敢泄，即或偶泄焉，其人念手足之情，自己当之，不忍以累其党，此诚立党之苦心，经千万人陶熔而成此特别之社会者也。前之立党，既以秘密为第一义，今之欲善其党，岂能违之！况夫今日者，虽世界会党各相呈现之时，而各党中一切机关之事，亦未能宣露于外，使人知而使人防，则本党进取之方针，运动之妙法，关于全部得失厉害祸福存亡，岂可违先祖之训，而犯私泄军事之条哉？虽然，当秘密者，秘密之是也，至如党内之历年多而积弊生，传世久而遗训失，时势变而方针异，正宜大加改良进步，不能因循苟且，缘以为奸也。吾先祖立党之宗旨，苟非与国种有关，则可任其腐败，与缘以为奸者，借党以欺人，托会以

求富矣，尸位素餐，蝇营狗苟，醉生梦死，走肉行尸，亦人群腐败之常耳。而不知如此行为，不独污我义兴之声名，即先祖爱国爱种之隐衷，亦将永没而不传于世矣，岂非大失先祖之遗意哉！故我义兴不欲振兴也则已，如欲振兴也，舍改良安有望哉？夫以改良为至要之举，则世界各国私会公会之历史，不能不熟考而取法之，各国私会公会之历史，吾虽不能尽详之，然而其目的专向于国家，务使我之所要求于国家者，必能达其所欲而后已，则大略可知也。我义兴何所求于朝廷，何所恶于朝廷，岂非以民族受制政治无权之故，愤而为此举乎？以此故而立会党，党中之人即宜极力达其目的，使我义兴会党有一日在于天下之间，势必群舍其性命，以扫无理之政府，群抛其头颅，以博立宪之光荣，万不宜辜负此至大会党之名，无所事事，与腐朽之物同科。夫日日为之，月月为之，年年为之，将必有达其目的之一日者。虽然，岂能一蹴而至哉，改良组织，实为目前不可缓之要图矣。（中略）

虽然，袖手旁观，毫无举动，人或不屑责之，以其二百年来忘祖宗之遗训，视盟誓若弁髦，借放马以图财，求口食之无缺，非有雄飞宇内之心，振兴民族之志，故有众数十余万，亦视之蝼蚁虫沙，大而无当，多而无用，毫不足以为庙社之忧。故听其自生自灭，自聚自散，自起自没，曾无事焉，震惊匕鬯，瞻言百里，引为心腹之疾也。虽或有一二豪杰，愤苍天之愤愤，奋赤手于元元，方欲披荆棘，翦蓬蒿，救斯世于水火，登斯民于衽席，而腐败历数代而来，混合为下流之藪。党内习于骄纵，不知节制之为何，习于淫掊，不知军法之为何，习于平等，不知军令之为何。志所存者，只在子女玉帛，享旦夕之侯王富贵。岂知经营天下，宏远规模，究内治以安人心，善外交以联与国哉！即据有天下之半，良平为谋臣，韩彭为大将，而内讧横生，自相残贼，萧墙煽祸，长城忽倾，开隙以引人践踏，启穴以召水冲决，势虽极盛，不旋踵而尽归扑灭，天乎人乎？岂非党内之无纪律无章程无道德有以致之乎！其非然者，则此或南方据州，彼或北方取县，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声气不通，消息断绝，人得制我，我莫制人。故年年岁岁，省省州州，莫不潢池弄兵，无几即殄灭以去。即有继起者，相率蹈从前之败辙而已，未见其能有所悟，改弦而更张之也。其逃于海外者，或以头颅之声价见重于社会，相与赠金帛，供挥霍，预商业，不数年而有富翁之资格。平时叱咤风云，慷慨悲歌之气，日即消亡，反以捐官衔，进洋籍，为狡兔三窟之计，义兴先祖所传恢复中国汉种民权之遗意，更不知置于无何有之乡矣，岂复顾念而保守之哉！南洋数十百岛，我会党中人大率陷于此弊，有财者即相率而为官，以图洗涤，一为官则骨化神移，多置娇妻美妾，多买良田美宅，多役僮仆奴婢，汲汲顾影，只愿快活，以了此生，以偿前此之辛苦，不复有大志；其无财者，更无论矣。（中略）

中国汉人，无政治之权，无国统之系，二百五十年于兹矣。国亡之日，即吾义兴公司创始之一大纪念日也，吾义兴公司既因国亡而起，今又偃蹇蹂躏于无理政府之下，呻吟哀吁，屡动干戈，而冀其有所悟，改革政治，以免陷人民于不平之境，卒遭斩刈，无有白其苦衷者。微论执民族政治之义论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断不能容异族之加乎吾上，即以“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之义论之，亦岂能听其妄为。彼今日鬻吾士，明日鬻吾民，日夜荒淫，徒工媚外，所行之事，无不颠倒糊涂，失权辱国，令人心灰气结。又以民为奴隶牛马，盗其土地以自养，不能守仍不还之，竟以赠诸外人，抽剥万端，善政无一，每经一大变，则腐败愈甚，压制愈精，乃至以其祖宗所谓发祥之地，拱手送诸俄人手下，以求自庇，则吾汉种所居之本部十八行省，求其不分割持赠，以购保险延其子孙帝王之业，如越南故事者，又乌可得哉！夫彼不过长白山下之一部落耳，本无国也，借吾汉人之国以为国耳；既借吾汉人之国以为国，以生以养，以安以乐，应念如何保守之，反背汉人之德，而以为仇，欲倚外力，以制吾国民之死命，则即国土所有权，更国民所当发愤者也。以此数大问题，我义兴方汲汲筹对付之策，如何而后可以争回国土，使其不转赠于他姓，如何而后可以整顿国政，使其不贻害于苍生，民族主义尚不暇及，何论于社会主义大同理想哉！曰：吾明知不能骤致大同，而实欲立大同之基也。立大同之基何？曰：在迫朝廷改专制政体而为立宪政体，中国有立宪政体，社会风潮自然汹涌而至。以中国贤圣所传天下学大同学之种子，久经灌溉，岂忧其不繁生耶！迫朝廷，改专制为立宪，其法何在？曰：在改良义兴公司组织，由私会进公会，由民党进政党。改义兴公司为公会政党，其法何在？曰：在开《大同日报》。大同主义者，使吾义兴兄弟放开眼界，放大心胸，知泰东西政党公会之有大名誉大荣光，并天地而不朽，与日月而并寿，可钦可慕，可仪可法，而不徒以私会民党，自甘蜷伏，没世而无闻也。吾义兴兄弟有念先祖卧薪尝胆茹苦含辛创立本会党之宗旨者乎，庶几汉种有吐气之时，民权有出现之日也。吾甚乐与言之，乃首先述《大同日报》缘起，以见吾志。

孙总理与致公堂 甲辰（一九〇四年）春，孙总理二次渡美，甫至檀香山，即改组其戚程蔚南所设之《檀山新报》（即《隆记日报》）为党报，向保皇会之《新中国报》口诛笔伐，与康徒益生恶感。其母舅杨文炳建议，谓革命党虽与洪门同一宗旨，但洪门习惯非曾歃血拜盟者不得认为手足，故为联络多数同志起见，宜即列籍洪门，以厚党势。总理鉴于首次渡美时未得洪门之助，深以杨说为然。遂由洪门叔父钟水养介绍，毅然加入檀岛致公堂，是日拜盟者六十余人，由主盟员封总理以洪棍之职。洪门职员，例分三级，元帅曰洪棍，军师曰纸扇，将

官曰草鞋。总理领导革命多年，荣膺洪棍尊号，自属当之无愧。又洪门例称曾起兵讨清之首领曰大哥，故自后洪门人士对于总理，咸以孙大哥呼之。未几总理自檀乘船赴旧金山，檀埠康徒陈继俨等挟总理排击保皇之嫌，预使旅美同党设法阻止登陆，于是旧金山税关华人通事之隶保皇会籍者，遂诬指总理所持之入境护照为伪做，总理因是被阻于船上者一夜，次日移送安琪儿岛木屋移民候审所，羁留竟日。先是旧金山致公堂得檀岛致公堂电，谓总理某日趁某轮来美，嘱郑重接待，致公堂大佬（会长之称）黄三德，英文书记兼《大同日报》司理唐琼昌等届时到船埠欢迎，始知被保皇会暗算，大为愤激，遂延美律师那文（现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顾问）致电华盛顿政府抗争，并以五千元向移民局保出候讯。旋得华盛顿政府复电，以该入境护照为合法，飭令放行。总理既出木屋，颇受洪门人士优礼，致公堂职员以保皇会勾结关员，诬陷同胞，尤为不满。时欧渠甲方主《大同报》笔政，以总理莅美，于彼有利害冲突，遂于报上著论排斥，诋洪门尊重总理为不智。黄三德、唐琼昌，乃革退欧总主笔一职，请总理荐留日学界同志承之。总理以致公堂会员占旅美华侨之大多数，只以团体涣散，主张分歧，不能为祖国革命之助，因提出洪门会员应从新举行总注册之议，并手订致公堂新章规程，内分八章六十七条，节录如左：

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

原夫致公堂之设，由来已久。本爱国保种之心，立兴汉复仇之志，联盟结义，声应气求，民族主义赖之而昌，秘密社会因之日盛，早已遍布于十八省与及五洲各国，凡华人所到之地，莫不有之，而尤以美国为隆盛。盖居于自由平等之域，共和民政之邦，结会联盟，皆无所禁，此洪门之发达固其宜矣。惟是向章太旧，每多不合时宜，维持乏人，间有未惬众意，故有散漫四方，未能联络一气，以成一极强固之团体，诚为憾事。近且有背盟负义趋入歧途倒戈相向者，则更堪痛恨也。若不亟图振作，发奋有为，则洪门大义必将沦隳矣。有心人忧之，于是谋议改良，力图进步，重订新章，选举贤能，以整顿堂务，而维系人心。夫力分则弱，力合则强，众志成城，此合群团体之可贵也。我堂同人之在美国者，不下数十万人，向以散居各埠，人自为谋，无所统一，故在平时则消息少通，有事则呼应不灵，以此之故，为外人所轻藐所欺凌者，所在多有，此改良章程维持堂务所宜急也。且同人之旅居是邦，或工或商，各执其业，本可相安无事，但常以异乡作客，人地生疏，言语不同，风俗不同，入国不知其禁，无心而偶干法纪者，有之矣。又或天灾横祸，疾病颠连，无朋友亲属之可依，而流离失所者，亦有之矣。其余种种意外危虞，笔难尽述，语有之曰“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若无同志来相维护，以相赙恤，一旦遇事，孤掌难鸣，束手无策，此时此境，情

何以堪。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捍御祸患，赍恤同人，实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一也。本堂人数既为美洲华人社会之冠，则本堂之功业亦当驾于群众，方足副本堂之名誉也。乃向皆泄泄沓沓，无大可为，此又何也？以徒有可为之资，而未有可为之法，故虽欲振作而无由也。今幸遇爱国志士孙逸仙先生来游美洲，本堂请同黄三德大佬往游各埠，演说洪门宗旨，发挥中国时事，各埠同人始如大梦初觉，因知中国前途，吾党实有其责，先生更代订立章程，指示办法，以为津导，我旅美同人可以乘时而兴矣。况当今为争竞生存之时代，天下列强高倡帝国主机，莫不以开辟疆土为心，五洲土地已尽为白种所并吞，今所属者仅亚东之日本与清国耳。而清国则世人已目之为病夫矣，其病势积弱，疆宇日蹙，今满洲为其祖宗发祥之地，陵寝所在之乡，犹不能自保，而谓其能长有我中国乎？此必无之理也。我汉族四万万人，岂甘长受满人之羁轭乎？今之时代，不竞争则无以生存，此安南、印度之所以灭也；惟竞争始能独立，此美国、日本之所以兴也。当此清运已终之时，正汉人光复之候，近来各省风潮日涨，革命志士日多，则天意人心之所向，吾党以顺天行道为念，今当应时而作，不可失此千载一时之机也。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图光复中国，拯救同胞，实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二也。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而抑汉族，假公济私，骗财肥己，官爵也，银行也，矿务也，商务也，学堂也，皆所以饵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本堂洞悉其奸，不肯附和，遂大触彼党之忌。今值本党举行联络之初，彼便百端诬谤，含血喷人，盖恐本堂联络一致，则彼党自然瓦解，而其所奉为君父之满贼，亦必然覆灭，则彼汉奸满奴之职，无主可供也，其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可胜诛哉？凡吾汉族同胞，非食其肉，寝其皮，何以伸此公愤，而挫兹败类也。本堂虽疲弩，亦必当仁不让，不使此谬种流传遗害于汉族，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实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三也。今特联络团体，举行新章，必当先行注册，统计本堂人数之多少，以便公举人员，接理常务，必注册者然后有公举之权，有应享之利，此乃本堂苦心为大众谋公益起见，法至良，意至美，凡我同人，幸勿为谣言所惑，迟疑观望，自失其权利可也。今特将重订新章先行刊布，俾各埠周知，参酌妥善，待至注册告竣之日，然后随各埠公举议员，择期在本大埠会议决夺施行。望各埠堂友同心协力，踊跃向前，以成此举。同人幸甚，汉人幸甚。

谨将重订新章条款详列呈览

第一章 纲领

一 本堂名曰致公堂。总堂设在金山大埠，支堂分设各埠，间有名目不同者，今概改正名曰致公堂，以昭划一。

二 本堂以驱除异族，光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务以协力助成祖国同志，施行本堂宗旨为目的。

三 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堂相同者，本堂当认作益友，互相提携，如其宗旨与本堂相反者，本堂当视为公敌，不得附和。

四 凡各埠堂友，须一律认捐重建公堂楼宇经费，额捐银一元为底，多而益善。认捐者须详报姓名，俾照注簿存据，此次必须照额捐足领取底票，方能享受总堂一切权利。

五 所有堂友，无论新旧，均先遵守陈近南先生遗训。凡属才德出众者，皆能受众公举，以当本堂各职。

六 本堂额设总理一名，协理一名，管银一名，核数一名，议员若干名，公正判事员三名，公正陪审员二十名，及中西文书记委员干事等，均俟建楼工竣后，始行照章公举。

七 各埠支堂，当举总理一名，书记、管银、核数各一名，值理若干名，皆由该处堂友公举，呈名于总堂总理批准，方能任事，如所举非人，总理有权废之，该埠当另举妥人。

八 各埠支堂，除遵总堂新章外，堂友可随地所宜，议立专规，以维持堂务，然必当先呈总堂议员核定，总理批准，方得施行。

九 香主为堂友表率，必须品行端正，才识兼优，始能胜任，况现值改良内容施行新章之际，尤须有才学胆略，始望有裨大局，整顿一切，现拟暂行停止保举新香主。

十 议员议事，必须人数过半，方能提议，若不满一半之数，当即停议，以杜少数专擅之弊。（下略）

天运岁次甲辰吉日

金山大埠致公总堂启

洪门总注册之失效 孙总理对于所订致公总堂总注册新章，希望极巨，盖全美致公堂会友逾十五万人，此新章如能实行有效，则每一会员须缴纳注册费美金二元，总数可收入美金三十万元以上，倘以此款协助祖国革命党充购械起兵之实用，则满清政府运命之日臻危险，不言可知。致公堂职员对总理此项计划，极为赞成，遂推举总理及总堂大佬黄三德二人亲往全美南北各地，劝导各分堂会员实行注册，并宣传洪门反清复明之宗旨。于是总理及黄三德等周游南北数十埠，历时半载有余，每到一处，总理必集众演说，而黄三德亦必开台拜会（洪门称开会拜盟曰开台做戏）。然是时在美之洪门团体异常散漫，各埠分堂对于总堂之信仰

久已有名无实。加以保皇会林立各埠，各分堂职员身跨保皇会籍者，实繁有徒。而《大同报》新聘之记者仍未抵美，总堂尚缺一言论机关为各分堂之指导。因是各分堂对于总注册事，大都阳奉阴违，延不举办，会员之报名注册者，寥寥无几。计各地致公堂职员出而赞助者，仅有洛山岷之杨廷光、吕统绩，山的古之谭淦明，纽柯连之陈秋谱，美疏拉之黄暖家，纽约之雷月池、黄溪记，波士顿之梅宗炯等人而已。总理奔走数月，惨淡经营，煞费心力。终以民智闭塞，一时不易收效，遂以注册事委诸黄三德，自赴纽约与留美学生王宠惠、陈锦涛、薛颂瀛等商议革命进行之外交及经济诸大问题。旋渡欧洲与留欧学生贺之才、魏宸组、史青、胡秉柯、王鸿猷、朱和中等组织革命同盟会。濒行前犹赖欧美学界同志接济旅费始能成行。由此可知洪门总注册之成绩如何矣。

刘成禺《与大同报》 《大同报》既逐退欧榘甲，总理即介绍余任《大同报》驻日通信员，并托余物色留东同志之能文者充任该报总编辑，余初荐广西桂林人马君武，马初允就聘，嗣以事辞，余乃改荐湖北武昌人刘成禺。刘生长于粤之番禺，故号禺生。为两湖书院高材生，肄业东京外城学校，因创刊《湖北学生界》杂志，提倡革命，又于癸卯（一九〇三年）元旦日在各省学生聚集骏河台留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礼时，演说革命排满，以是为清公使蔡钧开除成城学校学籍，不许入陆军士官学校。时方筹办《祖国》杂志，为《湖北学生界》之续，闻总理在美办报需材，欣然就道。惟以持主笔护照赴美，入境不易，且虑保皇党利用美税关挟嫌妨阻，故亲返上海，取得出洋学生护照，更由《友人时报》馆东主狄楚青专函介见在美保皇会员随时照料，以免入境时发生阻力。刘返沪时，距上海《国民日报》出版之日未久，在沪诸同志只知刘渡美游学，绝无人知其就《大同报》主笔之聘也。及刘自横滨放轮，东京同志李书城、程家桢、但焘、时功玖、潘公复等数十人咸至江干送别。抵旧金山之日，黄三德、唐琼昌、邓幹隆等多人代表致公堂及《大同报》莅码头欢迎。保皇会预得狄楚青介绍书，以刘为留学生，故未设法阻止，及后乃知为大同报主笔，虽欲从中作祟，已无及矣。《大同报》自刘主持笔政，旗垒为之一新，渐渐发挥洪门反清复明之宗旨，使致公堂会员明白本来面目，前之误染康、梁余毒，以敌为友者，至是迷途知返，大不乏人。南北美洲凡有洪门人士所到之地，莫不有《大同报》，一纸风行，无远弗届。保皇会以刘之来，影响其党势甚巨，以是时美国尚无主笔可以入境之条例，遂欲借题中伤，使刘不得居美。幸刘早知保皇会有此一着，于办报期内，已在士丹佛大学报名入学，康徒之毒计，终不得售。乙巳（一九〇五年）秋，清廷派端方、戴鸿慈赴欧美各国考察宪政。保皇会于端、戴莅美日，百般谄事，惟恐不力，且欲借端力以逐刘出境，端询革命党主笔为何人？康徒以刘某对。端呵呵大笑曰：“刘成禺是我的学生，他一定听我的话。”遂派人请刘到旅馆会餐，刘届时往见，端礼遇甚优，相与话旧多时，最后语刘曰：“你是我的得

意学生，总要给我一点老面子，那句话请你不要多说。”刘一笑而别。次日大埠唐人街喧传钦差大臣请刘老师吃饭，《大同报》竟因之多售百数十份，而报中论调固与前无异也。甲辰（一九〇四年）该报刊有保皇会两番将争取帅印之图像二幅，一为梁启超冒称中国国务总理大臣委任美国军官福近卜为中国维新军大元帅之英文证书，一为梁启超与美国军官福近卜译员鲍赐三人合照。盖梁启超初以中国国务总理大臣名义委任美人福近卜为中国维新军大元帅；其后复以此职委任美人堪马利（Homerley）（堪马利为有名军事批评家，著有《未来之美日战争》一书，蜚声于时。辛亥革命，孙总理邀其联袂返国，民元任南京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福近卜以梁启超为违约背信，特向美国法院提出控诉，更访《大同报》司理唐琼昌请求协助，故《大同报》即刊载此项文证，以暴露康、梁冒名棍骗之罪状。由是各地保皇会员纷纷登报脱党，《大同报》之力为多也。是时担任撰著者，除刘成禺（别号壮夫）外，尚有徐甘棠（别号铁锥）、蒋梦麟（别号惟心）、廖卓庵（云翔）诸人。余自乙巳八月专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后，早已辞退《大同报》驻东探访一职，嗣庚戌夏改任加拿大温高华埠《大汉报》记者，以致公堂及旧日同事之关系，遂仍为《大同报》投寄论文。尝撰一长论曰《最近中国革命之种种运动》，凡四万余言，民十九出版之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即多取材于此项旧作也。辛亥七月，余为筹措革命军饷，自加拿大渡美，且就《大同报》记者之聘，未及一月，而武昌义师突起，刘成禺及余均先后归国为革命政府尽力。民二国会选举，唐琼昌以华侨代表名义回国参与华侨选举会。时国民党本部派余主持华侨选举事务，余遂悉力助之，唐获选华侨参议员第一名，即酬报唐在美国首先赞助革命及援助总理入美之功也。

致公堂与同盟会 致公堂反清复明之宗旨，虽与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宗旨相同，但以年湮代远，积弊丛生，会员之能确守宗旨贯彻主张者，百不得一。且洪门历来门户之见极严，恒称会外人士为风仔，即汉奸之谓，在彼中深明主义者亦常卑视洪门以外之革命党为后辈，不愿与之合作。孙总理、郑士良、尤列、陈少白及余等深知彼中情形，故不惜卑躬屈节，先后加盟于洪门团体，即不外迎合洪门前辈自尊自大之心理，避免猜忌，联络感情，庶于大局进行有所裨补耳。余于庚戌秋莅加拿大，应《大汉报》记者之聘，域多利及温高华两埠致公堂知余久列籍洪门，待余特优。余亦绝不谈同盟会组织事，以避猜忌，故辛亥三月广州黄花岗一役，孙总理及余在加拿大发起筹饷，域埠致公堂率先实行变产救国，以为众倡。此外温高华、杜朗度、满地可各致公堂亦均踊跃赴义，所得不资，殆占黄花岗一役用款之半数。谓加拿大致公堂为是役筹饷之首功，无不可也（参阅《逸经》第三期十一页）。是时美国各大埠已有同盟会之组织，同盟会机关之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亦已出版，与加拿大同时发起筹饷，因美国致公堂之漠视，结果仅由李是男等募得华币万数千元。其故即由于致公堂与同盟会不

能合作所致也。是年五月孙总理自美东莅旧金山，有鉴于两团体不能合作之弊，乃与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大同报》司理唐琼昌商议合作方法，欲令同盟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而致公堂则开特别会，删除繁文缛礼，以优待同盟会员入会，庶可共同革命救国。黄、唐等咸热心赞成，遂由双方各在《大同日报》、《少年中国晨报》揭登联合布告，以示合作，照录当日二团体布告如左：

同盟会与致公堂联合布告

洪门为中国提倡排满革命之元祖，而大埠致公总堂之改良新章，更与本会三民宗旨相合，原可互相提携，共图进取，惟洪门内容含有秘密性质，而本会会员尚多未入洪门者，故不免窒碍。今得孙总理驾抵金山，主张联合，而致公总堂专开特别会，以招纳本会会员之未入洪门者，本会集议，全体赞成。特此布告各埠会员一体遵照，以成大群合大力而共图光复之大业，是为厚望。天运辛亥年五月二十二日，三藩市中国同盟会启。

致公总堂广告

孙文大哥痛祖国沉沦，抱革命真理，遍游五洲，驾抵金门，与众义兄聚集，倡议与同盟会联合，结大团体，匡扶革命事业，同盟会员热心祖国，全体公认其未进洪门者一律入围，联成一气。本总堂叔父大佬义兄等，备极欢迎。开特别招贤之礼，以示优遇，尽释从前门户之分别，翼赞将来光复之伟业，扫虏廷专制恶毒，复汉家自由幸福。仰我洪门人士，一体知悉。须知招纳天下英才，本总堂之主义，特此布告，统为鉴照。天运辛亥年五月日美洲大埠致公总堂启。

洪门筹饷局之组织 旅美同盟会员李是男（公侠）等加入致公堂后，孙总理即向致公堂提议组织洪门筹饷局，以为黄花岗一役卷土重来之计，众赞成之。遂由总理手订洪门筹饷局缘起章程及革命军筹饷约章若干款，以资遵守，录之如次：

洪门筹饷局缘起

兹当人心思汉，天意亡胡，所以各省义师，连年继起，然尚未能一战成功者，何也？岂以人才之不足，战阵之无勇耶？皆不然也。试观最近广州一役，舍身赴义者，其人多文武兼长之士，出类拔萃之才。当其谋泄失败，犹能以数十人力战而破督署，出重围，以一当百，使敌丧胆可知也。然人才既如彼，英勇又如此，仍不免于失败者，其故安在？实财力不足，布置未周之故也，内地同胞，久在苛政之下，横征暴敛，剥皮及骨，遂至民穷财尽，固无从厚集资财，而为万全之布置也，故输财助饷，以补内地同胞之所不逮，

实为我海外华侨之责任，义不能辞也。内地同胞舍命，海外同胞出财，各尽所长，互相为用，则革命大业之成，可指日而定也。我洪门创设于美洲，已数十年矣，本为合大群集大力，以待时机而图光复也，所谓反清复明者此也。今时机已至，风云亦急，失此不图，则瓜分之祸立见矣。本总堂兹承孙大哥指示，设立筹饷局于金山大埠，妥订章程，务期完善无弊，以收效果，捐册寄到之日，切望各埠手足，竭力向前，踊跃捐资，以助革命大业，则洪门幸甚，中国幸甚。

谨拟章程开列如左

一 革命军之宗旨，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使我同胞共享自由平等博爱之幸福。

一 凡我华人皆应供财出力，以助中华革命大业之速成。

一 凡事前曾捐助军饷至少十元（美金）者，皆得列名为优先国民，他日革命成功，概免军政府条件之约束而入国籍。

一 凡事前未曾捐过军饷之人，他日革命成功，须照军政府条件之约束而入国籍。

一 凡捐过军饷五元（美金）以上者，当照革命军筹饷约章奖励条件办理。

一 议在金山大埠致公总堂设立一筹饷局，由众公举人员办理，由孙大哥委人监督，各埠曾捐助军饷者，皆可派一查数员，随时到来查数。

一 筹饷局之组织，分为两部，一董事部，一办事部。

董事部以现任致公堂职员，及捐款千元以上者当之，人员无定额。

办事部总办一人，会计一人，查数一人，中文书记三人，西文书记一人，劝捐委员无定额，随时由董事议定，由总办择人任使，监督一人。

一 凡局内之事必经董事议决，然后办事部方能执行。

一 所收捐款多少，除经费外，一概存入银行，以备孙大哥有事随时调用，他事不得提支。

一 议所收款拨出一成，为筹饷局经费，以支办事人员车费薪水邮电纸笔各费，如有盈余，仍拨归军饷之用。

一 所有筹饷局经费，须要监督批准，方能动支。

一 所发捐册，以寄到之日起，限期两个月缴回清算，按名给发执照为凭，其捐数五元以上者，另行双倍给发中华民国金币票收执。

美洲金山大埠致公总堂特启

附录革命军筹饷约章

第一款 凡认任军饷至美金五元以上者，发回中华民国金币票双倍之数

收执，民国成立之日，作民国宝通用，交纳税课，兑换实银。

第二款 认任军饷至百圆以上者，除照第一款办法之外，另行每百元记功一次，每千元记大功一次，民国成立之日，照为国立功之例，与军士一体论功行赏。

第三款 凡得记大功者，于民国成立之日，可向民国政府请领一切实业优先利权。

第四款 以上约章，只行于革命军未起事之前，至革命军起事之后，所有报效军饷者，须照因粮局章程办理。

中华革命军发起人孙文立

洪门筹饷局既成立，因对外关系，更定名国民救济局（Kwok Min Charity Bureau），局中职员均由致公堂及同盟会二团体选用之，办事处设于旧金山士波福街三十八号致公堂二楼，辛亥七月二十九日，总理及全体职员尝齐集拍照以志纪念。兹将洪门筹饷局职员姓名党系表列如下：

总办朱三进（致公）、罗敦怡（致公），监督黄三德（致公），会计李是男（同盟），核数司徒文煊（致公）、李务明（致公），司数黄杰亭（同盟），中文书记刘鞠可（同盟）、关缉卿（致公），黄任贤（致公），西文书记唐琼昌（致公）、黄伯耀（同盟），董事黄达仁（致公）、朱逸庭（致公）、李寿（致公）、黎利生（致公）、区秀山（致公）、刘达朝（同盟）、林朝汉（同盟）、伍平一（同盟）、林元（致公）、黄世韶（致公）、许炯葵（同盟）、梁泽霖（致公）、伍寅（致公）、陆天培（致公）、李洪宇（致公）、刘冠辰（同盟）、黄佩兰（致公）、邝文迎（致公）、刘学泽（致公）、廖达生（同盟）、陈观光（致公）、曾进德（致公）、江总（致公）、伍梓楠（致公）、梁日东（同盟）、余森郎（同盟）、刘日初（同盟）、冯乾初（致公）、郑超群（同盟），演说员黄芸芬（同盟）、张霭蕴（同盟）、赵煜（同盟）。

筹饷局成立之初，总理提议先汇款万元与黄克强，为筹设暗杀机关经费。盖黄克强愤黄花岗一役之失败，决计亲入内地狙击满清一二大员，以振士气。经总理及余等再三劝其勿躬自行险，始允另派党员担任实行事务，并要求美洲同志供给此项用费。故总理令诸同志克日筹汇此款，以应需要，筹饷局遂遵命即电汇黄克强港币万元。两月后满将军凤山在广州被炸，即此暗杀机关为之也，总理复用中华革命党本部总理孙文及中华革命军筹饷局会计李公侠两名，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一种。券之反面初拟用英文孙逸仙（Sun Yat Sen），已由总理写出备用，后乃改用“Sun Wen”。凡助饷美金五元以上者，发给金币票双倍之数收执，许

于民国成立之日作为国宝通用。关于辛亥三月二十九一役各地捐助之款，亦以此项金币券发给之（参阅《逸经》第十二期《革命逸史》），又发金币券时各附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凭照一纸，有“中华民国成立之日准列名为优先国民概免军政府条件之约束而入国籍此给原人收执”字样。是年六月二十六日筹饷局议决派总理及黄芸苏、张霭蕴、赵煜四人分途赴美国南北各埠演说筹饷，由致公总堂登载布告如左：

致公总堂派员游埠演说筹饷布告

本总堂首次提倡筹饷为空前之伟举，我洪门人士，虽羈身海外，而二百六十余年亡国之惨痛，刻不去怀，今者风云急矣，时机熟矣，筹饷之议，全体赞成，同肩责任矣。现经印就捐册，寄呈各埠，复派演说员两队，孙文大哥黄芸苏君为一队，周流美国之北。张霭蕴君赵煜君为一队，周流美国之南。分途遍游全美，演说劝捐，发挥本堂宗旨务达实行目的。该员等所到各埠，凡我同志，务祈优礼欢迎。并望各埠职员叔父，鼓励同胞，慷慨捐助，巨资麇集，大举义旗，十代之仇，指日可复，不特我洪门之光，抑亦汉族之幸也。

孙文大哥与黄、张、赵三君游埠演说路程大略：

孙文大哥黄芸苏君于七月初二日动程，先往钵崙、舍路、士卜顷、抓李抓罇、迫加斯地、杭定顿、南巴、贝士卜提、爹罇、恶顿、梳力、洛士丙令、典化、愚士斯地、圣垒。

芝加古、先行拿打、必珠卜、波地么、华盛顿、费城、纽约、哈佛、士丙非、波士顿、杭面顿、保夫庐、企里卷、地彩、密地慎、胜普、棉答步路、柯未贺、地高打掌慎、积活比利、立必斯地、气连打、猫失地、委林墨、我利古、李糯，至卡慎而还。

张霭蕴君赵煜君亦同日动程，先往马些、次马且罇、非士那、轩佛、都那利、北加非、汝路士、巴士杰、委林士、夫冷士塔、云士路、巴梳、火活笃统亚麻、愚士斯地、圣垒、茵陈答步士、先拿打、必珠卜、纽约、费城化、波地么、华盛顿、罗利哥林比亚、士湾拿、戾臣委、墨简、亚连打、孟金利、莫比利、纽柯连、布满、山多寸、巴梳、水路花斯地、罗珠卜、企粒顿、古碌、片顺、挑新、非匿、夭马、力运、粒巴洗、山班典那、罗省、山爹姑、恶市拿、山打巴罇、山打巴罢、林卜和老比、山垒比市陟、沙连那、山古罗司、屈臣委利、吉来、山多些、尾利扮，至山多酒而还。

天运辛亥六月二十六日

北美洲致公总堂公布

洪门筹饷局之成绩 总理于七月初二日偕黄芸苏等分途出发，濒行虑同盟会

员与致公堂中人仍多隔阂，特电令余赴美相助，时余已屡接黄克强函电催促汇款，及得总理电，乃于是月下旬由加拿大渡美，黄三德、唐琼昌、刘成禺诸人与余旧谊至深，而同盟会于余尤关系密切，故余莅旧金山后，两团体咸能和衷共济，无复如前之互相猜贰矣。是年八月十九日，武昌义师大举，是晚余适在沙加缅都埠致公堂演说募款，阅西报号外，知革命军已发动，遂兼程回金，令筹饷局将存款尽汇香港机关部应急。九月初有芝加哥同志梅培来电提议拨款购飞机充军用品，众咸赞同，遂委托梅在东美担任购机及雇用美国机师，至十月初旬始由梅购得克地士厂（Curtis）制之飞机六部，并雇用美机师威尔霍斯（Wilcox）一人，同志助手余夔、李绮庵二人，先后运送至沪，即民元二月在南京试飞之飞机是也。自武汉军兴，不及一月，而湘、陕、晋、赣、滇、沪、黔、苏、浙、宁、桂、粤、闽、皖、蜀各省次第光复。九月初总理自伦敦来电，令汇美金三千元供归国旅费，筹饷局即遵命汇去，未几致公堂及同盟会洪门筹饷局三团体，以国是不日大定，特公推余为旅美华侨革命党总代表，回国参与组织临时政府事宜，并将筹饷局发行已售未售之金币券一切账目携归缴呈革命政府销号。余归抵上海在十一月朔，是月初六日总理亦自欧洲莅止，是月十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总理以十六票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二黄三德自美返国，总理延充全国铁路督办公署顾问。嗣铁路督办公署解散，乃失意回美，闻现在洛山岬埠仍操理旧业。唐琼昌于民二国会解散后一年回美，民六以病去世。李是男于民十始返国，任总统府秘书。近年任中央党部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委员。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因宿疾逝世，国民政府念其前功，特明令公葬。《大同报》于民元改名《中华民国公报》，民六后以维持乏人，竟致停刊，殊可惜也。

苏曼殊之真面目

同学苏曼殊圆寂后数年，生平友好以曼殊生前关于幼年身世，讳莫如深，因之怀疑莫释，群起为曼殊身世之探讨。甚且有摭拾曼殊所撰《日僧飞锡潮音跋》及说部《断鸿零雁记》，牵强武断为出自倭种。柳君亚子父子所编《曼殊全传》及年谱其最著者也。余与曼殊为总角交，且在日同砚三载，舍曼殊亲属而外，当以余所知为较详。民十七，亚子以曼殊序拙著《三次革命军》有“总角同窗冯懋龙”之言，爰向余详叩曼殊幼年遗事，余举所知告之，更代函询曼殊表兄林君紫垣。林君向任天津中原公司经理，复书述曼殊本生父母及家庭状况綦详。亚子得之，始觉旧著臆断之非，因改撰新传，力证前失，而曼殊倭种之冤乃大白。然

及今尚有人误信谬说，而辗转传诸海外者，是不可以无辩也。顾余所知仅为曼殊披剃以前事实。至披剃以后，则余二人天各一方，晤对之机缘极少。民四尝为拙著《三次革命军》作序，乃陈君树人代请。余时居美洲，事后始获知之。曼殊尚有一至亲姊婿杨姓名耀垣，亦横滨大同学校同学，现供职上海苏浙皖统税局。世有欲知曼殊家世者，不妨就杨君请益，谅可一一奉告。兹就余所记忆者依次笔述，更举世人对彼之疑团分别剖解，以见曼殊之真面目。

曼殊之本名 苏曼殊幼名子谷，无字，在本家及大同学校、早稻田大学、青年会（留学界最初之革命团体），均用此名。其亲属及学友除此名外，余无所知。“元瑛”之号，乃削发后添制，殆与曼殊二字同，非其本名也。亚子初根据曼殊所撰《潮音跋》及说部《断鸿零雁记》，遽定为始名宗之助，小字三郎。该说部固曼殊之一种游戏笔墨，不足为据。若认虚构为实录，则施耐庵可称宋江，曹雪芹可名宝玉，无是理也。至曼殊于披剃后自号“元瑛”，或谓其取义于《红楼梦》之神瑛侍者，斯言亦有可信，盖余尝见曼殊居东京时，向友借阅《红楼梦》，手不释卷，后有此称，其殆以摆脱尘缘之宝玉自命欤。

曼殊之父母 曼殊父名杰生，香山县人，在横滨山下町三十三番英商茶行任买办，性任侠，好施与。甲年中日之战，旅横滨华工多拟归国，而短于资斧，杰生辄解囊力助，人多德之。吾国侨日工商无论挈妇居日与否，大都好与日妇同居。粤语谓之“包日本婆”，其初月给数元为报酬，久之感情日洽，形同配偶，生子后尤为密切，更无权利条件可言，亦无所谓嫁娶，特横滨唐人街之一种习惯而已。有使其本籍妻妾与日妇同寓者，亦有以一人而同时纳数日妇者，均能相安无事，绝少勃谿，远非吾国有妻妾之家庭所企及。杰生居日既久，自难免俗。曼殊之母，即从此种习惯而与杰生同居者也。母曰亚仙，杰生与其戚属咸以此称之。亚子谓其母姓河合，似亦语出说部，实无佐证。亚仙生曼殊后十一年，而中日战起，杰生乃携曼殊母子返粤。逾四年，杰生家道中落，遂使母子东渡，依其亲属林氏以居，时曼殊年仅十四。某氏谓曼殊于十三岁前已披剃为僧，且通欧洲词学及英语，均不足信。又己亥（一八九九年）曼殊十六岁，在横滨大同学校读书时，教员陈荫农尝因某事语乙级学生曰：“汝等谁为相子（Ainoko）者举手？”于是举手者过半，曼殊亦其中之一人。日语相子，即华语混血儿或杂种之谓。旅日华侨咸称华父日母之混血儿曰相子，曼殊固直认不讳。或者不察，妄断曼殊为日再醮妇之油瓶儿，岂不冤哉？

曼殊之亲属 曼殊有族兄曰维翰，号墨斋，同肄业于横滨大同学校。曼殊负笈东京，墨斋亦专攻师范，故曼殊之于同辈亲属，与墨斋为最昵。墨斋后返粤，数任教职，颇有声于学界，民元后以病身故。又其女兄适同邑杨耀垣。杨亦大同学校学生，现在上海统税局服务。又有表兄曰林北泉及林紫垣，均在横滨经商。北泉以营业失利南游印度，现况不详。紫垣后任上海东亚旅馆经理，旋至天津创

设中原公司。今日能详道曼殊家世者，仅林、杨二人耳。

曼殊之学历 曼殊十四岁前在何校读书，不详。十五岁时横滨华侨初设大同学校，余及曼殊均于开幕之日入学。校分甲乙二级：甲级所授为中英文二科，乙级所授为中文一科。曼殊属乙级，与五、六、七舍弟同班。己亥余转学东京，曼殊至庚子（一九〇〇年）春始升学甲级，兼习英文，余戚李自重亦与同班。辛丑（一九〇一年）以其亲属林氏之助，与学友张文渭同入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因林氏只月助十元，仅敷下宿屋膳宿两费，乃刻苦自励，迁于最低廉之下宿屋，所食白饭和以石灰，日本最穷苦学生始居之。曼殊竟安之若素，不以为苦。每夜为省火油费竟不燃灯。同寓者诘之，则应曰：“余之课本，日间即已熟读，燃灯奚为？”其勤俭有如此者。壬寅，林氏津贴忽告中断，曼殊大窘。适清公使汪大燮有许各省优秀学生改充公费生之举，曼殊赖横滨侨商保送，转学于振武学校（成城学校改名），习初级陆军，始得免于废学。是年冬，余因事归国，癸卯（一九〇三年）春，始再东渡。时军国民教育会已告解散，曼殊告余谓已决计返粤有所活动。某氏记载谓曼殊十五岁在早稻田习政治三年，及十七岁在成城学校学陆军八月，多与年龄事实不符。证以余说，真相自白。

曼殊之文艺 曼殊在大同学校二年，性质鲁钝，文理欠通，绝未显其头角。该校于文学上只间采用《昭明文选》之论文书启为课本，于诗赋辞章概未讲授，以故出身该校鲜有以文学见称者。曼殊转学东京刻苦攻读之年，正留学界翻译东籍风起云涌之日。苦学生稍通文理，即可译书自给。曼殊独以短于国学，既不能争雄士林，复无以取给学费，其困苦可知矣。然其作画之天才，则早已活现于大同学校时代。彼之绘术本无师授，间作小品馈其学友，下笔挺秀，见者咸为称异。彼与舍弟同级，余得其作品于舍弟，始知其能。及后同寓东京，则从未见其执笔作画。迨丙午（一九〇六年）《民报》特刊之《天讨》出世，所作《陈元孝题壁》及《石翼王饮马》二图，老练精工，有同名宿，令人惊叹不已，此才谓非出自天授不可也。考曼殊之用力于诗及古文辞，当在壬寅青年会成立以后，盖曼殊初至东京之一二年，所往还者不过三数同乡学生，嗣加入青年会，渐与各省豪俊游，于是文思大进，一日千里，迨遍迹佛门，益旁通佛典，思想玄妙，迥非吴下阿蒙之比矣。其文字始见于上海《国民日报》，寻而诗文并茂，名满天下。谁复知彼于大同学校时代固一混沌未凿之小儿耶。

曼殊与革命党 曼殊于壬寅前，尚未萌革命思想，故支那亡国纪念会之发起，余未敢约其署名。及壬寅秋，叶澜、秦毓璠、张继、董鸿祎、周宏业及余等取少年意大利之义发起组织青年会，宣言以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发起人多属早稻田大学学生，余遂介绍曼殊入会，曼殊至为乐从。是为曼殊与革命团体发生关系之开始。翌年（癸卯）俄占东三省，青年会员乃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留日学界蜂起和之，卒为清使馆干涉而止。时曼殊忽动归思，向余求一介绍书至香港

见陈少白，余应之，曼殊莅港，下榻《中国日报》。其父杰生早年在乡已为曼殊聘妇，闻子归自日本，遂至港访之，且欲使其完娶。曼殊竟避而不见。少白以为天性凉薄，力劝其从父归乡，曼殊乃不告而行，莫知所往。数月后至港，则已削发为僧，易名曼殊矣。旋至上海与诸志士游，会《国民日报》出版，乃在报中任撰小品文字。自是奔走苏州、长沙、芜湖、江宁各地，迭任教职，所往还者类多革命豪俊；江南陆军标统赵声其尤著者也。丙午复至东京，与章太炎及刘申叔夫妇同居。时《民报》增刊纪念号，以天讨为名，属曼殊题画，曼殊因作《陈元孝题壁》及《石翼王饮马》二图以赠。刘申叔刊《天义报》，曼殊亦有作品。余至民元秋始重晤曼殊于上海《太平洋报》，计期不相见已九年矣。

曼殊之轶事 曼殊少年轶事甚夥，除上述外，余都忘之。据亡友林广尘所谈，曼殊与刘申叔夫妇同寓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时，偶患精神病。有一夜忽一丝不挂，赤身闯入刘室，手指洋油灯大骂，刘夫妇咸莫名其妙。又居沪时，如遇行囊稍丰，即喜居外国饭店，谓一月不住外国饭店，即觉身体不适。此种癖好，老兴中会员尤列亦有之。

《三次革命军》题词 民四，余在美国旧金山《民口》杂志有《三次革命军》之作，爰托陈君树人在东京印刷。时曼殊居日本，树人代余向之索序。曼殊特为题词，以志旧谊，录之如次：

冯君懋龙，余总角同窗也。少有成人之风，与郑君贯一齐名，人称双壁。会戊戌政变，中原鼎沸，贯一主持《清议》于粤五稔，一夕掷笔长叹曰：“粤人多言而寡要，吾知其终无成也。”遂绝食而殒。君亦翩然退征，与余不相见者十有余载（按此语有误，实只九载）。前年于海上遇之，正君仓皇去国之日。余方愿其有迈世之志，用释劳生。比日君自美利坚观巴拿马大会造游记以归，更有撰述，命余作序。余愀然告君曰：久病之人，终日解衣觅虱而外，岂能共君作老健语耶？君有澄清天下之志，人但谓广东人有生为乱，而不知君故克己笃学之人。若夫傅嘏所云志大心劳，能合虚誉者，斯无望已。曼殊题。

新加坡《图南日报》

《图南报》出世前之南洋 《图南日报》为南洋华侨革命党机关报之鼻祖，在此报出世之前，新加坡有《叻报》及《天南新报》，槟榔屿有《槟城报》，吉隆坡有《南洋时务报》。《叻报》、《槟城报》属守旧派，《天南新报》属保皇派，

《时务报》属基督教派。革命党人之在南洋者，尚未有机关报之组织也。先是康有为于戊戌政变后，尝偕其徒侣梁启超、徐勤、欧榘甲、汤觉顿等先后至新加坡组织保皇会，事前已得当地富商邱菽园（炜菱）之助，发刊《天南新报》。出版第一日，其报面大书“孔子降生二千四百四十九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己亥四月初八日”字样。英属各埠华侨从之者，大不乏人。庚子（一九〇〇年）七月唐才常汉口之役，邱菽园尝向闽粤侨商募集勤王军巨款电汇上海应之。是时革命党人对于南洋群岛仍未开始活动，庚子六月孙总理因日本同志宫崎寅藏为康有为构陷入狱，特由越南西贡至新加坡设法营救，曾求助于旧友黄康衢、吴杰模、林文庆数人。林为星州著名医学博士，极得当地英吏信用，宫崎得以无事出境，即赖其斡旋之力，然黄、吴、林三人均非党员也。庚子闰八月惠州革命军失败，其将领黄福、黄耀廷、邓子瑜诸人均亡命南洋。翌年（辛丑）兴中会员尤列亦接踵而至。尤有辩才，以闽粤籍各富商性多顽固，不易感化，乃渐向义兴会团体及农工二界鼓吹革命排满，闻者多为感动。旋发起中和堂于新加坡，分会遍设檳榔嶼、吉隆坡、怡保坝罗各埠，从者日众。《天南报》记者黄世仲、黄伯耀（世仲之兄），康荫田等亦加入中和堂为会员。尤更于中和堂所高悬惠州革命军所用之青天白日旗，以作兴中会一脉相传之表示，海外华侨团体首用青天白日为国徽者，中和堂实为之倡。时有闽籍富商厦门人陈楚楠慕尤列名，爰托《天南新报》记者黄伯耀介绍相见。楚楠有商店曰合春号，营木厂及罐果业，向与邱菽园为挚友，因得阅《清议报》、《开智录》、《新民丛报》及各种书报，渐醉心新学，自号思明州之少年，知尤列为老兴中会员，遂与老友张永福专诚请谒，一见如故。永福，粤之潮州饶平县人，营新长美布匹店，亦有志士也。当癸卯（一九〇三年）闰五月上月上海《苏报》案起，楚楠、永福及永福外甥林义顺愤清廷肆虐，特用小桃源俱乐部名义致电驻沪英领事，请援保护国事犯条例，勿将章邹引渡清廷，以重人权。其后复集资翻印《革命军》五千册，改名《图存篇》，设法输入漳、泉、潮、梅各乡镇，广事宣传。继以提倡革命，非借报馆为喉舌不可，遂各出资创设《图南日报》，为南洋群岛革命党人之第一言论机关，尤列与有力焉。

《图南报》出世后之南洋 《图南日报》资本全出自楚楠、永福二人，地址在新加坡福建街二十一号，自癸卯秋冬间即已进行筹备，至甲辰（一九〇四年）春始事竣出版。初由尤列介绍郑贯公充任该报总编辑，贯公以方筹办《广东日报》辞，乃改聘陈诗仲承之，郑、陈均前任香港《中国报》记者也。此外更聘尤列为名誉编辑，黄伯耀、何德如、康荫田、胡伯镶、邱焕文诸人分任撰述译务。第一日尤列作发刊词，署名吴兴季子，初印一万份，后减作一千份。然长期订阅者仅三十余份，盖其时风气未开，各商店多视为大逆不道，群起反对，且严诫其子弟伙友不许购读，故出版多日，仍难推销，仅作宣传性之赠送品而已。是年冬，《图南报》更别开生面，乘庆祝乙巳（一九〇五年）新禧之机会，印刊一

种富有刺激性之月份牌，分赠华侨，以资宣传。上题“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涂炭，相率中原豪杰还我山河”二十字。下题“哲理皇汉帝位满清光绪三十一年岁次乙巳为耶稣降生后一千九百零五年至零六年”及“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图开新世界，书檄布东南”等句。中刊自由钟及独立旗各一，异常美观。英、荷两属各埠华侨工界各团体会所多悬诸座右，而报纸销场亦因之递增至二千数百份。乙巳冬《图南报》为华侨冯夏威自杀于上海美领事署前以殉美政府新颁华工禁约事，发起追悼会于仁济医院。先期预请当地华民政务司署批准开会，英官谓必须尤列不到会始可照准，陈楚楠等竟许之。尤列闻之大愤，及期先到会场登坛演说，痛言拒约抵货之理由，及迁就外人之失当，座众大为鼓掌。事后英吏竟未干涉。未几各地抵制美货之风潮愈益扩大，适有英船载运政府定购之美货到埠，码头华工激于爱国大义，咸拒绝起运，华民政务司乃请译员何宽设法。何曰：若得《图南报》主人陈楚楠、张永福二君代疏通码头苦力，乃易为力。英吏遂邀陈、张至署，请其劝告各工人勿拒运美货，陈、张以无此能力却之。英吏谓只须二君代解释英轮所载美货乃当地政府先期定购之用品，与寻常商品不同，即生效力，不必为劝告工人语亦可。陈张勉为署名，此项公告张贴后，不及半日，英轮之货完全卸陆。英吏闻之，始知《图南报》对于群众之势力，为之称异不置。

孙总理与《图南报》之关系 孙总理向知南洋尚无革命派报纸，恒引为憾事，及甲辰秋自日本至檀香山，尝助《檀山新报》为文，与保皇派之《新中国报》大开笔战。偶见《图南报》致《檀山新报》请求交换报纸函，及寄来报纸月份牌等，知吾道不孤，至为欣悦。乃亲寄美金二十元至《图南报》购取乙巳年月份牌二十张，复移书尤列查询该报为何人组织，以便通讯。又《图南报》记者陈诗仲未就《图南报》职时，总理在日本已闻其因事脱离《中国报》，及莅檀岛，乃函嘱余介绍诗仲任《檀山新报》主笔，诗仲初允就聘，后以驻香港美领事不允签发护照，始改就《图南报》之约。总理先后得余及尤列报告，知《图南报》操笔政者即属彼意中之陈诗仲，尤为惬意。是年六月自欧洲东归，先期函电尤列、秦力山等，嘱于舟过新加坡时引诸同志相见。届期，秦力山以深入滇边未能赴约，尤列遂领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登轮晋谒，总理告以欧洲留学界已成立革命党机关，此次赴日本，谅不日亦可成立，嘱尤等在南洋预为布置，以利进行，尤等咸为乐从。是为孙总理与南洋同志结合之嚆矢。

《图南报》之停刊及改组 《图南报》发刊不及一载，以销路不广，亏折甚巨。赖楚楠、永福二人辛苦支持，尚能勉强出版，将及二年，前后支出不下三万元，以是赔累益甚，且积欠编辑部及排印工人薪金为数不赀。记者陈诗仲因此辞职返国，司理林采达以避工友索资，亦匿迹不见。至乙巳年冬，遂不得已宣告停版，两月后楚楠、永福不欲民党喉舌中断，复谋集资重整旗鼓，继续发刊。适有友人黄江生介绍商人许子麟、沈联芳、陈云秋、朱子佩等合股改组新报，拟组织

资本二万元，《图南报》所存机器铅字家具等物作为价值一万元，其余半数由许等担任，另迁新址，定名《南洋总汇报》。出版之初，仍由楚楠、永福主持，报面不用大清年号，称清帝光绪为载湉，与以前《图南报》之立言宗旨尚能始终一贯。诂陈云秋、朱子佩二人思想顽固，力诫当事人不得登载激烈文字，而各记者不之恤，仍高谈革命如故。至丙午（一九〇六年）春，云秋等遂提出拆股承让之议，后乃改为抽签，即由抽得者接受报业，结果为云秋一派所得，楚楠等仅取回拆股金五千元而退。其后《南洋总汇报》渐为保皇派入寇，所聘记者均属康门徒侣，徐勤、欧榘甲、伍宪子等即凭借此报与革命党为敌，南洋之民党喉舌因之喑哑者年余。翌年七月，始有第二言论机关之《中兴日报》继起。

林义顺事略

林义顺，字发初，广东潮州潮阳县人，生于南洋新加坡埠。少失怙恃，由外祖父母鞠育。初在家塾习国文，卒读四书。年十岁，肄业于圣约瑟学校，专攻英文。十七岁毕业，遂至陈楚楠所设合春号学习商务，月薪三十元。任事谨慎，楚楠极信赖之。楚楠，福建同安县厦门人，别号“思明州之少年”，素热心新学。初纳交于保皇会员邱菽园，得阅《清议报》、《开智录》、《新民丛报》等书报。继结识兴中会员尤列，渐倾向革命真理。癸卯（一九〇三年）闰五月，上海《苏报》案起，楚楠与张永福激于义愤，爰用小桃源俱乐部名义致电上海英国领事，请援保护国事犯条例，勿引渡章炳麟、邹容于清廷。是为南洋华侨同情革命之第一声。永福为义顺母舅，有布匹店曰新长美号。义顺尝助其料理营业事务。故楚楠、永福二人事无巨细多委义顺任之。义顺时年二十四，因急图革命收效，乃集资翻印《革命军》五千册，易名《图存篇》，设法秘密输入漳、泉、潮、梅各乡镇，分送士商各界，以广宣传。旋复亲返汕头，向潮属各县大肆活动，乡人多为感奋。是年楚楠、永福更出资组织《图南日报》，至甲辰（一九〇四年）春始出版，亦以义顺奔走之力为多。乙巳（一九〇五年）六月，孙总理由欧洲取道赴日，舟过星洲，陈、张、林等偕尤列登轮求谒。总理谓此行到东即建立革命党总部，星洲可设分部，嘱各人预为筹备。是年冬，总理从越南莅星，遂假晚晴园开会，即日成立同盟分会，举楚楠为会长，永福副之，义顺为交际干事。丁未（一九〇七年）七月，《中兴报》出版，义顺任司理人。翌年，总理由越南移居星洲，寓东陵东明律一一一号，先后派义顺至庇能、仰光各地创设同盟分会，及招募《中兴日报》股款，收效甚巨。义顺长于英文，尤善交际，总理对外事件

十九委其办理，故生平创作能力多取师资于总理。时医师林文庆在马来群岛负盛名，甚得当地政界信仰，总理于彼为旧交。庚子夏，康有为向英官诬称革命党将不利于彼。英官令拘嫌疑日人宫崎寅藏于狱，总理在越南闻讯，即赴星谒当局为宫崎解脱。英官判宫崎离境，即林文庆为之说项也。丁未后，总理每有事于文庆接洽，均遣义顺代劳。义顺由是见知于文庆。戊申（一九〇八年）后，文庆集资创设三巴汪公司，专从事种植树胶，赏义顺才识，任为公司司理。时马来群岛农场多植波罗，果价低贱至不敷城市牛车费。故购致农场，而所种波罗树概不计值。义顺即于波罗农场中添植树胶，由数十百英亩扩充至数千英亩。三巴汪公司而外，更以一己经营所得自行组织农场，使丁未潮州黄冈革命失败之亡命同志余通、陈涌波、余御言诸人为之佐理。园地之广遍于星洲、柔佛二埠。己酉（一九〇九年）后，南洋同盟会失迭受镇南关、河口二役败挫之影响，元气大伤。楚楠、永福亦营业不振，势濒破产。总理、精卫、汉民相继离星。《中兴报》乏人维持，竟致歇业，独义顺深入山中，大展其开拓农林之抱负。向例波罗之收获期为四年，树胶之收获期为六年。至辛亥年适为义顺所经营农场之波罗收获期，而波罗时价忽由每个三四分狂跃至每个二三角，因是获利十数万。次年复进境不已，雇用农工恒数万人，罐厂赖其供给，糖价受其影响，隐然执南洋种植家之牛耳，遂有“波罗大王”之称。南洋人名波罗曰旺莱（黄梨）。义顺喜招待祖国往来同志，往来与旺莱同音，故又有“往来大王”之称。于是长袖善舞。民二、三又值树胶收获期，所获成绩不让于波罗，更集资至百数十万。黄冈亡命同志余通等亦各盈余十数万不等，咸乐不思蜀。义顺因营建别墅于洪水港，以接待远客，题曰“湛华别墅”。民二秋，赣、宁、湘、皖，闽、粤各省讨袁军失败，民党各将领多遁逃南洋。李烈钧、陈炯明、谭人凤、岑春煊、熊克武、周震鳞、柏文蔚、×××、黄复生、方声涛、周之桢、古应芬、邹鲁、张继、何子奇、李明扬、王有兰、卓仁机、黄强、马育航诸人先后莅星，义顺概竭诚招待。民三、四间，民党内部以政见不一，有中华革命党与水利速成社之分。义顺一视同仁，不分轩輊。就中陈炯明更挈其眷属寄寓别墅者三载，关系尤形密切。故陈任广东省长时代，义顺返粤，陈款之于省公署，礼遇异常优渥。民九，陈率粤军自漳州回粤讨莫荣新，义顺为募集饷糈三十余万元。时人颇有号之为陈派者。实则其时陈炯明尚尊奉孙总理为党魁，助陈即无殊助孙。若责义顺以有款应直接交付总理，而不当间接汇至漳州者，则井蛙之见耳。民二、三间，前浙江都督汤寿潜有志垦殖，特赴星洲开辟农场，赖义顺事事指导，成绩甚优。民十前后，义顺声誉鼎盛，迭任当地中华总商会正副会长，英政府亦聘充农林委员会委员、米粮制限局委员、鸦片制限委员会委员、和平审判官等职。历年星洲中华总商会正副会长例由闽粤二省人轮值选充，向为当地保守派人把持，民党商人无问津者。辛亥时有同志主张联合本派商店争取此席者。义顺曰：“吾党此时经济力未充厚，争之无益，

君等试拭目以看我于十年内能得之否。”果不出十年，义顺竟膺树胶大王徽号。巨富如黄仲涵、陈嘉庚、李尧阶，咸与互联姻好，富力物望倾动一时。于是全埠商人俱热诚劝进，共庆得人。世所谓有志者事竟成者非欤。民十三后，义顺从南洋至上海，时西山会议派及反共大同盟咸以款绌求助，义顺均慨然解囊无吝色。民十九，南洋英、荷二属政府同颁布限制树胶出产条例，树胶价格遂一落千丈，义顺营业因而损失不貲。幸借手腕灵敏，不致全局崩溃，同业咸服其智。义顺迭蒙商业上之打击，仍眷眷不忘国事；每遇外患或党祸发生，辄致电当局，痛陈利害，有所贡献。民二十一，尝应征为国难会议会员，扶病诣洛阳出席会议。以此会于抗敌救国无所表见，怏怏归南洋。民二十四，八月，因闻华北危急，忧伤成疾，遽患咯血，经西医诊治，两月余始瘳。本年三月，拟易地疗养，爰买棹返国，迨归抵上海数日，旧病复发，竟以不起。国民政府追念前功，特下明令褒扬并赐予公葬。

乙丙两年印行之革命军债券

孙总理于乙巳（一九〇五）丙午（一九〇六）两年，先后印行革命军债券二种，一为乙巳年十一月发行之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正面刊“公债本利一千圆券，第一回□字第□□号。广东募债总局五年内清还。总理经手收银人孙文印。天运岁次乙巳年十一月□日发”字样。除由总理亲笔署名外，券号及年月日概由总理自行填写。券之背面刊有“中华民务兴利公司今议立新章，兴创大利，以期利益均沾，特向外募集公债二百万元，以充资本。自公司开办生意之日始，每年清还本利五分之一，限期五年之内本利清还，如到五年期满，有不愿收回本利者，以后则照本利之数，每年算回周息五厘，每年派息一次。特立此券收执为凭，广东募债总局立约”等语。按乙巳年十一月即中国同盟会东京本部成立后之第四月，是年十月总理偕同志黎仲实、胡毅生、邓慕韩三人由日本赴越南西贡，濒行尚向留学界同志筹措旅费，故行囊殊不充裕。嗣抵西贡堤岸，始向越南华侨募集军饷，因虑易招当地政府干涉，故用广东募债总局及中华民务兴利公司等名义发行，此券系在日本横滨印刷，旅日党员多未知之，即在西贡堤岸等处亦发出极少。从民元至今，仅发现数纸而已。二为丙午年正月发行之英法文中国革命政府一百元军债券，内载“中国革命政府许持券人于政府成立一年后向广东政府官库或驻外代理取回一百元。一九〇六年元月一日总统孙文”字样。下刊白日徽章，一面用英文，一面用法文，语意相同。先是孙总理有法国友人李安利（2. Leoni）寓西贡波列华查纳街九十号（90. Boulevard Chumer, saigon），向日赞

助中国革命，总理特以印刷此项革命军债券之任务委托之。印成后，总理复加盖蓝色小章然后发出。是年秋总理自南洋赴日本，途经香港，余迓之于法国邮船，总理交付余军债券三箱，另给香港鸦片承餉公司总办陆秋杰英文手谕一纸，略言：“谕烟公司差役知悉，内件经余阅过，并无禁品，不必搜查”等语。盖陆秋杰乃南洋吉隆坡同盟会员，时方承办香港鸦片烟捐务，总理适与同舟，故嘱其手谕烟公司差役令勿搜查，以免宣泄秘密也。余携军债券藏诸《中国报》，其后数奉总理函嘱从邮局分寄海外各埠。是年冬许雪秋以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名义经营潮、梅两属军务，领去此项军债券二百张，丁未（一九〇七年）正月初七日，许与薛金福、乔义生、谢逸桥、谢良牧、方汉城、陈芸生、方瑞麟、萧竹漪、蔡德、李次温诸人，谋在潮城、黄冈、浮山、揭阳、惠来各地分途起事，因布置不及，临时中止，乡人来会者要索遣散费，以是分给军债券数十张。是年四月十一日，陈芸生、余丑、陈涌波、余通等猝然起事于饶平县属之黄冈城，与清军血战七日而败，许雪秋所领去军债券多用于此役。是年十月二十七日革命军占领广西之镇南关，孙总理于期前已电令余将香港所存军债券尽运越南备用。是月二十九日适有同志田桐（梓琴）、谭人凤（树平）、何克夫、谭剑英四人奉召赴越南东京（即河内），余遂将所存军债券三箱委托田等携交孙总理。诂是时镇南关军事已失败数日，重要党员，多忙于善后工作，军债券入口，事先未与越南当局接洽就绪，故军债券到步时，即被海防税关扣留，而田等四人以运送军债券之关系，亦为法人阻截，由海防同志刘岐山等保出候讯，后经总理与当局交涉多次，驻河内法总督卒允全数归还。惟出等四人则因清政府指证为著名革命党之故，不得入越南地境，故田等居留海防二十余日仍须遣归香港。在此二十余日中，田等四人中有一趣事，颇足为旅越党员之谈资。盖中有一人名谭剑英者，同志中之陆军学生也，以羁留异域，不甘寂寞，稍作猎艳之游。海防党员某等据以报告总理，总理虑于筹饷进行有所障碍，乃使胡汉民作函讽诸人戒慎。时谭人凤年逾六十，得书乃复数语曰：“老夫耄矣，无能为矣，久已丧失战斗力，请毋过虚”云云。闻者无不发噱。镇南关一役既失败，清政府与法公使交涉，要求不许总理居留越南，总理遂赴新加坡，而以经营滇、粤军事之责委诸黄克强、胡汉民。迨戊申（一九〇八年）三月，云南河口革命军败挫，黄克强、胡汉民亦先后莅新，所存越南之军债券大部遂由河内甘必大街六十一号机关部移送至新加坡晚晴园。未几，河口将士亡命南洋英属者数百人，总理命张永福、林义顺等开设石山公司以收容之。其中分子多半出身游勇，间有在石山附近犯杀人夺财嫌疑，致遭地方官吏逮捕者。英国警吏因在若辈住所搜获此项革命军债券，而有干涉发售之举，总理乃将所藏军债券全数付之一炬，仅检出百数十张裹一大束，交张永福保存。至民国成立后，张犹郑重珍藏，至今未失云。

朱少穆事略

朱少穆，粵之南海九江乡人，岭表大儒九江朱次琦之遗裔也。其父经商越南堤岸，拥资甚富，有古董癖，收藏名人字画至夥。少穆自幼随父至交趾，目击法人虐待侨胞情形，不胜愤恨。其父恐其肇祸，乃遣回故里读书。岁癸卯（一九〇三年）年十九，东渡日本求学。会时俄兵侵占东三省，钮永建、蓝天蔚等发起拒俄学生军义勇队，少穆与同乡卢少歧、桂少伟、伍嘉杰诸人率先报名加入。迨义勇队被日政府强逼解散，乃与桂少伟、廖仲恺、何香凝、彭自立等同寓牛込区某町，补习日文为入学之预备。是年秋，孙总理自南洋莅日本，余遂介绍同乡学生之有志者晋謁，少穆其一人也。未几总理与日友日野小室等密设陆军速成学校于东京青山，留学界从学者有黎仲实、桂少伟、胡毅生、李自重等十四人。少穆以有志法政，卒未加入，然亦尝捐金助学，众多称之。甲辰（一九〇四年）余与梁慕光在横滨创设洪门三合会，为交通内地秘密会党之导线，少穆与仇亮、秋瑾、刘道一、王时泽等同日订盟，是为留学生加入秘密会党之嚆矢。少穆旋从李植生、梁慕光学制炸弹炸药，饶有心得。乙巳（一九〇五年）七月，孙总理从欧洲至日本，与黄克强、陈家桢、张溥泉及余等发起中国同盟会，第一日加盟者五十余人，少穆与焉。浙江蒋尊簋入党，即少穆所介绍。是年冬总理将游南洋，以旅费短缺，爰向各省同志求助，少穆与同乡学生何斌兄弟筹措千金应之，复致书西贡粤商李卓峰等为总理助。总理至越南，颇受侨商欢迎，少穆与有力焉。戊申（一九〇八年）四月，河口革命军失败后，少穆自九江乡挟其家藏名画一箱至港，拟托陈少白向港商求售，贮存《中国日报》逾年，未能出脱。己酉（一九〇九年）冬，党人策划广州新军反正运动，需款孔亟，胡毅生、李文甫等商之于余，取少穆存画贱售，借充军用。无何少穆父死，其家以少穆取去藏画未返，分配遗产时，议扣取其产额五千元以抵偿画值，少穆无异言也。辛亥武汉革命军兴，少穆适毕业法律学校，乃向横滨侨商募款数万元，携带回国献诸沪军都督府。及民元南京政府成立，更与孙寿屏、苏焯南等发起恢复兴中会于广州，复随寿屏至南京謁孙大总统有所陈议。民二八月，广东讨袁军瓦解，龙济光入粤，党人被杀害者，实繁有徒。少穆亦以党案株连下狱，赖粤港绅商易兰池、冯香泉等多方营救，始获保释。自兹而后，民五讨袁驱龙之役，民九讨莫之役，民十一讨陈之役，少穆均尝奔走其间，为国尽力。民十二受大理院长赵士北命，任澄海地方审判厅厅长，在职未久，即辞职改业律师，不预外事。近年以故旧凋零，弥足感念，爰

与少数老友创建革命老人坟场，为身后之计。詎因此为粤当局所忌，于民二十五年三月七日遭公安局无端逮捕，拘禁四十九日，经胡汉民及民党各耆宿向当局力保，仅释放同案之黎粤、李天德二人，少穆竟于四月二十四日惨遭横杀，陈尸郊外。临刑时遗书其妻云：“贤妻大鉴，本生不幸，真真不值，我一世为党，本次确系无辜，定难闭目。惟望上帝祝福。我见总理，定必告诉，临别请无挂。朱少穆”闻者莫不冤之。少穆妇赵竹子为横滨永新祥商店东主兴中会员赵峰琴之第四女，横滨基督教会所设共立女子中学毕业生，长于音乐文艺，迭任广州各学校音乐教师有年，生子女各一。少穆就义后六月，粤局一变。民党耆宿黄明堂、钟荣光、李福林、谢英伯等乃联合全粤各界及华侨各社团，于十一月八日开朱少穆追悼会于民教会，莅会者千数百人。少穆遗族更具呈蒋委员长请求昭雪，兹录载原呈如下：

呈为违法残杀，惨无人道，恳请昭雪，准予抚恤，以慰忠魂事。窃氏夫朱少穆乃兴中会同志，早岁留学东瀛，攻法学及军事诸科，笃信主义，矢志忠贞，恬淡成性，不居功利，厕身革命，艰险备尝。当云南河口之役，广西镇南关之役，均从事宣传筹饷工作，宵旰奔驰，不遗余力。迨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清社既屋，遂由先总理及黄克强、陈英士诸公联电日本同志，嘱令分别筹饷购械，完成北伐大计。氏夫夙抱热忱，请自隗始，先捐千余金为之首倡，登高一呼，输将踵接。继续在横滨征数万元，携带回国，挹注饷糈。同时并号召华侨同志百余人，参加北伐，旋先总理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府南京，委氏夫以秘书之职。民二袁氏盗国，遣爪牙龙济光踞粤，极端仇视党人，氏夫一本素志，毫不畏葸，威逼利诱，皆不屈服，后以乱党加之，逮捕下狱。系囹圄，受酷刑者数月。自分以身许国，早置生死于度外，虽罹狂狴之苦，处之夷然。嗣由粤中大绅易兰池、港商冯香泉等多方联保，始获开释。虽得脱险，不因是稍隳锐气，再接再厉，仍本奋斗精神。如民五之讨袁驱龙，民九之讨莫，民十一之讨陈诸役，均躬与其事，不遑宁处。遭遇艰难困苦，绝无怨怼之言。在党历悠久时期，不敢存微幸之想。至民十二大理院长赵士北，委充澄海地方审判厅厅长。徒以逆氛未靖，法治难期，视事不久，解职而去。自民十二以还，执业律师，不预外事，意谓革命大业已告成功，得瞻郅治，仔肩可卸，从此韬光息影，宁作承平之民，原冀与世无争，得保首领以殁。何图天不谅只，横祸突来，冤抑莫伸，竟有超出法理常情之外者。粤自军阀肆虐，荼毒生灵，割地自封，蔑视党纪，措施徒为民病，治理大乖輿情。氏夫忠耿为怀，弗畏强御，主持正谊，致触淫威，乃于本年三月七日上午一时，以莫须有遽加逮捕，在公安局拘禁四十九天，不许家人探望，身羁縲绁，备受毒刑，勒逼伪供，周内其罪。当经各同志营救无效。复由胡主席展堂暨各元老力予保释，阳虽应允，阴置弗恤。驯至四月二十四日

下午四时秘密提刑，横杀郊外，翌日始悉，在丛葬中收尸成殓。（下略）理合将被害事实，连同照片三张，备文呈请查核。伏乞俯赐昭雪，准予抚恤，以彰正谊，而慰忠魂，泉壤有知，亦当鳌戴大德也。临呈不胜哀恳待命之至。谨呈委员长蒋。计呈照片三张。朱赵竹子偕子永年女美和泣呈。

未入革命党前之胡汉民

胡衍鸿，字展堂。乙巳（一九〇三年）东京《民报》出版，别号汉民。丁未（一九〇七年）居越南河内，易名陈同。原籍江西吉安，与文廷式有戚谊。乃祖随宦至广东番禺，遂家焉。幼失怙恃，有兄弟七人，仅存其三。长兄衍鹗，字清瑞。七妹灵媛，汉民行列第四。家贫，刻苦攻书，时赖书院季考奖金以自给。与衍鹗同蜚声文坛，汉民尤才气纵横，词锋锐利，为士林所重。某科乡试获中举人。广州府陈望曾慕其文学，聘充府署西席。粤垣《岭海报》则延任总主笔。某岁借卖文得售，获资万金，家道渐以丰裕。庚子（一九〇〇年）后粤中新学渐兴，汉民饱读书报译本，以提倡新学自任。某岁元旦日尝大书门外春联曰：“文明新世界；独立大精神。”见者多视为怪物。辛丑（一九〇一年）壬寅间女医士张竹君在河南南福医院开演说会，倡办育贤女学，为广东女学之先声。一时新学志士多奔走其门，隐然执新学界之牛耳。汉民与程子仪、朱通孺三人赞襄最力，《岭海报》不啻为张之宣传机关。同时杜清持女士亦设培英女学于西关。某日《岭海报》所载来稿忽有杜清持程度高于张竹君一语，张大不怿，爰向汉民质疑。汉民以手民误排答之，张不能释然，友谊缘是疏远。壬寅（一九〇二年）陶模督粤，派吴敬恒带领学生数十人赴日本学习速成法政，以一年为期。汉民及詹宪慈、冯鸿若、周起凤等预焉。时余方肄业东京早稻田大学，且任旅日广东学生同乡会会长，闻有同乡学生多人来，乃亲至横滨码头接待，并述代表同乡会欢迎意旨。新来诸生均长袍大袖，辫发垂垂，见余衣和服，咸以为异。余导彼等至高野屋旅馆。汉民与余虽非旧识，然彼此相知有素，故谈论时事，甚形欢洽。汉民曰：“余读《新民丛报》多册，久久莫知梁任公宗旨所在；及读新小说载梁著《新中国未来记》，中有假托激烈派李去病问答辞一则，可知任公宗旨仍在民族主义，与其师康有为根本不同”云云。余应之曰：“任公虽假托小说中人物宣泄其政见，然既称为急激派议论，而仍声声歌颂光绪圣明（亦假托李去病语），可谓自相矛盾，吾人不可被其瞒过。”汉民深以余说为然。莅东京后入宏文学院。校为嘉纳治五郎所设，范源濂等任译事。是年八月清公使蔡钧商请日政

府取缔中国留学生，吴敬恒在使馆抗争最力，蔡乃请日政府以警吏逐吴离日。留学生愤而归国者数十人，汉民其一也。余送汉民至横滨船埠，尝以改良《岭海报》一语勸之。先是汉民于东渡时，特将《岭海报》总主笔一席委托其兄衍鸢摄理。衍鸢赋性顽固，不知新学为何物。是年十二月除夕，洪全福、李纪堂、梁慕光等谋起义于广州，以事泄失败。衍鸢竟在《岭海报》大放厥词，连篇累牍，痛斥革命排满为大逆不道，香港《中国日报》著论驳之，双方笔战逾月。时汉民已由日返粤，民党中颇有责汉民不当任其兄猖獗至是者；然汉民自少即事衍鸢如父，固无制止之能力也。癸卯（一九〇三年）汉民堂弟毅生因广东大学堂风潮退学东渡。是年秋总理自安南莅日本，余乃介绍毅生及粤籍学生桂少伟、黎仲实、朱少穆、张崧云、廖仲恺、伍嘉杰、卢少岐、何香凝诸人与总理相见。未几总理约日友日野熊藏少佐秘密组织革命军事学校于青山。学生从学者有毅生、李自重、黎仲实、桂少伟、伍嘉杰、卢少岐、郭健霄、李锡青、刘维焄、区金钧、卢牟泰、饶景华、翁浩、郑宪成等十四人。此校开设半载，以内哄宣布解散。甲辰（一九〇四年）粤督岑春煊派学生至日本法政大学学习速成法政，以二年期毕业。汉民于是二次东渡，同行者有×××、朱大符、金章、陈融、叶夏生等数十人。毅生时任横滨华侨学校教员，因介绍汉民与横滨民党梁慕光、廖翼朋等相识。乙巳（一九〇五年）六月，总理从欧洲东归，与余及黄克强、陈天华、程家桢、宋教仁等发起中国同盟会。是日毅生介绍加盟者，有×××、朱大符、李文范、张伯乔、古应芬、金章、杜之秋、张树棠、姚礼修九人。汉民适以事偕廖仲恺返粤，故不预焉。同盟会成立后十余日，汉民、廖仲恺同返东京，即宣誓入会。是年七月十三日留学界开大会欢迎总理于麹町区富士见楼，莅场者一千三百人。总理演说声低，汉民为之传译。时总理以旅费告罄，向同志求助，汉民慨捐百元，同盟会所设《民报》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汉民与×××、朱大符同任笔政，汉民之名见于世上自此始。

未入革命党前之胡汉民补述

胡汉民于壬寅年（一九〇二年）游学日本，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不数月，即以吴敬恒等向清使馆争送私费士官学生事退学返粤。是年除夕，洪全福、李纪堂等谋起义于广州失败，其兄清瑞（衍鸢）时代汉民任《岭海报》总主笔，对于革命排满大肆攻击，与香港《中国报》笔战者逾月。民党中人以汉民人极开通，何致令其兄猖獗至是，颇有怀疑之者。查汉民自日本返粤后，次年癸卯

(一九〇三年)以梧州中学监督沈雁潭之介绍,充任该中学教员,主讲国文修身等科。全校学生九十余人,皆由招考而来。汉民素擅辩才,思想新颖,议论风发,全校翕然宗之。有时谈论时政,语涉激烈,则再三告诫诸生曰:“现时官吏耳目众多,文网周密。吾等议论时事,只能宣之于口,万不可形诸笔墨,致授人柄。”未几桂抚议设师范学校于梧州,校址在苍梧传经书院,仍以沈雁潭为监督,汉民亦任教席。开学之后,梧州知府程道元常以管学资格到学监视。每次来时,例必开道呼喝,且须开放中门延接。沈雁潭厌其烦,特将兴学上谕张贴正门。自后程来,门乃不开,程衔之。时有顽固绅士数人,怂恿程守解散中师两校,程许焉。遂以提倡革命诋毁孔孟不敬上谕等罪名,指捏汉民于两广学务处张鸣岐。两校生徒愤程破坏学务,亦举代表十人赴粤。控其玩视新政,蹂躏教育。程愈羞愤,竟电粤诬指学生代表为革命党,请杀数人以平风潮,鸣岐乃调阅汉民在两校所主各科讲义,觉无只字与革命有关者。时岑春煊任两广总督,颇以兴学自负,因严电程守,称胡某所编讲义查无一字与革命有关,该守何以昏庸聋聩,颠预至此?着记大过一次。两校仍应照常办理,毋得率渎等字样。代表等以所控得直,遂回梧听候复课。惟沈雁潭已于一月前调充桂林高等学堂监督。汉民骤失奥援,知无可为,遂辞职返粤,学生亦相率退学,两校为之一空。归广州后,间助其兄编辑《岭海报》。时《羊城报》记者莫任衡有《驳女权论》一文,汉民因与女医士张竹君相善,张素以提倡女权自命,汉民乃访《亚洲报》主笔谢英伯,相约拥护女权,同向《羊城报》反攻,英伯极赞成之。甲辰(一九〇四年)复就香山隆都中学校长之聘。任职数月,适粤省有派遣日本速成法政生之举,遂再东渡留学,时年二十有六云。

胡汉民之谐诗

胡汉民有辩才,善诙谐。余嘲之曰:“糊糊涂涂。”彼答余曰:“冯冯翼翼。”戊申(一九〇八年)居新加坡时,尝撰谐诗一律赠邓慕韩,至今犹传诵人口,诗云:“铜山万壑果然真,发梦忘魂意气伸。旧日师爷称绰号,近来皇帝是乡亲。缩低铁甲方无敌,吓走金表大有人。最恨爱莲贤伉俪,不堪此地更维新。”第一句指邓通,誉慕韩祖先之富。第二句,慕韩屡语人谓人生以梦遗为第一快事,因既可省却金钱负担,又可获得真正享乐。第三句,慕韩向有师爷之称。第四句,谭发素有帝王思想,世人多以皇帝呼之。慕韩与谭同属三水县人,故曰乡亲。第五句,慕韩深叹近代各国海军不解将舰体缩低之法;若预先缩低至水平线,而后

突然向敌舰猛撞，则必所向无敌云。第六句，述丙午年（一九〇六年）某日东京同盟会开干事会，有吴弱男、吴亚男姊妹至党部谒总理，衣洋服，挂金表，以英语向总理详谈，娓娓不休；迄摇铃声动，二女仍不告退。慕韩乃手持价值二百余元之大金表，告总理以开会时刻，二女始匆匆兴辞。慕韩谓此举全靠大金表吓走小金表之力。第七句，慕韩夫人号爱莲女士，而新加坡有娼寮曰“新爱莲”。慕韩因之大有异地怀人之感，故云。

《中国日报》征联之大观

戊申（一九〇八年）十月清帝载湉（光绪）逝世，溥仪以冲龄继位，改年号曰宣统。香港《中国日报》所刊己酉（一九〇九年）之月份牌附联曰：“汉家何日重颁历；满族于今又改元。”为记者陈春生手笔。是年春清摄政王载沣重用满宗室良弼、舒清阿、凤山等，厉行排汉政策，时《中国日报》特向阅者征联求教。联首为“未离乳臭先排汉”，乃朱执信所拟。盖谓溥仪尚未脱离乳臭年龄，即已实行排斥汉人也。《中国日报》于本报读者征求之外，更同时委托海外各党报，如新加坡《中兴日报》，槟榔屿《光华日报》，缅甸仰光《光华日报》，檀香山《自由新报》，旧金山《大同日报》等，代为募集，故海内外应征者极形踊跃，统计所收对联在十万以上。余与朱执信为初选鉴定人，再四审阅，第一次入选者约二千名，最后由×××、胡汉民二人评定甲乙，仅取录二百名。首名为“将到毛长又剪清”，乃香港刘一伟所投，次名为“横扫膻腥独立旗”，乃南洋挂拿比胜埠邓泽如所投，殿军联为“一洗辫污大革新”，第五名为“才近脂香已醉人”，第十名为“自出心裁不让人”，此外更有“宁使身糜不帝秦”，“甚至牙科亦举人”，“最惹魂消一转波”，“巧画眉纤善媚妻”，“饱载腰缠尚剥民”，“鲜听鼾喧竞扰邻”，“倍觉神伤独倚楼”，“欲博头衔远出洋”，“力斩颜良不仕曹”，“既扯皮条又捉奸”，“不学头尖莫作官”，“擅弃膏腴曰媚夷”，“大筑颐和苦病民”，“永矢心诚共复明”，“渐减容光总为郎”，“厚敛脂肥假振华”等句。余多不复记忆。又缅甸仰光《光华日报》亦征联曰：“摄政王兴，摄政王亡，建虏兴亡两摄政。”系记者吕志伊（天民）所拟。其冠军联为“驱胡者豪，驱胡者杰，汉家豪杰再驱胡。”亚军联为“出师表前，出师表后，武侯前后六出师。”殿军联为“兼桃子成，兼桃子败，清朝成败二兼桃。”以上联对仗不易，故鲜佳构。

《中国日报》与菲律宾清领事涉讼记

清季旅菲律宾华侨与革命党发生关系最早者，为郑汉淇、杨豪侣、欧阳鸿钧、何宝珩、林日安等数人，除欧阳及何外，余均闽籍。郑汉淇与孙总理在香港雅利士医学院同砚，在小吕宋以行医致富。辛亥间，（一九一一年）创刊《公理报》于小吕宋卡路根打拿街四百〇九号，为菲岛革命党机关报之嚆矢。杨豪侣生长广东，其父名汇溪，经商菲岛数十载，弱冠留学日本，与余同肄业早稻田大学。夙有志革命，癸卯（一九〇三年）以参加拒俄义勇队，横遭日政府及清公使干涉，愤而弃学，乃之菲岛，改营商业。丙午（一九〇六年）康有为使其徒徐勤至小吕宋开设保皇会，杨乃号召闽、粤二省同志谋破坏其事。某日徐勤召集其党徒假座广东会馆开会，杨与欧阳鸿钧、何宝珩、黄汉杰、郑杰等十数人登坛演说，痛言君主立宪之不足恃，及康党历来借名行骗之罪状。听者大为鼓掌。此会遂不欢而散。杨知是时香港《中国日报》由余主持，乃介绍广泰昌商店东主香山人欧阳鸿钧及日安布店东主林日安为驻菲报务代理，复与欧阳同担任《中国日报》义务采访员，于启迪侨胞知识，及倡导民族主义，深资得力。时清政府新派杨士钧任驻菲总领事，士钧人极腐败，毫无新学思想。当其由香港乘船至曼尼刺（小吕宋），食餐时侍役以牛酪（即支土）捧进，士钧误以为香硷，竟取而涂诸手上，就盥手之水中抹擦，举座人士为之大笑。有同舟之侨商王华彬目击其事。及抵任后，其妻妾每日临窗梳头，大开牖户，一任游人纵观。士钧则坐妆台前饱餐姿色，虽中外人士聚观如蚁勿顾也。《中国日报》遂据驻菲访员通信从实揭载，士钧读之老羞成怒，乃托港商吴理卿延律师要求《中国日报》更正，否则须在法院控告赔偿名誉损失。《中国日报》即以目击此事之华侨王华彬数人为证，依法答复之。士钧卒不敢逞。杨豪侣于辛亥革命前归国，参加福建革命运动后，供职闽省政府，不数月以病去世。欧阳鸿钧以营业失败，回粤赋闲已有多载，近年始至南京依其子以居云。

李煜堂事略

广东著名大商辛亥革命时期曾任广东财政司长的李煜堂先生，已于二十五年

元旦日逝世了。他不但是一个有信用有魄力能令世人敬佩的老商人，而且是热心公益乐善不倦的大慈善家，又是富于革命和进取性，四十年间始终不懈的革命同盟会会员。他的生平事业和一切经过，我因为同他有戚串的关系，所以知道颇为详细，兹先将其事略简单的记述如下：

李先生名文奎，字煜堂，粤之台山县人。兄弟七人均经商美洲致富。煜堂行列第四，年十八即随其兄出洋，数年后积资返香港，创设金利源、永利源两药材行。甲年中日战后，好浏览中外书报，以国势阽危，非振兴新工商业不克自存，遂热心投资于各种新事业，先后经营广州电力公司及河南机器磨面公司，泰生源进出口货行等。以经验缺乏，旋起旋蹶，而其志迄不少衰。壬寅（一九〇二年）以香港水火保险业权操外人之手，国人利权外溢，每年损失不貲，遂联合香港华商出入口货行及药材行百数十家，自行互相保险，榜其名曰联益公司。举力经年，而成效大著，同业洋商嫉之，屡图破坏，而无如之何。旋复创设康年人寿保险公司，为吾国人自办人寿保险之滥觞，成绩亦大可观。由是先后组织联泰羊城联保三保险公司，分店遍设国内各口岸及南洋群岛，时人咸以保险大王称之。乙巳（一九〇五年）美国宣布禁止华工入口苛例，粤人冯夏威夷自杀于上海美领事署前，以儆国人，举国大愤，咸揭抵制美货相号召。先生乃联络广州、香港工商学报各界成立拒约会，以为后援，港上美商患之，爰托律师何启出而和解，即世称十二条款者是也。先是先生于庚子（一九〇〇年）尝遣其子自重留学日本，自重缘是结交革命党诸志士，共筹光复大计。乙巳八月东京同盟会本部成立，自重与其妹婿冯自由同受孙中山先生委任归国推广党务，设置分部于香港、广州、澳门各地，先生率乃弟文启慨然加盟。丙午（一九〇六年）革命党惟一机关之《中国日报》为清吏及保皇党人倾陷，势濒歇业，先生徇陈少白、冯自由请，斥资承购该报，而使冯自由主其事。自丙午以迄辛亥，此革命枢纽之赖以维持不堕，实以先生之力为多。及庚戌（一九一〇年）正月，广州新军反正失败，国报受当地政府严密监视，先生乃改以其数十年老店金利源药材行为交通机关，辛亥三月二十九黄花岗一役以迄民元南京政府建立，所有海外党部汇输款项概由该店收解，间有同志假该店贮藏危险物品，店伙震骇，先生泰然处之。辛亥广州光复，先生被推任财政司长，民军所在哗噪，先生在港一夕而筹饷八十余万，饥卒乃就抚听命，库储亦以次就理。在职六月，洁身而退。自兹以后，乃专心从事开发实业，所经营者，除各保险公司外，尚有广东银行、新新百货公司、汉口穗丰纺织公司、哈尔滨置业公司等。更以余力用之于教育交通公益诸事业，如广州岭南大学、执信学校、公医学校、青年会学校、纲纪慎学校、宁佛铁路、内河轮船公司、广肇医院等，辄普加资助提挈，乐观其成。而对于国事仍一日不能去怀，民五讨袁之役、民六护法之役、民九讨莫之役、民十及民十二北伐之役、均尝联络港商，筹集饷糈，为孙中山先生之助，民二十年九一八祸起，先生应征为国难

会议议员，屡与尤列等向当局电陈救国御侮方略。民二十一“一二八”淞沪之役，复向港商募集巨款，接济义军，先后汇沪者百数十万元，因日夕奔走，积劳成疾，数濒于危。民二十四秋间，广东银行以世界不景气，百业凋敝，因而周转不灵，驯致歇业。先生百计匡救，力图规复，各债权人咸为感动，复业之议遂定，而先生竟以是忧瘁成疾，卒致不起。弥留时犹萦怀国事，殷殷问日军进占至何地，并嘱告当局勿忘东北四省，时为民国二十五年一月一日。享年八十有六。

以上不过叙述先生生平事略，而于先生的德性品行及种种过人的特长，尚未道其十一。今更根据事实，就其一生对于个人社会国家之德性分别述之。

一曰和平谦让 先生处世之宗旨，以和平及谦让为第一义，其训迪子侄，不外夫此。而实行之方法，则在夫“肯吃亏”三字。尝对后辈曰：“凡有大小争端，如肯互相让步，无不可和平解决，对于小权利，若能常常让人，则一旦有大权利在所必争者，我如坚持力争，对方因平时得我给予种种便利及好处，在情面上及良心上，自不能不表示相当之让步，此即我所以制胜之道也”云云。以故乡人或社团遇有纠纷事件，辄邀请先生出而调解，凡经先生斡旋者，罔不争讼立息，言归于好，故有和事老之称。台山人多迷信风水，往往因尺土片壤，涉讼数十年，经先生一言而相让息事者，指不胜数。民党先进陈君少白于民元解职广东外交司长后，在香港改营商业，先生荐其任粤航轮公司经理，陈君一日语先生曰：“吾精通中英二国文字，学问辩才均远胜公，何以每遇商店或社团有事时，人多不纳吾言，而独惟公言是听，公果有何术而致之乎？”先生对曰：“学问愈高深，则利害之见愈分明，而对于凡百事件皆不肯吃亏。君之才能，我所敬佩，但事事不肯吃亏，人遂不能得君如何好处，又何能听君之言。我因学问百不如人，只有事事谦让，以获人望，而补不足，若君亦如我之好让，而无利害之见存焉，世间尚有我辈啖饭地乎？”闻者咸奉为至言。先生之到处受人敬礼，殆以此故。

二曰好新进取 先生最迷信维新事业，尤喜结纳维新党人。庚子以前粤中新工商业寥寥可数，闻廖君凤书（廖仲恺之兄）言广州电力公司大有可为，遂投资其间，自任总办，而以凤书为司理。以乏于经验，不及一年，即贱售于英商祺昌洋行。此外投资者，如河南磨面公司、泰生源出入口货行等，亦次第歇业，所失不资。至壬寅发起联益保险公司，继复组织康年人寿保险公司，创吾国保险事业之新生面，而成效始渐显著。在联益公司成立之前，华商营保险业者已有数家，然以经费浩繁，收支不能相抵。先生鉴于往辙，语人曰：“吾国人对于保险事业，既缺乏此种学识及经验，决难与外商竞争，只有节省经费一法足以胜之。彼外商皆租用大洋楼为事务所，雇用职员之薪金，动辄月支千数百元，耗费极巨。我如只设一小写字间，职员概支微薪，年终有利始优给奖金，虽较外商获利稍薄，然每年所需事业费，仅及外商十之一二，此种比较节减之经费，即为我之

赢余，可以操券而得。”友人咸服其言。先生自此陆续经营保险公司多家，即本此旨。又先生对于乡村迷信陋俗，恒排斥不遗余力，在未崇奉基督教之先，已不许家人拜祀偶像。壬寅，其家人营建一新屋于台城龙舟里，台俗新居落成典礼，已嫁女儿不许入门参加，乡人坚持旧习，先生斥为野蛮，力打破之。因使其子自重再留学日本，其崇新黜旧，于此可见一斑。

三曰爱国不懈 先生少具爱国思想，尤热心革命排满，乙巳年领导粤港工商报学各界，组织对美拒约会，为国人抵制外货之先声。丙午，香港《中国报》被保皇党叶恩康同璧等控告，涉讼经年，时《中国报》隶属于文裕堂书店，文裕堂以营业不佳，势沦破产，《中国报》受连带关系，以致讼费不继，有为敌党掠夺之虞。先生不忍此革命喉舌为之中断，慨然斥资向文裕堂承购该报，使免遭败讼拍卖之厄，复辛苦支持报中度支者六年。辛亥九月粤省光复，先生率港商林护，吴东启等数十人随胡君汉民入粤。众推汉民任都督，先生任财政司长。时各路民军云集省垣，往往持手枪炸弹以强索军饷，先生惟以公忠自处，绝不为威武所屈，民军首领感其诚悃，咸帖然就范。及民元二月统一政府成立，先生以从政非其所长，率先引退，仍至香港重理旧业。无何，袁世凯篡国称帝之真相暴露，各省民党日谋匡复，群向先生求助，先生辄解囊应之。间有意存奢望，以倾家变产为请者，先生曰：“余之救国为持久性的救国，余家人口至夥，负担极重，故不能如吾族人李君海云之孤注一掷，只可量力源源接济，此后余报国之机会至多，余职责所在，决不后人”云云。盖庚戌正月广州新军反正之役，李君海云时在先生所设之金利源药肆，私营美洲华侨汇兑事业，因军饷紧急，遂席卷存款二万余元，以助义师。事后屡受股东究诘，赖先生平停息事，故云然也。自时厥后，孙中山先生所进行革命事业，如民六海军护法之役、民十及民十二出师北伐之役，先生皆号召港商募集巨款，为军政府之助。民二十一“一二八”之役，港侨捐金赴义者为数不下二百万元，且发起全港工商界每月自动的缴纳所得捐若干，至罢战日为止之议，实先生倡导之力。先生所谓持久性的救国，此言益信而有征矣。通观四十年来一部商人的革命救国史，关于个人募款最多者，乙未广州一役为黄咏商，庚子惠州及壬寅广州二役为李纪堂，丁未镇南关一役为曾锡周、马培生，庚戌广州新军一役为李海云，民五讨袁逐龙一役为简让之、林晖廷，讨莫荣新一役为杨西岩、郭民发，讨陈炯明一役为伍学幌、杨西岩，除曾、马外，俱属港商，或为力量的时间性，或为禄位的投机性，或为权利的条件性，独先生始终不务权利禄位，宣劳仗义，死而后已。“一二八”之役，更日夕向港侨演说募捐，至于声嘶力竭，病几不起。求之海内外商人能具此持久性的救国成绩者，殊不多觐。

四曰乐善好义 先生每年恒划出其收入之一部为公益事业补助金，如教育事业，私立大中小学校之赖其资助者十余所。慈善事业，则对于其穷困亲族按口分

别津贴之外，每年协助国内外医院之经常费，为数不赀。晚年因所营商业不振，收入顿减，其子弟中有以减少慈善捐款为请者，先生曰：“余之素志，即好善不倦，虽节衣缩食，而此项捐款万不能减。”于是核减家人月费，以为慈善费之补充。病笃时，犹切嘱其后人对于历年捐助之各项公益补助金，勿予中断，此亦持久性的好义，尤属难能可贵。

五曰洁已奉公 先生任财政司长者六月，维时变革伊始，餉糈浩繁，粤政府尝二次向港商借款，许以借一元还两元之利益。及偿款期届，先生乃劝港商体谅政府困穷，减收息金半数，港商咸无异议。其后廖君仲恺继任司长，因协济北京政府政费，特向港商募集有奖公债一百万元，詎因民二讨袁军起，龙济光战胜入粤，此债卒未清偿，港商至今犹啧有烦言也。先生自谓身为商人，只知持筹握算，绝不明了国家之财政大计，彼之肯担任财政官吏不过尽党员之责，在革命过渡期间偶一为之而已。革命党官吏与清朝官吏不同之点，即是革命党不要钱，而清吏则贪污要钱，若革命党亦要钱者，则吾人何必革命。故当时有谣传先生卖缺好货者，先生即愤然向胡、陈二都督辞职，经胡、陈力劝，始允暂任数月。先生于解职后，尝语余曰：“余在职六月，除应得俸金外，曾先后于港商借款总额中占有四万元，偿还时除本金外，得息金二万元，此即余一行作吏之所得”云云。民三、四间，先生尝有与同志建筑商林护君互谈交换财产之趣事，盖先生与林咸谓已有财产不满十万元，故提出彼此易产征信之一法，及后核查所值，乃知先生财产不及十万，而每年所得各公司发起人特别奖金之数远在十万财产利息之上。林护财产约十数万，而所获年息仍不及先生所得，遂一笑而罢。此事后为胡君汉民所知，恒引为笑谈。粤金融界惯以操纵银毫纸币为投机事业，有好友淡友之分，先生于纸币低跌时？辄以银毫吸收纸币，借以调剂市价。廖君仲恺语之曰：“此乃市侩行为，殊不合财政学原理，世界各国亦无此政治。”先生曰：“吾本不谙财政学，只有恃此法以救济市面而已。”然廖后长财政，固亦不得不袭用先生之方法也。先生卸任之后，尝解私囊，耗资七百余元，印布任内一切度支单据表册征信录，分送国内外各社团，以示廉洁之模范，粤人咸称颂不置，此真革命商人掌理财政之别开生面者也。又去年秋，广东银业歇业之前，先生知该行财政拮据，特将牯领洋房及各大公司股票贱价脱售，以清偿所欠，结果虽不能挽救危急，然其公以忘私之热诚，一般债权人莫不深相敬佩。以视世间借破产或亏折以渔利之市侩，相去何可以道里计耶？

六曰苦志毅力 先生对于一切邪癖恶习，均深恶痛绝，弱冠在美国尝染阿芙蓉癖，归国后决意戒吸！然戒一次即大病一次，三十五年中屡戒屡吸，而其志不馁。亲友中虑其因此丧生，多劝其不宜固执，陈君少白亦以此劝之。先生曰：“吾日向社会各界提倡改革，若仍浸染恶癖，何能自圆其说？”遂毁弃一切烟具，带病戒之，至五十五岁始获成功，而体魄反因之日健，连续添子女十一人。世有

借口年老不能戒烟者，诚不可不以先生为法也。先生亲友中有以贩卖烟土及开赌致富者，尝劝先生附股其间，谓可操券而获巨利，先生谓身是维新人物，虽渴不饮盗泉，始终拒绝其请，如先生之苦志毅力，洵可风矣。

如上所述，均为先生之嘉言懿行，大足为世人取法。尚有一节，则为忠厚待人。先生生平商业上失败之历史亦有多次，每次均以用人不慎，被侵蚀巨款，而致影响营业，识者咸谓其过于忠厚所致。然先生每经一次失败，仍泰然自若，淡泊处之，恒语人曰：“金钱是世界公物，得失何必介意。”此其所以能享修龄，而急公好义老而弥笃也。民二十，国难会议议员在上海开预备会，先生预焉，熊君秉三尝叩先生以何道而获高寿，先生曰：“吾一生以和平为旨，凡事皆以和气解之。”所谓和气致祥，其在斯乎！

庚戌新正广州新军反正记

河口败后之革命党 同盟会自云南河口一役失败后，以收拾余烬，元气大伤，各领袖如孙总理刚再游欧美，黄克强及谭人凤则东渡日本。从戊申（一九〇八年）五月至己酉（一九〇九年）初冬，对于内地之军事行动，殆有完全停顿之势。惟香港及广州等处党务，则反因此得以聚精会神，而大为发展。香港分会及广州机关均气象一新，而同盟会南方支部亦于己酉冬成立于香港黄泥涌道。赵声、倪映典均因遭粤督疑忌，先后失职。赵居香港，而倪则留省，专任运动新军事务。先是党员张谷山、姚雨平等曾于丁未春着手运动防营反正，兵士附和者颇不乏人。至戊申冬，复有葛谦、谭馥、严国丰、黎萼、罗树沧、曾传范、钱占荣诸人在营伍中散放票布，宣传革命。事泄，葛、严、谭三人死之，黎、罗、曾、钱等被捕系狱。军中军队受其感化者，络绎于道。及倪继续进行，成效更著，至是年冬事机渐熟，因有克期大举之计划。

倪映典略历 倪端原名映典，字炳章，安徽合肥人。先世赋性高旷，不乐仕进，至倪父某以医术行世。倪幼习父业，至庚子年目睹时艰，即慨然以天下事为己任。甲辰（一九〇四年）弃医业，投身安徽武备练军学堂，冀练一军人资格，以为国民用。毕业后，复入炮兵学堂。丙午（一九〇六年）为江南炮兵营将校，军事学冠侪辈，尤以马术名闻。丙午冬萍乡兵起，江西清吏乞援南京。倪挺身请往，冀萍军势有可为，遂乘机以为助也。及抵萍，见大事已去，从此益加悲愤，吞灭胡虏之念，时流露于辞色间。戊申年皖吏调倪任骑兵营管带。时熊成基等正组织同志于军队中。倪往，气益壮，盖熊固倪同学，而在江南时，倪切磋之益为

最深者。旋倪为满督端方所觉，电至安徽询索，将不利于倪，倪遂不能安于皖，易名而走粤，即至香港《中国日报》访冯自由，正式加入同盟会。旋投身军队充炮兵见习官。未几，安庆马炮营反正，倪以在粤未得身与，时以为憾。既而为炮兵排长，演说复仇主义，声泪与俱，同袍将士，多为感动。倪以渐见疑于当局，乃辞职出，亲赴香港谒同盟会机关部诸首领，力言新军大部倾心革命，机会大有可为，请香港同志担任筹饷，而彼则愿在省积极谋发展。赵声等深韪其议，谋遂定。

新军入党之踊跃 倪受任后，先在香港《中国日报》领取《革命先锋》、《外交问题》、《立宪问题》等小册子万数千册，散布军队中，以广宣传。新军兵士大都通文字，感化最易，一二月间收效至巨。继设机关于城内天官里五号、雅荷塘六十七号、木排头宜安里、清水濠等处，使营弁巴泽宪、方紫柅、张立璧、陈哲梅、谭瀛、易培之、黄洪昆、王占魁、江运春、翁锡亮、甘永宣诸人分头运动。复由香港《中国日报》印制同盟会小盟单万张，携至省中各机关，令各兵士举手宣誓，每逢假日，则在白云山濂泉寺演说革命，三标兵士趋之若鹜，鼓掌如雷。十月间有一标三营罗嗣广探知其事，取得盟单一纸，持告协统张哲培。张遂急向粤督周馥告密。周大惊，令张立将盟单付诸一炬，且切嘱勿传播于外，有彼此均有不便等语。排长巴泽宪即因此事逃避香港。

各地响应之准备 倪映典以时机已熟，迟恐生变，复亲赴香港提议从速举事，赵声等均赞成之。遂电美国，请孙总理筹二万元应急。一面电邀黄克强、谭人凤来港，共策进行。旋得总理复电，谓款可筹划足数，并令积极进行勿馁。克强、人凤先后至港，鄂人孙武因事自鄂来粤，即在香港宣誓入党，谓鄂省已有共进会之组织，军界多趋向革命；如粤有事，鄂必响应。李书城、庄蕴宽自桂赴沪，过港时访冯自由于《中国日报》。李求见克强，谓闻粤中新军已有动作，现桂省军界运动亦极得手，最好两省同时举事，以分清军之势，可否延缓数月等语。克强托故不见，而使胡汉民代表见之。陈炯明时任谘议局议员，亦在广州入党。十一月间自粤赴沪开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过港有所闻，谓当从速返粤有所尽力。此皆是年冬间事也。

筹款及运械情形 形势日急，而孙总理所许二万元之款，仅由纽约、波士顿、芝加古三处先后汇交《中国日报》冯自由收八千元，殊不敷义师发难之用。众同志异常焦灼。党员中有李海云者，香港文咸街远同源汇兑业商店之经理也。闻起事需款，见义勇为，毅然将店内存款二万余元悉数献纳革命党，以供军用，已则逃匿河南大塘村，借避股东诘责。党部得此巨款，顿呈生气，于是在羊城各区分设机关多处，大肆活动。徐忠汉、胡灵瑗、林直勉、黄侠毅、方紫柅、李应生等税屋于宜安里等处，预备起事时纵火接应。孙眉、杨锡初及女同志李自平、陈淑子等则在香港湾仔东海旁街七十六号四楼冯寓日夕赶制青天白日旗，藏于卧

具中密运广东备用。洪承点、徐忠汉、李自平、陈淑子等担任密运炸药子弹等事，朱执信、胡毅生、李海云则驻河南大塘村，助民军首领李福林、谭义、黎广等为响应新军之筹备。至十二月下旬，海内外同志麇集香港、广州二地，大有弦满待发之势。

除夕闹事之真相 倪映典原与香港机关部约期于庚戌（一九一〇年）正月初旬发难。预定先由新军首先反正，而李福林、谭义、黎广、陆领等则率四乡会党扑城，以为响应。诂兵士中有因杀敌在即，不免志骄气扬者。十二月三十夜有二标三营兵士吴英元等以购名片细故，与双门底绣文斋书店发生争执。警察从而干涉，兵士不服。由是新军与兵士聚众互相殴斗。巡尉朱绍祥受伤。警兵将新军二人带去。二标统带知其事，派人前往保释，为一局警长所拒。元月一、二、三数天原为新军假期。初一早第一标新军数百人愤同事之见侮于警吏，各执械入城，将被逮新军夺回，并拆毁警局二处，伤警吏数人。粤督袁树勋闻变，立飭中协水提督道一府两县驰往弹压。惟新军均不听令，依然寻殴不已。高警道即命各局巡警卸去号衣，改易民装，照常站街，至是新军始行退去。

闹事后之兵变 广东新军向分三标：第一标驻燕塘，第二、三标驻北校场。第一标步兵三营另炮兵二营辎重及工程各一营，每营三百余人。其步兵营共扎一处，如品字营，炮工辎另扎一处，相隔不远。此标教练已四年，规制极为完备。除夕闹事者为第二标，而初一日夺回新军兵士及与警察大闹者为第一标，与二、三标无与。第一标又以步兵三营为首，其中炮、工、辎又非全数同意也。及初二日，协统张哲培及一标标统刘雨沛鉴于军警之闹事，遽将初二、三两日假期改为运动会，以杜止各兵出营滋事。是早各兵向标统要求放假不得，一标三营率先鼓噪，咸谓闹事者只二标，其不放假咎有应得；若一标亦不放假，殊欠公道。一时同声附和者数百人，遂同闯进炮、工、辎各营，搜获枪械并子弹一箱，且将空炮乱放以示威。时刘标统出而弹压，大声喝止无效，被伤头面倒地。张协统知事大变，由后门遁去。至十时先有步兵二三百人汹拥出营，旋有多数奔回大哄曰：“警兵派大队攻营，我辈当出御。”于是全标震动，无论同谋不同谋，皆纷纷束装，各执枪械负子弹，由燕塘炮、工、辎回营向城内出发。

子弹缺乏之原因 先是粤督曾得陆路提督秦炳直电，谓探悉新军多受革命运动，请严密防范等语，故二十九日已密飭各标统将枪内扳机并子弹解缴军械局，只留每营常备子弹一千粒、七营共七千粒而已。因是各兵士所夺获军械皆无扳机，不可用，乃复拥向炮、工、辎各营严搜。适各营正将扳机用马车载运进城，遂被夺去。惟各快炮均无子弹，枪弹亦缺乏。然已势成骑虎，不得不冒险前进。袁督闻警，疑有革命党在内主持，令将城门关闭。满将军都统均亲督旗兵巡城。新军列队到东明寺，闻城门已闭，遂退往城外山场，及往来于二标三标之间。

东门之战 省中各军官以事势危险，乃在督练公所会商消弭之法。适陆军小

学总办黄士龙因事到省，各军官以黄曾任一标标统，且得士心，遂推其出任劝解。黄赴东郊痛切演说，众皆无辞。黄劝即携械返燕塘，有数兵士言我辈尚有数十兄弟在东门外附近，既同出亦应同归。黄允其请，带数兵士向东进发。詎旗兵不许通过，并放枪轰下，伤五人。黄总办亦中枪，弹伤右臀大腿两部。新军黄毓璜重伤不治，张辅云、黄廷成、蒙某三人各受伤。新军闻黄总办伤重，忿恨填膺，遂向旗兵开战，互击良久，乃向燕塘撤退。并分兵一队向北校场，占据钱局后之小山及横枝冈等处。另一队占守东校场茶亭附近，预备翌晨与清军决战。是夜城中文武官吏大为戒严，旗兵运炮登城守御。都统守东门，将军守归德门，李准守北门。袁督并电催虎门各营暨陆提秦炳直率兵来援。省河兵舰亦巡弋接应。居民因各街道交通闭塞，一日数惊，但新军甚有纪律。沙河一带贸易如常，若无事然。

倪映典之决心 当军警闹事时，倪知事必因之破露，乃匆匆赴香港，与黄克强、赵声等重订发动日期，相约缩短时间，急图大举，而往返间新军之败露已无可弥缝矣。初一日下午，倪乘夜船返广州，初拟劝新军暂忍耐数日，勿遽暴动僨事。次早抵燕塘，见大势至此，知一发不可收拾，始毅然入炮、工、辎营，期挽救于万一。既入，全军欢呼，如获慈母。是早十时炮营管带齐汝汉尚站队演说，力劝各兵士勿为革命党诱惑。倪大怒，袖出手枪击之，齐连中三枪，立仆地死。队长胡思深因不肯反正，亦被倪枪杀，队长宋殿魁、李震均惊惧自戕，于是倪率全军俱出，向清军进攻。

牛王庙之战 初三日侵晨，水提李准统领吴宗禹率管带李景濂、太永宽、李得铭、童常标等各防营所部二千余人，由大东门、大北门、小南门三路进兵，并派孙树荣、周礼、李在灼、陈知本各委员出东门侦探。下午一时至淑德书院，见新军占据麻疯院附近山头，列阵以待。吴宗禹、童常标乃至军前，晓以利害，令即弃械归营，贷其一死。新军弗恤，司令倪映典身穿蓝袍，手持青天白日满地红之革命旗，方驰马督励前进。新军队长王占魁等亦出阵反说吴军归降，往返四次均无效。吴宗禹立饬所部，在牛王庙一带分占四山，以步队遮其前，而以退管炮队紧接其后。布置既定，全师俱伏山上，新军伏牛王庙之两小山脚。吴军别有一队从杨箕村进至黄冈包其后，遂各开战。倪映典亲率一军进至横枝冈，遇吴部管带童常标，二人同籍安徽。倪以童亦曾入会受盟，乃趋前劝其乘时反正。童等佯与接洽，忽一弹中倪头部，受伤堕马，满口流血，童等夹持至吴宗禹前，倪大骂不屈，遂遇害。两军剧战约一时许，新军每人不足一弹，无法补充，阵亡者百余人，遂纷纷向燕塘溃退。清军获胜，直追至沙河而止。是夜吴军在沙河驻扎。九时一标步队营起火，新军复出大队，用声东击西之法，向吴军直扑。吴军复用重炮击之，新军再败。吴军追至瘦狗岭，斩首三十余级。

新军失败后情形 清军于进攻时防新军西攻，先调兵五百守流花桥，五百守

长堤，以阻其西下之路，并调佛山安勇四百至省。秦炳直亦由惠州率大兵至，布置颇称严密。初四日新军退守白云山、石碑、东圃一带。清军分队四出搜剿，并向各路追击。是午并将一标二营烧去，以免藏匿。由是新军先后被获者百数十人，除由各军私自杀害之外，余均解送营务处审讯。中有头目易培之、王占魁、黄洪昆、江运春、尤龙标、苏美才、甘永宣等七人，俱直认起兵革命不讳。此外逃匿香港者百数十人，均由《中国日报》、《时事画报》等供应。

诸烈士之供词 营务处连日由赵臬及委员朱为潮向被获新军严讯取供，审出叛兵黄洪昆、苏才美、尤龙标，均高、肇两府人，司务长王占魁湖北人。此四名均认以革党混入军队图谋起事，各人领有革命飘布，刊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创立民国，保我汉民，矢信矢忠”等歌诀为记。新军内有倪映典为革命党干事员，全靠倪在营引诱各人入党。倪与孙文交通，时与往来信息，在香港设总机关。倪映典在城内天官里居住，谭瀛在城内雅荷塘居住，省城以他两人处为聚集机关。经已向香港购定步枪二千枝，马枪二千枝，每枝配码二百颗，另大战炮四尊。约定六月与各省军队同时起事。拟由小东门入城攻打将军署，焚杀旗街，专以扑满为宗旨，不扰害汉民。得了省城，攻广西，上湖南湖北，直攻京师。适遇警兵交哄，由倪借此鼓动，往一标、二标、辎重各营，约同反正，约共有千余人，同到协司令部迫取枪械，并取码子三箱，仅得一箱可用，有两箱是演操空壳码。先由倪迫挟齐管带同反，齐不允，立即杀毙。随迫宋管带，宋畏惧，即用枪自戕倒地。王、黄、尤、苏四人均为革党得力之人。当时初三早防营对仗，均有伊等分把路口。李水提派李、童两弁前来劝谕，被倪反骂汉贼，称此日为革党出世。李、童两弁回营，即开炮击剿。倪被炮毙，同场死者百余人，幸免者四处逃散。尤龙标初三败后潜逃戏院看戏，旋到许管带处被拿。王占魁欲往吴统带宗禹营被执，据称新军内入革党者居大半，将来军队必有再反正云云。

是月十八日，粤吏以王占魁等虽已定案，仍欲诱供革党内容，借资罗织，复提王等至饭厅，与之对坐。因谓之曰：“汝党在军界如何运动？”王曰：“每逢假期约定往白云山脚濂泉寺叙会，或数十人，或百余人，公推演说，以倪映典最为动听。有时拍案叫绝。费用由倪映典及谭瀛二人支出。”朱委曰：“何不以此处作演说坛，演给我听？”王即起言：“满洲占据我国二百余年，重视满人，薄待汉人，甚为不平，故我辈决意革命。”洋洋数千言。朱委曰：“革命后何人做皇帝？是否即孙文？”王曰：“择功之最大由众公举。”朱委曰：“公举后彼据为子孙世业奈何？”王曰：“可以众力攻仆之，务使成为完全民主国。”朱曰：“中国自大禹传子孙，何尝不善？”王曰：“否，历朝开国多属贤明，传及少子即为权臣窃柄，最易生乱。”朱委曰：“中国现在已预备立宪。”王曰：“此等伪立宪，特愚弄国民耳。”朱委曰：“汝辈自何时起运动？”王曰：“去春由香港总机关部运来同盟票，票内书明姓名年岁籍贯职业，交排长巴泽宪散放。十月为营内官长查出。十

一月改用红小名片，以威武二字编号，招得数十人入会者，给优等勋章。百人以上者，给特别勋章。”并用笔将票布及勋章形式字句写出。朱委曰：“福建平和县举事想是同党。”王曰：“恐未必然。”朱委曰：“宜安里起获之旗，是否汝等所用？”王索观旗式曰：“不知有此旗，但猜度或系孙葵、黄秀山所为。”朱委曰：“革党营制如何？”王曰：“略仿新军，惟惩办叛党最严。”朱委曰：“饷章如何？”王曰：“较新军为优，刻下经济未充，尚未发给。”朱委曰：“大清待百姓不薄。”王曰：“汝为清官，那得不云然。”朱委曰：“我将汝超生，汝肯悔过自新效力赎罪乎？”王曰：“宁死不能变宗旨。”朱委问毕，遂向袁督请示，卒由袁督赵臬等判处黄洪昆、王占魁、江运春三人以死刑，尤龙标、苏美才、甘永宣三人递籍永远监禁，其余分别监禁，或递解原籍。诸烈士供词以黄洪昆为最壮烈。照录如下：

黄洪昆供。现年三十一岁。清远凤塑村人。父亲黄德添。母亲已故。兄弟二人。弟名锦和。我居长。娶妻未有子女。光绪三十三年七月由黄士龙招入学兵营当学生。现在炮二营右队当正目。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二标有兵士入城。到城隍庙前取定刻名戳。以致口角争论。巡警上前干涉。后与兵士吵闹。打架伤人。巡警就把兵士锁获回局。当时我未有在场。不知闹事的人是何名字。及有人多少。正月初一日上午。二标的人拆烂警局。我亦未附和入城。是时尚未有变乱的意。迨二标的人来知会一标的人及工、辎、炮等营。谓被巡警欺凌。邀同前往报仇泄忿。炮营右队排长谭瀛于初一下午暗中知会前已革炮一营左队二排长倪映典。乘此机会鼓动起事。倪映典们因知新军入革命党者已居多数。有此机会易于鼓动。起事后响应立至。不日成事。又值初二日统领不许放假。兵士鼓噪。是日由一标官长及谭瀛纠合炮、工、辎各营传发命令。跟从未获的翁锡亮、钟善全。已获的甘永宣。督率前往协司令部。抢有空枪码两箱。又真枪码一箱。约三千颗。又到二标搜枪。未有枪码。后到讲武堂抢得枪十余枝。枪码一箱。亦约三千颗。前后共抢洋枪二千余。抢毕回营。欲把枪码分派。因各抢各得。多少不等。我有码子三十余颗。工程营约三百人。炮队两营约三二百人。一标三营三四百人。约共千余人。搜抢回来后。初二晚深夜时。倪映典到我棚内向我说。此时兵士已纠合。此等机会难得。记号平常用勇字号。某系特等。用何字记不清楚。前时拿获的葛谦、严国丰、谭馥均系革党中紧要之人。自伊们获办后。倪映典作事愈加秘密。我并不识葛谦等。不过耳闻其名而已。至给看之运动军人章程十条。系倪映典所拟。倪映典于去年九月问租赁天官里寄园五号门牌之屋为总机关会议处所。嗣因一标查出革命票。于十一月间由谭瀛另租雅荷塘门牌六十七号。门条贴谭公馆。凡机关之命令均到该处会商。我去年十二月初旬到谭瀛家。见伊弟谭员及现逮案的甘永宣及钟善全、倪映典们在场。此系普

通聚会。甘永宣系党内主动员。惟非我所纠。初三打仗时。见甘永宣携枪跟随倪映典把守大马路。那同逮案的尤龙标、苏美才都非党内要紧的人。其中内容不知清楚。王占魁系党中有名人。或知一二。如有举动。军火由倪映典托香港《中国日报》社湖北人年三十余岁的某某。又年约四十余岁的不知何处人某某购买。闻说步枪四千枝。马枪二千枝。每枝配码二百颗。攻城大炮四尊。价银由孙文筹措。原约俟本年六月间由虎门运省。欲俟马兵练熟。枪枝一到即可造反。先攻省城。打将军衙门及旗界一带。盘踞省城。攻打广西。由湖南、湖北逐节直向北京城。如能成事。当立倡事得力的总头子为主。以后改为民主。由民间公作总统。不能如清朝代代相承。因历朝开国之君多贤明。再传之后少主多昏暗。往往生乱。故我党以民主为宗旨。在我自己思想。确以革命为是。虽死亦不变宗旨。至旗式系外方内圆。色非青则蓝。我现将式样及同盟票款式绘图呈阅。其同盟票由香港寄来。每次四五百张。不记清楚多少次数。去年春间即在军界运起。均倪映典、谭瀛等经理。现在木排头宜安里搜出旗子。我未有到过。不知详细。惟既搜有旗子。又于初三晚放火逃去。又是王所为。伊等到港住画报馆。来省则住我处潜图举事。或其见事败露。故有此举动。倪映典时与孙文有信来往。十二月三十日我曾闻倪映典说。孙文到江苏打听广东消息。但不知藏在江苏何处。我平日也没见过孙文的面。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福建乱党起事。我并不知道。至广东革党。闻潮州嘉应州最多。倪映典煽动人入会。时常演说。系分步、炮、工、辎等营。分日到白云山脚的不记名寺内。或在寺外。每次或三几百人。多少不定。伊立在坛上。各弟兄站在地下。演说是革命。因汉人如此之多。满人仅及二成。我们多数人受此少数人欺压。轻汉重满。全无公道。专以压制手段。外国则不然。何以我汉人甘为奴隶。嗣后务须同心同德。苦志操练。听候机关命令。大众当要排满。言至忿际。拍桌几烂。各人则鼓掌赞和。陆军各人饮荷兰水食饼而散。其费用系由倪映典、谭瀛在公款项内动支。革党已定天运年号。因革命总统未立之故。不记元年二年。如去岁己酉年则写天运己酉年。今岁庚戌年则写庚戌年。以示不戴满清之意。谨将情节略叙亲供呈阅。至我所供的翁锡亮。曾在天官里总机关处会过面。初时我不识他。由倪映典对我说。他系广东人。曾入革党。系炮队教习官。现在到案的翁锡亮并非我所供的翁锡亮。不能混扳。梁成有、辛发利、林灿辉、余瑞麟等都非有心革命。实被众人逼胁的。周田福、王兴我都不认识。惟闻古振华亦系革党。刘君烈、刘如竹并不识其人。汤少清虽系革党。亦无督打事情。今被覆讯。所供是实。

事后新军之影响 当初二、三两日新军起事时，宜安里、雅荷塘、天官里、

清水濠各机关尝纵火响应，宜安里旋即扑灭，所藏卧具内之青天白日旗遂为兵警搜出。附城大塘、乐从各乡会党本拟同时发动，因事起仓卒，筹备未周，而新军一标已败，乃宣告暂停进行。经此役后，新军二、三两标亦大受满吏疑忌，监视摧残，惟恐不力。至辛亥三月二十九一役，尚不能有所动作。及辛亥九月广州反正。新军一部由刘师复、莫纪彭、任鹤年等领导，在香山前山宣布独立，开粤省光复之先河，即导源于庚戌之役也。

袁树勋之奏折 附录清两广总督袁树勋关于新军反正事奏折如下：

袁树勋电请军机处代奏。折云：粤省新军酿变。遵旨分别剿抚擒获首要及地方平定各情形。迭经电请代奏。并将此事始末及筹办善后各缘由专折具陈。差弁赍投在案。连日督同营务处司道等会同擒获各弁兵共三十九名。分别研讯。据黄洪昆供（见前不重录）。据王占魁供。充当一标二营后队司务长。入革命党为排长。据江运春供。充当一标一营左队司务长。入革命党为干事员。引诱兵士入党约二百余人。得有特别勋章。该王占魁、江运春所供与黄洪昆同。又据尤龙标供。充当辎重营右队副目。入革命党为主动员。随同拒敌官兵。惟未往抢枪码。据甘永宣供。充当炮队二营右队司务长。系入革命党。随行抢枪。拒敌官兵。据古振华、林开盛供。充当一标二营后队正目。后入革党。被胁往扎广九铁路。并未持枪打仗。据王功田、杨欲兴、余瑞麟、林灿辉、梁有成各供。被胁同行。乘间脱逃。据翁锡亮供。先期请假回籍。据冯江、车振彪、黄端胜、林亮励、李然兴、陆志鸿、黄端辉、车伯福各供。先事离营。黄荣彪、辛发利、王兴各供。患病躲避。黄福、张家彬、梁海、王鸿志、曾广鸿、陈永升、练致祥、曾焕熊、颜学材、周田福、王汝丰各供。临时畏逃。田能胜、萧积生、陈威林各供。系马伙夫。不知逆情各等语。并据黄洪昆亲书供词。并默写票布上四言句。驱逐老鞑。恢复中华等字样。伏查现审各犯。黄洪昆、王占魁、江运春三犯同谋叛乱。戕毙官长。擅拒官兵。黄洪昆、江运春诱军入党，得有特别优等勋章。王占魁于官军开仗时。并敢宣布革党宗旨。诱军归附。带引入城。均属叛逆昭著。罪大恶极。当即恭请王命。先行就地正法。尤龙标、苏美才、甘永宣三犯入党助逆。罪无可逃。惟此次全标叛变。诛不胜诛。该犯等虽听纠入党。尚无转纠别人。似与黄洪昆等有别。拟贷一死。递籍永禁。用昭法外之仁。古振华、林开盛两犯被胁屯扎广九铁路。并未拒敌。惟系革党。拟将古振华递籍禁锢八年。林开盛情节稍轻。递籍禁锢五年。此外各名或被胁同行。乘间逃走。或患病离营。或临时潜匿。或不知逆情。自应清免置议。拟飭督练公所分别递籍留营归伍。综此次各兵所供投身会党。冀图乘间起事。并夺械戕官。昌言革命。几无异词。尤以黄洪昆一犯所供为最详尽。且亲笔书写。神色不

变。并据供称新军为革命党出力。非为国家。其散布票纸有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四言句。且伪立天运年号。该党军制亦有统领标统各名目。其运动所至。以各省军界最多。利其器械多而操练熟。此次委系因兵警交哄。以为有隙可乘。致接济不及而败。而有等悖谬之徒。胆敢以怜惜新军为辞。妄肆鼓吹。用心甚为叵测。总之扰乱治安即属悖逆。既有夺械戕官焚烧营房抗拒官兵种种确据。证以各犯供词。直认不讳。树勋疆寄所在。惟有执法以从事。并一面剴切示谕。严禁造谣生事。以靖地方。抑树勋更有请者。新军与逆党勾结。皖省酿变于前。今粤又煽乱于后。且主动者多由该军各级官长。一经获案。亦昌言不讳。其病根误听自由独立之学说。而外来之诱胁遂以乘之。腹心可忧。燎原亦可虑。应请传旨练兵各省分。严加选练。力杜波邪。为思患预防之计。除将各犯全供及黄洪昆亲笔供词。并倪映典所定运动章程十条。分咨查照。并严缉供开在场各乱党获办外。所有讯供分别惩办情形。是否有当。伏乞军机处代奏。恭候训示祇遵云云。

李海云事略

李海云，字芸生，广东台山县冲蒌乡人。少聪颖好学而有定识，父佑谱早岁经商美洲，晚年返国，在香港集资设远同源商号，营港、美两地之汇兑业。海云弱冠即从父命学习懋迁，每于余暇浏览《中国日报》及新学书籍，油然萌国家思想。远同源号原附设于文咸东街金利源药行二楼，金利源为李煜堂、文启兄弟所创，煜堂长子自重少留学日本，肄业陆军，尝结识孙中山先生，服膺革命真理，甲辰（一九〇四年）归香港，与史古愚、伍汉持等组织光汉学校于九龙，提倡军国民教育，全港学校翕然宗之。那打素医学校（即今香港大学）学生李树芬、陈元英素昵自重，且与金利源有乡谊，课余常下榻其间，相与纵谈时政，至为相得。海云与其伙友李以衡因亦萦怀国事，渐有光复之志。先是海云从兄是男（公侠）于丙午（一九〇六年）以李伯海介绍加入香港同盟会，己酉（一九〇九年）春复由美国致书于余，特为海云、以衡二人介绍入党。海云等乃访余于《中国日报》，由余为之主盟，是为海云致力革命之始。其后《中国日报》以经济困乏，几濒于危，海云、以衡均尝贷款接济，余甚德之。是年冬，赵声、倪映典以运动广州新军将次成熟，请香港机关部速筹款二万元，以备大举。黄克强、胡汉民乃致电美国孙总理求助，总理覆电谓届时可如数筹足，令赶速进行。倪映典遂在广州设立机关多处，招收新军入党，准备于庚戌（一九一〇年）正月初

旬起事。香港机关部复派朱执信、胡毅生等联络番禺、顺德各属民军，届期响应为新军助。诂总理在美奔走纽约、波士顿、芝加高三处，前后仅汇交香港《中国报》八千元，而新军运动已大致就绪，殆有一触即发之势。香港机关部诸人以时机紧急，无法应付，咸异常焦灼。党员李文甫等以海云素具热肠，知其可用，遂告以军事进行顺利及筹款缓不济急之情形，请其竭力相助。海云认为机不可失，遂下大决心，尽提远同源之现款二万余元献诸革命党机关部，以充军用。远同源本为海云父佑谱及陈元英父赴贤与同族某等之合股公司，至是海云乃诿为因金银业失败致亏空公款，转求父执李煜堂同志陈元英等代向股东说项，诸股东察知海云此次毁家赴义之真相，亦咸为之谅解，允不向法院诉追，是可见海云义举感人之深也。时香港机关部以款既得手，遂派海云驻河南大塘乡李福林家，专任民军购械会计事务。迨庚戌新正，新军以除夕无端闹事牵动全局，倪映典死之，事败后海云犹携其军用余款三千元至香港纳还机关部，尤属难能可贵。是年冬，黄克强、赵声等自南洋回，复谋在粤大举，组织革命军统筹部，分职任事，海云受任统筹部出纳课长。故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一役前后海外各埠华侨义捐，概由金利源商店代收，而一切文据则由海云署名。是役发难前海云愿担任袭取江固军舰，以分敌势。尝偕李其、陆觉生等赴粤设备。以黄克强等仓卒举事，未及约期，故不果行。是岁八月武昌举义，粤省民军相继发难，海云联络四邑民军应之。有会匪卢鹤年蟠踞新宁（即今之台山）为乱，戕害党人刘岐山、关焕章，海云率所部平之。旋由粤政府委充官银钱局局长。癸丑（一九一三年）八月各省讨袁军相继失败，乃亡命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其至友李以衡不能从，后以追随龙济光部将颜启汉，犯侦探嫌疑，为众所不齿，闻者惜之。民五，任中华革命军南路司令。率高雷各属军进占高州。民七，任潮桥盐运副使。民十，陈炯明率粤军自闽回粤。大总统府成立，任会计司司长。民十二讨陈之役，任讨贼军第七路司令，旋改任江门警察厅厅长。民十四，任第七师师长。寻改编第七师师长。民十五，任增城县长，寻调广东禁烟处处长。民十八，任广东治河委员会委员。民十九，任台山县县长，民二十一，任南海县县长，民二十五，任中央党部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委员。是年冬，以宿疾迭辞南海县长职，遂挈眷回里借事休养。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卒以突患脑贫血症逝世，年四十有九。遗二子一女。民二十六一月二十一日中央党部通过赐予公葬，生平事迹付党史史料委员会存记。余有联挽之曰：“挟纾济义师，论庚戌前功，慷慨有同倪映典；输材襄党报，念香江旧谊，转瞬又随胡展堂。”

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革命军起义实录

余于《逸经》第三、四期尝记述“黄花岗一役海外筹款之一幕”，以作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一役之纪念，忽忽又复一年。本年又值《逸经》出版一周年后之四月五日，不能不再搜罗史料，作第二度之纪念。兹从尚未脱稿之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下编，择录关于是役之重要史料二则，用供读者之快睹。一为民元二月黄君克强在南京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革命先烈追悼会之演说词。一为参加是役幸获脱险之莫君纪彭（字非）笔记。两者均属锋镝余生最有价值之实录。此外余尚珍藏关于是役之他项史料甚夥。容俟他日补述。

一 黄克强在民元南京黄花岗先烈追悼会演说词

今日为黄花岗诸烈士在广州死义之纪念日。是役也，去年海上各报均有记载，但语焉不详。兴请与诸君一详言之。近十年来堂堂正正可称为革命军者，首推庚子惠州之役，次为大通之役，此后一二年寂寂无闻。后二年孙中山先生由美归，而广东，而日本。乙巳年组织同盟会，苦心经营；旋有潮州黄冈之役，萍醴之役，钦廉之役，镇南关之役，河口之役。河口一役感动军界，以致复有安庆之役。前年正月有广东新军之役。此役败后，海外各同志更加愤激，即各军队中之同志亦非常热烈，无间于南北。众论多欲利用此时机，克日起义，可收全功。是时孙中山先生由美至日本，转而抵南洋，与各同志集议。此时会议者，东南各省多有代表。议会之地点在南洋槟榔屿。兴与赵伯先、胡汉民两先生日日商议。当时所缺者惟饷械二项。幸南洋各志士担任筹款者极形踊跃，得十余万元。乃议决由孙中山先生赴美继续筹饷，赵君与兴来内地运动。本拟去年正月即当起义于广东，后因种种事件均未办理完善，故迟迟未发。地点议定广东者，因运有机枪四十多枝在彼。又广西军队中亦有预备援应。至于内地之布置，长江一带谭人凤先生任之。谭先生身体多病，此时亦冒险力疾至鄂。其时鄂有居正、孙武及系狱之胡瑛诸先生暗中筹划。湘省则有焦达峰先生力谋进行，异常敏捷。上海则今都督陈其美极力运动。当时交通部公举赵伯先先生主持，盖赵与兴皆驻在香港者也。而又议定赵由闽出江西，兴出湖南，谭人凤出江西。此时北方军队亦有暗为援助者。东京同志则归国援助者极多。但我辈此时起义不能多得军械，只得

购备手枪。及同志中听制炸弹发生种种困难，故又延期。然节节进行，未尝稍懈。姚雨平先生则任运动广东新军及巡防营。现海军司令胡毅生先生则运动各会党。各会党亦非常服从，至军事上之计划，兴与赵伯先先生任之。议定以千余人当选。赵率百余人。今第七师长洪承点及兴亦各率数十人。陈炯明守备城西旗界，因旗界内有训练之兵数千人，而旗民之备有枪械者亦五六千，故不得不力谋防御。但此时又有极端之困难，则因进行之中，早为前清粤督张鸣岐所侦悉。城中增设军队，防备严密。虽议决三月二十八日发动，而军械尚未运进。此时又设统筹部，兴自任之。赵伯先先生为总指挥。事后外间传言兴为总指挥者误也。二十五晚兴入广州城，至机关部宣告发动期。然此时又发生一极困难问题，则承运枪械之人有陈镜波者，系李准令其投身我党为侦探者也。彼已将由头发船运进之枪百余杆，子弹若干，报知李准。幸我辈其初起运三次均未失手，而他路运进枪械子弹，为渠所不知，故不疑我等即日起事。盖我辈另运之枪弹系装入油漆桶运进者，亦有由女同志诸人随身携带者。二十六日防备更严。张调巡防营数营入城，驻观音山。广州城内之观音山，犹南京城中之北极阁，居高临下，极占形势，故张派兵驻此以扼我军。此日有倡议改期者，然种种机关已备，势难再延。故兄弟及少数同事坚持不可，谓改期无异解散，将来前功尽弃，殊为可惜。是时又议赵所率二部分多外乡人，易为满吏侦知，不如暂退驻香港。二十七日姚雨平先生来城，然枪械仍未到齐，赵部已退驻香港。二十八日张又调巡防营入城，然营中有同志颇多，故此时多数又决议进行，冀有该营为之援助，而该营中同志亦多半赞成发动迅速者。下午二时半遂电赵部下，要其来城。当赵部退香港时，方疑我辈另有意见，故彼甚愤激。此次得电，皆极欣然，来者颇多。是夜商议次日进行方法，兄弟任由小东营出攻击督署，陈炯明诸人承认抵御警察局，姚雨平任收复小北门枪炮局，时间则定午后五时半。二十九日上午分发枪械与各处，然是晨城门已闭。赵君率所部自港来时已不能入城。而兴遂任指挥，部下共数十人。部署一切，至下午五时二十五分钟始率队由小东营出发。先十分钟，陈炯明君派人来问今日究竟发动与否。然来者见我等皆携弹荷枪，遂不言而去。事后始知陈因畏事之棘手，欲不发动，故派人来陈说一切。然来者并未明言，故我等并不知其不来援应，仍孤军冒险前进。出军时全队行走迅速，至督署门首，有卫兵数十人驻守。林时爽先生率二三人前进，用炸弹猛击，死卫兵数人，余皆逃入卫兵室内，匿不敢出。然我军此时亦死三四人。卫兵既退，兴率十余人由侧门入署，余大部分，四川喻培伦先生率之，驻门外防御。兴入署至大堂，有卫兵数人见我军至，即招手愿降，求为引导。于是直入内进花厅各处搜张鸣岐不获。观其情形似久已迁移者。我军觅得床板木料等物，放火后遂出。复有卫兵一排在大堂下用枪向我

军猛击。兴立大堂柱旁，双手各持手枪还击，毙卫兵数人，余皆鼠窜，我军乃得出署。至门外，见喻培伦及所率之部皆已不在，盖当兴入署后，喻已率队往攻督练公所矣。我军行至东辕门外，时有李准之卫队与我军相遇，相隔距五十米。卫队遂即跪击我军，林时爽君时在前列，刚欲用枪还击，而头部已中枪弹，遂倒街中。兴手指及足亦受弹伤，乃率残部十余人转行，欲往助喻君攻督练公所。至双门底，又遇巡防营一大队，距我军丈余，福建人方声洞君猛击之，中有哨官巡兵数人。然彼见我军人少，乃向前直扑。尔时硝烟漫空，弹如雨注，方君遂中弹而仆，存者仅数十人矣。兴乃避至一民房中。由板内放枪，毙其前进者十数人。相持约十分钟，巡防营退去。我军复行，途遇喻君。喻以为欲攻督练公所，必先攻观音山所驻之巡兵，乃身先部下，携弹直上。至半山与巡兵激战，但部下之人多无经验，不善掷放炸弹，又见彼军势盛，遂一面抵御，一面徐徐引却，巷战至十二时。我军见彼巡防营愈增，乃退至一米店，用米袋筑墙以守，各挟利枪，一发数中。遂以十余人力御巡防营四百余人，毙彼近百数。巡防营畏死不敢前，始放火烧店，而此役之失败，至是完毕。（下略）

二 莫纪彭之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血战笔记

辛亥三月二十八晚二漏许，余叩先锋队长陈炯明宅，进谒副司令黄兴而问之曰：“明日之期限已定耶？不再更改耶？”司令点首言曰：“定矣。君宜率所部一准明晨来城。”余领命出，直归大石街所领选锋部之机关。在机关为予司家务者，有宋铭黄、庄汉翘两女士。见余归，迎面问余曰：“明日之事当如何？”余对曰：“事已定。余准备黎明赴车入花县三华店，约徐君维扬率所部来助战。请为余备早膳。”明日清晨乘车直趋三华店。徐君偕三两会党已徘徊于村边，若预知余来者。余执徐君手，稍远诸人，细语之曰：“黄副司令已预备今日薄暮进攻督署矣，吾人须率所部潜入城中听调度”，徐君闻言不应，久之，诘余曰：“君料此事成败如何？”余曰：“何计夫成败？事至此实无可如何。”仓卒集诸会党，约得六七十人，分数小队同搭午车入城，相约候诸城隍庙内，以待消息。余偕徐君趋陈队长宅，宅空无人，转趋小东营余所分设之机关，见有二人，中有盲一目者，裹甲守诸门侧。余略与之点首，直进后室，刀灿然作银光，陈诸席上，有数百把，炸弹三巨箱列于席右。喻君云纪（培伦）分配弹药甚忙。林君时爽据席头注视刀把，见余至，夷然笑谓曰：“人来乎？”余曰：“约有六七十人”。复问曰：“在何处？”余曰：“在城隍庙内，杂市民中备号令。”林昂首言曰：“且以二十人来。”予乃转身入城隍庙，以小东营方向示诸会党，嘱其三三两两次第入机

关内。予复往城外高第街联胜里机关，尽出所藏短铳炸弹，雇肩舆运入小东营。时见黄司令衣雪青色纺绸短衣，扎裤脚，据中案坐，神光奕然。分将短刀授时爽，炸弹授云纪。时分配刀与炸弹事系归时爽与云纪料理也。云纪告余曰：“我为炸弹忙得很，曾三日夜不合眼，不息手。除留我机关外。此处得足力弹五百枚。有此五百枚，足以奋斗一时矣。”时谭人凤手持短铳作播弄状，一似不解运用短铳方法者。黄司令忽抢前夺谭短铳，且戒之曰：“谭胡子不要闹。”黄司令语甫出唇，而短铳子弹夺管而出，轰然一鸣，声振檐间。幸码子从屋壁穿去，弹未伤人。黄司令复语谭曰：“胡子不要再闹，顷间已有错发弹子伤花县某君矣。”余闻言，知所部有受伤，向徐维扬问所伤者为谁。徐以手牵余袖转进复室，见一人卧地上，鲜血从右腿上流出，傍有十余人围伤者施救护法。余问傍人曰：“伤者无大碍耶？”闻有一人答曰：“弹已穿透左腿矣。”余行近伤者侧，俯察伤口，血肉突出，如茶碗口大。余慰问数语，复抽身出外厢，见刘古香带三人进，尾其后，见陈铁五手持火柴一巨裹。陈告予曰：“黄胡子着我出购此物，备燃弹用也。”朱执信亦踉跄从外来，穿白长衣，入室后将衣挂壁上，用小带向裤脚捆裹。余弥近问之曰：“吾属何队出发？”执信曰：“我愿从黄胡子去拼命。”壁上钟已四下，予知时候已到矣。忽忆大石街及莲塘街机关部，尚有司家务之女士四人、小童二人，为平日用以掩饰邻人耳目者。自张鸣岐督粤，已知党人谋事急，凡侨居城内者，非有家属，房主不许出货也。余私念今日之事为吾党孤注之一掷，生还之望可决云无，而彼妇人孺子既不能拼力以杀敌，今尚留城中，待死而已，无益。乃决意复去莲塘大石两机关部，速彼中留守者趋出城外，冀以免祸。余乃牵衣出小东营，拟告彼等后复来归队，意尚可及时也。余出户阈，见巡警二人向街头喁喁偶语，似已知余等今日之事者。余不敢顾盼，夷然而行。到大石街转弯处，若有一人从后赶来。余回首一望，盖喻云纪也。余矢口问曰：“老喻何往？”喻曰：“大队出发矣。我赶归机关部调同志扼守隘口，以断李准来援。”予亦略急数武到大石街，入门直疾呼门内人曰：“吾人出发矣，汝等可速去也。”庄、宋两女士闻言，不忍舍去，乃为之陈利害，徒死无益，盍为日后事尽力，且草一绝命书托代达某友人，亦嘱为予老母称音息，略以后事托两女士，力劝彼等从速出城外。两女士乃携二童子依依而去。俄而有二花县人色如灰土，抢入室内，向余言曰：“小东营队刚出发，有警察三人来诘问，领队者发枪，中其一倒地，余二负伤而逃。”余闻言至此，有惊天动地之巨弹声裂空气而来，继此声而起，轰轰砰砰然，如新年之燃爆竹，不绝于耳。余此时神亦为之眩乱，独自沉吟曰：“余当复追从大队入督署耶？抑就近与喻云纪独当一面耶？”

正踌躇间，约半时许，户外闻号筒声。宋玉琳与人辩论声，及喻云纪大

呼“凡同志者快出来助战”声。余乃从室中内进，呼二花县人出。喻既见余，便狂呼曰：“广东人对不起我们——既匿其利器，复临时畏葸而逃。”余急应曰：“余正欲从你队杀贼也。”喻云纪身负炸弹一巨束，左手持号筒，右手执短铳，额际尽染灰土，容色威猛，若能生吃人者。宋玉琳亦手持号筒一，一手执短铳，立于街边某宅旁，沉默无言。喻以号筒付余，携余手言曰：“老莫，汝熟道路，余与汝为先锋领队前进。”余问喻曰：“督署攻破耶？”喻曰：“攻破矣！吾与熊克武、但懋辛诸人用巨弹两枚从署后破壁洞入，壁为二大孔。余等入署，已无人抵抗矣。”余询黄克强、林时爽诸人安在。喻曰：“都不见之。”余复曰：“李文甫在何处？从大队向前门攻入者岂无令人耶？”喻曰：“各人都已四散，惟有不相识十余广东乡人（即花县会党），隐匿于署侧，余乃率之至此。”余复曰：“诸同志死伤如何？”喻曰：“署中二门傍有五六人倒死地上。”余与喻且行且语，将出大石街，观音山上敌兵忽放排枪，向莲塘街密射，应排枪声，有人呼痛声，有绝命声，有倒地声。已而闻瓦面上有炸弹发声，向观音山脚方向投掷。喻曰：“吾等已有集瓦面上接战矣，余等从速上瓦面。”余手招随从二花县人复转余等机关，取出长梯二，傍街边扳登瓦面。二花县人随余登梯，喻亦继之。四人首甫出梯头，排枪直从余四人处射击。四人伏瓦之上，因瓦盖之高低处以为障。排枪愈密，前方所掷之炸弹声亦相当而密。余探头窥前翼投弹为何人，有一枪弹穿余耳傍而过，落屋瓦上，碎瓦为数块，有小瓦横飞中余额间。而彼向前敌投弹与排枪相应和者为何人，一穿雪白罗短衣之美男子也。此美男子曾于黄克强左右一见之，但未审其姓名耳。吾等伏瓦面久，美男子以手招余等进，余等乃猛进接近。前方之人共为五人，仰伏屋堞下，山上排枪密度加紧，幸为堞蔽，无一受伤者。余与喻时时还短铳。美男子戒之曰：“铳短无力，不能达敌地，请留子弹为后用。”时见美男子身傍有一斗大之竹筐，盛弹及半筐。稍间，余急问美男子曰：“君为谁耶？吾人当同毙命于地下，岂可不知其姓氏？”彼人笑曰：“吾为刘梅卿。”且告余曰：“此处用不着短枪，炸弹须即行补充，以壮声势，否则敌人沿山而下袭矣。君等可下去，多运炸弹来。”时排枪声，及枪弹落瓦上，瓦碎片片作响，震撼脑气，目为之迷，几忘却此身在何方向。仓卒间见檐下有居民，状甚惶怖。余呼之曰：“同胞，余等为祖国谋光复，故拼死实行革命也。同胞请以梯借我等用，我等欲下去大石街耳。”檐下人若有踌躇者，余急以枪拟之。其人即以梯至，吾与喻云纪缘梯而下，所下处为人家一后园。吾复谓其人曰：“请开可通大石街之前门导吾等出。”其人急开门，余等遂出。山上排枪如急风扫骤雨而来，一弹中喻手指。又一弹掠耳际过。余与喻急避诸门外墙翼，顾此非大石街，乃莲塘街也。莲塘街与观音山成直线形也。山上敌人见街中复有人。发枪比瓦上

更密更烈，幸有墙翼为掩护，只见子弹如斜雨横扫街上。方子弹来势最凶猛时，吾焦急不可耐，以为此即为余等归宿地，乃振声呼曰：“老熊，余在此。”后无应者。移时，余又呼曰：“快搬炸弹来，快搬炸弹来！”盖余等舍以炸弹为最后之良友，已无他望矣。已而天已入暮，四处沈黑，敌面已不见人，山上排枪声亦渐疏。余曰：“天已沈黑。敌人不发枪矣。”

喻携余手，身挨门墙，而潜行转回大石街。有见街上三三两两同志，围烛光而麇聚。宋玉琳仍默然屹立于墙隅。但懋辛提大刀据石阶坐，右手血涔涔滴。余问但曰：“汝中敌弹耶？”但以手指喻言曰：“老喻以刀伤我手。”余叩其故，喻不置答。后问诸川人曰：“但不主张是日发难，暗将喻所制弹推数十枚于井中，喻恨之，且疑其有他志，故事发时欲以致但命。”喻集数川人扳谈，意中必有熊克武，惜未问及其姓名也。予亦默数所部花县人数，约十有五六人，合川人及宋玉琳，中有数外省人不甚认识者，共有二十四五人，许结为一小队。喻领其前，予督花县同志后。忽有两顺德人从横巷来会战，手皆持驳壳枪者。此时予队中，除刘梅卿外，止此两人有驳壳而已，俄见两人从后来向诘所部，二人即攫予襟，以二枪拟余。余惶然曰：“君为何者？”二人曰：“汝是敌人。”傍有数人即趋前劝解。后余问彼二人何为目吾为敌，彼二人曰：“吾同志等臂间皆裹白布为号，汝何独无？”予回顾臂间果脱白布缠号也。喻见二人后来，复谓余曰：“老莫，想此间机关尚有多人未出也，盍往唤诸？”余乃复入莲花街陈炯明分设之机关部，而街中已见返射之火光，墙壁尽赤，俨如白昼。余等见城中举火，知决有他处响应者，全队二十余人，神色为之大振，勃然有生气矣。

陈分设机关部在莲花街中约，予忘其门牌，四觅不得。时渴甚，路角一轿馆，因向轿夫取水饮。轿夫进水一大碗，予以数角与之。旋见一大宅，宅门半启；予闯入宅中，有一老妇伏地，双膝跪蒲团上，口中喃喃不辨何语。仰见神楼上燃两烛，中柱降香，意此老妇必祷神免祸也。予呼妇起，妇不起，口念南无阿弥陀佛不已。予斯时不禁发微噓。随引身出，行数武，见有人探头门外，予细辨之，知曾面熟者，此陈炯明机关中人也。吾与之点首，随此人入内，而何少卿、胡佩元两女士在焉。一见吾面，便问曰：“外面情形如何？”予曰：“已打胜仗。”两女士问曰：“张鸣岐就获耶？”予曰：“逃矣。”两女士鼓掌大喜，且贺吾勇。吾向女士索水饮。女士提巨壶茶出，吾且饮且与语，并告之曰：“此地不能久住，明晨快觅他处走也。”吾见搜诸人不得，乃转身入大石街原处。路角中见有居民多人，手持提灯，负细软物，作仓皇出走状，一见予等，即向乞命。予曰：“吾等革命军为同胞拯命耳，可勿生惧，且以提灯假我一用。”居民中有少妇一人，年二十许，容颜秀娟，穿白袖内衣，止着一履，状至可怜。彼等皆家近督署傍，已着火，故

为避火而出走也。

喻云纪与宋玉琳并数外省人集于一处，有二人扛炸弹一巨箩，随喻后。予上前问曰：“当今急计，吾等宜作何打算耶？”宋曰：“何除吾小队外别处无枪声？”喻曰：“姚雨平专任新军部分，至今尚未见响应消息。”予曰：“新军予亦熟识者，吾人越城墙出，直向燕塘求援于新军如何？”喻与宋皆大赞许。喻即高声呼曰：“吾队向东门进发！”喻复谓吾曰：“老莫，请汝向广东土人布告，吾人向东进取。”予乃分向花县诸人说明，必须出东门。诸人乃次第就行列。宋玉琳手持长梯，吾进前与宋各持梯一端，两人扛梯作先导。过大石街口，入□□里，有一小警察区，门半掩，忽有侦者由外直冲门入。予身刚过区首有枪一排从门内向吾等猛射。予即掩身于墙隅，以枪还射之，而吾与喻队已被截断。在警区旁鏖战半小时许，枪声渐止。予探头后望，街中不见有人影迹。予此时脑最焦乱，不知计从何出，又不敢再过警区追寻喻队，乃转身对北向横街，急步前趋。心脉起伏极急，意欲折过警区前街，则喻队或在此候予也。心慌脚乱，行未久，有人从高处叫唤曰：“此地不通行人，勿乱走！”予赫然而惊，举头望之，此为小北门，守门者方以枪下拟也。乃复回趋，略转数路角，更不知喻队消息矣。时予忽忆起夏君寿华长巡警教练所，曾受运动，约同响应。若得此为援兵，直引之寻喻队，当能合力夺城。与夏君疏通者为湖南陈某，乃决计到某旅馆访陈。见袁沛之枯坐旅馆内，而黄一欧在袁床上鼾声大作。予急叫“陈某何在”？袁云在隔壁。予唤陈来，陈犹疑不敢应，救拯之望于是绝矣。

后闻诸花县某君云：“喻队自失落后，左冲右突，不能越城墙出。天明后，吴宗禹率兵来攻，喻乃入元盛米店，聚米包为垒，恶战三时。全队几覆。喻到急时，以炸弹自焚。”世所传高阳里元盛米店之剧战，即喻最终之奋斗处也。噫！

黄花岗一役旅加拿大华侨助饷记

一 余至加拿大之原因

余前在香港主持《中国日报》及同盟会《革命工作者》六年。中间经过丁未（清光绪三十三年）四月潮州黄冈之役，及惠州七女湖之役，五月广州刘思

复谋炸清水师提督李准之役，九月惠州汕尾之役，七月钦州防城之役，十月广西镇南关之役，戊申（清光绪三十四年）二月钦州马笃山之役，三月云南河口之役，庚戌（清宣统二年）正月广州新军反正之役，迭受多次失败之苦痛。供给财源之南洋、香港等处同志侨商业已大伤元气，颇有一蹶不易复起之象。同时报馆财政亦受军事失败之影响，维持异常困难，余乃主张派员至美洲开辟新财源之说。适是时加拿大温高华埠致公堂方组织《大汉日报》为洪门宣传机关，专函托余介绍主笔。余早年亦属洪门会员之一，认此为绝好机会，遂自告奋勇，舍弃《中国报》而改就《大汉报》编辑之职。

二 加拿大华侨之政治思想

加拿大华侨自经康有为了己亥年（清光绪二十五年）首创保皇会之后，著名商家叶恩、李福基、李梦九、刘康恒、林立晃、黄孔昭等皆为会员，各埠分会星罗棋布。致公堂会员加入者亦不乏人，林立晃即域多利埠致公堂之管理库员也。康有为去后，梁启田、启超昆仲相继莅止。保皇会在海外各地筹款，以此地为成绩最优，有《日新报》为宣传机关。时有人倡议凡华侨归国均须缴纳保皇会捐款若干元，其势力伟大可见一斑。丙午（清光绪三十二年）温高华埠基督教徒周天霖等发刊《华英日报》，延崔通约为记者，偶因登载粤吏搜捕康党新闻一则，渐于保皇会发生恶感。保皇会恃其势力，讼《华英报》于当地法院，且施以种种压迫，《华英报》不能支，遂致辍业，崔亦失意渡美。

三 保皇会入寇致公堂情形

致公堂即洪门三点会之别名，最初由广东三合会首领因避清吏压迫，亡命海外，遂组织团体，以资连络。及太平天国既亡，洪秀全、陈金刚诸部将多远适美洲，大张旗鼓。由是凡有华侨驻在之地皆设分堂，占全美华侨总数十之七八。加拿大之总堂设于域多利埠，而人数则以温高华为多。康有为师徒初到加时，知洪门势大，乃倡议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之说以饵之；又谓清帝乾隆实为大学士陈宏谋之子，以吕易嬴，汉人江山恢复已久，殊无反清复明之必要。康徒徐勤、梁启田、欧榭甲、陈继俨诸人更投身入闾（洪门称加盟曰入闾），谋伺机攫其内部实权。洪门中人不知其诈，多为所愚，温高华致公堂书记黄壁峰等忧之，乃倡议一言论机关，定名《大汉日报》，借以挽回颓势，遂专函香港托余代聘记者。及闻余亲来，大喜，乃派干事林立权为代表赴域多利延接。

四 余初到域多利情形

庚戌夏余乘日轮伊豫丸至域多利，在舟中已得致公堂来电欢迎。到日，群设洗尘宴于会所，洪门各叔父（洪门资格老者称叔父）咸到。大佬马延远、先锋谢秋、先生张辉（洪门称盟主曰大佬，纠仪员曰先锋，书记曰先生），招待尤为诚恳。时有跨保皇党籍之林立晃疑余为风仔（洪门称冒认者及奸细曰风仔）特提出种种秘密记号以窘余，余一一应付裕如，并高歌“草鞋原是五条龙”歌诀以答之，盖余夫妇于甲辰某月同在横滨入关。余妇被封纸扇（又称军师），余被封草鞋（又称将军），均为高级职员，各有特别标识，非可冒充者也。林知余无懈可击，始帖然就范。时温高华分堂以地点集中，会员荟萃，向有取总堂而代之势。域埠职员深以为忧，乃托余从中斡旋，使云埠仍尊之为首。余慨然允之，后此域埠职员能纳余言，变产救国，即余两地斡旋之效果也。又余当日入境，所持者为主笔护照，而加拿大政府移民禁例只许我国官吏商贾教会学生游客五种人入境。余赖税关译员李梦九之助，得改主笔为教员，始得无事通过。

五 《大汉报》宣传之收效

余未到温高华前，《大汉报》已先出版半月，暂延张泽黎（号孺伯）代任笔政。张前任夏威夷《檀香山新报》记者，曾与檀岛保皇党《新中国报》笔战经年，亦同业之勇将也。时方随其叔父驻温高华清领事张康仁供职领署书记，举动咸受拘束。及余至，《大汉报》始尽量鼓吹反清复汉之宗旨。致公堂大佬陈文锡、先锋李寿、书记许昌平等，惟余言是从，各埠侨胞翕然向风，报务进步，一日千里。保皇派之《日新报》记者梁文兴（后名秋水）早年受余父雇佣，任上海广智书局校对员，与余亦属旧识，至是为同党所督责，渐向《大汉报》挑战。余乃对之迎头痛击，口诛笔伐，义正词严。计余在温埠从事笔政一年有余，大好光阴多半虚耗于笔战工作。其最收效者，则为曾任保皇会分会会长之黄孔昭及《日新报》前任记者之何卓竞均先后服膺革命真理，而保皇党徒皈依吾党者尤络绎于道。余于服务之余，更历游加属各埠，宣传主义，所至咸受欢迎。余知事机成熟，乃于是年冬电告孙总理谓加属筹饷大有把握，请于渡美途中先来温高华。时总理方在南洋槟城与黄克强、赵伯先计划在粤重图大举，得余电大喜，遂于渡美行程中，甫抵纽约，即取道入加拿大。

六 洪门筹饷局之成立

总理于辛亥前到美洲三次，惟足迹未履英属加拿大寸土。第一次在丙申（清光

绪二十二年)，因未谗华侨情形，不敢遽用真名，改称陈文，号载之，所结识者仅基督教徒数人，抵纽约时即有满清侦探尾之，故至伦敦未久即被驻英清公使诱禁。第二次在甲辰（清光绪三十年），是年始在檀香山洪门入闾，故抵旧金山时，得致公堂营救登岸，并设法改组《大同报》。旋与总堂大佬黄三德周游各埠宣传革命。以保皇会势盛，洪门人士多入玄中，故亦无所得（事详拙著《开国前革命史》）。第三次在己酉（清宣统元年），是时华侨已渐开通，致公堂亦稍了解本来宗旨。适是年冬，香港机关部因运动广州新军将次成熟，克期反正，特电总理请筹香港洋二万元，以资发动。总理复电报可，旋由总理先后电汇《中国报》余手收者四次，计纽约三千，波士顿二千，芝加哥三千，旧金山一千，总数港洋九千元。最后旧金山之一次已在庚戌正月初二新军失败之后，乃由旧金山少年学社李是男等一二人任之，与致公堂无涉。以偌大之旧金山而仅能募捐港银一千元，其困难可知矣。此次得余电邀，遂有开辟新财源之想。余知总理将至，乃函电各埠致公堂叔父，使各派代表到温埠欢迎孙大哥，以敦盟谊。洪门例称起兵反清之首领为大哥，在洪门历史只有五祖及元帅万云龙数人足以称之。总理到温埠之日，为辛亥正月初二日。洪门人士及其他团体多热烈欢迎，盛况为海外各埠所仅见。次日，致公堂开台演戏（洪门称入党加盟曰造戏，主盟员曰老母，介绍人曰舅父），总理及余相继演讲洪门历史及宗旨，华侨入闾者有吴侠一（号一飞）等三百余人。盟书咸称总理为老母，余为舅父。复由致公堂假得华人大戏院，逐日请总理演讲革命之利害得失是非等种种问题。每日听讲者逾千人。余知人心可用，乃提议创设革命救国筹饷局，众赞成之。温埠致公堂首捐香港银一万元以为之倡。众举刘儒坤为总理，岑发琛为司库，陈榛如为中文书记，黄希纯为英文书记；规模既备，成效渐著。总理更主张用革命军政府名义发行一种金币债券，分十元百元千元三种，革命成功后加倍偿还，暂由筹饷局发给临时收据，候在美国所印之金币券寄到，然后凭收据调换金币券，即其后金门国民救济局所发行之中华民国金币券是也。

七 变产救国之义举

是时，香港统筹部黄克强、赵声等以运动就绪，屡电催款。余对总理言，洪门会员多属劳工，仅凭个人捐助，不免旷费时日，殊不足以应付急需，因提倡变产救国之议；盖各埠致公堂会所多由会员捐资建筑，若使变卖助饷，实为事半功倍。总理深以为然。余知域埠致公堂会所原属公产，遂与总理同赴域埠，即于洪门欢迎宴上极力主张此说。各叔父多赞成之，惟中有少数谓会所为本堂永远基础，集款之法尽多，何必为此孤注一掷？其言亦有理由，余不便强之，乃向一般散仔（洪门称普通会员曰散仔）设法宣导，痛言反清复汉之机会已到，及舍私从公之责任宜尽，各散仔大为感动，遂召集全体大会，一致通过以其会所楼房向

银行抵押香港银三万元汇充革命军饷之议，是为旅美华侨破天荒之义举。各埠致公堂闻之，咸为振奋，都郎杜埠致公堂亦变卖其会所，得港币一万元，可称后先辉映。

八 黄花岗一役海外筹款之总成绩

孙总理以在加拿大筹饷成绩特优，大出意外，遂赴美国继续活动，而以筹饷职责委之于余。计先后经余手电汇香港统筹部者七万余元，占黄花岗一役各地筹饷成绩之第一位。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失败之后，革命军统筹部出纳课报告收支总数，收到海外各地义捐共一十五万七千二百一十三元，而加拿大实居各地之冠，然加属经此役后已成强弩之末，欲一时再集巨款，殊非易易。辛亥五六月间，余得黄克强、胡汉民自香港来电，嘱继续筹饷，以备再举。同时，总理因美国致公堂与同盟会员感情不能融洽，影响筹饷前途至巨，以余与旧金山致公堂及《大同报》素有特殊关系，邀余亲往相助总理，故余遂于七月下旬离加赴美。抵旧金山不及二十日，而革命军已在武昌发难矣。兹附录黄克强、赵声、胡汉民于是役前后致加属致公堂书三封如左（原书现存余手）。

九 黄兴、赵声、胡汉民致冯自由书

自由我兄大鉴：连读手书两通，敬悉。自前次收到域多利致公堂款三万后，即具公函作复，并请转寄一函向域埠致谢，想俱收览。昨午得来电，知温高华又汇到一万元，以加拿大一属而筹得如许巨款，微兄赞助之力，必不及此，佩感何似。第二手书云，兄尚可力任筹饷事，为源源之接济，真是余勇可贾。即从大局论之，事若发起，幸而有成，内地固不乏资，而外力仍不能无赖。以军用浩繁，无能预算，且购械购船等类有不可限之于何方面者。欧美皆须有党中可恃之人，则前途乃大得力，兄能力任于外，匪细事也。（日本于日俄战争时期中，其派任专员于欧美者，其得力不止在外交上，彼为成国且然，何况吾党。）现在时期已迫，惟款尚不足，除英属收到四万余元（日厘坤甸在内）西贡暹罗不过数千，加属四万，美属仅收过金山五千，视预算总额尚差五万元左右。（预算额中以购械为最大宗，盖新军无子弹，则必有为之助者，此事兄可推测而知，而其谋已经告知中山，中山亦大以为然，惟原拟购械之价，今以困于窘难，每个之价常逾于原拟，乃不得已之故。）至当时所以预算至十四五万，第一固由规模不得不大；第二则收入之预算，以为英属及西贡暹罗可得五万（今所差无几），美洲全境可得六七万，荷属可得六万，（此为谢良牧、姚雨平、刘子芬数人运动，当港军事部成立时，据彼处资

本家报谓八打威、泗水等处已筹定此数也，而岂知其后不然。)今美洲加属亦已筹到四万，金山虽则仅五千，然尚曰仍筹，则美洲或亦去原预算无几。所难堪者，荷属所汇到者至今不及万元，此外则以款绌要缓之电相报，于是荷属之预算收入乃差五万，于全局关系至大。中山东行，则纽约、波士顿、檀香山等处必仍有大望，然能否使时期展开，以待款来，则不可知。此次筹款以加属所得为最巨，即兄之能力可知。若于加属以外，更为中山之助，使得速举，亦所望也。尊夫人闻须待日本船，故至速亦须待月底动身。克如作好字当交带上。专此即颂近安。

兴
弟 声 顿首
展堂

毅生因购器事尚未归港（附及）
正面相克尚无之或须设法另晒也。

十 黄兴、赵声、胡汉民致域埠致公堂书

致公堂同志列位仁兄大鉴：前日收到尊处汇来军事费三万元，当即电复由温高华转达，想已收悉。此间诸事俱已著实进行。规划以两粤为主，而江、浙、湘、鄂亦均为布置。经济问题自得尊处巨款后，亦已解决过半。若美洲如金山大埠等皆能实力相助，则成功必矣。尊处同志闻系先变产业，以急应军需，热度之高，洵为海外所未有，同人等不胜感服，内足以作战士之气，而他埠同志闻风而起者，当亦踊跃倍于寻常矣。不审中山君此时尚在英属否？各埠致公堂情义相通，尊处以大力为倡，想必已有电函转告，使皆倾力赞助。事机甚迫，于现时多得一分之经济，不止有百十分之效力也。专此奉报，即颂义安。

赵 声
弟 黄 兴 顿首 初六日
胡汉民

收单一纸附呈，乞察收，并赐复示为荷，复书乞寄香港信箱三百五十一号《中国报》。

十一 黄兴、胡汉民致加拿大同志书

加拿大各埠同志诸兄公鉴：此次事前各部之组织，与临战党人殉国之

烈，已详于前寄自由兄书矣。当时以广东为主动，而云南、广西、湖北、湖南、江南、安徽、四川、福建、直隶数省为响应，各处皆有党人在新军中预备反正，拟广东省城一得手，则以次续起，因广东财政充足，交通便利，各种形势为天下最，抑且极宜于建立军政府之地也。岂知以经营过久，又猝遇温生财之事件，致虏加意侦察提防，未及期而事泄，迫于发动，遂无成功，幸新军不致受影响。同人等为大局起见，亦遂电止各省，不使遽发，盖恐其发而不足以制虏死命，则不如养其全锋。今虏虽知我党人此次必系聚精会神之举，然究不审我致力所在。所幸事后人心益愤，今云南、广西干部将弃学校俱已毕业，更加入同志数十人为新军将领。直隶第六镇有吴六征为镇统，密召其心腹同志于各省，使到其军为臂助。江南闻广东事起，有数营露甲欲起，幸为标统某同志婉止。广西同志蔡松坡调往云南总揽新军之事。凡此皆军界愈见进步之情形，而铁路国有问题激动民心，更使广东、两湖、浙江、四川五省反对政府之气益炽。从此港、澳两处密接省城，我党只利用为秘密办事之地，不为显扬之运动。今则殷实商人愿附入于吾党者日众。因见革命军起，而民间丝毫无扰。三月二十九之夜竟有开门而观战者。事后粤省民贼乃借口搜捕，纵兵掳掠，以总督之总文案（即胡铭槃，广西劝业道而张鸣岐特调来东者），其住眷亦被抢，并枪伤其仆妇。此外商民之受害者，更不胜数。故民心专向于吾党，而视虏政府如蛇蝎，此又普通社会进步之情形也。闻之先哲有言曰：“经一度之失败，可得良好之经验。”此次失败其大端有二：（一）则仍蹈往年一面办事一面筹款之辙。军事部组织于去年冬月，而南洋、美洲之款大半到于三月中，对外则未免日露风声，而内部且有极多障碍；（二）则待械以应用，待款以购械，械未至而人众已集，疏虞既所不免，伸缩更难自由。故弟等深维其理由，于此时党力方盛，人心激昂，卷土重来，不宜少懈。然经济无预备，必临渴而共掘井，则费时失事，屡屡由此。现在南洋同志已为筹款之预备。弟等之意，深望美洲同志亦为此绸缪，更宜于未事之先，各分贮于本埠，力量既厚，应机同集，庶不致迁延岁月，坐误事机。天时人事，近在咫尺，国仇友仇，誓以必报；惟我同志兄弟共图之。专此即颂

义安。

黄 兴

弟 顿首

胡汉民

中历五月二十一日

武昌起义与黄克强

黄克强于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一役失败之后，痛心多数青年同志之损失，及海外华侨捐款之虚掷，决欲亲至广州实行暗杀一二满清大员，以振作全国之民气。时余及中山先生均在美洲，闻克强决心行险，乃与致公堂《少年报》诸同志再三函电香港，力劝其不可轻生僨事，致碍大局。克强乃要求先筹汇二万元在广州设立暗杀机关，始允不亲自出马。遂由美洲中华革命军筹餉局如数应之。克强得款，即派人至广州筹备各事，其后陈敬岳、林冠慈等之狙击李准，及周之贞、李沛基等之谋炸凤山，即由此种机关指挥发动之也。先是，克强于辛亥正月已拨款五千元，使谭人凤至长江沿岸各省进行军事运动，准备于广州发难时，由苏、浙、赣、皖、湘、鄂诸省纷起响应。谭到上海，先与宋教仁、陈其美、吕志伊、郑赞丞、章梓等发起中部同盟会，以三千元交郑赞丞办苏、浙、皖、赣事。是月二十五日至汉口，召集居正、孙武、杨舒武、查光佛、刘英诸人在旅社开会，筹商起义计划，谓奉克强命督率长江各省革命进行；南京、九江已有联络，两湖尤关重要，广州于最短期间即可发动，届时湘、鄂应急起响应云云。并出八百元交居正作运动费，旋赴长沙，约会曾伯兴、刘文锦、焦达峰、谢介僧、邹永成诸人于路边井某日本旅店，以七百元交曾伯兴使任筹备诸事。诂长江各省正在积极进行之中，而广州黄花岗之败耗已至。各地同志初闻克强、人凤同时殉义，咸为懊丧。及悉二人仍生存，则欢欣鼓舞。各谋卷土重来，以雪前耻。居正、孙武初使邓玉麟在武昌黄土坡设一酒店，效梁山泊朱贵方法，借此运动军队。一时兵士趋之若鹜。八百金之运动费仅维持四个月而罄，酒店因亦闭歇。诸同志以坐食山崩，束手无策，乃由居正献计，谓广济县洗马坂达城庙有真金菩萨一尊，盗之可熔解其金以为用，众大赞成。群推居正与焦达峰、查光佛、刘文锦等任此职务。居等遂两次入山行窃，均以庙僧戒备严密而止。第三次得湘省壮士之助，盗得金像而出。途中骤遇官差，不得已弃之田中而逃。数月经营，竟成水泡。适有同志刘公（仲文）以父命挟五千金北上捐官，道经武汉。诸同志知其囊中有金，感动其改充起义经费。刘初犹疑不决，杨玉如、彭楚藩乃以计挟之。刘为所动，尽举所有充作公用。众既得资，当议决三事：（一）就武昌城内择要多开旅社，平时互通声气，有事即为集合点；（二）在汉口分租密室，专制造发难时应用之炸弹及旗帜文告等；（三）派人赴上海购办手枪，并邀黄克强、宋教仁、谭人凤莅汉主持。遂推居正、杨玉如二人往沪。居、杨莅沪后，乃分访谭人凤、陈其

美、宋教仁等筹划进行，并以一千元交英士代办手枪；更推吕志伊赴香港报告所获成绩，请黄克强筹集巨款。克日北行，共图大举。克强得书，乃电美洲同志令速汇款接济，并拟偕数同志赴沪主持一切。诟行旌未动，而武昌发难之电已至，遂挈女同志徐宗汉等兼程就道抵沪后，更得女医士张竹君之助，设法秘密入鄂。及抵汉口，则已后革命军之占领武汉半月有余矣。盖汉口机关部初拟于八月十五日，令新军各营同时发难。诟期前风声外露，清吏异常戒严。汉口《大江报》猝被封禁，詹大悲等入狱，乃下令延期。至十七日，孙武在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密室制造炸弹不慎，轰然爆炸，即由李作栋扶伤奔入日人同仁医院，余人相率走避。所有名册旗帜印信弹药等尽遭俄警抄掠，其余各机关多被搜查。彭楚藩、杨洪胜、刘尧澄三人先后被捕，以刑讯不屈，同时就义于督署门外。未几武昌各机关均相继破获，张廷辅夫妇及同志等被逮者数十人。蔡济民、吴醒汉、熊秉坤、金兆龙、吴兆麟、邓玉麟诸人以危机四伏，非冒险发难不足挽救，遂于十九夜号召各营俱起，群向督署围攻，相持一日夜。鄂督瑞澂统制张彪知事无可为，相率逃遁。将军铁忠伏诛。八月二十日午后局势大定，蔡济民等以黄克强、宋教仁未至，刘公出汉口狱未渡江，孙武负创，蒋翊武逃亡，乃强挟黎元洪为都督，借资号召。二十三日，谭人凤、居正由上海赶到。二十六日黎元洪就都督职。二十七日始下令派兵渡江，向大智门车站张彪大营进攻。张军及河南援兵望风逃窜。九月初，冯国璋领清军来犯，且有海军为助，声势甚巨。革命军力守刘家庙御之。时革命军锐气虽盛，然缺乏大将指挥，各营人自为战，号令为难，故刘家庙大智门阵地相继失陷，而汉口亦不守。九月七日，黄克强到自上海，全军将士闻之大为振奋。克强遂率兵渡江，阵于满春茶园，与冯国璋血战四昼夜。至十二日下午，卒以众寡不敌败退汉阳。黎都督乃派人迎克强渡江议战守方略，诸同志以克强纯恃革命党资望号召各军，若督师无名，危险实甚，咸主张公推为战时总司令官，以专责成。黎都督从之，遂于九月十三日清晨下令各军自营长以下齐集阅马厂，举行拜将式。届时都督与克强并辔临场，效汉高祖拜韩信故事，登台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官。克强即日组织战时总司令部，以李书城为参谋长。次早率众渡江，坚守汉阳，与清军相持者一月。各省遂得乘机大举，先后响应，如：张凤翔、井勿幕、景定成、李仲持等在陕西；温寿泉、阎锡山、孔庚、姚维藩等在山西；张培爵、夏之时等在重庆；陈其美、李燮和等在上海；朱瑞、陶成章、俞炜、龚味孙等在浙江；胡汉民、朱执信、陈炯明、王和顺、任鹤年、刘师复等在广东；林述庆、章梓、柏文蔚等在镇江；李恢、彭寿松、许崇智等在福建；李根源、罗佩金、蔡锷、黄子和等在云南；杨蔭诚、张百麟、黄泽霖等在贵州；刘古香、王狮灵、周毅夫等在广西；张榕、蓝天蔚等在奉天；吴春阳、管鹏等在安庆；张钟端、王天纵等在河南，皆于九月内举兵讨虏，次第奏功。清廷知大势已去，始派使南下议和，而革命之基础因之日固，卒以开创中华民国之新局。故克强之功，

虽在坚守汉阳，而其能坚守汉阳，以促各省革命党之响应，则关系民国之兴亡尤巨。其后汉阳虽以势孤失守，然克强固已血战逾月，心力交瘁，则非战之罪也。汉阳既失，克强乃走上海，谋率各省义师大举北伐。各省代表于是拥戴克强以组织元帅府。迄中山先生自欧洲归国，当选临时大总统，克强受任为陆军部总长，而民国中央政府遂以产生。世称孙黄为开国二杰，克强诚当之无愧矣。兹录克强于武昌起义前六日致余二书如次：时余已由温高华埠首途赴旧金山筹饷，此书仍寄《大汉日报》转交。余接阅时已在武昌起义后二十余日矣。

辛亥八月十四日黄克强致冯自由书

自由我兄鉴：广州之役，弟实才德薄弱，不足以激发众人，以致临事多畏惧退缩，遭此大败，而闽、蜀两省英锐之同志因此亦损失殆尽。弟之负国负友，虽万死无以蔽其辜，自念惟有躬自狙击此次最为害之虏贼，以酬死事诸人，庶于心始安，亦以作励吾党之气。故自四月初二返港，专意养伤，一面团集少数实行之士，以为复仇之计。除与展堂兄同署布告书之外，未常与一友通只字，其所以如是之孤行者，冀有以排脱一切纠缠，促其进行之速。不意蹉跎岁月，为同事人所阻止，不得进行其志，悲愤交集，无可发泄。适得杨君笃生在伦敦自沉消息，感情所触，几欲自裁。呜呼，人生至斯，生不得自由，并死亦不得自由，诚可哀矣。嗣得兄及中山先生并《少年报》致公堂各同志书，责备甚重，如以弟为系华侨之望，则弟实不敢当。以弟在吾党亦不过徒有虚名，自问于党事初未有如何之实益，若以弟一死为妖党所借口，致阻碍将来筹款之路，或所不免，此则弟日来所踌躇于心而未决者也。七月以来，蜀以全体争路风云甚急，私电均以成都为吾党所得，然未得有确实消息。前已与执信兄商酌，电尊处转致中山先生，请设法急筹大款，以谋响应，尚未得复，今湘、鄂均有代表来沪，欲商定急进办法。因未得接晤，不能知其实在情形，故不能妄断。至滇之一方面，若欲急办，尽可办到，以去年已着手运动，军界会党皆有把握，有二三万之款即可发动。然此方面难望其成功，以武器甚少，不足与外军敌也。滇为蜀应则有余，为自立计则不足，倘蜀败亦同归于消灭而已。是以弟等尚未能决其如何办法，专待蜀事得有确信方敢为之也。粤事弟已组织实行队，先去其阻碍吾党之最甚者，得成功时，再为电告。前兄囑书各字，三月九日以前均作好，闻皆存于令夫人处，不知刻已寄来否？其中有一最足纪念者为林时埭兄赠兄之横额，字势飞舞如生，诚绝笔也。余未及多叙。即请筹安。弟兴顿首。八月初九夜。通函请由金利源李海云兄转交。

又启者：

鄂代表居正由沪派人来云，新军自广州之役预备起事，其运动之进步甚

速（广州之役本请居君在鄂部总理其事，以备响应者），办法以二十人为一排，以五排为一队，中设有排长队长以管领之，平时以感情团结，互相救助，使其爱若兄弟，非他人所得间隔，成一最有集合力之机体。现人数已得二千左右，此种人数多系官长下士，而兵卒审其程度高者始收之，以官长下士能发起，兵卒未有不从者，不必于平时使其习知，况其中又有最好之兵卒为之操纵，似较粵为善。近以蜀路风潮激烈，各主动人主张急进办法，现殆有弦满欲发之势。又胡经武君亦派有人来，胡虽在狱，以军界关系未断，其部下亦约千余人。去岁弟曾通函胡君，请其组织预备，以备响应，胡已扩张其范围，其进步亦速。胡君之人在居君之部下者有之，拟于最近发动，期两部合而为一，据此则数已多，乘此路潮鼓涌之时，尤易推广。盖鄂省军界久受压制，以表面上观之，似无主动之资格，然其中实蓄有反抗之潜力，而各同志尤愤外界之讥评，必欲一申素志，以洗其久不名誉之耻。似此人心愤发，倚为主动，实确有把握，诚为不可得之机会。若强为遏抑，或听其内部自发，吾人不为之指挥，恐有鱼烂之势，事诚可惜。即以武汉之形势论，虽为四战之地，不足言守，然亦视其治兵之人何如，贼吏胡林翼于破败之秋，收拾余烬，犹能早然自立者，亦有道以处之。今汉阳之兵器厂既归我有，则弹药不受缺乏，武力自足与北部之兵力敌。长江下游亦驰檄可定，沿京汉铁路以北伐，势极利便。以言地利，亦足优为。吾人之纯然注重于两粤而不注意于此者，以长江一带，吾人不易飞入，后来输运亦不便，且无确有可靠之军队，故不欲令为主动耳。今既有如此之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动，宁、皖、陕（前本有陕西人井勿幕君在此运动，今已得有多款，势亦足自动，熊克武君已驰赴该处为之协助）、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急宜趁此机会，英勇精进，较之徒在粤谋发起者，事半功倍，且于经济问题尤易解决。兹约计各处大略有二十万左右，即足为完全之预备，至少四五万亦可发起鄂事。总之，此次据居君所云事在必行，即无外款接济，鄂部同志无论如何竭绌，亦必担任筹措，是势成骑虎，欲罢不得。吾人当体验内地同志经营之艰苦，急为设法筹集巨款以助之，使得有以宽裕筹备，不致艰困从事，归于失败，徒伤元气，不胜切祷之至。弟本以欲躬行荆、聂之事，不愿再为多死同志之举，其结果等于自杀而已。今以鄂部又为破釜之计，是同一死也，故许与效驰驱，不日将赴长江上游，期与会合，故特由尊处转电中山，想我兄接阅，必为竭力援助。前加属于广州之役最为出力，此纯系我兄血诚所感，故能有此。今更望有以救我，拟得兄等复电后，即行。或南洋之款须弟一亲往，亦未可知。余俟续告。手此复颂文安。弟兴再顿首。八月十四日。前函书未发，适鄂派人来故特补叙，又及。

辛亥武昌起义之革命团体

中华民国之肇建，世咸归功于清季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中国同盟会数大革命团体，而中国同盟会实总其成，此公言也。至最后之辛亥武昌起义一役，则有日知会、共进会、文学会三团体为之策动，均与同盟会有直接间接之关系。兹分别叙述其源流及组织经过与事业等等如次：

（一）日知会 湘鄂二省之基督教徒向在武昌、汉口、长沙等处设有传教机关，名曰圣公会。在武昌之圣公会设于高家巷，胡兰亭牧师主之。在长沙之圣公会设于吉祥巷，黄吉亭牧师主之。胡、黄俱抱革命思想，故自庚子（一九〇〇年）八月，唐才常、林锡圭失败之后，湘、鄂二省志士刘贞一、冯特民、曹亚伯、禹之谟等恒假圣公会为护符。癸卯、甲辰（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间，遂组织日知会为革命运动之枢纽。其会所书报社即附设于圣公会内，借以避免军警耳目。先后入会者，在鄂有胡华亭、刘贞一、冯特民、曹亚伯、季雨霖、李亚东、朱子龙、吴贡三、殷子衡、石志泉、吴崑、熊子贞、徐祝平、梁钟汉、吴兆麟等。在湘有黄吉亭、黄軫（后更名兴字克强）、禹之谟、刘揆一、宋教仁、易本羲、陈天华、胡瑛等。甲辰九月，黄軫、刘揆一、马福益等谋在湖南举事，不幸期前事泄，黄軫潜避于长沙吉祥巷圣公会，赖黄吉亭、曹亚伯之助，间关出险。乙巳（一九〇五年）东京同盟会成立，特派驻日湖北分会长余诚（剑济）回国，会同刘贞一在鄂进行党务，凡日知会会员一律加盟于同盟会，对外仍称日知会如故。刘家运等每于星期日假座文华书院演讲世界列国革命史事，旁及中国革命，军人学生多为感动。丙午（一九〇六年）夏间，刘贞一等以运动军界渐次成熟，乃遣吴崑（寿天）至香港《中国日报》访黄克强求借款大举。黄以华侨款未到手，嘱其静候。是年冬，孙总理因法国有意赞助中国革命，特派山西人乔义生随法国武官欧极乐周游长江各口岸调查革命党实力，刘贞一等在圣公会开会欢迎。法武官及乔义生演说革命，异常激昂。事为清吏张之洞、张彪所知，乃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派兵围困圣公会堂，捕获刘贞一、朱子龙、梁钟汉、季雨霖、胡瑛、李亚东、孙鸿钧、殷子衡、吴贡三等多人，并检出名册四巨本，多属军学界中人，吴崑、冯特民、余诚等幸脱逃。自是日知会及同盟会鄂分会遂被摧残殆尽。刘贞一、朱子龙竟瘐死狱中。胡瑛、季雨霖、李亚东、梁钟汉等至辛亥武昌起义始获重见天日。

（二）共进会 继日知会而起者，有共进会焉。是会成立于丁未（一九〇七

年)秋间,发起人尽属东京同盟会员。其规章方略略如同盟会,惟于入会志愿书所标宗旨上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语中之“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耳。入会资格不若同盟会之严,手续亦无同盟会之繁重。同盟会先须经长时间之严密考察,以定去取,而共进会则无之,此其略异也。其盟书亦用天运甲子纪年,与同盟会同。徽章旗帜用十八锥角交错形,取十八行省铁血联合之义,实为丙午东京同盟会本部讨论国旗各方式之一种,即辛亥举义时所用者是。会员相见时另有隐语暗号,大率以“中华民国”四字分析嵌用为准,有时亦参用同盟会之握手礼。其最高干部亦戴同盟会总理为总理,以示不与同盟会分门别户独成系统。所规定官制全袭用同盟会革命方略之三等九级制,故有都督副督参督及校尉等称。其初目的在运动国内各秘密团体,如三合、哥老、洪江、孝义等会党,使明白共和真理,而共进于革命之大路。本部设于东京,初举四川人张伯祥为会长,江西人邓文辉副之。会员有四川人余竞成,云南黄毓英、张大义,湖南焦达峰、杨锡庶、钟剑秋,江西彭素民,湖北刘公、刘铁、向寿荫,广东聂荆、熊越山,山东刘玉成、谭嗣黄,安徽方汉城等。张伯祥原为四川孝义会首领,党徒极众。戊申(一九〇八年)由日本返国谋大举。邓文辉继任会长,刘公为副。张伯祥等至内地收效颇著,先是长江下游沿岸各党会各守码头,各名山堂。至是乃将各会山水堂名均改为中华山兴汉水光复堂,统一于共进会内,党势由是日振。其后居正、孙武、余邦宪、李殿钧、谢鸣藻、文群、蔡锐霆、邓玉麟、季雨霖等,相继入会。居正尝为厘定章程,依其班辈分为八部。己酉(一九〇九年)×××、黎仲实等至汉口,谋炸清吏端方于京汉铁路车站,以事不果。濒行乃将所携带炸药铁弹等物存放孙武处。辛亥八月十七晚,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部被炸受伤,即此物也。孙武于己酉冬,至香港,访余于《中国报》,始正式加盟于同盟会。据言,是时党人运动军界已渐臻成熟,群以梅花徽章为号。其通信地址一在武昌省城内黄土坡街第五号李寓转孙治安,一在汉口新马路大成印刷公司丁佛堂转金相(号泉山)。自是香港机关部与武汉党人通信不绝,相约同时并举,使清廷首尾不能相顾。庚戌(一九一〇年)共进会东京本部复派黄毓英回滇,焦达峰回湘,刘玉山回桂,刘英、刘公等回鄂,邓文辉、余邦宪等回赣,分头活动。以其工作仅在联络会党,招纳亡命,故成绩不著。至辛亥春,谭人凤、居正先后到鄂,集合同志孙武、刘英、杨舒武、查光佛、焦达峰、杨晋康、邓玉麟等宣布黄克强来书,云定期四月初一开校,属武汉及各省筹备响应。查光佛谓新军振武社诸同志与共进会宗旨相同,且在各标营同志不少,应联合进行,以收实效,众赞成之,并预举刘公(原名湘号仲文)为都督,刘英为副都督,孙武为总参谋,宋镇华为第一镇统制,黄申芎为第二镇统制。及是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失败,两派同志闻之仍合力进行,志不少懈。刘公即以所寓之雄楚楼第十号门牌为集合机关,更出其预备北上纳粟捐

官之五千金为发动费。夏间，两派开联合大会分组各部，以蔡济民、吴醒汉、杨玉如、张振武等任参议，居正、杨时杰等任内务，查光佛、牟鸿勋等任交际，刘公、李作栋等任财政，蒋翊武、刘尧澄（复基）等任军务，彭楚藩、徐万年、熊秉坤等任各标营代表。后又议发难时以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刘复基副之，孙武为参谋长，蔡济民为参议长，吴醒汉、徐达明、王宪章、张廷辅、王文锦等为参议，谢石钦、潘公复、丁笏堂、陈磊等分任秘书干事等职，邓玉麟、李作栋任传达命令。举事时同志皆以臂缠白布为号。会四川铁路风潮大起，清廷派端方率湖北新军四十二标入川镇压，众以事势紧急，先期令居正赴沪，邀黄克强、宋教仁莅鄂主持大计。旋决定八月中秋日大举，因初八夜南湖炮营同志饮酒闹事而止。复改期十八夜十二时发动。诘是日下，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机关部因制炸弹不慎被炸，即避入日人所设之同仁医院。当被俄捕将弹药文告名册印信旗帜概行搜去。被捕之同志彭楚藩、刘尧澄、杨宏胜三人即于是晚为鄂督瑞澄杀害。武昌山前山后胭脂巷小朝街各处机关陆续破获。刘公、张廷辅等数十人先后被逮，是时湖北新军三十一标已随端方入川，四十一标中之大部则开往荆州，三十一标及马队炮队陆军中学均在南湖，四十二标则驻汉口城内，惟二十九标三十标同驻一营房，第八镇工兵营亦驻附近。蔡济民等闻彭、刘、杨三人遇害及诸同志被捕，决计于十九夜八时在本营房冒险发难，届时工兵营士兵金兆龙、熊秉坤开枪击队官阮某，毙之。方兴继掷炸弹，全营俱起，随进攻楚望台军械库。三十标同志吴醒汉、胡效騫等继之，更合南湖炮营会攻督署。蔡济民复率二十九标会攻，架炮于蛇山以击之。天明，瑞澄、张彪相继逃走。众以秩序急须维持，而革命军诸首领黄克强、宋教仁、刘公、蒋翊武、孙武等均不在城，乃强胁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首由蔡济民、吴醒汉、邓玉麟、高尚志、张廷辅、徐达明、王宪章、王文锦、谢石钦、陈宏诰等十五人组织谋略处，继复组织都督府及军务、军令、内务、财政、外交各部，布告安民，事乃大定。刘公出汉口狱渡江后，众以都督一职已归黎元洪，而刘无所得，乃推任为总监察。九月一日，焦达峰、陈作新起义于长沙，杀清总兵黄忠浩，众推达峰任都督，作新副之。至初十日，有降将梅某等以代黄忠浩复仇为辞，煽动黄部兵士作乱，焦、陈先后被戕。谭延闿继其位。邓文辉初率蔡锐霆、余邦宪、彭素民等奔走于萍乡、醴陵一带，与焦达峰相呼应。适驻萍营长胡谦弃职逃去，邓等领有其众，遂光复赣西数郡，后率北伐军会师南京，南北和议成后始遣散。黄毓英返滇后为人杀害。杨锡庶、钟剑秋在湘亦死于非命。张伯祥在蜀以孤立无援致败。至是共进会会员之得志者仅湖北一省而已。统一政府既成立，共进会宣布解散。有一部会员组织民社，因与黄克强意见不惬，乃附于共和党，与国民党相抗衡。而另一部会员则仍由同盟会改组而为国民党员，始终不渝也。

（三）文学社 鄂省军界革命同志自丙午日知会被封禁后，次年（丁未）即

有群治学社之组织，是为湖北新军创设革命团体之嚆矢。发起人为士兵杨王鹏、潘康时（队官）、林兆栋、黄申芎、黄元吉、邓玉麟、荣维亚、曾省三等。同时上海中国公学学生蒋伯夔（号翊武）至鄂，入四十一标当兵，结识查光佛、蔡大辅、唐牺支、李抱良、钟琪、刘尧澄（复基）诸人，力赞其成。查光佛、刘尧澄、宛思演、詹大悲等且在汉口发刊《商务报》以从事鼓吹，于己酉冬月出版，颇受社会欢迎。庚戌三月，湘省有闹米案发生，而汉口同时亦有争路风潮。鄂督特调新军人湘协助弹压，党人拟乘此时机举事。黄申芎、刘尧澄、查光佛等在四十一标计划发难，命陆军学生孙昌复自汉口潜运炸弹入省城，以爆裂为号。机泄，统制张彪恐激成大变，不敢深究。于是黄申芎走沪，林兆栋、黄孝霖走川，《商务报》亦被查封。群治学社遂为之一顿挫，然众志成城不为少懈。是年六月，刘尧澄复投四十一标为兵士，与蒋翊武、杨王鹏、唐牺支、李抱良、蔡大辅、潘康时、王守愚等谋赍续进行，更名振武学社。查光佛更联络各标营同志，以蛇山蕲春学社为机关，兵士报名入会者络绎不绝。计当时与谋者，有二九标排长蔡国桢（济民）高尚志，见习学生甘绩熙、杜武库、夏一鸣、杨选青、马骥云等，三十标队长张廷辅、队官潘康时、兵士吴醒汉（基培）、王宪章、万国宝、徐达明、王文锦、陈复元、冯中兴、罗良骥等，三十一标曾省三、黄元吉、李建中等，三十二标孙昌复、向海潜、单道康、李成牧、冯扶青、朱黄强等，四十一标蒋翊武、丁人杰、蔡大辅、廖湘芸、李抱良、唐牺支、曹衍、王华国、李达五、章裕昆等，四十二标丘文彬、曾汉城、张喜天、刘化义、胡玉珍、黄镇中、祝制六等，炮队徐万年、孟发成、黄驾白、陈国桢、陈子龙等，马队钱升甫、江炳灵、陈孝芬等，工兵营熊秉坤、金兆龙、方兴、马荣、李乃斌等，陆军中学席正铭、雷洪、谢莱、侯源英等，陆军测绘学堂李翊东等，辎重营胡祖舜等。振武社成立后一月，蒋翊武等利用星期假日，约集各标营代表二十余人在蛇山抱冰堂开一秘密会，制定标营队排各代表负责公约、规程，重行制定简单口号以为志，以是部勒完整，进行益猛。未几潘康时辞差出洋，施化龙代为队官，侦知其事，乃向上峰告密。杨王鹏、蔡大辅、李抱良因此被黜。凡稍涉党籍嫌疑者多托故避去，而团体复散。是年冬，蒋翊武鉴于屡次失败，欲求一完善保全之策，遂以研究文学为由，更名文学社。同时詹大悲、何海鸣办《大江报》于汉口，与为声援，胡瑛在狱亦与闻其事。辛亥正月元日，蒋翊武、孙昌复、詹大悲等九人召集发起会于黄鹤楼，讨论进行方法。时社员已有八百余人，推蒋翊武为临时社长，詹大悲等为起草员，编订社章。社中置正副社长各一人，下分参谋总务两部，部分数科。各标各营均举一人作为代表。二月十五开成立大会于小东门内同文学舍，选举职员，举定蒋翊武为正社长，王宪章副之，参谋部刘复基，参议员王华国、杨载雄。侦探科唐鼎甲，联络科王守愚、李肇甫，调查科龚使初、陈磊，总务部长张廷辅，庶务科罗良骏、唐牺支，会计科邹毓琳，纠察科胡培才、

蔡子胜，惩罚科胡玉珍。此外蔡大辅任书记，詹大悲任汉口交涉联络事宜，胡瑛参与社中一切机要及各处联络事宜。各标营代表为王文锦、曹子青、江光国、廖家骥、祝制六、陈俊德、高尚志、张哲夫、单道康、叶振中、陈道行、黄驾白、李翌寰、黄继汉、余凤斋、晏柏青、刘斌一、钟继武等。又陆军中学代表为雷洪、席正铭、卢华等。不数月，势力膨胀，大有不可遏抑之势。于是更派员赴各省运动。计当时所派者，上海杨王巽，江苏钟崎，安徽邹运猷，湖南杨王鹏，两广李抱良，山东、直隶刘九穗，云南胡乔，东三省邓韬。是年三月，查光佛、刘尧澄建议与共进会联络大举，会众咸赞成之，由是两派合力进行，势益雄厚，乃更组织一将校研究团，内附属下士班，专为运动下级干部及士兵等，即以蔡济民、吴醒汉、张廷辅、王宪章诸人主之。迨川路事起，两派均主乘时大举，公推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刘尧澄副之。时社员已增至三千人。社中经费除由李晓湘说汤化龙使担任数十元外，余概由社员筹集。正计议间，而汉口俄租界机关部于八月十八日，以失慎破获。同志杨宏胜亦因运送炸弹在其中和门正街寓所被执。宪兵彭楚藩及刘尧澄、蒋翊武等在另一机关会商急发。翊武主走避。尧澄拔手枪止之曰：“事前公举兄为临时总司令，事急应负责。若兄畏死，请先领予一弹。”楚藩急止之，正待下令，而逻者追至。尧澄掷以炸弹，而弹不发，遂被捕。楚藩、翊武越墙逃，为后门步哨所执，同解至巡警道署。翊武服常服，状若佣役，得乘间逃脱走避岳州。彭、杨、刘三人在督署受讯，怒叱清吏瑞澄、铁忠，历数满虏祸国罪状，卒为瑞澄杀之于督署门外。于是各秘密机关均被破获，交通断绝，人人自危。各标营同志为死中求生计，遂于十九晚大举发难，而开国逐虏之义举成矣。当发动时，王文锦、彭纪麟、马得胜、谢用权、张哲夫、李重任、余凤斋、阙龙、胡培才、江光国、王万年、熊秉坤、马世忠、杨载雄、金兆龙首先进攻，夺炮据军械库。黄驾白、单道康、黄维汉、蔡汉卿、刘斌一、钟继武、陈国镇、雷洪、席正铭、卢华、侯源英、谢代惇等先后率同志入城，攻督署，分占楚望台及蛇山。瑞督逃窜，省垣克复。继是王宪章、胡玉珍、祝制六、戈承元、邱其斌、黄振中等克复汉阳。詹大悲、何海鸣、林翼支、赵绳武、鄢树藩等克复汉口。三镇遂尽为我有，大局以次底定。其他如恢复荆宜一带则有唐牺支等。荆襄、郢安一带则有季雨霖、阙龙、彭玉珍、章裕昆等。克复重庆则有林兆栋等（后为夏之时所忌谋害）。此文学社实行革命之大概情形也。嗣南北统一，同盟会改组政党，文学社乃宣布取消名义，全体加入同盟会。无何，同盟会等六政团合并而成立国民党，文学社员咸为当然党员。癸丑（一九一三年）七月，赣、宁讨袁军起，旧文学社员踊跃赴义者，大不乏人。黄克强在南京败逃后，何海鸣、王宪章等尚能守城拒敌，血战经旬，世人咸称道弗衰。讨袁军既败，蒋翊武、王宪章、蔡大辅等先后为袁政府杀害。余人逃亡各地，备尝艰苦，今生存者已寥寥可数矣。

馮自由著

革命逸史

第二集

蔣中正



本书第二集大意

一、本书第二集系将香港《大风》旬刊及十日刊三年来所载革命逸史重新整理汇集而成。并根据事实时期人物三者分别先后另行编排。

一、本书可与中华民国十七年出版之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中二编互相印证参考。盖开国前革命史乃记载每次革命运动之本末。而本书则特重个人传记及轶事。足以补开国前革命史所未及。

一、《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下编编辑早已就绪。各地人士时有敦促出版之函牍见寄。著者以环境及时势关系未能早付剞劂。良用歉然。今特从下编内抽出可以发表之事实。先在本书次第披露。以供快睹。

一、本书所载史料。除就著者记忆力所及分别录出外。其余概以己亥年（一八九九）出版之香港《中国日报》。及著者多年珍藏之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为底本。惟挂一漏万。仍恐不免。海内外诸老友倘能列举所知。匡其不逮。无任欢迎。

一、本书第一二集尚不及著者身历及见闻种种事实十之二三。此后仍当陆续纪述。汇编付梓。以补正史所不及。

一、本书所载均属最有根据及最有价值之正史材料。以民国至今尚缺乏清季革命时代的正史之公布。故暂以“革命逸史”名之。

自题《革命逸史》十首

仲尼当厄春秋作。左邱失明国语成。我志未酬愧死友。写将逸史寄平生。
赵宣受恶称贤相。崔杼防民号贼臣。千古是非公论在。景阳纲目畏何人。
子房辟谷从黄石。少伯扁舟泛五湖。若使当年工述作。不劳迂固远操觚。
前代传闻有异辞。即今亲见亦支离。何如缔造艰难辈。各述行藏尽所知。
总理重阳唱大风。予生十四便从公。兴中会设横滨日。我是马前一小童。

(注一)

开智录倡平等说。国民报击自由钟。二四六年亡国痛。青年思想自陶融。

(注二)

重光汉业扶中国。善诱侨胞说大同。北美南洋司木铎。空文差幸奏肤功。

(注三)

同盟大会溯先河。七载经营俊杰多。若把关中比香港。不才岂敢望萧何。

(注四)

元年忝掌稽勋局。晚岁重修革命编。自信董南能直笔。开基功业此书传。
数典忘先大有人。沐猴蒙马更纷纷。一篇实录皆身历。启导青年认国魂。

注一：总理于乙未秋冬间亡命日本，与余父发起兴中会于横滨，余时年十四，奉父命宣誓入会，并司传递书信之役。

注二：余于庚子冬与郑贯公冯斯栾等发刊《开智录》于横滨。辛丑夏与戢元丞沈翔云王宠惠秦力山等发刊《国民报》于东京，壬寅春与章太炎秦力山马君武等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六年纪念会。总理亦具名为赞成人，是秋秦毓璠叶澜等组织青年会，余亦发起人之一。

注三：癸卯余任香港《中国报》驻东通信员，是秋复兼任美洲《大同报》通信员，此外檀香山《隆记报》及新加坡《图南报》均借余传达消息。

注四：乙巳秋同盟会成立，总理即派余赴香港主持报务党务军务，庚戌复派余赴北美主持加拿大《大汉报》及旧金山《大同报》，兼筹募起义餉糈。

孙眉公事略

孙德彰，原名眉，字寿屏，广东香山县翠亨乡人，孙总理（以下简称总理）之长兄也。居檀香山时，中外人士皆称之曰阿眉，鲜有知其名德彰者。眉公二字，则于丁未年（一九〇七）自檀香山归国后，同志以其年高德劭，始尊称之。父名达成，早岁业农，娶同邑隔田乡杨氏女为室，阅十载而生德彰。德彰幼聪敏好动，读书乡塾时，性颇强悍不羁。稍长，达成公以乡人多赴夏威夷群岛营工商业，杨夫人之弟文纳适由檀岛返粤，乃使德彰从其母舅赴檀谋生，借谙世故。时夏威夷尚系独立国，为土人君主制，各岛之农工垦殖贸易事业，大部由中日二国人经营之。德彰至檀，初为乡人佣作，旋以舅氏杨文纳之助，自向当地政府领地开垦。数年后更租得茂宜岛荒地千数百亩，广事畜牧垦殖，又在茄荷蕾埠设一商肆，为销售农牧出产品机关，因而渐致富厚。丁丑年（一八七七）夏威夷政府以德彰经营农牧，成效卓著，特许以多招华人来檀，大兴垦务之权利。德彰遂于回粤娶妇之便，在翠亨乡招徕乡人赴檀工作，一时应者甚众，同时更租一大帆船，载此项移民数百人以往，在檀之老华侨莫不惊其魄力之伟大焉。次年戊寅（一八七八）德彰以所业日进，乃函请达成公挈杨太夫人及幼弟赴檀就养，达成公无意远游，只命总理陪杨太夫人前往，时总理年仅十三而已。德彰初命总理在茄荷蕾埠商肆习懋迁术，旋知总理有志求学，乃遣赴檀山正埠教会学校习英文。癸未年（一八八三）总理以受耶稣教薰陶多载，渐笃信教义，毅然欲受洗礼。德彰闻之，恐总理日趋洋化，遂使回粤专攻国学，以补不足，且分授财产一部以策励之。总理回粤后，与邑人陆皓东同致力国学，日有进益，尤于乡人迷信偶像事，攻击不遗余力。某日，乡中北帝庙及天后庙之偶像先后被毁，乡人指为总理及皓东所为，群向达成公责难，达成公乃遣总理至香港就学以避之。德彰得父书，遂召总理赴檀免祸，并令退还所给财产以示惩戒，总理无异言。居久之，以屈处茄荷蕾小肆，其志不伸，遂自赴檀山正埠，拟取道归国，德彰亲往慰留，且以不给旅费难之。总理乃求助于授业师美教士芙阑谛文，芙教士慨然赠以美金三百，总理始获成行。既而德彰深悔督责总理过严，即以巨资寄达成公助总理向学。戊子年（一八八八）春达成公病故，德彰于数月前闻父病重，已回粤奉侍汤药，至是对于总理爱护备至，凡总理所需学资，均允源源供给，故总理在粤港肄业医学多年，用度宽裕，皆德彰所给予者也。

癸巳年（一八九三）夏威夷群岛土人大举革命，土王拒战不利，被逼退位，

遂改君主制为共和。德彰往日思想顽固，侧重保守，至是耳濡目染，心理为之一变，每闻乡人自祖国来，报告总理时作歌颂太平天国及反清复国言论，咸不以为异。戚族中有恫以抄灭家族等辞，促其劝阻总理行动者，概一笑置之。甲午（一八九四）中日开战，清军连战俱败，总理以国势阽危，非倾覆异族政府，改组民主政治，不足以图匡救，遂于是年秋冬间赴夏威夷，向旧日亲友募集义款，企图大举。抵檀后先莅茂宜牧场就商于乃兄，德彰嘉其志大言大，首赞成之，且划拨财产一部为助，复致书檀山正埠亲友为总理先容。于是正埠有志侨商何宽、邓荫南、李昌、郑金、郑照、李禄、刘寿、刘祥、程蔚南、黄亮、钟木贤、曹采、刘卓、陈南、许直臣、宋居仁诸人，遂先后加入总理所倡设之兴中会，并募得义捐数万元。总理得款后，乃于是年十一月归香港大举进行，旅檀同志邓荫南、陈南、宋居仁等亦先后回国参与义举，德彰大有力焉。乙未（一八九五）九月，广州第一次革命之雄图，既以事前失败。总理初亡命日本，组织横滨兴中会。旋赴檀岛晤德彰商再举计划，德彰慰勉有加，且属勿馁初志。未几杨太夫人偕总理卢夫人及其子科亦由乡人陆文灿护送至檀，均居茂宜牧场。德彰语总理，谓在檀同志新遭失败，人怀懊丧，筹款宜徐图机会，此时应先向他处发展，乃易为力。总理深以为然，因有美洲及英国之行。至丙申年（一八九六）九月，总理遂有被囚伦敦清使馆之一幕。

己亥年（一八九九）总理以康徒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等渐赞成革命，往还颇密，因有联合组党之举。事为康有为所知，立派门人叶觉迈携款赴日本，勒令启超即赴檀岛开办保皇会。启超不得已遵命赴檀，濒行约总理共商国事，矢言合作到底，以檀岛为兴中会发源地，力托总理为介绍同志，总理坦然不疑，乃作书为介绍于德彰及诸友。是岁十一月启超抵檀，持总理介绍书见侨商李昌、郑金、何宽、卓海诸人，备受欢迎，旋赴茂宜岛访德彰及其戚属杨文纳、谭允等，德彰招待优渥，且令其子阿昌执弟子礼，复导启超乘马遍游牧场，经日始毕。启超惊其规模之伟大，抚德彰背曰，人称君为茂宜王，今乃知为名不虚传。德彰闻之大乐。启超乘便渐以组织保皇会之说进，谓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与令弟之宗旨实殊途同归。德彰人素戆直，且误为预得总理同意，遂允竭力助其成事。故在檀旧兴中会会员李昌、黄亮、钟木贤等亦同入彀中，前后捐助汉口起事军饷逾华银十万元，德彰更令其子阿昌随启超至日负笈于康徒所设之大同学校。总理在日闻之，乃驰书责启超失信背义，并劝德彰及诸友勿为所愚。然德彰及在檀兴中会会员受毒已深，久未觉悟，其后孙昌至日留学虽由总理代管学费，然仍申父命，与檀侨子弟罗昌（罗登桂之子）、何望（何蕙珍女士之弟）、梁文贤（梁荫南之弟）等同肄业东京大同学校，总理亦不能禁之也。时启超前后有多函致德彰备陈筹款保皇各事，兹择录二通如次（原函现由冯自由保藏）：

其一

孙眉仁兄同志阁下：拜别以来，忽经旬日，每念厚谊，未尝或忘。近日北京事益急，各国西报日日扬言必当救皇上废西后，而唐山来书，南方预备既足，亦指日起事，此诚今日最大机会也。弟因现时外交之事甚要，欲急往美，本拟十号搭阿士梯耶前往，因太急不能得船位，而昨日多力船来，接有香港新加坡两电，皆催弟即刻回唐，又别有一电催会项也。弟尚未定行止，然弟意究以往美为要，因唐山事有弟不为多，无弟不为少，美国事则惟弟就近前往乃可也。故现时仍往美为多。阿昌随行之议既决，望阁下即遣其克日前来大埠，以便同往，弟约在二十号之船必启行矣。今日得接德初兄来书，内附阁下所惠隆仪五十元，谢谢！阁下前为公事，既已如此出力，复多所馈赠，于弟诚不敢当也。本月四号大埠本会请酒，集者百三十余人，道咸值理数名皆到，是日共加捐六千余金，今日钟木贤黄亮又各加捐三千元（四号之会两位已各加捐千元）。可谓踊跃之至。人心如此，大事何患不成？望告各同志即将会款迅速收集，急需汇归，以应急需，是所切盼。此请义安！太夫人尊前望代弟请安！杨文纳兄谭允兄处望代传电问候。弟启超顿首。七月七号。

其二

孙眉仁兄同志：阿昌到埠得接手书，欣悉一切。弟本拟搭二十号之船往金山，乃于本日唐山金山船同时到埠，接有新加坡电文两封，上海香港日本信函多件，皆催弟即日归国办事，不可少延贻误。弟看此情形，必是起义在即，有用着弟之处，再四筹度，不能不改而东归，决于明日搭日本丸东返矣。弟此行归去，必见逸仙，随机应变，务求其合，不令其分，弟自问必能做到也。至弟既东行，行踪无定，所有阿昌相随之议，似可作罢论。盖东方无甚可开见识之事，而阿昌现当就学之年，似仍当今其入书馆，胜于东归也。此子循良，弟甚爱之，望其勉学成就，他日共事之日正长也。至于令侄及各同志捐项，仍望赶收赶汇，因唐山急催弟归，其事机之急可知，其需款之急更可知矣。匆匆手此告别，即颂义安！杨纳谭允诸兄望打纲线代弟问好告别。弟启超顿首。七月十七日。

夏威夷群岛自戊戌年（一八九八）已合并于美国，美取保护制度，置总督一员治理之。己亥年秋冬间，檀岛疫疠盛行，当地政府乃火焚疫病区，以杜传染，居民多被驱逐市外。华侨以财产损失不貲，咸怨恨祖国政府之保护不力。启超至檀时，距火焚华埠事未远，闻者惑于拥护清帝变法维新，足以保护海外侨民权利之说，以为起兵勤王一途，实较革命排满为事半功倍，故于启超之倡设保皇

会，多踊跃参加，而旧兴中会员尤称得力，德彰亦其中之一人也。及庚子（一九〇〇）后，康梁师徒敛财之真相，逐渐暴露，信用日见消失，于是在檀之旧兴中会员，多深悔前误，颇有以总理前此介绍非人为辞者。阿昌在日本一年，德彰即召之回檀，旋遣赴美国加省习医。癸卯年（一九〇三）秋总理自日重莅檀岛，时保皇会势力已渐衰弱，其党《新中国报》对总理所主张大肆排击，总理乃假旧兴中会员程蔚南所设《檀山新报》，亲撰论文以驳斥之，革命党势因之复振。旋往茂宜岛与家人团聚，旧时亲友以总理深谙医术，每有疾病，辄就之求诊，总理初以此道荒疏为辞却之。德彰谓既是医生，毋庸固执；总理遵命行之，就诊者莫不著手回春，众咸惊为神奇。其母杨太夫人语总理曰：“革命目的在救人，行医目的亦在救人，第是救人，何必东奔西跑，自寻烦恼？”德彰曰：“行医只能救少数人，革命则能救多数人，吾弟奔走革命多年，自应始终一贯，岂可轻易变更，前功尽弃。”闻者咸奉为至言。然德彰是时之经济状况，已大不若前此之丰裕，盖美国治檀后，对于各岛农牧租地条例施以种种限制，茂宜牧场收入远不如前，故总理于是冬美国之行，德彰不能多所供应。濒行除给予少数川资外，另赐龙涎香一枝，备旅途不时之需。次年总理至纽约时，尝以龙涎香求售济急，即此物也。又德彰与舅氏杨文纳均以总理从事革命有年，仍以未加入最老革命团体之洪门为憾事，力劝总理从速入闾拜盟，以加强革命同志之合作，总理欣然从之。即凭洪门叔父钟水养之介绍，加入檀岛之致公堂为会员。及抵旧金山，保皇党徒竟勾结美国关员阻其登岸，赖旧金山致公总堂干事黄三德唐琼昌等仗义代延律师向美政府抗争，始获安然入境。事后人咸佩德彰文纳之有先见之明焉。

甲辰乙巳间（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夏威夷政府改订租地年限条例，依新章于旧租地者极为不利。德彰乃延律师抗争，此案至丁未年（一九〇七）春始由法院判决，旧租地者败诉，德彰以是损失不貲。茂宜牧场同时须归还政府，德彰不得已于是年秋偕老友杨德初归香港。初寓《中国报》社，由冯自由招待一切。旋赴越南河内与总理筹商善后方法。时总理方经营钦廉及镇南关军事，需款孔殷，故不能为乃兄之助，德彰遂决意将夏威夷数十年经营之事业全部收束，且迎旅檀眷属移香港九龙城，税屋以居，杨太夫人及总理卢夫人等与焉。时陈少白已以数年协助富商陈赓如杨西岩等反对粤汉铁路官办之故，获得酬劳费九千元。即用此款购置九龙牛池湾荒地十数亩，经营别墅，所剩余地甚广。及遇德彰乃欲售与余地之半为开辟农场之需，许其俟结束在檀余产之资汇到，然后偿付地价，德彰甚德之。遂与杨德初及其乡人等营建庐舍，及从事种植果菜饲养鸡豚等工作。虽土木缝任纤介琐事，亦多躬自为之。盖其多才多艺，勤俭耐劳，自初莅檀时已然耳。未几德彰得檀友讯，知余产所得仅足清付讼费，大为失望。少白闻之，仍重申前约。德彰呵之曰：君办理《中国日报》时，吾得舍弟信曾汇款助君多次，今君乃忍以戈戈之数相逼耶？言时声色俱厉。少白气为之慑。退而语陈

景华冯自由曰：弟是华盛顿，兄是拿破仑；华盛顿，可容易商量，拿破仑则真无法应付耳。由是双方感情日劣，经冯自由周旋其间，事乃寢息。

己酉年（一九〇九）冬同盟会运动广州新军反正，将次成熟，决意在粤大举。时担任制造青天白日之革命旗帜者有二处，一在香港湾仔东海旁街七十六号四楼冯寓，李自平、陈淑子、卢桂屏诸女士任之。一在牛池湾德彰农场，德彰及德初等任之。事为邻居陈少白所闻，虑因此惹起当地警吏干涉，牵累地产所有主，乃再三向德彰警告制止。德彰大愤，遂将布料缝车等件，尽移至冯宅合力缝制，数日内成三色旗百余幅，是即庚戌年（一九一〇）倪映典率广州新军起义一役所用之旗帜也。经此役后，德彰在九龙一带，渐与秘密会党交结。辛亥年（一九一一）春更大开门户，广事招徕，从者日众，当地政府乃下令使之离境。于是德彰遂以农场还诸少白，自与杨德初赴广州湾，易名黄镇东，以广州湾三泰利号为通信处。尝致函加拿大温高华埠《大汉日报》冯自由求助，冯以小款济之，德彰居广州湾时仍宣传革命，大招党人，高雷土人入会者，踵趾相接。至是岁九月粤省光复，始返国。

辛亥广州光复之后，胡汉民陈炯明迭任都督，一部同盟会员及华侨之不嫌于胡陈者，乃有恢复旧兴中会之议，群拥德彰为首领，以与军政当局相抗衡。德彰忠厚性成，颇为所用。实则辛亥以前旧兴中会员之参与其事者，殆无一人，德彰特供其傀儡品而已。民元南京政府成立，陈炯明屡言辞都督职，于是粤省党人军人及各社团各自选举都督，电请孙大总统委任，中以举德彰者为最多。南京总统府收受此项电文，前后凡百数十通。孙大总统乃电复粤各界，解释不能委任乃兄之理由：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辞极剴切，众乃无言。未几，德彰自粤赴宁，拟向孙大总统面陈粤政得失，从者有失意军人黄士龙等数十人。及抵南京，乃痛言让位袁世凯之失策，并指摘粤省胡陈二督施政之误谬，对于胡汉民尤责难有加。孙大总统惟力劝其从此勿预政事，息影林泉，以娱暮景而已。癸丑秋各省讨袁军既败挫，总理亡命东瀛，德彰亦自乡移居澳门，自是惓惓国是，郁郁不乐。民国四年以病卒于澳门旅次。遗一子，即阿昌，号振兴，于民国六年总理率海军南下护法后数月，在黄埔海面为海军所误杀。

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

孙总理幼名德明，字日新，别号帝象。其帝象二字之称谓，乃由其母杨太夫人平日信奉乡人所崇祀之神祇有所谓北方真武玄天上帝者，因以此名赐之。粤俗妇女

迷信神权至深，凡儿童出世未久，其父母即使膜拜所信奉之男神像或木石等类，称为谊父母。粤语谓之拜契菩萨。总理所居香山县东镇翠亨乡有神庙二，曰北帝，曰天后。杨太夫人不能免俗，故以其子拜契北帝为谊男，此帝象得名所由来也。总理十三岁，为清光绪四年戊寅（一八七八年），是岁夏五月，随侍杨太夫人赴夏威夷岛，就其长兄德彰以居。次年，德彰遣其入檀香山正埠英国基督教会小学肄业，十七岁壬午（一八八二年），转学于美国教会高等学校，校长为美国教会纲纪慎会所设，校中教员及宣教师芙兰谛文等均器重总理学行，莫不循循善诱。总理久受宗教教义熏陶，信道渐笃。至翌年春夏间遂有克日受洗礼之议。事为兄德彰所闻，深恐乃弟沾染洋化，遂给资令总理归国补习国学，总理欣然从之。

是岁夏六月，总理归白海外，学识长进，尤憎恶偶像，每过庙宇，辄指之曰淫祀。乡人中有陆中桂号皓东者，与总理为总角交，既重聚，契洽逾恒。总理时偕皓东过北帝庙，见有向偶像顶礼者，恒晓以木偶无知，劝勿妄信，乡中儿童纷然和之。某日，天后庙中神像面部因年久漆痕剥落，乡人疑为总理所毁，大哗，以无左证，未便责难。无何，总理毅然欲破除乡人迷信，与皓东同入北帝庙，戏折北帝偶像一手，并毁其他偶像三具，以示木偶不足为世人害。乡人见之大为鼓噪，群向总理父达成公问罪，声势汹汹。达成公怒，操杖觅总理，总理因避至香港，皓东亦赴上海。

总理既至香港，初在拔萃书院肄业，课余恒从伦敦会长老区凤墀补习国文，复结识美国宣教师喜嘉理博士。喜牧师来华传道多年，足迹遍广东各县，识总理未久，知其服膺基督真理而未受洗，遂力劝其早日受礼奉教，以为众倡。总理从之。数月后，总理果偕好友陆皓东同受洗礼于纲纪慎会礼拜堂，总理署名日新，皓东署名中桂，其施受洗礼者即为喜嘉理牧师。总理初号日新，原取大学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义，厥后其师友区凤墀为之改号逸仙，后数年先后从学于广州博济医院及香港雅丽士医院，皆以此名行之。总理之肄业博济医院，亦由喜嘉理牧师介绍入学。

甲申（一八八四年）春，总理转学于香港皇仁书院，每星期日恒至邻近道济会堂听王煜初牧师说教，时其兄德彰接父书，知总理有毁乡中神像事，屡函招总理往檀，谓将委以某项业务。是岁冬十月，总理应召而行，至则为德彰所痛责，谓蔑神兼以累父，且留总理居茂宜岛商肆习懋迁术，欲以少折其气。总理在肆数月，以其志不伸，毅然自赴檀山正埠买舟返国。过檀时，尝向旧业师美教士芙兰谛文求助。芙嘉其有志，赠以赉仪三百，总理始获成行。既归国，在求学及行医期内，先后结识基督教同志，有区凤墀、郑士良、杨襄甫、陈少白、何启、左斗山、王质甫诸人。乙未（一八九五年）九月广州之役，大得其力。及是役失败之后，奔走海外各地，恒得教友之助。在日本横滨，有张果、赵明、乐赵峰、琴菅源传（日本人）等，美国有司徒南达、黄旭升、毛文明、伍盘照、伍

于衍、邓幹隆、邝华汰、黄佩泉等，新加坡有林文庆、黄康衢、郑聘廷等，皆以基督信徒之谊，先后对于总理有所尽力者也。据丙申（一八九六年）冬十一月，总理在伦敦清使馆脱险后，致书区凤墀，详述被难经过，有“此时惟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等语。于此可见总理信奉基督真理之一斑。

考总理之信教，完全出于基督救世之宗旨，然其所信奉之教义，为进步的及革新的，与世俗之墨守旧章思想陈腐者迥然不同。余在日本及美洲与总理相处多年，见其除假座基督教堂讲演革命外，足迹从未履礼拜堂一步。间有中西教士与之讨论宗教问题，则总理议论风生，恒列举新旧宗派历史及经典，详征博引，透辟异常。闻者均无以难之。此又可见总理对于宗教学识之渊博，殊非常人所及矣。又总理自倡导革命以来，所设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等团体，其誓约均冠以当天发誓字样，是亦一种宗教宣誓的仪式，盖从基督教受洗之礼脱胎而来也。

关于总理信教之经过，有喜嘉理博士民国元年纪述，载于美国纲纪慎会月刊一篇，所述总理受洗奉教始末甚详，洵为最有价值之史料。又丙申冬，总理自伦敦致香港区凤墀书，亦足证明总理信仰基督真理之至诚，兹分别译载如次。

美国喜嘉理牧师关于孙总理信教之追述

近数月来，报章杂志，于当代伟人孙逸仙先生之纪载，详且夥矣，然亦有与事实不相符合者，未免为齐东野语之类也。余因忆及曩者与先生之交谊，略述一二，不能尽焉，盖亦可借是以窥先生之风范矣。

一八八三年秋冬之交，余与先生初次谋面，声容笑貌，宛然一十七八岁之学生，时其方自檀香山归。檀香山，其兄营业之地也。先生从兄游，肄业檀埠者已数年，余职在布道，与之觐晤未久，即以是否崇信基督相质问。先生答云，基督之道，余固深信，特尚未列名教会耳。余询其故，则曰，待时耳，在已固无可也。嗣后数月，果受礼奉教，余身亲其事。其受礼之地，在香港旧设之华人学堂中，距现有之美以美会教堂，约一箭地，地不著名，仪不繁重，而将来之中华民国临时第一总统，于是受圣礼皈依主焉。

自是以后，先生移居该学堂之二楼，同室者尚有其他华人，与一大美圣书公会之售书者，余则居于三楼，时相往返，甚爱重之。先生之莅港也，始则肄业于英国圣公会学堂，后乃转入皇仁书院。一八八四年，余与英人某，偕先生赴香山县，即其钓游地焉。未行之先，余等置备福音书若干，拟于途中分售于人，道经澳门，销售颇多，因暂驻足。先生导余等至一中国旅馆，膳宿之费，日仅三四角，食息与共，自澳门复行一二日，乃抵先生家，颇蒙其优待。观其居室服御，知其为殷裕之家，资产在中人以上，殆由其兄营业

发达之所致也。余于客居数日之中，尝一晤其夫人，礼意亦甚渥，当时其好客之情况，及今思之，犹历历如在目前焉。

先生既束身信道，即热心为基督作证，未几，其友二人，为所感动，亦虚心奉教。夫居今日宗教自由之世，而言皈依基督，固不足奇；当日情势，与今迥异，明认基督教者，殊不多觐。盖明认基督者，人咸耻与为伍，以故人人咸有戒心，然先生热心毅力，竟能化导其友人，使不得不出于信仰之途，其魄力之宏，感人之深，可略见其端倪矣。彼侨居海外之七百万华人，皆表同情于其排满之主张，非无因也。即彼同教之信徒，虽受外界之牵制，不能显助其运动，然而已心心相印矣。呜呼，中国能自专制政体，一变而为民主政体，非其感动力之伟大，庸有济乎！

先生热心宗教，百折不磨，方其奉教之初，其兄闻而严责之，谓苟不速与基督教割绝，必不复寄银资助之。长兄之命，凛凛难违；顾其夷然处之，不以稍夺其志，力传基督之道，辟像偶之非，娓娓不倦。其兄察得之，莫知所措，及促之赴檀香山，佯言有业务相托，实则欲其离中国也。既抵檀岛，其兄迫胁禁阻之，又不予一钱，使无以为饘粥资，而其竟不改其初志也。侨居之中华信徒，廉得其情，乃醵资遣之归国，学习传道科，盖彼时其传道之志，固甚坚决也。向使当日香港或附近之地，设有完善之神学院，俾得入院授以相当之课程，更有人出资为之补助，则孙中山先生者，殆必为当代著名之宣教师矣。以其热忱毅力，必能吸引多数人归服基督；无如事不出此，蹉跎数月，而年龄加长矣。乃拟舍此而学医，以为传道而外，惟行医最能为功于社会。余徇其请，为作介绍书于坎尔医博士，且为说项减轻其学费，当时学医之费全年只二十元矣。先生就学约二年余，复返香港，时香港医学堂已设，乃入而肄习焉。其前所学者，皆用华文，至是始用英文，凡阅四年。

当是时，先生始昌言中国之亟宜革新，而密筹实行革新之计划，中国牧师及其同道，闻其绪论，皆秘密与之结合，共谋进行。越至今日，盖已二十年矣。先生既卒业医科，爰于澳门开设药局，规模颇宏敞，中国人之富于资者，皆乐于赞助之。数年后，以经济告匮，遂尔中止。时余方在美国也。一八九四年，余返香港，先生偕伦敦会长老过访，见其神采焕发，温和庄敬，依然曩时态度焉。有伦敦会宗某长者，尝于德京柏林，执华文教鞭者三年，当日指先生顾谓余曰，子果操何术而使之为基督徒乎？盖先生当时已深为名流硕士所器重，颇有左右一世之概，此长老之所由作此问也。（译者按，所言伦敦会宗长老，即区凤墀。）

后此数月，谋于广州举义旗，以事机败露而溃，革命志士，东西奔窜，先生幸脱虎口，基督徒之株连被戮者若干人。于是先生漂泊一身，无国可归，清政府侦网密布，必欲得之而甘心；惊风骇浪，日而陆危，盖濒于死亡

者屡矣。卒于英国进修医学(?)之时，为清使所给，误入牢笼，械归有日矣。一班狐假虎威之奸吏，将借此为博取富贵之捷径，会逢天幸，得与英人康德黎博士通信。康德黎者，先生尝从之肄业，得耗后，竭力为之营救。旋得英相沙士勃雷侯之援手，乃获释放。当时余屡作书投赠，皆得先生答复。既出陷阱，遂不复公然至香港，即税驾日本，亦必销声匿迹，不令人知，盖两地政府，皆逼不得已而禁其入境焉。

倏忽光阴又数年矣，天涯地角，音信阔疏，至一九〇四年，始于旧金山重遇之。先生谓余曰，中国痼疾已深，除推翻帝政外，别无挽救之法。余解之曰，君曩者主张之改革，中国现已采行矣。先生雅不乐闻，第曰，满清恶政府，必不可使复存。同年冬季，余复遇之于纽约华人所设之礼拜堂，形容枯瘁，畴昔英锐之气已销，然于基督教道，则复虔心如初。当时余职司募捐，将于香港建堂，承其介绍某君，则今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之戚晚也。嘱余往访，或能得其协助云云。

任举何事，必须宽筹经济，先生提倡革命十余年来，常求筹集款项，而侨美之华人，类能顺承其意，慨然以巨资相助。其第一次举事所需经费，皆夏威夷群岛与香港所供应者，侨民之乐为接济，所在皆是，皆足以激励内地人民也。夫同是华人，而先生革命之志，独能履九死而不变，是何故欤？盖以宣教师之言论，大都尊重人道，屏斥旧恶，先生既夙闻而心醉之。夏威夷之驱逐女王，又其所身亲目睹者。夫夏威夷女王之罪状，本不若清帝室之甚，而犹不免于摈黜，则中国人民对于清朝之苛制虐政，其可含忍终古而不奋起以图自救耶？此先生之所以鼓吹革命，又以爱同族之心深，所以冒万险而绝无退志也。

今者民国成立，先生竟解大总统之任，而躬行揖让之事，其高尚诚朴之胸襟，与天下以共见，洵不愧为忠直之基督徒也。但按私情而论，先生此举，固非余所心喜，然先生固非遂遁世也，更将拓其计划，造民国前途之幸福，则先生一日生于世，其于中华民国史上，必放一日之祥光异彩，其任职与否，丝毫无所荣辱，而陶铸中华之潜势力，正以是而不可限量。呜呼！十八年来，摈逐国外，投荒万里，孑然一无告之遗氓，而一旦返国，遽行缔造民国之初基，受临时大总统之任，前清内阁亦为所感动而反正，旋转乾坤之德量，惟先生其谁任之！中华民国自此昭垂永久，炳耀万国，皆由其之克己恒忍，始终不渝，汲汲为同胞谋福利，绝不以一身之利害得失而有所欣戚也。向也余固切望其蔚成传道之健将，以救多数垂毙之灵，今见其效忠上帝，服务祖国，解危机于倒悬，卜景运之日新，循是前进，合四百兆人而共受提携，余心亦滋慰矣。

孙总理伦敦被难后致区凤墀书

启者：弟被诱擒于伦敦，牢于清使馆十有余日，拟将弟捆绑，乘夜下船

私运出境，船已赁备，惟候机宜。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在牢中自分必死，无再生之望，穷则呼天，痛痒则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时惟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然究在牢中，生死关头，尽在能传消息于外与否耳。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户俱闭，严密异常，惟有洋役二人日入房中一二次传递食物各件，然前已托之传书已为所卖，将书交与衙内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范更为加密，而可为我传消息者终必赖其人。今既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祷，使我安慰，当必能感动其人，使肯为我传书。次早他入房中，适防守偶疏，得乘间与他关说，果得允肯。然此时笔墨纸料俱被搜去，幸前时将名片写定数言，未曾搜出，即交此传出与简地利（即康德黎）万臣两师。他等一闻此事，着力异常，即报捕房，即报外部。而初时尚无人信，捕房以此二人为癫狂者，使馆全推并无其事，他等初二日自出暗差，自出防守；恐溜夜运往别处，初报亦不甚信。迨后彼二人力证其事之不诬，报馆始为传扬，而全国震动，欧洲震动，天下各国亦然。想香港当时亦必传扬其事，伦敦几乎鼓噪。有街坊欲号召人拆平清使衙门者，沙侯行文着即释放，不然，将使臣人等逐出英境，使馆始惧而放我，此十余日间使馆与北京电报来往不绝，我数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计而谋耳。幸天心有意，人谋不臧，虽清虏阴谋，终与我何，适足以扬其无道残暴而已，虏朝之名，从兹尽丧矣。弟现拟暂住数月，以交此地贤豪。弟遭此大故，如荡子还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

孙总理被囚伦敦使馆之清吏笔记

关于孙总理丙申（一八九六年）在伦敦清公使馆被囚一节，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前编》已叙述綦详。查当日任驻英公使为皖人龚照瑗，使馆职员有龚心湛（号仙舟，龚之侄也）、吴宗濂（挹青，江苏嘉定人）、邓廷铿（琴斋，粤人）、王鹏九、车焕章、谢邦清，及英人马格里诸人，均曾奔走于诱禁总理及预备雇船解送回国诸事。吴宗濂于民国后曾任驻荷兰公使。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年）著有《随轺笔记》一书，录载当时清吏对于此事之计划及一切布置，颇为详尽。余于民十七编著《开国前革命史》时，曾托友人但植之（焘）向吴宗濂借读，借供史料，顾久久未得，无从选录。近由他友多方觅得原书，特将书中关

于此事之记事全文录出见赠，亦清代官样文章之一趣闻也。亟为照录如下：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准出使美日秘大臣杨子清星使函称，粤省要犯孙文谋乱发觉，潜逃赴美，奉总署电令，确查该犯行踪，并飭电知龚星使援香港缅甸交犯约，转恳英国代拿等因，并附节略，叙其面貌年岁籍贯。八月十九日复准通使电称，孙文于西九月二十三日（即华八月十七日）由纽约搭船至英国梨华埔海口登陆等语。时星使卧病已久，神志甚清，当遣参赞马格里（英人）婉询英外部，拟援香港及缅甸交犯约，请拿该犯。外部答二约只能行于安南缅甸，不能施之他处，设竟代拿，必为刑司驳阻。星使之犹子仙舟司马心湛乃雇包探赴梨华埔守候。旋据该探密报，孙文剪发作洋装，于八月二十四日登陆，即日乘火车至伦敦，下榻客店，有二西人随行。九月初四日孙文行经使署之门，遇学生宋芝田（学生者使馆学生也），询其有无粤人在署，宋曰有之。孙即请见，乃进署门，入厅事，四等翻译官邓琴斋刺史廷铿，粤产也，遂与接谈。该犯以异地遇同乡，分外惬意。自言姓陈，号载之，继出金表以观时刻，刺史索观，则镌有英文拼切之孙字，刺史恍然。不动声色，约孙翌日再来，同赴海口探望粤商，刺史欣诺。孙既去，急密告仙舟，转禀星使，星使与马格里王鹏九两参赞密上办法，皆曰可拿。初五午前孙果贸然来，饭后，邓刺使请孙登楼，先至首层，观星宪之会客厅、签押室，继至二层，入李琴伯朋府盛钟卧室，坐谈良久。适马参赞到，刺史遂告孙曰，君能再上一层枉顾弟房乎？孙曰甚好。遂随刺史拾级而升。马参赞在前引导，先入预备之空房内，作开门待客状。邓指曰，此即弟房，请君先进。孙刚涉足，错愕间，马参赞即将房门关闭，告曰，奉有总署及驻美杨子清星使密电，捉拿要犯孙文，尔即是也。既经到此，请暂留一日一夜，静候总署回电。孙见已识破，无可如何，唯唯应命，星使遂飭邓刺史武弁车焕章谢邦清造炮学生宋芝田及洋仆二名，日夜轮守。初七日接总署回电，力嘱慎密办理，不可为英所知，致被反噬，应如何措手，悉听主裁。初八日星使嘱宗濂代拟电稿，言惟有专雇一船径解粤省，否则只可释放，派探密跟，穷其所往，请示祇遵。此电去后，总署无复。十三日星使又发电云：释放宜早，免有痕迹。仍无复电。时署外已有人日夜守伺。十六日英国《格罗字报》忽刊其事，不直使署所为，他报访事人接踪来访，邓刺史力辩其无，马参赞直认不讳。翌晨各报刊布，指为使署拐骗监禁，哗然四起，甚有以使署房屋绘为图画者，亦有以此事标题，特印大字告白，兜销报章者。使馆门口自朝至于日中昃，聚众至数百。英外部沙侯署闻消息，即柬请参赞去，婉告曰，中英交犯约，曾经前大臣议而未成，刻既无约可援，如解犯潜过英地，殊与公例不符，宜将孙文即日开释。马参赞诺诺连声而退，急即回禀星使，不移

时而外部总办及巡捕头果皆戾止，索领孙文。马参赞遂将孙文放出，交该总办及巡捕头，由后门坐车而去，盖避前门聚观之众也。是夜各报刊有孙文对答之辞，殊形荒谬。据谓邓星使告以拟将其装入箱中，运至船上，或先行毒死，解华戮尸，此皆该犯臆造，借以骇人听闻也。西国久无此等刑法，见此数语，益笑中国之教化毫无。十八日接总署复电，内称雇船解粤甚是，电款六千余镑，即令汇丰拨解等因。惜其时孙文已为英廷索去，无可挽回，当即据实电复。十九日仙舟接短工洋仆查耳来信，内言孙文起初几次着伊送信，优给金钱，伊皆一律缴呈马格里参赞，未得分文奖赏。嗣孙复许酬金五百镑送一密信，并嘱其事后离开使署随孙度日，故伊甘冒不法，以洋信密报孙文坎特立门森两英医，两英医即在外设法，派人伺守，并报外部及巡捕房，各报闻之，遂亦附和作不平鸣，致贵署不能不将孙文释放，曷胜怅怅。马参赞当时恫吓，谓如有走漏风声，当送官严办，予是以照实供明，听候惩治云云。仙舟司马以此信示马参赞，马参赞无计可施，徒形愤愤，各报议论纷如，痛斥马参赞及中国使署者又数日，而孙则致函英报，遍谢英廷、英报、英民，文过饰非，倾动众听。英国议绅之不明事理者，且举以诘责政府，拟请转令使馆不得再用马格里。幸沙侯相顾全大体，片言解纷，星使又无所见闻，得以怡然养疴，更幸外部允照星使照会中所请各节，移知香港总督，严查不法，以戢乱谋，而杜后患。即日由星宪咨报总署，此案遂结，然传递密信之奸仆，以孙文所酬止有英金二十五镑，控诸刑司，又不得直，至今迄不甘服。孙逆亦以港督悬有厉禁，不敢回华，以身试法，故辗转窜匿，溷迹东瀛。而我中国东南半壁，即借此得以谧安，则我星宪龚公之一纸公文，保全者诚大而远哉。粤民有知，尚其铸像以祝也可。时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嘉定吴宗濂追识于汉皋铁路局之牟隐庐。

按邓廷铿号琴斋，广东三水县人，乙未前孙总理在广州行医时尝与邓有一面之雅，故丙申远游伦敦，以他乡遇故，自容易受骗。邓后任广州某报记者，自称环球三周客，盖邓时以生平曾三度环游世界之经历炫耀人前也。辛亥革命后，邓于民元二月尝诣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投刺求谒孙总理。总统府副官某等知其曾陷害总理，欲治以汉奸之罪，特向总理请示。总理曰，桀犬吠尧，各为其主，已过之事，无庸深究，彼来求官，但不予之官足矣。即令副官护送邓出府，庶免发生危险，是可见总理器量之广，殊非常人所及也。

老兴中会员谢纘泰

谢纘泰，字日昌，号康如，广东开平县人。生长澳洲雪梨埠，其父日昌，在澳洲经商数十年，有商店曰泰益号，营出入口货贸易。少属洪门党籍，夙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纘泰幼承家训，恒以继述父志为务。岁丁亥（一八八七年），年十六，随父归香港，肄业于皇仁书院，渐结识同志杨衢云、周超岳、陈芝、罗文玉、黄国瑜、刘燕宾、胡幹芝等十六人。在甲午（一八九四）中日战役前二年，已设一书报社于香港百子里一号二楼，名曰辅仁文社。以其时风气闭塞，未敢公言造反抗清，仅与少数友好秘密商谈而已。乙未（一八九五年）春孙总理自檀香山返国，欲联合各地同志在粤举义，纘泰与杨衢云首赞其议，遂于是岁正月二十七日创设总机关于香港士丹顿街十三号，定名曰兴中会。其誓词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众推孙总理驻粤专任策动军事，杨衢云留港任计划餉糈，纘泰与何启任对外交涉事务，定期九月重阳日发难于广州。不幸期前事泄，陆皓东等五人死之，孙杨先后出亡海外，独纘泰留港办理善后。庚子（一九〇〇年）正月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莲珊）因与蔡元培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联名通电，反对清太后废立光绪，为清廷下令通缉，元善逃至澳门，复为清吏捏以卷逃公帑之罪，下诸葡国监狱。纘泰与元善素不相识，因闻其事于兴中会员徐善亭，遂力托香港天足会长英妇黎脱尔设法营救，黎复请香港总督卜力夫人相助，澳门葡督得港督电，立将元善释放出狱。元善得免于引渡清吏者，纘泰仗义之力也。是岁春夏间孙总理企图在惠州起兵，自日本来往南京，道经香港者数次，屡召集重要党员杨衢云、陈少白、郑弼臣等，至舟中会议军务，纘泰与焉。迨闰八月惠州三洲田之义师转战败退，粤督德寿及所部将弁咸集矢于杨衢云，遂于是年十一月贿买凶徒陈林，刺杀衢云于香港结志街五十二号英文教书馆，纘泰乃募集义捐抚恤衢云遗族，复助香港警吏搜罗清吏派凶暗杀证据。粤吏李家焯等卒以此事免职。纘泰有友李纪堂者，香港富商也，从纘泰言加入兴中会，庚子惠州之役，及党中言论机关之《中国日报》，咸得其资助。纪堂素有大志，自惠州义师败挫，久欲再图大举，一雪前耻，纘泰父日昌有老友洪全福，原名春魁，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之从侄也，幼随天王于广西，起义后转战湘、鄂、皖、浙诸省，晋封左天将，瑛王，三千岁。天国败，逃香港，佣洋舶为庖丁，挂名于香港义和行船馆，航海四十载，春秋已高，不克任劳，隐居香港，悬壶自贍。纘泰知其不忘天国，雄心犹在，特介绍与纪堂相识，纪堂以全福为可用，以革命军大将军一职界之，并出巨资助其

大举。全福提议筹措军饷五十万元，缙泰亦提议推举老博士容闳为起兵后临时政府大总统，纪堂均无异议。旋设总机关于德忌笠街二十号顶楼，颜曰和记栈，复派梁慕光李植生等，设办事处于广州市同兴街信义洋货店及河南继业公司和记公司芳村德国教堂等处，定期于壬寅（一九〇二年）十二月除夕占领省城，宣布共和政治。诟事机不密，事前为清吏侦悉，城内外各机关悉被查封，党员梁慕义等就逮者十余人，全局因而瓦解。同时驻香港党员被拘者数人。缙泰与其友《南华早报》记者英人克银汉，力请英政府拒绝粤吏引渡国事犯之请求，卒由伦敦殖民部电令开释，缙泰之力为多焉。自此役失败后，缙泰父日昌愤极成疾，癸卯（一九〇三年）逝于香港，年七十二。缙泰后助克银汉任《南华早报》编辑，专在言论上鼓吹改革，不再与闻军事。民十三追述其生平，笔之于书，题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于兴中会成立始末，纪录颇详，刊诸《南华早报》，惟无中文译本。晚年锐意经营农矿事业，以绌于资本，无所进展。尝屡向国民政府建议，请将杨衢云遗体自香港迁葬国内，以慰忠魂。迄今未偿所愿。本年四月一日病终于香港湾仔轩鲤诗道二三九号本宅，年六十六，遗三子二女。

程奎光事略

乙未（一八九五年）九月兴中会广州之失败，党人殉义者四人，世称朱、丘、陆、程四烈士。程，即香山程奎光也。奎光，字恒敦，号星堂。有昆弟四，伯早歿，仲恒征，叔恒启，名璧光。奎光其季也。璧光少入福建马江水师学堂，既毕业，派赴英国充海军学生，归国后迁广丙舰管带，属广东水师。奎光赖乃兄提挈，亦入马江学堂习驾驶术，随擢镇涛舰管带。时清政不纲，南洋水师自甲申（一八八四年）败没于法舰队，当局不思振拔，腐败如故。璧光奎光咸怒然忧之。奎光尤义愤填膺，隐然有脱离异族政府之志。岁癸巳（一八九三年）孙总理在粤开设东西药房，尝假城南广雅书局内抗风轩为同志聚谈所，同志尤列、郑士良、陆皓东、魏友琴诸人常莅其间，议论时政得失。璧光兄弟与总理有乡谊，且同主张改革，遂亦引为同调。及甲午（一八九四年）中日启衅，璧光奉调率广东水师北上，仍任广丙兵舰管带。大东沟之战，清军败绩，广丙亦沉没，璧光缘是落职归粤。时总理方从檀香山回国，发起兴中会以从事革命活动，奎光亦得力党员之一。及闻璧光郁郁居乡，乃使奎光力劝其兄参加义举，璧光意甚犹豫，乃弟劝以利害，璧光知不能却，始签署誓约而出，其意未释然也。是岁秋，党人决于九月重阳日大举，奎光任运动水师之责，其坐驾舰镇涛与安澜同称粤海水师

之巨擘，故水师大小兵弁多帖然就范。诎是役以期前事泄失败，清吏得间谍密报，先后捕获陆皓东、朱贵全、丘四、程耀宸、程怀、程次、梁荣等五十余人，继又围搜奎光寓所。奎光时患痔疾甚剧，兵警以其供职水师，许其乘肩舆坐马桶而行。及抵营务处时，痔疮溃裂，肠出四五寸，血流被体，见者莫不酸鼻。清吏以其身任职官，令以军棍严刑逼供，奎光大骂满奴可杀不绝。笞至军棍六百，卒气绝而死。事后粤督谭钟麟奏报拿获党人一折，仅言擒斩陆皓东等三人，独于杖毙奎光事，无一字及之。殆以军棍毙人为私刑，故讳言之也。奎光死时，璧光已避地南洋槟榔屿，得免株连。然由是怨总理颇深，久久不与总理生关系。至民七，海军南下护法，始消释前嫌，相好如初。奎光妇何姓，于其夫殉难时，慷慨自经以从。无子，以仲兄恒征之五子耀椿为嗣。

程璧光与革命党之关系

程璧光，字玉堂，广东香山县人，少聪颖好学，性强项，弱冠由清廷派赴英国充海军学生。既毕业成绩冠侪辈，数年后循资格升任广东水师广丙军舰管带。甲午（一八九四年）中日之役，日本海军陷刘公岛，广丙与来远、定远、威远、靖远诸舰先后沉没，璧光幸不死。战后落职回粤，郁郁无以为生。先是孙总理在癸巳（一八九三年）创设广州沙基东西药房悬壶济世，尝假城南广雅书局内抗风轩为同志谈话所，常到叙谈者有尤列、郑士良、陆皓东、魏友琴、程耀宸诸人。璧光及其弟奎光与总理为素识，且有乡谊，故亦常莅其间，相与批评时政得失，引为同调。及次年璧光失职归乡，总理方从檀香山回国，发起兴中会，以从事革命活动，奎光亦为得力会员之一。总理闻璧光落魄返里，遂使奎光约会于西关某机关，语之曰，清廷丧师失地，均由政治不良所致，君身预战事，自无不知，吾今顺天应人，提倡大义，君前年亦赞同此议，即请宣誓入会，共成美举云云。璧光闻言，意甚犹豫，良久不欲署名，总理遂托故离席，密使奎光向乃兄说辞。奎光曰，此地乃造反大营，吾兄到此，已知一切机密，各人何能任兄徒然外出，弟已入会多时，决以身许国，兄亦断不能置身事外，请即毅然入会，勿再迟疑。璧光度不能免，乃援笔书誓而出，其意未释然也。嗣乙未（一八九五年）九月重阳大举之计划失败，总理及杨衢云、郑士良等相继出亡。在粤党人被逮捕殉义者，有陆皓东、朱贵全、丘四、程奎光、程耀宸等五人，即世所称朱、丘、陆、程一案是也。奎光时任广东水师统带，被逮时解卒促之行，家人曰伊病脱肛，肠将出五寸，寸步不能移矣。解卒曰，乘轿坐马桶中何害。奎光被解至营务

处受军棍六百死，其妻亦自缢。璧光惧祸及己，乃避地南洋槟榔屿，住梅县富商谢梦池家，梦池即其后同盟会员谢逸樵、良牧昆仲之伯父也。璧光由是怨总理颇深，遂不再与党人发生关系。明年李鸿章奉使赴欧，道过槟榔屿，谢梦池招待甚殷，璧光亦与同席。鸿章询璧光何故南来。璧光曰，甲午之役全军覆没，朝廷方降罪矣。鸿章曰，此大事于一人何尤，且归，吾当为君电解之。璧光以是归国，得复职于海军衙门。辛亥奉清廷命赴英国监督新造军舰工程，是岁八月武昌革命军兴，未几孙总理膺选临时大总统，璧光率舰在英，孙总理以电邀之，璧光踟蹰甚久。至南北统一政府成立后，始率海圻舰回华。黎元洪于前清甲午前后曾供职水师，隶璧光麾下，极为相得，至是对璧光格外推崇，礼遇甚优。民五六月袁世凯帝制不成，以忧愤死。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璧光受任海军总长。民七夏秋间段祺瑞嗾使督军团叛变，张勋入京复辟之变继作，元洪被迫退位。璧光不直段张辈所为，因率海军抵沪，备国家之缓急。段祺瑞既驱逐张勋，孙总理叠电劝告，使拥护约法，诛锄叛逆以补过，祺瑞卒不之省。总理乃使谢良牧以世谊谒璧光，谓总理决欲赴粤护法，拟迎元洪南下，请璧光领导海军参加义举，海军饷由总理筹备等语。璧光喜，遂亲谒总理坦然释前怨，即于七月二十二日同发表宣言，否认国会解散后之非法政府，率海圻肇和等舰驶粤。当将发之夕，程夫人哭于上海环龙路孙宅之门，不令璧光赴粤，曰吾叔死于君，吾婢死于君，其又欲吾夫死耶？璧光不为所夺，毅然就道。总理既抵粤，乃与国会议员电请黎元洪南下复职，元洪不应，国会议员乃选举总理为军政府大元帅，代行总统职权。民七桂军阀陆荣廷莫荣新等私欲与北方军阀议和，以牺牲护法为条件，以璧光拥护军政府最力，忌之特深。会广东省议会有选举璧光为省长之议，驻粤滇军各将领亦赞成之，陆莫等乃阴使凶徒，狙击璧光于海珠对岸，璧光死焉。自是桂军阀纵肆日甚，而军政府亦渐改组大元帅制为总裁制矣。事后军政府及粤人公葬璧光于海珠公园，并为建设铜像，以垂久远。今日游人过海珠公园，见有巍峨铜像矗立其间，即璧光也。

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

戊戌（一八九八）政变后一年，即己亥年春，康有为已由日本渡美洲，其徒梁启超、韩文举、欧榭甲等留居日本，在横滨发行《清议报》旬刊，攻击清西后那拉氏及誉扬清帝光绪，不遗余力，是岁春夏间，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设宴飨孙总理及陈少白、梁启超、宫崎寅藏、柏原文太郎数人于早稻田私邸，特为

孙梁二人介绍，欲使孙康二派联合为一，共任国是。梁启超初识孙总理，对于总理言论，异常倾倒，大有相见恨晚之慨。由是孙派之杨衢云、陈少白、尤列，康派之梁启超、欧榘甲、梁子刚、张智若、罗伯雅诸人，时相往还，顿形密切。一时孙康合作之声浪，轰传于东京横滨之间。梁复先后介绍章炳麟、唐才常、周孝怀、钱恂等与孙总理相见，孙章二人之订交，即梁为之媒也。孙总理以梁等渐倾心革命，遂有联合两党进行革命之计划。旅日康徒半赞成之。两党有志者协议公推孙总理为两党合并后之会长，梁为副会长。梁语总理曰，如此则置康先生于何地？总理对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于是由梁草拟一《上南海先生书》文长数千言，略谓“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等语。署名者同门十三人。书去后，各地康徒为之哗然，指此十三人为逆徒，呼之曰十三太保。是岁秋启超至香港尝访陈少白，殷殷谈两党合并事，并推陈及徐勤起草联合章程。徐阳为赞成，而阴实反对，因与麦孟华各驰函新加坡，向康有为告变，谓卓如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初得十三人劝退书，已怒不可遏，及得徐麦二人函，乃立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启超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复令欧榘甲赴美国任旧金山《文兴报》主笔。康门徒倡向视其师如帝天，及得康有为答书严词申斥，不准所请。复因梁欧二人先后被逼离日，此十三人之团体遂无形消灭，而孙康合作之局亦随而瓦解矣。梁启超于濒行日，尚向孙总理相约共谋国事，矢言合作到底。并托总理介绍檀香山之兴中会同志相见，总理坦然不疑。孰知梁启超抵檀后，竟食言而肥，遽侵夺兴中会之地盘，据为保皇会有耶？事详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兹不赘述。查当日署名致康有为劝退书之十三太保姓名，询诸与此事有关系之康徒，多已不复记忆。以余所知，此十三人实为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罗普、罗伯雅、张智若、李敬通、陈侶笙、梁子刚、谭柏生、黄为之、唐才常、林述唐等。其中只有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罗普、罗伯雅五人为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舍及万木草堂讲学时代之嫡传弟子，其余八人特慕名拜门而已。韩文举，字树园，番禺人，品学俱优，迭任上海《时务报》、澳门《知新报》、神户《东亚报》、横滨《清议报》、《新民丛报》各报主笔，自号扞虱谈虎客，鼓吹民族主义最力。梁启超在《新民丛报》间有排满言论，以畏惮其师责备，往往假借扞虱谈虎录栏中发表之。韩在民国后，隐居乡井，以教读自给，闻今尚生存，年已七十余矣。欧榘甲，字云樵，归善人，少与邑中秘密会党游，持论激烈，行文高古，尝在《清议报》痛论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理，康有为斥为大逆不道，勒令赴美，及至旧金山，初运动洪门致公堂创设《大同日报》，尝撰《广东独立脱离满清羁绊之说》，文长六七万言，颇受世人欢迎。《新民丛报》特汇集作单

行本行世，即名著《新广东》是也。癸卯（一九〇三）孙总理自檀香山莅美，保皇党勾结税关党徒阻其登陆，致公堂干事黄三德唐琼昌等，延美律师那文向美京力争，总理赖以安然入境。欧以致公堂尊礼总理，大起猜忌，遽于《大同报》著论，诬称孙某借革命行骗及极言洪门中人优礼欢迎之非是。致公堂大愤，立对欧下逐客令。总理乃命冯自由在留东同志中物色主笔承乏，冯自由遂以刘成禺应之。欧自出《大同报》后，内受同门指摘，外为革命党呵斥，尝一度赴新加坡为保皇党报张目，亦不得意，遂匿迹家园，郁郁以终。罗普，字孝高，顺德人，同门麦孟华之妹婿也。戊戌东渡游学，吾国学生入早稻田专门学校（时尚未改称大学）者，罗为第一人。易西服后，仍留余发不去，故自号披发生。《新民丛报》社出版之《新小说》月刊中，有假名羽衣女士著长篇小说，曰《东欧女豪杰》，叙述俄国虚无党谋刺专制君主之为国牺牲，及女杰苏菲亚之慷慨义烈，绘声绘影，极尽宣扬歌颂之能事，最为脍炙人口者，即出罗氏手笔。民二，梁启超任财政部长，罗尝一度任广东省府某厅长。及国民政府成立后，财政部税务署长谢作楷延罗充任秘书。其女公子某自欧洲毕业归国，以共产党嫌疑被拘入狱，经多方营救始免，洵足继承乃父昔年表彰苏菲亚之素志矣。罗伯雅张智若二人，任事沈毅，在康徒中以交通会党绿林著称，主任孙康合作之说亦最力。李敬通陈侶笙均《清议报》及《新民丛报》编辑员。梁子刚谭柏笙为横滨福和商店少东主，黄为之为横滨广万泰商店少东主，三人皆富家子，好作高论，无所表见。唐才常字佛尘，湖南浏阳人，于戊戌与梁启超同执长沙时务学堂教鞭，由梁介入康门，与康有为本无深切之关系。林述唐名锡圭，湘阴人，乃时务学堂学生，己亥秋，偕秦力山蔡松坡等同莅日本，肄业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才识干练，与湘鄂哥老会素有渊源，同学以其有类《水浒传》中林冲，咸以豹子头称之。东渡后数月，唐才常谋在湘鄂二省大举，力邀林回国相助进行，林遂约留学界同志粤人黎科，鄂人傅慈祥、吴禄贞、戢元丞，闽人郑葆晟，燕人蔡丞煜，湘人秦力山、李炳寰、蔡钟浩、田邦璇等结伴赴鄂。梁启超特在红叶馆设筵祖饯，并邀孙总理、陈少白、沈翔云、宫崎寅藏、平山周诸人作陪。庚子（一九〇〇）九月，汉口自立军之活动，以林联络会党之力为多。其失败之原因，即因倚赖康梁接济饷项，以致愆期失事，唐林均以身殉。事后秦力山等咸归咎康梁师徒吞害害公，纷纷宣告断绝关系，是即唐林见欺于康梁之恶果也。当己亥年康门十三太保与孙总理往还最密，相与高谈革命之时，梁启超有亲笔致孙总理函札多件，现存余手，是为孙总理在癸卯年寓横滨时交余保全者，选录二通如左：

其一，逸仙仁兄鉴：前日承惠书，弟已入东京。昨晚八点钟如复来滨，知足下又枉驾报馆，失迎为罪。又承今日赐饌，本当趋陪，惟今晚六点钟有他友之约，日前已应允去，不能不往。尊席只得恭辞，望见谅为盼。下午三

点钟，欲造尊寓，谈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并约杨君衢云同谈尤妙。此请

大安

弟卓顿首

其二，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见也。与君虽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惟弟现寓狭隘，室中前后左右皆学生，不便畅谈。若枉驾，祈于下礼拜三日下午三点钟到上野精养轩小酌叙谈为盼。此请大安。弟名心叩，十八。

记章太炎与余订交始末

余之识章太炎先生在于己亥（一八九九年）夏间，其时梁任公函托横滨大同学校，选择优级生至东京小石川区梁宅讲授中国文史学，余及冯斯栾、曾广勳、郑云汉四人预焉，时余年十八耳。太炎莅东京亦下榻梁宅，是为余二人订交之始。先是太炎于丙申戊戌（一八九六至一八九八年）间，尝为上海《时务报》撰文。会戊戌八月，清室政变，党狱大兴，凡前与《时务报》有连者，咸在通缉之列。太炎因是避地台湾，依日本诗人山根虎雄以居。间在台北《新报》为文劝告康梁辨别种族，勿再效忠虏主，自贻伊戚。任公方主办《清议报》于横滨，与孙总理过从颇密，渐醉心民族真理，得太炎书，乃函约赴日，谓将介见孙某同计议国是。太炎闻之甚喜，因有扶桑之行。太炎与孙总理订交即在此时。余与太炎同居梁宅十日，晨夕聆教，获益良多，惜余当日犹未谙国语，恒假笔谈达意。犹忆太炎于纵论黄梨洲王船山二人学术笔谈末，附语曰：“足下聪颖如此，卓公之衣钵有传矣。”云云。庸詎知数载后，余与任公因政见冲突，师徒遽成永不可解之仇敌耶。壬寅（一九〇二年）春，太炎以厕名上海张园国会案，为苏抚恩铭指名通缉，遂再东渡。受任广智书局修纂，与余同税居东京牛込区旅舍。太炎夙患羊痫疾，有一次自外返寓，甫入门即昏厥仆地，余为之延医诊治，一日而愈。时余为广智书局翻译日本帝国大学教授德国那特硎博士著《政治学》一书，全文四十万言。太炎为余润辞，维时译事初兴，新学界对于日文名词，煞费斟酌。如社会一字，严几道译作群，余则译作人群或群体；经济一字，有人译作

生计或财政，余则勉从东译。太炎于此不置一词。然社会经济二语，今已成为吾国通用名词矣。是年三月，太炎约余及秦力山、马君武、朱菱溪、周宏业、王家驹、陈犹龙、王思诚、李群等九人，于明崇祯帝殉国忌日，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孙总理梁任公均署名为赞成人。是为吾国留东学界组织爱国团体之滥觞。开会前一日，日政府徇清公使蔡钧要求，遽以强力制止；太炎及余等均被日警署传往严词告诫。届期上野精养轩之预定会场有无数警吏监视，孙总理及留学生数百人来会皆不得入。孙总理乃面邀太炎及余等数发起人至横滨永乐楼召集华侨兴中会会员及中和堂会员多人补行纪念式。是夕觥筹交错，席间孙总理倡议各敬太炎酒一杯，凡七十余杯，太炎亦不觉醉。此会虽以外力压迫，未能如期举行，然大义所被，深入人心，太炎之有造于青年学子，非浅鲜也。

癸卯（一九〇三年）上海《苏报》案起，太炎以序邹容著《革命军》反驳康有为政见书，被判监禁三载。及丙午（一九〇六年）狱满，同盟会本部特派党员迎至东京，聘充《民报》总撰述。时余已至香港主《中国日报》笔政。其间函牍往还，叨教不少。丁未（一九〇七年）夏秋间，吾党谋在粤南钦廉大学，初拟从日本雇船运械至钦州防城附近之白龙港接济党人起义，时孙总理方驻越南河内主持大计。担任钦廉军事之主将为王和顺，担任在日雇船购械之责者为日人同志萱野长知，余则驻香港专司筹运饷械及传达消息任务。正进行间，太炎在《民报》社偶闻日人平山和田等言，谓吾党所购枪械属明治十八年式，陈旧不堪作战。遽用《民报》社名以明电告香港《中国日报》，谓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余得电，乃转告孙总理。总理以事属军事秘密，而太炎竟以明码出之，深为不悻，故其自传中有“不期东京本部之党员忽起风潮，而武器购买运输之计划，为之破坏，至时防城已破，而武器不来”之记事。（事详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载王和顺许雪秋事略）然据此事经过而言，当时吾党虽有运械至白龙港之计划，但后经孙总理、王和顺、萱野长知及余等再四研究，以钦州党人无法与日本通电，自不能依时接卸船械，而香港与钦州经由河内辗转传递消息，亦必迁延时日，贻误戎机，遂废此策不用，而改从运械至惠州汕尾卸岸之议。是即丁未八月汕尾一役，党人许雪秋等接收而未得手之武器也。故平情论事，责太炎以不谙军事，冒昧发电则可，若加以泄漏秘密破坏戎机等辞，则容有未当。盖太炎生平秉性戇直，稍有感触，辄一吐为快。顾以书生而好预兵事，则无心之失，自不可免。况此役运械至钦州海岸之原定计划早已抛弃，更不能为太炎咎也。

民元南京政府建立，孙总理遣使迎太炎至总统府。余与太炎不相见者九载，至是始复聚首话旧，互数当年亡国纪念会之十发起人，则化为异物者殆及半数。至民二十四年六月，太炎亦逝，则存者仅余等二三人耳。当民十三年春，国民党改组容共，余以反赤被遣去粤。全党骚然，太炎怒焉忧之，乃约余及马君武、田梓琴、居觉生、刘禹生、茅咏薰、周道腴、谢良牧、焦子静、管鹏、但植之等十

一人，于是冬会于上海南阳桥寓所，主张集合同盟旧人商讨护党救国之策。各方老友闻而感奋，三年后遂有实行清党之举。是则太炎以德望感人之力为不少也。民二十年九一八祸作，余时居哈尔滨，仓皇去满，抵沪，具告太炎以当局不抵抗情况。太炎大愤，移书切责典兵者立功自赎。及民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变起，益形焦灼。以当局举棋不定，乃自北上，教北方诸将以恢复失地及备边守险之策。以主者阳奉阴违，惘然返沪，自是日以国事为念，居恒书空咄咄，如有所失。卒从李印泉言，移家吴门，以讲学自遣。民二十四年一月二日，为其六十八岁寿辰，各省同盟老友，不期而集合苏城，同伸庆祝者二百余人。咸谓非太炎之德望，不足以聚无数之破铜烂铁于一堂。宴饮时，余出示近作时事新诗若干首（略载《大风》旬刊第五十五号），太炎颇为称许，笑谓足与《饮冰室诗集》先后媲美，盖重申三十八年前在日同居梁宅时之旧话也。是日称觞后，太炎忽在礼堂昏厥，须臾清醒，众从后掖之。太炎回顾曰，我非孙凤鸣，尔非张溥泉，况又无汪精卫在前，何故抱我弗释耶。仍欢笑如故。余以太炎于病后，犹能作此雅谑，绝不料其寿之不永也。不图是年六月十四日，太炎遽捐馆舍，国丧典型，万方同慨。余时挽之曰：“大军已溃八公山，怜当局责重忧深，雪耻不忘王丞相，与子昔倡亡国会，叹此日人凋邦瘁，伤心重作汉遗民。”闻太炎于未病时，已预作遗言，谓设使异族入主中夏，后世子孙，永不得受其官禄。又在逝世前一月，尝致书蒋委员长痛陈抗战御侮大计，辞甚激切。蒋委员长特复书慰之，其睠睠于宗国之安危有如是焉。太炎歿后二年，事变丛生，果不出太炎所料。幸而敌忾同仇，举国一致，最后胜利，为期不远。太炎其或可以瞑目矣乎！

女医士张竹君

凡言清季之女志士，不能不推广东女医士张竹君为首屈一指。竹君，番禺人，父曾任显宦，有兄弟姊妹多人。稍长从父命肄业于广州多宝大街柔济医院附设之夏葛女医学堂，校为美国长老会所设，学科完善，修业期为四年，粤人妇女之从事医术及接生者，多出其门，竹君少聪颖好学，尤善交际，诸外籍女教员咸优异之。庚子（一九〇〇年）以优等毕业，遂悬壶行世。是时粤中风气尚极闭塞，世俗多不信西医，独竹君生涯鼎盛，每日来往柔济医院及出入城南城西，恒西服革履，乘四人肩扛之西式藤制肩舆，前呼后拥，意态凛然，路人为之侧目。故当时有谓竹君在轿上观英文书时，其书实为上下倒置者，殆好事者故甚其辞耳。竹君以所业日张，乃于医室之外附设福音堂一所，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广

招亲友多人，在内宣扬基督教福音，间或批评时政，鼓吹维新学说。于是城中教育界及报界中人大为倾倒。每周宣讲《圣经》时，座中智识阶级及非基督教徒几占过半数，其号召之能力可知也。又富绅巨贾内眷与竹君作通家好者，尤不乏人。凡年龄相类者称曰干姊妹（粤语谓之契姊妹），年龄高者称曰干爸爸、干妈妈（粤语谓之契爷契娘），年龄幼稚者称曰干儿子干女儿（粤语谓之契子契女），由是契爷契子契女之声，洋洋盈耳。盖竹君以体弱多病，欲持不嫁主义，故喜人呼之为父，而不愿人呼之为母也。在诸友好中，以住居河南跃龙里之李二少奶最为相善。二少奶名徐佩萱，即豪绅李庆春之孀媳也。性豪侠，好施与，其子李强女李雄均称竹君为契爷，竹君每有兴创，恒鬻珍饰以助无吝色。竹君初募资建褊福医院于荔枝湾，继在河南柳波桥侧设南福医院，各耗资巨万，李二少奶之力为多焉。竹君行道一年，初在河南北两医院倡立演说会，继设育贤女学为全粤女学之先声。一时粤中名士如俞伯扬、周自齐、庄炳汉、王亦鹤、桂廷銓、梁新武、张嵩云诸人咸奔走其门，隐然执新学界之牛耳。诸志士中时在褊福南福两医院作座上客者有三人，胡衍鸿、程子仪、朱通孺是也。胡字展堂，后别号汉民，时任《岭海报》主笔。凡在报界揄扬竹君之文字，多出其手。程为将弁学堂毕业生，与钮永建同砚，陶模督粤时任练兵教员。朱为兴中会员朱淇之侄，与革命保皇二党中人均有往还。竹君每当夏秋两季，常雇一大花舫（粤语谓之紫洞艇）于河旁，为避暑纳凉之所，胡、程、朱三人日至舟中叙谈，视为故常。是岁史烈士坚如之妹憬然，以避香港《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之求婚来粤，因与竹君有同砚之谊，故下榻褊福医院。盖自坚如庚子殉义之后，陈少白迭向憬然乞婚多次，坚如之兄古愚，以少白早年已纳妇生子，表示异议。且授意陈妇美娇昌言反对，故憬然特他适避之。憬然居粤数月，旋患时疫甚重，虽竹君看护备至，卒以不起，殓葬及善后诸事，咸由竹君及毛文敏（后改名文明，连县人）、朱通孺等任之，憬然屡勃坚如义举，沈毅勇敢，不让乃兄。一旦戕于天灾，兹可惜也。竹君往还诸绅富中有卢宾岐者，东莞人也，其子少岐少有大志，与竹君相谈时事，过从至密，因有订婚之议。少岐久拟东渡留学，及厄于家庭不果，赖竹君慨然假以旅费二百元，乃得成行。少岐去后半载，竹君忽因事与卢府中人发生嫌隙，遂与少岐日渐疏远，婚约遂亦无形解散。同时有马君武者，桂林人，而康氏万木草堂弟子也，能文章，美词藻，从广西至粤攻读法文。闻竹君在教会演讲福音，语涉时政，异常崇拜。自是每次福音堂布教，恒有马之足迹，渐露爱恋之意。卢少岐遇之，辄视为情敌。一日，马忽在张之客室取去张之诗扇一柄，张四觅无著，旋得马之法文求婚书，情辞恳切，张不能从，乃以素持独身主义一语拒之。未几，马亦赴日本留学，尝作《张竹君传》登诸横滨《新民丛报》，附以七绝诗一首，誉扬备至。有“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之句。此辛丑壬寅间（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事也。时胡汉民尚在广州，备知其详，尝语人谓此一幕剧为驴

马争獐，可谓谗而虐矣。壬寅广州有女教育家名杜清持者，适志士曹驾欧，与杜鹿笙杜枚叔为兄弟行。时与其妹月波创设广东女学堂于西关，汪千仞、王亦鹤、何子徒、谢英伯、莫天一等均任校董。月波与香港《中国日报》记者陈诗仲曾订婚约，以是粤垣及香港各报时载杜氏姊妹投稿，文名颇著。某日《岭海报》忽有“杜清持程度优于张竹君”一语之揭载，竹君阅之大愤，乃向胡汉民责难。胡谓出于编辑人之无心，而竹君谓事出有意，双方争执渐激，二人友谊遂生裂痕。未几胡以官费东渡习速成师范，事乃寝息。竹君在粤悬壶数年，以答责学生伍庙藩黄素波二人事发生风潮，经绅商界多方调停始解。甲辰（一九〇四年）伍黄二生赴日本，肄业横滨山手共立女子中学。竹君亦舍弃所设广州两医院，迁寓上海，另创基业。居沪未久，绅商学各界咸欢迎之，尤以哈同夫人罗迦陵女士及伍廷芳夫人，富商李平书等为最称得力，因尊罗迦陵及伍夫人曰谊母，李平书曰谊父。先后倡建医院数所，其号召之能力殊不亚在广州时也。辛亥（一九一一年）八月武昌革命军起，革命党首领黄克强在香港闻讯，急挈徐宗汉女士赴上海，谋设法入鄂，徐宗汉即前与竹君相善之李二少奶，原名佩萱，曾于四年前加入同盟会，极努力于革命工作。辛亥三月黄花岗之役，因为黄克强侍奉汤药，遂嫁黄为室。及相偕莅沪，以清吏搜索沿江口岸极严，不易偷渡。知竹君在沪交游至广，爰向竹君求援，竹君乃组织红十字救伤队，以中外人士结队往汉口救伤为名，使黄克强乔装队员，徐宗汉则充看护妇，因得避免各关津骚扰。九月初七日到达汉口，竹君之力也。民元南京政府成立之前数日，余由美国归沪，旋诣西华德路访黄克强，适竹君与胡汉民徐宗汉等均在座。余于壬寅自日本返粤，以卢少岐之函介，与竹君有一面之识，若胡汉民则与竹君为多年故交，自壬寅因报载纪事发生误会，至是始和好如初焉。民元以后，竹君仍居上海新加坡路治旧业，惟韬光敛迹，绝不在社会上显其头角。时有人见其陪侍伍廷芳夫人观剧而已。某岁粤人徐甘棠与女医士罗秀云一双老夫妇，在上海东亚酒楼举行婚礼，延邝富灼及竹君为伴郎伴娘，新夫妇及男女嫔相皆年在五十以外，沪报称为双绝。按竹君在广州成名，实远在庚子辛丑间，当时一般志士咸称之曰妇女界之梁启超，其魔力可见。回忆戊申（一九〇八年）夏，陈璧君自南洋东渡留学，途次香港，余招待之于《中国报》。璧君偶言在槟榔屿时久耳张竹君名，渴思一见。某某等告以胡汉民与竹君交厚一段因果，璧君谓竹君不知具何魔力，乃令汉民倾倒若是。即就余书案匆匆作一长函致汉民，托余付邮。后数月汉民从新加坡至港，余问以璧君书作何语。汉民但摇首答曰，璧君真荒唐而已。是又可见竹君魔力之一斑焉。

《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

番禺黄世仲，字小配，别号禺山世次郎。少颖悟好学，读书过目成诵。弱冠后，以居乡不得志，偕乃兄伯耀先后渡南洋谋生，初至吉隆坡，充某赌馆书记，华侨各工界团体以其能文，多礼重之。时闽商邱菽园发刊《天南新报》于星洲，鼓吹维新学说，风动一时。世仲于工作余暇，常投稿该报发抒所见，辄被采录，文名由是渐显。庚子辛丑（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间，尤列创设中和堂于南洋英属各埠，工界从之者如归市，世仲弟兄预焉。中和堂固兴中会之别派，其楼顶高悬青天白日旗，揭橥革命排满，至为明显。世仲遂亦倾心民族主义，尤喜读香港《中国日报》，恒不去手。壬寅（一九〇二）冬以尤列介绍，归香港任《中国日报》记者，适是岁除夕洪全福、梁慕光、李纪堂等倡义广州之计划失败，党人梁慕义等殉难者十余人。广州《岭海报》主笔胡衍鹗（清瑞）借题对革命党大肆抨击，世仲著论斥之，持矛刺盾，异常透辟，双方文战月余始息。癸卯（一九〇三年）康有为排斥仇满之政见书出世，《中国日报》与章太炎先后为文驳之，《中国报》文字多出世仲手笔。是年郑贯公另创《世界公益报》于香港，世仲特辞退《中国报》席，以助其成。其后贯公复发刊《广东报》及《有所谓报》等，世仲均与其事，乙巳（一九〇五年）广州志士潘达微等组织《时事画报》，世仲为撰《廿载繁华梦》小说，书中演述富绅周某宦途及家庭琐事，绘声绘影，极尽能事，大受社会欣赏。在清季出版之社会小说名著中，此书实为巨擘。丁未（一九〇七年）世仲自创小报曰《少年报》，亦提倡民族主义，刊行一载而止。世仲所著《洪秀全演义》，即先后登载于《有所谓》及《少年报》。戊申（一九〇八年）七月复由《中国报》以单行本出世，是书系撷拾太平天国遗事轶闻及故老传说，效《三国演义》体编演而成，洋洋三十万言，章太炎为之序。出版后风行海内外，南洋美洲各地华侨几于家喻户晓，且有编作戏剧者，其发挥种族观念之影响，可谓至深且巨。乙巳八月冯自由奉孙总理命，自日本至香港组织同盟会，未几孙总理亦赴南洋，舟过香港，冯自由引世仲及郑贯公登法轮谒之，二人同时宣誓入会。世仲旋被选为香港分部交际员。丙午干事部改选，复被选为庶务员，于会党运动及文字宣传，至为尽力。辛亥八月武昌革命军兴，九月十八日粤省宣告独立，各路民军云集广州，世仲与各民军首领向多意气相投，因得被委充民团局长一职。时骄兵悍将跋扈非常，各将领中间有携手枪炸弹至财政司署逼索军饷者，当局以民团局驾御无方，咸为世仲诟病。壬子三月南北统一告成，胡汉民随孙总理归广东，都督陈炯明弃职他适，濒行署一军

令曰：“黄世仲侵吞军饷，应即枪决，以肃军纪”等语。签后置公案上，留交新任执行。胡汉民就新职后，遂如陈令行之，闻者多为呼冤不置。盖陈炯明于民元二月，尝向南京政府电荐世仲为广东都督以自代，及将去职时，竟以侵吞军饷罪名拘禁世仲于狱。未经法院审讯，遽假胡汉民手杀之，前后反复如出两人，民党中人咸为扼腕。陈少白曰：“世仲宣劳革命有年，功大罪小，陈炯明入党日浅，或不知其过去历史；胡汉民宜无不知，就职时应即移交法院依律审讯，以昭公允，倘情罪确实，亦当计功减罪，未可置诸重典，乃汉民竟甘任陈炯明之刽子手而不辞，殊不可解。”云云。此言不为无理。先是世仲既长民团局，以生平好用机智，颇得民军诸首领拥戴，由是恒假各路民军以自重，屡向当局逼索饷械，当局不胜其扰，有识者已深为世仲危。某日世仲为其子娶妇，大张筵席，某某等报载各路民军首领纷纷馈送贺礼，穷奢极侈，所值不貲。及世仲伏法，身后绝非富有，众疑始解。世仲之兄伯耀亦南洋中和堂会员，尝任星洲《大南报》及香港各报记者，以机智远不如乃弟，民国后碌碌无闻，不知所终。

附章太炎撰《〈洪秀全演义〉序》

演义之萌芽，盖起于战国，今观晚周诸子说上世故事，多根本经典，而以己义饰增，或言或事，率多数倍。若六韬之托于太公，若素问之托于岐伯，则演其言者也。演言者，宋明诸儒因之为大学衍义；演事者，则小说家之能事，根据旧史，观其会通，察其情伪。惟己意以明古人之用心。而附之以街谈巷语，亦使田家孺子知有秦汉至今帝王师相之业；不然，则中夏齐民之不知国故，将与印度同列，然则演事者虽多皮傅，而存古之功亦大矣。禺山世次郎作《洪秀全演义》，盖比物斯志者也。余维满洲入据中国全土，且三百年，自郑氏亡而伪业定，其间非无故家遗民推刃致果，然不能声罪以致讨伐，虜未大创，旋踵即仆。微洪王，则三才毁而九法斲。洪王起于三七之际，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图籍十二年。旌旄所至，执讯获丑，十有六省，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其时朝政虽粗略未具，而人物方略，多可观者。若石达开、林启荣、李秀成之徒，方之徐达常遇春，当有过之。虜廷官书虽载，既非翔实，盗憎主人，不时以恶言相诋，近时始有搜集故事，为太平天国战史者，文辞骏骤，庶足以发潜德之幽光，然非里巷细人所识。夫国家种族之事，闻者愈多，则兴起者愈广。诸葛武侯岳鄂王事，牧猪奴皆知之，正赖演义为之宣昭令闻。次郎为此，其遗事既得之故老，文亦适俗，自兹以往，余知尊念洪王者，当与尊念葛岳二公相等。昔人有言：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洪王朽矣，亦思复有洪王作也。丙午九月章炳麟序。

附黄世仲《〈洪秀全演义〉自序》

余尝谓中国无史，盖谓三代直道，业荡然无存，后儒矫揉，只能为媚上

之文章，而不得为史笔之传记也。当一代鼎革，必有无量英雄齐起，乃倡为成王败寇之谬说，编若者为正统，若者为僭国，若者为伪朝，吾诚不解其故。良由专制君主享无上尊荣，枭雄者辈即以元勋佐命的名号，分藩食采的街爵，诱其僚属，相助相争。彼夫民族的大义，民权的公理，固非其所知，而后儒编修前史，皆承令于当王，遂曲笔取媚，视其版图广狭为国之正僭，视其受位久暂为君之真伪。夫三国时代，陈寿司马光者，见晋武宋太与曹操若也，则上曹下蜀，习凿齿朱熹者，见夫晋元宋高与刘备若也，则上蜀下曹；而求如世家陈涉，本纪项羽，殆罕觐焉。是纲也，鉴也，目也，只一朝君子之家谱耳。史云乎哉！是以英雄神圣，自古而今，其奋然举义为种族争为国民死者，类湮没而弗彰也。惜有之矣，其不訾之为伪王与贬之为匪逆，其又几何？吾观洪氏之起义师，不数年天下响应，发广西，趋两湖，克三吴，竟长江之极，下收闽、浙、燕、齐、晋、汴，林凤翔叱咤之所及，望者如归。其间若冯云山钱东平之观变沉机，若李秀成石达开之智勇器量，若陈玉成、林启荣、萧朝贵之勇毅精锐，人材彬彬，同应汉运，即汉、唐、宋、明之开国名世，宁足多乎，当其定鼎金陵，宣布新国，雅得文明风气之先，君臣则以兄弟平等，男女则以官位平权，凡举国政戎机，去专制独权，必集君臣会议，复除锢闭陋习，首与欧美大国遣使通商，文物灿然，规模大备。视泰西文明政体，又宁多让乎，惜夫天未祚汉，谨疫洊臻，而贪荣慕禄，戕同媚异之徒，又从而摧之，遂致所事不终，半道失败，智者方悯焉。而四十年来书腐亡国，肆口雌黄，发逆洪匪之称，犹不绝耳，殆由曾氏大事记一出，取媚当王，遂忘种族。既纪事乖违，而李秀成供状一书，复窜改而为之黑白，遂使愤愤百年亡国之惨，起而与民请命之英雄，各国所认其为独立相遣使通商者，至本国人士独反相沿而自污之，怪哉！吾蓄虑积愤，亦既有年，童时与高曾父老谈论洪朝，每有所闻，辄笔记之。洎夫乙未之秋，识×山上人于羊垣某寺中，适是年广州光复党人起义，相与谈论时局，遂述及洪朝往事，如数家珍，并嘱余为之书。余诺焉而叩之，则上人固洪朝侍王幕府也。积是所闻既伙，而今也文明东渡，民族主义既明，如太平天国战史，杨辅清福州供词，及日人满清纪事诸书，相继出现，益知昔之贬洪王曰逆曰匪者，皆戕同媚异忘国颂仇之辈，又扭于成王败寇之说，故颠倒其是非，此皆媚上之文章，而非史笔之传记也。爰搜搜旧闻，并师诸说及风流余韵之犹存者，悉记之。经三年而是书乃成，其中近三十万言，皆洪氏一朝之实录，即以传汉族之光荣。吾同胞观之，当知虽无老成，尚有典型，祖宗文物，犹未泯也，亦伟矣乎。时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六年季夏禺山黄小配序。

《革命军》作者邹容

邹容字蔚丹，四川巴县人，父业商，家颇丰裕。少聪颖，年十二，“五经”、“四书”及《史记》、《汉书》，已琅琅上口。父许为科甲中人，使专攻制艺，然性弗喜，课余辄从事雕刻，所作类雕篆名手，人以为天才。父怒，辄施以夏楚，然雅弗喜科举，倔强犹昔，殆天性然也。父令从成都名宿吕翼文学，益通晓经训说文，所学乃愈猛进，惟好非薄古人，攻击程朱及清儒学说，尤体无完肤。吕翼文恐为所累，槟出门墙。时清廷渐倡新学，蜀吏遣派学生赴日本留学，络绎于道，邹父亦命蔚丹负笈东渡，时为壬寅（一九〇二年）春，蔚丹年十八岁矣。既莅东京，初就神田区同文书院习东文，校为东亚同文会专为中国学生而设，一教授彼邦文字及初级科学，以备考入专门学校之预科学校也。时广州时敏学堂所派学生黎勇锡（仲实）陈芙昌（匡一）等，亦在该书院肄业。是岁夏某日余因事诣该书院访诸同乡，蔚丹知余尝偕章太炎秦力山等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爰托黎勇锡陈芙昌等介余相见，互述所志，至为欢洽，时蔚丹犹未认识太炎也。是秋余以事返粤，蔚丹殷殷送余至横滨船埠，不图自是遂成永诀矣。癸卯（一九〇三年）春，留东学界以俄人进兵满洲，清廷有与俄政府私立撤兵条款之议，大为震动，特开拒俄大会，公电清廷宣言否认新约，并组织拒俄义勇队，以备归国从戎。推蓝天蔚为学生军总教官，钮永建汤樵为归国请愿代表。蔚丹亦发起大会之一人，且任义勇队员，遂日从众会操，未几，日政府徇清公使蔡钧之求，勒令义勇队解散，蔚丹大愤，适陆军学生监督姚文夫有奸私事，秽腾学界，蔚丹于上灯后，遂偕友好翁浩王孝缜张继等五人，排闥入姚寓，批颊数十，持剪刀断其辫发，悬诸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正梁，闻者称快。事后姚文夫吁求日警逮捕行凶者，蔚丹乃偕张继等归上海避之。时章太炎方主讲爱国学社，日以文章气节相砥砺，声动一时。张继引蔚丹晋见，太炎一见奇之，许为少年英发，称之曰小友。遇蔚丹有问学请益事，辄循循导之。蔚丹居爱国学社未久，深悟清政府之不足恃，且伤内外志士之不脱奴隶根性，于是发愤草《革命军》一书，凡七章：首绪论，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种，次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次革命独立之大义，次结论，凡二万余言。书成，就太炎求修饰。太炎曰，语虽浅直，然感动普通社会，非如是不可，遂为作序，以广其传。同志金天翮、蔡寅、陶虞熊等共任刊资，于是年五月在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五月十四日《苏报》且作《读革命军》一文以阐扬之，并为新书介绍一则。书出后，举世为之轰动。

同时章太炎所著《驳康有为政见书》亦先后出版，与《革命军》相呼应，蔚丹遂益知名于时。又有《苏报》者，衡山人陈范（梦坡）所主办，先持缓进主义而渐及激烈主义，纵论横议，学子宗之，隐然执全国新学界之牛耳；主笔为长沙章行严（士钊），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而从游章太炎于爱国学社者也。一日蔚丹与张继、章士钊同在爱国学社叙谈，太炎乘兴挈蔚丹等出饮酒四马路九华楼，相与纵谈天下大事。酒酣，太炎昌言吾四人既僇力国事，应不分老幼，结为兄弟。张继和之，四人遂一拜而定，蔚丹其季弟也。太炎其后因有“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州，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餽，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之句。无何，清商约大臣吕海寰及苏抚恩寿以党人啸聚上海租界，公然倡乱为名，屡照会租界英吏，指名要求逮捕革命党人，及封禁爱国学社《苏报》社等团体。英吏竟徇所请，于是岁闰五月初六日分派警探搜索章炳麟、邹容、蔡元培、吴敬恒四人，适邹、蔡、吴三人均外出，只捕去章一人，蔚丹在外闻讯，乃自往租界捕房投到，此癸卯上海大党狱所由起也。案发后数日，清政府特派知府孙建臣及上海县汪瑶廷，延外籍律师与太炎蔚丹等对簿于会审公廨。蔚丹供称四川巴县人，年十九岁，初来沪入广方言馆，后至日本东京留学，因愤满人专制，故有《革命军》之作，今年四五月间请假来沪，闻人言公堂出票拘我，故自到捕房投到云云。太炎供词详见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兹不赘述。清吏初要求驻沪各国领事引渡章邹二人甚力，上海工部局以保障租界内居民生命自由为题，坚决拒之。清政府乃转求驻京各国公使，各使亦以不能侵越领事权限对。此案经会审公廨研讯多次，中西臬员均以关系重大，无法判决，卒将全案移送北京外交部与各国公使直接办理，然亦延搁多日，迄无办法。沪上党人所延律师乃声称章邹等不得罪名，久系囹圄，在法律及人道均属不合，要求立将控案注销，以崇法治。故沪上忽有释放章邹之风说。清政府深恐此案徒劳无功，遂允采纳英使意见，从宽办结。卒由上海会审公廨宣判章太炎监禁西牢三年，邹容监禁二年。此惊天动地之大讼案，遂轻轻告一结束焉。狱既定，太炎蔚丹同在狱中罚作苦工。蔚丹年少性刚，往往不耐狱卒侵凌，时相齟齬。又以啖麦饭不饱，益不能平，太炎乃为之日讲佛典，更授以因明入正理论，曰，学此可以解三年之忧矣。在狱岁余，卒以愤激内热致疾，太炎屡请狱吏为延中西医诊治，皆弗许。至乙巳（一九〇五年）正月，势渐沉重，延绵四十日，二月二十九日夜半竟以不起，年二十一岁矣。翌晨太炎往视，抚尸痛哭，目终不瞑。时距出狱期仅七十日，世人咸疑清吏设法死之。上海刘三（季平）乃收其骨密葬沪西华泾乡黄叶楼旁，同志鲜有知者。自蔚丹入狱后，所著《革命军》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占清季革命群书销场第一位。各地书肆以避关邮检查故，多易名贩运，或称《革命先锋》，或称《图存篇》，或称《救世真言》，或与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并列，而简称曰《章邹合刻》。此书文辞不如太炎之《驳康书》，论理不如秦力山之《革命箴言》，徒以通俗浅显，适合当时社会需要，几

于人手一编，卒赖其言为驱胡建国之本，功不在孙、黄、章诸公下也。辛亥武昌革命军兴，民元南京政府成立，孙大总统追念前勋，赠蔚丹大将军。四川军政府以礼招其魂以归。民十一年冬，章太炎始由刘三探知蔚丹葬所，遂向诸友好募资为修治墓道。民十三年四月太炎、于右任、张继、田桐、刘三等二十余人同诣华泾乡举行公祭，太炎更为作表刻石焉。今太炎、田桐、刘三亦先后随蔚丹于地下矣。国事如斯，安得前方抗战健儿及后方公务员，皆如昔年革命军马前卒邹容者耶！附录太炎撰《〈革命军〉序文》如次：

蜀邹容为《革命军》方二万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然得无恶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足以坠吾实事。夫中国吞噬于逆胡，已二百六十二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持正议以震聋俗，自尔遂寂泊无所闻。吾观洪氏之举义师，起而与为敌者，曾李则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勿问其是非枉直，斯固无足论者。乃如罗、彭、邵、刘之伦，皆笃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闽而金溪余姚，衡阳之黄书，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戎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之戒，宜一切习闻之，卒其行事，乃相谬戾如彼，材者张其角牙，以覆宗国，其次即以身家殉满洲，继乐文采者，则相与鼓吹之。无他，悖德逆伦，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故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然则洪氏之败，不尽由计划失所，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今者风俗臭味少变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温藉，不欲以跳踉搏跃言之，虽余亦不免是也。嗟乎，世皆瞶昧而不知语言，主文讽切，勿为动容，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异时义师再举，其必堕于众口之不俚，概可知矣。今容为是书，壹以叫咷恣言，发其惭恚，虽瞶昧若罗彭诸子，诵之犹当流汗只悔，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反乎？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则其所化远矣，借非不文，何以致是也。抑吾闻之，同族相伐，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划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余杭章炳麟序

兴国州人曹亚伯

曹亚伯，湖北武昌兴国州（民国改称阳新县）人，太平天国用兵湘鄂时，兴国州人应募者极众，而立功亦至伟。刘成禺著《〈太平天国战史〉题词》，有“兴国州人策异勋”一句，即指此事。亚伯赋性率直，嫉恶如仇，自幼居乡，每聆乡中父老述太平军当年起兵杀贼遗事，辄眉飞色舞，油然萌种族思想。稍长肄业两湖书院，时任书院山长者为梁鼎芬，尝仰承鄂督张之洞意旨，日以诱导学生效忠满清为事。亚伯以诸生多热衷利禄，不脱奴隶根性，遂呵之曰“无气骨”，或曰“走狗奴才”。同学中恶其好使气骂人，咸以“曹疯子”三字报之。癸卯甲辰间（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亚伯初结识武昌基督教圣公会牧师胡兰亭黄吉亭等，胡黄均有心革命，常于说教讲道时，假基督舍身救世等事为宣传革命资料。亚伯与之志同道合，遂亦皈依基督教。未几相与发起一革命团体，名曰日知会。其会所均附设于武昌、汉口、长沙等处之圣公会内。一时湘鄂两省志士，如鄂之刘贞一、冯特民、季雨霖、朱子龙、吴贡三、李亚东、梁钟汉、石志泉、张难先、吴崐、殷子衡、吴兆麟；湘之黄軫（后更名兴字克强）、刘揆一、禹之谟、宋教仁、易本羲、陈天华、胡瑛诸人，咸陆续附入焉。甲辰九月黄克强、马福益、刘揆一等谋在湖南起事，亚伯至长沙助之，不幸期前事泄，黄克强潜避于长沙吉长巷圣公会黄吉亭寓所。后乃乘二人肩舆，垂下轿帘，亚伯与张继二人各怀手枪，紧随其后，卒获脱险。乙巳（一九〇五年）各省志士云集日本东京，亚伯与焉。是岁七月孙总理自欧洲抵日本，遂与黄克强联合旅日全国各派革命党人组织中国同盟会，第一次成立会假座赤坂桧町黑龙会所，冯自由预约亚伯赴会。当各写盟书时，亚伯自书籍贯曰兴国州。有广西人某不知有兴国州地名，以为儿戏。亚伯曰：“君不知太平天国大败清军时有兴国州人包打洪山之事乎？（事见刘著《太平天国战史》）若无兴国州人，你们两广的天王洪秀全焉能安然在金陵登基也。”众笑解之。丙午（一九〇六年）夏秋间，亚伯自日本赴英国游学，道经香港，偕张继访冯自由于《中国日报》，冯自由请其任驻英义务通信员，亚伯慨然不辞。在伦敦数年，日操其不规则之英语，向外人宣传中国革命，孜孜不倦。己酉（一九〇九年）孙总理自南洋赴英伦。亚伯介绍吴敬恒入同盟会，且向留英同志筹款八十金镑助总理旅费。及辛亥八月武昌革命军起，总理复至伦敦，尝邀亚伯与吴敬恒结伴归国，亚伯以事辞。民元夏秋间，鄂省民党有国民党与共和党两派之争，共和党孙武一派以素与都督黎元洪有好感，颇占优势。

适亚伯自英回，黎元洪与彼为旧识，特邀入幕府赞勸机要，国民党乃大得其助。其后卒为共和党所挤，不安于位。民二赣宁讨袁军失败后，亚伯东渡谒孙总理，参加中华革命党之讨袁工作。民三中华革命党既成立，陈炯明等在南洋表示异议，另创水利速成社以相对抗，孙总理乃派亚伯及陈耿夫二人至南洋各埠，向华侨党员宣布改组宗旨。民六六月总统黎元洪被督军团逼胁解散国会，国人大愤，孙总理在上海力图起兵护法，而绌于经费，会有素与亚伯相识之美籍某国医士告亚伯曰：如孙公有起兵护法之决心，某国愿助资百万。亚伯以告总理，总理大悦，惟嘱亚伯坚守秘密。亚伯曰：吾乃基督教徒，当指天为誓。自是每当夕阳西下，亚伯恒偕女友吴□□乘马车游行各马路兜风，顺道至虹口某医士寓所携去大皮篋一具，其中累累皆各国钞票，外人虽侦伺严密，无疑之者。未几遂有程璧光率海军南下及广州召集非常国会之举，亚伯之力为多焉。事后亚伯拟措资创办亚林臭药水厂，求助于总理，总理助以万元，即酬其是役奔走之劳也。此事已隔多年，亚伯以信誓旦旦，讳莫如深，有时酒后狂醉，始为老友道之。民十十月总理督师北伐，驻节桂林，亚伯随行。尝因细故与参军某不协，某令侍役勿为其供食，亚伯大窘，陈少白怜之，乃使就食于己室，少白每日例与总理同桌而食，至是乃特为亚伯设供，礼之逾恒。某以是迁怒于少白，亚伯意不自安，遂偕少白先后返广州，逢人必诉某氏兄弟闭塞贤路，妨害大局等事，闻者多为不平。时陈炯明方极力抑制北伐军进展，知亚伯与某氏兄弟有隙，且素得海军将领温树德等心，遂多方联络，备致推崇，使怂恿海军将士宣言中止北伐，谓“某氏历年揽权伐异，妨功害能，吾等非釜底抽薪，不足以保全总理”。亚伯惑之，以告少白，少白曰：“北伐关系大局安危，君与某氏发生恶感，乃属私事，安能因私害公！”冯自由适在座，亦谓亚伯曰：“陈派谋不利于总理，尽人皆知，君万勿卷入漩涡，为君计，应立即避嫌离粤，庶免危险。”亚伯愤然顾余曰：“都是你从前介绍我入同盟会之过，今日他们如此忘恩负义，我倘有不测，惟君是问。”少白与冯自由力劝之。亚伯卒从陈冯等言，快快归沪。行后不及两月，而陈部叛变围攻总统府之祸作矣。亚伯自是厌闻时政，以亚林臭药水厂售诸五洲大药房，在崑山购地数十亩经营农业，差足自给。民十五国民革命军入江苏，亚伯号召乡民起义于崑山，附近各乡闻风响应，革命军某支队疑亚伯属投机分子，诱禁之于上海司令部。亚伯移书上海交涉使郭泰祺求援，郭以告蒋总司令，蒋立下令开释。亚伯既脱罪，谓国民党改组后，一般青年多数典忘祖，鄙视前辈，皆由不知革命历史所致，遂发愤搜集其多年珍藏之日知会文书笔记，及辛亥武昌革命一切文告等等，编辑成书，题曰《武昌革命真史》，凡数十万言，民十八特托中华书局旧友陆某代其发行。出版未久，在京鄂人吴某等谓曹著批评起义人物过于露骨，且抹煞起义之各团体，而独归功于日知会，有失公道，遂联名呈请党部禁止发行，并没收之，中华书局因之损失不赀。亚伯受此打击，决意摆脱世事，专心学佛，且禁绝

荤腥，尽改其平日好使气骂人之故态。尝语人曰：“吾辈革命党人作孽过重，惟有竭诚念佛，足以忏悔一切，死后庶免沦入畜生道”等语。大有抛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概。民二十五年旦尝至苏州章太炎宅祝寿，人见其须长逾尺，道貌盎然，迥非昔比。民二十六年秋日军犯沪，崑山地近战区，迭受日机轰炸，亚伯犹念佛农舍，不愿迁避。至十月某日沪报忽转载其圆寂消息。时在崑山失陷之前半月。生平友好以交通阻塞，无从吊唁，咸为哀悼不置。然亚伯能于所居未沦陷前作大解脱，得免身受阿鼻地狱之惨，当是佛学有得之效，不可谓非幸事也。

日知会首领刘敬安

辛亥武昌义师之发动，众咸归功于同盟会员所组织之共进会及文学社，而不知共进会及文学社成立之前八、九年，已有一日知会为之先导。日知会盖庚子唐才常富有票一役失败后湘鄂二省之革命策源地也。发起日知会之主动人曰刘敬安，籍湖北安陆府潜江县，生于清光绪元年乙亥（一八七五年），原名贞一，敬安其字，又号静庵，皈依基督教时道号保罗，系出世家，有兄弟四人，敬安居长，少有志新学，尤热心救世，稍长即投身武昌基督教圣公会为信徒，隐然以普渡众生为己任。癸卯甲辰间（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以国是日非，决非和平手段所能匡救，遂另创日知会为革命运动机关。其地址即附设于武昌高家巷圣公会之内，表面为阅书报社，实则借以散布各种革命书报于军学绅商各界，而谋军事上之活动。所散布之宣传品，有章太炎著《驳康有为政见书》，邹容著《革命军》，陈天华著《猛回头》、《警世钟》，吴之铨著《孔孟心肝》等等。复设印刷所于黄州，凡运动革命之出版品，皆使同志殷子衡、吴之铨（贡三）等广为印送。以学界易于散播，兵士传播颇难，故每于夜间或兵士出动之时，由营中同志秘置革命小册于各兵士之床，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犹以为未足，更设法求人南湖马队营营长黎元洪部为书记，以故兵营中大小消息莫不知之。其分会及书报社遍设于鄂省之黄冈、湖南之长沙、江西之九江等处。武昌圣公会牧师胡兰亭及长沙圣公会牧师黄华亭、九江圣公会牧师胡厚斋均力助其事，而收效益巨。各地先后入会者，鄂省有殷子衡、朱子龙、吴崐、冯特民、季雨霖、李亚东、张难先、张统、宛思演、刘尧澄、熊十力、郝可权、徐叔渊、赵光华、熊飞宇、曹亚伯、梁钟汉、吴贡三、石志泉诸人，湘省有黄克强、宋教仁、胡瑛、陈天华、易本羲、刘揆一、禹之谟诸人，赣省有李献彬、陈义山、查冠英、黄茂才、刘庆云、杨器之诸人，皆各省绅商军学各界之有为青年也。甲辰黄克强、刘揆一等谋

起义于长沙，吉长巷之圣公会会所亦为秘密运动机关之一。及十月十日在万寿宫轰炸湘省大吏之计划不幸期前失败，克强匿于圣公会，赖黄华亭、曹亚伯庇护之力间关出险，而在鄂之经营不免大受影响，然其志不为少懈。于宣传基督教福音及革命真旨外，更兼任圣公会所设之武昌文华学院汉文教授以自掩。嗣乙巳（一九〇五年）秋东京同盟会本部成立，留东日知会会员先后加入，武昌日知会亦遵命改组为同盟会鄂分会，由是进行愈力。军学两界之同情者络绎于途。每逢星期假日，兵士学生至会所阅报者，座为之满，陆续签写誓约者为数不下万人。丙午（一九〇六年）春以军界运动渐告成熟，欲在鄂省乘时大举，特派同志吴崐（寿天）至香港谒黄克强求接济饷糈，适黄克强赴南洋未返，冯自由乃款吴于《中国日报》，使在港候之。两月后克强始返，以南洋之款未能遽集，遂遣吴回鄂，嘱转告暂为忍耐，须候华侨方面筹得巨饷乃可发动。是年夏孙总理以法国当局有赞助中国革命之表示，特派廖仲恺驻天津，佐法武官布加卑翻译中国各省革命消息，复派山西人乔义生随法武官欧极乐（Captain Ogal）巡游长江沿岸各省调查革命党实力。是岁五月初八日，欧极乐等抵武昌，敬安预得电讯，乃率会员多人渡江至汉口迎之，既莅会所，军学两界到场欢迎者千数百人，极形拥挤。欧演讲法国革命之往史及中国不得不革命之理由，听者莫不感动。散会时并拍照纪念。时巡警道冯启钧之密探亦杂人丛中，因得尽窥其实，以在场多军界人物，未敢孟浪举发。是岁十月，萍乡醴陵革命军猝然起事，与清军剧战经月而败，党人萧克昌、蔡兆南、刘道一、禹之谟等死之。清吏借此大兴党狱，武昌日知会职员刘敬安、朱子龙、殷子衡诸人，均在悬赏通缉之列。日知会会员中有郭尧阶者，醉心利禄，遽向冯警道告密，冯遂会同总兵张彪于十一月二十九日率兵四五百人围搜圣公会堂及各员住所，先后逮捕敬安及朱子龙、梁钟汉、胡瑛、李亚东、季雨霖、吴贡三、殷子衡、张难先等九人，并检出名册四本，牵连军学两界甚众，敬安之父及兄弟亦被拘系狱。鄂督张之洞派武昌府赵楚江，督署委员郑保琛及江夏县夏口厅等在武昌府衙门五福堂严刑取供，敬安等均供认实行革命不讳，惟对于清吏强指刘敬安即萍醴党案有关之哥老会头目刘家运一语坚不承认。清吏逼令敬安供招，迭用藤条笞背一千四百下，血肉横飞，肉尽骨见，死而复生者数次。刑讯后，同狱殷子衡尝用白布手巾拭其背血，留作纪念。阅三年为敬安所见，乃题数语于血巾上，曰“衬刑伤血，承思亲泪，傍大病枕，汝实吾患难中之纪念品，而亦实吾纪念主恩膏之一要件也。吾安忍弃之，吾焉得不留之。戊申重阳之后一日保罗志于湖北之模范监狱中”云云。九人下狱后迭经严刑逼供，时闻有斩决之讯。圣公会黄吉亭牧师，乃请美人孟良佐牧师及吴德施主教致电北京美国公使乐克希，向清政府极力营救，而同志吴禄贞、程家桢时在北京，亦屡向庆王肃王条陈，主张勿杀党人，以免加增汉满种族恶感。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外交部遂电知鄂督，有“关于圣公会之日知会刘敬安等从缓办理”之一语，此案延至第二

年丁未（一九〇七年）五月始确定罪名，敬安与胡瑛均定永远监禁，余人则分别监禁十五年或十年不等。敬安在狱时信奉耶稣救世真理，久而弥笃。每夕祈祷之声喃喃不绝，狱吏及同狱者多为感化，因而皈依基督教者颇不乏人。同狱之殷子衡一日叩敬安曰，连夜闻君祈祷之声何为。敬安曰，维摩诘病在斗室，佛法及于三千大千世界，耶稣降生马槽，福音遍传于南北两极；予持耶稣之名，求救中国之苦，身在縲绁，心在天堂，汝未观新旧二约乎？三界唯心，有所归依，即不乱也。自度度人，汝其急信道以求解脱患难中之孽障乎？子衡闻言五体投地，自此日后敬安学道，于极苦中求至乐。（以上数语出子衡狱中日记）同狱有因萍醴党案入狱之湘人欧阳道垠，豪杰士也，性刚直而不能下人，见敬安等研究福音，早晚祷告，颇以为异，敬安乃不惜瘠音苦口，开导以基督设教真理，欧阳豁然领悟，日就敬安请益，如亲师长。是年六月敬安大病，垂危床褥七十余日，赖从其学道之诸友狱卒等殷勤奉侍，潜馈药饵，得不死。病愈后乃与同狱胡瑛、吴贡三、李亚东等秘密组织一中华铁血军于狱中，阴与日知会会员变名分设之各种机关通声气，实为日知会破案后革命运动之中坚。迨辛亥夏旧疾复发，是年五月十六日竟死于武昌模范监狱。狱吏及众囚久受其熏陶，爱敬如慈父，死时皆抚尸痛哭，且遣使飞报圣公会，中西牧师闻耗哀痛，迅至狱中，舁尸至武昌圣马可堂厚殓之。入棺之顷，敬安老母痛不欲生，见尸几不辨为其子之真相，盖骨瘦如柴，年仅三旬余，而须发尽白，其为国所受之苦，可以想见。敬安死后三月，而武昌革命军起，中华民国由斯产生，敬安有灵，其可瞑目耶。

刘敬安与刘家运

余与鄂省日知会首领刘敬安从无一面之识，昔在清季丙午（一九〇六）尝由曹亚伯介绍，与敬安及日知会干事冯特民通书二次，敬安署名或称敬庵，或称静庵，向未签署家运二字。余当时固不知敬安有家运之别号也。是岁十一月鄂吏假搜捕萍醴起事余党名目，且悬重赏购缉刘家运。及敬安被逮，清吏强逼其供认刘家运，而敬安始终否认之，究竟敬安是否即家运，余及当日湘鄂诸同志黄克强、宋教仁等多未知其实。民元后曹亚伯语余，谓敬安与家运同为一人，其所著《武昌革命真史》，内载殷子衡狱中日记，有“刘公敬安名贞一，道号保罗，家运其别字也”等语。亚伯与敬安同属日知会主要人物，子衡更与敬安同狱多载，均称家运二字为敬安别号，由是党人中编述史传者，遂认敬安家运同是一人，一见于孙总理自传，二见于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大风》旬刊十六

期所载《革命逸史》，三见于刘揆一著《黄兴纪传》。民二十八年九月余忽接日知会老友吴崐（寿天，又号寿田）从宜昌来书，力言敬安与家运非同一人。嘱为更正，原书照录如左：

自由老兄先生有道，别十余年矣，动定如何？深为系念！近阅《大风报》，知老兄尚殷殷于革命史之纪述，纪实阐幽，甚盛事也。惟家运一篇实不可不以更正。盖刘静庵与刘家运本是两人，因刘家运有赏金五千元，当时官吏遂以刘静庵代之。事后刘家运又由湖南捕获送鄂，曾与同监之殷君子恒（此人尚在）晤谈两次，以后则不知其下落。此事敝友张君难先所作刘静庵碑阴，言之甚详，已嘱其直寄一份与老兄一阅，便知其真相矣。特此上颂著安。弟寿田吴崐谨启，八月二十九日。

吴崐即拙著所载丙午年由刘敬安派赴香港访谒黄克强，余尝招待之于《中国日报》数月之老友也。民二曾当选众议院议员，自民十二国会被非法解散后，即已不通音问。近忽移书为故友刘敬安阐明真相，洵于党史补益不鲜。张难先与敬安为同狱九君子之一，其言至有根据。吴书来后不及半月，张难先所撰烈士刘静庵先生墓碑及碑阴二文亦至，更足证明家运为湖南哥老会重要头目，与敬安非同一人，爰亟为录出，以正前误。

烈士刘静庵先生墓碑及碑阴（已刻）

清光绪三十二年冬湖广总督张之洞，令按察使梁鼎芬会司道七八辈鞠囚，时一囚慷慨言中国危殆，触鼎芬怒，笞之；囚怒，骂鼎芬，鼎芬怒，益笞，囚益益骂，鼎芬益益笞，囚自首至踵趾无寸肤完，濒死者数，稍苏，仍戟手骂不绝，当时号为铁汉。即辛亥前吾鄂革命党首领潜江刘静庵先生也。先生少随父珙读，纵观六经诸子，并究心闽洛姚江，旁逮内典道藏，罔不学，学俱有心得。稍长，见中原多故，投鄂军为管带黎元洪司书记，欲假军队作根基进行改革，有吕大森、胡瑛、朱元成、何季达等设机关于武昌，名曰科学补习所，以愚官府耳目。先生与宋教仁先后入所，急谋联合湘省，期于清那拉后寿节举义。亡何湘事泄，破获机关，得鄂中秘密，湘抚飞章报鄂督按治，时甲辰十月，鼎芬方官武昌知府，承旨封科学补习所而逮捕党人，先生亦被逐于黎氏。旋清廷命铁良南下搜括财赋，先生闻之怒，密令胡瑛、王汉侦刺之，不中而汉死，先生益愤，复勾合同志图再举。先是美教堂设有日知会，即教士阅报所也。先生素善其会长胡兰亭，因缘为会中司理，将借其地为机关，集同志。会例星期演讲，先生每登坛，痛述大局危亡状，以输其革命意义。不数月，军学界大感动，相率入会者达数千人。更设东游预备

科及江汉公学，广事号召，至于教会之阅报室，遂变为革命党之根据地矣。湖北党务自科学补习所挠败，经先生呼号，声势复振。孙总理在海外闻讯，大喜，爰派黄冈吴同志崐，与法国同志欧几罗，来鄂视察，以期大举。欢迎时，欧几罗不知有暗探，倡言中国应如何从事革命，语瞬息传遍，当路侧目。时丙午五月也。及秋萍醴事起，势綦张，孙总理在日京，谓时不可失，派胡瑛、朱元成、梁钟汉等回鄂，晤静庵，谋响应。适无赖郭尧阶者，以游学识胡瑛，侦悉内情，告密于巡警道冯启钧，导捕先生及胡瑛、朱元成、梁钟汉、季雨霖、李亚东、殷子恒、吴保春并难先九人，以攫赏金。初鄂督得谍报，云长江下游匪首为刘家运，因悬赏万金缉，郭即指先生为家运贸之，先生急走黄陂，逻骑追及执还，对簿之日，鼎芬、启钧必欲先生自承为家运，并迫供同党。先生名贞一，字静庵，一字敬庵，在军名大雄，故始终违拒，第承己为革命党，不涉谁何。后家运被获，与殷子恒同监，实另一人也。卒罗织成狱，十二月二十六日已部署行刑矣。忽圣公会教士，群起声先生冤于领事公使，为直于内外部，下鄂督，得不死，仍判以永远监禁。竟于辛亥五月瘐毙狱中，年三十七，距起义方三月，呜呼痛矣。先生之在狱也，学行益进，禁卒囚徒俱感化，愿为弟子者数辈。一日纳一囚，狰狞凶悍，吏卒畏惮，移与居，久之，和易过他囚。先生平居不苟语言，仪止庄肃，宾朋过从，虽最轻佻者亦莫不敛容相对。以国难不娶，没后，令以弟子应松嗣。去年湖北省政府政务会议议决，公葬先生于武昌东郊伏虎山之麓。系曰：使公迟数月死，得见专制推翻，吾辈亦有所归矣。噫嘻天耶！聊寿贞石，以为吾党纪。中华民国十八年八月一日，沔阳张难先撰并书，大冶许长清刻石。

碑阴（待刻）

静庵烈士碑文刻竣后，觉有一事，犹须详说者，即海内刊物，多误指刘家运即刘静庵是也。此事一见于中山先生之自传，再见于刘揆一先生之《黄兴纪传》，其他以讹传讹者，尤指不胜数。兹事弗辨，则后来几只知有刘家运，而诤刘静庵于乌有虚无之列，或浑静庵家运为一人。因孙刘之言论有力，而讹传周遍海内故也。今试以致误之由，一一剖白之以明真象。丙午冬余辈九人被逮，微闻官府指逮捕之刘静庵即家运，俱惊愕，以静庵向无此名，比对簿，按察使梁鼎芬必欲静庵自承为家运，静庵抵死不承，只慷慨自承为革命党耳。先是湖督张之洞接直督袁世凯电，谓得日本探报，称长江上下游巨匪为刘家运，适萍醴狱兴，之洞举家运，胡瑛、朱子龙等并案立格侦缉。有同邑郭尧阶者，因友人之介绍识余，厌其儇薄也，轻之，惟未严拒其往还。会余方组织科学补习所，因缘得识胡瑛、宋教仁，东渡留学，与教仁尤昵，尧阶归国，教仁抵书静庵为之延誉，且谓湖北党务须与商洽。余戒静

庵无轻信，谓尧阶浮薄，非可与计大事者，静庵以余绳人刻，置之，尧阶好冶游，负日商四千金，控诉夏口厅，拘其兄追比，尧阶计无出，见名捕刘家运悬赏万金，胡瑛、朱子龙各数千，心动，时湖北党魁群望属静庵。自欧几罗来后，风声益大，赏緝中虽无静庵名，然官厅与社会之指目均在静庵，静庵不自安，遂匿黄陂，尧阶即诬静庵为家运，告密巡警道冯启钧，导索黄陂村中。其实家运乃哥党渠魁，久洋溢长江上下游者也。胡瑛、朱子龙、梁钟汉适奉中山先生命回鄂，谋响应萍醴，其谍报均来自日本。萍醴事起仓卒，湖北党人未尝濡迹其中，故赏緝牒中无静庵名，尧阶深悉党部内情，以姓同事同时同牵合而株连之，于是构成冤狱，未几家运在湖南被捕，递解来鄂，与殷子恒同锢一处，数月提付他所，竟不知所终。一时士论，谓家运既明白被捕于湘，则静庵与家运显是两人。承大吏旨者，既欲诬指静庵为家运，静庵抵死不承，乃复酷刑毒逼，案牍盈尺，不料家运竟获，则官厅之诬陷何以自解，且恐吾曹廉其隐而窘之，乃谋窜取家运移置他监为名，即牵连别案置之死以灭其迹，此当日官吏移甲换乙李代桃僵之惯技，以规避处分者也。余撰静庵碑文，虽知事实经过如此，然局外言人人殊，究不能不矜慎从事。邀集同难之见存者李君亚东、梁君瑞堂、刘君保春、殷君子恒，并请日知会与静庵同居数年之胡兰亭黄吉亭两会长，及历来参与日知科学两团体之曹君亚伯，丙午夏与欧几罗偕来之吴君崐，聚首证明。吴君曰，我自中山所来，从未见静庵有家运名。胡君曰，余与静庵朝夕相处，乌有此称。而殷君并谓家运实别一人，与我同监，随取丁未二月十四日汉报一纸宣示，标题为湘省又获刘家运，其言曰：去岁在黄陂拿获之刘家运，研讯数次，自供为敬庵，仅认为革命党，不认为刘家运。现闻湘省又拿获一刘家运，究竟孰真孰伪，将来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也。由此观之，可想见当日之官吏张皇失措，不得不以诡谋消灭其事矣。此外诸同志均不认静庵有此名。静庵本烈丈夫，既已承为革命党，当无幸生余地，其名果为家运，又何苦志死茹刑，为此无意识之狡展耶？且静庵学人，其原名或曰大雄，或曰贞一，而字则为静庵，或敬庵，俱寓有深意，何取此凡俚之家运二字。是年在文华书院书一联曰：“大块噫气嗟劳苦，帝天无言遂生成。”自署丙午年重阳前一日敬庵刘子书。又前三日书一联，署曰静庵书。现在前联存文华校长卢春荣家，后联存胭脂巷张稚侯家，有目共睹。党人为应付环境计，常有变姓名以避侦伺之法，静庵既身为领袖，其化名当秘示亲切会中之党员，以便应付事机，何以会中会外任有机要者，概无一人知之耶？据上种种为证，则静庵家运迥属二人，已无丝毫疑问。维孙刘等纪载讹误之由来，有说明之必要也。吾鄂自来风气，大抵耻华声，厌标榜，木讷质直，不为时贤所注意，匪第丙午为然，即辛亥上年，谭人凤奉派来鄂，视察党务，谓王玄奔蒋翊武如田舍翁，李长龄若老学

究，罗良骏似纨袴子，即可见党人彼此之意态矣。鄂中内地党人多自田间来，丙午以前咸无赫赫名，萍醴事起牵涉及鄂，声誉始大，故传者只能举萍案之名名之，初无暇计夫实在也。日复一日，讹以传说，于是静庵之名为家运二字所夺，以轰轰烈烈之奇男子，因名字之讹误，几成为全身疑案，诘非吾辈极痛心之事乎，所以余于静庵之名，急于别白纠正，不丝毫迁就也。碑文体尚简要，未克详述，因复列碑阴如右，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夏张难先补记于东湖之思旧庵。

记上海志士与革命运动

广学会及《大同报》

上海为我国内外之交通孔道，自海禁以后，各国教士络绎来中土宣传基督教义，群以上海租界为枢纽。英美二国人士李提摩太、林乐知、李佳白等特创设广学会及大同学会等文化组织，专翻译基督教经典及欧美史地科学等一切关于文化之书籍。如《泰西新史览要》、《普法战史》、《格致汇编》之类，无虑数百种。国人之谈新学者，莫不奉为津梁。广州双门底之圣教书楼，即以贩卖广学会出版书报为营业，孙总理及康有为之倡导维新，大都得力于是。及甲午战后，士大夫渐知变法之急务，此项译本尤风行一时。故自西欧之文化东渐而言，广学会及大同学会翻译之功，实为不朽。又该会附刊有《大同报》一种，系周刊或旬刊，亦为我国最老之刊物。出世数十年，未尝或辍。于启导新知，甚有价值。

《时务报》及《昌言报》

《时务报》旬刊出版于丙申年（一八九六），为汪康年、梁启超、夏曾佑、章炳麟等所创，专提倡变法，批评时政，议论新颖，轰动一时。吾国杂志之倡导改革者，该报实为先河。该报经理人为汪康年，号穰卿，尝发刊《上海中外日报》，清代名进士也。社论除梁启超、章炳麟外，尚有康有为弟子麦孟华、徐勤、刘桢麟诸人。所撰述文字，大都惊世骇俗，顽固士绅多为侧目。章炳麟于乙未年（一八九五）尝入康有为所设之强学会，故梁启超邀为同事。是时孙总理陈少白与康梁师徒同倡新学，尚无革命保皇之派别，故丁酉年（一八九七）横滨华侨

邝汝磐、冯镜如等创办学校，求师于孙总理，总理为荐梁启超，梁以事不能行，乃改推徐勤自代焉。继《时务报》而起者，尚有康广仁、吴介石、陈继俨等所设之澳门《知新报》，及韩文举、韩县首等所设之《神户东亚报》，与《时务报》同一论调，主笔政者，皆康门徒侣也。《时务报》出版二载，以汪康年、梁启超二人互争主权，聚讼不休，结果为汪所胜，遂易名《昌言报》，章炳麟仍任笔政如故。会戊戌（一八九八）变政，康有为恃清帝势力，遽以明令派梁启超赴沪督办官报，欲收旧《时务报》为官报。梁未行而祸作，即《昌言报》亦不免于封禁，汪章诸人咸避地隐匿。是年冬，梁复发刊《清议报》于横滨，大唱勤王之论，是为庚子（一九〇〇）年唐才常汉口富有票一役之导线。

经元善之狱

戊戌政变后，清廷遂有废立清帝光绪之议，至己亥（一八九九）冬此说愈盛，清廷竟以是征求各督抚意见，赖江督复电，有“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一语，而光绪之位得以保全。时沪上志士深染康梁余毒，尚不知革命排满为何物，甫闻废立之说，即号召绅商学各界开会反对，以经元善、蔡元培、黄炎培等为之倡。众主张联名致电清廷抗争废立，推上海电报局总办浙人经元善（字莲珊）领衔，电文署名者凡一千二百三十一人。清廷令捕元善，署名者咸慄慄自危，元善亡走澳门，清廷复照会澳门葡督拘捕，葡督徇其请，禁之于大炮台，赖兴中会员谢缵泰代求香港总督卜力向葡督营救，始免于难。此庚子年（一九〇〇）正月事也。

正气会及自立军

己亥冬湘人唐才常与康有为梁启超诸人决议在长江沿岸各省起兵勤王，运动各省会党及防军发难之责，才常任之。向海外华侨募集饷糈接济义师之责，康梁师徒任之。才常应付各方，至有权术。对康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故各方咸为之用。留东学生先后归国参加者，有林锡圭、秦力山、吴禄贞、戢元丞、沈翔云、黎科、傅慈祥、蔡丞煜、刘伯刚、吴念慈、李炳寰、蔡钟浩、田邦璇等二十余人。才常初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假用日人田野橘次名义，榜其名曰东文学社，阴则组织正气会为策动机关。手订章程二十余条，文中有“非我种类其心必异”，及“君臣之义如何能废”等句。旋又易其名曰自立会，称其军曰自立军。进行半载，成效渐著。湘、鄂、皖、赣之哥老会头目多与联络，所发富有票散放于沿江各省者为数甚夥，势力日益膨胀。惟康梁所许军资多为少数保皇会首领中饱消耗，屡电催海外接济，均爽约不至。才常初定七月十五日各路并举，以饷糈不足，于是数数展期以迁就之；日久风声外泄，延至是月二十八日，而汉口自立军之总机关部遂被清吏大举搜索，才常及同党

二十余人死焉。余党纷纷逃避海外，驻沪办事处之东文学社旋亦瓦解。

张园之国会

才常于事败之前一月，尝于六月间假庚子拳匪事变人民须自行保种救国为辞，邀请沪上当代名流开大会于张园，美其名曰国会。莅会者有容闳、严复、章炳麟、文廷式、叶瀚、张通典、吴葆初、宋恕、龙泽厚、沈荃、马湘伯、毕永年、戢元丞、狄葆贤等数百人。公推香山容闳为会长，侯官严复为副会长，才常为总干事，林锡圭、沈荃、龙泽厚、狄葆贤为干事。成立后大招清吏之忌，以时值拳祸猖獗，无暇禁阻。上海各日报中为之鼓吹者有《同文沪报》，是报即东文学社教习日人田野橘次所设，才常等在沪活动甚得其力。时国会中参与分子至为复杂，除才常及其密友数人外，鲜有得参与自立军机密者，余人大都震于国会民权之新说，乘兴来会，非有如何确定之宗旨也。逮开会后，首招毕永年章炳麟二人之反对，永年以乡谊力劝才常断绝康有为关系。才常利保皇会资，坚不肯从。相与辩论一日夜，失望而去。炳麟责才常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称拥戴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因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未几汉口自立军事败，参与国会诸首要咸被清吏指名通缉，容闳、严复以是先后出亡英美避之。

龚超之狱

唐才常既败，富有票余党多逃亡上海、香港、澳门及日本各埠，中有湖南人龚超者，前为长沙时务学堂学生，是役与唐才中、何来保等企图在湘起事，失败后间关逃沪，庚子年十一月初一日为清总兵颜某派人诱至华界，即被拘禁营中，事为龚友侦知，乃向租界工部局及英领事求助。英官以清吏此举影响租界主权及居民治安，遂在会审公廨提出抗议，卒将龚超提回租界审讯。清吏始终诿过于颜总兵部下之兵弁，谓颜并无捕龚之意，此乃颜部欲得千金赏格，故贪利为之，颜绝不知情云云。结果龚超遂获释放出狱，是为租界英吏庇护国事犯之滥觞。龚旋赴香港，易名苏子山，壬寅年（一九〇二）十二月尝与洪全福、梁务光等谋在广州大举，除夕事泄，被逮判监禁二十年，迄辛亥革命始获开释。

《国民报》及《大陆报》

辛丑年（一九〇一）春夏间，留东志士秦力山、沈翔云、戢元丞、杨庭栋、杨荫杭、雷奋、王宠惠、冯自由诸人发刊《国民报》月刊于东京，鼓吹民族主义，不遗余力。留学界公然倡导急激言论者，此为嚆矢。是报每期输入上海逾二

千份，影响于东南各省青年，为力至巨。惟是报仅出至第四期，即以款绌停版。明年壬寅元丞与日人下田歌子合资创设作新社于上海，专以译著新学书籍及贩卖科学仪器为宗旨；同时复刊印《大陆报》月刊，以继承《国民报》之统绪。是报主张改革，虽不如《国民报》之激烈，而排斥康梁之保皇邪说，尤有过之。主笔政者，除秦力山、杨荫杭、杨廷栋、雷奋等外，更加入陈冷等数人。是时沪上日报杂志之言激烈论者，只一《大陆报》而已。是报亦仅出至十数期而止。

壬癸两年之政治集会

壬寅癸卯（一九〇三）两年间，沪上人士之国家观念，日渐激发，如桂抚王之春有借法款假法款以平乱之议，及俄人要求签订满洲退兵新约。寓沪各省绅商志士辄在张园开会反对，或联电北京政府抗争，或请政府惩革负责官吏，或主张罢市罢工，以民气为后盾，或乘机向异族政府请愿实行立宪，以御外侮。慷慨激昂，汹动一世。癸卯四月各省绅商志士初在张园召集拒俄大会，有主张编练义勇队以响应日本留学界者。及闻清廷密电各督抚查拿义勇队代表，群以愤无可泄，一般舆论遂日趋激烈，革命排满之声浪，因而响彻云表。其初各界人士自发起拒俄大会后，旋即组织四民公会以资号召，继乃易名国民公会。最初主动者为吴敬恒、冯镜如、陈范、龙泽厚、邹容、黄宗仰诸人，凡维新志士多列名焉。原无所谓派别。至五月间康徒龙泽厚忽倡议易名曰国民议政会，主张乘势向清廷请愿立宪，于是冯镜如首陈意见脱会，邹容、吴敬恒及爱国学社诸人皆表示不肯加入，而国民议政会遂成无形的解散。然是时清吏对于预会诸人，固一律目为革命党，并无缓进急激之分。未几清商约大臣吕海寰函告苏抚恩寿，谓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滋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迅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等语。苏抚乃飭上海道向各国领事照会拿人，各国领事已签名认可；为公共租界工部局不予赞成。故此案得以暂时延搁。

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

中国教育会成立于壬寅年秋冬间，地址在上海北泥城桥福源里，即今跑马厅对面。发起人为寓沪志士章炳麟、蔡元培、吴敬恒、蒋维乔、叶瀚、黄宗仰、汪德渊等。众推黄宗仰（号乌目山僧）任会长，章蔡等皆为董事。此会之宗旨，在于改良教育及编订完善之教科书，并仿通信教授法，刊行丛报。正规划间，而驻日清公使蔡钧阻遏留学生入学，及上海南洋公学南京陆师学堂等禁制学生言，各事相继发生。各处学生均被逼退学，同向中国教育会求助。黄、章、蔡、吴诸人乃另开设爱国学社以容纳之。各地退学生及有志之士署名学籍者凡一百三十二

人，学社对于诸生之言论绝对放任，故师生皆议论时政，放言无忌，一改官立学堂所为，隐然成为东南各省学界之革命大本营焉。教育会于学社之外，复设爱国女学堂，以湘人陈范之女公子撝芬为校长，与男校互相犄角，各放异彩。癸卯五月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忽以权限问题，宣告分裂，会员有从中竭力调停者，因章炳麟主张对于学生渐加以制裁，而吴敬恒则袒护学生，意见各殊，卒难复合。而教育会会员之任教职者遂多谢去。学社经费原募诸寓沪热心绅商，而哈同夫人罗迦陵女士尤占巨额，一旦内部破裂，遂有岌岌动摇之势，同志莫不引为憾事。

章邹二氏之名著

爱国学社开设后，章炳麟任讲授国文，发挥民族主义，至为激烈，讲稿时在《苏报》发表，渐为清吏所忌。会蜀人邹容以在京以陆军学生监督姚某有奸私事，偕五人闯入其室，持利剪割去其辫发，被控，逃至上海，访炳麟于爱国学社，二人一见如故，容遂下榻社中，各为高论，容称炳麟为东帝，而自称为西帝。容篋中有留东时所撰《革命军》稿，就正于炳麟，炳麟击节称赏，即为作序，使黄宗仰、金天翮、蔡寅、陶赉熊筹措资刊行之。先是康有为于游欧美后，尝有《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行世，排斥革命仇满之说，不遗余力。炳麟因撰《驳康有为政见书》以辟之，至是亦与《革命军》同时付梓。书出风行一时，读者无不感动，清吏因之大震。未几，此二名著遂与《苏报》同成租界会审公廨最大讼案之好资料。

章邹案及《苏报》案

《苏报》为陈范创办。陈湖南衡山人，号梦坡，历任江西知县，因教案落职，移居上海，主持是报已有四载，初提倡保皇变法之说，继以清政不纲，末由挽救，乃进而揭橥革命，为天下倡。所延聘记者有吴敬恒、章行严、汪文溥诸人，持论激烈，清吏视之有同蛇蝎，初由江督恩寿向上海道指名拿办首要，第一次名单有蔡元培、吴敬恒、章炳麟、钮永建、汤檠、冯镜如、龙泽厚等多名，以工部局拒绝签字而止。未几两江总督魏光燾迭奉清廷严谕，有“上海爱国党倡言革命，该督会同葺贖”之语。乃派道员俞明震至沪查办。复向各领事提出第二次名单，内有蔡元培、章炳麟、陈范、吴敬恒、邹容、黄宗仰六人名字。工部局仍表示异议。明震乃问计法律顾问英人担文律师，担文教以诉诸法律。于是由江督魏光燾代表清政府为原告，控诉蔡、章、陈、吴、邹、黄、龙诸人于会审公廨，工部局不能拒，乃于闰五月初六日出票拘人，被控诸人预知消息，多出走避之。元培赴青岛，敬恒赴英伦，陈范、陈撝芬、汪文溥、黄宗仰相继赴日本，炳麟不

肯去，曰，革命必流血，吾之被清政府拘拿，今为第六次矣。及西捕至爱国学社，问谁为章某。炳麟正在客室中，自指其鼻曰，我即是。欣然随之去。炳麟自狱中作函告容，令自行投到。当晚邹容乃自首，时申新各报多持反对论调，《新闻报》尤讥笑炳麟之不去为虑。炳麟自狱作书答之，有“志在流血性分所定”，及“休矣《新闻报》已者，请看数百年后铜像巍峨高出云表，我为尔”等语。同时令大队西捕围搜《苏报》社，捕去司账员程吉甫一名，复到派克路第七〇二号《女报》馆，捕去陈范之子仲彝及《女报》办事员钱允生二名。又在福州路捕去龙泽厚一名。《苏报》社即被封禁，爱国学社亦解散。闰五月十四日第一次开审，原告为清政府，承审员为清知府孙建臣上海县汪瑶廷及英国副领事迪比南。清政府所延律师为古柏及哈华托二人，章邹等同志亦延律师博易及琼斯二人代为抗辩。清政府所控罪状，乃摘取《〈苏报〉论说》及《革命军》、《驳康有为政见书》中语句。在中国视为大逆不道，译成英文则平淡无奇。经数次研讯，中英谘员以章邹二人问题太大，一时未易判决。乃先将无关紧要之陈仲彝、程吉甫、钱允生三人开释。余外龙泽厚一名，清吏指为庚子汉口富有票案要犯，要求解往湖北讯办。英领事以龙业已羁押数月，应从宽办理，遂准其交保释放。

章邹案国际交涉

清政府于此案之起初，要求将章邹等六人提归内地办理。上海工部局以维持租界内治外法权及居民生命为理由，力持异议。及经会审公廨开讯，被告律师质问原告究系何人，谘员孙建臣称章邹等系奉旨着江苏巡抚饬令拘拿等语。被告律师乃得意言曰：以堂堂中国政府，乃讼私人于属下之低级法庭而受其裁判耶。孙谘员不能答。从二十七日第二次审讯后，案遂搁置，盖清政府欲用外交手段，向北京英公使直接交涉，请求引渡章邹二人，以明正典刑也。由是此案竟成国际上之大问题。清外部与英使间交涉多次，英使均以英律保护政治犯为辞，迄未解决。于是被告律师乃向会审公廨声称，章邹等不得罪名，久系囹圄，在法律及人道均属不合，要求立将控案注销。故是时沪上忽有释放章邹之风说。因是清政府深恐此案徒劳无功，卒允采纳英使意见，从宽办结。至甲辰年（一九〇四）四月，遂由会审公廨判决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均罚作苦工，在狱期满，逐出租界。邹容年少性躁，不禁虐待，于出狱前一月病故。炳麟素研究佛学，又有涵养，至丙午年（一九〇六）五月初八日出狱。届时旅沪同志蔡元培、叶瀚等及东京同盟会代表龚炼百诸人，均至西牢守候欢迎。即赴吴淞登轮东渡，旋任《民报》总撰述。

书报业及学校之发达

癸卯一年为上海及苏浙各地革命书报业及爱国学校最发达之时期，留日学界出版物，如《新广东》、《湖北学生界》、《汉声》、《湖南》、《游学译编》、《新湖南》、《江苏》、《浙江潮》等，皆以上海为尾间。沪人自行编印者，除《革命军》及《驳康有为政见书》外，则有《黄帝魂》、《〈苏报〉案纪事》、《馗书》、《俄罗斯大风潮》、《孙逸仙》、《沈荇》、《攘书》、《中国民族志》、《清秘史》、《女界钟》、《三十三年落花梦》、《二十世纪大舞台》、《〈国民日日报〉汇编》、《自由血》诸种。各书局如镜今书局、东大陆图书局、国学社、《新民丛报》支店等，均不惜资本，各征求此类译本著述，以投时好。就中有镜今书局陈竞全者，甘肃秦州人，为名进士，久官知县，以不嫌于清政，罢官来沪，创办书局。并时出资协助革命刊物，卒因是破产，抑郁以死。又有香山人徐敬吾者，专以出售革命书报为业，常偕其女宝姒在味莼园及青莲阁等处演说革命，听者如堵，书报借此畅销，时人以徐尝撰《野鸡花榜》载诸小报，故赐以“野鸡大王”之徽号。宝姒亦有辩才，其父之得力助手也。自爱国学社开设后，苏浙各地志士继起办学者风起云涌，爱国女学自校长陈撷芬赴日，仍由蒋维乔、钟宪鬯、王季同诸人维持，中国教育会即迁入其内，保留余绪。癸卯冬蔡元培自青岛返沪，仍假该校所为活动机关焉。上海附近之华泾乡有丽泽学堂，主持者为刘季平（又名刘三）、刘东海（季平从兄）、秦毓璠、费公熙诸人。校址即假刘季平所居宅。甲辰春以事解散，其学生一部改组为青年学社，校址在上海新闸路。是年冬学社因万福华行刺王之春一案横被牵涉，卒被封闭。江苏常熟及吴江之同里均设有中国教育会支部，常熟支部创办塔后小学，丁初我、徐觉我、殷次伊等主持之。殷次伊于章邹案起时愤而自杀，塔后小学随之歇业。同里支部创办自治学社，附设兵操。金天翮、柳弃疾、林纾、陶赓熊等主持之。金天翮同时复设明华女学，规模悉仿爱国。湘乡张通典之女公子弘楚、驾美、振亚，及阳湖孙济扶等，皆出身此校，声誉颇著。绍兴东浦有热诚小学堂，为徐锡麟所办，内附兵式体操。嘉兴有演说教育二会，均敖家熊所办，暗鼓吹革命。此外金华有《萃新旬报》，苏州有吴中公学社，杭州有杭州公学社及《白话报》，各乡村市镇新建学校亦多濡染爱国思潮，群以议论时政为风尚。虽或命运不长，旋起旋蹶，然有助于革命波涛之澎湃，决非浅鲜。

《国民日日报》之继起

《苏报》案发生后，寓沪志士多避居他处，各怀戒心。革命喉舌，因之缄默者半载。及是年十月，遂有章行严、张继、谢晓石、何梅士、陈去病诸人发刊

《国民日报》，为卷土重来之计。是报发行人为广东东莞人卢和生，自幼生长香港，系英国海军工程毕业之老留学生，在沪任西报主笔有年。时创办诸人虑招清吏干涉，故用卢名在英领署注册。是报言论与《苏报》同，而篇幅及取材则较《苏报》为新颖，执笔者除章、张、何、陈等外，尚有苏曼殊、陈由己、柳弃疾、金大翻诸人。出版未久，大受社会欢迎。数月后，卢和生发生意见，竟致涉讼。香港《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因同党内哄，有碍大局，特亲赴上海设法和解。复有同志叶澜、冯镜如、王慕陶、连梦青等奔走调处，卒由双方各允息事而止。是报经此风潮，任出资者成为失望，卒致无法复版，闻者惜之。

《俄事警闻》及《警钟报》

癸卯冬，蔡元培自青岛回沪，适俄人进兵奉天，举国骚然，因与同志刘光汉、陈竞全、叶瀚、王季同、陈去病、林獬诸人发起对俄同志会，又刊行日报一纸，名曰《俄事警闻》，专录载俄兵侵满消息，及排击清政府外交之失败，以唤起国人之注意。地址在福州路工部局东首之惠福里，旋更扩大篇幅，改名《警钟日报》。刘光汉、汪德渊、孙寰镜、柳弃疾等同任撰述。言论益见精彩，实继承《苏报》及《国民日报》之统绪。出版数月，销路日广，旋以批评清廷外交失地，持论过激，至乙巳年（一九〇五）二月二十日遂为德国领事照会当道强行封禁，并有令拘捕主笔刘光汉，光汉预匿他处得免。

华兴会与万福华刺王案

甲辰（一九〇四）春，湘省革命党人黄兴（原名轸）、刘揆一、马福益等组织华兴会，定期是冬十月十日，清西后六十生辰，袭取长沙省城，分五路大举。不幸事泄失败，兴、揆一等先后逃沪，设秘密机关于新闻路新马路余庆里，企图再举。寓沪各省革命党员多出入其间，皖人万福华其一也，时福华闻前桂抚王之春有勾结俄人侵略东三省之举，异常悲愤，乃向友人假得手枪一枝，日欲伺隙狙击之春，以警凶顽。初潜伏跑马厅新马路昌寿里王寓所左右多日，迄无下手机会。乃于十月十三日，冒王友赵某名义，邀之春会饮于福州路金谷香西菜馆。之春依时赴约，甫入门，福华大骂王卖国之罪，即举手枪击之，以不谙先拨机制然后放枪之法，攀机十余次，均无子弹射出，遂为西捕所擒，被系于老捕房。越日，党人章行严闻讯往捕房慰问，捕房因得跟踪至余庆里机关大事搜索，在寓之黄兴、苏鹏、张继、薛大可、章勤士、徐佛苏、郭人漳、林万里、朱启陶、陈天华等十余人尽被捕去，就中有道员郭人漳方就江西新都统之职，是日适在路上与旧友张继、赵世喧、黄兴三人相遇。张继即邀之至余庆里叙谈，故亦同时被捕。

案发后，旋得赣抚夏时来电为郭人漳解救，上海道袁海观亦亲访英领事要求释放，因是郭等十余人遂得不问事由全数开释。先是湘、鄂、宁各督抚均有文电至沪通缉黄兴，且附以照像，故会审时兴诡称为安徽教员李有庆，西吏犹持兴之照片对照。以有须无须之别，疑惑不定。幸一华人通译事先诡称所搜出党人名册，为日用饭菜账簿，即时抛弃，无从证实，始得无事。兴等以沪上不能立足，乃先后避往日本。

光复会之活动

癸卯夏秋间，留东学界所组织之军国民教育会，以清廷禁阻学生结队拒俄，遂决计推举会员中在本省有相当力量者为实行员，使归国从事实行工作。湘人黄兴、皖人程家桢、浙人龚宝铨数人，即归国实行员之最重要分子也。宝铨既返国，初组织暗杀团，谋狙击一二满清大吏，以张声势，久久未得机会。至甲辰秋乃招集江、浙、皖数省同志扩大为革命党集团，会蔡元培从青岛归上海，觐知其事，乃求入其会，愿与合作，团员非常欢迎。于是更将规章详加修订，定名曰光复会，群推元培为会长，时元培仍居爱国女学堂，故会中事务，多在爱国女学取决之。宝铨与会稽人陶成章为莫逆交，谕知成章从事联络浙省秘密会党工作有年，与各会党首领渊源甚厚，故力邀成章入会。成章从之。由是绍兴商学界及各属会党头目相与订盟者，络绎不绝，成章之力为多焉。是岁十月，黄兴、马福益等谋在湘省大举，元培预使成章等计划在浙省响应，及黄兴等于期前事泄失败，浙事遂亦为中止。是冬光复会始在沪正式成立，章炳麟时在狱中，尝致书元培等策动之。十二月绍兴人徐锡麟偶过上海，见元培于爱国女学，遂亦入会。锡麟素有大志，订盟后隐然以匡复为己任。时以元培专心学术，不耐人事烦扰，致会务无大进展。乃独归绍兴创办大通学堂，成章、宝铨及有力会员吕熊祥、赵卓、蔡元康（元培族弟）诸人均入绍兴佐之。由是光复会之大本营遂由上海移于绍兴，旗垒为之一新，及乙巳年（一九〇五）七月各派革命党合组中国同盟会于东京，光复会员亦为主要发起人。故成立之初，即由皖人吴春暘推荐蔡元培为上海分会会长，未几陶成章、刘光汉亦任《民报》编辑。春暘、成章、光汉皆光复会员也。同盟会成立后三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留学界大愤，陈天华于十一月十二日，愤投大森海湾自杀，同盟会员秋瑾、易本羲一派主张全体归国，另在上海办学。胡汉民、汪兆铭一派主张求学宜忍辱负重，力反对之。于是秋瑾愤然归国，与诸同志创设中国公学于吴淞，旋由徐锡麟介入光复会，时瑾方在沪组织《中国女报》，又与中国公学教员陈伯平等税屋于虹口祥庆里为活动机关。锡麟时正实行捐官擒王计划，无暇兼顾大通学堂，遂举校务及全浙军务悉委瑾任之，相约光复军在皖浙二省同时发难。瑾于是入绍兴主持一切。及丁未（一九〇七）

五月，锡麟在安庆事败，瑾于六月亦为清吏擒杀，光复会自是一蹶不振，事详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

上海及江苏同盟会

乙巳同盟会成立之初，即已指定蔡元培为上海分会会长兼主盟员，旋以元培将赴德国留学，会务不能有所进展。丙午（一九〇六）春，同盟会本部乃派高剑公（后更名旭，号天梅，金山人）为江苏分会会长，合上海江苏二分会为一机关。初创办健行公学于西门小菜场宁康里为革命运动枢纽，同事者有朱葆康（字少屏，上海人）、柳弃疾（字亚子，吴江人）、陈陶怡（原名剑虹，后改陶遗，号道一，金山人）、沈砺（字道非，松江人）、陈去病（字佩忍，吴江人）、吴修源（号信三，松江人）诸人。继又开设会所于宁康里某号，距健行公学不百步。其屋初为同志夏听渠养病之所，故即以夏寓名之。第一次会议莅会者，有蔡元培、刘光汉、张昭汉（湘乡张通典之女公子）等三十余人。第二次会议则假座新闻路辛家花园，梁乔山、谭心休、龚炼百（字铁铮，庚子富有票案龚超之弟，湘乡人）等与焉。健行公学实继承爱国学社之统绪，高、柳、陈、朱、沈、吴等皆任讲师。以《黄帝魂》、《法国革命史》、《荡虏丛书》等为教材，学生颇感动。以是欢迎章炳麟出狱及赴华泾乡为邹容烈士墓纪念碑行开幕礼，均有健行学生参与焉。丙午丁未间（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七）孙总理常来往日本南洋，舟过沪江时，每由在法租界公董局服务之法国友人向同志传达音讯，于是剑公、葆康、陶怡、亚子诸人，恒至吴淞舟中相见，兼请示进行方法。又东京出版之《民报》、《复报》、《洞庭波》、《鹃声》、《汉帜》各刊物，亦以健行公学为总汇，陈陶怡每携至福州路奇芳茶楼品茗售书，与徐敬吾所设之书肆成犄角，围观者如堵墙。时敬吾之女公子宝姒女士早已病故，敬吾之宣传力因之大减削矣。后数月，外间颇有清吏将封禁健行公学之谣诼，众以夏寓接近健行公学，不速迁，恐有一网打尽之祸。丙午秋，乃徙于八仙桥鼎吉里四号，仍标曰夏寓，所以避耳目也。其初寓居鼎吉里者为高剑公、陈陶怡、柳弃疾三人，后以健行校务来往不便，而湘同志宁调元（字太一，醴陵人）、陈家鼎（字汉元，宁乡人）、傅专（字钝根，醴陵人）适有事来上海，乃以相属焉。后数月宁等东渡，则刘光汉、苏曼殊入居之。同时吴淞中国公学亦设有同盟会机关，梁乔山、谭心休、马君武等主持之。故章炳麟出狱，即迎至公学下榻焉。及明年丁未夏徐锡麟秋瑾事起，清吏照会沪租界当局大索党人，人心为之汹汹，诸同志多他适避之。健行公学始解散，鼎吉里四号机关亦取消，自是丁未至庚戌（一九一〇）之三四年间，同盟会在上海之党务几完全停顿，长江沿岸各省之革命工作亦无所进展。其后陈其美出而重张旗鼓，始自空言而渐进于实行，而党势为之一振焉。

《竞业旬报》及《神州报》

同盟会成立后一二年，寓沪同志发刊报纸者有数种：一为丙午年秋瑾女士所主办之《女报》，此报出世为期甚短，故功用不广。二为《竞业旬报》，出版于丙午年夏秋间，馆址设在铁马路爱而近路庆祥里，主持者为傅钝根、谢消庄、丁慧仙、胡适等数人。时香港《中国日报》尝委托《竞业旬报》以通电报告新闻事务。适是岁十月萍乡醴陵革命军起，谣传已攻破长沙省城。傅钝根、谢消庄等信以为实，竟电《中国日报》谓革命军克复长沙。《中国日报》遂特发号外，宣扬革命军胜利。后乃知为不确，大为保皇报所指摘，诚趣闻也。三为《神州日报》，出版于丁未年二月二十日，主持者为于右任（字伯循，陕西三原人）、杨守仁（字笃生，湖南常德人）、汪允中（名德渊，歙县人）、叶仲裕、金怀秋、王无生诸人。是报鉴于往日《苏报》及《国民日报》之覆辙，对于时政之批评，惯用旁敲侧击之文字，故不易为清吏所挑剔。刊行未及一载，以邻居失火，不幸殃及，全馆悉付一炬。杨守仁缘电杆而下得免。事后于右任以无力恢复辞退，仍由杨守仁、叶德裕、汪允中诸人设法重整旗鼓。逾年杨守仁渡英伦留学，叶德裕^①以病自沈于江。旧日发起人留者，仅汪允中、王无生数人耳。是报支持至民国后数年，易主多次，论调亦变化无常。其文章最精彩者，为关于辛亥年三月黄花岗一役之发难纪事及诸烈士传记，与后起之《民立报》，可称一时瑜亮。

陈其美之革命运动

上海同盟会自丁未健行公学及夏寓相继取消后，江浙党务因之搁浅者三载。及戊申（一九〇八）春，陈其美（字英士，吴兴人）自日本归国，始渐著手于党务工作。其美素有大志，尝于丙午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旋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学，及履沪，乃纠合同志创办《中国日报》及《民声丛报》为言论机关，旋设秘密事务所于马霍路德福里，江浙革命党人之往来海上咸驻足其间。同志多以梁山泊三字名之。至明年己酉（一九〇九）夏，会务益振，其美遂时约江浙两省同志在事务所商议大举计划，时同志刘光汉、汪公权郎舅已投降清江督端方，充当密探，方由日本返国未久，常至事务所中访友，借以探取消息。诸同志以光汉为本党文坛健将，无疑之者。某次秘密会议决定大举进行方略，光汉亦列席，遂以见闻所得报告端方。端方据以照会租界当局派警吏查抄德福里机关。其美以外出得免，在寓者三人，周淡游、褚慧僧（辅成）乔装工人走脱，只张恭一人被捕。张字同伯，金华

^① 原文如此。疑应为叶仲裕。

人，为浙江龙华会首领，秋瑾之左右手也。被逮后，移禁南京监狱。平阳党首领王金发侦知为光汉所为，怒挟枪访之，责其变节卖友，将处以死刑。光汉跪地乞命，谓必以一己生命保全张恭。恭因得改系上元狱，幸不死。光汉由是不敢再至上海。汪公权以为无虑，仍时至沪刺探党人秘密，卒为王金发枪毙示儆。案发后，金发乃偕其同事一人避地香港，匿于湾仔东海旁冯寓，此已西冬间事也。其美经此事变，江浙大举计划遂以中辍，至辛亥中部同盟会成立，始作卷土重来之计。

《民呼》、《民吁》、《民立》三报之经过

于右任自《神州日报》被火辞退后，旋向沪寓殷商庞青城、柏小鱼、张人杰诸人募集资本，另创《民呼日报》，号称已招足股额六万元。馆址设在山东路一百五十六号。其筹备始于戊申年八月，至明年己酉三月二十六日始告出版。其所宣布之主见，曰本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之宗旨，曰本报为纯全社会上之事业，对于内政外交力持正论，无所瞻徇。曰本报博征海内外名人各种著作，以收集思广益之效。担任著译者，除右任自任社长外，尚有范光启、吴宗慈、王无生、戴天仇、周锡三诸人，销路之盛，渐驾各老报而上之。报中言论，对于时政得失及官吏贪污，时下严厉之批评，尤于陕西、甘肃二省当局多所指摘。以是大惹清吏之嫉视。出版后四月，迭次发生讼案，一为陕甘总督毛某飭沪蔡道控告该报主笔于右任、陈飞卿所办甘肃筹赈公所有短解赈款情事，令向会审公廨彻底查究。二为皖省铁路公司协理朱云锦控《民呼报》毁谤名誉案。三为已故上海道蔡钧之子国桢控《民呼报》，谓其毁坏故父生前名誉案。四为新军协统陈德龙控《民呼报》毁坏名誉案。四案连续发生，于陈二人以此被羁捕房月余，经会审公廨十四次研讯结果，是岁七月二十四日卒由中西谳员宣判，谓“《民呼》报馆不安本分，迭被控发，念系初犯，姑予从轻议结。于右任实非安分之徒，姑念振款清缴，尚未侵吞，已在押一月零七天，毋须再行押办，判逐出租界。陈飞卿应并飭具安分结存案。嗣后如有借开报馆不安本分凭空诋毁情事，定当重办，不得仍援《民呼》之案为例”云云。同时租界工部局复询清吏所求，将《民呼报》之发行权强行取消，而《民呼报》遂无法复版。事后沪上各报咸著论斥责会审公廨判词之失当，清吏无如之何。《民呼报》既闭歇，于右任乃于同年八月中旬，另发刊《民吁报》，以继其统绪。且在法国驻沪领事馆注册，以避清吏鱼肉。馆址仍在山东路旧地，宣言以提倡国民精神痛陈民生利病保存国粹讲求实学为宗旨。名义上以朱少屏为发行人，范光启（字鸿仙，安徽人）为社长，景耀月（字帝召，山西人）、王无生、周锡三等任撰述。所撰发刊词出帝召手笔，词语典雅，颇为当日士林传诵。时日人方锐意侵略满蒙，清廷拱手让人，事事屈伏，故《民吁报》时对国人大声疾呼，痛斥日人之阴谋。出世甫两月有余，是岁十月初七日遂为驻沪日领事三穗照

会沪蔡道，将《民吁报》暂行封禁，并传该报主笔范光启讯究。该日领所指出《民吁报》伤害中日二国邦交之言论凡六十二则，如：《中国之危机》，《及锦齐铁路与远东和平》，《外交回顾之惋叹》，《国民之自觉》，《伊藤噩耗杂感》，《满洲痛史之鳞爪》等篇。虽一字之微，亦指为有关日本国全体之名誉。此案研讯多次，日领否认原告，而使苏松太道蔡某任之。审讯时，日领复要求正副领事同列席会审，照例有权会审之英、美、德三国领事均以事不干己规避不出，故谏员宝子观惟日领之命是听。沪上各英文报如《字林西报》、《捷报》等皆著论批评清吏处理此案之不公，及日领之无理取闹。清吏及日领逼于舆论，始决将此案从轻判结，是岁十一月十七日宣判大意云：《民吁报》所载论说多系臆测造谣，实于中日邦交有损，该报发封业经多日，此案自未便久悬，到案主笔范鸿仙并非该报紧要之人，从宽判将报永远停止出版。所有主笔人等均免予深究，该报机器以后不准作印刷报章之用等语。于是《民吁报》竟遭永远封禁。计自出世以迄被封，为期不过四十余日而已。《民吁报》停歇后十月，于右任以同志庞青城、沈缦云、孙性廉、陈其美、周觉等之助，复募集资本十万元，由发起人先认定三万元，另组织《民立报》为国民正当的言论机关，馆址设于三茅阁桥。原定是年八月二十八日《民吁报》被封一周年纪念日出版，嗣以筹备不及，乃改至九月初九日。时清廷方以预备施行立宪为号召，海外及各省革命党员多驻足申江，伺隙而动，故任《民立报》撰述者有宋教仁（邈初）、吕志伊（天民）、景耀月、谈善吾（老谈）、范光启、王无生、徐血儿诸人。济济英才，可称一时之盛。越年辛亥三月，黄兴等攻粤督署失败，义声震于全国，《民立报》益振振有词，崇论闳议，大为党人张目。及是岁八月，武昌革命军兴，宋教仁、吕志伊、于右任、景耀月、范光启等均出任军政府要职。《民立报》中枢，几为之一空。其后支持至民国二年秋，各省讨袁军败绩，以不禁袁世凯暴政之压迫，自行停版。

中部同盟会及长江革命

同盟会事例，海内外各地概设分会，咸直隶本部或总理。及戊申孙总理驻节新加坡，乃特设南洋支部，以统御英荷两属各分会。己酉年冬复添设南方支部于香港，以筹划西南各省军事。庚戌正月，广州新军反正一役，即南方支部所策动也。新军之役既败，南方支部诸首要多星散，黄兴、胡汉民赴南洋，冯自由赴北美加拿大，赵声、谭人凤赴日本。是岁六月谭人凤、宋教仁、赵声、林时壘、居正、张简亭等邀集在日本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开会于小石川区左仲远（原名陈犹龙，字桃痴，庚子唐才常案有名）寓所。宋教仁建议组织中部同盟会，以策动长江各省革命工作。谭人凤力赴其议，众赞成之。宋教仁旋返沪，与陈其美、章梓、郑赞成等计划进行。是年冬，黄兴、赵声、胡汉民等根据槟榔屿干部大会

原议，决定在粤大举。谭人凤、赵声主张从速设置中部同盟会，集合长江各省同志以响应广东义师。众遂推举谭人凤携资赴上海、南京、九江、汉口、长沙各地，从事此项工作。人凤于辛亥正月初旬抵沪，即传黄兴命，督促宋教仁、陈其美、章梓、郑赞成等分途进行。继赴汉口、长沙，晤居正、孙武、焦达峰、谢介僧、曾伯兴、刘承烈诸人，均令著手积极筹备，与粤军协同动作。岁二月中旬，人凤再莅上海，时宋教仁、陈其美等筹备组织中部同盟会已渐就绪。人凤以粤省军事发动在即，未及开成立会，即邀教仁、其美、吕志伊赴香港参加义举。未几，黄兴等以仓卒焚攻督署失败，人凤等乃归沪，仍继续长江革命工作。是岁五月下旬，谭人凤复至汉口，与居正、孙武、焦达峰、杨任、谢介僧、邹永成、曾伯兴等重商湘鄂大举计划，旋偕曾伯兴莅沪，访宋教仁、陈其美等报告长江各省运动成绩。遂于闰六月初六日假座湖州会馆，开中部同盟会成立会，各省莅会同志凡三十三人。众推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及某某四人，分任庶务、文事、会计、交际等部长。定议由江、浙、皖、赣、鄂，湘、川、陕八省联合大举，各自分途进行，而统属于中部同盟会。是日到会签名册今尚由杨谱笙郑重保存，照录如下：

宋教仁	湖南常德府桃源县人	上海三茅阁桥《民立报》
陈其美	浙江湖州府归安县人	上海湖州旅沪公学
涂道潜	四川夔府云阳县人	吴淞中国公学
邓道藩	四川绥定府新宁县人	吴淞中国公学
陶咏南	四川夔府云阳县人	吴淞中国公学
陈勒生	福建侯官人	上海新关发存票处
史家麟	福建闽县人	上海新关发存票处
郑螺生	福建	南洋吡叻分会
李孝章	福建	南洋吡叻分会
王源水	福建	南洋吡叻分会
王辟尘	福建	南洋吡叻分会
王葛庐	福建闽县人	上海四马路三山会馆
张仁鉴	四川重庆府涪州人	吴淞中国公学
潘祖彝	福建南平人	静安寺路海关造册处
林 琛	福建闽县人	福州南台《建言报》馆
李 洽	湖南新化人	长沙南阳街作民译社
梁 鳌	湖南邵阳人	吴淞中国公学
李光德	江苏无锡人	无锡观前街七号
倪纬汉	安徽无为入	民立报馆
范光启（鸿仙）	安徽合肥人	民立报馆

姚志强	浙江乌程人	湖州旅沪公学
杨兆崙（谱笙）	浙江乌程人	湖州旅沪公学
吕志伊	云南思茅人	民立报
江镜清	浙江奉化人	上海新学会社
胡朝阳	浙江奉化人	新学会社
章 梓	江苏上元人	三马路国民社
张卓身	浙江平湖人	西门外庆安里三号
周日宣	浙江奉化人	城内东门
曾 杰	湖南新化人	长沙贡院东街南阳印局
沈 琨	江苏嘉定人	
谭人凤（雪髯）	湖南新化人	北浙江路晋寿里三十五号
通信名用雪髯		
陈毅君	湖南邵阳人	北浙江路晋寿里三十五号
陈 道	湖南湘乡人	

中部同盟会既成立，会员对于长江各省之革命工作，益趋积极。至七月中旬，鄂省军界同志运动已臻成熟，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遂派居正、杨玉如赴沪购办手枪，并邀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莅汉口主持大计。时黄兴尚在香港，居正等抵沪，即在马霍路陈其美寓所召集会议。莅会者除参加成立会诸人外，于右任、熊克武、陈方度、柳聘依、梁维岳、谭心休等预焉。是会决定南京上海与鄂省同时发动，并派吕志伊赴香港请黄兴速来。居正等留沪旬余，以陈其美代办手枪尚未齐备，乃遣杨玉如先归。越数日而鄂省同志迫不及待，武昌南湖炮营之炮声轰然震全国矣。于是黄兴、居正、谭人凤、宋教仁等兼程赴鄂督师进取。陈其美、李燮和、章梓、林述庆、姚志强、俞炜、龚宝铨等联络上海、吴淞、杭州、镇江、南京等处防军先后反正，以响应之。是则中部同盟会策动之力为多焉。

上海光复及沪军都督

担任上海光复之任务者二人：陈其美与李燮和是也。其美从事浙江革命工作数载，与各地防军及会党素有渊源。燮和字柱中，湖南安化人，亦同盟会员，先后尝参加甲辰长沙华兴会及丙午萍乡醴陵二役，后至南洋荷属文岛双溪烈埠，充华侨学校教员。戊申，陶成章在南洋发起光复会，端赖其力。辛亥，黄花岗一役之前，黄兴邀其归国参与义举。燮和偕陈方度至广州而事败。黄兴遂遣之赴沪，使联络驻扎上海、吴淞、南京各处湘籍防军相机反正。及武昌革命军兴，燮和运动益力，上海防军及驻吴淞之黎天才部多受其部勒，准备克期发动。其美闻江南

制造局已有防军一部联络就绪，遂迫不及待，使高尔登、杨谱笙于九月十三日率民军敢死队进攻制造局，局中驻军赞拒各半，一时未能攻下。其美乃请各同志停攻，而自徒手进制造局，向反抗军队开导。众力阻，不听。果为清军扣留，用铁索锁禁于柱上一夜。燮和闻警，乃令所预约之防营管带陈汉钦立向制造局猛攻，出其美于险，各同志乃在小东门内海防厅内开会，议组织沪军都督府。各防军初拟推燮和为都督，陈汉钦为上海总司令。后以燮和与其美意见不洽，绅商各界多属意其美，陈汉钦从中排解，力劝燮和退让，以免内哄。时驻吴淞粤军济字营早受燮和约束，亦同日反正，燮和乃让都督于其美，自领所部移驻吴淞，另设军政分府，称吴淞都督。寻改称光复军司令。至民元南京政府成立，始解职闲居。其美既任沪军都督，有所凭借，遂力助苏州、杭州、镇江、南京各地义军之发动。复建议在上海召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由各省代表推定伍廷芳温宗尧为临时外交代表，其后各省代表之选举大元帅副元帅，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成立。孙中山先生之当选临时大总统，其美与有力焉。

孙总理癸卯游美补述

孙总理于癸卯甲辰（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两年间第二次游历美国情形，余前于《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及《革命逸史》二书先后叙述颇详，世之编史者以余当时为总理驻日代表并兼任香港《中国日报》及旧金山《大同日报》通信记者，见闻较任何人为翔实，故多采用余著为蓝本。惟余近获久居檀香山及旧金山两处老友之各种纪录，乃知往日所载犹未详尽，应有补正之必要。就中亟宜补述者，有檀香山之党务运动，及总理抵旧金山被税关羁留时基督教徒伍盘照等仗义协助入境之事实。其应订正及声明者，则有总理所持之入美护照，为夏威夷岛土生证书，及被美海关羁留木屋多日二事。盖余昔年以事关总理尊严，且易发生误会，故关于利用夏威夷土生证书事，未便率尔直述，而被海关羁留时限，亦讳言为只一二日。今据当年协助总理入美之旧金山《中西日报》民二十四年六月九日版所载，则对于总理利用夏威夷土生证书事已明白记述，且援孔子微服过宋之义。总理生平为救国而奔走革命事业，从权行事，不止一次。如戊申（一九〇八）年总理游暹罗时，暹政府令其即日离境。赖美国公使出面斡旋，得改为一星期，即利用此土生证书之效果也。至羁留海关木屋多日事，乃美人对于一般华侨之苛例，是为吾国人之莫大耻辱，固非为总理一人而设。事实具在，无庸曲讳。爰补述及订正当日事实如后，亦史家应有之责也。

檀香山党务之复兴

癸卯年（一九〇三）夏秋间，孙总理自越南抵日本横滨，时距东京拒俄义勇队及上海《苏报》案风潮未远，与此案有关之陈范、黄宗仰、陈颢芬诸人及各省激烈分子，多逃亡至日，咸就总理商讨革命进行方针。总理以国内民智日开，机会渐臻成熟，乃于东京青山创设革命军事学校，以收容各省有志军事之青年，并决计再游美国，筹措饷糈，以备大举发难。是岁秋冬间，从日本抵檀香山。此地为其多年旧游及兴中会发源之地，其兄德彰向在邻近之茂宜岛经营畜牧，故亲朋故旧至夥。惟是处党务自经己亥年（一八九九）梁启超到此提倡保皇会之后，兴中会员以梁持总理介绍函为饵，多为所惑（事详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投身保皇会籍者，颇不乏人。因是兴中会之团体，久已荡然无存，会员中能终始不变者只有郑金、郑照、李昌、程蔚南、许直臣、何宽、李安邦等十数人，然亦慑于保皇会之声势，莫敢或抗，惟缄口结舌，以期待总理重来而已。总理在乙未年（一八九五）冬间广州失败后，只来檀一次，故此度重来，已相隔九载，大有今非昔比之感。时保皇会有机关报名《新中国报》，其主笔为前澳门《知新报》记者陈继俨，号仪侃，康有为之高足弟子也。闻总理之来，恐保皇会之基础为之动摇，乃于报上丑诋革命党，且及总理个人，旧兴中会员郑金、李昌等异常愤激。程蔚南与总理旧有戚谊，时在檀主办一毫无关宗旨之旧式报纸，名《隆记报》，又名《檀山新报》。总理乃使程改组该报为党报，以笔政乏人，遂亲自撰文与《新中国报》大开笔战，并致书冯自由，使代延聘前香港《中国日报》记者陈诗仲来檀任总编辑。檀岛党人自有此报为喉舌，旗垒为之一新，而会务亦稍稍复振。

希炉埠党部之成立

夏威夷群岛除檀香山正埠外，以希炉埠为较巨，其地以有火山之名胜，游客至众，商业亦颇繁盛。华人居此者约数千人，就中属基督教徒者不少。有华人基督教礼拜堂一，主持者为宣教师毛文明（原名文敏）。庚子年（一九〇〇）九月轰炸广东督署一役，尝与史坚如共学之兴中会员也。时在该埠任职播道，间或宣传革命，深得华侨信仰。闻总理抵檀，乃发起欢迎会，请总理来埠讲演国事。总理欣然莅止，文明与该埠著名农业家黎协假日本戏院请总理演说，华侨听者数百人，座无余隙。旋由文明介绍黎协、黄振、卢球、李华根、古贺、刘安、杨吉、郑仲、黄义、郑鏐、林弼南、唐安诸人入会，将原日之演说会改为党部，希炉埠之有革命团体自此始。

孙总理之驳保皇报文

总理自希炉返檀后，会务日见起色，时任檀埠基督教礼拜堂牧师者为黄旭升，向有志革命，与毛文明有戚谊，总理至是大得其助。李昌、郑金等乃假西人戏院请总理演讲三日，听者异常踊跃，先后得新会员杨锐、曾长福等多人。前时误入保皇会之兴中会员多觉悟来归，保皇党势力因之大受影响。陈仪侃为挽回颓势计，乃日在《新中国报》造作诽语，向革命党挑战。时《隆记报》所聘记者尚未抵檀，总理于是汇集《新中国报》两月来排斥革命之口实，撰一驳保皇报文以斥之。是为总理生平在报上撰作长文之开始，兹觅得民元前九年之《隆记报》录载如下：

驳保皇报（载癸卯年冬檀香山《隆记报》）

阳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檀埠保皇报刊有《敬告保皇会同志书》，此书出于该报主笔陈仪侃之手，而托他人之名，欲间接而驳仆日前之书也。书中所载语无伦次，义相矛盾，可知作者于论理学（Logic）一无所知，于政治学更懵然罔觉。所言事实多有不符，所引西事牵强附会，本不欲推求详辩。然其似是而非之理，最易惑人，故条驳之，以塞毒焰，而辟谬论。彼开口便曰爱国，试问其所爱之国，为大清国乎？抑中华国乎？若所爱之国为大清国，则不当有“今则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之一语，自其口出。若彼所爱之国为中华国，则不当以保皇为爱国之政策，盖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实害国也。彼又曰“中国之瓜分在于旦夕，外人窥伺，乘间即发。各国指认之地，照会政府不得让与别人”云云。曾亦知瓜分之原因乎？政府无振作也，人民不奋发也。政府若有振作，则强横如俄罗斯，残暴如土耳其，外人不敢侧目也。人民能奋发，则微小如巴拿马，激烈如苏威亚，列强向之承认也。盖今日国际惟有势力强权，不讲道德仁义也。满清政府今日已矣，要害之区尽失，发祥之地已亡，寝而日削百里，月失数城，终底于尽而已。尚有一线生机之可望者，惟人民之发奋耳。若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将钦我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既识引管子之作内政以寄军令，何以偏阻汉人行革命复祖邦？今日之作内政，从何下手，必先驱除客帝，复我政权，始能免其今日签一约割山东，明日押一款卖两广也？彼满清政府不特签约款以割我卖我也，且为外人平靖地方，然后送之，广东之新安县广州湾，已然之事也。倘无满清政府为之助桀为虐，吾民犹得便宜行事，可以拼一死以殉吾之桑梓。彼外国知吾民之不易与，不能垂手而得尺寸之地，则彼虽贪欲无厌，犹有戒心也。今有满清政

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乃彼书生之见，畏葸存心，不识时势，不达事体，动辄恐逢人之怒。不知我愈畏缩，则彼愈窥伺，我能发奋，则彼反敬畏，岂有逢人之怒之理哉？如其不信，吾请陈仪侃日日向外人叩头，日日向外人乞怜，试能止外人之不照会清廷以索地否？清国帝后今日日媚外人矣，日日宴会公使及其夫人矣，媚外人之中，又与俄国为最亲姬矣。然而据其发祥之地者则俄也，不逢人之怒莫过于今日之清帝后，以仪侃之见解，则必能免于瓜分矣。信乎否乎？既知中华亡国二百六十年矣，不图恢复，犹竭力以阻人之言恢复，言革命，是诚何心哉？彼固立心以殉清朝之节，清亡与亡，清奴与奴，洵大清之忠臣义士矣，其如汉族何！而犹囂囂然执毋宁二字以骂人为白奴，是真强词夺理矣。彼曰“革命之说原本大易”，又曰“中国固始终不能免于革命”，其言是矣，其乃何以又曰“中国今为民智萌芽时代”。夫大易者，中国最古之书，孔子系词称汤武革命，顺乎天也，岂由汤武至于今，历二十余期之革命，而犹得谓之萌芽时代耶？其所引法国三大革命曰：“经卢骚、达尔文、福禄特尔诸大哲提倡建设”，而不知达尔文乃英人，当法国第一次革命之时，彼尚未出世。当第二次革命之时，彼尚未成学，当第三次革命之时，彼尚未闻名于世。其第一次出版之著作名曰《生物本源》，出版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当时英国博物家尚多非其说之不经，十余年后始见重于英之学者，又十余年后始见称于世人。今该主笔特大书曰：“达尔文有与提倡法国三次革命之功。”彼所指之达尔文，是达尔文之前身乎？想该主笔必精通三世书矣，否则何以知之耶？又云：“法国死于革命者一千二百万人。”该主笔常讥吾人革命不起于京师，想亦熟闻法国之三大革命皆发于巴黎矣。而巴黎之外无死于革命者，试问巴黎当时人口几何，作者知之乎？且巴黎虽经三次之革命，而未遇扬州十日之屠，无广州洗城之惨，就使巴黎全城之民皆死于革命，三次计之，亦不足此数，毋乃该主笔以一人轮转数十次计之乎！若此，则非吾所敢知也。彼既曰：“革命之结果为民主政体也”，胡又曰：“有建设者谓之有意识之破坏，无建设者谓之无意识之破坏，彼等是否有建设吾不敢知”云云。夫革命者，破坏也。民主政体者，建设也。既明于革命之后，定为民主政体矣，非意识而何？曰“政”，曰“体”，非建设而何？该主笔以一手之笔，一时之言，其矛盾有如是，斯亦奇矣！彼又尝谓中国人无自由民权之性质，仆曾力斥其谬，引中国乡族之自治，如自行断讼，自行保卫，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等事。虽不及西政之美，然可证中国人稟有民权之性质也。又中国之民向来不受政府之干涉，来往自如，出入不问，婚姻生死不报于官，户口门牌鲜注于册，甚至两乡械斗，为所欲为，此本于自由之性质也。彼则反唇相稽曰：“此野蛮之自由，

非文明之自由也。”此又何待乎彼言。彼既云“性质矣，夫天生自然谓之‘性’，纯朴不文谓之‘质’，有此野蛮之自由则便有自由性质也，何得谓无”。夫性质与事体异，发现于外谓之事体，稟赋于中谓之性质，中国民权自由之事体，未及西国之有条不紊，界限秩然，然何得概谓之无自由民权之性质乎？惟中国今日富于此野蛮之自由，则他日容易变为文明之自由，倘无此性质何由而蛮，是犹琢玉必其具有玉质，乃能琢之成玉器，若无其琢，虽琢无成也。彼又曰：“中国人富于服从权势之性质，而非富于服从法律之性质。”试问无权势何以行法律乎？今如檀岛，若政府无权势以拘禁处罚犯法之人，其法律尚成为法律乎？夫法律者，治之体也，权势者，治之用也。体用相因，不相悖也，今该主笔强别服从法律与服从权势而为二事，是可知彼于政治之学毫无所知也。彼又曰：“立宪者过渡之时代也，共和者最后之结果也。”此又可见彼不知立宪为何物，而牵强附会也。夫宪法者，西语曰 Constitution，乃一定不易之常经，非革命不能改也。过渡者，西语曰 Transition，乃变更之谓也，此二名谓皆从西文译出，中国无此成语也。该主笔强不知以为知，而妄曰 Constitution，乃 Transition 时代，一何可笑也！推彼之语，必当先经立宪君主而后可成立宪民主，乃合进化之次序也。而不知天下之事，其为破天荒者则焉耳，若世间已有其事，且行已收大效者，则我可以取法而为后来居上也。试观中国向未有火车，近日始兴建，皆取最新之式者，若照彼之意，则中国今日为火车萌芽之时代，当用英美数十年前之旧物，然后渐渐更换新物，至最终之结果。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车，方合进化之次序也。世上有如是之理乎？人间有如是之愚乎！今彼以君主立宪为过渡之时代，以民主立宪为最终之结果，是要行二次之破坏，而始得至于民主之域也，以其行二次，何如行一次之为便耶？夫破坏者，非得已之事也，一次已嫌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夫今日专制之时代也，必先破坏此专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宪也；既有力以破坏之，则君主民主随我所择，如过渡焉，以其滞乎中流，何不一掉而登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也。使该主笔若不知民主为最终之结果，其倡君主立宪犹可说也，乃彼既知为美政，而又认为最终之结果，胡为如此矫强支离多端辩难也。得勿以此事虽善，诚为救中国之良剂。但其始不倡于吾师，其终亦不成于吾手，天下上等之事，必不让他人之为，故必竭力阻止，以致不成而后已，是重私心而忘公义也。彼又曰“会外人意，革命党非洪门会中人何以图羊城，谋惠州，而利用洪门之势力”。不知革命党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合力举义，责有应尽，非同利用，如彼等欲暗改洪门之宗旨，而令洪门之人，以助其保救大清皇帝也。又仆前书所指以满洲之野番，尚能享皇帝之权，而彼则曰：“岂不见各国宪法之”云云。仆所指乃当今清国专制之皇权，而彼引各国宪法以答，真

强为比例，拟于不伦矣。彼又曰：“所谓保皇者，自我保之，主权在我，非彼保我也，不得为满奴”云云，此真梦梦也。今光绪皇帝俨然在北京，日日诏见臣工，日日宴会公使，有时游颐和园，有时看西洋戏，何尝受彼之保，其言之离事实，何相远之甚也。彼又曰：“今则驱除异族谓之光复旧物，不得谓之革命”，此拾人之唾余，知其一不得其二者也。其书中最得力者，为托某氏之言，曰：“弟前十年固为彼会中人，今已改入保皇会矣”云云，其是否属实，姑毋庸辩。但据其所述誓词，则知彼门外汉，亦升堂而入于室者也。不然，岂有下乔木而入幽谷者哉，不观其他之入保皇会者乎？多以保皇为借名而误入者也。该主笔又从而引申其说曰：“蒙古与满洲且不辨”云云。仆等虽目不识丁，而地輿之学，敢信尚不至此。惟见彼有“蒙满东三省诸地在俄人势力范围”云云，蒙者蒙古也，满者满洲也，岂于蒙满之外更有一东三省乎？该主笔自称深通于五洲大势，何以于彼清国之形势，尚有此言也。可知其平日荒唐谬妄，强不知以为知，夜郎自大，目中无人，真不值识者一哂。仆非文士，本不欲与八股书生争一日之长，兴笔墨之战。但以彼无根之学，以讹传讹，惑世诬民，遗害非浅，故不得已而驳斥之。倘彼具有天良，当知惭愧，早自悔悟，毋再现其丑也。又其人存心刻忍，观其所论《苏报》之案，落井下石，大有幸灾乐祸之心，毫无拯弱扶危之念，与保皇会友刻前打电求救之意，亦大相背反。其手段之酷，心地之毒，门户之见，胸度之狭，于此可见一斑。今特揭而出之，以质诸世之公论者。

入美手续之筹备

总理时于党务余暇，特至茂宜岛牧场，谒其母杨太夫人及乃兄德彰等，九年阔别，一家团聚，喜可知也。惟是时德彰所经营之牧场，因夏威夷政府修改土地法，取消私有制度之故，大受损失，已不若往年之丰裕。故对于总理游美之旅费，不能多所供给，惟赠以龙涎香一枝，备旅途中困乏时需要而已。其母舅杨文纳以总理丙申年（一八九六）第一次游美，成绩不佳，实由缺乏同志相助，因力劝总理在檀加入洪门会党，加强革命党之势力。且谓现时保皇党机关林立于美洲各埠，倘不与洪门人士合作，势难与之抗衡。尤可虑者，在檀康徒陈仪侃等挟近来两报笔战之嫌，难免设法运动美国关员妨阻登陆，故宜取得一夏威夷土生证书，以备不虞等语。德彰亦以为然。总理久有参加洪门之心，对此毫无异议，惟于取用土生证书一节，颇以为不当。文纳谓“古人成大事者多能通权达变，如伍员乔装出关，孔子微服过宋，皆是此意。此举以救国为目的，何必拘泥”云云。总理卒从其言。乃由德彰转托老年同乡数人，向茂宜岛当局代为证明，并取得此项证书为入美登岸之需。及总理重莅檀岛，遂浼洪门前辈叔父钟水养向洪门致公

堂介绍入闾（著者按，洪门称入会曰入闾）。致公堂职员中有身跨保皇会籍者，对于总理之加盟，表示反对。钟水养曰：“洪门宗旨，在于反清复明。孙某未入洪门，已实行洪门宗旨多年，此等人应招纳之不暇，何可拒之门外。”反对者不能对，致公堂于是择日为总理演特别开台戏（洪门称拜盟曰演戏）。同时拜盟者六十余人。由主盟员某大佬封总理为洪棍。洪门军职，例分洪棍、纸扇、草鞋三级。洪棍，即元帅之别名也。总理拜盟后十余日，即首途赴美，濒行时遗书陈少白冯自由二人，使在香港日本二地多寄文稿于《隆记报》，以助其声势。其后陈诗仲因驻香港美领事拒发入檀之主笔护照，改就新加坡《图南日报》之聘。《隆记报》始终未得国内文人来主笔政，仅由旅檀之华侨学校同志教员代理编辑而已。后一年，在檀党员曾长福等更将该报大加扩充，改名《民生日报》，延张泽黎（号孺伯）充任记者，与《新中国报》记者梁文卿（号秋水）续开笔战，是时檀埠之革命党势已蒸蒸日上，迥非二三年前之比矣。

旧金山登陆时被阻

是岁腊月总理舟抵美国旧金山港，关员登轮查验旅客护照。见有孙逸仙之名，即谓此人为中国乱党，应暂留船上听候讯问，不得登岸。据美海关事例，凡华人旅客所持入境护照有疑问者，关员先令羁留原船候讯，讯后认为不正当者，即令由原船拨回出发地点；其仍有疑问者，则于原船开行时改禁码头上海关附设之木屋。经关员二次审讯，乃定准许入境与否，如判决拨回，始由移民局长明告本人以拨回之原因，并限本人于十日内向华盛顿工商部上诉。如本人败诉，则仍须候所搭之原船回美时，乃由原船拨回，故被禁华人往往羁留木屋至数月之久，是即美国对吾华人施行多年之特别苛例也。先是檀岛保皇党陈仪侃等探闻总理赴美有期，预通知旧金山同党使设法阻止总理入境，以为党争之报复。旧金山保皇党员以告清领事何祐（香港何启律师之亲族），何欲借此向清廷邀功，乃关照美海关，谓有中国乱党孙某将于某日搭某船抵美，请禁阻其入境，以全清美二国邦交等语。美关员惑其言，因有阻止总理登陆之举。及查总理所持护照为夏威夷土生证书，夏威夷为美属土，依律不得阻止入境。关员以告何祐，何力言孙某系生长广东香山县，所持护照，必为伪造，仍请美海关尽力禁阻。当总理被困船上时，船上海员多属惠州籍之洪门会员，闻总理遭难，咸为不平，群向总理慰问致敬，且馈赠食品不绝。故总理亦不觉其苦。及改羁码头上木屋，与陆上友朋消息隔绝，无法通信，深以为忧，其困状可想见矣。

基督教友及致公堂之助力

总理困居木屋数日，经移民局讯问后，竟被判令出境，候原船拨回檀岛，因

之焦灼异常，徬徨无计。忽睹被禁乡人中所阅《中西日报》有总理伍盘照字样，偶忆盘照为著名之基督教学者，素以说教及办报蜚声于时。乙未年（一八九五）亡命出国时，粤中教友左斗山、杨襄甫二人尝作函为之介绍，此函尚存行篋未用，此时大可用之。乃草一函，求一卖报西童带往沙加缅都街《中西日报》，外书伍盘照博士收启。另有英文“到奉带书人七角五分”字样，盘照拆视，内称“现有十万火急要事待商，请即来木屋相见勿延”之语。盘照久闻总理盛名，即往移民局请准当局，得入木屋晋谒总理。相见之下，握手甚欢。总理谓此来被清领事函报税关指为乱贼，如准之入美，有碍地方治安，因此被判出境。现距十日上诉之限期已近，特求各教友援手等语。并将多年前左斗山、杨襄甫等署名之介绍函交盘照带回，函面写司徒南达牧师伍盘照博士同启。内言“携此信之人，忠心为国，请尽力相助”云云。信末不书年月日，盘照当允在外设法，即持介函访司徒南达。南达认识为左、杨二人亲笔，遂招集各教友筹商营救方法。金谓各教友俱有家属在内地，此事只可暗助，不便明帮。孙君既言曾加入洪门团体，应即通知本埠致公堂，请其出名向美京工商部上诉。盘照谓此事既由何领事主动，我如上诉，彼必稟请公使出头横生阻力，不若我先往询何领事，并劝其不必再稟公使，免伤同乡感情云云。盖盘照是时兼充领事署顾问，年受领署夫马费一百元，何领事如有重要对外事件，多向其咨询办理也。及赴领事查询此事底蕴，何领事否认受人嘱托，讳称此举乃奉清政府命令而为。盘照曰，孙某系革命党，不能指为乱贼。现有同乡多人决定向美京上诉，请勿稟报公使，以免激动众怒。何领事曰，君言吾亦可行，但君为吾顾问，应小心行事。盘照遂往访致公堂英文书记唐琼昌，告以总理被美海关禁阻入境及羁留木屋之经过，并谓据总理谈话，自承为洪门会员，故致公堂宜即设法营救，以尽手足相助之谊等语。旧金山致公堂为全美各埠洪门分堂之总部，宗旨虽号称反清复明，然以代远年湮，会中分子多已丧失本来面目，其任事职员身跨保皇籍者亦不乏人，独总堂大佬（主盟员之称）黄三德及英文书记唐琼昌平日热心革命，尤钦佩总理学行。嗣闻总理入境受阻，大为愤激，琼昌即偕盘照同访致公堂顾问美律师那文，请其依法相助；复往木屋叩总理以此案详情。遂由那文向移民局声明即向华盛顿工商部上诉，并依五百元保证金之移民法例。当由致公堂以士波福街楼业向保单公司具保五百元，担保总理出外听候美京判决。同时致公堂职员及基督教徒之有志者多赴码头欢迎脱难，借表敬意，总理羁留木屋多日，至是始获恢复自由。自丙申年（一八九六）被困伦敦清使馆以来，此为第二次之蒙难。

办党及筹饷之成绩

总理脱难后，黄三德、唐琼昌等招待殷勤，即在致公堂会所下榻，日间则时

至《中西日报》用膳，与致公堂职员及基督徒司徒南达、伍于衍、邝华汰、雷清学、邓幹隆诸人极为相得。三星期后，美工商部之判决文已到，略谓“孙某既持有夏威夷岛出生证书，当然取得美国公民所享受之居留权利，绝无可以拨送出境之理由”等语。于是清领事及保皇党徒之中伤计划因之粉碎无余矣。时《中西日报》司事伍于衍以该报缺乏驻香港访员，求总理推荐。总理以陈少白、郑贯公二人对。先是总理在檀时已预印就革命军需债券若干，为到美募饷之需。嗣抵旧金山，始知华侨风气尚极闭塞，其稍开通者非属保皇会员，即为基督教徒，乃商诸黄三德、伍盘照等，拟措资印刷邹容著《革命军》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地侨胞，以广宣传。黄伍等均表同情，并由《中西日报》担任排印，订价五百元。书成后，总理以所订五百元印费无从筹措，乃请致公堂报效寄书邮资，而《中西日报》则不收印费，作为捐赠。黄伍等慨然从之。全美华侨得此有力宣传品之启导，不及半载，知识为之大进，此书之力为多焉。同时总理更欲借此扩张党势，拟先从具有新思想之基督教徒人手，乃召集教友之有志者，假士作顿街长老会正道会所开救国会议。众推邝华汰博士为主席，邝为有名学者，娶美女为室，时任加省大学教授，对于总理主张异常倾倒。是日总理于说明革命主义之后，提议请座众购买革命军需债券，谓“此券规定实收美金十元，俟革命成功之日，凭券即还本息一百元。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员，成功后可享受国家各项优先利权”云云，各教友对于购券事，均甚赞成，惟闻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员一节，多谈虎色变。谓吾辈各有身家在内地，助款则可，入会则不必，总理乃谓此举志在筹饷，入会与否，一惟尊便。此项债券票面并不写姓名，可勿过虑。众无异言。于是各教友先后购券，得美金二千七百多元。就中以华生隆号司理雷清学所捐二百元为最多，福和号厨子刘伯所捐十元为最少。各债券均假《中西日报》内室填写号数，并由总理签署英文“孙逸仙”三字于下，右侧加盖“孙文之章”四字方印。第一号至第十号为伍盘照所得。未几邝华汰复在卜技利埠募得一千三百多元。其后总理偕黄三德周游美国各地，即恃此款为旅途之需。总理原欲在美奠立兴中会基础，惟结果所得，正式宣誓入会者只有邝华汰一人，殊非初意所及料。关于总理入美被阻及发售军需债券情况与债券样式，以《中西日报》经理伍于衍近日所报告为最详，爰节录于后，借资参考。

自由先生惠鉴，承惠《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并垂询中山先生一九〇三年抵美被困于码头木屋详情，不胜谢谢。查当年记载此事之报纸，因本埠地震灾劫，已荡然无存。一九三五年，本埠圣玛利公园所建孙公铜像举行开幕礼时，敝报尝有“四十年前禁入境而今享得像巍峨”之句。其时江尼古西报访员来询前事，愚以所能记忆者告之，该访员亦谓西报因震灾一无所存。愚所未忘者，孙公由檀到美被禁于码头木屋间，侨界无有知之者。孙公

因素闻伍盘照之名，遂写一函托西童送来本报，函面写英文到奉银七毫五仙。愚得函即交盘照，内称“现被移民局批拨出境，请来木屋相见”字样。盘照乃向移民局讨情，得入木屋相见。据孙公云，被清领事指为乱党，有害地方治安，不准入境，并将左斗山、杨襄甫等签名之函交盘照带回。函面写司徒南达牧师伍盘照博士同启，内言携此信之人忠心为国请力助之等字，并不书年月日。愚与司徒牧师认明确是左君签笔，因即招集教友筹商。佥称教会人士各有身家在内地，可以暗助，不可明帮。孙公既向盘照言已入洪门致公堂，应请致公堂出名上诉工商部为佳。盘照谓此事既由领事主动，我如上诉，彼必禀报公使，多生枝节。不如我先往询何领事，并劝其不必再禀公使云云。及盘照往领署，何领事对此事直认不讳，谓曾接政府来电，称孙氏某月日到檀，某月日由檀附某船来美，飭即知会海关勿令其登岸等语。盘照谓孙氏系革命党，属国事犯，不能指为乱贼。现有某大团体助其向美京上诉，请勿禀报公使，致将风潮扩大。何领事曰，此议可行。但君为吾顾问，应小心行事为要。盘照遂往访致公堂出番唐琼曰，告以一切经过。随偕往见该堂常年顾问那文律师，请其援手。那文于是同往木屋向孙公探询底蕴，即向移民局声明向工商部上诉。略谓“孙某乃檀香山籍民，因在中国提倡革命，故被本国政府指名通缉。今中国领事阻其入境，实属损害檀籍人居留美国之权利，及违背美国容留国事犯之法例”云云。当由致公堂以楼业向保单公司具保五百元保出候判。孙公于是每日传食于《中西日报》，夜则在致公堂会所寝宿，约越三星期，工商部始电令旧金山移民局放行。事后孙公仍居此间，曾委敝报刊印邹容《革命军》一万一千册，订明印费五百元，印就后，孙公谓分寄美洲南洋各埠之邮费及包纸已由致公堂担任报效，印费一项亦请《中西日报》捐助，共成美举。愚与盘照从之。孙公复向各教友发售革命军需债券，约得二千七百余金。该券号数即在敝报内房填写，由一号至十号为伍盘照，由二百六十九号至二百七十九号为伍于衍。因愚欲取最后之号券故也。其后在埠兴中会会长邝华汰又在卜技利埠募得一千三百余金，孙公复劝吾加捐以取最后之券。故四一四及四一五两号亦为吾所得。惟各人所得债券，有因惧政府搜获株连而不敢留存者，有经本埠地震巨灾而被毁者，吾所存四一四号及四一五号之二券，系放入“味根”书内携回中国，后复带之返美者，兹随函寄呈影印二份，亦一有价值之纪念品也。

尊著纪载周详，可称信史，读之获益良多。惟据愚所知，书中有数细则与当年微有不符，请条举为兄言之。第六章五十一页及第九章一四九页云“中山二次游美，保皇党嗾使同党之海关译员阻其登岸，被留烟治埃伦木屋者一日，幸赖美国致公总堂总理黄三德《大同日报》总理唐琼昌之助，以五千元保出候讯”。又第二十章一六〇页云“旧金山致公堂得檀香山致公堂

电，谓孙大哥于某日搭某船来美，嘱郑重招待，黄三德、唐琼昌等前往接船，知被保皇党暗算，乃延律师那文以五千元向税关保出候讯”等语。关于孙被困木屋及各人营救情形，前已详述，可勿赘言。其应订正者，（一）美国移民律无五千元具保之条，只有具保不过五百元之句，故篇中五千元之句，当是五百元之误。（二）美移民局建筑新外人羁留所于烟治埃伦，又名天使岛者，始于一九一〇年，孙公于一九〇三年被困之木屋系在旧日码头原址，若干年后始移往烟治埃伦，故“烟治埃伦”一语似应删去。（三）阻止孙公登岸者，系清领事何祐，保皇党实无阻止他人之势力，尊著云云，未免太视保皇党势力过高。（四）尊著谓孙公被留木屋者逾日，其羁留若干时日，愚虽无从记忆，但美船惯例，至少停泊码头数日，然后开行。将行之日，始将待讯之船客拨上码头木屋。再经关员查讯，乃判定能否入境。如判令出境，又须由移民局长签字，并明告本人以拨送出境之原因，容限十日内向工商部上诉，否则须候所搭来美原船拨回出发地点。照此手续而言，决非一日或数日可以毕事，大约至少亦在一星期以外。此凡曾经被困木屋之华人，无不知之。故孙公羁留之时日若干，可以从此推断。（五）孙公于被判出境后，始函告伍盘照求助。可知事前在美华人并不知孙公之来，更可知檀香山致公堂并无电告旧金山致公堂，及黄三德、唐琼昌等得电后前往码头接船等事。黄唐等得盘照面告，始知其详，事实明甚。以上所陈，现黄君三德尚在罗省，那文律师亦在本埠，均可举而问之，因读尊序有云：“其有短篇只字列举所知，以匡不逮，余引领望之”等语，谨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义，据实奉告，伏惟谅之。并候著安。伍于衍渤。一九四〇年九月五日

冯自由按：伍君此函洵足补充史实，为益非鲜。惟所称当日妨阻总理入境为清领事，而与保皇党无关一节，殊不尽然。盖余当日于事后所得总理通信及各方报告，均谓保皇党从中构陷所致。伍君谓保皇党无此势力，然该党对于美海关虽无直接之势力，若间接向清领事嘱托，及勾结关员上下其手，则固优优为之。且据清领事语伍君盘照，谓奉清政府命令而行。依清代外交官职权，外部对于海外侨民之行事，概由公使转达，从无直接命令领事之例。假令此举系出自清政府命令，则必经由驻美公使转饬领事办理，始符手续。今清领事既始终未提及公使，其为受人嘱托，自无疑义，且其时檀岛保皇党之衔恨总理，甚于敌国。日欲伺机报复，此事总理在檀已有所闻，故从权取得夏威夷出生证书，以备不虞。该党既侦得总理出发有期，及所乘何船，自必电知旧金山同党设法妨害登陆，在美彼党得电，遂预运动清领事及美关员，多方构陷，以致演此怪剧。不然，清领事何从预知总理行期，而此正式有效之夏威夷出生证书，美关员又岂敢冒昧否认之耶？管见如此，质诸伍君，以为何如？

《大同报》之改组

致公堂有机关报名《大同日报》，为欧榘甲所创办；欧号云樵，惠州归善县人，康有为之万木草堂弟子也。在康徒中以能文称。迭任上海《时务报》，澳门《知新报》，横滨《清议报》等报主笔。己亥（一八九九年）夏秋间，梁启超及同门多人，在日与总理往还至密，渐趋向革命真理，因有联合组党之议。榘甲亦赞成人之一。尝在《清议报》高谈汤武革命，为诸同门所不敢道。康有为闻之大怒，既痛责梁启超等附和革命之非，即勒令启超赴檀香山开设保皇会，将功赎罪，复拟摈榘甲于门墙外。经徐勤、麦孟华等代为缓颊，乃遣往美国充旧金山《文兴报》主笔。惠属归善博罗二县，素为三点会渊藪，榘甲少居乡，结识会党首领颇多，因亦名厕会籍。抵美后，遂凭此资格联络致公堂会员，谓康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与洪门反清复明之宗旨，实殊途同归，应彼此合作，共同救国。致公堂会员多为所动。辛丑壬寅间（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榘甲游说致公堂各职员创办洪门机关报，该堂大佬黄三德、英文书记唐琼昌、司库员朱三进等深趋其议，乃措资设立《大同日报》，即延榘甲任总编辑。大同二字之得名，亦为榘甲所定。盖康有为尝为横滨华侨学校题名大同学校，榘甲以此名其报馆，即表示其继承康门之统绪也。《大同日报》出版时，榘甲初著《〈大同日报〉缘起》，发挥洪门改革之理由，极为动听。复以太平洋客名义，撰一长文，鼓吹广东独立，极言粤省有脱离满清政府之必要，登至数十续，痛快淋漓。读者莫不击节称赏。横滨《清议报》特为印作单行本，题以“新广东”三字，书出风行一时。康有为闻之，乃复严词申斥，有“云樵离经道应逐出门墙”之语。榘甲因之论调一变，改倡“洪门应与保皇会合力迫朝廷改专制为立宪，以立大同之基础”等说，不敢再作激烈语矣。及癸卯冬，总理抵美被阻，榘甲与总理原为旧识，以挟檀埠同党笔战之嫌，且虑《大同报》为所搀夺，力劝黄三德、唐琼昌等置身事外，勿为总理助力。迨总理脱难，榘甲竟在报上著论排斥，且诋洪门尊重总理为不智。总理出木屋后，日传食于基督教徒之《中西日报》，而于致公堂机关之《大同日报》若划鸿沟，即以榘甲向来宗旨不定，势难脱离康门范围之故也。黄三德、唐琼昌初欲榘甲与总理合作，再三劝告，而榘甲仍假《大同报》恣意攻击，狃狃不休，致公堂各职员以忍无可忍，始下逐客之令，并请总理推荐留日学界同志主持笔政。总理首荐冯自由任驻日该报通信记者，且托冯在日物色主笔一人。冯初荐广西人马君武。马以事辞，乃改荐湖北人刘成禺，刘为《湖北学生界》编辑，尝以鼓吹革命，被清使馆革除官费学籍。受聘后，自赴上海领取留学生入美护照。因闻冯自由述总理抵美时，被保皇党构陷之经过，乃向素日相识之在沪保皇会员时报主人狄葆贤（号楚青别字平子）求得一纸致旧金山保皇党会长之

介绍书，借免发生阻力。甲辰（一九〇四年）夏，刘自横滨抵旧金山，时总理已偕黄三德出游各埠。《大同日报》自刘到后，革命横议，鼓荡全美。华侨受其感化者日众，计总理是次游美之成绩，实以改组《大同日报》为最著。其后庚戌辛亥（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两年美洲南北各埠同盟会之成立及筹饷赴义的伟绩，均导源于是焉。

洪门致公堂之渊源

洪门团体原名天地会，在海外通称义兴会或义兴公司，在美洲曰致公堂，是会始创于清初康熙时代，其时距明亡未久，明之忠臣义士，再三力图恢复，誓不臣清，前仆后起，卒难挽回世运。二三遗老以清祚已固，兴复大业，非一时所能收效。乃欲以种族思想流传后人，特创设一种秘密团体，为传播此种思想之导线，是即洪门团体之所由起也。在美之致公堂总部设于旧金山大埠，他如纽约、芝加高、波士顿、圣路易、费城、华盛顿、洛山矶、西雅图、沙加缅都、砵仑等百数十埠，皆设分堂，凡有华侨驻在之地，莫不有之，咸隶属于旧金山。华侨名列会籍者占十之八九，其在大埠者，未入洪门尚可谋生，若在小埠，则非属致公堂会员，辄受排挤，故势力伟大，为各团体冠。考其历史，最初由广东三合会头领因避清廷摧残，逃亡海外，遂组织致公堂，以资联络。其后太平天国失败，洪秀全部将陈金刚旧部亦多远托美洲，重整旗鼓。然久而久之，故老凋谢，面目渐非，洪门人士能了解宗旨者，百不得一。孙总理于丙申年第一次游美时，以未列洪门会籍，虽向各埠致公堂职员大讲革命仇满之真理，彼中人士概漠然置之。及戊戌（一八九八年）政变后，康有为于己亥春渡美，初设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于英属加拿大，复派其弟子梁启田、徐勤、欧榘甲、陈继俨诸人赴美国设立支会。梁徐等知洪门势大，可供利用，乃先后投身致公堂，以联络彼中之有力者。洪门中人不知其诈，颇为所愚。各埠致公堂职员之思想较新者，多兼充保皇会干事，致公堂英文书记唐琼昌初任保党机关《文兴报》译员。榘甲之能入寇致公堂及创办《大同日报》，即琼昌领导之力。癸卯冬总理二次抵美，洪门人士已较前开通，尤以黄三德、唐琼昌、朱三进、邓幹隆数人为深明大义，总理与黄、唐等无片面之识，一函之介，而黄、唐等竟能仗义营救脱难，且毅然驱逐欧榘甲于门外，殆亦洪门本身之种族观念使然也。

致公堂之总注册

孙总理既助唐琼昌改组《大同报》，询知致公堂内容复杂，堂内职员，除三数热心家外，多半泥守旧习，毫无远大思想，而各分堂对于总堂之关系，大都阳

奉阴违，有名无实，尤以美东各埠为尤甚，欲恃其筹饷救国，实属戛戛其难。乃向堂内各职员建议举行全美会员总注册之策，略谓在美洪门会员既有十数万人，若能重新举行登记，不独足以巩固团体，回复威信，且可借此收集巨款，为公堂基金及协助国内同志起义之需。且愿亲往游历各埠，劝告洪门手足同勤义举。各职员大为赞成。即请总理起草总注册章程，并举总理与黄三德大佬二人出游各埠，鼓励进行。总理于是手订致公堂新章要义及规程八十条，全文已载《革命逸史》第一集，兹不赘录。

总理所订致公堂新章条款最特色者，为全文中第二条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一项，不独开辟古今革命党人之新生面，且足奠定三民主义之基础。翌年乙巳（一九〇五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之日，总理首提出入会誓词之四大纲领，即此十六字也。洪门之宗旨曰反清复明，为单纯的民族主义，总理乃代添人民权主义之创立民国，及民生主义之平均地权二项，意义高深，殊非思想简单之致公堂人士所能了解，然堂内各职员急欲征集全体会员之注册费，以充公堂基金，故对于新章条文，绝未加以详细研究，一惟总理之马首是询瞻。又其时公堂财政绝不充裕，关于总理及黄三德二人出游之长途旅费，亦不能多所供应。因是总理乃出其发售革命军需债券所得之大部以助成之。甲辰春夏间，总理遂偕黄三德出发，取途南方铁路沿斐士哪、北加非、洛山矶、巴梳斐力士、巴士杰、纽柯连、必珠堡、圣路易、亚兰达、华盛顿、费城、波地摩、芝加古等数十城市，以达纽约。每到一处，总理必聚众演说洪门反清复明乘时救国之宗旨，而黄三德亦必开台演戏（洪门称招收会员拜盟行礼曰开台做戏）。惟是时洪门团体异常散漫，各埠分堂职员身跨保皇会籍者，实繁有徒。虽经总理舌敝唇焦，多方劝谕，而各分堂对于总注册事，仍属虚与委蛇，延不举办。各埠会员之报名注册者，寥寥无几。加以旧金山总堂缺乏相当人才，推行新章使之有效，即总堂本身亦未按照新章条款选举各部职员，因是总理奔走七八月，惨淡经营，稍获端绪。而各分堂于总理去后，即已淡然若忘，不复提及登记事宜，此则总堂平日丧失威信有以致之也。总理抵纽约后，以民智闭塞，一时不易生效，遂以注册事委诸黄三德，而转向留学界及国际方面之运动，特自撰一英文告欧美人书，题曰《中国问题之真解决》，外书中文“革命潮”三字，刊印万册分赠各国人士。东京日文革命评论及香港《中国日报》均译载之。留美学生与总理时相过从，互讨论革命政府之外交财政各问题者，有王宠惠、陈锦涛、薛颂瀛诸人。复由《大同日报》主笔刘成禺之函介，与留欧学生胡秉柯、贺之才、魏宸组、史青、朱和中等通递信息，胡、贺、魏、史、朱等急欲总理赴欧商谈国事。各筹集旅资汇寄纽约，迭促总理早日就道。迄乙巳春间，总理遂由美渡欧，成立我国留学比、法、德、英各国学生之革命团体，至于洪门筹饷革命之成绩，直至七年后辛亥广州黄花岗一役前，冯自由策动加拿大各埠致公堂变产救国，及武汉举义

前三月，旧金山致公堂与同盟会联合设立筹饷局，始大见收效，是固总理癸卯甲辰两年间游美散播种子之力也。

《新湖南》作者杨笃生

杨守仁，原名毓麟，字笃生，一号叔壬，其言论文章，散见于报纸杂志，多署名椎印寒灰，湖南长沙人。生于清同治壬申（一八七一年），丁酉（一八九七年）科拔贡孝廉。性笃厚聪颖，少好学问；及长，精研先儒性理及佛老之学，经史百家无所不窥。时学使张亨嘉江标咸赏其才识。戊戌（一八九八年）一试春官，分发广西知县，不至任，遂绝意仕进。甲午（一八九四年）中日之败，清廷假意维新，诏兴学以开民智。湘抚陈宝箴学使徐仁铸颇提倡新学，设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主讲席，笃生与唐才常等任教授，嗣戊戌政变，学堂解散，梁遁日本，笃生几及于难，避乡数月乃免。己亥（一八九九年）应江苏学使瞿鸿禨之聘，入幕襄校，所取皆宿学通儒，终以宦途污浊辞去。庚子辛丑（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馆湘绅龙湛霖家极相得，但非所志，不久居也。壬寅（一九〇二年）春挈龙氏学生颍原同渡日本，初入宏文学院，继入早稻田大学，并劝龙氏出资兴学。长沙胡子靖创办明德经正两校，龙氏尝竭资以助，笃生实有力焉。居东时有同乡黄克强、刘揆一、陈天华等最为相得，共发刊《游学译编》一种，专以输注政治革命种族革命等学说，大半出自其手笔。复著《新湖南》一卷，鼓吹湘省脱离满清独立之说甚力，与粤人欧榘甲著之《新广东》同风行于世。癸卯甲辰（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间俄兵进占满洲，笃生愤清廷外交之失败及瓜分之祸迫，与留东同学组织拒俄义勇队，将赴敌，以日政府之压制，不果。旋复与同志改组义勇队为军国民教育会。更于会中密组一暗杀团。黄克强、周来苏、苏鹏等咸预其事，专主张暗杀，研究爆发物十余种。尝由冯自由介绍谒横滨梁慕光学制炸药。因拂案触银制药屑失慎，一眼失明。甲辰夏偕周来苏、苏鹏由日携炸药至北京，约张继自湘至，何海樵自沪至，设机关于天津，谋炸内城宫殿及颐和园，以震动天下人耳目。潜居京城数月，以无隙可乘，失意南归。是岁八月，黄克强、刘揆一、陈天华、宋教仁等谋在长沙起义，笃生乃与蔡元培、杭辛斋等在沪密设机关，一面接济湖南，一面结合留东各省同志。会十月湘事败，黄克强以长沙圣公会黄吉亭牧师之助，脱险至沪，谋再举。复设机关于上海新闻路余庆里，众推笃生为会长。及同志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发，余庆里机关被搜，检去手枪炸药名册会章等等，按捕黄克强等十余人，杨毓麟名亦在列。笃生因是改名守

仁，以避侦者耳目。继乃变计潜迹政界，以从事中央革命，谓发难边区不如袭取首都收效之速。居京数月，赖张伯熙之助任译学馆教员。会清廷派遣五大臣出洋调查宪政，笃生认为时不可失，遂力谋厕充随员以行事。先是笃生尝于甲辰乙巳（一九〇五年）间与同志吴樾、马鸿亮、杨积厚、庄以临、侯景飞、金猷树诸人组织北方暗杀团，众多主用手枪，笃生独主用炸弹，众如笃生言，出郭门数里之山谷中试之，果猛烈异常。吴樾大喜，愿力任狙击铁良事。乙巳六月，五大臣出洋事起，樾曰，击彼五大臣，不尤愈于击铁良乎？遂于九月二十六日五大臣出发北京正阳门车站之日，决行荆聂之事，以车动力猛，炸弹自行爆裂，死之。然清吏未疑及笃生之所为，故笃生仍得同行。抵东京，与黄克强、张继、宋教仁等筹商扩充同盟会及实行方略，乃辞退随员职务，再返上海，约集同志设正利厚成肆为江海交通机关。丁未（一九〇七年）春与于右任等在沪组织《神州日报》，极力鼓吹革命，直诛政府之专制，痛陈种族之灭亡。时有魏蕃实者，与汪康年以全湘矿产卖于德人，订约数年，屡起轆葛，约不能废。笃生愤甚，乃与同乡易本羲、王延祉、唐支厦、陈家鼎、童尧山等力主废约，群推笃生向魏抗争，笃生谒魏索阅约文研究内容，魏出约，笃生竟袖之走，魏鸣捕不获，其约乃交由陈家鼎、王延祉等送驻日清使杨枢报外务部，卒废之。《神州报》出版未久，以邻居失火，亦遭殃及。笃生缘电杆而下，未葬火窟，蹶蹶再振，幸而复刊。是年冬萍醴革命军败挫，武昌日知会案破，刘敬安等九人被逮，柳继忠亦被囚于长沙，笃生尝多方营救无效。戊申（一九〇八年）春迎其慈母，并携其弟殿麟至沪，相依一月。时清廷派蒯光典为留欧学生监督。聘笃生长秘书，笃生以事机未熟，暂难发动，遂随蒯至欧洲。居英数月，乃留学于苏格兰爱伯汀埠。辛亥（一九一一年）夏闻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一役黄克强战死凶讯，忧伤过度，夜不成寐，后得冯自由由加拿大致书，告以克强仅伤指无恙，用是稍慰。未几复闻列强有实行瓜分中国之说，神气沮丧，旧疾复发，头痛浮肿，愈不成眠。是岁六月十三日忽投利物浦埠之大西洋海岸自尽，死前留书石瑛、吴敬恒，托其将所积英金一百镑，转汇黄克强作革命军费，余三十镑托转寄其老母。其尸后经渔人捞起，由石瑛、吴敬恒、曹亚伯等葬之于利物浦公墓。旅利物浦华侨特为开会追悼，死年四十。子克念，女克恭，家固小康，以奔走国事中落。其兄德麟亦革命党员之铮铮者。民元任南京留守府秘书，继任湖南财政厅长，兼国民党湘支部长。民二汤芑铭奉袁世凯命督湘，首捕德麟入狱，越四日即被杀，湘人感其操守廉洁，及今犹称颂弗衰。

《猛回头》作者陈天华

陈天华，字星台，别号思黄，湖南新化县人。性敦笃，善属文，少时即以光复汉族为念，遇乡人之称颂胡、曾、左、彭功业者，辄唾弃不顾，而有愧色。居常不事家人生产，虽箪瓢屡空，处之怡然。日惟从事著述，专以鼓吹民族主义为务。所著咸用白话文或通俗文，务使舆夫走卒皆能读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册散播于长江沿岸各省，最为盛行，较之章太炎《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革命军》，有过之无不及。年三十一，尚未娶，或劝之娶，辄泫然曰：“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每读中西史志，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其爱国之忧，发于天性如此。岁癸卯（一九〇三年）留学日本，时值俄兵入据东三省，瓜分之祸日迫，朝野皆束手无计，乃大悲恻，啮指血成书数十幅，备陈灭亡之惨，邮寄内地各学校，读者莫不感动。是岁夏，黄克强、刘揆一等组织华兴会，谋起义于湖南，联络粤、鄂、皖、浙各省党人，以倾覆政府，天华与焉。甲辰（一九〇四年）秋，黄、刘与马福益等运动渐臻成熟，天华闻之，星夜附轮归长沙，筹划布置，昼夜不少辍。计以十月十日清太后六十寿辰，全省官吏在万寿宫行礼时，预埋炸药其下以炸毙之，同时分在长沙、岳州、衡州、宝庆、常德五路起事。诟期前不幸事泄，黄、刘、马诸人先后出走，天华间道走江西至上海，与黄克强、杨守仁、张继、仇亮等重集会于公共租界新闻路余庆里谋再举。会皖人万福华愤前桂抚王之春主张联俄，枪击之于福州路金谷香西菜馆而未中，西捕探索至余庆里机关部，党人以嫌疑被逮者数人，天华不得已重游日本避之。乙巳（一九〇五年）春天华忧伤过甚，忽发奇想，建议于东京骏河台之我国留学生会馆，主张用全体留学生名义向清廷请愿实行立宪政治，盖有感于庚子甲辰二役倡义之失败，企图别出途径，潜布党人势力于政界，期有所活动也。留学生会馆干事乃取决于各省同乡会，黄克强、宋教仁、冯自由等均不以为然，各同乡会亦表示异议，事遂无成。是岁秋孙总理自欧洲莅日本，集合各省革命党人组织中国同盟会，天华亦为发起人之一，被推为会章起草员。《民报》成立，复被推为撰述员，尝在《民报》发挥革命时代宜行开明专制之说。与同盟会颁布革命方略之军政时期相同。此开明专制四字，即梁启超利用以反驳《民报》所主张民权主义之论据也。又其所著《狮子吼》小说，发扬种族观念，尤感人至深。《民报》出版未一月，值日本文部省询清公使所求，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留学界异常愤激。同盟会对于此事亦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归国，另在上海办学，以洗日人取缔之耻辱，天华

与易本義、秋瑾、田桐等主之；一派主张求学宜忍辱负重，胡汉民、朱执信、汪精卫等主之。两派互相驳论，争之至烈。秋瑾、易本義等以是归国。天华愤不能平，乃作绝命书累万言，竟于十一月十二日投大森海湾自杀。孙总理时在南洋，闻之哀悼不已。香港同志郑贯公等旋开追悼会于杏花楼，各界临吊者千余人，冯自由作联挽之曰：“生平得爱友二人，星台殉国，近午何之？（黄克强原字近午，时已赴广西，久未得消息，故云。）可叹吾党英才，又弱一个；灵爽凭健儿五百，公武（南洋同志通信暗号，称孙总理原名为公武）鸣钟，自由不死，誓覆虜酋政府，实践三民。”天华死时三十有一。遗稿已出版者，有《猛回头》、《警世钟》、《最近政见之评决》、《国民必读》、《最近之方针》、《中国革命史论》等八种，皆风行于世；就中以《猛回头》、《警世钟》二种为效力至伟。丙午（一九〇六年）秋七月，有浙江人曹阿狗因演讲《猛回头》为金华县令嵩连所杀。天华逝后六载，即辛亥八月，杨守仁（笃生）在英国闻黄克强在三月二十九日广州黄花岗一役败讯，亦愤而自投于伦敦海滨。陈杨皆湘人，亦忧国伤时之文人，岂同受汨罗江屈大夫之召耶？不然，何三湘爱国文人投水之多也！

留欧学界与同盟会

在乙巳（一九〇五年）七月，中国同盟会开成立大会于日本东京之前数月，欧洲诸国之我国留学生，已有革命团体之组织，惟尚未确定革命团体之名称耳。先是孙总理于癸卯（一九〇三年）冬自日本渡美，为联络洪门致公堂参加革命之故，尝偕致公堂首领黄三德周游华侨所在地，游说洪门会员，使回复反清复明之真面目。以其时保皇会势焰方盛，阻力极巨，虽经舌敝唇焦，收效尚微。甲辰（一九〇四年）春冯自由荐湖北人刘成禺任旧金山《大同日报》主笔。刘抵美后，以欧洲留学生多属鄂籍，且半属旧友，特专函介绍贺之才（培之）、史青（丹墀）、魏宸组（注东）、胡秉柯（质斋）四人与孙总理相见。贺等得书，乃函邀孙总理赴欧共商国事。嗣闻孙总理方勾留纽约，以缺少川资未能克日就道，遂由留比、法、德三国学生尽力凑集得八千余佛郎，电汇孙总理作旅费之需。乙巳（一九〇五年）春孙总理由美抵欧，先至比利士京城，寓史青寓所，日与贺之才、史青、魏宸组、胡秉柯、朱和中（子英）诸人讨论组织革命团体方法，众皆赞同。孙总理乃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设民国平均地权”四事为党中纲领，众略有诤辩，经孙总理剴切解释，始无异议。众又对于誓约稿所载当天发誓及天运纪年二语亦有问难，亦由孙总理再四说明，乃照原文通过。于是总理及

贺、史、魏、胡、朱等先后填写誓约，当众宣誓。贺等旋又介绍陈宽沆、喻毓西、李藩昌、程光鑫、李仁炳、孔庆睿（伟虎）、胡铮、王治辉、刘荫弗（文贞）诸人先后入会。是为留欧学界组织革命团体之嚆矢。然是时尚未确定此革命团体之名目也。比京团体既成立，孙总理旋至德、法、英三国向留学界从事联络。计留德学生先后加盟者，有刘家侖、周泽春、宾步程、钱汇春、陈匡时、马德润等；留法学生先后加盟者，有唐豸、汤芑铭、向国华、冯承钧、王鸿猷（子匡）、高鲁（鸛青）、石瑛（衡青）、黄大伟（子荫）、石鸿翥等；留英学生先后加盟者，有孙鸿哲、吴敬恒（稚晖）等。于是比、德、法三国京城均有我国革命团体之成立，革命党人之声势为之一振。惟当孙总理客居巴黎，与法国殖民大臣有所接洽之际，忽发觉其贮藏重要文件之小皮篋为人割破，所有党员入会誓约及与安南政府有关书札均被窃去；后乃查悉为王发科、王相楚二人所为，陈匡时、汤芑铭、向国华三人亦与其谋。事缘王等五人入会后，猝然惧祸反悔，初往利倭尼街孙总理寓所瓦克拉旅馆，拟面求总理发还盟单，值总理外出，久候不归，知总理所有文件素藏小皮篋中，乃以小刀割破皮篋，尽将内贮函牍单据窃取以去。即由王发科、王相楚二人持诣驻巴黎清公使孙宝琦，自行检举，且谓所发现孙某与法政府交涉关于安南之来往书札极有价值，足以立功赎罪等语。孙宝琦闻言大惊，惟不欲遽兴党狱，命使馆参赞吴宗濂会同二王将各盟书发还本人，不许借故生事，一场风波遽尔平息，时张人杰（静江）方任巴黎使馆商务随员，虽未与革命党发生关系，然其人思想新颖，家资丰厚，颇得孙宝琦信用。或谓宝琦之所以不加追究，乃张与使馆参赞夏循坦二人之力，似非无因也。留欧学界经此次风潮之后，驻比、德、法各革命团体遂决行重新改组，各会员一律再写誓约，凡品行有亏及信仰不坚者，概从淘汰。党基由是渐固。未几，孙总理首途东归，众复募集旅费以壮行色。是岁秋东京中国同盟会本部成立，留欧学界之革命团体得本部通告，始确定同盟会之名称，并先后在比、德、法、英、瑞士各国设立通讯处。其所在地如下：

法国巴黎通讯处：魏宸组、胡秉柯、王鸿猷 M. Wei 70 Bd. St. Germain, Paris, France.

比国京城通讯处：史青、贺之才 M. Chetsing, Boide No. 224, Bruxelles. Belgique.

德国柏林通讯处：朱和中、宾步程、冯承钧 Dsuhochung, 79, Augsburger St. Berlin. Germany.

比国烈日城通讯处：孔伟虎、刘文贞 M. L. W. tsing, 13, Ruegaucet Liege, Beligue.

英国伦敦通讯处：曹亚伯、吴敬恒、杨笃生 Abel Tsao, care of Mr. Palmer, 76 Shelgate Road Chapham Common, London, S. W. England.

瑞士国通讯处：李仲南 M. Faintepang, 19, Pre du Marche Lausanne, Swiss

自王发科等窃盗盟书事件发生后，贺之才、史青、胡秉柯等有鉴于此，特于同盟会外另组织一公民党，以为同盟会之过渡机关。其宗旨只有同盟会誓约内所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三大纲领，而独删去平均地权一项。凡会员入会者，须先入公民党，俟训练有素，然后正式加盟为同盟会员，如王鸿猷、高鲁、石瑛、黄大伟、杨循祖、石鸿翥等，即由公民党而转入同盟会也。此外尚有巴黎《新世纪报》之无政府党一派，此派奉无政府主义学者巴枯宁、蒲鲁东、托尔斯泰等为祖师，专提倡废政府废宗教废家庭之学说，以张人杰、李煜瀛（石曾）、吴敬恒、褚民谊为中坚分子。张人杰为巴黎古董商通运公司主人，尝于乙巳某月与孙总理同舟结识，自愿捐助巨款为革命资金。总理在东京及河内时，尝得其协济数次。至丁未（一九〇七年）六月始在香港加入同盟会。吴敬恒则在伦敦由曹亚伯介绍入会。李石曾、褚民谊闻张人杰已在港入会，始在巴黎继续加盟。其后孙总理复莅欧土三次，党势日有发展。最后一次为辛亥九十月间，即武昌革命军兴后一月，尝邀各种专门毕业之同志归国参加组织共和政府事宜。故民元南京政府成立，各部次长及总统府参军以留欧学生为多，如外交次长魏宸组，财政次长王鸿猷，实业次长马君武，海军次长汤芎铭，及总统府参军黄大伟、喻毓西、陈宽沆诸人是也。方黄克强推荐汤芎铭任海军次长时，有留欧同志多人以汤往年曾与谋割取总理皮篋盗取誓约事，提出异议。总理谓汤既率领海军反正有功，吾党可以不念旧恶。反对者始息议。庸詎知民二以后，汤竟故态复萌，在湘省大杀党人，以取媚于袁世凯乎？

贺之才述欧洲同盟会成立始末

湖北学生之革命热 湖北兴学最早，学生皆少年英俊，富于感情冲动性，第一批留日学生吴禄贞、刘成禺等首先鼓吹革命排满，又值《三十三年落花梦》、《新民丛报》、《中国魂》等出版物畅销内地，一时学生靡然从风。赓赓萌革命思想矣。会日俄为东三省事缔结密约，学生大愤，乘机集会于曾公祠，为极激烈之演说，武汉人心大震，寻为当道禁阻，然自是湖北学生界遂暗中有一革命团体矣。其中坚分子为李书城、时功玖、孔庚、朱和中、史青、贺之才、胡秉柯、耿觐文、魏宸组、曹亚伯、陈同如、时公璧、冯特民诸人；李书城秘密联络军队，孔庚密为代派《新民丛报》，曹亚伯借教会为护符，以日知会为宣传机关。时邹容以《革命军》案被锢西狱，贺之才乃间道赴上海，密携《革命军》数百册回鄂，散布鼓吹，几罹于难。

留比学生与革命党 湖北当道忌诸人甚，时思有以远之。癸卯冬选派学生分赴东西洋留学，朱和中遂被派赴德，贺之才、史青、魏宸组、胡秉柯被派赴比，

未几李书城、耿觐文、时功玖、孔庚等亦被派赴日。贺等道经上海，遇刘成禺，曰，孙中山先生方在伦敦，诸君此行，可与之会晤共商大计。因作函为贺等四人介绍。贺等抵比后，被清使杨某禁之一室，如待小学生然。抗争数月，始获自由，因以刘之介绍函寄往伦敦，并附函约孙来比。（时孙寓荷兰公园友人摩根家中。）数月后，始得复音，云适往某处旅行，不及早答，且云甚愿赴比一游，惟缺少川资云云。贺等即为筹款寄去，一面电邀朱和中来比，贺之才与胡秉柯并亲至哦斯丹埠码头相迓。

革命团体之组织 中山先生既至比京，寓史青家中，与贺、魏、胡等畅谈数日夜，娓娓不倦，所言皆革命方略及建设事业。贺等又介绍喻毓西、孔庆睿、陈宽沆、刘荫荪、李藩昌、李仁炳、胡铮、王治辉、程光鑫等相见，彼此极为融洽。中山先生因提议组织革命团体，众皆赞同，惟朱和中对于以天运纪年，魏宸组对于当天发誓一层，略有诤辩，中山先生多方解释，似视起誓为极重要。众始无异议，亲书笔据，其文曰：

具愿书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

天运乙巳年 月 日押（指印）

（编者按第一次在比京同盟之愿书确系如此东京大会成立之后对于字句微有修改）中山先生亦依同式亲书誓文一纸，交贺等收执（此纸至今尚存史青处）。并同时提议同党晤面时各种秘密手式口号，如问君从何处来？答，从南方来。问向何处去？答向北方去。问，贵友为谁？答陆皓东史坚如二人云云。（按此种口号后均修改，仅沿用骈指交钩握手法。）

中山先生之乐观 中山先生自内地失败后，避居海外，四出鼓吹革命，而闻者多拥耳却走，莫之赞助。无已，惟思联络秘密会党，如三合、三点等会，若辈知识悬殊，不能与共大事，遂怏怏而之英伦。又以旅囊空空，一举步则舟车之费无所出，蛰居愁城，其失意之状可想矣（此事中山先生亲为余言之）。自至比京后，始知知识界中亦有同调，不禁喜出望外。宣誓既竟，则为极痛快之演说，亦若痛饮黄龙即在目前者，其得意之状，较之就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时实有过之。（民元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临时总统任，余亦归国，相见后，余曰，我辈夙昔志愿，竟成事实矣，何等痛快！中山先生蹙额曰，何来痛快？直苦恼耳。）余等并告以东京同志甚多，均可加入同盟，因为之作函介绍李书城、但焘、时功玖、耿觐文等，中山先生遂决意为东京之行。

留欧诸国学生之加盟 时朱和中坚请中山先生赴德国，由朱介绍入党者，有马德润、刘家桢、王发科、王相楚、陈康时、钱汇东、周泽春诸人（一说马德润始终

不肯发誓立据)，由德返英入党者仅有孙鸿哲一人，转道赴法，由陈宽沆先期介绍唐豸，复由唐介绍汤芑铭、向国华等加盟，于是留欧同盟会之气势，为之一振。

王发科等之叛盟 时中山先生兴高采烈，拟由巴黎取道东至日本，会新任安南总督某与伊有旧，素赞助中国革命。中山先生因与法国殖民大臣有所接洽，尚未得要领，遂暂寓利倭尼街之瓦克拉旅馆，坐待好音。一日外出，归寓忽发觉被盗，其唯一行篋为一小革囊，被刀割一大洞，所有同盟证书及与安南当局有关之重要文件均被窃去，因之大惊，急电比京余等告以状，余等公推胡秉柯赴法，谋善后策，始查悉为王发科等叛盟的故。王为人甚矫情，而胆小如鼠，平日喜谈论，饰为爱国忧民之状，朱和中为所给，引为同志，入党后，即万分懊悔，寝馈不安，日夜与王相楚、陈康时同谋叛盟，遂相偕赴法，巧言说唐豸，唐不为动，遂与汤芑铭、向国华等合谋同访中山先生，其本意拟向先生哀求，发还愿书，值先生外出未遇，及见其行篋，遂萌祛篋之念。以小刀割之，尽攫所有，急携赴清使孙宝琦处，叩头哭诉，备言悔状。宝琦不欲兴大狱（或云宝琦之所以不加追究者乃张人杰、夏循坦进言之力，夏与宝琦为戚属，而张则方为使馆商务随员也），命吴宗濂将盟书寄还本人，后于密函中发现安南事件，则大惊，急赴法外交部破坏其事，事后先生为余言，被窃后，惶急之状，为伦敦使馆被困以来所未有。一则数十同志之生命攸关，二则恐因此遂失却联络知识阶级之机会，三则安南事件为所破坏，深为可惜。噫，王发科等之肉，其足食乎。其后陈康时与王相楚自回国后，即已匿迹销声，惟王发科后更名王翥，闻曾在四川某军中为将官云。

同盟会之改组 盟书被窃之消息传至比京，贺之才、史青等急召集同党，提议重书誓文事，与会者一致赞同，惟此后选择党员异常慎重，凡品行有亏及信仰不坚者，概从淘汰。计重具愿书者，仅有史青、贺之才、魏宸组、胡秉柯、喻毓西、刘荫弗、李藩昌、李仁炳、程光鑫、陈宽沆十人，在法者仅有唐豸一人，在德之朱和中、周泽春、钱汇东三人，于事后特至比国，与贺等协商重组团体，后亦加入。所可幸者，留欧同志受此打击之后，其志益坚，而团体益固。改组既定，同人遂公筹款项，付中山先生作东归之计，并先期由贺之才函告东京之李、但、时、耿诸人，述同盟会成立之经过，并令其筹备欢迎。数月后，轰轰烈烈之东京大会遂于是成立矣。

留比同盟会之工作 中山先生屡嘱同人专心求学，以为建国之需，虽镇南关河口诸役，事前贺之才等屡请回国，躬赴前敌，先生均婉言劝阻，是以在比同志，仅获从事于宣传与预备之工作，其可得而纪者，有如下数则：

一、党员每月各捐其学费十分之二，存储生息，以备革命之用。厥后中山先生东奔西驰，常赖此款作川资。

二、每月聚会二次，研究革命方法及建设事业。

三、为扩充党务起见，由贺之才、史青发起另组一革命团体，名曰公民党，其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三项。而平均地权不与焉。此党专为训

练及联络同学中之有志者，以为加入同盟会之预备。公民党之中坚分子为王鸿猷、高鲁、石瑛、黄大伟、石鸿翥诸人，其余党员则湖北四川籍之学生占大多数，厥后王鸿猷、石瑛、黄大伟、杨循祖即由公民党而转入同盟会者。

四、党内设有编译部，专司报纸上之宣传，其时外报载中国革命新闻，多助清政府张目。经同人用文字宣传后，始渐与民党表同情矣。

五、党员平素极意联络比国社会党，冀获精神上之援助，中山先生二次至比时，由贺之才介绍于冈城社会党首领华灵东之前，因得识加美利好十万及意迈尔云地威提，二君在议会势力甚大，意氏后任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贺导中山先生往议院之客室相晤。谈次，将平均地权一事，发挥尽致，彼等佩服不已，并允尽力援助。惜当时社会党未执政权，未免力不从心耳。

六、每逢内地预备举事之前，中山先生必来函报告，一日嘱购军火，于是贺之才四出张罗，卒得奥国退职军官某担任接济步枪三千枝，取价甚微，事已垂成，后因款项不济，遂中止。

留比同盟会之轶事 一日贺之才导中山先生游比京之拉甘巴公园，忽遇清使馆随员某，贺大窘，某询中山先生姓氏，贺急代答曰，此吾友日本人高野也。（时南洋一带，英人禁例甚严，中山先生为旅行便利计，尝假用日本人名 Takano 译言高野。）某疑信参半，然究亦莫可如何也。比国烈日城开博览会，驻法清使孙宝琦往观，张人杰从焉。人杰逢人必谈革命，党员疑为汉奸，几欲群起攒殴之，张急走得脱。盖是时同盟会成立未久，又值割皮包之事发生，而张又随清使同来，是以党人疑之，厚诬张君，亦可笑已。黄大伟初出洋时，顽固特甚，期年尚不肯去豚尾，与之言革命，则掩耳却走。后经魏宸组、贺之才、陈宽沆等多方劝导，迟之又久，始于辛亥三月黄花岗举事前一月加入同盟，然一入党籍，其努力奋斗反非寻常同志所可及，盖其天性使然也。（民十四应老友冯君自由之命，写于北京大学，贺之才追述。）

二民主义与三民主义

一民主义时期 吾国清代革命党之变迁及进化，可分为三个时期：从甲申（一六四四）满清入关至甲午（一八九四）中日之战为一民主义时期；在此时期间各省会党及明末遗民之起兵者，如顺治初年之郑成功、张煌言、阎应元、陈邦彦、陈子壮、瞿式耜、何腾蛟、李成梁等，康熙时之朱一贵等，乾隆时之林爽文等，嘉庆时之刘松、聂杰人、齐王氏、林清、李文成等，道光咸丰时之洪秀全、

杨秀清等，皆树反清复明之旗帜，是为单纯的民族主义，又可谓之一民主义。

二民主义时期 甲午中日之役既败，孙总理于是年秋冬间创设兴中会，其入会誓词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又于选举会长时，名会长曰“伯理玺天德”。此职系英文 President 之译音，即合众民主国之大总统也。吾国革命党之具有民权主义的宗旨者，以此为滥觞。自兴中会成立后，继起之他派革命党，如日知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咸以提倡共和政体为号召，非复如昔日旧式革命党宗旨之单纯矣。故自乙未兴中会发起以至乙巳（一九〇五）同盟会成立，此十年间可以谓之二民主义时期。

三民主义时期 世人皆知三民主义为中国同盟会所始创，然在乙巳七月孙总理联合各派革命党组织此会时，其誓章上尚未明白规定三民主义之名词也。同盟会之誓词曰：“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天运某年某月某日”云云。当第一日假座东京赤阪区桧町内田良平宅开会时，孙总理提议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之十六字为誓约。在座会员有数人对于“平均地权”有疑义要求取消，孙总理乃起而演讲世界各国社会革命之历史及其趋势。谓：“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者，即为社会问题，实较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同一重要。我国虽因工商业尚未发达，而社会纠纷不多，但为未雨绸缪计，不可不杜渐防微，以谋人民全体之福利。欲解决社会问题，则平均地权之方法，乃实行之第一步。本会系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立志远大，必须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等语。剖切解释，至一小时之久，众始无言。故以同盟会誓章而言，则平均地权四字，只是民生主义之一部，不得谓平均地权即民生主义也。同盟会成立后五月，即乙巳十一月二十一日，其宣传机关之东京《民报》出版发刊词为孙总理手撰，文中首举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三大主义为纲领，是为此三大主义并列之嚆矢。而民生主义四字亦即发见于此时。在《民报》出版以前，世界上固无民生主义之新名词也。从同盟会成立以迄今日，可称为三民主义时期。

孙总理之社会思想 孙总理在乙未（一八九五）九月广州失败之后，即漫游欧美诸国，考察政治社会各种状况，对于社会问题尤热心研究。在己亥庚子间（一八九九至一九〇〇）与章太炎、梁启超及留东学界之余等晤谈时，恒以我国未来之社会问题及土地问题为资料。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土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其对于欧美学者之经济思想，最服膺者为亨利佐治（Henry George）之单税论，即平均地权之思想所由起也。《民报》初期尝命廖仲恺将亨利佐治之名著《进步与贫乏》（Progressan Poverty）译登报端，廖仅译数千字而止。考平均地权之名词，虽载于同盟会誓章，惟此名词之首次发见，则在于同盟会成立前一年甲辰（一九〇四）孙总理手订之美洲致公堂

新章。盖当时致公堂尝为跨籍保皇会之会员盗据数年。及孙总理到美，该堂职员黄三德等乃将跨党者驱逐，并请孙总理修订章程，借资整理。孙总理乃为编定规程八十条。其第二条曰：“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与同盟会誓约不差一字。可知孙总理怀此思想已有多载矣。又乙巳夏孙总理在欧洲收揽我国留比、德、法各国学生入党，其誓约亦与致公堂规程相同。及同盟会兴而孙总理此种理想始渐见诸文字。革命党青年之注意研究社会民生问题者，亦自兹始。

三民主义简称之由来 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之代名词。此简称之名词，始用于香港《中国日报》。盖《民报》出版后，南方各省由《中国日报》任总代理。余时任《中国报》社长，以在广告上介绍《民报》总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冗长不便，乃简略称之曰三民主义，以资号召。数月以后，海内外各党报相率从之，遂成为一普通名词。犹记丙午（一九〇六）春香港各界人士开陈天华追悼会于杏花楼，余撰联挽之曰：“生平得爱友二人，星台（天华字）殉国，近午（黄兴字）何之？可叹吾党英才又弱一个；灵爽凭健儿五百，公武（南洋同志通函向伟称孙文二字曰公武）鸣钟，自由不死，誓覆虏酋政府实践三民。”联为陈少白代书。余作此联时，海内外同志尚未通用此简称之名词也。胡汉民于丁未（一九〇七）春自日本莅香港，屡向余言，民族民权民生之三大主义，不当以简称之三民二字代之，且指为不通。及己酉（一九〇九）从南洋归港，亦常以此为谈柄。然是时此名词在世上已成确定不易，不独各种刊物通用之，即孙总理自亦以为适合而采用之焉。

共进会之誓约 辛亥武昌起义，以共进会为最有力，惟该会之誓约系“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人权”之十六字，与同盟会誓约所不同者只差一字，世人多引以为异。考共进会之发起人张伯祥、余晋城、吴祥慈、邓文辉、居正、焦达峰、刘公、孙武等皆同盟会会员，其所以别树一帜另立小组者，即为利便联络国内各省秘密会党之故，且以各派秘密会党大都知识幼稚，所施与之宣传资料，除种族主义外，最高限度只能添入民权思想，若语以奥妙幽深之土地问题，殊非彼等所能了解。故特将誓约内地权之“地”字改作“人”字，此其修改誓约采用二民主义之苦衷也。及民国肇建，共进会解散，同盟会亦改组为国民党。从民二七月讨袁至今，中间经过护国护法驱龙逐莫讨陈北伐诸役，三民主义之推行，如日经天，行将化被全球，无远弗届，是所望于三民主义之真信徒。

中国同盟会史略

同盟会成立前之革命党 吾国革命党人之提倡逐满建国，始于兴中会，然兴中会自庚子（一九〇〇年）秋惠州革命军之败挫，及广州史坚如之谋炸抚署二役以后，党中健将如杨衢云、史坚如、郑士良、黄福诸人先后斲丧，元气实力为之大伤。故从庚子秋以至乙巳（一九〇五年）夏之五年间，兴中会实无如何之军事动作可言。中间虽有壬寅（一九〇二年）除夕洪全福谋在广州之大举，其主动人谢纘泰、李纪堂均属兴中会员，然究非出于兴中会本部所策动，不能谓与兴中会有深切关系也。惟我国之留东学界及内地志士，自经庚子惠州革命及唐才常汉口自立两役之怒潮所激荡，影响之巨，得未曾有。计在此时期内国内外志士之组织革命团体者，辛丑年（一九〇一年）有横滨郑贯一、王宠惠、冯自由、冯斯栾等之广东独立协会，壬寅年有东京章炳麟、秦力山等之支那亡国纪念会，及秦毓鎰、董鸿祎、周宏业等之青年会，上海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等之中国教育会，癸卯年（一九〇三年）有东京叶澜、秦毓鎰、程家桢等之军国民教育会，及上海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等之爱国学社，云南临安周云祥等之保滇会，甲辰年（一九〇四年）有武昌胡兰亭、黄华亭、刘静庵之日知会，及长沙黄軫、马福益、刘揆一等之华兴会及同仇会，上海龚宝铨、蔡元培、陶成章之光复会。此外各地出版之革命书报，东京有《译书汇编》、《国民报》、《湖北学生界》、《汉声》、《浙江潮》、《江苏》、《湖南游学译编》、《二十世纪之支那》、《太平天国战史》诸种；横滨有《开智录》、《新广东》诸种；上海有《苏报》、《国民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章炳麟《驳康有为政见书》、《革命军》、《三十三年落花梦》、《黄帝魂》、《清秘史》诸种；香港有《世界公益报》及《广东日报》，檀香山有《檀山新报》及《民生日报》；旧金山有《大同日报》；新加坡有《图南日报》；缅甸有《仰光新报》，蓬蓬勃勃，可谓一时之盛。就中各革命团体至乙巳春夏间尚保全相当势力者，为湖北之日知会，及湖南之华兴会，江、浙、皖之光复会。时距长沙举义失败及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之狱未远，各派首领多避地日本，共图卷土重来之计。顾以各派势均力敌，未能集中力量，合组一大团体，以与清政府抗衡，识者憾焉。

惠州革命失败后之孙总理 孙总理自庚子惠州革命一役失败之后，时往来欧美南洋各地，向侨商及学生鼓吹民族主义，以培养革命种子，且屡与各国政党有力者磋商协助中国革命之方法。壬寅冬之游越南，癸卯秋之游檀岛，甲辰春之游

美国，乙巳春之游欧洲，均收效甚宏。当癸卯夏由越南抵日时，曾与闽粤同志十余人秘密组织革命军事学校于东京青山，用意至为远大。詎孙总理离日后数月，该校旋以內哄解散。总理时在檀岛闻冯自由报告此事，为之惋惜不置。时冯自由任香港《中国日报》及美国旧金山《大同日报》之驻东记者，总理与留东同志传达消息，概由冯任之。乙巳夏冯得总理在欧洲德、法、比、英四国成立新革命团体及不日东渡之通信，即以告留东各省同志，莫不欣喜若狂。及是岁六月中旬，舟抵横滨，东京同志来商进取者大不乏人。时各省同志中负人望者，以华兴会领袖黄兴（黄轸改名）为最，孙总理前尚未与之认识，至是始由日人宫崎寅藏介绍黄及宋教仁、陈天华等数人与总理相见于东京风乐园。黄等对总理备致倾慕，并愿率领华兴会全体会员与总理合组新革命团体。总理深表赞同。于是决定是月下旬某日假座东京赤坂区桧町黑龙会会所为第一次开会地点。孙黄各自通知所识各省同志届时赴会，此同盟会成立前之大概情形也。按同盟会第一次开会时日，确为乙巳六月下旬，惟是日为下旬何日，余已忘之。据亡友田桐谓是六月二十四日，亦有谓二十九日者，以无文证，未敢武断。查第一次莅会同志现今生存者尚有十数人，若有人能提出文证以确定是日为何日者，于建国史料价值之增加，决非浅鲜。

同盟会之第一次开会 及留东各省革命党同志第一次集会期届，兴中会员孙总理、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自横滨莅会，各省同志之由黄兴、宋教仁、程家桢等通知到会者，有张继、陈天华、田桐、董修武、邓家彦、吴春暘、康宝忠、朱炳麟、匡一、鲁鱼、孙元、权道涵、张我华、于德坤诸人。由冯自由通知到会者，有马君武、何天炯、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刘道一、曹亚伯、蒋尊簋、但焘、时功玖、谢良牧诸人。由胡毅生带领到会者，有汪兆铭、朱大符、李文范、张树枏、古应芬、金卓、杜之秋、姚礼修、张树棠诸人。由宫崎寅藏通知到会者，有内田良平、末永节诸人。计莅会六十余人中，与孙总理属旧相识者，只程家桢、马君武、张继、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冯自由、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等十人，其余皆新同志也。时甘肃尚未派学生游学，故是日到场者有十七省人，独甘肃一省缺席耳。众推孙总理为主席，于是总理详言全国革命党各派应合组新团体以从事讨虏工作之必要。众无异议。继复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时有主张用对满同盟会名义者，亦有谓本会属秘密性质，不必明用革命二字者。再四讨论，卒从后说，确定名称为中国同盟会。总理更提议本会宗旨拟规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事为纲领。有数人于平均地权一节略有疑问，总理乃历举世界革命之趋势及当今社会民生问题之重要，谓平均地权即解决社会问题之第一步方法，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当专向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必须并将来最大困难之社会问题亦连带解决之，庶可建设一世界最良善富强之国家云云。演讲约一时许，众大鼓掌。曹亚伯首言我凭良心签名，全场无异议。黄兴倡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众咸举手赞成。即由总理拟

一盟书方式，经众推黄兴、陈天华二人审定，词句如下：

联盟人 省 县人
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
此任众处罚
天运乙巳年 月 日 中国同盟会会员

会众签署盟书后，总理遂领导各人同举右手向天宣誓如礼。誓毕，总理谓在干事会未成立前，众人盟书暂由我保管，我之盟书则请诸君举一人保管，众推黄兴任之。旋总理至隔室分别授会员以同志相见之握手暗号，及三种秘密口号。一曰汉人，二曰中国物事，三曰天下事。随与各会员一一行新握手礼，欣然道喜曰：“为君等庆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语毕，室之后部木板卒然坍倒，声如裂帛。总理曰，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众大鼓掌欢呼。众复推定马君武、陈天华、宋教仁、汪兆铭为会章起草员，约于下次开会时提出。

同盟会之第二次成立会 自第一次开会后，留东各省学生逐日加盟者络绎不绝。是年七月十三日留学界开大会欢迎孙总理于曲町区富士见楼，莅会者千三百余人，后至者多不得入。留学界公然开大会欢迎革命党首领，前未之闻也，是月中旬同盟会复假赤阪区霞关子爵阪本金弥邸开第二次正式成立大会，阪本邸与清公使馆密迹，会员颇有误投清使馆者。是日莅会人数三百余人，首通过会章，次选举干事。会章采三权分立制，各部干事，除总理一职已于第一次开会公推外，余依会章分别票选，兹录述所通过会章内之组织大略及各部，前后职员姓名如次：

一、执行部 其下分列六部

庶务部 此部职权最重要，总理他适时，以庶务总干事代行一切，前后任之者凡五人：首任为黄兴；兴他适，张继继之；继他适，朱炳麟继之；炳麟他适，孙毓筠继之；毓筠他适，刘揆一继之。揆一任此最久，至辛亥革命为止。

书记部 首任马君武陈天华，后以君武赴西京大学，天华旋蹈海死，改任田桐、胡衍鸿继，又添入但焘李肇甫。

内务部 首任朱炳麟，继匡一，其后事权渐集中于庶务部，此部形同虚设。

外务部 程家桢、廖仲恺主之，后家桢赴北京活动，仲恺亦回国。

会计部 首任刘维焘，维焘以入联队未就职，谢良牧继之，良牧归国，何天炯继之。

总理部 首任谷思慎，思慎他适，程克继之，后此部亦同虚设。

二、司法部 判事长，首任邓家彦。判事张继、何天瀚，检事宋教仁。此部以任事诸人先后归国，一年后渐无形取消。

三、评议部 议长汪兆铭，议员田桐、曹亚伯、冯自由、梁慕光、胡衍鸿、

董修武、范治煥、张树枏、熊克武、周来苏、但懋辛、朱大符、吴崐、胡瑛、康宝忠、吴鼎昌、于德坤、王琦。此部以各议员先后归国者众，一年后渐同虚设。

此外留东各省会员，亦各就奉省会员中举出一人为本省分会长，专司本省留学界之人会主盟事务，兹录各省分会长前后姓名如下：

直隶：张继，继他适，杜羲继。

河南：杜潜，继曾昭文。

湖北：时功玖，继张防，继陈镇藩。

湖南：仇式匡，继黄兴，继刘揆一。

广东：何天瀚，继何天炯。

四川：丁厚扶，继张治祥，继黄树中。

陕西：康宝忠，继赵世钰。

广西：刘崛，继卢汝翼，继曾彦。

山西：王荫藩，继荣福桐，继荣炳。

江苏：高剑公，继章梓，继陈剑虹，继张鲁。

山东：徐镜心，继丁维汾。

安徽：吴春暘，继高荫祖。

上海：蔡元培。

江西：钟振川，继张世膺。

福建：林时埭。

贵州：平刚。

云南：吕志伊。

浙江：秋瑾，继陶成章。

同盟会之国内外分会 同盟会既成立，孙总理于是年八月十日首派冯自由、李自重至香港组织香港澳门及广州各地分会，次依吴春暘之推荐，派蔡元培任上海分会长。其他各省区亦先后派员组织分会或相当机关。国外分会成立者，以欧洲比、法、德、英四国留学界为最早，盖当是年春总理游欧时，先已成立革命党团，仅名称未定耳。越南各埠分会成立于乙巳年冬，以河内为总汇。南洋英荷两属各分会最先成立者为新加坡，以总理居其地久，且属交通孔道，各埠分会均附属之。至戊申年（一九〇八年）秋，更扩充为南洋支部，以胡汉民任支部长。暹罗分会在南洋组织最晚，至戊申年冬孙总理亲往联络始告成立。香港分会兼任军务，责任最重，自冯自由任分会长后，丁未年四月潮州黄冈及惠州七女湖之发难，五月刘思复在广州谋炸李准之经营，九月惠州汕尾运械之布置，皆香港分会直接指挥之。及己酉年（一九〇九年）冬，胡汉民自南洋莅港，始别组南方支

部，将军务党务划分为二，以后军务及南方各省党务由南方支部主持之，香港分会则专任香港党务。故庚戌新正广州新军之役乃发动于南方支部，香港分会不与焉。美国分会成立于庚戌正月初，由香港分会派李是男至旧金山负责筹备，至孙总理亲游北美始举行开幕式。加拿大分会亦成立于庚戌年（一九一〇）冬，盖是年夏冯自由应温高华埠《大汉日报》之聘，乃著手组织。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之役，以加拿大党人捐款为最巨，此举大有力焉。菲律宾分会成立于辛亥（一九一一）春夏间，是为香港会员李其至小吕宋号召该处同志组织者。其他澳洲及南美中美各国华侨有志者，虽与国内同盟会员时通消息，助饷不少，然以乏人主持之故，至辛亥革命以前，仍未有分会之组织也。及辛亥春，黄兴自香港派谭人凤至沪，与宋教仁、陈其美等组织中中部同盟会，策动长江沿岸诸省革命工作，是年八月遂有武昌义师之崛起。

同盟会机关之《民报》 同盟会初拟发刊一机关杂志，为宣传主义之木铎，宋教仁、田桐、白逾恒等愿取消所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月刊，与新党报合并，众赞成之。并定名《民报》。其第一号于是年十月二十一日在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出版。发刊词出孙总理手撰，文中首揭肇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极为透辟，是为此三大主义名词之新发现，盖以前世人从未闻有民生主义之新名词也。是报先后任撰述者，有陈天华、汪兆铭、胡衍鸿、朱大符、宋教仁、章炳麟、刘光汉、但焘、黄侃、汤增璧、汪东诸人；先后充庶务干事者，有董修武、何天炯、黄树中、邓慕韩、吴崐、鲁鱼、张我华诸人。出版未一月，值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留学界大愤激，陈天华于十一月十二日愤投大森海湾自杀。以是同盟会员中亦分归国办学及忍辱留学之二派。结果卒为后说所胜。《民报》因学潮延期一月，第二号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始继续出版。兹录其第一号发刊词原文如次：

近时杂志之作者亦夥矣，誇词以为美，嚣听而无所终，摘植索涂，不获则反复其词而自惑，求其斟时蔽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议，远瞩将来者乎。夫缮群之道，与群俱进，而择别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历史既与彼群殊，则所以掖而进之之阶级，不无先后进止之别。由之不貳，此所以为舆论之母也。予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美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皆治化焉。其他施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

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嗟乎，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焦，惟企强中国以媲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沈梦不起，万事堕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且人群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事半功倍，良誇非慢。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实行也近，吾于《民报》之出世视之。

《民报》出版后之经过 《民报》出版至第五号，适章炳麟于丙午年（一九〇六）六月二十九日在上海监禁期满出狱，同盟会本部预派时功玖、龚练百、仇亮、胡国梁等至沪欢迎。《民报》自第六号起，改推炳麟为总编辑。七月十五日留学界开大会于神田锦辉馆欢迎之。十月二十日《民报》同人更开一周年纪念会于锦辉馆，莅场者六千人，为留学界空前之盛会。黄兴主席，章炳麟读祝词，其词曰：

我汉族昆弟所作《民报》，倏载至今，适盈一岁。以皇祖轩辕之灵，洋溢八表，方行无闰。自兹以后，惟不懈益厉，为民斗杓，以起征胡之铙吹，流大汉之天声，白日有灭，星球有尽，种族神灵，远大无极。敢昭告于尔丕显皇祖轩辕烈祖金天、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夏、商、周、秦、汉、新魏、晋、宋、齐、梁、陈、隋、唐、梁、周、宋、明、延平、太平之明王圣帝，相我子孙，宣扬国光，昭徼民听。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以底虏酋爱新觉罗氏之命，扫除腥膻，建立民国，家给人寿，四裔来享。呜呼，发扬蹈厉之音作，而民兴起，我先皇亦永有依归。《民报》万岁，汉族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散会时，各馈《民报》纪念特刊“天讨”券一枚。是日孙总理演说词，始阐明民生主义及五权宪法。梁启超因此在《新民丛报》对民生主义大肆抨击。《民报》与之笔战经年，至十九号乃止。及戊申年七月刊至第二十四号，适清政府谋与美国缔结盟约，同时驻日清公使乘机向日政府交涉，以封禁《民报》为

请。日政府虑中美同盟之成，足以妨害己国利权，竟从清吏所求以媚之，遂强加《民报》以提倡无政府主义扰乱社会治安等罪名，下令封禁，并没收是期刊物。黄兴、章炳麟、宋教仁等乃委托宫崎寅藏代延律师抗争，不胜，因谋将《民报》迁往美国出版。黄、章、宋三人赴美护照已由美人宣教师某设法取得，旋因有他项计划，终不果行。《民报》停刊后二年，胡汉民、汪精卫等于己酉年（一九〇九）十二月，以法国巴黎濮倡街四号总发行所名义继续出版，实则仍在日本秘密印刷，仅出两期，至第二十六号而止。

同盟会成立后之经过 同盟会成立后一年，孙总理、黄兴、章炳麟等更编制革命方略，由本部颁布各省实行员，使于义师发动时有所准绳。由是国内各省及海外各埠机关林立，人心归附，如水之就下，党势日见发展。清廷大为恐慌，乃令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政府交涉，要求驱逐孙总理出境。日政府为取媚清酋计，卒密令总理离日。总理不得已从之。遂于丁未正月二十日赴南洋筹划两粤军事。未几镇南关、河口相继发难，留东党员纷纷归国。是时同盟本部之职权，事实上实随总理之所在地为转移，而总理之所在地，即为革命军事大本营之所在地。总理于丁未春至戊申春驻节河内，及戊申己酉两年驻节新加坡，此两地即无异革命军大本营之所在地也。己酉秋总理由新加坡迁居槟榔屿，旋赴美国。庚戌正月在旧金山成立驻美同盟会，始将入会誓词改作“驱除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之十八字，然此项新誓词仅于美国一隅用之，国内外各地党部固始终未得接修改誓词之通告也。是岁春总理自美抵日本，为清代理公使吴振麟所知，因请日政府拒绝总理入境，故总理到东未久，日政府即下逐客令。总理不得已仍渡南洋，旋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诸人至槟榔屿，规划广州大举。定策后，总理乃远游美国及加拿大，与冯自由李是男等等筹集饷糈，是为辛亥三月黄花岗之役。是役失败后，总理复至旧金山召集致公堂职员及同盟会会员合组洪门筹饷局，以为筹集义款之总枢纽，此举于辛亥各省义师之发动，及广州轰炸事件之迭起，至有力焉。在庚戌辛亥之二年间，东京同盟会本部之重要职员仍为刘揆一、何天炯诸人，及武昌革命军起，各省踵之。留东党人乃纷纷内渡，参加实行工作，而民国遂以告成。于是乎同盟会党纲之三大主义，形式上乃毕其二焉。

水牛将军田桐

田桐字梓琴，号恨海，别署玄玄，湖北蕲阳人。弱冠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博学强记，尤工书法，崭然露头角。癸卯（一九〇三年）冬东渡留学，结识皖人

程家桢（韵笙）、燕人张继（溥泉）等，益倾心民族主义。翌年夏秋之交，与同乡刘炳标（仲文）、白逾桓（楚香）、鲁鱼（雯青）诸人创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发扬革命真理，及反抗日人占据辽东，异常尽力。是岁冬黄克强、刘揆一（霖生）等在长沙倡义失败，陈天华（星台）、宋教仁（逖初）相继莅日本，均加入《二十世纪之支那》社，而报务益发展焉。乙巳（一九〇五年）夏六月孙总理自欧抵横滨，号召留学界之有志者组织中国同盟会，开第一次成立会于东京赤阪区松町内田良平寓宅，宣誓入会者六十余人，田其一人也。未几同盟会机关之《民报》出世，《二十世纪之支那》社与之合并，《民报》撰文有署名恨海者，即田别号也。又田以《民报》偏重法理考据，不适于普通社会，乃与高旭（天梅）、雷铁崖（昭圣）、柳弃疾（亚子）等，另创《复报》以应之。所载田诗有警句云：“大哭一声黄帝墓，儿孙这样怎安排？”是为近代白话诗之滥觞。又编集明遗老所记佚事及清代严禁各书，名曰《亡国惨记》。章太炎题词曰：“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除，汉道将何冀！”出版后风行一时。丙午（一九〇六年）某日，田与章太炎、林时壘、胡汉民等在牛込区筑土八幡町廿一番地孙总理寓所闲谈，偶及田单驱火牛破燕事。田曰：“田单在古代用火牛，吾谓今人可用水牛。若革命军举事，清军有马队，而革命军无之，吾人大可预训练水牛队以临阵，必可制胜”云云。章太炎曰：“乃祖用火牛而后人更发明水牛战术，可谓后先媲美。”众大笑，自是人咸以水牛将军称之。丁未（一九〇七年）春，革党有事于两粤，田偕湘人柳聘依（扬谷）至香港参与机要。是年十月孙总理在越南河内有攻取桂边镇南关之计划，田与谭人凤（树屏）、何克夫、谭剑英等乘轮赴海防助之，冯自由托其携带革命军债券三箱交孙总理，诿此项债券竟为海防法国关吏扣留，田等亦以是被禁入越境，后田改赴南洋，迭任荷属爪哇华侨学校教员及新加坡《中兴日报》记者，尝与保皇党之《总汇报》大开笔战。撰稿咸署名恨海二字，恨海之名，由是大著，《总汇报》尝戏撰“药石（即居正在报上之笔名）无灵精卫焉能填恨海”一联以嘲之。戊申（一九〇八年）云南河口革命军败挫，革党在南洋基础渐次动摇，《中兴报》因而停刊，田乃主张中央革命之议，谓稽诸各国革命史，各国革命党无不向中央政府进攻，卒成大业，吾党历年均在海疆各省计划举事，实不足以制虏之死命，此后吾党分一部党员专在京畿一带从事活动，庶可收擒贼擒王之实效等语，众皆壮之。田于是变姓名归国，与宋教仁、白逾桓诸人分头进行，北方民党多受其部署。旋偕景定成创刊《国光新闻》于北京，以倡导民权立宪闻于时，满官僚多畏惮之。是报至民国建元益发光焰，至民二袁世凯解散国民党，田等先后避难南下，始告停刊。民二田当选众议院议员，及国会先后三次非法解散（一、民二袁世凯，二、民六黎元洪，三、民十三段祺瑞），田均奔走南北，倡导护法，三十余年如一日。民三孙总理在东京改组中华革命党，旧同盟会员反对总理毁党造党之议者，颇不乏人。独田与陈其美、居正等率先署名誓约，毫不踌躇。民十三冬，孙总理养痾北平，各省党

员先后北上者络绎于道，是时民党内部为容共事件发生极大纠纷，田惘然忧之，乃于民十四元旦，约冯自由、刘揆一、刘成禺、谢良牧、王斧、丁维汾、于洪起、周震鳞、李煜瀛、王秉谦、蒋尊簋、李根源等发起民前同盟旧友新年恳亲会于北平中央公园。届时莅会者二百数十人，同拍照以志纪念，甚盛事也。国民革命军既统一全国，田被征为国民政府委员。民十八以其一生研究所得，并综合古今中外盛衰兴亡之道，著为一策，题曰《太平策》，即在其独力创办之《太平》杂志逐期发表之。是书内容所列举者，有建都篇第一、选举篇第二、中央篇上（原治）第三、中央篇中（统治）第四、中央篇下（分治）第五、地方篇上（总则）第六、地方篇中（诸制）第七、地方篇下（区划）第八、兵制篇上（兵制屯田）第九、兵制篇下（处兵）第十、河渠篇上（导河）第十一、河渠篇中（导淮）第十二、河渠篇下（北方诸水）第十三、考试篇第十四、盐政篇第十五、学制篇第十六，诸篇之后，附以个人研究有素之宪法草案。观其章目，足知是著结构之雄伟矣。是刊仅出至第三号，而田已归道山，遗稿竟未能续刊，惜哉。时在民十九年七月二日，春秋五十有二。

按乙巳中国同盟会成立之日，即为中国革命党人各省各派大团结之日，于中华民国之缔造，关系最巨。凡属民党咸欲审定此会成立日期，以志纪念。余等在场诸老友曾互相查询，各人只能记忆是月为乙巳七月，而不能定为某日，独田则毅然确定为阴历六月二十四日。余以缺乏文证，至今未敢从同。甚望在场诸老友能搜罗当日盟书刊物等件，借供史料之考证，至所欣幸。

田桐事略补述

田桐，字梓琴，别号玄玄居士，湖北蕲春县人。父又青，为名诸生，在乡设塾授徒，从游者众。生四子，梓琴其长也。幼而秉承父训，于诸子百家及唐宋以来名家文集，靡不兼综博览。稍长，文思益进，惟于八股时文，则鄙弃弗置。尝应州课，试后，父索观其文，不中当时律令，大怒笞之。揭晓竟列案首，亲友咸为称异。少好游，弱冠尝孑身登庐山，遍览诸名胜，后乃读书白鹿洞。同学迹之，辄不知所往。年二十二补县学生。时鄂省学风渐趋维新，乃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崭然露头角。同学中有桃源宋教仁者，少负奇气，议论纵横。梓琴与之志同道合，遂共昌言排满。鄂吏闻之大骇，因有查究校中生徒从严惩办之议。监督纪巨维，纪晓岚之远孙也，夙赏识梓琴才，惧不能庇，讽令他适避祸。梓琴遂于癸卯岁（一九〇三年）东渡日本求学，与黄兴、曹亚伯、陈天华、白逾桓、宋

教仁、刘揆一等交最密。反满革命之志，由是益坚。旋与刘仲文、白逾桓、鲁鱼、宋教仁等创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鼓吹民族主义，不遗余力。出版达三期，以同志蔡汇东有《评论辽东半岛》文，触日政府忌，没其书，严究主名。梓琴与教仁几被逮，稍间乃解。

乙巳（一九〇五年）夏六月，孙总理自欧洲抵横滨，梓琴偕黄兴、宋教仁、程家桢等数人往谒之，大倾服。旋应总理召，开各省革命同志联合大会于东京赤坂区桧町内田良平寓宅，届期遂邀《二十世纪之支那》诸同志俱往。是日莅会宣誓者五十余人，决定中国同盟会之会名及盟书词句，一致推举中山先生为总理。十日后复假灵南坂子爵坂本金弥邸开成立大会，选举执行评议执法三部干事。梓琴被举为评议员，兼总理书记。是岁十月，同盟会之机关《民报》出版，梓琴著作颇多，文有署名恨海者是也。时清廷以留日学生多趋向革命，飭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政府商谈约束留学生方法。日政府徇其请，特颁支那留学生取缔规则以防之。诸生大哗。同志陈天华因之蹈海死。梓琴亦聚有志者多人于弘文学院，主罢课，所在和之。清廷据杨枢报告，诏捕激烈者十八人。梓琴与焉。其中恇怯者多资金帛走京师求赦免。梓琴独泰然置之。丙午（一九〇六年），复与同志雷铁崖、高天梅、柳亚子诸人创刊《复报》月刊，是报文字浅显，适于通俗社会，故风行一时。又集明末遗老野史，成《亡国惨记》，书出人心益奋。

丁未（一九〇七年）春，孙总理得香港冯自由电，称许雪秋在潮州筹备举事已臻成熟，请派留东同志回国相助。遂偕胡汉民、谢良牧、黎仲实、胡毅生诸人离日南下。后数月，梓琴亦至香港，拟入内地参加实行工作。时惠潮两地军事已先后败挫，总理方驻河内，谋在钦廉及广西镇南关继续大举，函邀各地同志赴越南集合。梓琴遂偕醴陵谭人凤、连州何克夫、柱平谭剑英、湘乡陈树人等应召。濒行时，香港同盟会分会长冯自由托其携带革命军用券二大箱交呈总理。舟抵海防，为法国关吏发觉，各人均被扣留警署。即由海防殷商刘岐山保出候讯。总理乃向越南总督交涉释放。结果越督只允将债券给还总理，而携券者，则以清吏抗议之故，被判出境。梓琴居海防迭接革命军占领镇南关及孙黄诸人同赴前敌消息。以讼事未解，无从参加，因之焦急万分。及离越仍返香港。旋奉总理命，遣赴新加坡主持《中兴日报》笔政，与保皇党之南洋《总汇报》争论革命民政与君主立宪得失。文战经年，大受英荷两属侨胞之欢迎。戊申（一九〇八年）某月，康徒徐勤择日在新加坡振武善社演讲禁烟历史。梓琴知其必借此提倡君宪，遂偕孙德彰（总理之兄）、邓子瑜诸人赴会，拟再师东京革命党人大闹政闻社之故智，有以惩创之。果不出所料，徐勤于发言间，竟越出题旨，盛赞清廷宣布限期立宪之德政。梓琴闻言，义愤填膺，大呼曰打。孙德彰等数十人奔而前，徐勤急反身走得脱，保皇党徒由是气益馁。

孙总理自丁未十月镇南关一役失败之后，以越南政府徇清吏请求，讽使离

境。故自河内迁地新加坡，寓东陵胡节律——一号。邻舍有杨圻号云史者，常熟人，清领事署之副领事也，与梓琴及当地同盟会正副会长陈楚楠、张永福等以邻居故，颇相认识，与梓琴尤一见如故。时粤督张人骏适密奉廷寄遣凶徒至南洋谋刺总理。清总领事以杨所居与总理寓所密迩，乃使刺客寄寓杨宅乘便行事。杨知清祚将终，对于清吏阴谋，极不赞同。遂密告梓琴，便通知总理预为防范。且向刺客晓示种种利害，刺客大为感动，竟放弃原定计划掉头他去。总理因得安然无事。此项义举，在杨固属深明顺逆，梓琴亦大有力焉。

戊申庚戌两年间（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梓琴应荷属侨商之约，赴三宝壟、坤甸、泗水各地设报馆，兴学校，深得各界信仰。尝在泗水《南侨日报》转载日人大越英三郎所著《南国记》，尽发荷人虐待华侨惨状。荷政府禁之不可，乃勒令出境，侨商多挥涕相送，如失师保。时距广州黄花岗一役未远，梓琴鉴于历年党人在边区各省举事之失败，乃主张进行中央革命擒贼擒王之议。黄兴诸人莫不壮之。梓琴于是变姓名北上，与宋教仁、程家桢、白逾桓等分头进行。既抵燕京，乃与同志发刊《国光新闻》为言论机关，表面上以倡导立宪排斥官僚政治为号召，密与井勿幕、续西峰、景定成、熊克武诸人联络北方豪俊以袭据京师。屡次企图，均以清吏戒备严密不果。及辛亥秋间，闻党人运动湖北新军之计划已臻成熟，亟拟回鄂督促进行，正摒挡间，而武昌义师已起，遂星夜买舟南下，及抵沪，则谭人凤、宋教仁、居正等已先期赴鄂矣。

革命军既光复武昌，以党中著名首领均未到，乃推清协统黎元洪为都督。黎与诸降将咸意存观望，故士气不振。梓琴至沪时，黄兴亦自香港至，遂随黄赴鄂。黄被任为革命军总司令，梓琴为随军参谋。初数次战颇利，及冯国璋尽率其精锐来攻，汉阳势危，梓琴献策，尽取汉阳兵工厂钢板置濠堑间，以御铙弹，得相持至月余始陷。黄兴事后语人曰：“吾始以梓琴为方士，今乃知其智计，亦大过人也。”汉阳既失，黄兴乃就江宁求援，梓琴亦随之行。

民元，南京参议院成立，梓琴任临时参议院议员。及南北统一，乃北上复办《国光新报》，日为文斥袁政府阙失，挝发隐谋，不少容借。袁世凯深衔之，使农商次长张仲华持十万元支票来社，商请该报转移论调。梓琴令经理李基鸿却不受，闻者咸为之危。一日铙发于寝室屋巅，梓琴以外出得免。或劝其知所戒备，则笑谢曰：“死生有命，吾何惧焉！”是岁，宋教仁遇刺于上海车站，国人多疑为袁氏主使，人心惶惶。孙总理不欲借此与袁破裂，毅然北上，表示全国统一之至诚。梓琴遂随总理游太原，沿途宣扬德音，听者为动。民二，正式国会选举，复由鄂人举充众议院议员。开会日，袁世凯令汤化龙、梁士诒、王赓诸人组织御用党，以妨害议宪。复私借外债以戕戮异己。梓琴知袁包藏祸心，势将摇动国本，乃南下谒孙总理，力主兴兵讨贼之议。总理早有是意，以民党诸都督多乏勇气，一时未敢轻举。一日，总理招民党各将领于自宅，商讨进行方略。黄兴等多

主持重。梓琴起而怒骂曰，是不足与有为也。乃间关至淮上，入张汇滔军，劝其称兵独立。未几，李烈钧、柏文蔚各在赣皖发难，黄兴亦亲赴宁举兵。时袁氏已先阴为备，使冯国璋进踞浦口，李纯下九江，倪嗣冲奔命淮北。民党诸军以准备未周，缺乏联络，先后不支。梓琴时参淮军幕，乃亡命走日本。

民三，孙总理愤癸卯一役由于党人不用命，及团体散漫，宣布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各省党人之曾任军政要职者，以誓约上有服从总理字样及须盖印指模，多表示异议。独梓琴及陈其美、居正、冯自由等少数人率先赞成之。民五春，袁氏称帝，总理令陈其美、居正、邓铿等在海疆各省起兵讨之。梓琴亦被委充中华革命军湖北总司令。及抵鄂，则起兵者已十数辈。袁将王占元闻之大怖。伏不出，袁死，黎元洪继，乃解兵复入国会，于时政多所献替，而倡废盐引以利民一事，尤反覆不厌，格于众议未行。时欧战方酣，国务总理段祺瑞欲开边衅以蓄众，向国会提出参战案。民党议员咸反对之，梓琴坚持尤力。段大怒，令所部组织公民团包围两院，断绝供给以胁之，继又授意督军团，使联名电请解散国会。总统黎元洪卒从其请，遽于民六年六月十二日下令解散。梓琴遂偕各议员南下，开国会非常会议于广州，选举孙总理为大元帅。称护法政府焉。

民九，岑春煊、陆荣廷、莫荣新等与北方军阀私订和议，牺牲护法。孙总理命陈炯明自闽南旋师讨平之，旋设中国国民党本部办事处于广州，委梓琴为党务部长。嗣兴师北伐，复委为大本营宣传处长。时陈炯明已通款于吴佩孚，遽于六月十六日举兵叛变，且令叛将叶举等逮捕韶关大本营职员，变兵搜查韶关行营时，指名严索田桐。梓琴厉声应之曰，老子即是田桐。遂就捕。有书一巨篋，叱使变兵负之，或迟疑，乃责之曰，尔等捕我，即应为我负物。变兵笑相顾曰，田先生真倔强人也。及解送至广州，炯明不欲开罪他省民党，遂令释之。未几，吴佩孚已起北方，拥黎元洪复总统任，召集旧国会，梓琴偕民党诸议员重北上列席，于制宪问题，多所论议。十二年夏，曹锟谋以金钱贿选总统。梓琴语诸议员曰，君等欲贪利受污，则乾坤正气几乎息矣。应如沪，议员之拒贿者亦相继至，假上海湖北会馆开会，旋以经费不足散，梓琴仍赴粤从孙总理。

时总理方驻粤，组织大元帅府，见梓琴来，立委为大本营参议，属以改组国民党事。梓琴以共产党人别有存心，乃力陈容共之非计。总理不能用，遂拂袖去。及莅沪，乃假南阳桥章太炎寓所，邀集各省同盟旧友筹商护党救国方法。决议用公函警告全党，合谋匡救。函未署名者有梓琴及章炳麟、居正、周震麟、马君武、刘成禺、茅祖权、谢良牧、但焘、焦子静、管鹏、冯自由等十二人（原函见《革命逸史》第九一页^①）。是函公布后，不及二稔，而有清党之举。

自民十三总理逝世后，梓琴以与国民军总司令胡景翼有旧，被征赴洛阳参与

^① 见改版后第56页

帷幄，未几，景翼死，岳维峻继。十五年三月，吴佩孚纠合旧部，由湖北趋河南，维峻与战不利。梓琴率左右退河北，至新乡，说骑兵独立旅长郑庠速以兵扼黄河北岸，遮佩孚北进，南与国民军第五军方振武相结以自固，徐图匡复。振武不敢应，乃退保顺德。先是晋军已通款佩孚，三月十六日使师长商震来犯。梓琴与孔庚督所部御之。战方酣，守北门卒贰于晋，开门请降，遂被俘。商震原属同盟旧人，特亲来劳问。梓琴曰，吾为囚分也，何劳为。二十日至太原，晋督军阎锡山遣参谋长李勉之来迎，主其家。佩孚闻梓琴在晋，索甚急，锡山与梓琴亦有旧，且素服其为人，不忍出也。

是岁秋。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先后平定湘、鄂、闽、赣诸省。梓琴受任为江汉宣抚使，兼湖北省政府委员。尝募死士炸毁孙传芳运载军实之江永轮船，使革命军得顺流而下九江、安庆，其智能有足多者。明年，复将政府命，与周震麟入晋，说阎锡山来归。十七年革命军定北京，全国统一，先后受任为国民政府委员及山西政治分会委员、立法院委员、革命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皆未就。闲居上海，惟以著述为事。除独力发刊《太平》杂志外，另著有《革命闲话》一卷，《扶桑诗话》一卷，诗文集十余卷。性豪放，不事家人生产，得钱辄以分士，晚岁得肝鬲疾，十九年秋渐剧，一夕读报大感伤，咯血斗余，遂于是岁七月二日逝于上海寓次。配室童夫人，生二子一女，侧室王氏无出。

梓琴于所著《革命闲话》中有《牢骚语》一则，附录于后：

党人好作牢骚语，恒闻之曰，同盟会有负于我，国民党有负于我，□□□有负于我，是皆以自身为革命之客体，非以自身为革命之主体也。应转一语曰，同盟会之目的未达，我之责任未尽也，国民党之目的未达，我之责任未尽也，民国之国是未定，我之本愿未偿也，孙□□之大业未成，我之体力未殫也。自古四五等功易赏，三等功次之，二等功不易赏，一等功恒未见有受赏者。以牢骚论，余诚有之，不问后来，即当同盟会成立时，余以二十世纪支那社革命团体百余中心革命人物加入合作，曾为谁道之哉？盖致力于天下者，不能自念小功也。

杨卓霖事略

杨卓霖字公仆，一名恢，湖南醴陵人也。体格魁梧，富有勇力，少以任侠闻于乡，邑中秘密会党多乐与之游。里有斗争，辄往劝解，谓同种不宜相仇。事亲

孝，事师以礼。尝夜借邻烛读兵书及中外战争稗史，时拍案狂呼曰：大丈夫生不封万户侯，当赴锋镝死耳，安能与乡里小儿讨无谓生活哉！遂投张春发麾下为目兵。庚子（一九〇〇年）拳匪之乱，随张春发军防御京津，与八国联军接战，奋勇争先，手刃日卒数人，连发数十弹皆命中，军虽败而未至覆没，统军者莫之知，卓霖亦不自言，联军既捷，津沽为墟，卓霖愤清廷乱政误国，民气不振，乃周游诸省，求江湖豪侠，如关外之红胡子，山东之响马，长江之盐枭，江西之洪江，浙江之青帮，闽粤之三点。皆欲结其魁杰，既而察其时机未至，会党不足与有为，遂决心转学陆军，求入南京将备学堂，为军界革命运动之基础。是时周馥任两江总督，德国向之要求以南京之狮子山为租借地。馥将许之，苏沪人士集议反抗，以怵于官威，敢怒不敢言。卓霖谓国家土地不可以尺寸与人，倘周馥放弃主权，应以卖国论罪，辞甚激昂。听者皆惊。自是常以手枪自随，事为馥所闻，欲致之死。将备学堂提调陶森甲素器重卓霖为人，密告卓霖，谓当留此身以有待，徒死无益，幸勉学焉。乃资使东渡日本。而狮子山租借之议亦遂寝。甲辰（一九〇四年）卓霖至日本，入铁道学校，每遇困乏，则赖陶森甲及杜云秋助之。课余则日至横滨从粤人李植生学制炸药及炸弹之术，极有心得。乙巳（一九〇五年）七月孙总理黄克强等发起中国同盟会于东京，卓霖以黄克强介绍入会，未几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事起，留学界全体异常激昂，陈天华更投海以励之，卓霖益思有所为，乃迁居横滨，研习制造各种爆裂弹及施用方法，刻苦逾恒。是时益阳人姚宏业被留学界举充归国设学代表，道过横滨，与卓霖别，相对泣下，各以死相助。翌年宏业以上海中国公学事投黄浦死，卓霖益为感愤，遂偕同志李发根、廖子良二人由日内渡有所活动。丙午（一九〇六年）十月萍醴革命军起，卓霖在沪闻讯，日谋联络各省党人大举响应，然萍醴革命军以事起仓卒，转瞬即败，卓霖不为气馁，乃大呼曰吾将觅死所矣。仍奋勇进行如故。吴淞有标统周维藩者，卓霖旧交也，卓霖亲往游说，使其率所部反正，周只允赞助革命，而不愿担任发难。卓霖大为失望。旋结识两江总督署密探萧亮、刘炎二人，萧刘均湘人，亦留东学生，向充端方走狗，专在沪查探革命党动作，冒认洪帮会党头目，佯投入革命党，故设陷阱，使人入彀。卓霖不知其诈，遽用革命军副司令名义，委萧刘以南洋淮扬等处革命军相当职务，复偕李发根、廖子良等携炸弹多具至扬州，联络该处会党头目，欲谋刺端方以举事。萧刘等乃向端方告密，卓霖等三人遂在扬城某茶楼被捕，旋在所寓客店搜出炸弹八枚，制造炸药料多件，及革命军檄文刊物等等。端方委长沙人朱恩麒鞫其狱，三人各有供词，卓霖供云：“我是革命党，尝阅欧洲历史，知中国非实行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亡。法国卢梭云，不自由无宁死。佛家云，众生一日不出地狱，即余一日不出地狱。白种祸我黄种，卓霖立志保种救国，是非俟百年后史家评论。廖子良、李发根两人乃我骗来做教习的，受我之害，拖累无辜，恳各位审判官保全二人性命。制造绵花火药之硝酸酒精

各药水，是我同萧刘二人买的。十二月十六夜杨卓霖供”等语。朱委取供后，以卓霖为同乡，欲为减罪，乃回报端方云：卓霖罪涉疑似，必欲诬杀，宁免我职。狱久不决，而警监何黻章欲要功，力言卓霖罪证确凿，并及同逮之廖李二人。乃故遣朱恩黻之沪上，亲讯卓霖等三人，卓霖知祸已迫，廖李且不免，乃一以自任，且骂且起，前掀书案，案折，谓事与彼二人无涉，我志不遂，死耳。天下岂有畏死杨卓霖耶！速杀我，毋累及无辜，卒由端方判称“杨恢系孙文党羽，授为伪副将军，令往各处运动。李发根廖子良游学日本，喜谈政治革命，被杨煽诱入会，未受伪职。杨即就地正法，李廖各予监禁五年”云云。卓霖遂于丁未（一九〇七年）二月就义，死前四十日，尝请其友傅熊湘寄书其母，温问有加，不知母逝世已久，未之告也。卓霖死后，无敢视其尸者，萍乡叶钧与邑人潘晋独收之，葬之金陵。

新福州建设人黄乃裳

黄黻臣字乃裳，别号慕华，福建闽清县人。幼习举子业，为闽中名孝廉。甲申（一八八四年）中法战后，知非改革不足以图存，遂留心顾炎武、黄梨洲诸家学说，旁及新学史地译本，种族观念油然而生。闽省士绅及出洋侨民之言新学者，咸推为泰斗。有二女，一适林博士文庆，一适伍博士连德，均为蜚声世界之名医。文庆向悬壶于新加坡埠，思想新颖，亦有志于改革，故甥舅二人志同道合，相得益彰。甲午（一八九四年）以前新加坡华侨所设“古友轩”会所有星报之发起，林文庆特荐其岳翁任总主笔一席。乃裳以闽人自明末后冀免满虏苛政，历年聚居南洋群岛者数逾百万，久欲乘机向彼辈大声疾呼，灌以国家思想。惟是时华侨风气尚极闭塞，报纸之规模非常幼稚，迨莅南洋后，审察情势，亦仅能采渐进主义，使侨胞次第觉悟而已。戊戌（一八九八年）后以南洋各岛蕴藏无限富源，更欲利用之以经营大垦殖事业，知婆罗洲之英属沙撈越有千万顷之原野未经开辟，遂由文庆资助，向沙撈越政府承批山林数万英亩，辟为农场，由闽省内地招募工人数千名，作大规模之垦殖，命名曰新福州，土人多以新福州王称之，行之三年而成效渐著，农产品收获由是日丰。南洋通例向称大农场曰港门，大农场主人曰港主，凡港主均有包卖烟酒赌博之特权，且因以为利。乃裳为基督教徒，素以贩运鸦片及饮酒聚赌为有伤道德，故毅然牺牲此项权利，以为众倡。其工人受乃裳陶熔，亦多戒绝烟酒赌等恶癖。沙政府素恃出售洋烟为收入饷源，嗣检查各港门购烟成绩，独新福州一港不能推销，遂向乃裳再三警告，乃裳绝不为动，且与沙王发生齟齬。沙王乃取销乃裳之港主特权，且下逐客令，乃裳因之

损失十余万金，益悟寄他人篱下而成功之产业为不可恃矣。壬寅癸卯间（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乃裳年已六十，时林文庆已获订交于孙总理，革命思潮轰轰输入南洋，侨胞风气为之一变。乃裳渐与新加坡爱国侨商陈楚楠、张永福等结交，始有吾道不孤之感。癸卯上海《苏报》案起，陈张等翻印邹容著《革命军》万册，易名《图存篇》，分送闽粤各地，借广宣传。乃裳独贾其勇，亲携五千册回国担任实行工作。及抵汕头，遂结识许雪秋、陈宏生、林受之、曾杏村、许唯心诸人，极力倡导革命。潮梅之有心国事者仰其高年壮志，莫不惟命是从。丁未（一九〇七年）春，许雪秋、陈宏生等在潮州二度举义，乃裳与有力焉。未几乃裳回福州养病，仍向绅学工商各界散播革命种子，不遗余力，所携之《图存篇》几于人手一编；闽中青年受其感化者，大不乏人。辛亥广州黄花岗一役，闽省同志死义者二十余人，就中黄炳忠、卓秋原等皆其门下士也。乃裳认识孙总理在丙午年，时许雪秋、陈芸生、邓子瑜等均在新加坡，曾对将来起事地点详细讨论，乃裳力主在闽粤边区发动，然后与滇桂义师互相策应，总理深韪其议。其后雪秋之军事进行，即奉行此计划者也。丁未秋，乃裳复游南洋荷属爪哇各岛，适清政府先后派刘士骥、汪凤翔赴南洋视学，宣导奴化教育；乃裳深以为忧，遂与各校民党教员鄂人田桐、时功璧，湘人李柱中、陈方度诸人向刘汪等大肆抨击，刘汪等咸知难而退。是年八月十五日乃裳尝贻书陈楚楠、张永福，言时功璧宗旨与乃婿林文庆同，谓当从教育下手，五年后始可起事。彼在急激派中，以为时日太赊，不如一二年内即行大举，此与孙总理意见相合云云。此可见其老当益壮，所志较少年人尤激烈矣。辛亥八月武昌革命军起，乃裳时在南洋，以机不可失，星夜买棹回闽运动响应，并电新加坡闽商筹款接济；南洋侨商张顺善、陈武烈、陈嘉庚、陈先进、殷雪村等立筹措巨款应之。九月十九日福建光复，众举孙道仁任都督，乃裳任交通司长。乃裳在任内多所建树，主张派兵北伐最力。至民元南北统一，始以疾辞退。自是息影林泉，不问外事，民十三以寿终，年已八十余矣。

鉴湖女侠秋瑾

秋瑾字璿卿，别字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会稽人。少读书家塾，聪颖好学，有女才子之称。其父寿南宦游闽湘诸省，瑾随焉。自幼许婚于湘人王延钧，以父命，非其本愿，年十八出嫁，生子女二人。延钧赋性顽固，醉心利禄，纳资为部郎、需次北京。瑾笃信新学，鄙薄官邪，渐与王意见不合，经同乡戚友陶大钧、陈静斋为之和解；不得，乃相与定约分家产，各自为谋，瑾得万金，所托非

人，尽耗其资，乃尽以所有首饰托大钧妾获意代为变卖，得资后东渡日本留学。

甲辰（一九〇四年）三月至东京，初入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转学于青山实践女学校。居恒衣和服，不事修饰，慷慨潇洒，绝无脂粉习气。日惟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王时泽、仇亮、刘复权、蜀人彭春阳、赣人曾某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是岁秋冯自由、梁慕光等组织洪门天地会于横滨，瑾素有志于秘密会党之运动，遂偕刘、彭、王、曾诸人报名加盟，受封为白纸扇之职，白纸扇又称先生，即俗所谓军师也。是岁冬浙人陶成章以事赴日，陶亦隶属会稽，与瑾同邑，瑾由其戚之介，识之于旅次，知成章与敖嘉熊、龚宝铨（章太炎之婿）等运动浙省党会有年，因叩以所运动事，成章尽以其所历告之，并为介绍光复会同志机关二处，一函致上海蔡元培，一函致绍兴徐锡麟。乙巳（一九〇五年）瑾回国省亲，遂谒蔡元培于爱国女学堂，旋往南京，因欲同志辛汉以运动其父执某，使出资襄助革命，无效，乃复归沪，由沪旋绍，见徐锡麟于热诚小学堂。瑾之归里，本为筹学费计，既抵家，求给于母，母家固不中贲，勉为筹数百金付之。瑾乃再莅日，时湘人陈范（梦坡）以《苏报》案关系，亡命横滨，其携来二妾湘芬、信芳均浙籍，系出故家，瑾以其有玷同乡名誉，乃使脱离陈氏范围，并劝同乡学生助以学费。湘芬、信芳因得离陈独立，瑾之力也。又陈范之女公子擷芬曾发刊《女苏报》于上海，名重一时，亦以党案随父居日，忽奉父命将嫁粤省商人廖翼朋为妾，留学界闻之大哗，瑾乃召集女同学开全体大会，向擷芬严厉警告。擷芬谓事出父命，不得不从。瑾曰，逼女作妾，即是乱命，事关女同学全体名誉，非取消不可。众鼓掌和之。擷芬靦然退席，婚事遂以瓦解。瑾之天性义侠，略见一斑。未几徐锡麟携其妻王振汉莅日本留学，瑾为之照拂一切。锡麟归国，振汉仍留日。

乙巳七月东京同盟会本部成立后半月，冯自由介绍瑾至黄克强宅入党。浙人入同盟会者，蒋尊簋为最早，瑾其第二人也。是岁冬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湘人陈天华愤而投海，民党学生分为归国设学及忍辱求学二派。瑾与田桐、易本羲等主张归国最力，遂偕易本羲联袂归国；旋创办中国公学于上海，借以安置归国学生。复与敖嘉熊、吕荣祥、丁铎诸人相交，由嘉熊荐充浔溪女学校教员，因与女学生感情不洽辞去。丙午（一九〇六年）春由徐锡麟之介绍，始入光复会，时浙人董鸿祎方在南洋爪哇办学，频招同学往助，易本羲、王嘉榘、汤调鼎、陈华等先后就聘；瑾亦有行意，陶成章、龚宝铨力止之。瑾乃倡设《中国女报》于上海，是岁八月又与中国公学教员陈伯平等赁屋于虹口祥庆里为运动机关，因制炸药失慎，伯平伤目，瑾伤手。迨十月萍乡醴陵革命军猝然大举，全国震惊，各省革命党集议上海，欲起兵为援，瑾锐然以浙事自任，乃还绍兴，入居大通学堂。是校为金华、处州、绍兴三府会党荟萃之所，瑾与各会党首领约，俟湘省举兵后，即出为应援，旋偕王文庆赴诸暨、义乌、金华、兰溪各地

部署一切。十二月十九日至金华，寓于党人金阿狗家，并访龙华会首蒋乐山，有所计划。未几归绍兴，闻刘道一、杨卓林、宁调元、孙毓筠、胡瑛诸同志先后失败，或死或囚，接应之举，为之顿挫，遂益愤恨，决计不假外力，独行举事，而运动益力。

大通学堂原为徐锡麟、陶成章、许仲卿等所创，成立于丙午年八月，实为光复会训练秘密会党以兵式体操之机关，数月后成绩斐然，锡麟、成章以别有所谋，不暇兼顾，所委托之人又不能胜任，乃于丁未（一九〇七年）正月请瑾主持校事。瑾乃添设体育会，欲令女学生皆习兵式体操，己为督率，编成女国民军，绅学两界皆反对之，女学生亦无至者，瑾不得已乃多招金、处、绍三府会党头目数十人来习兵操，瑾亦自著军衣，乘马出入城中，深为当地士绅所不悦。瑾于接事之初，尝极力向地方官吏多方联络，故开学之日，知府贵福及山会两邑令咸致颂词。贵福并赠瑾对联一，曰“竞争世界，雄冠全球”。瑾于是益得畅所欲为。正二月间瑾屡往来杭沪运动军学两界，三月间复亲历金处诸邑两次，既归大通，复函召各属会党入绍兴计事，其所最信任之会首为义乌吴琳谦及金华徐买儿、武昌周华昌，卒得三人之力，使各属会党翕然就范。及筹备略竣，乃分光复会职员为十六级，以所撰七绝诗一首为表记，诗曰：“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凡从黄字迄于使字，皆有表记，例如黄字为首领，首领五人即以推徐锡麟等。祸字为协领，无定员，瑾自居协领，源字为分统，以洪门各会党首领任之，浙字以下为部长、副部长等职。各职员均以金指环为记，指环文字即以己职衔之代名词嵌入之，或以 ABC 等英文字母代之，其势力遍及金、处、绍各府县，即其他府县会党亦多受其部勒。

是时徐锡麟在安庆蓄谋大举之布置已渐成熟，遂与瑾相约于五月内分途起事。瑾于四月初乃复编制所属各洪门会党为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八军记号。定议先由金华起事，处州应之，俟清兵自杭州出攻金处，即以绍兴党军渡江，乘虚以袭省城，军学界为内应。若攻杭城不拔，则回师绍兴，入金华处州，出江西以通安庆。初定期五月二十六日大举，旋易为六月初十日，詎五月初绍兴党人裘文高已集众在台州树革命军旗帜，二十一日义乌党人以运动事泄被捕，二十三、四等日金华党案又发，瑾以事机急迫，乃使陈伯平赴安庆告锡麟，锡麟知不能再延，遂于二十六日皖抚恩铭莅警察学堂阅操时乘机杀之。卒以筹备未熟，与陈伯平、马宗汉先后被逮死焉。安庆义师遂全局崩溃。清廷以是大兴党狱，株连极众，大通学堂本锡麟手创，至是更无可幸免矣。

徐锡麟之败，瑾于六月初一日阅上海各报始知其事，为之寝食不安，懊丧异常。是时所规划之浙省军事，金华之党军已尽破坏，处州府之一部尚无发动消息，嵊县党人则又别成一旅，校中诸生相议即日举事，先杀贵福，占领绍城，而后再图其余，尤胜于束手待毙。瑾则力主必待嵊县之兵来然后举事，且分遣体育

学生二十余人往杭城分头埋伏，以为内应。于是藩离尽撤，而其势益孤。先是绍兴士绅胡道南等素不悦瑾所为，风闻瑾平日有交结平洋会党不轨情事，遂挟嫌向贵福告密，贵福亦早有所闻，至是遂微服宵行上省请兵。巡抚张曾敫据报，立派巡防营统领李一智率第一标兵渡江，赴绍兴围捕。当拔队时，李将各兵身上及随身各物搜索无遗，恐其有通党军也。以故兵营中极形骚扰，瑾于初三日得讯，乃令诸生将枪械藏过。初四日上午王金发自嵊县来，与瑾商酌十日举事之约，午膳毕从容而去。未几即有党人归报，言清兵已来，瑾使再探，回报往东浦，瑾信为然。众学生咸劝瑾出奔，瑾不答。学生于是散去者数十人。清兵旋至学堂，不敢遽进。又有学生劝瑾向后门乘河渡船走者，瑾神色自如，只令学生及办事人先走，自居内室端坐不动，盖自闻徐锡麟死耗，已蓄义不独生之志矣。清兵攻入前门，不意为学生击死数人，伤者亦数人，学生死者二人，瑾束手就擒。贵福使山阴令李宗岳讯问，瑾不作一语，遂于翌晨四时就义于轩亭口下。盖贵福与瑾平日颇有往还，虑其供开扳连，畏之特甚，不敢稍留片时也。瑾既被害，暴尸道路，无敢收葬者。其女友徐寄尘、吴芝瑛等收其遗骸，葬之西湖。清吏恶之，满御史常徽上疏请夷其冢，清吏恐激民变，乃阴嘱其兄桐出名迁柩，以还绍兴。己酉（一九〇九年）冬其子自湖南来，迁瑾柩归湖南，与其夫延钧合葬焉。瑾死时年三十一。迹其生平，行事之勇敢，任事之忠纯，处事之公正，虑事之周密，临时之沈毅；不独在清季浙江党人中无出其右，即以全国党人而论，亦属凤毛麟角。自瑾死后，浙中各会党如丧考妣，元气大伤，殆呈一蹶不振之象。党人经此挫折，苦心孤诣，越五年后，始有辛亥九月杭城之光复。

丙午靖州禹之谟之狱

禹之谟，湖南湘乡人，少有大志，博学能文，生平喜读先儒王船山遗著，谓胡、曾、左、彭好大喜功，误入歧途，皆由不善读书之过，闻者多目为狂徒。弱冠尝游江浙，饱览长江沿岸形势，油然萌故国河山之感。甲午（一八九四年）清日构衅，慨然投笔从戎。湘军某统帅以其文弱书生，使任运输事务，因得往来关内外及辽东西各险要，军食赖以无缺。战后以劳绩保知县，因见国是日非，辞不受命。旋赴上海，专心研究各种实业。半年后复游日本，投身大阪千代田等工厂学习工艺，日有精进。寻以其父春轩病重，忽遽归国。戊戌（一八九八年）政变，谭嗣同等六人死之。之谟谓非我种类，其心必异，倚赖异族政府改行新法，等于与虎谋皮，遂力倡革命救亡之说。庚子（一九〇〇年）七月唐才常、林锡圭谋起兵武汉，

之谟亦与其谋。事败，尚不知，入唐寓，所见逻骑满室，知有变，乃从容作寄信人得脱。旋往来宁沪间，有所计议，久无所成。癸卯（一九〇三年）归湘潭筹设毛巾厂，延技师教导乡民以各种纺织事业，邑人多受其惠。甲辰（一九〇四年）复推广至长沙，并附设工校，次年更添设工场，整理机织，皆亲自操作，职工咸乐为之用。又借湘乡会馆创办惟一学堂，城中各校赖其力成立者甚多。适日俄媾和，清廷谋以福建向日抵换辽东，湘人群电北京政府抗争，之谟实为之倡，以是湘中教育会商会皆推为会长。乙巳（一九〇五年）秋，孙总理、黄克强、陈天华、宋教仁等组织中国同盟会于东京，克强密函之谟，使在湘设立分会及推销《民报》，湘中民党由之谟介绍入会者，颇不乏人。《民报》亦由其一手代理，销路甚盛。丙午（一九〇六年）夏，为反抗日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而投海之新化人陈天华，及为创办上海中国公学失望而投海之益阳人姚宏业，二尸同时归棹湖湘，之谟主张应公葬岳麓，以表崇报。清大吏禁之，二棹到日，之谟约全城学生制服行丧礼，万人整队送之山陵。当道及乡绅成为侧目，以为民气伸张至此，殊于政府及官绅不利，非严加制裁不足以杜绝祸根。时有长沙学务处总监督俞诒庆者，素行卑污，尝用学务处灯笼为前导，宿娼于下等妓馆，为群学生所窘，捕至濂溪阁，黥其面，裸其体，拍其照于土娼胯下。事后，之谟曾当众斥其无耻，指为士林败类。至是俞挟前恨，乘机向湘当局告密，谓之谟为革命党魁首，专派送《民报》邪说，勾结军学两界谋起事。清大吏惮之谟名，迟迟不敢发，会六月湘乡学界抗争盐商浮收，风潮甚烈，之谟力言食盐加税，已违人道，浮收巨额，民命更危，倘不能根本撤消，亦应将浮收之款移充办学，免入贪囊，湘乡知县陶据以上详，坐之谟以率众塞署罪，湘抚遽下令逮捕，长沙基督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与之谟相善，力劝之避。之谟不可，曰：吾辈为国家为社会死，义也。各国改革，孰不流血，吾当为前驱。遂于丙午六月二十一日被捕，士绅等为之营救申辩者日数十起。清吏格于清议，监致常德，复移靖州。靖州府金蓉镜（嘉兴人，字甸丞），性极残酷，虽之谟已定罪永远监禁，仍欲杀之以媚长官。故抵靖后更酷刑十余日取供，始以针刺指甲，继倒悬之，熏椒烟于其口鼻。之谟仍不屈，金愤甚，自烧烙铁，烙其肤肉，全身焦烂，胥役皆不忍睹。未几，萍醴革命军起，全省戒严，党狱因而大兴。金牧更借端罗织，再四刑讯，断指割舌，身无完肤。至十一月二十一日，之谟卒被缢杀于靖州之东门。就义之先，犹手书绝命辞，虽拇指已断，字迹仍端好如恒。死时指金牧曰，我要流血，为何绞之？辜负我满腔心事矣。观者多为感动。狱中尝先后作遗书多通，分致全国同胞及亲友，叙述舍身救国经过，读之足以廉顽立懦，择录如左：

其一、致全中国国民书

我所最亲爱之在世同胞鉴：世界危殆，固由迂腐之旧学所致，亦非印版的科学所能挽回。故余之于学界，有保种存国之宗旨在焉。与若辈以摧残同

种为手段者，势不两立。于是乎有靖州之监禁，不百日而金牧提讯，所发不成理论之问题，无非受人意旨，阴谋秘计，横为成见。是以所答动遭无理之驳诘，不能置辞。且曰，尔辈牛马耳，人欲食则死之，有何爱焉。禹之谏正告同胞曰，身虽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其身而死，甚勿奴隶其身而生。前途茫茫，死者已矣，存者诚可哀也。我同胞其图之。困心衡虑，终必底于成也。禹之谏四十一岁。丙午十一月十九日靖州狱中遗书。

其二、与同学诸君书

同学诸君御览，捧读来书，感愧交增，汗泪并下。敬谕诸君有根柢，琢磨益光，亚东之华盛顿，其在诸君乎！谩本不学无术，动多窒碍，未能于社会建毫末之利益，致增一层阻丧，死罪死罪。至湘学会即能成立，必含多分的奴性，借奴势以伸权力，行压制，可预知也。满奴亦得利用之，呜呼危哉，学子其在彀中矣！猗欤幸哉，学子已能自立矣！我所希望之学生自治会，幸赖诸君之大魄力，于大风潮大势力兴大狱之际，放大光明于黑暗世界。狱中人闻之，喜而不寐，更望诸君以百折不回之气概，振刷精神，整齐秩序，力求进步，毋少懈怠，毋少退让，以自治会为政党会，新国会之基础，其责任之重且大也如此，诸君勉之。吾辈可为清廷之囚犯，不可为自治会之罪人，愿诸君务其大者远者。若目前之小害，无畏焉。今学生自治会成立矣，请再进一步，创立群治大会，为各省倡，亦惟诸君是赖。铁路初归官办，既而绅办，两年之久，毫无影响。今春商会成立，谩于会中再四演说，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有此大权大利之铁路机会，商界当急取之，勿徬徨也。幸而见信，是以有四月电达商部允归商办，两期即集股二百万有奇，近有官督商办之说，是皆前此绅办者因事权不已属也。阴地唆弄，必破坏商办之局而后快。商界无人才，无魄力，只可居被动之地位，无原动之资格。湘路之能否专归商办，必得学界为之援助，否则一为官办，资本无著，人皆愴而不前，势必借洋款，以数百万赎回之路权，又将去矣。且湖南与之俱亡，谓余不信，试观甲午三千万赎回之辽东，随转而送之俄人。辽东为建虏发祥之地尚尔，有何爱于湖南？呜呼怨哉！欲存湖南，必争路权，争路权者，商界学界之天职，责无旁贷，诸君以谩言为千虑之一得欤！请于学界开会之际，为谩宣布此意，以俟大多数国民采择，是为幸。承诸君存问惠赠，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学生自治会成立之日，谩敬捐银二元，以答盛情。云云。

其三、致诸弟书

蓉立、泽蔚、健康六弟如见：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四时靖州牧金蓉镜提余

讯问，毫无意义，所问人名多不知者。余之脚镣自八月二十六日托人具保状于吏目，始开去，故提讯可不带镣。越日金牧亦未诘予之去镣。五日入狱，十八日三时金牧又提予讯问曰：汝为何到这里来？余曰：为湘乡学堂提监行陋规事。金牧即曰：此非原因，可将原因说来。余曰：其为葬陈天华、姚宏业事乎？金牧曰：不是，尚有原因。余曰：长沙周守所详，亦不过此二事，他非所知也。又问曰：你认得杨某乎？陈某乎？所问之人皆向所未闻。余曰：都不认识。金牧曰：你会作对联乎？你认得报馆的人乎？余曰：我不能作对联，亦不识报馆之人。金牧曰：曾闻禹之谟三字，如雷贯耳，何以这些人都不认得？然则你所认识者，又是些什么人？余以各学堂监督教员及商会之人对。金牧曰：仅识此等人，亦不算上等人。所答动遭无礼之斥驳。谓左右曰，拿长刑来，即当面钉镣。且曰，你既说不出原因道理来，即如牛马一般，牛马之肉，人欲死则死之，何爱焉。押下去，金牧此讯，心横成见，不知受谁意旨。余之生死，久已置之度外，乃于十九日遗书在世同胞，附回公鉴。带镣坐牢又一月，不闻动作。余日以群学肆言一书，玩索而有得焉。叹我国民智之劣于群德群情，虽以万倍的显微镜亦不见有影儿。十一月十八夜三鼓睡中，提禹之谟，余乃著衣前进，至二道之右侧小厅，金牧云：湘抚鄂督有来文云，陈某供称孙文派你在湖南为虚无党，你从实供来，还有些什么人？余曰，余在湘省办纺织事，三年于兹，不知孙文陈某为何许人？金牧即呼拿梆子来，褪去余衣，跪于铁练之上，两手左右伸开，于膝后湾处横压一棍，两端入柱之孔，又以棍横于脚背湾处，板上三叠，计一尺高，使重压力尽在膝盖，胸前横一棍，使不得移动，金牧即呼打以荆条，鞭背至九百，血耶肉耶？余不得见。金牧即问你是孙文党乎？余曰：孙文之党可也，余即孙文亦可也，请速杀，此苦不能受矣。金牧曰：何必杀，就是这样打死。复曰，你认得谭心休否。余曰，谭心休自四月为上海公学派回湖南筹款，曾会一面的。金牧又曰，听得陈统领说你为陈天华作了一副挽联，“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是湖南”云云。余曰：我不曾作挽联。金牧曰，闻有一种《民报》是你代为发卖。余曰：我不开书铺报馆，何能卖报。时转五鼓，有管禁董某在侧，余托其至金牧前代求，称余能书愿死状，请释此刑。久之便签牌放下，自三更至四鼓，赤身跪压，加以鞭背，几遗矢溺。数兵扶之下架，脑虽未死，而四肢已不知谁属。比抬入禁，置于床，至十九日午刻，自膝而下，尚冷如冰，同禁张福二以酒磨三七按摩之，不知有痛。至晚轻摩之，犹麻木不知，重按之始觉有痛，不能步行，如厕必负之而入。闻又欲提讯，死耳，夫复何言。祈诸弟代余稟堂上诸位大人，谢抚鞠之恩，悔不孝之罪。丙午十二月二十日兄之谟靖州狱中遗书。

其四、再致诸弟书

蓉立、泽蔚、健康六弟如见，昨二十夜亲笔所书之信及遗言，已封妥托带，尚未发行，二鼓后，金牧提讯，至二堂梆子已具。金牧即呼上梆子，裸其体，照昨书所书情形，而加用大椒末熏口鼻，金牧亲持扇香一大把，烧吾背约二时之久，无所供，抬至戏厅，吊吾右大指及大脚指，悬高八尺，数刻绳断，大指已经破烂，寻亦断，又换系左大指悬之，再用香火灼吾背及膊，遍体无完肤，所讯无非是要供称孙文。又曰，尔昨所讲认得这个谭心休，究竟是孙文使来的否？余曰：我只知伊为中国公学回湘筹款。金牧曰：你不实供，分明他是孙文的党羽，你为何不说？又用香火乱烧。余曰：既说是他的党羽，即是他的党羽，我不得清楚。金牧曰：谭心休是几时来通约你们的？余曰：是四月筹款时会过的。金牧曰：我听说他有个什么票据。余曰：不知。金牧曰：昨天你认说是孙文的党羽，为何不知他的凭据口号？又拿火来烧，余只得诬供有口号。金牧曰：是何口号，从实供来。余曰：记不得清楚了。言未了，即用火乱烧，余即诬供曰：口号叫做中国人。金牧曰：不止此一号，尚有何号？我见他势又执香火近前。余又诬供曰，以手加额为相见之礼。金牧曰：杨怀三你到底认识否？余曰：认不得。金牧曰：他说你在湖南是个头目，究竟你是何等头目？余曰：我不是头目。又拿火来烧，不得已又诬供曰：我是上等头目。金牧曰：然则你是头目，你之下还有些伙计，是些什么人？我说无。金牧曰：总有些，你不说，我又要你上火坑。我见其势太猛，曰：同志即是伙计。金牧曰：你同志有多少？我说不计其数。金牧曰：是何姓名？我说无姓名。问孙文叫你们做什么事情的？我说救国保种。金牧曰：如何救法？我说是杀人放火，金牧曰：你要杀那一个，予曰：应杀者即杀。金牧曰：你们几时起事？余曰：我不知期。金牧又来烧，余信口曰：十月间。然则在何处起事？余曰：在上海相会。金牧曰：何必要到上海，我想即是湖南，你不见浏阳醴陵之事乎？你关在禁里，不然你也是一个。又问，你与孙文同党，有何好处？余曰：好处就是革命。金牧曰：《民报》是你发行否？余曰：我不曾发行。然则是谁发行？答曰：不晓得。金牧曰：你曾看见《民报》乎？我说看见一本。金牧曰：《民报》上说的是什么道理？我说无非中国被外国欺压，政府不能保护，总要百姓晓得救国。金牧曰：尚有何言？余曰：一时记不起来。求他释放下来，徐徐讲出。金牧曰：放下来不讲，再上火坑。众役放下，不知有无四体，时俯卧在地，气息奄奄。金牧催说曰：我晓得放下来你就不讲了。他说就要把你打死。我即述说一些救国的话。时已五鼓，金牧即标牌收押。兵役抬下，不省人事。遗屎在床，至今二十一早七时始苏，求友书此普告同胞，要知政府下诏立宪，专制的凶暴政

治，有进无已。将来四亿的同胞，其苦惨可想而知。我死矣，哀哉同胞。丙午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书于枕边，禹之谟遗言。

胡汉民入党时纪实

余前在《逸经》半月刊尝先后记述《未入革命党前之胡汉民》两则。近读某会所编纂史料，所载汉民参加同盟会时日，于事实颇有出入。余为同盟会第一次开会发起人之一，于当日情形知之最详，不可不有以正之。

考汉民第一次到日本留学，系在壬寅（一九〇二年）夏间，所学为日人嘉纳治五郎所设宏文学校之速成师范科，期以六个月毕业，惟汉民不待修业期满，已因事返国。第二次到日本，则在甲辰（一九〇四年），所学为法政大学之特设速成法政科，期以二年毕业。同行者有汪兆铭、朱大符、叶夏声、陈融、张树枬、古应芬、金章等数十人，皆粤督岑春煊所派之官费生也。先是汉民之堂弟毅生已于癸卯（一九〇三年）春夏间负笈东渡，会孙总理自越南莅日本，旋组织革命军事学校于东京青山，各省学生从游者十四人，毅生其一也。此校开设半载，即以内哄解散。及翌年汉民来，与毅生同税居于神田三崎町，渐与党人相往还。每赴横滨，恒至华侨学校及余与廖翼朋等寓所叙谈，时东京横滨间尚未有党人之固定组织也。及乙巳（一九〇五年）六月，孙总理来自欧洲，遂召集各省同志发起中国同盟会，开会之第一日，毅生预得余通知，由渠带领到会之同乡学生，有汪兆铭、朱大符、张树枬、古应芬、李文范、金章、杜之秋、姚礼修、张荫廷等九人，皆粤省速成法政生，而汉民及廖仲恺不与焉。盖汉民、仲恺是时适以事回粤也。开会后约十日，汉民偕其妻陈淑子妹灵媛及仲恺、江誉聪、郑拜言等同莅东京，俱寓神田区新宅。江誉聪，字叔颖，系江孔殷之子，尝从汉民受业，故乃父特托汉民挈之东游。汉民既知同盟会成立，即由胡毅生介绍偕仲恺向总理宣誓入会。偕来之江誉聪、郑拜言以同寓故，亦令与盟。惟郑拜言于签署约后，终夜旁惶，恐怖万状。仲恺语之曰，日本留学生谁非革命党，既入党矣，恐惧何为！拜言终不自安，不数日竟悄然楼被归粤，留东粤籍党人知者，莫不引为笑谈。江誉聪在日未久，即随伍廷芳使美为官学生。辛亥，粤省光复，誉聪以初年入会之因缘，得与民党诸干事奔走往还。民二，国会开会北京，梁士诒代袁世凯组织一网罗粤议员机关，名曰潜社。粤议员之供御用者，颇不乏人。中属同盟会籍者亦四五人，即誉聪媒介之力也。汉民入会后数日，而留学界开大会欢迎中山先生于麹町富士见楼。中山先生演说时以声浪不高，临时令汉民传译，时为七月十三日。余亦在场也。

邓师爷十国请医生

邓慕韩，三水人，好出奇计，友人多以师爷称之。胡汉民尝赠以一联曰：“祖宗当契口，皇帝是乡亲。”祖宗指汉文帝嬖臣邓通，皇帝指横滨华侨洋服商三水人谭发。（事见《逸经》第二期《革命逸史》）慕韩亦作一联以答之曰：“老豆（粤语父之称）是师爷”，盖汉民之父世充各衙署幕宾，粤人咸称幕宾为师爷，慕韩此联可谓针锋相对。丁未（一九〇七年）十月初六日慕韩向余取旅费百元，赴南洋婆罗洲山打根埠筹募革命军饷，谓有族人邓某在该埠设商店广怡和号，是处有华人矿工数万人，若得每人捐资数元，即可获资数十万元，嘱余代印刷收据十万备用。余仅以所存香港同盟会空白收据一千张给之。慕韩去后二十余日，而广西镇南关之义师猝发。以枪弹缺乏，坚守炮台八日而退。（十月二十七日占领炮台三座十一月初四日撤退。）事后山打根埠华侨问慕韩以革命军如何撤退镇南关之理由，慕韩对之曰：“革命军既占领镇南关，用兵甚为得手，恰遇龙州一带边防大疫，革命军乃由越南河内延聘欧美十国名医前往设法预防；十国名医咸谓此种时疫非常可畏，实无法防治，只有撤退避之等语。因是革命军遂不得不暂时撤退，以保全实力”云云。慕韩居山打根数月，毫无所得，归香港时，仍将余所给之同盟会收据原封不动纳还，余时戏以党人轶事编作小说章回目，中有一联曰《邓师爷十国请医生》，即指此事。

谢逸桥事略

谢元骥字逸桥，广东梅县松口堡人。其祖益卿经商南洋英属槟榔屿，致富巨万。伯父梦池世其业，益光大。父可阶居乡，读书养亲，宿学能诗，为邑名士。生子八人，逸桥其长也。生而跌宕不群。儿时就塾，跳荡号叱，群儿多辟易，宾客盈门，有不当意者，辄侮侵之。性不好科举之学，临场应试，游戏万端，常惊其座人，或者彩服跳踉市中，儿童追逐者恒数十辈。遇神庙偶像，辄毁之，或怀归其家，庋阁累累。一时皆呼为狂生。邻邑名宿丘逢甲（仙根）奇其行，作《谢生行》以张之。弱冠父死，渐笃志向学。时清政不纲，丧师失地，日有所

闻，朝野汹汹，海内志士多倡言改革。逸桥感怀时事，隐然有澄清天下之志。闻有当代奇人侠客，辄欣然往就之。岁庚子（一九〇〇年）孙总理及杨衢云等方设革命机关于香港，将在粤谋大举，逸桥闻其事于惠州党人，爰偕友人温静侯至港访之，未得见，适惠阳欧榘甲（云樵）在港，与武汉自立军唐才常通声气。逸桥以蕉岭陈鹤云之介，得识欧氏谈论甚洽，乃相约归乡倡办团防，为拔赵帜立汉帜之计，盖榘甲谓唐才常在鄂筹备已熟，不日可以大举，欲逸桥在嘉应各属组织团防，及期异军突起，足以援应武汉之义师也。逸桥既归乡，以仓卒不得款，乃谋诸父执温柳介及业师饶芙裳。温饶向皆提倡新学，咸赞成之。为寓书其伯父梦池，令出巨金以襄事。议既集，众推饶芙裳为团防总董，逸桥与温静侯副之，募勇购械，日事部勒。是岁七月唐才常在汉口事泄被害，逸桥闻之异常悲愤。时乡中旧绅有与逸桥不睦，而驰书梦池，指逸桥为交通匪人贻祸乡族者。梦池得书大惊，遽电令逸桥等停办团防，声明不再给资。逸桥知革命之业非旦暮可及，乃变计留学，挈诸弟良牧适群等先后东渡日本，此甲辰乙巳间（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事也。是时保皇党欺骗世人之罪行日益暴露，东游诸生益倾向革命一途。乙巳秋孙总理自欧洲莅日本，与冯自由等发起中国同盟会于东京，逸桥之三弟良牧以惠州党人梁慕光之介，率先受盟，逸桥旋亦踵之，弟兄二人均以兴复汉族为己任。是岁冬孙总理南游越南，以绌于旅费，爰向留学界措集，逸桥昆仲悉力助之。越年归国，向潮梅各县力倡革命救国之说，各县豪俊多倾心焉。旋在松口堡创设师范讲习所，传播革命种子。上而闽之汀漳，下而潮梅各县，学子相率就学门下惟恐后。丁未（一九〇七年）二月弟良牧与潮安许雪秋、澄海陈宏生等谋在饶平发难，袭攻潮州府城，事败，复图黄冈。逸桥之父及伯父向在潮汕铁路公司占有巨股，颇有左右该公司能力，至是逸桥乃亟至汕头供职路局，阴为是役道地，凡党人往来运械递信诸务，皆以一身支吾。是岁四月黄冈义师又败，党人余通、余丑、陈涌波、方汉城等纷纷出亡，清吏名捕党人急，逸桥多方脱之，或间道致诸其家，以是保全者甚众。而逸桥亦屡濒于危。赖谢氏家世雅负德望，当地巨绅显吏多与有连，因得不坐。当是时潮梅之言革命者，群推逸桥为祭酒，同志间咸呼之为大哥，良牧为三哥云。黄冈既败，逸桥于是旋里与梁鸣九、温静侯、张谷山、姚雨平等组织体育传习所，外以造成体育师资为名，内实为革命枢机，取法陆军学校制，日夜肄习武事，以备造次发难，得指挥材。其后殉难于辛亥黄花岗一役之林修明、周增、郭典三诸烈士，即出其间。既卒业，姚雨平遂赴广州设机关，运动巡防及陆军，逸桥出资佐之，并为规划大计，终以财力短绌，不克大举，乃决计赴南洋，为其伯父梦池权衡商业，欲乘间移其财产之一部，以济大事。南行谒孙总理于新加坡具述所怀。总理慰勉有加。戊申（一九〇八年）三月河口革命军败挫，总理旋至槟榔屿有所策划，馆于逸桥寓所。庚戌（一九一〇年）新正广州新军反正之役覆败，黄克强、赵声、何克夫自香港来，拟假道缅甸

人湏发难，已有成约矣；逸桥良牧兄弟以云南地僻，不是举大事，力阻其行。不得，乃走告总理。总理亦以为然，使黄、赵勉力改图广州。赵声力言举事广州，非有预备金十万元不可。逸桥慨任筹募，约以旬日先集半数始定。卒由英荷两属同志劝募如额。黄赵等乃一意往港进取，是为辛亥三月二十九黄花岗之役；逸桥实间接有力焉。民元南京政府建立，总理令良牧贻书招之，逸桥辞以亲老不赴，旋被委充同盟会汕头分部长。并与叶楚伦、林百举等创办《中华新报》；未几改办《大风日报》，以作讨袁机关。及袁世凯帝制瓦解，遂息影家园，希言利禄。叩以少年时事，恍如隔世。是时其伯父梦池既前卒，家渐中落，惟布衣蔬食，自甘淡泊而已。民九总理开府广州亲莅汕头检阅军队，特率胡汉民、姚雨平同赴松口，盘桓谢家三日，尝邀出任事，逸桥逊谢不遑。总理亦不强之。逸桥向患咯血疾，民十三后鉴于时局纠纷，党祸日炽，疾益亟。至民十五年五月终于汕头寓所，春秋五十有三。遗子一，女二。晚年颇以书画自娱，顾不自爱惜，厥稿大半散佚。逸桥逝后六年，乃弟良牧亦以民二十年六月卒于广州，民二十五年国民政府追念逸桥良牧兄弟前功，特令褒扬之。良牧事迹另载良牧专传。

附黄克强辛亥黄花岗一役前致谢逸桥书。

乙桥我兄大鉴：怡保手上一函，想已入览矣。今英属之款大致已有眉目，惟与十万之数所差甚远，而前途待办之事，有如星火，不可迟以分秒，望兄前许之件，速速决心实行，驰赴港部办事。弟昨由芙蓉出星，拟赴日邮内渡（十二日开行），时期逼迫，无缘来尊处晤商，至为歉仄。良牧兄款事，亦望赶速收齐，偕其管理人返港，切盼切盼。伯先兄昨亦有函来催贵昆仲，意至恳切。因此函与展堂兄所商事多（展堂现在西贡，须将此函汇寄去），故未呈上，专此即请筹安。良牧兄统此未另。弟兴顿首。

东军都督许雪秋

许雪秋原名有若，雪秋其字也。广东潮安宏安乡人。父经商南洋致富，雪秋幼随父在新加坡学习懋迁。性慷慨，任侠好客，缙绅士夫江湖侠客咸乐与之游，有小孟尝之称。其父故后得遗资甚丰，以好交游，随手辄尽。壬寅癸卯间（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福州人黄乃裳漫游南洋马来半岛，鼓吹种族革命，闽粤侨民多为感动。雪秋以黄年高志壮，异常倾倒，遂纳交焉。是时保皇党所设星洲《天南新报》停刊已久，兴中会员尤列组织中和堂，侨商陈楚楠、张永福等创设《图南日报》，南

洋各埠华侨革命思想日渐萌起。雪秋目击祖国时局之艰危，隐然有逐满兴华舍我其谁之志。甲辰（一九〇四）秋遂邀同志黄乃裳、陈宏生诸人联袂归国。九月至汕头，即于是月十九晚邀集黄、陈及吴金铭、吴东升、李杏坡等，在宏安乡故宅“寄云深处”立坛开会，宣誓倾覆满清，相约分途担任招揽同志及筹措军械军饷二事。经营数月，得潮属各县有名同志吴金彪、萧竹荷、李子伟、余丑、余通、陈涌波、林鹤松、刘龙苍、黄得胜、林苍龙、谢明星、薛金福、林惠卿、罗木斗、刘荣华等数十人，势力日盛。乙巳（一九〇五）正月十二晚众举雪秋任革命军司令，总领全部职权，陈宏生任闽粤度支部长，吴金铭任参谋长；并议派陈宏生赴福州晤黄乃裳商议闽省响应事，李杏坡担任联络学界事，吴东升担任联络各省同志事，吴金铭担任联络饶平会党余丑、余通、陈涌波等合作事。于是各事进行，粗具端倪。更设法向潮汕铁路当局运动取得承办铁路建筑工程之特权，密派余丑、余通、陈涌波为筑路工头，使招集同志七百名充铁路工人。复由吴金铭以绅士名义稟请道府镇台，准在潮安上七都祠招募团练四百名，亦以同志充之，均约定三月十五日同时举事。詎因李杏坡用人不慎，其部下在华美乡事泄，总兵黄金福遂派哨官梁栋元将杏坡拿获斩首，吴金铭亦同时被捕，刘龙苍乃约邑绅郭竹君等联名保释。旋复有人告发雪秋为革党首领，道府派委员陆桂元刘英生密查，雪秋前曾捐纳道台衔，与道台某向属旧识，至是乃身怀手枪，只身向潮州道署自投，侃侃抗辩。道台某以其为地方大绅，遂不深究。雪秋经此次蹉跌，乃重赴南洋募集饷糈，企图再举。丙午某月孙总理自日本至新加坡，雪秋素仰总理名，浼张永福为介，即加入同盟会。时总理方有志图粤，闻雪秋历述早年在潮州经营革命经过，及其所配备各地之潜势力，深为嘉许，立委任为中华国民军东江都督，使在粤省东江各属相机发难。自丙午同盟会本部编定革命方略以来，总理依据方略以委任都督，雪秋实为第一人。是年冬雪秋自汕头至香港，谒余于《中国日报》，谓在潮梅筹划事渐臻成熟，嘱代电东京，请总理派同志回国相助，总理乃派留学生晋人乔义生、皖人方汉成、粤人方瑞麟、李思唐、张煊、方次石及日人萱野长知、池亨吉等先后至香港。雪秋旋邀集各路主任及众同志大会于宏安乡自宅，决议定期丁未（一九〇七）正月初七日分头大举，派定蔡乾初担任筹款。薛金福偕乔义生、李思唐、张煊、郭公接往饶平浮山埠布置一切。届期率众于夜间进攻潮州府城，黄伟斋率潮城内十八馆各同志为内应。余丑、余通、陈涌波、蔡德、吴焕偕、方汉成、方次石赴黄冈，黄德胜赴惠来，罗飞雁赴揭阳，谢逸桥、谢良牧、李次温、李子伟、吴东升等暗率同志多人，藏匿于潮汕车站蔡家祠敌山台潮安内城各处，均预备响应，陈芸生、萧竹荷担任运动揭阳炮台兵弁反正。各项筹划均已就绪，乃期至而浮山之众，因遇风雨大作，旋聚旋散，黄冈一部遂亦无法集合，雪秋知机会已失，遂令各部暂行分散，静待后命。后数日风声渐露，同志薛金福、黄志、张顺数人被捕见杀，雪秋乃以善后事委诸陈宏生，自赴香港谒余报告起事中变情形。余即电越南河内向孙总理请示。总理复电谓此后勤事

时期须与惠州及钦廉义师约定同举、以便牵制清军。令雪秋万勿孟浪从事，致伤元气。于是众遂暂停动作，专候惠州钦廉消息，以定进止。雪秋与谢良牧、方瑞麟、李思唐等同寓香港兰桂坊守候电音，乔义生、池亨吉驻汕头幸阪旅馆，担任接洽同志传达消息等事。迨三月下旬，余丑、陈涌波到港报告黄冈同志已被清吏捕去二人，各同志拟克日举事，以便营救，雪秋亦跃跃欲动，余及胡汉民均再三劝阻。嘱其静候总理命令，务与惠州钦廉同时发动，即令余陈二人回黄冈设法制止。诂四月十三日，各报纷传革命党人于十一日晚在潮州饶平县黄冈城起事之消息，全粤为之震动。盖潮城镇总兵黄金福据黄冈都司隆启密报该处地方有党人聚众开会情事。初十日特派守备蔡河宗带兵防范，捕去蔡姓党徒二人。余丑、陈涌波主张非速举事，不能营救被捕之同志。遂聚众七百余入于十一晚九时往攻协署，血战一日，卒将全城占领，擒获都司隆启及武弁蔡河宗、王绳武、许登科等。同时出示布告安民，免除清吏一切苛捐，人民悦服。惟以事起仓卒，主要人员均在香港汕头未来，暂由余丑主持其事。十四日陈宏生、方汉城、林国英始由汕头赶至，众以陈为雪秋助手，暂推为临时司令长，雪秋在香港于十三日始知确讯，即于次日率同志李思唐等十余人赴汕，然是时清军已在汕头附近布防严密，虽欲赶赴战地督战，亦不可得矣。党军初以主帅乏人，贻误戎机，延至十四日夜始由陈涌波、余丑先后率兵进攻黄金福大营于汫洲港，剧战二日，黄部不支稍退。旋清军援师四集，党军前后受敌，且以土枪不能及远，伤亡数十人，遂向黄冈撤退。众以械劣弹乏，不堪再战，宣布解散。雪秋时在汕头幸阪旅馆，与乔义生日人萱野长知等规划丰顺、揭阳、惠阳、潮安各县响应事。诂十七日晨方汉成等已由黄冈抵汕，报告党军解散情形，众大懊丧，雪秋以清提督李准统兵到汕，拟设法轰炸其运兵轮船，以图再举。因戒备严密，无懈可击而止。遂偕诸同志仍至香港守候机会。继奉孙总理电召，令偕萱野同赴越南河内指示机要，雪秋告总理，谓土炮不敌洋枪，为黄冈一役失败之主因，倘能从外国购运新式军械至惠州汕尾洋面，彼可预雇大帆船数十艘在海上收接，即在海陆丰沿岸招集党人大举发难等语。总理深韪其议，即令萱野回日本办理购械及租船运输事宜，并飭雪秋返香港与余等策划进行。于是雪秋遂派许佛童、范妈鲁、林鹤松诸人分头赴汕尾运动。至八月间已渐告就绪，预备于军械运到时，可召集汕尾附近万数千人听候指挥，同时萱野在长崎收到余汇款一万元后，亦来电称购械租船两事俱妥，嘱派熟识汕尾沿岸地形之引港人往日随船指导。适同志邓慕韩于八月十三日东渡就学，余乃托邓带领引港人陈二九赴神户供萱野调遣，彼此约定于船械出发前二日由长崎电告香港。雪秋即亲赴汕尾筹备接械，期前须用大号渔船二十艘游弋该处近海准备接收。该轮宜于夜间入港，用红灯为号，借避清吏耳目。嗣九月初一日余等得萱野电知，谓船械约初五日可到，雪秋遂偕同志刘思咏（湘人柳聘依改名）、谭剑英等多人于初三日晨乘小轮渡赴汕尾。诂是早登轮时，见有清碣石镇总兵吴祥达之侦探同舟，惧而登岸折回，仅遣刘思咏等先行。时萱野偕邓慕韩、陈二

九等已于初二日乘幸运丸自长崎启碇，所购置者为明治三十八年式村田式快枪二千枝，每枝附子弹六百发，另短枪三十枝，日本古刀五十具，将校用军刀二十具，犬养毅闻之，亦赠最古之宝刀三具，以壮行色。械价除先付万元外，余款由萱野至友山下汽船会社主人三上丰夷担保偿还。幸运丸载重二千八百吨，属山下汽船会社租用，该船原有代三井洋行运煤至香港之约，萱野以无资租用全船，遂以友谊关系，由三上命该船船主将此项军械顺道载往汕尾洋面起陆。同船尚有萱野邀请之日本同志陆军大尉定平伍一，及前田九二郎（宫崎寅藏表弟）、金子克己、三原千寻、望月三郎、日下××诸人，均愿为中国革命效力者。初六日船抵汕尾洋面，久未见有帆船接应，停泊三小时，始见雪秋驾一小舟来探消息，萱野责其筹备不善，令速以大船至，雪秋匆匆去，谓数小时后大船必来。诿是时汕尾捷胜沿岸连日因雪秋招集会党预备大举，风声四起，及见日轮停泊近海，沿岸聚观者万数千人。清总兵吴祥达先有所闻，曾饬属戒备。驻守碣石附近之小兵轮忽见日轮在此停留半日，深滋疑惑，乃驶近日轮前侦查行动，日轮船员颇为恐慌。萱野欲将船驶往外海，伺晚间再来，惟船主以该船原属三井洋行租用，主张迳驶赴香港卸去存煤，再图别法。萱野不能阻，船遂南行。雪秋时方设法租用帆船出海，见日轮一去不返，大为懊丧。幸运丸初七日晨抵香港，邓慕韩、热衷赴《中国日报》谒余，详述雪秋接械失误经过。余即邀集胡汉民、萱野、定平、前田、金子及惠州同志温子纯、曾捷夫、曾仪卿等在坚道七十二号机关部开会，讨论补救方法。议决俟该轮于三日后三井洋行煤炭装卸竣事时，由萱野率领捷夫子纯在港召集之同志五百人，乘原船赴惠州平海洋面将存械交给该处党人，即在平海大举发难，并以捷夫仪卿叔侄二人久在其地拜盟立会，信用至厚，故令仪卿先乘小火轮赴平海传集会党准备接械，正筹备间，该轮忽因港吏得粤督照会，请扣留私运军火之船。日领事得讯，令其立即离港，以免发生交涉，遂不及尽卸存煤，匆匆启碇返日。萱野于事后始知，为之扼腕不置。而各项损失之巨，均由其友三上任之。是役之失败，各方咸归咎于雪秋之筹备不善。然雪秋仍志不少懈，坚约萱野同赴南洋筹款再举，濒行由余及胡汉民二人署名代移书南洋同志陈楚楠等云（原书现由张永福保藏）：

楚楠、永福、子麟、子瑜诸兄均鉴：启者，东江经营之事，海内外属目，而功成九仞，忽遭意外，为人力所不能抗者，以致顿挫（其详细可由雪兄亲自报告），殊足痛惜。兹雪兄等力气不为之折，誓为卷土重来之举，即彼处机局虽有所阻，而大势依然，未尝取坏，所缺欠者，则此再图之经费，日本同志萱野长知君此度为吾党之事尽力经营，牺牲甚巨，而未睹成功，亦誓不生还瀛国，因与雪兄同莅南洋各埠，为经济之运动，企集众腋以图之。盖惠潮之事，今虽暂停，而前功未废，况得战阵之事如萱野等以为助（萱野君外尚有日本陆军大尉士官数人，萱野君曾在东三省日俄之战争时代，屡与

马杰联合，辄战胜俄兵），其成绩当出前者期望之外，吾党有志光复者，断不因一次之小挫而灰心，加以异国之人犹且尽力如是，尤足生其观感，所望诸兄尽力之所及而辅助之，潮事关于大局至重，而可否再图，纯视经济问题之解决，弟等不胜祈盼之至，专此敬请侠安。

冯自由

弟 顿首

胡衍鸿

雪秋三度在潮惠进行军事之经费，除由孙总理拨款外，所得于新加坡潮州侨商林受之、沈联芳、潘兆鹏等捐输者，为数不赀。迨汕尾一役失败后，重莅南洋，则所相识热心国事之同乡，多成强弩之末，无可设法。以是淹留数月，一筹莫展。戊申（一九〇八）二月，总理由越南至新加坡，时方锐意经营钦州及河口军事，更无余力助雪秋再举，雪秋因之大为失望，适同盟会员浙人陶成章自日本游南洋，以同盟会干部措施失当为辞，在荷属爪哇各岛另倡设光复会，荷属各埠同盟会员李燮和、李天邻、时功璧等纷然和之，雪秋与陈宏生以失望之余，遂亦加入光复会，谋别树一帜，南洋各埠同盟会员之属潮梅籍者，因之稍受影响。是岁一月云南河口革命军兴，总理特派汪精卫、邓子瑜二人赴荷属文岛各处筹款接济，竟受各埠同志反对，无功而回，即陶成章、许雪秋等别树一帜之结果所致也。雪秋自是息影南洋者三年，至辛亥九月粤省光复，始偕陈宏生、陈涌波等回粤组织南路进行军，光复潮汕，设司令部于汕头旧道署，降将吴祥达挟汕尾旧恨忌之，乘雪秋不备，突然派兵围攻，雪秋、芸生、涌波等均被惨杀。事后吴祥达电告都督陈炯明，诬称雪秋等纵兵殃民，故不得已行诛等语。陈炯明入党日浅，竟直吴而曲许，不为申理，潮人莫不冤之。雪秋为革命毁家，身后零落，遗子四人，赖华侨同志为之抚养云。

心社创作人刘思复

刘思复（后更名师复）粤之香山县人，少聪颖好学，十五岁应童子试，补博士弟子员。时国中言新学者方力斥八股文学，指为亡国弱种之源，思复闻之，大为感动，遂抛弃学业，专研究科学及算术，饶有心得。壬寅年（一九〇二年）与同邑志士徐桂及族兄樾杭等发起演说社于石岐城，提倡改革，邑中士子从之者颇不乏人，复创办女学堂一所，不顾旧绅士之剧烈反抗，毅然以改良社会振兴女学为己任。甲辰年（一九〇四年）赴日本留学，渐与革命党人相往还，益有志于光复事业。乙巳（一九

○五年）秋孙总理自欧洲莅日本，组织中国同盟会于东京，思复亦列名册籍。旋至横滨，从惠州人李植生学制炸药。丙午（一九〇六年）夏秋间孙总理决议在粤大举，留东粤籍学生先后归国从事实行工作者数个人，思复其一也。时香港《有所谓报》已改名《东方报》，谢英伯、陈树人等同任笔政，思复至港，谢、陈等力邀襄理撰述，思复允之。旋与安怀女学堂教员丁湘田订立婚约。丁未（一九〇七年）春香港同盟会机关部以军界同志郭人漳、赵声等均奉调来粤充任重要军职，而孙总理所派许雪秋、邓子瑜等亦在潮惠两属运动发难，将次成熟，乃密设机关于普庆坊备同志栖止，思复与汪精卫、廖平庵数人同寓其内。是年二三月间党部以潮惠举事在即，粤督岑春煊及水师提督李准均为党人大敌，非去其一，不足以消除阻力，而张党人之声势。因有选任实行委员专任此项任务之议。思复久有此志，且研究爆裂品有素，于是乃慨然请行。汪精卫及余等咸赞成之。思复既受任，初在《中国日报》四楼密制炸药，以试验不便，乃移至宝庆坊机关部，偶因试验失慎，为水银炸药击伤脸部，遂赴澳门就医，而实行计划一时为之停顿。迨脸伤既愈，乃偕李纪堂往青山试验掷弹方法，初拟于惠潮两地军事发动期间同时著手，嗣因脸伤未愈，延至四月下旬，始在广州觅地布置一切，并由香港机关部派同志张谷山、张伯乔、朱执信诸人助其进行。张谷山字如川，五华人，向在梅县充任教员，鼓吹革命最力，是时方在广州租定城内旧仓巷凤翔书院，设一长乐留学公所，为运动军学两界之枢纽。张树楠字伯乔，番禺人，与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同在东京学习速成法政，归国后常往来港粤间，传达党人消息，最为出力。其家在制台前张大夫第，党人恒假之作会议所。二张因兹事至港，与思复磋商进行方法。与议者有余及胡汉民、李纪堂、刘槩杭诸人。决议李准方由汕头班师回粤未久，应即行诛以示威，使张谷山担任在凤翔书院附近觅一僻静地所，以为实行机关之出发点，张伯乔则担任侦查李准每日来往必经之要路，以便相机行事。议定后，张于四月二十六日返广州，思复旋接张伯乔报告，探悉李准每月朔望二日拂晓恒赴总督署参谒，每行必乘怒马疾驰，大可邀之于道等语。遂不待张谷山回报，二十九日早迳乘轮抵省，由谷山就凤翔书院中择一静密之房舍居之，复携谷山偕往督署及水师行台二处之前后左右交通道路，详细查考，以便行事。又以张伯乔所居在制台前，李准来去行踪不能逃过其耳目，相约五月初一早亲见李准入督署时，即到凤翔书院报以暗号，而思复即可密伺李于要道而狙击之。詎伯乔如约于初一日拂晓目睹李乘马入督署后，匆匆过凤翔书院门外报信时，思复尚未准备竣事，及见李乘马出督署驰返水师行台，思复仍未外出，知是早之机会全然错过，如欲卷土重来，又须准备若干时日矣。思复所用炸药及铁弹，均由香港制就，分别携至广州，弹为螺旋式，用时以药粉与砂粒混合，然后配以铁壳。是早思复起床稍迟，致不及配置完善，初已装成炸弹一具，迨配置第二具时，铁壳外之螺丝边因有余药遗置纹上，稍遇摩擦，立行爆炸，声震若雷。思复被爆伤面部及左手下部，五指全废。谷山闻声往视，则见思复尚挺然直立，头部

及手足皆鲜血狼藉，乃摇手使其勿声，自往邻近之图强医院，求医士伍汉持速往救伤。继复趋回书院，见伤者已横卧床上，神气尚清，亟问曰，医生即来，所有重要什物应速收拾免被军警搜获。时榻上之洋毡角置有已配成之炸弹一具，思复即命其移置室外之便溺缸。谷山曰，怕其炸否？思复曰，碰硬则炸，可轻轻拈至溺缸，徐徐放下则不炸矣。谷山依言行事。未几，同寓之学生工人闻声大集，附近之站岗警察亦来。伍汉持则挈医学生陈逸川、周演明、黄又夔数人携药品匆匆而至，见伤者满身是血，大骇。初以为被人用枪击伤，并未疑及炸弹爆裂所致。思复自称三水人李德山。及伍医士问以如何致伤，则瞑目不答，在旁之警吏谓非通报警局查明不可。谷山知事趋严重，遂托辞外出，驰赴豪贤街朱执信宅报警，并即易服去须，绕道佛山而至香港，当图强医院学生陈逸川察视伤者时，见床边藤篮内贮铁弹二枚，知为党人所为，复见床席下外露书函数件，即收入衣袋内藏之，纷扰良久，警吏因发现铁弹，渐疑伤者为革命党人，巡警道龚心湛令暂舁伤者入韬美医院，俟伤愈乃审讯究办。思复既入院，法国医士恐伤势延及全体，遂将左手下部全行割去。初二日晨谷山与朱执信先后至香港《中国日报》告变，余与胡汉民、李纪堂共商挽救之策。翌日余派男女党员数人至粤，联络韬美医院侍役，谋乘间援思复由医院后门水道出险。经营数日，卒以警吏防范严密而止。粤吏初严缉谷山，李准风闻此案以己为目标，主张从严究办尤力，因谷山无法弋获，遂疑与图强医校有关，特派军警大搜该校宿舍，无所得，仅检获美洲温高华《华英日报》记者崔通约致校长伍汉持函件。中有“今日欲谋革命非革命思想普及人心不可”一语，指为与革命党人往还之证据，遽将伍汉持拘去。伍时在法政学堂肄业，法政学堂校长夏同和及教员杜之秋等闻之，乃联名具函为伍保释，而伍狱始解。思复伤愈出院，清吏研讯多次，均自称三水人李德山，因试验化学受创，绝不肯供招真姓名。后因其聘妻丁湘田到狱视病，粤中各报相率揭载，世人始知所谓李德山者即刘思复，而思复亦不再于粤吏鞠讯时隐讳矣。粤吏经再四审问，均无佐证，卒判令解回香山原籍监禁，思复自是系香山县城监狱者两载。至己酉（一九〇九年）夏陈景华自暹罗归香港，余知陈与豪绅江孔殷有旧，乃托陈为思复设法营救，江孔殷受陈托，因向当道说项，而出思复于狱。思复至香港，同盟会诸同志开会于跑马地愉园以欢迎之。思复在港息影三年，专研究巴黎《新世纪报》倡导之无政府主义，极为精进。辛亥（一九一一年）八月武昌革命军起，粤中党人亟谋响应，思复与莫纪彭、林君复等运动驻香山前山镇之新军率先反正，号称香军，旋率兵会师广州，闻张鸣岐出走，胡汉民已任都督，遂放弃兵权，不问政事，隐居于杭州西湖白云庵者数月。复鉴于旧日同志之热衷权利，乃发愤宣传无政府学说，以为敝屣功名之倡。初创设晦鸣学社，发刊各种宣传品，继与莫纪彭林直勉等组织心社于广州东园，规定十二戒约：（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婚姻，（六）不称族姓，（七）不作官吏，（八）不坐轿及人力车，（九）不作议员，（十）

不入政党，（十一）不作陆海军人，（十二）不奉宗教。凡社员须一律敬谨遵守。癸丑（民国二年）八月龙济光入粤，晦鸣学社被封，思复乃移居上海，编印《民声》杂志，鼓吹无政府主义及世界语，不遗余力。甲寅（民国三年）三月，以积劳成瘵，卒于医院，时年三十有一，民声社诸同志特为营构墓地于西湖烟霞洞侧。以前之心社信徒，自是风流云散，无复有效忠十二戒约者。

国会议员流血第一人伍汉持

伍汉持，广东台山县人，少笃信基督教，肄业佛山西医学院，既毕业，悬壶于香港油麻地，与革命党员郑贯公、史古愚（坚如之兄）、陈典方（少白族弟）、崔通约等过从最密，渐萌革命思想。壬寅癸卯间（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史古愚、陈典方、崔通约等组织学校于九龙，汉持任卫生教员。壬寅冬余自日本返国，始识汉持于该校。时俄人谋进占东三省，清廷有与俄政府订立密约之议，粤志士桂少伟等联名致电清廷抗争，汉持亦列名焉。乙巳（一九〇五年）汉持与李自重、史古愚、陈典方等复创九龙光汉学堂，注重兵式体操。香港各学堂纷纷踵之，全港学堂之尚武精神为之一振。翌年迁地广州，夫妇二人合设图强医院及产科学堂于旧仓巷。男女生徒从游者颇不乏人。会粤更有法政学堂之设，执教鞭者皆留东归国速成法政毕业学生，杜之秋、朱执信、古应芬、张伯乔、叶夏声等咸任讲师。汉持素热心时政，且深慕孙总理为人，以为当此国步艰难，业医者非兼娴习政事，不足以应付时势。遂毅然向法政学堂报名入学，以年冠诸师长，益刻苦自励，学业猛进，诸教员咸器重之。丁未（一九〇七年）四月党人刘思复，张谷山，张伯乔等在广州旧仓巷凤翔书院密设机关，谋暗杀清水师提督李准。五月初一清晨，刘思复以制炸弹不慎，爆伤面部及左手下部，谷山仓皇赴近邻图强医院求汉持速往诊视，汉持与思复谷山等素不相识，且不知为革命党人所为。闻讯乃挈学生陈逸川、周演明、黄又夔三人驰往凤翔书院，见思复伤状，且自称为三水人李德山，初以为被人用枪击伤，并未疑及炸弹爆裂所致。及察视伤势时，见床侧藤篮内贮铁弹壳二枚，始觉与党人有连。继见床席下露出书信数件，乃与学生陈逸川各收入衣袋内藏之，期掩灭痕迹。时警吏大集，及发现藤篮内炸弹，咸战栗无人色。巡警道龚心湛令将伤者暂舁入韬美医院，以便穷究。警局疑此案必与图强学堂有关系，是晚即派大队军警严搜校舍，仅检获加拿大温高华埠《华英日报》记者崔通约致汉持一函，中有“今日欲谋革命，非革命思想普遍人心不可”等语，遂指为与革命党人交通之实证。遽将汉持拘禁系狱。水师提督李准

风闻此案以己为标的，主张彻底严办。后经法政学堂校长夏同和及教员杜之秋、古应芬、叶夏声等联名具函保释。粤吏始准汉持取保开释。事详冯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兹不赘述。是岁秋孙总理自河内函命余物色医学界同志，为钦廉革命军救伤之需。余致书汉持约其到香港面商要公。汉持乃派图强医院学生周演明前来商洽，颇资得力，后二年，汉持与陈炯明同在法政学堂，以第一期班生毕业。迨民国成立，国民党粤支部进行筹备国会选举，汉持亦列名竞选，一部分党员借口汉持往年于凤翔书院刘思复被炸伤一案，曾主张报警验伤，使思复几罹不测，指为有意陷害，因而发生异议。胡汉民、刘思复、张谷山等乃各在报端发表辟谣告白，为汉持辩诬，群疑始释。民二春汉持当选众议院议员，旋挈眷偕叶夏声等诸议员联袂北上。余时受国民党本部招待粤籍议员之托，预觅得北京南城东莞新馆等处为同乡议员居所。汉持与叶夏声同携眷属下榻其中。诂东莞新馆向有时见鬼物作祟之传说，旅京莞人相惊伯有，罔不视为畏途。余等在京日浅，皆不知之。汉持居此未久，夜闻其携来广东仆妇时作北方口音，“这个那个”之声，彻宵喧闹，嘤嘤不休。此仆妇原不解国语，粤语之外，实毫无所知，故汉持等咸咄咄骇诧不置。汉持本基督徒，素不信怪异，惟以家人惊扰不宁，乃不得已移寓骡马市大街佛照楼旅店以迁就之，亦异闻也。是岁四月国民党与进步党争选众议院议长至烈，进步党以获袁世凯大量金钱之助，其首领汤化龙遂得膺选议长，汉持痛诸人民代表之贪利害公，为之愤恨不已。时有同乡江某者，乃父太史于乙巳秋尝托胡汉民挈之东渡留学，即由胡汉民介入同盟会，以是因缘遂得于辛亥广东反正后出入广州同盟会会所，与诸党人时相委蛇，党人无疑之者。及民二国会选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以与江某有世谊，知其与民党议员多有往还，特使专任收买粤籍议员之责，以为袁世凯称帝之准备。因此西城之甘石桥梁宅，时有粤议员足迹。旋复创设一罗致粤议员之猪仔机关，名曰潜社，粤议员入其彀中者，几达半数。就中属同盟会籍者亦有黄某等四人。皆江某牵线之力也。一日江某诣佛照楼访汉持，代梁士诒致意，馈以交通银行五千元支票。汉持以财来不义却之。四月二十七日袁世凯私向五国银行大借款案成立，汉持大愤，自草一查办袁世凯十大罪案意见书，遍求各议员副署，众多闻而骇退。签名者仅得叶夏声等十人，勉强向国会提出，卒为议长汤化龙搁置。七月中旬二次革命爆发，赣、宁、皖、粤各省讨袁军相继大举，是月二十二日夜，余及国会议员汤漪等八人，在李铁拐斜街公余俱乐部被逮，拘禁警署。二十六日余获开释。翌晨匆匆襆被出都，迨登车，则赫然汉持偕其长子在焉。盖自余等被捕后，外传袁世凯将大捕议员，民党议员先后赴津避祸者百数十人。汉持独淡然处之，诸友好以其曾提查办案，力劝往津暂避，至是日始断然离京也。余适与汉持同一车室，纵谈时局，各抒胸臆，咸太息帝制遗孽之误国殃民不能自己。及抵天津，余寓日租界日人旅馆。汉持亦寓日租界德义楼客店。方以为同托庇于外人势力之下，可期万

全。诂余首途赴沪后十余日，闻汉持因往法租界佛照楼访友，竟在华法界路电车中为天津警备司令杨以德所部军警逮捕，拘禁未久，即以枪毙闻。是为中华民国国会议员流血之第一人，时李准方作天津寓公，或谓李挟丁未刘思复一案之宿仇，故速其死，在理或然。然袁世凯既痛恨汉持之提查办案，则先假汉持一人，以对国会全体作敲山震虎之举，亦意中事，固无待夫李准之构陷，而汉持亦自有可死之道也，汉持就义之次日，适为被捕八议员丁象谦、常恒芳等押解到津之时，亦羁禁于绰号屠户杨以德处，闻者多代为危险，不意杨某因办伍案过惨，舆论攻击，竟改易态度，殊出一般意料之外焉。后两月，余在香港，汉持夫人以其夫生前尝在康年人寿保险公司购寿险二千元，求余代向该公司保证收款，余从之，是岁十一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会及省会中之国民党籍议员，国会遂无形解散。参众两院议员先后继汉持被害者，有徐秀钧、林文英、姚勇忱、徐镜心诸人。后四年，即民国四年六月六日，袁世凯以忧愤死，帝制瓦解，国会恢复，汉持求仁得仁，死不虚矣。

南军都督王和顺

王和顺字德馨，号寿山，广西邕宁人。少负奇气，以行侠尚义闻。弱冠入伍，隶提督刘永福部为哨官，每战恒身先士卒，上官多器重之，时清政不纲，洪门会党潜伏两粤腹地已久，纷然并起，以反清复明相号召。和顺知其可用，思以兵法部勒之，为光复祖国用，立弃官入会，以义勇得众心，名以大著。壬寅癸卯间（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三）有陆亚发者，广西著名之游勇头领也，与和顺素相莫逆，金以其时清军在桂兵力异常空虚，大可乘机而动，遂相约分头举事。亚发一举而陷柳州，庆远、思恩、郁林各属纷纷响应。和顺亦占据南宁、梧州等属多县，以相犄角。清将苏元春等望风而逃，清廷大为震惊，特令粤督岑春煊以七省之兵临之，悬赏十万购陆王二人首级。复遣使招降，饵以禄位，均不为动。相持两载，卒以众寡不敌，亚发死焉。甲辰（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和顺率余众退至邕属四塘墟，犹阵斩清帮统吴胜贵以示威，后知事无可为，乃携其侄阿福走香港，潜匿九龙光汉学校，由同志史古愚、伍汉持、李自重等庇护之。旋托其侄于李自重，使雇佣于金利源药材行，遂避地越南西贡，赖堤岸侨商黄景南、李亦愚之助，得免于冻馁。乙巳（一九〇五年）冬孙总理自日本至西贡，将有事于两粤边防，和顺谒之请益，即加入同盟会，总理命随至河内，同寓甘必大街六十一号，解衣推食，礼遇至优。时总理行馆偶乏仆役，各同志内衣咸由总理亲属陈四姑亲自洗濯，和顺引为不满，见诸辞色，黄克

强不能堪，语总理曰，先生以国士待和顺，而和顺不礼，盍稍抑之。总理曰：和顺出身行伍，举止粗豪，自所不免，吾为国纳贤，安可因细故与之计较。和顺闻之，益为感奋。丁未（一九〇七年）春夏间，钦州三那乡民刘思裕等，愤清吏苛征糖捐，聚众抗官，粤督周馥派统领郭人漳标统赵声各率兵赴钦弹压。总理与黄克强以郭赵均属革命党员，认为时机可乘，克强亲莅钦州，驻郭人漳军中，更委任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专任钦廉军务，令随胡毅生至廉州，居赵声营十余日，由赵给与军事委员任状，遂易名张德馨，偕同志霍时安经区家墟平银渡至钦州府城，沿途防军皆信为政界委员张某，无有知其为革命党要人者。居府城一日，即取道赴那桑，三那父老已派人远接，时同志梁建葵、梁少廷先已奉命在三那各乡组织民军，预备发动，有枪数百枝，刘思裕之侄显明率数百人来会，声势颇盛。和顺初与赵声约，拟先率党众进取南宁，而赵以所部新军自后尾追，相机暗助，倘得南宁后，攻取他处亦用此法，后以运动南宁清军目的不达，始变更计划。和顺率党众来往三那附近，日谋伺隙而动。抵平吉时，刘显明因和顺久无办法，遽引所部散去，和顺以粮食不给，乃率余众至板城墟就食，乡民咸乐供给之。和顺留三那数月，迄未得机发难，适驻防城清军连长刘永德（辉廷）、李之焜（辉堂）二人表示有意反正，乃决计在防城起事，派员赴越南向孙总理请示，总理以防城近白龙口，有海上接济之利，深为赞成，即分电香港冯自由及日本长崎萱野长知，令雇船将在日预购之军械运至白龙港起岸，备革命军取用。旋因从日本运械至钦州沿岸，须由河内香港二处辗转传递消息，事实上必不能于最短期间做到，遂不得不改变原议，另觅相当地点为接械之准备。（著者按总理略传，谓是役接济军械之失败，由于东京同志某等以明电通告香港《中国日报》，以致风声外露所致，实不尽然。盖运械至白龙港之计划，经和顺与萱野及著者三面详细研究，认为配置时间地点人员三者均有窒碍，同向总理提议作罢。故总理遂改将此项军械拨给许雪秋应用，即是岁九月由萱野亲自乘轮运至惠州汕尾，因事折回之军械是也。）和顺以运动成熟，不能再延，即于七月下旬率众二百余人，从三那之王光山袭取防城。二十七日开始攻击。二十八日清军驻衡字营连长刘辉廷及团长唐浦珠率先响应，驻对河之连长李辉堂继之，党军入城，杀清知县宋鼎元及其幕宾家属等十九人，四处张贴中华国民军南军大都督王告示。即日率部众五百人向钦州府城进攻，欲袭取府城为根据地，适连日大雨连绵，道路泥泞，有碍行军，行一日夜始达城外，遥见城上灯火密布，知已有备，乃下令退却，驻兵于距府城二十里之地。黄克强在城内闻讯，商诸郭人漳，以出巡为名，带兵一连出与和顺商议进行方法。克强述人漳意，谓城中有钦廉道王瑚及其所部多营为梗，欲使和顺督所部先进攻广西，占南宁后，人漳即设计除王瑚以反正，并允助和顺弹药，以备进攻。和顺不赞成此策，仍主攻城之议。克强不得已乃私约以夜间暗袭，届时由克强带兵开城接应。诂王瑚早闻郭部有通敌之报，是夜自领亲军巡城，严密设备，克强于夜半开城之计遂以不成。初三晚和顺引兵至城外，见无

接应，知事有中变，仍退驻原处。旋得克强密报，告以城中有备，不易下手，仍劝令进取南宁，和顺以南宁向驻重兵，且乏内应，亦不易制胜。闻灵山县城守卫空虚，大可乘隙而袭。于是改议进攻灵山，取道入桂，行三日而至南劳墟，沿途民团多携械来投，有众千余人，惟枪械则不满千。再行半日抵檀墟，距露山城十二里，城外有一山名六峰山，山下有桥曰环秀桥。相传环秀二字乃一富户美婢之名，遗有艳迹，乡人皆能道之。桥距县城约半里，和顺预使该处同志陈发初制竹梯三十具，备登城用。诂陈仅制备二具，殊不敷用，乃派精锐二百人先登，登者仅刘梅卿等数十人，后到者因梯折而退。刘等在城内与防军苦战一日，伤亡颇众。城外党军因城不易下，乃退驻小山，次日有清兵千余人从南乡来援，党军一面攻城，一面分兵拒敌，剧战三日，以弹药告乏，始拔队退却。遂由滑石冈、凤凰山、武厘、北通等处取道回三那。和顺以一时无力进取，即下令解散，并令梁建葵率一部精锐退入十万大山，以备后图，已则折回河内，向孙总理报告是役失败之经过。总理对之慰勉有加，仍令担任桂边镇南、平宜、水口三关之军事活动。是岁十月初五日和顺偕何海荣赴那模村，欲与桂边凭祥土司李祐卿议夺取镇南关事。抵文烟及那感墟时，法国兵惊疑为日本侦探，两次被逮，再三解说始免。迨至那横，李祐卿所部游勇与和顺意见不合，拒绝合作。和顺知无可为，乃怏怏归河内，总理于是改派黄明堂、关人甫二人继续进行镇南关军事，而使和顺谋取水口关，以为声援。至是月二十七日，遂有革命军占领镇南关炮台之举。是役总理及黄克强等于夺取炮台后，均自河内亲临台上指挥，独和顺不预焉。即以其与李祐卿所部不偁之故也。镇南关之役既败，总理乃命黄克强率钦廉党人及越南华侨从越边进攻钦州，仍令王和顺佐黄明堂关人甫规划攻取云南河口，以窥昆明。戊申（一九〇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晚间黄明堂、关人甫、王和顺率所部百余人举义于滇边信防（即河口），血战一日，占领山上炮台，诛杀清防务处督办官王镇邦，清兵六营尽降，全滇震动。四月初五日和顺始督兵沿铁路进攻，以后方供给不继，遂屯驻铁路七十八基罗之点不进。时黄克强方由钦州折回河内，奉总理电委为国民军云南总司令，令统领大军前进。初八抵河口，见军事进行复多疲玩不振，而屯兵不进，尤误戎机，乃力催明堂添兵助和顺进取昆明。明堂以米粮不足，意甚犹豫，乃派人至前敌约和顺来会，共商进攻之策。和顺亦以兵少弹缺为虑。克强遂欲亲率一军袭取蒙自，而将士多不听号令，乃知本身非有基本军队，不能指挥他军，决计自回河内，拟征集前在钦州旧部组织基本队，购置盒子炮多挺，然后再赴前敌。及抵法属老街，法兵以其貌似日人，遽逮捕之，后悉为中国革命军大将，则按照国际法，例当拨送出境。克强遂被法吏遣至新加坡，而革命军失此导师，士气为之一挫。时明堂和顺等屯兵不进，众心渐懈，清廷乃调滇桂两省之兵数万人，实施大包围战略，和顺在泥巴黑附近与清军相持二十余日，卒以子弹渐缺，不得已向河口撤退，继以河内侨商黄隆生等解来米粮忽为法官禁止通过，将有绝粮之虞。迫得将义军宣布解散。除令队长何护廷马大等率一部精锐退

入桂边外，明堂和顺及将士六百余人，先后由法官派轮护送至新加坡安置。总理特令当地侨商陈楚楠、张永福设法介绍诸士卒各埠工厂矿场农园，使各安生业。和顺由是息影南洋者三年。至辛亥（一九一一年）三月黄花岗一役之后，始回香港有所活动。是岁八月武昌革命军起，粤中志士纷纷谋举兵应之。和顺不求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助，独自募集饷糈，在惠州发难，与清军血战于飞鹅岭者七昼夜，卒于九月光复惠州。嗣广州反正，遂率所部十七营会师羊城，即当日号称惠军者是也。民元陈炯明继胡汉民任粤都督，实行消灭民军政策，和顺不为屈，遽率所部抗之，不敌出走。旋北游燕京，欲饱览天下形势，袁世凯拟罗致为己用，特以总统府军事顾问问饵之。和顺居京逾年，知袁氏有异谋，遂弃职南返。民四年十二月袁世凯公布帝制，粤中党人起兵声讨者，有中华革命军及护国军等等，和顺亦组织义军，以相策应。民十一年六月陈炯明叛，孙总理避至上海，和顺乃赴梧州，与滇军将领张开儒、杨希闵谋回师讨逆。迨滇桂军入粤，重开帅府，始解军职。自是隐居羊石，口不言功者多载。民廿二以历年感受山瘴得足痛疾，旋愈旋发。民二十三卒以痼疾不治逝世，年六十有六。遗三子四女。妻刘守初亦同盟会员，以其夫身后萧条，乃发刊华侨通讯社，卖文以自给。中央党部以和顺有功革命，特给恤款年金五百元，以六年为限。余作联挽之曰：“钦廉转战经旬，复指挥河口义师，论功不让黄近午（克强别字）；清廷悬赏十万，仅博得民国薄恤，当局何忘介子推。”

香港陈杨三家与革命党

陈杨三家之名词 陈杨三家者，香港富商陈席儒、陈赓虞、杨西岩三人之简称谓也。二陈为檀香山华侨大种植家陈芳之子，香山县人，各得其父资产巨万，归国后历任香港德忌利士轮船公司买办，在港商界中素以财雄见称。杨西岩原名蔚彬，新会县举人，尝任檀香山领事，少受乃祖遗下多量地产，有轮船码头曰杨泰兴，月获租值甚丰，时人金以大地主名之。丙午（一九〇六年）春粤督岑春煊以武力收粤汉铁路为官有。陈氏昆仲及杨西岩三人以大股东资格，领导粤省及香港澳门各地股东开会反抗。陈杨三家之名词，即自此始。

陈杨三家与粤汉铁路 丙午某月粤督岑春煊召集粤汉铁路全体股东开大会于铁路公司，派幕府洋务委员温宗尧代表出席，宣布决将铁路收归官办理由。各股东闻之大哗。粤绅黎国廉（桂裴）遂代表多数股东起而反对，力言强收官办之违法占权。温宗尧愤然大烧台炮（粤语谓拍桌子为烧台炮），拂袖而去。岑督旋下令将聚众抗官之股东代表黎国廉拘禁系狱，粤人大为反对。粤港及海外各报咸

力助股东，措辞异常激昂。岑督复严禁粤中各报登载反对言论，违者封禁，港商陈席儒、陈康虞、杨西岩均属该路大股东，至是遂号召在港股东组织粤路股东维持路权会，函电向清政府极力抗争，并派代表北上谒同乡京官戴鸿慈、唐绍仪、伍廷芳等请求协助。是会争讼数年，所费不貲，仅电报及广告等项已耗十数万元，多由陈杨三家解囊相助。而为三家之谋主者，即为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兼《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陈杨三家之与革命党人发生关系，亦在此时。

陈杨三家与革命党 二陈之父陈芳与檀岛希炉埠大畜牧家孙眉（德彰）素有交谊，孙眉即孙总理长兄，故孙总理在香港澳门间业医时，以世谊乡谊之关系，与二陈颇有往还。陈少白于己亥（一八九九年）冬奉孙总理命返港发刊《中国日报》，由律师何启富商李纪堂等介绍，渐与二陈结识。杨西岩与陈少白相交始于乙巳（一九〇五年）冬，盖是时港商有拒止美国禁制华工苛约会之组织，西岩为发起人之一，何启与少白同任该会顾问，少白每事指导得宜，西岩极信任之。及争路事起，陈杨等以少白雄才博学，奉为导师，凡会中一切计划莫不言听计从，所有文电咸出少白手笔。时《中国日报》已由荷理活道迁至德辅道，该报四楼社长室，无形中成为争路会办事处。每次发出致清政府及各省疆吏电报动辄千数百言，亦由少白介绍香港中国电报局译员之同盟会同志梅县人梁扩凡任之。《中国报》虽在香港发行，而销路之畅达，则有赖于广州。盖其时港中商民多缺乏政治思想，于偏重政治之报纸，绝不措意。故《中国报》出版四年，销于粤省及海外各埠者殆占三分之二。迨粤路风潮发生，《中国报》及各港报均仗义执言，一致抨击岑督之非理。岑督莅粤之初，颇能励精图治，尤重视《中国报》，对于该报用人行政之批评，间有采纳。及为港报同声反对，遂下令禁止港报入口，《中国报》亦不免焉。其于宣传主义上之损失，殊非浅鲜。

陈杨三家与《中国报》 先是癸卯（一九〇三年）某月《中国报》以维持困难，尝与香港文裕堂印务公司合并，成为文裕堂印务公司资产之一部。乙巳（一九〇五年）冬因攻击保皇党在美洲行骗事，被康有为之女同璧在香港法院控文裕堂以毁谤名誉之罪，双方涉讼多月，迄未解决。及丙午夏，文裕堂以营业不佳，有牵累《中国报》之虞，陈少白深以为忧，陈杨等以《中国报》为争路事牺牲绝巨，尝语少白，谓倘报馆为讼事不能支持，彼等当合力斥资万元以助，借酬党人协助彼等之劳等语。少白及冯自由等咸信之。及是年八月文裕堂果宣告破产，陈杨等虽于事前知之，而默无一言，少白竟束手无策。冯自由时任该报记者，以此举关于民党信誉绝巨，乃求援于外舅李煜堂，赖其助力。事前以五千元向文裕堂购出《中国报》，始得免于拍卖。《中国报》既改组，同时迁于德辅道三百〇一号，冯自由继任社长。同盟会同志以陈杨等食言而肥，多怀不满，至丁未（一九〇七年）春革命党谋在惠潮两属发动军事，孙总理以经费缺乏，乃亲书一函致陈杨三人，请合筹军饷十万元。该函乃由越南河内寄冯自由，令交少白

相机办理。诂少白得书后，谓陈杨等原非有心革命，向之筹款，徒伤感情，竟退回原函，不允代交。是年四月十一日潮州黄冈革命军起，冯自由以义师需饷至急，遂将该函直接送交德忌利士轮船公司陈赓虞手收，并遣同志李纪堂访陈探询意见。赓虞竟对李声言，革命党起事为妨害商务，殊属不智。如此次黄冈作乱，彼之轮船公司营业大受影响，即为明证等语。李以赓虞如此措辞，遂据以报告《中国报》。同盟会诸同志以陈杨前既不践协助《中国报》之约，已属负义，此次既不助款，尤复公然反对，咸为愤激。次日《中国报》即著有《民族与铁路》一文，痛论“今日救国须以实行民族主义为根本问题，根本既解决，则其他枝节可以迎刃而解。争路事件不过枝节之一端，有志救国者应从根本设想”云云。孙总理初意陈杨三人必能输财助饷，以济义军，至是始大失所望。

陈杨三家与陈少白 陈杨等抗争粤路股权两载，至岑春煊调任离粤，风潮始息。少白至戊申（一九〇八年）某月，以计划争路之责从此息肩，乃向三家求践前诺。首商诸陈赓虞，赓虞曰，吾兄弟对此绝无问题，君可先问西岩，西岩能助若干，吾兄弟即可照数相助。少白乃转商西岩，西岩仅允助资一千元，少白虑赓虞以西岩为例，私告赓虞，谓西岩允助二千元。赓虞曰，吾人前允酬君等万元，以答历年相助之劳，今西岩既允助资二千元，则余数当由吾兄弟二人凑足此数。于是少白遂得陈杨等酬金实数九千元，即以此款购置九龙牛池湾田产若干亩，辟建农场，并移家居焉。未几，孙总理之兄眉以营业失败，自檀岛挈眷归香港，少白乃假以农场一部，使自种植为活。己酉（一九〇九年）冬革命党谋使广州新军反正事机渐熟，孙眉担任在其农场密缝制青天白日旗，备起义之需，事为少白所知，虑招当地警吏干涉，于彼不利，遂强制孙眉，不许在其农场区域行险。孙眉不得已乃迁湾仔东海旁街七十六号四楼冯宅继续缝制。是即庚戌（一九一〇年）新正广州新军反正所用之青天白日旗也。越年孙眉以招收党员事被放逐至广州湾，其所借农场仍归少白所有。

民国后之陈杨三家 陈氏昆仲席儒尝留学美国，知识远较乃弟为开通，戊申冬清帝后逝世，港侨多不遵守所谓国丧，赓虞独须发不薙，白衣白冠以过市。民元后少白辞广东外交司长归职香港，与赓虞及李煜堂等创立粤航轮船公司，并充任该公司协理，即陈李等所荐用。少白所建九龙牛池湾楼宇及农场亦以善价售诸赓虞，即赓虞历年大兴土木之九龙别墅是也。席儒于民国后与陈炯明私交颇笃。民十一六月陈炯明、叶举等据粤叛变，私委席儒为广东省长，在职数月，即随炯明出走。席儒之子永善尝由炯明委充粤兵工厂总办，某年在港被人狙击，弹留腰部数载乃亡。杨西岩于辛亥粤省反正一役，尝联合港商多人犖金附义。民十一孙总理出兵北伐及民十二讨陈复粤二役，更将其在港地产陆续变卖，悉充饷糈。毁家纾难，尤属难能可贵。要而言之，陈杨等三人在辛亥以前，只于陈少白私人有相当关系，实未予革命党以何种之助力。迨民国成立，二陈亦仅向当局权要，虚与委蛇，未立寸功。独

西岩于民九始正式加入国民党，自粤军从漳州返旆，以迄民十二孙总理重开府广州，均踊跃输将，始终不懈，以视二陈之缺乏国家观念相去远矣。

《新世纪》主人张静江

张人杰字静江，浙江吴兴人，上海张园主人之子也。父歿，分得遗产巨万，性豪侠，好施与，以体弱足蹇，不良于行。癸卯甲辰间（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孙宝琦任驻法国公使，静江夤缘得充使馆商务随员，遂在上海巴黎间经营中国古董贸易，设一店曰通运公司，法人之有中国古董癖者，咸趋之若鹜，以是获利甚丰。旅法数年，渐结识西欧无政府党诸学者，获聆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学说，因之思想锐进，立论怪特，隐然以中国无政府主义之宣讲师自任。时我国留欧学生之倾心革命真理者，大不乏人，以静江身任使馆随员，而口操过激论调，疑为别有作用，多未敢与之往还。某岁比国烈日城开博览会，静江随清公使孙宝琦往观，逢人必谈革命，留比学生贺之才等对之尚怀戒心。乙巳（一九〇五年）夏间孙总理自纽约至巴黎，与留法、德、比、瑞诸国学生胡秉柯、魏宸组、贺之才、史青、朱和中诸人发起中国同盟会，静江犹未与焉。是岁某月静江乘法轮赴某地，闻总理适与同舟，乃趋谒总理，自道姓名，谓总理曰：“君非实行革命之孙某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总理大喜，乃与之互约通电暗号，约定电文 ABCDE 之次序：A 为一万元，B 为二万元，C 为三万元，D 为四万元，E 为五万元。事后总理犹未敢深信初次相识之静江能有求必应也。丙午（一九〇六年）冬间总理自南洋至东京，以经济困乏，束手无策，一日语黄克强曰：“吾昔在法轮中邂逅一张姓友人，其人系供职巴黎清使馆，而兼营古董业者，尝告余至急需款时，可随时致彼一电，彼必尽力相助，今姑发电一试。”克强闻为使馆人员，颇滋疑虑。及总理按址去电，数日后即有三万佛郎从法汇到，一时东京同盟会本部为之顿呈活气。丁未（一九〇七年）夏间总理移居越南河内，以经营两粤军事需款，复电静江以 A 字，更电以 E 字，两次均如约汇到，数月后两粤各地军事之得以旋仆旋起者，静江之力为多焉。总理曾命胡汉民代作书道谢，并详述军事经过。静江复书曰：“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云云。”是年静江与李煜瀛（真民）吴敬恒（燃）等已在巴黎发刊《新世纪》

报》，专提倡无政府主义，奇谈异说，震惊一世，其资本多由静江任之。我国人之言无政府主义者自兹始。《新世纪》出版后数月，静江以事归国，舟过香港，尝登岸访余于德辅道三百〇一号《中国报》馆。丁未五月孙总理以同盟会香港机关部经营潮惠两府军事需款，令余电静江求助，余遂致电上海福建路四百〇八号通运公司转静江乞款。距去电月余，迄未得复。是年六月十九日，静江忽偕周伯年（名觉，浙江人，曾任监察院委员，民二十五身故）至港，谓港地气候温暖，于其足疾适宜，特来此养病。余即夕宴之于杏花楼，并引见李纪堂、胡汉民、余育之等。静江纵谈所笃信之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等学说，议论生风，所谈男女关系之界说，尤见天真。据谓“世人过分重视性的关系，最为错误。盖社会所以划分男女关系，如此明显，乃传统的习惯使然，而种种罪恶即缘是产生。此种习惯未尝不可改革，譬如我们的手可行握手礼，口可以行接吻礼，则性的关系又何尝不可用以行礼乎？”此种思想，颇与浏阳谭嗣同著《仁学》所说相似，世俗闻之当为诧异不置矣。余及胡汉民复约晤静江伯年于坚道七十号同盟会机关部，余知彼在欧尚未入会，乃请伊与伯年补行入会手续，两人无异议。及见同盟会盟书有当天发誓字样。静江曰：“余为无政府党，不信有天，如许余不用‘当天’二字，当可如命。”余与胡汉民乃破例许之，余时询以曾否接到余一月前之函电。静江愕然曰：“余得君电，即由某西商银行电汇君名收五千元，岂未收到乎？”余答曰：“无之。”静江大异。余等遂约李纪堂同赴该行办事房查询。始知静江所发英文“冯自由”三字为浙江口音 Von Tsu yao，银行译作黄聚祐，持以问《中国报》营业部，答以并无黄姓其人，而银行遂以投递不到塞责。静江谓其过在于银行，要求银行补偿延搁之利息，银行固不允任究也。此款经余等交涉多次，至七月十三日始由金利源药材行保证收回。静江借寓香港黄泥涌道愉园两月，乃返上海。庚戌（一九一〇年）夏间余赴加拿大，舟过上海时尝登陆访之，而静江已他适，仅获见其伙伴周伯年而已。庚戌辛亥间陈其美、周淡游诸人屡图在苏浙各地举义，所需饷械，以静江筹措之力为多。民国肇建，总理初拟提出静江为南京政府财政部长，静江坚拒不就。癸丑（民二）八月南方讨袁军失败，翌年总理另创中华革命党于东京，特邀静江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静江毅然不辞，惟以宿疾不克东渡供职，概由次长廖仲凯用静江印章代行职权，静江不过问也。观静江为人，自投身革命党以来，只尽义务而不问权利，三十余年如一日，孙总理初遇之舟中，即称之曰奇人；及后更誉之曰革命圣人。就静江生平言之，诚非虚誉。

记刘光汉变节始末

刘光汉原名师培，字申叔，江苏仪征人。少聪慧好学，尤研精历史掌故，文名籍甚。中癸卯（一九〇三年）科举人。弱冠后，渐与革命党人相往还，油然萌光复汉族之志。甲辰（一九〇四年）秋冬间蔡元培、龚宝铨、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于上海，光汉以蔡元培之介入会。是年冬俄人进兵东三省，全国骚然，蔡氏乃与光汉发起《俄事警闻》，日以危言，警惕国人。旋改名《警钟日报》，隐然以继承革命系统之《苏报》及《国民日报》自任。且延林獬及陈去病、汪允中、林宗素为编辑。出版数月，因辱骂德人，德领事遂邀集各国领事封禁报馆，且欲逮治光汉。《警钟日报》由是停刊，光汉乃匿居于浙江平湖大侠敖嘉熊家。时敖方创设温台会馆，为浙西党人之交通机关，因光汉来投，引为臂助，颇资得力。光汉寓嘉熊处半年，因安徽友人之招，乃往芜湖。历任安徽公学、皖江中学、赭山学堂各校教职，与张通典、苏曼殊、范光启诸人同事。复为上海《国粹学报》撰述，专提倡民族主义，影响教育界甚巨。及丙午（一九〇六年）六月，章太炎以《苏报》案期满出狱，东京《民报》推章为总编辑。光汉闻之，遂于丁未（一九〇七）正月偕其妻何震及姻弟汪公权莅日本，均加入同盟会。光汉且任《民报》撰述，署名韦裔。时梁启超方在《新民丛报》大发挥“满洲本为明朝藩属，中国亡于满洲绝非亡国”之说。光汉乃条举史事，为文数万言以驳斥之。义正词严，深为海内外称赏。光汉夫妇时与章太炎、苏曼殊同居，渐与日本社会党之急激派北辉次郎、和田三郎等游，遂心醉社会主义。寻发刊一《天义报》月刊，极力鼓吹社会主义学说，是为我国人发刊社会主义机关报之嚆矢。其妻何震更提倡父母姓并重之说，自号其姓名曰何殷震。光汉复介绍日人北辉和田二人为同盟会员，欲援引二人任同盟会干事，以庶务干事刘揆一反对而止。光汉心衔所提议改组同盟会攘夺干部职权之策不成，渐有异志。会是时清吏肃王善耆、铁良、端方等鉴于徐锡麟之暗杀，咸有戒心。各自设法向党人施展金钱政策，使为己用。肃王首罗致皖省党员程家桢，遣至东京，愿贡献万金于同盟会本部，以尽友谊。声明绝无条件。刘揆一等以渴不饮盗泉拒之。端方亦授意败类学生多人从中作祟，或伺隙离间，或用金钱买收。党人之意志薄弱者，间为所愚：光汉之妇何震及其姻弟汪公权即其人也。何汪不独从此入于侦探一流，且形同夫妇，宣言公夫公妻不讳。适光汉因事与章太炎、陶成章等大起冲突，又以勾结日人谋夺党权事不理人口，何汪等乘之，日夜怂恿光汉，使人官场，以图报复。光汉外恨党人，内惧艳妻，遂不得不铤而走险，始真为江督端方之

侦探矣。戊申（一九〇八年）冬光汉偕何震汪公权归上海，亟欲立功自见。初闻陶成章自南洋返国。以陶名列徐锡麟案通缉之列，日与两江督标中军官米占元往各码头查探成章行踪。久之不得，无以复端方之命，意甚焦灼。己酉（一九〇九年）夏党人陈其美、张恭、王金发等日集江浙两省同志计划大举，以上海马霍路德福里为机关。时光汉逆迹尚未显著，故开会时常获列席，众咸不之疑。因将党人开会详情密告端方，端方乃命上海道向租界当局交涉，即派警吏查抄党人机关。陈其美适外出，周淡游、褚辅成易工人服装走脱，仅张恭一人被捕解送南京。党人大举计划因而事泄中止。王金发侦知为光汉所为，怒挟枪访之，责其变节卖友，将处以死刑。光汉跪地乞命，谓必以一己生命保全张恭。恭因得移禁上元狱，幸不死。光汉由是不敢再至上海。汪公权以为无虑，仍时至上海侦探党人举动，卒为王金发枪毙示儆，闻者快之。案发后，金发偕其友一人亡命香港，访冯自由求庇。冯乃匿之于湾仔东海旁街七十六号四楼自宅，此己酉冬间之事也。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光汉深恐党人追究前罪，闭门不出。民党亦无与往还者。民四袁世凯自谋称帝，袁克定、梁士诒等献策，主张罗致失意无行之老革命党人，许以厚利，使之上书劝进，庶可收举国人心一致拥戴之实效。袁颺其议。时光汉已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潦倒半生，受命之下，如膺九锡。故洪宪筹安会六君子中，光汉与湖南李燮和、胡瑛，安徽孙毓筠四人皆同盟会员；独光汉于民元前三年曾一度变节耳。洪宪既败，光汉仍掌北京大学教席如故。近年以病逝世，身后如何，党人故旧无知之者。语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刘光汉一之而再，殆扬雄华歆之流亚欤！

光复军司令李燮和

李柱中字燮和，湖南安化县人。少有大志，沈毅寡言，不尚空论，喜与秘密党游，甲辰（一九〇四年）黄克强、刘揆一、马福益等在湘省组织华兴会革命机关，谋于是年九月在长沙、岳州、衡州、宝庆、常德等处，分五路大举。燮和为黄克强所设长沙明德学堂学生，亦华兴会会员，因得参与机密，分任重要职务。及黄等预定于清那拉后万寿日轰炸省城万寿宫，击杀全省文武官吏之计划。先期事泄，党人纷纷出亡，燮和与焉。乙巳（一九〇五年）东京同盟会成立未久，燮和亦东渡留学，遂由黄克强介绍入会。丙午（一九〇六年）冬湖南浏阳、江西萍乡等处哥老会首领姜守旦、龚春台等猝然举兵，攻占浏阳、醴陵、萍乡数县，声势浩大。清廷震惊，特令湘、鄂、赣、苏四省派兵会攻。留东同盟会员得讯，先后回国欲投义师者，颇不乏人。燮和其一也。

燮和归抵上海，闻萍浏党军已一蹶不振，而汉口革命机关之日知会主任刘敬庵等亦被捕系狱，知湘鄂事无可为，乃改途赴香港，欲谒黄克强面商卷土重来之策。时黄克强已往东京，燮和居香港《中国日报》两月，专候黄回以定进止。同寓《中国日报》三楼者，尚有潮州同志许雪秋之子四人，年各不满十岁，盖许是时适赴南洋筹饷以供潮汕起事之需。濒行，以其四子托余照料，余故同款之于《中国日报》也。燮和株守无聊，乃日与许氏四子作捉迷藏之戏，见者为之捧腹。无何，黄克强报书，谓暂不能离日，嘱燮和自取途径。燮和以湘鄂督抚通缉党人名单已名亦在其列，不便再入内地活动，爰求计于余。会南洋荷属同志李天邻、曾连庆等有托余物色学校教习之举，余遂以燮和应之。燮和在文岛滨港中华学堂及双溪烈埠启智学堂设教三载，成绩斐然，深得华侨信仰。丁未（一九〇七年）冬陶成章至南洋，欲向华侨募款在江浙二省起事，同盟会干部以党章不许私人向会员筹饷，力阻其议。陶大愤，乃借口干部措置失当，另用光复会名义自行募捐，复遍游荷属群岛，大倡光复会。燮和与失意党人许雪秋、陈芸生及侨商曾连庆、蒋报礼诸人纷然和之，駸駸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戊申（一九〇八年）三月云南河口革命军起事，汪精卫、邓子瑜奉孙总理命往荷属筹饷，至文岛时，因大受光复会会员反对，无功而返，即以不得燮和之助力所致也。庚戌（一九一〇年）冬黄克强至南洋筹措广州起义军饷，以荷属各教员燮和及陈方度等多属湘籍同乡，且与己感情密切，遂力劝捐除意见，同任艰巨。燮和等欣然从之。是役荷属同志共募款三万余元，燮和与有力焉。未几陈方度回国，与柳聘依、黄一欧、胡国梁等同入广州巡警教练所作学生，冀可充内应。辛亥（一九一一年）三月广州之大举失败，同志死者甚多，惟方度等幸皆出险。不久燮和亦回国，在上海专事联络驻吴淞上海等处之湘籍防军，期于他省事发时勃起反正。

辛亥八月武昌革命军起，驻沪党人亟图援应，燮和与陈其美各分途进取，燮和所运动之防营，尤为得力。九月十三日其美先率民军敢死队冒险攻江南制造局，为清军所擒，锁禁一夜。燮和闻警，乃令所预约之防营管带陈汉钦率所部立即发动，出其美于险，旋组织沪军都督府。各防军初推燮和为都督，陈汉钦为上海总司令。后以燮和与其美意见不洽，绅商各界多属意其美。陈汉钦从中排解，力劝燮和退让，以免内哄。时驻吴淞粤军济字营早受燮和约束，亦同日反正。燮和乃让都督于其美，自领所部移驻吴淞，另设军政分府，称吴淞都督，寻改称光复军司令。及民元南京政府成立，燮和遂辞职引退，由是闭户闲居，不复与闻政事。

民四秋，袁世凯决计改民主制为帝制，召集总统府及参议院各亲信，商讨改变团体进行程序。梁士诒、袁克定、杨度等献策，谓宜贿赂当今失意穷困之老革命党员，使之上书劝进，以表示举国人一致拥戴之公意。袁世凯深韪其议。杨度复推荐燮和及胡瑛二人，谓李胡皆尝奔走革命，建立殊勋，现俱潦倒穷途，不得志于民党，彼与有乡谊友谊之关系，可以引为我用等语。于是由杨发起筹安会，以厚利许给燮和及胡

瑛、刘师培、孙毓筠、严复诸人，使署名请愿帝制。燮和于辛亥上海让督一役，原非出自本愿，解职后闲居四载，尤郁郁寡欢，至是遂为杨度甘言所诱，先列名为筹安会六发起人之一。民国五年六月袁世凯暴死，帝制瓦解，燮和愧见故人，自是蜷伏家园，谢绝世事。数载后以病逝世；海内故旧，无有知其民五以后状况者。

章太炎于《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序文评燮和曰：“自徐锡麟死，光复会未有达者，李燮和乃流寓爪哇一教员耳，而能复振其业，返归沪海，与湘军东伐者相结，江南制造局之役，事败气燬，乃以数百人宵突其门而举之，上海一下，江浙次第反正，则李燮和为之也。”又曰：“综观开国以来十余年中，赞帝制，背民国，延外患，参贿选，及诸背义卖友之事，革命党之不肖者皆优为之，独复辟事不与，则事前训练之功犹不可没”云云。若燮和者，屡参义举，功成不居，迨贫无立锥，始腼颜附袁自污，为天下笑，其亦可谓革命党之不肖者欤！

（编者按：陈方度、黄一欧、柳聘依、胡国梁皆由湘籍同志龚超〔敬夫〕托其戚张通典〔伯纯〕荐与巡警教练所长夏寿华者，张谓此辈均为湘人，可收作学生。夏与张不但亦皆为湘籍，且夏以张为巡警道王秉必之又案，可藉以自固，故允之。事败后，巡警道有囑张备文捉拿龚之手条置于张之办公桌上，适张未至，为龚所见，龚将手条藏于桌上所置之毡毯下，即由巡警道署后门至巡警教练所，告知陈、黄、柳、胡促其速逃，龚本人亦他往。）

民国前之李登同

李福林字登同，粤之番禺大塘乡人。民国前，人皆知其绰号灯筒，而莫有知其名福林者。灯筒二字亦以其好手持灯筒而称之，厥后乃就俗称之灯筒二字易为登同，因以为号焉。性任侠，好抱不平，清末羊城附近南番顺各县多盗，剽掠以外，尤嗜械斗，大塘乡为众乡渊藪，乡人以登同得物不归私有，且分配公平，咸奉为头领。大塘邻近各乡有失物者，登同辄解囊以偿，颇有路不拾遗之风。每遇绿林间大事发生，登同恒指定聚会地点，召集各县头领赴会，各处头领见其信号，莫不惟命是听。乙巳丙午间（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清廷命岑春煊督粤，岑治盗严，各县绿林魁首多奔南洋避之，登同与其族弟李菱与焉。时革命党人方以收编各地会党绿林为起事方略之一。如乙未（一八九五年）重阳广州一役之大炮梁、李杞候、艾泉等，庚子（一九〇〇年）闰八月惠州三洲田一役之黄福、黄耀廷、江恭喜等，壬寅（一九〇二年）除夕广州一役之曾捷卿、刘大婶等，甲辰（一九〇四年）九月长沙之马福益、何少卿等，丁未（一九〇七年）四月潮州黄冈一役之余丑、陈

涌波、余通等，皆当地有名之会党绿林也。丁未孙总理历游英属马来群岛及法属越南，是岁十月广州镇南关一役前后，登同适偕谭义、黎广、李菱等莅越南海防，获交侨商刘岐山、甄壁等。由刘甄等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引见总理，请示救国方略，愿于革命党在广州发难时，号召绿林数千人，借械斗为名，集中于附城各乡伺机响应。总理颔其议，令于归粤时与粤港诸同志协商进行，并专函介绍与余及朱执信、胡毅生诸人相见。未几，登同及谭义、黎广、李菱等由南洋至香港，持总理介函访余于《中国日报》社，余款之于杏花楼，相与约定联络方法。即以登同族人在羊城所设韭菜栏新和号及南海旁街泉馨茶楼、河南大塘乡万馨茶楼三处为通信地点。时余方主持粤中党务军务，各种军械均由余设法保藏，因赠登同以驳壳枪一枝。登同谓携带不便，容俟归乡后乃派人来取，一月后果遣族人偕其妾至港领取，盖为安全计，特将驳壳机件拆开，而裹诸妇人身上，可免侦者耳目也。登同得枪大喜，语胡毅生云：“某次各江绿林大会，各出其武器相示，独陆兰清有驳壳枪一枝，称为全省第一。此后当不使阿兰专美于前”云云。其后党人中时至大塘乡与登同往还者，有胡毅生、朱执信、李文范、徐宗汉数人。某日登同族弟李菱又号黄须菱者，忽莅港访余，状极狼狈，据称适携妾来港，拟赴南洋，登岸时保良局巡差谓其来历不明，遽将其妾拘去，特来求助等语。余遂亲诣保良局为之保释。一年后粤报忽载李菱在大塘乡被清兵捕获枪决。盖清兵伪装花轿迎亲，诱乡民往观，李菱不知其计，竟为所擒云。己酉（一九〇九年）冬黄克强赵声等谋运动广州新军反正，预定以倪映典统领新军三标起事，而登同则率各乡绿林在外响应。因绿林多有枪乏弹，故特使李海云携款驻大塘村专任购弹事，复派女党员徐宗汉往来传递消息，各种筹备已臻成熟。詎是役竟因少数新军于除夕闹事，倪映典统领缺乏枪弹之新军猝然举义，兵败身殉。登同以事起仓卒，无法接应。为之扼腕不已。庚戌（一九一〇年）冬孙总理、黄克强、赵声、胡汉民等召集华侨同志在新加坡开会，决议募款在广州再图大举，登同同时在南洋，亦与其盛。辛亥三月广州黄花岗一役，登同与其族人李雍、李湛、李伍平、李田等原担任率领番禺各乡民军齐集大水圳附近，以为城中义军之响应，詎事前因得革命军联络员告以决定改期，遂不果行。及是岁八月武昌革命军兴，各省相继反正，清吏张鸣岐、龙济光等犹负粤以自固，登同乃号召所部组织民军，与南海陆领、三水陆兰清、顺德谭义等会师广州，即所谓福军是也。民元年八月余巡游各省稽查革命勋绩，至广州时尝诣河南海幢寺福军司令部访登同叙旧，则距丁未初见时已六年矣。

广东戏剧家与革命运动

广东号称革命策源地，世人感归功于新学书报之宣传，然剧本之改良及维新志士之现身说法，亦与有大力焉。在庚子年（一九〇〇）拳乱以前，粤中风气尚极闭塞，士大夫能稍言维新变法者，寥落如晨星。及庚子以后，清廷辱国丧师之罪，举国同愤，民智因而大开，有心人士主张非实行革命排满不足以救亡者，缤纷并起，或则以报纸鼓吹，或则借演说倡导，然皆未能深入民间，使种族思想普遍于各级社会，以收实效。职是之故，革命主义之香港各报，遂有编撰戏曲唱本以引人入胜之举。最先发起者为己亥年（一八九九）十二月出版世称革命元祖之《中国日报》，该报首在附刊之旬报特辟“鼓吹录”一门，由杨肖欧、黄鲁逸数记者撰作戏曲歌谣，或讽刺时政得失，或称颂爱国英雄，庄谐杂出，感人至深。其后在香港出版者，有《世界公益报》、《广东报》、《有所谓报》、《东方报》、《少年报》等，在广州出版者，有《时事画报》、《群报》、《国民报》、《人权报》、《南越报》、《平民报》、《天民报》、《中原报》、《齐民报》等，均注重戏剧歌谣一门，其旨趣及作风略与《中国报》相仿佛。此外香港广州保守派各报，以俗尚所趋，亦多踵而效之。歌唱之风，盛极一时。甲辰乙巳间（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有陆军学生前辈程子仪者，在陶模督粤时代，与钮永建同办陆军学堂，夙有志于社会教育，时方赋闲家居，与兴中会员陈少白、李纪堂等过从甚密，以其时民众识字者寡，徒恃文字宣传，实难普遍收效。于是建议创设戏剧学校，编制各种爱国剧本，招收幼童，授以相当教育，俟其学业有成，乃使出而实行表演。如是方可以涤除优伶平时不良之习惯，一新世人之耳目。陈李深韪其议。陈允襄助编制剧本，李愿捐助巨资以为之倡，定名“采南”歌戏班。训育一年始成，乙巳冬在乡市及香港、澳门等处开演，所排新剧颇博世人好评，实开粤省剧界革命之先声。惜乎创设不及二载，而资本已折阅无余，此幼童剧团遂不得已宣布解散，有志者咸为扼腕。未几复有香港各报记者黄鲁逸，黄轩胄、欧博明、卢骚魂、黄世仲、李孟哲、卢博郎诸人组织“优天社”于澳门，各欲亲自粉墨登场，为社会现身说法，以棉力弗继，未及出演，数月而散。黄鲁逸志不少懈，更邀黄轩胄、陈铁军等组织“优天影剧团”，惨淡经营，历一载始克出世，是为新学志士献身舞台之嚆矢。粤人通称新剧团曰志士班。示与旧式戏班有别。该班出演数载，成绩斐然可观，旋亦因事中辍。戊申年（一九〇八）陈铁军又组织一社，名振天声，所编剧本多偏重推翻专制，及暴露满虏虐政，时遭地方官吏之干涉，以当日民气日强，清吏有所畏

惮，幸免于祸。是岁十月清光绪帝母子相继逝世。清制国丧期内禁止演剧，该班乃借赈灾募款为名，赴南洋诸埠游历演唱，所编诸戏本，名为劝人禁烟禁赌，实则暗中宣传革命，于南洋华侨民智之启导，厥功非鲜。自乙巳以迄己酉之四五年间，经报界之热心鼓吹，及志士之现身说法，其影响所及，遂使在旧式戏班之诸名伶亦渐有排演爱国新剧之倾向。就中最有力者为人寿年班主角梁垣三（蛇王苏）、豆皮梅、新白菜等所演《岳飞报国仇》一剧。梁垣三饰宋徽宗后，豆皮梅饰李若水，新白菜饰岳飞，均能表扬忠义，唤起一般遗民之民族观念，其收效之速，较新剧团之宣传，有过无不及。《中国日报》尝赠梁垣三等以“石破天惊”横帑，用旌其功，洵非虚誉。同时广州、香港、澳门各地志士组织新剧团者，有陈俊朋等之现身说法社，李德兴等之移风社，梁侠依等之现身说法台，分道扬镳，一时称盛。振天声社自南洋返香港，乃与现身说法社合并，易名曰振南天，未几又解散。庚戌（一九一〇年）后振天声社诸同志得陈少白之助，另组一白话配景新剧社，剔除旧套，眼界一新，极受社会欣赏，是为白话配景剧之滥觞。继起者复有“琳琅幻景”及“清平乐”、“天人观社”诸社，均属话剧团之铮铮者。此种剧团咸对腐败官僚极嬉笑怒骂之能事，卒能引起人心趋向于革命排满之大道。及辛亥革命军起，诸剧员躬身参与义举者，尤不乏人，是更由演剧之舞台工作，进而为实行工作矣。兹就各新剧团之历史及人物依次述之：

（一）采南歌 此剧团原名天演公司，地点设于广州河南海幢寺诸天阁，发起人为程子仪、李纪堂、陈少白，粤中富绅黎国廉、钟仲珏、钟锡璜、潘珮瑜等多出资赞助之，资本共三万元。公司先设戏剧学校，招收十二龄至十六龄幼童八十人，授以普通教育，次乃授以戏剧常识。所编剧本，如《地府革命》、《黄帝征蚩尤》、《六国朝宗》、《文天祥殉国》、《侠男儿》、《儿女英雄》等等，或破除迷信，或讽刺时政，或表扬忠义，或排斥异族，均为有益世道人心之作。开设二载，以资本折阅净尽，因而闭歇。所训育人材颇为鼎盛，诸童伶于解散后，多改就旧式戏班，无有能记忆本身剧团之如何宗旨矣。其后旧式戏班之名角，如李元亨、戴谦吉、利庆红、杨州安、赛子龙、余秋耀、靓荣、大眼钱、新丽湘、冯公平诸人，皆采南歌栽培之弟子也。

（二）优天影 此剧团为报界志士黄鲁逸、黄轩霄等所组织，初名优天社，设于澳门，数月后因经济不支解散，未几复活，更名优天影社，开演后大受世人欢迎。演员中以姜云侠、郑君可为最著名。所排演剧本，最得人欣赏者为《火烧大沙头》一剧，剧中首引清吏杀女侠秋瑾一事为导线，颇足发人深省。此外如《黑狱红莲》、《梦后钟》等剧，均寓戒除烟赌之深意，于移风易俗，至有裨益。此剧团关系人物，仅就余记忆力所及，述载如下：

第一届社员录：黄鲁逸、黄轩霄、黄叔允、郑友廉、郑笏臣、梁松之、陈铁五、陈铁军、梁侠依、李一天、何少荣、叶莹堂、黄世仲、欧博明、卢骚魂、李

孟哲、卢博郎、庞一凤、卫沧海、刘汉在、吴仁甫、何侣侠。

第二届社员录：黄鲁逸、黄轩胄、姜云侠、郑君可、郑铁军、庞一凤、徐懋之、黄自强、李冉、梁松之、郑笏臣、郑友廉、叶莹堂、何少荣、欧博明。

（三）振天声 优天影社解散后，一部分社员陈铁军等于戊申年另组“振天声”剧团以继之，社址设于广州荔枝湾彭园。所排剧本，有《熊飞（明末抗清之英雄东莞人）起义》、《博浪沙击秦》、《剃头痛》、《虐婢报》等剧。就中以《剃头痛》一剧，为最能动人观听，尝惹起清吏之严重干涉，盖一极有兴味之滑稽历史剧也。清初某遗民诗云：“闻道头堪剃，谁人不剃头！有头皆要剃，无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此时竟编入剧本唱白之内，可谓大胆绝伦。出演数月后，忽值清廷帝后同时死亡。清制国丧例禁演戏，陈铁军乃商诸陈少白，请其代向香港筹赈八邑水灾公所建议，愿率全体演员同往南洋各埠，为该公所筹款赈灾。一为灾民请命，二则暗中向华侨宣传革命，陈少白力助其成，遂由该公所选派黄咏台带领振天声剧团南游诸埠，所至各地，备受侨胞欢迎。抵新加坡时，同谒孙总理于晚晴园，其有未加入同盟会者，一律举手宣誓，孙总理勉备至，诸人益为感奋。事为保皇会机关之《总汇报》所闻，遂著论反对该剧团之筹赈水灾，谓该团员尽革命分子，华侨捐款赈灾，即无异赞助谋反大逆。革命党之《中兴报》因是与之笔战经月，而南洋华侨对革命之认识，由此愈深，至今新加坡华侨前同盟会分会会长陈楚楠尚保藏民元四年前振天声戏券一纸，诚一硕果仅存之纪念品也。该社社员录如下：

陈铁军、陈铁五、卢我让、陈有全、黄叔允、黄少允、胡季白、彭瀛渔、何侣侠、卫沧海、梁侠依、李一天、吴仁甫、刘汉在、梁焕熙、张志坚、张恨民、区寿山、黄咏台。

（四）现身说法社 此剧团为陈俊朋等所组织，社址设于香港，成立未久即与振天声合并，易名振南天。其社员录载如下：

陈俊朋、黄子觉、黄志蕴、谢持久、骆铁苍、胡可为、胡孝思、刘侠民、谢沃波、黄自立、郑校之、蔡忠信、陈甦亚、吕少初、韦勤。

（五）移风社 此剧团设于广州市河南。发起人为李德兴等。成立未久，旋即解散，故效果不著。其社员录如下：

李德馨、梁醒公、李瑞庄、李铁汉、雷漱石、郑拔初、李少帆、廖十五、周少保、陈钢军、范志扬。

（六）现身说法台 此剧团发起人为梁侠依，社址设于番禺花埭，成立久暂及社员姓名不详。

（七）振南天 振天声剧团自南洋归香港，以保皇党曾向清吏告密，谓该团在南洋鼓动革命仇满，故不能再在内地立足，因而宣布解散；旋与现身说法社合作，更名曰振南天，未几亦解散。

(八) 振天声白话剧社 辛亥春陈少白、黄咏台等以振天声社解散后，诸同志不可无所寄托，遂由陈少白向香港富商陈庚如商借一千元，另创白话配景新剧，粤省之有白话剧自兹始。初由陈少白手编《自由花》、《赌世界》、《父之过》、《愚也直》诸剧，情文绝佳，观者叹为空前之作。继起者更有琳琅幻境、清平乐、天人观社等等，可与振天声先后媲美。民国以后，诸剧社先后解散，惟琳琅幻境巍然独存，历久不衰。该社社员胡津霖等之毅力，有足多者，除振天声社员外，他社人物未能详悉，录载如下：

黄咏台、梁少伟、卢我让、张恨民、陈甦亚、梁秀初、何侣侠、罗容甫、卫沧海、卫汉铁、何少侠、刘汉在、欧寿山、胡孝思、邱锡源。

缅甸华侨与中国革命

华侨教育与新旧思想

华侨之居缅甸者，以仰光一埠为最众，数约八千人。闽籍漳泉人居首，广东次之，而风气之开则远在南洋英荷两属之后。癸卯年（一九〇三）冬，始有闽人林国重、陈金、杜诚浩、陈甘泉、庄银安、徐赞周诸人创办中华义学于仰光大埠，是为缅甸兴学之滥觞。此校至甲辰年（一九〇四）始开课，学生仅六十余人耳，同时庄银安、徐赞周、陈甘泉三人另设一益商夜学，以利侨胞之日间不暇攻读者，中华义学至乙巳年（一九〇五）春添授英文课程，日见发达，学额增至百二十人。是时康有为方由印度莅缅，以保救清光绪帝举行新政相号召，侨商受惑者大不乏人，相与设置保皇会于五十尺路，康以庄银安在侨商中负重望，爰亲访银安，备致推崇，拟延为仰光保皇会长。银安初以康为热心爱国，遂亦虚与委蛇。独陈甘泉主张革命排满最力，谓康历年伪造衣带诏以欺骗侨胞，美洲南洋各地华人多已深悔入彀，登报脱党，吾等胡为此时甘心堕其陷阱。因是侨商中乃分为保皇与非保皇二派，除陈甘泉、徐赞周二三人外，尚无人敢昌言革命也。是岁春间，湘人秦力山（力山事略载《革命逸史》首集第一二八页^①）自香港莅星洲，欲在南洋各埠大鼓吹革命，闻缅甸华侨风气闭塞，遂以闽人李竹痴之介，于五月初五日舟抵仰光，寓陈甘泉宅。甘泉一见如故，引之见银安，历述康梁棍骗华

^① 见改版后第71页。

侨及己身与唐才常于庚子年（一九〇〇）汉口一役失败之经过。银安如大梦初醒，遂宣布与保皇会脱离关系。其后康徒以党势涣散，计不得逞，乃强指银安为叛徒，职是故也。时陈、庄、徐等复请力山重修中华义学章程为民族主义教育，力山乃为该义学撰序文，凡二千余言，其结论曰：“创作每生于感情，感情则生刺激。刺激者，即外来之恶现象是也；感情者，即感此恶现象而有所难堪者也。诸君以故国之沦亡，受风潮之刺激，情动于中，不能自己。而此之义学赖以成立，则吾又有以为诸君进者焉。夫刺激有生自历史者，有生自地理上者，仰光历史上吾人之刺激为何，则中国民族史之终编大书而特书之曰：永历帝被清兵迫而入缅甸。又曰：三桂弑帝，盖即吾汉民族三千余年古国之自始见灭是已。仰光地理上吾人之刺激为何：曰此即英国经营中国腹部扬子江流域之根据地是也。不识董事诸君观过去而察未来，其将何以维持此初心，使此学校立于太平印度两洋之风涛簸荡中，而有以挽神州之陆沉耶”云云。该校董事颇为感动。因有新旧两派之分。未几力山以星洲同志陈楚楠等约往办报，旋有清政府所派视学员萨君陆奉命到缅宣传满清德政，拟将中华义学改称中华学校，愿负责向北京学部领取每年助学金若干，各董事慑于利禄，竟从其请，赞周、甘泉、银安数人抗争无效，乃与该校脱离关系，另将所设益商夜学改组为日学，历聘国内学者陈仲赫、曾玮清、陈允洛等到仰主持学务，是校提倡国民教育历久弗衰。辛亥光复后改名共和学校。侨商中先后由该校毕业而出服务社会者，实繁有徒。如殷商张耀琪、雷太声、陈瑞璧诸人其尤著者也。

秦力山与《仰光新报》

《仰光新报》设于缅甸仰光大埠勒达街二十号。其股东新旧不一，至为复杂，故报社毫无宗旨。庄银安初任是报经理，以主笔政者不得其人，且动辄受股东掣肘，故不能有鲜明之主张，特一保守式之报纸而已，秦力山初至仰光时，见该报形式腐败，遂向银安痛言革新该报言论之必要，并愿代撰论文，以唤起一般侨胞之迷梦。银安乃为介绍于该报编辑。力山因著《革命箴言》二十四章，凡六万余言，登出后，各埠人士，风动一时。据力山于乙巳六月二十日自滇边致星洲《图南报》陈楚楠书略云：“顷著有说革命一书，已寄赠仰报。该报但销数千份，此书若在贵报重登，或得照邹书一例能翻刻成本送人尤妙也（共有六七万字）。惟此书成于十二日之内（以弟先欲入川恐赶不及），多有理论未完全之处。将来公如肯俯就一灾枣梨，望嘱诗耀两兄为之校斧，或于同胞之条理与理论，均不无小补，弟因邹书徒事谩骂而不言理，故不得已而有此作也。书中驳诘康党之处甚多，可一惩其烦焰。孙君逸仙自巴黎来信言，六月过星，约相待一见，惜弟已出缅甸矣。”等语。先是力山离仰光后未久。有滇边干崖土司刁安仁出游印度，途经缅甸，与侨商丘仁恩相识，丘见其谈吐不凡，有志仇满，爰介见银安、赞周、甘泉诸人，各倾吐心腹，引

为知己。安仁归时慨然以举兵滇边为己任，并以物色人材相托。及力山二次到仰，徐、陈、庄等遂介绍力山入滇为安仁助。力山素有志联络滇人反清，闻之大喜，遂于是岁夏秋间如缅甸新都满得礼埠，与寓该处之滇省志士李瑞伯结识。居数日，再进缅甸蜡凤投滇人张石泉处。石泉时任该地英官译员，富有民族思想，与力山尤为莫逆，因有兰谱之盟。力山寓蜡凤多日，尝赋诗词多章，所著《革命箴言》全文即成于此时，是文仅刊至十六章，即为该报之顽固派董事所反对，竟将余稿八章强行毁灭，读者莫不引为憾事。然其效力实足造成后来旅缅华侨之革命思想，厥功不容湮没也。是岁冬力山复至仰光，改变装束，欲亲投北京实行暗杀，行程未定，而吴樾轰炸清五大臣之事起，旋得同志张鸣岐自北京来书，谓各省关津因吴案戒严，切囑不宜轻进。力山正犹豫不决，适干崖土司刁安仁派人求助，谓干崖方开办军国民学堂，缺乏体育及师范教员，敦促力山等代延教员多人，力山于是挈陈仲赫、陈守礼、李贞壮、陈仁和、谢玉兔等五人欣然就道。及抵干崖，安仁深喜得人，乃将地方民政委诸其弟，而以校务付托力山，自率男女十余辈东渡日本留学，力山乃为作书介见孙总理黄克强等，是为革命党人与云南土司发生关系之开始。安仁既东渡，力山以校务为土司幕友把持，无法改善，大有去志。丙午（一九〇六年）秋赞周、甘泉、银安等以《仰光新报》为顽固派操纵，乃组织一商务调查会月报，名为振兴实业，实以发挥民族主义为宗旨，延张石泉及闽人萧少珊为编辑。出版数期，迄无起色。嗣悉力山不得志于干崖，遂函邀回缅主持是报，力山得书，乃别择教员承乏，克期离滇，詎濒行时忽染重病，以误投药饵，竟致不起，是岁十月十一日卒于干崖，享年二十有九。是诚革命党人莫大之损失也。

旅缅党人不幸时期

秦力山既逝，刁安仁在日闻此凶耗，恐校务废弛，乃偕留东同志蜀人王群、滇人林春华、钱克昌及日本教习小室等数辈回滇，以振兴农桑为名，其实以训练军事教育为要旨。詎事机不密，遽为保皇党报纸揭诸报端，滇督锡良乃派专员探取秘密，故安仁等归干崖未久，即得滇督严令，不许该校教授兵式体操。王、林、钱等以安仁一筹莫展，乃散而之他。时陈甘泉，庄银安所经营垦荒事业亦不幸失败，二人各亏折巨资。甘泉以此得病逝世。党人失此重心，不免大受影响，此丁未（一九〇七年）事也。又是岁夏六月有云南同盟会员杨秋帆者（名振鸿号思复），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及任云南杂志编辑，在士官学校时，清廷以其主张不稳，请学校将其开除，指名通缉，但后又任其为滇边腾冲府防军司令。以练兵守土有方，为某国驻腾领事所忌，嗾之清吏，杨不得安其位，出亡缅甸，张石泉为介绍于徐赞周，赞周礼之甚优。无何，滇督仍向缅甸当局索取逃犯，许予缅甸官以重利，赞泉乃设法遣之东渡，张石泉回满德礼后，旋因猎失足堕水死。庄银

安、徐赞周以同志迭遭变故，而清吏及康党均气焰逼人，顿形懊丧。故自丙午冬寨力山逝世以至戊申（一九〇八年）春，可称为缅甸革命党人最不振之时期。

同盟会及阅书报社

同盟会之在南洋各地成立分会，以缅甸暹罗二处为最迟，盖缅甸华侨风气闭塞，远不如英荷两属之开通也。戊申春三月，王群由日本带来同盟会本部委任证书，徐赞周、陈仲赫、陈钟灵三人率先加盟，陈守礼、张源、陈国章、沈继昌、林水都、王永和、林金源等十余人继之，旋开第一次成立大会于仰光大贺胥园，会所附设于益商学校内，以外间反对者众，进行不易，开幕三月，仅得会员三十七人。未几河口革命军败将黄子和杜韩甫逃亡至缅，因与赞周等商设机关报，以张党势，复得槟榔屿同志陈新政函介仰光殷商陈玉著、张永福（与星洲之张永福同名）、陈金在、曾广庇多人入股，报社赖以成立。是岁八月朔日同盟会机关之《光华报》出版，主笔二人为滇人杨秋帆及鄂人居正（觉生），均由孙总理自星洲推荐而来。出版月余，党势大振，会员增至四百余人。同盟会会所遂由益商学校迁于河滨街与百尺路转角之三数。其初定名演说社，以避忌者之耳目，后改称觉民书报社，会务日以发达。是秋九月孙总理特派汪兆铭、吴应培二人到缅，各党员异常欢迎。汪等乃为改订缅甸分会章程。遂于是冬十一月二十日选举正式职员如左：

正会长 庄银安

副会长 卢喜福

财 政 陈栽春

会 计 沈继昌

庶 务 陈振川

书 记 林铁汉

主盟员 庄银安、何荫山、陈仲赫、刘庄君、卢喜福、曹沛霖、林致和

调查员 曹树三、陈文豹、林清良、池叔苹、郑国兴、利桑、何焕尧、张源、何普泉、陈群英、丘启川

宣传员 林铁汉、李警魂、何可人、周之武、梅宗武、沈屏夷

征收员 李龙、黄镜波、林水都、刘保生、林金源、吴加篆、何若稽、林己巳

评议员 张志成、徐赞周、陈钟灵、陈仲赫、傅剑秋、黄连锦、陈云祥、洪锡福、林登庸、雷振新、陈御卿、黎直卿、曾国汉、陈绍平、黄文儒、李海国、陈汉生、陈美全、黄卯寅、杨秋毫、陈正忠、魏声亩、龚效、陈玉著、朱棹棠、何笃生、曹焕翔、周之武、黄秀、张复、许魔力、林一叶

《光华日报》出版后数月，同盟会特派居正、陈仲赫二人赴缅甸各埠扩张党务，多设分会，所过二十余埠，均指定热心同志为主盟人，因之成绩卓著。与英荷两属群岛相伯仲，计所增设各分会开列如下：

埠名	主盟人	埠名	主盟人	埠名	主盟人
木各具	陈虞卿 郑耀蒸	新彪遵	陈就正	猫 宇	蔡寿民 李景兴
沙 已	陈延谟	渺 略	苏细仕	瑞 帽	陈巽南 李广福
毛淡棉	丘伯钟 朱绰业	力不丹	丘景芳	卑 廖	杨景藩 林幼雨 常寿山
居 脉	杜启仁	绕彬九	陈振玉	敏 建	周子器 陈绍平
洞 遇	陈国珍 杜子乾	榜 地	区伯扬	洞 枝	黄锡三
彬文那	朱昌袞 杨明察	知 亩	卢省三	瓦 城	陈太高 刘观於 杨 名
兴沙搭	陈颇阵 杜明敲	勃 卧	李宣琳	密 沙	陈章逊
蒙 摩	尹寿生	仁兰姜	郑 庇	勃 生	陈子卿
吉 桃	陈文造				

缅甸各埠同盟会分会虽次第成立，然因各地当局不断干涉及清吏侦探密布之故，多不敢公然书同盟会三字，在大埠则称书报社，小埠则假个人寓所或商店作通讯处，如仰光分会外称觉民书报社，瓦城分会外称振汉书报社，吉桃分会外称义民书报社是也。兹将各埠书报社名列下：

埠名	书报社名	埠名	书报社名	埠名	书报社名
仰 光	觉 民	毛淡棉	汉 声	望 濂	启 智
勃 生	汉 兴	洞 遇	益 华	仁兰姜	协 汉
勃 卧	培 民	木各具	爱 群	绕彬九	振 华
吉 桃	义 民	密 沙	兴 汉	知 模	汉 群
瓦 城	振 汉	丹 老	新 民	秉礼光	智 民
猫 宇	振 民	杰柳巾	演 进	土 瓦	务 民

缅甸同盟会成立后，以先后筹款维持党报之故，对于孙总理所需求不能多量协助，戊申十一月汪兆铭回星洲，庄银安等募款二千八百元以应之，同时陶成章亦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费名义筹饷，银安等亦助以千元。己酉（一九〇九年）春孙总理以河口败军将士群集南洋，给养困难，思赴美洲募集巨资再图大举，特派胡汉民赴缅筹措旅费，银安等复贻金二千余元济之。此外协助辛亥三月二十九一役，及杨秋帆、居正、吕志伊、陈仲赫、黄克强、李雁南、郑坤诸同志来往滇粤舟车各费，亦为数不赀。据徐赞周所藏缅甸同盟会人名总册，从戊申三月成立日起至辛亥年止，实发给会员底号共二千三百四十三人，所载姓名年龄籍贯皆备。查民国成立后国内外各地之同盟会员名册，大都因事毁灭，或已遗失，独缅甸名册今尚保存，洵属难能可贵。

《光华报》及《进化报》

《光华报》地址在仰光百尺路旧门牌六十二号，初由党员陈颇瑞、陈守金、陈玉著、李海国、陈清波、陈文豹、庄银安、徐赞周诸人集资缅甸币八千余盾，以三千盾承购旧日《仰光新报》之铅字印机赶行出版。庄银安任经理，陈仲赫副之，总主笔为杨秋帆、居正二人，先后助理编辑者有黄大哀、何荣禄、苏铁石、傅春帆、陈绍平、林文曲、黄兰士、徐赞周诸人。其股本多半招自该埠普通商人，非尽党员也。是报初出版即大倡革命排满，尤抨击康梁不遗余力，康党嫉之如眼中刺。陶成章所著浙案纪事，即在是报登载。未几秋帆以事入滇，荐滇人吕志伊（笔名天民）自代，康党初嫉此报股东之非党员解散报业，计不得逞。会清帝母子同时毙命，天民在报上征联曰：“摄政王兴，摄政王亡，建虏兴亡两摄政，”应者虽多，惜无佳构。时党员卢喜福忽发奇想，私电袁世凯请立汉人为帝，乘机革命，以倾覆满清。清廷因是根究电报来源，遂向英公使交涉，重订电报新约，以后缅甸华侨有电达本国政府者，不得代为转递，此例至民国成立后二十余年犹未废除也。时康党乘势以商人名义公呈清廷，请简派领事驻缅，清廷准之。未几遂首派蜀人萧水熙到仰光充任领事一职。是岁《光华报》因清领事借为丧家点主事，屡向商人敲诈取财，天民特用“领事神主”四字为撰一联，加以讥刺，萧水熙老羞成怒，遂以行文抄没本籍财产为辞，威胁该报之七股东代表令即停止营业。七代表独李海国一人坚决拒之，余六人慑于声势，竟腼颜屈从，是报遂不免于停版拍卖，且为康党间接出资购得，闻者莫不切齿。康党即攘夺是报，乃易名《商务报》，延张石朋、李牙聪二人为主笔。石朋笔名顽石，牙聪绰号聋子，皆保皇会员也。同盟会以报被攘夺，遂开全体大会筹募复兴股本，一夜得资一万三千余元，是冬十一月朔日乃有第二之《光华报》继起。地址在五十尺路二号，先后司经理者有陈仲赫、黄水田、陈汉平等，主笔政者仍为居正、吕志伊

二人。是报复活后遂与《商务报》大开笔战，未及数月，《商务报》记者张石朋自承理屈，愿皈依革命真理，毅然脱离该报。李牙聪因亦缄口无声，时人戏撰一联曰：“生公（居正笔名）说法，顽石点头；天民示威，聋子投地。”即指此事。无何，《商务报》以寡助歇业，民党势力为之益张。庚戌（一九一〇年）夏康党与清领事合谋倾陷《光华报》以泄忿，由萧永熙密电清外部，动以危辞。清外部遽向英公使交涉，谓《光华报》鼓吹无政府主义，请将该报当事人驱逐离缅。英使以告缅甸总督，缅督遂下令递解居正、陈汉平二人出境。其驱逐令有“押送广东交清官办理”字样。舟过星洲时，幸该埠同盟会预延律师向星洲当局极力依法抗争，因得改为自由出境，亦云险矣。《光华报》受此摧残，元气大损，同时复有封报捕入之谣诼，报中职员人人自危，庄银安首避去槟榔屿，其他职员亦多隐匿别埠，因之《光华报》遂不免第二次之停刊。银安既莅槟榔屿，乃与侨槟同志陈新政、黄金庆、徐洋溢等措资举办第三之《光华报》于其地，聘东京《鹃声》杂志记者蜀人雷昭性（铁崖）为主笔。于是冬十月一日出版。其志实在继承仰光《光华报》之系统，不欲使其一旦中断也。然仰光《光华报》甫停刊月余，吕志伊、陈钟灵、徐赞周、李海国、魏声亩、陈震川、丘思道诸人即已著手重兴第三次之机关报，改光华曰进化，即以旧《光华报》资产充之。陈钟灵任经理，吕志伊仍司笔政，其鼓吹之勇敢，不让于前，清领事终无法以抑制之，此庚戌春二月事也。《进化报》出版仅八月，康党复勾结地方警吏，借假查账为名，向该报任意摧残，终以公理不胜暴力，不得已重行停刊。吕志伊以是离仰归国，事后徐赞周乃联络张永福、杨子贞、曾上苑诸人，以学务总会名义，承买《进化报》机器铅字，另设立《缅甸公报》，仍以宣传革命为务，至民国成立犹屹立弗衰。屈指同盟会员在缅甸之四次办报，所耗逾六万元，其经历之险阻艰难，殊非笔墨所能形容矣。

党人之云南革命运动

联络滇边土司为革命党人进行方略之一，自秦力山逝世后，党人莅缅甸者仍运动不辍。己酉秋杨秋帆以同志林春华由滇边永安来缅，报告该处防军已运动成熟，可以一呼而起，秋帆遂于是冬十月间道入腾冲。与同志张文光在永昌举义，因攻清军不克，走蒲阳，筹再起，以感染瘴气，旧疾复发，咯血而亡，同志彭宣草草以白布裹其尸葬之。十二月居正得刁安仁等书，谓蒙化、顺宁、永昌、蒙自、腾越、大理、龙陵各地均已联络成熟。嘱派同志赴干崖筹商大举，遂偕陈仲赫同赴干崖。诘抵干崖时，安仁以清吏已有防备，恐事泄瓦解，令居等秘居破庙中静候时机。居等以发动无期，不得已仍返仰光候之，庚戌夏六月黄克强自香港来，亦拟入滇企图起事，吕志伊介绍克强与滇人寸尊福相见，寸愿釀万金作滇边

起事义饷。将行，适缅甸匪首貌产与英人为难。各地戒严，途无所出，遂以折回。时克强审察滇边形势，谓其地交通困难，经营十云南不如一广东。因决计回广州发动。是即辛亥三月二十九之役。是役仰光同志参加者二人，一为李群，号雁南，一为郑坤。李殉难，葬黄花岗。郑则足部中弹获救。时陈仲赫亦回香港，谋北上加入暗杀团，居港机关数月，后因病返闽。及辛亥八月武昌举义，刁安仁张文光于九月初亦举兵占领腾越，即电缅甸同盟会求助饷糈，缅分会遂筹集巨饷应之，并派同志吴镇福、王怀、李亚灵、寸尊福、饶潜川、杨大森、祝宗荣等人腾越效力，诿张文光据腾越后，以滥作威福，纵兵扰民，大受各方指摘。乃推安仁出任军政府代表，赴宁沪报告光复经过，而尽诿过于彼。安仁不知其诈，欣然就道。未几张文光为省军所杀，安仁至南京，旋被滇师长李根源控以勾结土匪觊觎内乱等罪，被禁警署。及南北统一，复移系北京，得孙总理黄克强宋教仁等仗义营救，其狱始解。出狱后以悲愤过度，宿疾复发，歿于北京德国医院。至缅甸同盟会所派入滇人员至大理府时，被守吏赵藩冤杀者，有王怀一人，无故监禁者有杨大森、祝宗荣二人，旅缅侨胞至今犹称冤不置。

庄银安与辛亥革命

辛亥武昌起义后，相继响应者七八省，南洋各埠党人以闽省尚无声无臭，乃公推庄银安为总代表，回厦门督促进行。及福建光复，银安旋为闽都督孙道仁聘充顾问，厦门参事会亦举为议长兼副财政长。旋以吏治无法澄清，官僚习气太重，谓为换汤不换药，大悖原定革命方略，拂袖归闽，创办大同油厂，获资甚丰。民二年冯自由长临时稽勋局时，尝发出聘书三百余通，延请海内外各埠辛亥前有功革命者为稽勋局名誉审议，银安名亦在列。其后得银安复书如下：

自由先生大鉴，奉到三月十九日惠书，不弃刍蕘，辱荷宠任，抚躬自问，感与惭俱。弟不死之身，销声鹭岛，见闻寡陋，固不敢以言评勋。第邦基既已维新，而功人诿令埋没，报功崇德，固国家所宜然。发微阐幽，亦后死者之责任。管见所及，谨当奉闻。先生民国伟人，权衡自能合节，革命先觉，网罗定不遗珠。附呈劳绩表一册，请希垂鉴。并颂勋绥，不尽。

弟庄银安上言。

民国二年五月十八日

南洋请教员之笑话

庚子（一九〇〇年）以后，南洋英荷两属华侨风气渐开，各埠纷纷创设华童学校，咸用国语教授，其教员多由祖国聘来。余主香港《中国日报》时，各埠学校托余延聘教员者有多处，经余代聘者有鄂人田桐、时功璧，湘人易本羲、陈方度、李柱中（号燮和，后为洪宪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皖人杨希说等十余人，多属留东学生。中有粤人张□□者，同盟会员张伯乔之族兄也，丙午（一九〇六年）秋冬间余受新加坡中兴公司张子贞之托，嘱为爪哇某埠延聘能通国语之教员，张伯乔初荐其族弟梅仙，谓其毕业某中学，足以胜任愉快，余纳之。及期来者为梅仙之胞兄□□，而非梅仙，一年逾不惑之冬烘学究也。以系出番禺捕属，国语颇精，惟酸气逼人，似不知新学为何物者，谓乃弟以事不能践约，特荐伊以代。余以该校需教员至急，未便改议，遂亦听之。时香港时疫盛行，各船公司例须出示检验身体凭证，方允售票。余乃引□□至屈臣氏大楼，访佐赖医生检验身体。及登升降机，□□目所未见，询余曰：“此即赴新加坡之火船乎？”余恐为旁人见笑，未遽置答。司机者询余等何往。□□答曰：“往新加坡。”余曰：“非也，乃往佐顿医生处。”司机者大笑曰：“胡为说往新加坡？”同机之西人成为捧腹。及机停登楼，□□复询余曰：“如此他检验了身体乎？”余笑举升降机之效用告之，彼始缄默无言。次日余为购日轮二等船位，派人送之登轮。据送者回报，此君对于洋刀叉器具及抽水马桶用法，毫无所知。在船未久，已被侍役窃笑不已。余知此君在沿途舟中又不免闹几许笑话矣。无何，余得新加坡同盟会分会长陈楚楠来书，谓张君子贞以所聘新教员张□□迂腐顽固，大不满意，因其娴熟国语，尚能相安无事等语。丁未（一九〇七年）二月有前在惠州三洲田起义之同志黄耀廷，奉孙总理命自新加坡至香港参与潮惠军事，语余曰：“彼一日为某客棧至码头接客，遇一新上岸而彷徨无措之广府人张□□，逢人自道姓名，谓是香港冯自由荐来充当教员，要见陈楚楠张诚忠（子贞）二人。彼见其走投无路，乃为之指导一切”云云。一年后，南洋归客为余言，“张子贞对于所聘教员六人，终以张□□为最满意，盖各教员多属留东学生，往往因事鼓动风潮，常有聚众要挟情事，独张每次均置身事外，惟保全饭碗是务，深得校中各董事之欢云。”张某后此何时罢职归国，后无所闻。

上海《神州日报》小史

《神州日报》之创办人 清末革命党人在上海之言论机关，自癸卯（一九〇三年）《苏报》及《国民日报》乙巳（一九〇五年）《警钟报》等相继被封禁后，为之缄口结舌者将及二年。至丁未（一九〇七年）春始有陕西泾阳人于右任（伯循）、湖南常德人杨守仁（笃生）等发刊《神州日报》，以为东京留学界所刊《民报》、《复报》、《洞庭》、《鹃声》各报之呼应。于右任于甲辰（一九〇四年）岁以印行《半哭半笑楼》诗集讥切时政，被陕抚升允指为革命党，严令通缉。乃间关逃沪，肄业于震旦学院。翌年以外籍教员干涉事散学，遂与同学叶仲裕等别组复旦公学于吴淞。旋约杨笃生、叶仲裕、金怀秋、王抟沙、汪寿臣、张俊卿、黄桢祥、谭价人、邵力子等组织日报，以图振作士气，发扬正论。议定后亲赴日本，向留东诸同志募股。秦陇豫晋学生协会特开会赞成，为集款二千数百元。时同盟会成立甫经一载，孙总理适驻东京，右任由同乡会员介绍加入党籍，未几事竣归国，而《神岐日报》遂于丁未二月二十日出世。

《神州日报》之内容 《神州日报》之成立，颇得当代名流如章太炎、马相伯、黄晦闻等之赞助，题报眉首为南通张季直（謇），盖张时任复旦中国两公学董事，与右任等有师友之关系也。悬壁直额为平湖金怀秋所书。右任自任社长，杨笃生、王无生、汪允中任撰社论。第一日之发刊词署名三函，即由笃生、无生二人主稿，与右任参订而成。此文意内言外，隐含民族主义之情绪，与昔年《苏报》及《国民日报》大刀阔斧之论调，殊有不同。盖自《苏报》案以后，清吏对于富有革命色彩之书报，文网周密，一般新学家咸具戒心，不得不用旁敲侧击之文字，以作迂回之宣传也。此报体裁特重社论一栏，所下时政批评，针针见血，足以廉顽立懦，附刊之说部小品文字，以芳馨排侧之词，写小雅诗人之旨，亦足使读者之种族观念，油然而生，此外尚有学界新闻，专以培养学力，提倡体育为主。故尤为青年学子所欢迎、又其与别报不同之特点，在于不用清胡君主年号，而以丁未二字代之，出版数月，销路日盛，駸駸驾旧时各报而上之，非无故也。

《神州日报》之中断 是报刊行未及一载，以邻居失火，不幸殃及，编辑印刷营业三部悉付一炬。杨笃生缘电杆而下得免。事后于右任以一时无力恢复辞退。仍由叶德裕、汪允中、杨笃生诸人竭蹶再振，幸而复版。逾年杨笃生渡英伦留学，旧日发起人留者仅叶汪数人耳。

复版后之《神州日报》 于右任离《神州报》后，旋由《舆论日报》聘充编

辑，未几复先后发刊《民呼》、《民吁》两报，均被清吏借故封禁。庚戌（一九一〇年）九月更创设《民立日报》，与《神州日报》宗旨略同，而革命色泽较为浓厚。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革命军进攻督署一役，《神州报》所载发难纪事及殉义诸烈士传记，表彰誉美，惟恐不力，与《民立报》可称一时瑜亮。辛亥革命之一举成功，该报与有力焉。惟自民国成立以后，该报屡易其主，绝无宗旨可言。旧时民党中人以其反复无常，有玷昔年《神州日报》之主旨，咸为扼腕不置。民五袁洪宪帝制瓦解后未久，该报以营业不佳，宣告闭歇。至二十六年某月，有蒋光堂者以光复《神州报》为号召，在沪重刊《神州日报》，然已大非昔年之本来面目矣。

《神州日报》发刊词 丁未《神州日报》发刊词，高古典雅，士林传诵。所谓摭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文中历举吾国往古人种智慧及宗教观念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帝国主义法律统系文学思想冒险性质等种种特色，如数家珍，益足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诚旧文学中之代表作也。兹录载如次：

自古哲士哀时，达人砺俗，曷尝不以微言闲议，激荡民心，转移国步者哉！是以文致大平，垂经世先王之志；眷怀小雅，偏主文谏谏之辞。纫馨洁于九歌，托悲怀于五噫，亦有发摅至论，剴切群愚，仇国成书，罪言属稿。垫角巾而寤叹，揭留都而宵泣，邈然高蹈，怆我先民。自欧俗中更，竞辟报纸，新闻之学，蔚为大宗，纂述之余，订为专律。十万毛瑟，惊法兰西霸主之心；七匠员舆，识美利坚文章之富。津逮吾华，条流粗具。于以挥政客之雄辩，陈志士之危言。澡雪国魂，昭苏群治，回易众听，纪纲民极。较之仰天独唱，众心不止者，厥用益宏焉。夫国闻闾史，稗官杂事，抽毫而悉具，则陈一纸而汲众流，庄言谐论，良规俊辩，授简而并陈，则费寸阴而获拱璧。山川自古，方策犹存。顾瞻周道，鞠茂草以无时，惆怅新亭，庶横流之有托。此神州日报之所为作也。且夫赤县起于昆仑，白坟达于瀛海。文化肇造，实首此方，猗欤铄哉。三朝七曜，建黄中之极，五币九棘，垂丹书之制。方牙雅契，已有司海司陆之命，桑邱当璧，乃受鞑靼旄人之賸，观象察法，开物成务，视彼嵯峨金塔，想像声明，轶荡铜门，留传制作者，后先相距，犹以稚子而拟成人矣。粤自三季蜕嬗以还，渐有今不若古之诮。图篆灰于巨烬，绵裾工乎霸术。履武蹈踵，禾绢既无其才；因陋就简，群盲竞扞其籥。坐使狼獾歧舌之众，遂成积薪后来之势。眈眈禹甸，渺渺余怀。痛何草之不黄，思古人而难见。矧以嫣黄惨僂，蛮触纷呶，覩国者既有其人，论世者因而夷我。遂令神明之宅，广漠之都，冠裳礼义所留遗，风雨阴阳所和会者。日损月蹙，患此沦胥。嗟乎，百王陵谢，小儒方索其珠，九州云雷，万马齐喑其口。文武之道，既坠于周原，龙蛇之灾，更延于大陆，岂不以民朴浇散，群德陵夷，朝廷有西园谐价之声，缙绅无北门终宴之守，处士鲜鲁连蹈海之志，细民缺周嫠恤纬之思。四维不张，

一流将尽，用致此耶！而登墟墓者，必思德于九京，眷禾黍者，必兴悲于七庙。三宿之恋，未绝于粉榆，一姓之哀，尚崇于伏腊。况复出入皇王帝霸四千余载，绵历正统伪系二十余朝，服畎亩者，划苍梧紫塞雁门瀚海以为町畦，食名氏者，综七略九流四部百家以为藩匭。山崇岳峻，重瞳聃耳圩项骈胁之所降神，河曲江平，绿书赤字金马碧鸡之所流熠。教宗治理，萃儒侠魁祖圣神谟略之光华，物曲官能，极睿知心肝人工精英之创述。必有芬烈以康厄运，岂其天公易醉，而金策终沦，正气方收，而宝符不出。遂以秕糠前烈，弁髦悼史。伊川披髻，无所待于百年，宗国夷言，已先隳共五典。晋大夫之忘祖，徒袭衣冠，宋右师之卑祭，更无魂魄。将何以间饫愿存历谱垂三统持五运哉！夫徐舒雍壅，厥生秀民，羲画农耕，聿开神龛。指南有作，启闢龙覩地之图；活版初传，让路德操戈之隙。四游干运，开地动之先河；三正授时，契日轮之恒晷。西陵纤手，貽大利于全球；上国华虫，饰蜚英于百代。是为神州人种智慧之特色。搏搏大地，浑浑蒸民，群姓既昭，宗法斯建。然而溺神道者，淆之以祭师，诬帝谓者，渎之以天使。静言欧洲政教分离之始，实为百年凶残遭会之机。此州自上古以远，民事昭晰，绝地天之通，罔有降假，废云鸟之纪，以奠阴阳。魂舒魄惨，识类性通德之宜；日薄星回，验育物位天之则，是为神州宗教观念之特色。封建既息，阶级遂平，卖浆织屦者，徒步而取公卿，揭竿斩木者，赤手而论大宝。故英伦贵族议院之改革，无所用其勋勳；日本藩阀政治之弛张，不足论其轻重。是为神州社会主义之特色。因仍宗法，以建国家，雷霆万钧，积重难返。然而立天顺人之微旨，磅礴乾坤；外夷内夏之大防，昭垂云汉。及其苍鹅已出，白马方来，则有握拳碎齿，激悲愤于倾辅，剖腹纳肝，担忠贞于末路。亦有岳岳贯虹之气，哀哀三户之谣，矢一瞑于黄冠，望归来于朱鸟。沈井中之秘史，干城上之浮图。汉尼拔之崎岖道路，蔑以加兹，玛志尼之悴憔生平，讵能相尚。是为神州国家主义之特色。建三世之神旨，恢大同之上德，圣心广大，仁智斯闳。乃若禹名所极，指大秦泰远而方遥，衍说所周，眇少海重瀛而毕具。建冠裳以会万国，崇封禅以召百灵。彼夫亚力山大之武功，该撒棚标之战略，沙力曼之盛业，拿破仑之野心。较厥岁年，瞠乎后矣。是为神州帝国主义之特色。文明法系，约有四宗，震旦一隅，渊源最古。三代以降，枝叶弥繁，周官六典，实职官通则之推轮，王制一篇，具民刑诉讼之方略。治罪专律，邓析已定为竹刑，民法正文，萧何用悬于金布。刑名既黜，轨迹不闳。然而检罗马法之成文，远在千年以后，守大宪章之契约，实为五誓所苞，洞天人消息，久贵民权，观中外之会通，自宏邦礼。是为神州法律统系之特色。蹄远既瞩，文字以滋。主形主声，苍佉实分其道，行右行左，中西各适其宜。然而东极蜻蛉之州，南旋马来之族。谚文假字，谚语苗歌。虽形体之大殊，实本支之相嬗。若其黼黻文治，棣通民俗，甄录之富，赫于琅环，流别

之繁，溢于江海。是为神州文学思想之特色。环游瀛海，检探岛夷，披热带之荆棘，触寒门之冰雪，欧风所播，逸足相寻。然而张骞凿空，实在西历之前，甘英持节，远临咸海之外，近世以还，华佣所赋；辟澳大利不丰之土，蔚为上腹，相美利坚通运之宜，致之远道。蒙犯霜露，嘉惠人群，援爵论功，应居上赏。是为神州冒险性质之特色。过此以往，更仆难终。实岳渎之骄子，天壤之俊民，非犹太、波兰、印度诸族所可同日语也。夫诵荷马神话之诗，希腊所由光复，读布氏英雄之传，意人遂以崛起。斯拉夫民族，以一成一旅而蹶东邻，日尔曼森林，用再接再厉而摧强敌。况以开明夙擅，灵赋久甄，纵横二万余里，文轨方同，男女四百兆人，风霆易合。蕴秦孝之积耻，效勾践之卧薪。诉帝尝以敷诚，待皋陶而与直。何遽不可以负荷积薪，支持堂构者欤！然则指陈得丧，穷极端委，鞭策顽懦，导启贞元。匪劳者之自歌，实道人之可徇。且夫训方问俗，地官之洪轨也，陈诗观风，太史之常识也。弃我取人，师善之夷徒也，演术通艺，知今之宝筏也。旁求四国，不无郢书燕说之功，俯仰八埏，大昭鸷视鹰瞵之象。谅有裨于颓运，或无诟于卮言。顾以简牍方陈，质文易眩，综其流极，厥有四端：繁词既骋，神鉴不周。既论甘而忘辛，亦无敌而放矢。竹素之林，或淆于坚白；箴砭之术，无补于膏肓，此一弊也。鲁市有虎，传言者三人，洧渊斗龙，祷祈者万众。不疑盗嫂，鲁参杀人，采齐东之谰言，为中朝之故事。又一弊也。东邻生猫之事，奚裨于见闻；大官赐酺之仪，何关于惩劝。一则委巷谰闻之琐语，一则承平粉饰之虚文。录之者累累难终，闻之者昏昏欲睡。又一弊也。甘陵两部，迄成钩党之灾，蜀洛分崩，卒酿靖康之祸。当大厦将倾之日，昧同舟共济之箴。昵乡曲之宴私，淆品评于月旦。又一弊也。蓬心未化，症结弥多，是则宏达所深訾，亦惟吾党所不尚。嗟乎！即因求果，弥怀履霜集霰之哀，振聵发聋，宁辞披发纓冠之诮。欢娱朝野，悼燕雀之焚如，大好河山，怅螭蛙兮盈耳。惕亭林匹夫之责，绎南雷待访之编。嗟我兄弟，孰非轩昊之神孙，请续阳秋，备纪中原之文献。空言可托，有痛哭流涕以陈辞；来日大难，冀瘖口晓舌之有补。矫矫风云之气，会扶白日再中；昭昭天祖之灵，眷我皇图亿禩。

谢英伯之鼾声

谢英伯之鼾声，名闻天下，识与不识，莫不知之。余于壬寅（一九〇二年）冬间识英伯于杜鹿笙、杜枚叔昆仲家，其时英伯犹未以鼻息如震之名显于当世

也。丙午（一九〇六年）英伯任香港《东方报》记者，挈眷移居兰桂坊，一夕有印度警差过其门，闻屋内吼声如雷，疑有人打架，扣门询之，英伯之妇吴氏告以是其夫瞌睡时鼻息之声，屋中并无他人等语。印差去后复来，闻吼声较前更巨，遂再扣门查究，经谢妇再三解释，均不置信。卒由谢妇唤醒英伯，用英语说明始已。又辛亥（一九一一年）某月英伯自香港赴檀香山就《自由新报》之聘，有一次登厕，竟酣睡马桶上，多时不醒，西人乘客以厕门久闭，屡呼不应，乃令侍役设法启之，侍役闻鼾息咻咻，始知其中大有人在，遂狂敲厕门不已，良久英伯始睡眼惺忪而出，乘客无不捧腹。又英伯足迹所至各地旅店，如澳门、华盛顿、纽约等处，常因鼾声惊扰邻室旅客，致为店主人下逐客令，此等事不一而足，书不胜数。民八英伯及余等组织一俱乐部于广州大东旅馆，名九九俱乐部，英伯初提议定名鼾社，众以鼾之一字，为英伯个人所独擅而反对之。英伯殆以鼾主人自命矣，陕西富平人胡景翼（笠僧）亦一大胖子，同以鼾声著名，在讲堂向军队训话时，甫数语，即鼾吼大作，与英伯在某校讲书之姿势相仿，可谓无独有偶。民十四景翼任国民军陕军总司令，驻军开封，反对贿选之国会议员多往开封谒之，景翼恒于谈话间对众瞌睡，咻咻作狮子吼。中有皖人凌毅（蕉庵）语之曰：“有广东老同志谢英伯体胖嗜睡，无一不与君相似，惜未挈之同来，与君一较长短。”景翼曰：“谢君若来，吾必倒屣以迎，吾二人大可辟一室以各显身手，为世界胖子留一段佳话。”举座为之绝倒。英伯自民五在美娶洋妇后，鼾声似较未娶时略减，余一日叩英伯以是否黄白通婚之效，英伯颇以为然。今英伯既与美妇离异十余年，不知其鼾声较昔何如耳。

（编者按：此文刊于《大风》旬刊第七期。即民二十七年五月五日时在英伯逝世一年以前。英伯生平轶事甚多，容作传记补述之。）

新小生李是男

李是男原名吉棠，字奕豪，又号公侠，广东台山县人。生于美国旧金山大埠。其父佑宽在美设一皮鞋商肆，曰和隆号。是男生而颖悟，在旧金山土生华童学校中有神童之誉，尤嗜本国戏剧。凡著名粤曲之小生唱本，皆能琅琅上口，稍长从父命回粤习举子业，文艺因而大进。乙巳（一九〇五年）某月粤人冯夏威为美国新订华工禁约，自杀于上海美国领事署前，国人大愤。各省志士纷纷组织拒约会，以抵制美货为号召，是男亦与邑人之有志者李自重、陈元英等发起联志社于台山西宁市，以为拒约之响应，由是革命思想油然而生。丙午（一九〇六年）秋偕李伯海

访余于香港《中国日报》，由伯海介绍加入同盟会。伯海为加拿大域多利埠保皇会长李福基之子，与《有所谓报》记者郑贯公、陈树人等素有往还；尝于乙巳冬以郑陈之介绍入会，是男盖其族人也。丁未（一九〇七年）冬是男以事渡美，曾访余辞别；余为作介绍函使谒金山《大同日报》唐琼昌、刘成禺及致公堂黄三德诸人共商组党救国事宜。次年余得是男书，谓致公堂会员多顽固守旧，曾与商榷多次，均侈然自大，不愿与后辈少年合作，故无从进行云云。己酉（一九〇九年）春余复得是男书，介绍其族人李海云、李以衡等人会。海云即在金利源商店内搭庄之远雄源号经理，后于庚戌（一九一〇年）新正广州新军一役，捐助巨额军饷者也。是岁秋间是男得余寄到香港中国同盟会委任主盟员证书，始与旅美同志黄芸苏、张藹蕴、温雄飞、黄伯耀数人发起少年学社于旧金山，以为革命运动之基础。盖当时旅美华侨风气尚极闭塞，是男等均年少言轻，素不为华侨各团体所重视，故未敢直接昌言革命，以招惹多数顽固侨胞之反感也。未几复组织一《美洲少年周刊》，由黄芸苏、黄超五、温雄飞等分任撰述，而印刷费则是男独任之。渐与各埠华侨之有志者发生密切之联络，宗旨日益明显，旧金山之保皇党人咸以“少年亡”三字嘲之。又与黄芸苏、张藹蕴等创设金门两等学堂，以培植革命青年为宗旨，侨界子弟头脑为之一新。是岁腊月香港同盟会谋运动广州新军反正，特电旅美孙总理求助发动费二万元；总理时在纽约，得电后遂奔走于纽约、波士顿、芝加哥三埠，向华侨筹款，结果仅得港币八千元，大失所望。乃星夜乘车向美西，拟继续筹足二万之数。抵旧金山时已近除夕，是男偕少年学社会员迎之，是为是男获识总理之始。总理旋请致公堂及少年学社集款接济广州新军反正之急需。致公堂以一时无此能力辞，少年学社则仅有会员十余人，多属教员及工界，亦爱莫能助。至庚戌正月初旬，仅由是男将其父商店所存会项凑足港币千元，电汇香港应急。计庚戌新正广州新军反正一役，余在《中国日报》前后经手收到美国捐款港币九千元，其中一千元即是男个人之义捐也。是时孙总理鉴于美洲党势之不振，遂命少年学社即改组为中国同盟会，各会员须一一加盟，委任是男为会长。由是全美各埠分会次第成立，会务渐见发展。庚戌夏余应加拿大致公堂之招，自香港赴温高华埠，主持《大汉日报》笔政，兼为旧金山《大同日报》撰文，与是男同声呼应，相得益彰。是岁冬是男等复集资改组《少年周刊》为《少年中国晨报》，美洲之建立同盟会机关报自此始。辛亥（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广州一役失败之后，孙总理自加拿大渡美，以旧金山洪门致公堂与同盟会不能合作，殊足妨害革命事业之进行。遂令同盟会员一律加入洪门团体，以利筹饷，是男等从之。旋与致公堂总理黄三德等创设洪门筹饷局，委任是男为会计，并发行中华民国金币券，以供国内各省起义之需。券之两面均有会计李公侠署名，即是男也。是男复为筹款计，组织一新剧团，亲自粉墨登场，饰小生一角。居恒精于音律，至是高歌一曲，响遏行云，金门士女咸大为倾倒。每往来唐人街中，妇女界多称之新小生。归寓则电话纷来，馈品杂至，几

有掷果盈车之誉。是岁七月余自加拿大赴旧金山，助是男等募集军饷。及武昌革命军兴，致公堂及同盟会洪门筹饷局等三团体推余代表归国，是男送余登轮，以甘草香糖一包为赠。谓适过某街，有某女士馈以此物，谨以转赠云云。惜余于抵沪开行篋时，始发觉此糖已融化净尽，无可入口，殊未免辜负美人之贻矣。民国既成立，旅美党人相继回国任事，独是男留美十年，始终担任《少年报》编辑职务，绝无归志。中间经过党部派别无数之政争，是男咸置身事外，不作左右袒，因之深得一般党员之爱戴。民十一遵孙总理命归国，任广州总统府秘书。民二十任广州中山纪念堂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以见嫉于林直勉辞去。民二十三年任中央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委员兼秘书。民二十六以肺疾归广州，是岁五月二十八日逝世。国民政府以其有功革命，特下令褒扬，并赐予公葬。余曾作联挽之曰：“兴唐李靖，代有贤孙，记倡义美洲，勋绩永铭金币券；顾曲周郎，偏多短命，叹收功赤壁，延寿难为铁肺人。”

关外大侠蒋大同

蒋大同原名卫平，直隶永平府人。少有大志，弱冠补博士弟子员，考入永平师范学校，恒读黄黎洲、顾亭林、王船山诸家学说，慨然兴故国河山之感。戊戌（一八九八年）政变后，因读浏阳谭嗣同《仁学》一书，极慕谭嗣同为人，乃改号慕谭。肄业师范未久，嫌其迂腐，转入永平中学。会保定陆军速成学校成立，即弃文就武。谓国家危急至此，非振兴武事决不足以救国，锐然以练兵救国为己任。于是刻苦精进，成绩斐然，同校五百人无出其右。乙巳（一九〇五年）美国宣布禁阻华工人境苛例，举国大愤，粤人冯夏威且自杀于上海美领事署前，以警告国人，大同闻之，义愤填膺，遂纠合同学，提倡抵制美货，以为内外各埠拒约会之应声。而《京话日报》主笔浙江人彭翼仲深表同情，亦联合鼓吹，共相号召。北方抵制美货之风潮，一时大盛，不期为驻京美使所侦知，遂向清外务部指名惩治。清外部即电保定陆军速成学校督办冯国璋捕之，冯爱惜大同之才，密令逃逸，而以先事逸去闻。适赵尔巽出任盛京将军，冯暗中推荐之，彭翼仲与赵亦有交谊，更为之游扬。时距甲辰（一九〇四年）日俄战后未远，关外犹未建置行省。大同至奉，赵极推重，乃为之擘划新政，培植教育，振兴实业，又与商震、陈幹、徐于等创办辽阳陆军小学，及沈阳劝学公所、商业专门学校、官话字母总塾等各种教育，辽沈文化因之大兴，关外地广人稀，满清入据中土以来，二百六十余年中向禁止汉人移植，而山东直隶流民往往因乞食流亡，混合日众，但与土著杂处，语言亦异，及蒋大同之

官话字母总塾成立，仅六阅月即已分设六十余处，语言统一，收效极巨。赵尔巽爱其才，欲委以劝学所督办一职，大同不欲仕于异族政府之下，初意只求作事，不愿作官，及赵劝其入仕，竟辞而去。遍历关外及蒙古各地，知中俄之关系日益迫切，遂向俄人专心研究俄文，以备后用。又借贩书为业，向东三省各地推销各种革命救国之书报。某日旅行黑河，卖书于齐齐哈尔府官宋小濂，宋聆其言论，观其丰采，知其非书报小贩，留为上宾，求其襄助办学。大同以不作官拒之。宋对之愈加敬礼。时留东同盟会本部已派联络员至东三省扩张党务，大同与商震、徐于、刘乾一等均先后加入，党势日盛。未几复只身旅行于西伯利亚边境一带，沿途观察形势，调查风土人情，及俄人对于远东之军事设备，以熟谙俄语，多有所得。盖大同以满蒙沿边前后被俄人侵占之土地不下数万方里，我国非恢复故物，抵御外侮，无以生存，故有志预求熟悉敌情，以为军事外交之准备也。及入俄境，俄吏见其形迹可疑，拘留于警所，检其日记簿绘有各处险要略图，指为国事秘密侦探，收之世界著名之西伯利亚监狱。狱囚万余人，非俄国无政府党即中国红胡子，红胡子待新犯极凶刻，大同入狱未久，即以国语向数十老犯演说国事，红胡子皆奉之如神明，食必先进蒋先生，狱中禁读书报，大同乃每日口讲指画，教老犯读四书古文，不一年而江湖大盗皆化为孔门弟子矣。寻狱卒亦渐为大同所感化，俄犯见红胡子多受大同熏陶，性质一变，遂亦群请蒋先生授课，大同乃以俄语讲解中国历史伦理。俄囚大半属政治犯，尤易于感动，不半年皆感格，称大同为东方圣人，功德所传各地，俄人崇拜者日众。沿西伯利亚各城镇绅商遂联名向俄皇保释，俄皇特旨释放之。出狱之日，老犯万余人同声痛哭，声震铁棚，俄官吏相戒失色。据实电奏俄皇，俄皇电谕谓蒋大同如再入境，应特别注意。己酉（一九〇九年）大同释归长春，又创办《长春日报》，极力鼓吹国权及抨击伪立宪。清吏渐疑之。先是安庆革命军首领熊成基于戊申（一九〇八年）十月失败之后，尝易名张建勋，只身变装至长春投大同，大同乃召商震、徐于、徐竹平等密会于长春，商定进行方略，成基遂之东京谋再举。己酉十二月成基至哈尔滨有所活动，竟为汉奸臧冠三所卖。案发，《长春日报》主笔徐竹平亦被捕。大同以时在榆关得免，然清吏借此大兴党狱，罗织愈甚。大同不得已再走黑河避之。是时宋小濂已迁黑河道尹，正与俄国发生四十八旗屯边界交涉，束手无策。见大同至，大喜语之曰，得君来此，国界可以不受俄人侵略，大同亦慨然以挽回国权自任，允与俄国周旋。甫入俄境，俄吏见其名刺，即动目相顾曰，此昔年出西伯利亚大铁狱，全狱号哭敬爱不忍其去之蒋先生也。亟捕之，宋子濂闻讯，迭向俄吏交涉多次，俄吏佯允送还，舟过黑河，俄派哥萨克骑兵一队，乘其半渡而要击之，大同死时，犹高呼“杀我一人，毋累舟子”，声未歇而舟已沉，土人哀之，收其尸葬于黑水之滨，宋小濂闻讯，为之哀悼不置，然惮俄人强悍，竟不敢过问。夫蒋大同固中国革命党之圣贤也，俄国狱囚尝称之曰东方圣人，可谓当之无愧，乃不死于清吏之虐政，而死于俄人之忌刻，虽与熊成基就义吉林之死法不

同，而死于救国保种之神圣事业，则无以异。今之党人若能化私为公，彻底觉悟，事事奉蒋大同为模范，全国一心誓保吾圉，则外侮虽强，不足虑也。

湖南都督焦达峰

焦达峰原名大鹏，字鞠菰，湖南浏阳县人，父充某乡团总，家颇殷实，有田五百余亩。少读书家塾，聪颖冠侪辈。年十四入浏阳高等小学，渐解时事，闻邑人有道同邑先辈谭嗣同、唐才常殉国事迹者，辄倾耳静听，如有所得。稍长，才气焕发，尤嗜体育运动，如击球竞走诸事，皆所擅长。时清政不纲，外患迭见，湘省教员于授课时，往往以所谓中兴名臣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诸人勉励学子。达峰怫然语人曰，胡、曾、左、彭自残同种，贻羞本省，何足称道！吾惟有从谭嗣同、唐才常之后耳。偶从日本《清议报》获读衡阳劫火生所作，有“前后谭唐殉忠义，国民千古哭浏阳”之句，则哦声讽诵，恒不去口。年十八入长沙高等学堂游学预备科，研究日文，进步甚速。居长沙二年，渐与各秘密会党头目及留日归湘之革命党人游。挥金如土，人多目为豪士，而革命思想亦愈奋发。诸友中以湘乡人禹之谟过从最密。禹于甲辰丙午间（一九〇四至一九〇六年）在湘籍兴学校开工厂以提倡革命，最为激烈，极器重达峰志节，凡秘密筹划，多使参与，达峰以是增益不浅。

丙午（一九〇六年）年二十，遂决志东渡求学。其父尝先后为鬻田三百亩以供之。莅日后，旋入同盟会，日与黄克强刘揆一等研究长江沿岸起义方略。初拟学习陆军，以日政府不许私费生入校，不果，乃入东斌学校。东斌固私立之初级军事学校，乃日人专为中国自费留学生不得入陆军学校而设者也。丁未（一九〇七年）同盟会新设十部，中有联络部，专以联络各省秘密会党为宗旨，达峰被推为调查部长。未几达峰及同志川人张伯祥、余晋城、吴祥慈、赣人邓文辉、鄂人刘仲文等以同盟会内部复杂，长江各省会党头目皆脑筋简单，非另设小团体，并委用熟悉会党情形者分途招纳，不易收功。又以同盟会誓约内之“平均地权”四字意义高深，非知识幼稚之会党所能了解，故另约一部同盟会员组织共进会，以专司此项联络任务；且将“平均地权”改作“平均人权”，以免收揽会党时多费唇舌。此事进行异常秘密，同盟会员除有关系者外，多不知之。达峰于立会前尝举以告黄克强。黄以为不可，曾与驳论数次。及闻其已告成立，而孙总理方在越南筹划军事，未便商讨，遂亦置之不论。戊申（一九〇八年）四月云南河口革命军失败，黄克强自南洋重莅日本，旋组织军事讲习所于大森，以供同志

研究陆军之需，达峰与焉。

是岁九月共进会推举主要会员回国分途进行军事，湖南军事定义由达峰负责。十二月达峰抵汉口，与鄂省同志协商入手方法。旋还湘。己酉（一九〇九）三月再来鄂，偕鄂同志合设总机关于汉口，分机关于武昌，惟绌于经费，支持不易。适有浏阳布商刘肯堂、周海文贩夏布至汉口，因以乡谊关系说之入会，刘周从之。且以卖布所得捐充党费，两机关赖以不废。七月达峰偕刘周返湘，易名左耀国，密赴浏阳、醴陵、萍乡等处联络当地会党头目相约合作。

辛亥（一九一一年）二月谭人凤自粤来湘，云黄克强等谋在粤大举，约达峰在湘筹备响应。达峰乃偕杨晋康、熊心逸、钟剑秋等赴汉口，与鄂同志居正、孙武、邓玉麟诸人规划湘鄂同时起义事，众以经济困乏，束手无策。居正献计，谓广济县西北邻蕲州之洗马坡有一达城庙，内供金菩萨一座，所值不赀，吾党若设法盗取，大可供革命资金之用。众推达峰与居正二人先往洗马坡查探。达峰等于三月查探事毕回汉口，即闻广州事败，众仍拟二次盗取菩萨充军饷，志不少懈。达峰且谓此事非以精练拳棒之武士任之不可，彼可以回湘征调武士前来。达峰去后，居正、刘文锦、查光佛等迫不及待，尝于五月中旬约数人赴达城庙附近三角山，谋盗取佛像，以不得当而返。至六月初旬，达峰及杨任、谢介僧等果率湖南大汉七人莅汉，是月中旬达峰即领七人继续工作，十五日晚出大锥凿通达城庙后墙，盗取金菩萨而出，以天将晓，行人渐众，寺僧且鸣锣报警，不得已将菩萨弃诸庙旁池塘而去，此数月奔驰之筹饷奇计，遂一旦付诸水泡矣。众闻此举功亏一篑，颇形懊丧。会四川争路风潮大起，湘鄂各省继起响应，全国震动，众认为机不可失，决计两省同时大举。达峰即返湘，召集陈作新、杨任、谢介僧、邹永成、王炎、李洽、曾杰、阎鸿翥、杨守贞、袁剑非、文经纬、易宗羲、成邦杰、吴作霖、唐溶、谭性恂、伍任钧、张显义、徐鸿斌、安定超、袁天锡、曾楚章、吴瑞卿、曹政典、刘子培、龙铁源诸人商定进行方略，各分任联络军队会党及政商学界诸项工作，筹划数月，渐臻成熟。

是岁八月十九武昌革命军突起，湘省军政界余诚格等闻警，一日数惊，达峰急部署一切，拨于二十六日举兵应之。定由哥老会在城内先举火为号，而新军继起响应，以湘抚余诚格防军总领黄忠浩戒备严密不果。至九月初一日晨，达峰以布置就绪，乃自领敢死队于小吴门，令陈作新扑北门，军界同志安定超、李金山、王鑫涛、丁乘尧、张加勛、杨雨农、刘清安、刘光荣、谭满芳、彭友胜诸人预受约束，各以所部反正，遂进占军械局谘议局各机关，合攻抚署。余诚格、黄忠浩下令军士应战，皆不听命，革命军遂攻陷抚署。余诚格已先逃，黄忠浩由抚署后遁出，为革命军所获。众以其抗义最力，杀之于小吴门。又劝业道曾绶若营务总办王毓江长沙县知县沈瀛均以犯顺伏诛，翌日军民代表及革命党人大会于谘议局商组军政府，公推达峰为大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达峰力辞，且荐谘议局

长谭延闿自代。谭坚拒，达峰始就职。军政府之下设军务参谋两部，以阎鸿翥、袁剑非、吴作霖、杨世杰、阎鸿飞等分任之。时余诚格虽逃，满清余孽犹未肃清，谘议局议员之属君主立宪党者亦多怀异志，虽经军政府安民镇抚，人心迄未安定。初二日夜午果有藩署之亲兵队突攻官钱局，革命党员夏季佑被害，王猷伤腿，赖安定超等率新军四十九标五十标数营，将其包围缴械遣散，逆谋未得逞。达峰为孚洽輿情采众议计，特延谭延闿为军务院长，事无大小，悉以咨询谘议局旧绅，由是军民两政多由旧绅把持。谭人凤偕鄂都督府卫队营长刘佐龙自武昌解械款抵长沙，见都督大权旁落，大碍军事进行，力主解散旧绅所设议事机关，达峰一秉大公，认谭议为窒碍难行，且虑发生内变，婉言谢之，谭慨叹而去。时鄂中乞援之电，一日数至，达峰关怀全局，一意以出师援鄂为务。嗣得谭人凤解来械款，即令原新军一协扩为两协，拨令王隆中率四十九标先发，五十九标驻岳州作预备队，长沙只留少数军警维持秩序。诂新军前驻宁乡益阳之五十标梅馨蒋国经两营，已于初三日陆续开回省城，君宪党陈树藩、向瑞琮、黄诚斋诸人方谋颠覆革命政府，遂播散种种蜚语，阴使标统梅馨等谋杀焦陈二督，借便私图。于是扬言武昌济饷数十万为焦陈二督克扣，时达峰正议编练各县民军作第二次援鄂之举，浏阳醴陵人闻风来省投效者，络绎于途。反对者复引为口实，谓来者均系会匪，焦督即著名之洪江会首姜守旦变名，新军起义各弁兵有功宋邀升赏，即因焦督蓄意黜退旧伍，而代以会匪所致。因之谣言四起。形势险恶。达峰处之泰然，且当众自请辞职率师援鄂，以让贤路，而偿素志。众不许，乃仍令新军四十九标依原定计划于初七日出发，四十九标将领多属起义同志，达峰以急湖北之难，遽调遣离省，因之藩篱尽去，授匪以隙，杀机之伏，已在是矣。援鄂军出发后之第四日即九月初十日，城外商店受奸人煽动，发生纸币挤兑风潮，市民汹汹，旧绅诡请都督亲往弹压，达峰命副都督陈作新前往，陈督御马出，甫至北城门口，即为变兵所害。陈督既死，叛将梅馨乃扬言为故总兵黄忠浩报仇，诬陈为匪，并言陈匪已去，焦匪尚在，宜并去之。遂指挥所部冲入督府，达峰正与阎鸿飞、曾杰、文经纬、袁剑非、易宗羲等讨论继续援鄂及解决湘西纠纷等事，闻变，同志有劝之匿避者，达峰曰，安用避为！我为种族革命，凡我族之附义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绅士，余皆容之。今咨议局绅煽动黄忠浩残部叛变，既杀副都督，又欲杀余，悔不用谭石屏（人凤字）之言，将若辈先除，今竟为若辈所算，余惟有一身受之，毋令残害我湘民。且余信革命终当成功，若辈反覆，自有天谴。言毕，即亲出外向变兵宣慰，变兵遽前执之，拥至军政府门外，达峰乃望望旗而呼曰：诸君幸勿扰乱秩序。变兵自后刺之，遂死，年方二十五耳。

君宪党旧绅以阴谋得逞，遂拥谭延闿为都督，谭既就职，同时安民告示遍贴市衢，即任向瑞琮为军务部长，升梅馨余钦翼为师长，因恐出发援鄂之革命各队归而问罪，乃将杀害焦陈二督之罪名，加诸乱兵身上，主谋作乱诸凶咸得逍遥法

外。时前方部队已开至鲇鱼套，闻变皆泣不成声，徒以汉上战事方急，未便回师讨贼，以分革命之势，亦惟有沫血饮泣，与清军拼生死而已。谭延闿就任后，君宪派大权在握，对于援鄂，意存观望，未再加遣一兵。及闻黄克强登坛拜将，心有所慑，故革命党人在湘尚能相安无事。迨南京政府成立，梅馨等益有戒心，各向革命党权要曲意交欢，借消公愤。谭延闿后葬达峰于岳麓山。民国五年刘人熙督湘，始立石冢上，题曰“浏水堕泪之碑”。民国十六年余方编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闻老友刘揆一来沪，下榻法租界西门路永裕里梅宅，爰诣梅宅访刘话旧，并详询甲辰（一九〇四年）华兴会倡议始末，及后始知其居停主人即为当年杀害焦达峰因以升官发财之陆军中将梅馨，为之愕眙者久之。吾于达峰本无一面之识，然以同盟情感所关，忽耳梅馨名，有如电之触脑。则与达峰素识厚交而又有同志同乡之谊如刘者，竟能忘仇亲敌，有类姻好。其通权达变，远非常人所及，吾虽浅陋，殊愧无此雅量也。时梅馨以失兵柄居上海，旋患乳痛，将死。达峰友邓玉麟往视，曰，得毋焦公为厉耶！馨叹曰，当时直为人作猎狗耳。民元孙大总统追赠达峰大将军，其后章太炎为作赞曰：达峰年少蹶起，义屈元耆；而其言卒中，智勇仁疆，实出侪辈上，故能平行湘汉，制其綰毂，桀然为义师树标，盛哉。斯陈项之亚已。夫首义者固多强死，衔讐不整，陈王且有庄贾之祸，又况于余子。重以民党日偷，恶直上谏，扬浮名，没实功，达峰已死，而后来者掩以上勋，众口幡幡，又曷足校哉！

邝佐治事略

邝林号佐治，粤之台山县人。以己卯（一八七九年）三月生于美国旧金山都板街八百号。父业杂货商，幼随母回国求学。性任侠，好抱不平，乡人有遭土豪欺侮者，辄袒之。弱冠娶妇，得子二，父死，家渐中落，仍渡北美谋生活。初从族人某习西厨业，颇堪自给。每于工作余暇，浏览新学书报，渐具国家思想。时清政不纲，国内各省之革命义师，山鸣谷应，前仆后继。旅美侨胞发刊日报以鼓吹革命者：旧金山有《大同日报》，檀香山有《自由新报》，温高华有《大汉日报》，发聩振聩，收效卓著。佐治涉猎有得，隐然萌步武史坚如、徐锡麟之志。己酉（一九〇九年）秋冬间，香港同盟会员李是男与有志者十余人初组织少年学社于旧金山，以提倡民族主义为号召。佐治闻之亟报名为会员，时华侨风气尚多闭塞，各埠保皇党徒势未少衰，李等犹未敢公然大声疾呼，以独树一帜也。庚戌（一九一〇年）正月广州新军反正，孙总理适于是时行抵旧金山，少年学社

开会欢迎之。孙总理令改组为中国同盟会北美支部，是为同盟会在美之滥觞。佐治自加盟后，雄心勃勃，日思献身作一革命军马前卒而不可得。是岁冬同盟会之言论机关《少年中国晨报》社在旧金山企利街出版，党势为之一振。十月初旬清海军大臣载洵贝勒赴美考察军政，将道经旧金山。旅美中华总商会及中华会馆得讯，特预备开会欢迎。佐治闻之，以若辈忘亲事仇，异常愤激，遂约同志香山朱卓文各挟手枪，拟伺载洵过屋伦码头狙击之。盖谓载洵此来，名虽考察军政，实则归国后将颁行伪立宪，以笼络汉人，大足为革命前途障碍，非先除之不足以绝后患也。先是清贝勒载涛尝于六月前游美，道经此埠唐人街时，被儿童掷以爆竹，受一虚惊，故此次载洵来此，清领事预求当地警长严密保护。以是美警署分派侦探多人，预伏屋伦车站四面，侦伺观众，以备不虞。及载洵从美东乘车抵屋伦站，佐治与朱卓文同厕身人丛中预备行事。詎佐治形迹早为美探所疑，当其以手向裤囊欲拔枪时，即被美探马佛麦缅等以强力制止。朱卓文知事机已泄，乃乘间逸去。时清领事及华商多人群集车站鞠躬迎迓，均未知载洵遭逢此险。迨美探查觉佐治所怀者为实弹手枪，遂拘解至总警署，控以蓄意杀人之罪。同盟会以佐治此举由于爱国热忱所致，特延美国社会党法律顾问华利斯为之辩护，并派朱卓文办理此案。方佐治拘至法院时，美检察长讯以是否有意暗杀载洵及其暗杀之理由。佐治侃侃而谈，直认不讳，对曰：余年三十一，向任卜技利埠西人学生兄弟会所充当厨工。去年曾加入旧金山中国少年学社为会员，该社乃以推翻外族专制建立民主政治为宗旨，如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之美国独立然。此次满洲皇族载洵来游美国，并非为小国谋公益，实欲兴建海军，以压制革命党，使汉人受满酋束缚。我闻其来，早已密购手枪，立意杀之，以除国家大害。只我一人起意，并无他人知之，今所谋不成，殊属可惜。然我既决心为国牺牲，虽坐电椅而死，亦毫无悔意。我料我死后必有无数之我继续进行云云。依美国通例，凡杀人嫌疑犯未经发见真实证据而坚不承认者，十九可以援律脱罪。往年在美华侨堂斗之风，最为盛行，被获之凶手多能经过辩护手续而获逍遥法外，即为明证。佐治此次仅有身怀凶器之嫌疑，尚无拔枪在手之行动，若矢口不认，则按律只受身怀凶器之轻罪处分。今佐治乃慷慨供招，惟恐不尽，虽由华利斯律师多方辩护，卒无能为力，经屋伦埠第四高等法院数度研讯之后，陪审员十二人根据佐治供词，竟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移送山坤顿狱监禁。事前华利斯律师尝诣狱访佐治，嘱将供词否认，以便脱罪。佐治曰：“吾此举在于唤起我国民族之革命精神，及予满洲君臣以严厉之警告，万死不辞，安用脱罪为。”同盟会于佐治入狱后，定义每星期派员慰问，以尽党谊。民元夏南北统一，旅美同盟会致电北京国务总理唐绍仪，请向美政府交涉释放佐治。唐令驻美公使向美政府婉商。美政府据法院查复，称佐治在狱三载，治事勤劳，学业精进，乃下特赦令释之。佐治既出狱，遂买棹归粤，期享受革命方略中所载优先国民权利。及抵羊城，自诣都督府投刺求谒，当局以非素识，拒不见之，继历访国民党诸干事话旧，党部

对之亦殊冷淡。佐治大为失望，喟然语人曰，吾昔读东周列国演义，范蠡有言，越王勾践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安乐。观今日吾国革命党人，谁非勾践者，而今而后，吾知所以自处矣。于是愤然渡美，隐居小埠，重度其厨工之生活。余于民三年重游新大陆，尝周游全美百数十埠募集讨袁军饷，见国民党各分部会所尚多悬佐治照像，与殉国诸烈士同列。余到处查询佐治踪迹，竟无有知之者。呜呼，若佐治者，其革命党人中之神龙欤！

温生财事略

温生财略历 温生财字练生，广东梅县井塘乡人也。父迎盛，母林氏，生子六人，生财居四，性刚烈，家贫淡，少失怙，依母而成人。虽无力就学，少读诗书，然幼得贤母慈训，且受基督教会陶熔，故大义深明，廉介自若。甫弱冠，即誓志从戎；离乡井来粤峽，得亲戚介绍，投入行伍，充当步卒。而本省，而浙江，而安徽，而台湾。半生奔走，饱历风霜，无非为异族效力。然目击政界之腐败，乃洁身引退返香港，而改习机器。嗣因与同业意见不洽，复自鬻其身，抛祖国而远渡南洋。至荷属日里埠作种烟工，不堪其虐，复逃走英属。备尝辛苦。幸善操顺德音，得顺德华侨机器行中招呼，留为同业，始得业机器度日，寄身于吡叻锡矿之中，时有革命党员在此宣传革命，生财乃翻然起舞，由盟友张子敬介绍为同盟会员。以是日发革命热，逢星期必到会所听演讲。己酉（一九〇九年）秋乃与同业组织广益学堂于吡叻之咖啡山，日则手足胼胝，谋工资以为支持之用；夜则聚首一堂讨论国事，研究进行之方。辛亥（一九一一年）二月初旬见时事日非，瓜分日迫，因而实行暗杀之热度，益高涨而不可制。乃愤然回国，有所进行。本欲北上燕京，谋刺满虏，奈川资无几，介绍无人。未几金尽裘穿，不得已屈身广九铁路佣工，寄居东市街之小屋，徐图机会。时黄克强、赵伯先等方谋在粤大举，省垣机关林立，生财与港粤两地党人绝少往来，故并不知之。

杀孚琦概况 辛亥三月初旬，驻粤满将军增祺被召入京，都统孚琦承其乏。初十日飞机师冯如在燕塘演试飞机，生财探悉孚琦亲往参观，乃预伏要路中相机行事。是日午刻孚琦偕其子出东郊，所带旗兵多人，拥卫严密。观飞机毕，四时自燕塘返，经农林试验场，入视一周。旋返至咨议局前商店麒麟阁门首，人丛中突出一人，身穿蓝色薯蓣衫裤，面黑而矮，闯至轿前，迎面放枪击之。中孚琦额，孚大呼，旗兵以事起仓卒，相顾错愕。该刺客续放枪，复中头部，孚即不能言。旗兵互相走避，时因看飞机者散场，行人拥挤，但见刺客飞舞其中，舆夫已将舆弃下逃

去。刺客复放枪两响，中孚头部腹部，前后共四响，旋弃枪向东门一路而逸，时孚子乘舆杂众人中，随役扶之下，趋入咨议局，一霎间，发难场所只余孚尸独在舆中，气息已绝。久之舆夫始返原处。孚子入议局，初欲借用局兵护卫回署，后乃电告总督都统各官，各官至，始命卫队多人拥护孚子返署。刺客何人，即温生财也。

被逮时情形 当生财发枪时，咨议局守卫巡士郑家森闻声出视，适见游人奔避，生财独自跳舞人丛中，四面顾盼，旋乃将枪弃去，雍容而行。郑即尾随其后。生财行至竹林，将身上外衫脱去，弃之林中，郑暗随之。途遇河南侦探队黄熙林会同跟追，转向盘龙里，出永胜街，与站岗巡警相遇。郑乃上前将生财抱持，并鸣号召诸巡士，与生财互相纠缠。时生财大喊“丢那妈”一声，颠扑数次，卒被拿获，解向二区分驻所，其凶器亦于尸场附近拾得，系五响手枪，只余空码壳四颗。获案时，适警道王秉恩在咨议局，巡官飞报，王飭即就近解交番禺县，由番令用无顶轿，派兵数十名护押至营务处严密会讯，十一日又将介绍生财往广九铁路雇工之荐人二名及其屋主拿获。

供词之壮烈 生财于清吏初次审讯时，供称温姓名生财，四十二岁，顺德人。六岁时被人拐往大吡叻，十余岁回粤，在某提学处当长随数年。又在台湾镇张其光部下保五品顶戴。回粤后再往南洋充当烟草锡矿等苦工，又曾入公益学堂稍习英语，习闻孙文等排满革命之说，遂入其党。去年乘利生轮船回香港，在客栈居住。带有友人荐函，在广九铁路做工，故常往来港澳深圳等处。现居省城东市街均安店对面。无父母兄弟妻子，即为顺德何村人亦记不得。生平不赌不饮，只好嫖。此次刺杀将军，系为四万万同胞复仇，先刺满人，后刺汉官，今义务已尽，心殊快乐。独恨吾无百金舟车费，否则入京师可以大得志。今目的虽达，吾心犹有憾焉。又言我一人，手枪一枝，竟吓散数十旗兵，如入无人之境。可见官兵无用，将来对待外人必不可靠。又言手枪自外洋带来，只剩五粒子弹，平时出门常携在身，闻演飞机，连续二日均前去观看。诘以同党，则称十八省皆有，以广东为最多。诘以何人主使，则称出自自己。诘其同党何在，则称遍地皆是，惟伊额头无字，故不能识。今事出我手，则我是革命党。侃侃而谈，绝无惧色。此连日讯问之情形也。又生财自言，是日系在旗人所开茶店饮茶，闻将军至，乃出而击之。获我之警兵本非我敌手，因自己目的已达，不忍伤及同胞，故听其立功。且语之曰，你们不过想升官，请勿动我，可随你们同行。在缉捕局讯问时，问官云，孚将军与尔何仇，何以将他击毙。答云，方今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皆系满人为之。此次系为四万万同胞雪愤。问官又诘其同党，答云，系一人所做之事，并无同党。诘以何不约帮手，答云，此事非比乡中械斗，人多可壮声威，若所约者，偶一不慎，泄漏出来，岂不误事。况人多亦属无用，即如昨日将军前呼后拥百十人之多，何以我一声枪即尽行跑清云云。问官恐其回护同党，吓以此处刑法利害。答云，何不拿来一试呀。问官亦无以难之。是日讯问时，又传其同居之何福等三人至堂质讯。何福系在广九铁路磨

机器者，对生财哭曰，闻得尔打死将军，我已吓得魂不附体，今又奉官传案。生财答云，此系我一人所做之事，与别人无涉，尔不用慌。又供称已故知县沈某即沈学司之伯父，及现在候补知县荣勋（粤省驻防）均系旧东。问官恐其说谎，即请荣令到场，已隔别二十余年，尚能认识。生财身上仍穿旧蓝布衣，头发颇长，气体甚粗，满口北音，兼能操上海旗下各处语言。讯毕，当堂取具掌模，即据此定讞。

张鸣岐之审讯 未几，水师提督李准复往营务处，亲提生财审讯。据供实系嘉应州人。讯至行刺情形，生财眉飞色舞，扬扬得意，双手拍腿而言：谓放第一枪即见各卫队走散，心甚畅快，接连放三枪，见均中要害，更为欣慰。并对李云，吾二十余年前即已识尔，彼时尔方为大少，今已为大人，因教以为将之道，谓为统领者，应如何恩威并济，军士方能用命，应如何纪律严明，方为良将。絮絮不绝。再讯问同党主谋姓名，坚不吐实。喝用四人踩扛，仍不吐。十四日已刻张鸣岐亲讯生财，先由兵勇用无顶轿将生财押赴督署，轿帘密盖，外垂铁练，一警差执之。前后各拥枪械颇众。在二堂开审，中设长公案，张坐左，春右都统坐右，两边列公案二，左藩司陈夔麟及巡警道兼营务处差王秉恩，右提法司俞宗颖及广协兼营务处差黄培松。两边又另设两案，一史厅承，一文检察长。张亲自讯问，先问生财姓名籍贯，皆操粤语以答。录事言汝能操北音，可用北语直说。生财遂改操国语，侃侃而谈，词气镇定。但以在营务处曾经踩扛，双足受伤，不能步履，且钉脚镣四度，故以四人掖之而行。然其状态轩渠，并无半点畏缩气象。所供无非排满革命等语。及供至初放一枪，各卫队员役均慌忙夺路而走，故放心再击三枪从容而遁云云。张问曰，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生财曰，杀一儆百，我愿已偿。张乃不复问。转请春右都统复究，冀得特别供词。而春闻生财供词，似有无限感慨。且其时天乌地暗，大雨倾盆，故不再讯，仍交回番禺县收押。

就义时演说 生财禁在番署时，常派差役四人勇丁十人轮流看守，其手脚颈项均用铁练锁牢，不能举动，每饭必须役人旁伺。十六日张督奉京电，即传文武属官密议数小时，不动声色。十七日正午张督升堂，提法司巡警道旁坐，随由番署提出生财，张讯验毕，问曰，不错了么。生财答曰，不错了，不用多讲。即押出督署头门外。番禺颜令设公案讯之，生财乃痛斥官场腐败情形。已而喝令捆绑，时生财伸直两手，刽手竟不能屈。未几生财云，吾今可任你绑，然后绑之。遂用竹箩舁坐，兵勇数百人及文武各官押至大东门外咨议局前，生财神色自若，绝无怯容，沿途自言自笑，若不知转眼即为断头鬼者。迨至惠爱街一带，乃大声笑曰，今日我代同胞复仇，各同胞务须发奋做人方好，既而曰，许多事归我一身担任，快死快生，再来击贼。时两旁观者人山人海，与平时决囚迥异。东较场兵警重列，禁止路人观看。番禺县知事一到，喝令行刑，而生财即为国就义矣。事后，上海《民立报》评曰“粤语‘丢那妈’三字，经温烈士一呼，而增无上之荣誉”，信然。

清季之西北革命运动

留东学界与西北革命 清季各省革命风潮之汹涌，实以留日各该省学生为其主动，西北诸省其最著者也。当乙巳年（一九〇三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于东京，第一日与会者有十七省学生，十八省中只有甘肃一省因未派生出洋，故尚无人参加。计当时西北各省学生先后入党者：直隶有张继、杜羲诸人，山西有谷思慎（仲言）、王荫藩、荣福桐、荣炳、景定成（梅九）、朱炳麟、燕斌、景耀月诸人，陕西有康宝忠、邹子良、曹雨亭、赵世钰、于右任诸人。时任驻日之山西同盟分会会长者为谷思慎，任该会评议长者为景定成，任陕西同盟分会会长者为康宝忠，任该会评议长者为赵世钰，彼等更另设一明明社，专介绍西北各省人加入同盟会，先经该会审查后始引进之。丙午（一九〇六年）某月上海复旦大学学生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东渡，向留日学界募股。秦、陇、豫、晋四省学生协会为集款二千数百元以助之，即明明社号召之力也。时他省学生与秦晋学生景定成、谷思慎、邹子良、王荫藩等往还最密者，有湖南之陈家鼎（汉元）、仇亮（武匡），江西之邓文辉、李烈钧，江苏之何子奇，山东之商震（起予）、陈幹等。陈家鼎与同乡甯调元方发刊《洞庭波》杂志，因归葬蹈海烈士陈天华于岳麓，惹起长沙清吏之注意，几被逮捕，仍亡命东京，遂与景定成、杜羲等议扩大《洞庭波》组织，易名曰《汉帜》。陈家鼎任编辑，景定成撰小说并译述，杜羲仇亮为投稿，因文字浅显激昂，极受社会欢迎。与《民报》、《复报》、《鹃声》各杂志分道扬镳，有异曲同工之妙。惜以财力不继，仅出两期而止。

西北革命之动机 未几山东同志陈幹偕商震东渡，邀景定成、陈家鼎二人赴青岛，创办震旦公学，拟联络青岛船厂工人发起同盟罢工，抵抗强权，工人渐能实行。旋为德人侦知，遂下逐客令，此戊申年（一九〇八年）事，是为北方社会运动之开端，同时兼寓种族革命于其中也。时景定成事先已入北京有所谋划，遇陕西同志井勿幕，遂偕游山西。及抵太原，及召集当地党员讨论起义方略，群以陕西民性强悍，地势雄峻，可为西北诸省之革命根据地，因决定秦晋联络发动计划，井勿幕归抵西安，乃介绍定成在西安高等学堂教习，以期交通军政士绅各界。时邹子良已由日先返，努力扩张党势，成效日著。勿幕与焦子静、师子敬诸人更组织健本学堂于富平会馆，谋树革命根基，胡景翼即出身此校。当时为年虽幼，已崭露头角，投身同盟会矣。由是革命党势力日张，不许保皇立宪派人潼关一步焉。井勿幕等以同志日众，乃多设分会及通讯机关。由景定成作四言密语

为党员约章，曰：秘露死决，接交宁缺，分途并进，破坏建设。又公推李仲特为会长，井勿幕、张奎光、邹子良、曹寅侯（树勋）、王一山等任军事责任，陈慧亭、常铭卿、茹卓亭、郭希仁、刘允臣、李元鼎（子诒）等任文字宣传及教育事业，寇遐李仲山等任运动绿林会党，景定成、杜羲、焦子静、师子敬、张翊初、马开臣等任联络各部分责任，常秘密集议于开元寺马开臣学塾及雁塔上，颇极一时之盛。此己酉庚戌间（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事也。

《国风日报》与北方革命 庚戌辛亥间（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景定成、杜羲二人以陕西革命萌芽渐次暴长，乃相偕离秦，杜羲北上，定成赴日本，与宋教仁、赵世钰、陈家鼎等商定进行策略。因留学界抗争河南矿权事，定成被推为争矿代表之一，遂得乘机公然入都，与湖北同志白逾桓创办《国风日报》，提倡中央革命。特程家桢（韵生）、田季卫两同志联络清肃王民政部尚书善耆为之保障，颇能口诛笔伐，不避权贵。及辛亥八月武昌举义，更乃大张旗鼓，为北方革命言论之中心。又密纳四川同志彭家珍于报社，谋炸清室要人，良弼死焉。奇功以立，《国风日报》与有力焉。

武昌举义与秦军响应 辛亥武昌革命军起，他省义师之响应，除湖南外，当以陕西、山西二省为最早，此即秦晋同盟会员事先联络驻省新军将校之力也。当革命军占领武昌之警报传至西安，党人井勿幕、邹子良、李仲特、曹寅侯等乃密议通告新军同志将领克期发动，以兵士入会者众，风声外泄，谣言大起。清将军文瑞与巡抚钱能训异常震惊，预以军械局枪支弹药分给旗兵，加意防备，且将新军之有革命嫌疑者尽移诸边远州县，而代以防营。第一标第三队同志将校钱鼎以事势紧急，遂提议从速发难，拟以九月八日为期，众赞成之，诂新军第一标第三队及第二标第三队均定九月移驻，文瑞且大兴党狱，兵士及学生被逮者八百余人。众大愤，遂于九月一日大会于森林，决定先期大举，即以第二标第一队长张凤翔率所部占军械局，第三队长张益谦占城门，钱鼎率陆军中学堂学生占布政使银库及各机关，文瑞率所部旗兵战不胜，退守满城。当夜同盟会员及各军将领开会于军械局，公推张凤翔为全陕大统领，钱鼎副之。后仿各省例改称都督及副都督，时文瑞仍据守满城，顽抗二日夜，力尽乃投井死。旋众复推井勿幕为招讨使，出兵河东，于是井勿幕率偏师由大庆关渡河，进占蒲州解良，攻克运城，河东一隅义军声势为之一振。张凤翔拒敌潼关，得失数次，始终不懈。西路则由曹寅侯集民军十万，多无械，持刀上阵，不计危险，力拒甘督升允所率之甘军；苦战数月，使敌军不能下乾州以窥西安，厥功甚伟。邹子良、张开臣既努力于光复西安之役，功成乃敝屣权利，退而组织新村于耀县，开西北社会革命之先河，可志也。迄民元二月清帝退位，张凤翔、张伯英诸将领时尚驻兵华阴县，与清军相持，会景定成渡河西来，因同议善后方略，诂升允尚恃强来攻醴泉，及闻清政瓦解，始议退师，而黄钺已据秦州宣布独立，升允惧断其归路。乃弃军走，醴泉围解，秦局因以大定。

山西独立与吴禄贞被刺 湖北、湖南、陕西各省举义消息传至太原，山西同

盟会员乃力促新军同志姚维藩、阎锡山、温寿泉等发动，正计划中，忽传陕西革命军将出师攻晋，清巡抚陆钟琦大恐，欲派新军一部移守潼关以阻之。新军参谋姚维藩对各同志主张在被调防之前克期大举，众然之，遂以八日为期，即就军中选敢死队五百人，以五十人往攻抚署，以四百五十人往攻旗城，是日拂晓新军攻入抚署，陆钟琦殉清廷，藩司王庆平提法使李盛铎等被获后旋即释放，遂推阎锡山为都督，温寿泉为副都督。时景定成尚在北京，闻变即绕道归晋，与同志仇亮、姚太素、史可轩、续桐溪（西峰）诸人共参督幕。清廷闻太原之变，即任陆军统制吴禄贞（绶卿）为晋抚，令率兵平乱。禄贞早年附和革命，庚子（一九〇〇年）八月汉口自立军之役，尝与唐才常同谋，后在北方亦时与党人往还甚密。及受晋督之命，党人气势为之大张，禄贞一面与统制张绍曾合谋，拟以陆军第六镇与第二十镇同时发动，一由石家庄，一由滦州，各登火车，假清君侧为名，会师北京，一面密约同志姚荐楠、孙荣、石德纯等在京策应。时清廷决定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但世凯因禄贞在石家庄，不敢北上。此时清廷极为恐惧，一面准备拥溥仪逃往热河，一面则派袁克定多方拉拢民党，竭力游说禄贞合作，禄贞置之不理。九月十六日中夜，禄贞在石家庄车站卧室中遽遭暗杀。张绍曾原系世凯私党，比即焚毁革命文告，中上进攻北京。斯时阎锡山已派景定成、仇亮、姚太素、史可轩等赴石家庄协议进行。景定成等既至娘子关，前敌总指挥姚以价迎入司令部商谈，夜将半，石家庄忽来电话，先报告旗兵溃变，次报告吴禄贞被刺已死，众大骇，咸谓吴为奸人所害，军心必愤激，欲为主帅报仇，应赴石家庄一观究竟，遂共乘车到石庄，遇六镇参谋何遂，相抱痛哭。景定成等说明来意，并集军队围定吴帅无首死尸举哀，其状甚惨。更对众宣言是为清廷派人来刺杀者，军无主帅，推何参谋为统领，北向复仇。各兵士乃振其缠白布之腕，齐声高呼，愿为吴统帅复仇。旋由旅长吴鸿昌邀入司令部集议，主张继续吴帅革命，议决电张绍曾由滦州攻北京，由山西担任联军军费及种种条件，电报随发，决定吴鸿昌集全军为吴统帅发丧宣誓。景定成等数人乃外出集合来石晋军向之训话。旋有人报告吴鸿昌自行率军退走于正定方面，无术追回，乃听其去。而议运回吴禄贞所截留之法国炮弹枪弹于太原，因此事为吴帅致死之由，盖不欲供给毒器于进攻武汉之清军，而特行截留以示反清决心，可谓烈士一片心血。且在议决条件中，若不运回，势仍归清军劫去，何啻资寇以兵。景定成等虽极力主张由正太铁路运回，庶不负死者志愿。然来石庄之山西革命军兵少力薄，未能坚守石庄，仅毁坏铁路十余里，以绝敌人交通，而涣其军心，终为袁世凯偷渡北上。袁世凯既秉清政，遂派段祺瑞率三路兵攻娘子关，相持月余，娘子关失守，太原随之，革命军乃分走南北，继续苦斗，幸续桐溪已攻克大同，雁门关之清军不战自溃，阎锡山始有退步。景定成等随军东下，由党人杨钱甫、李鸣凤（岐山）先后担任行军都督，得众万余，遂下绛州，据襄陵，攻平阳，战功卓著。直至清帝退位，南北统一，乃

停止军事行动。时袁世凯不欲山西落于党人之手，特派李盛铎主晋政，晋代表孔庚力争，谓大同河东均在党人掌握，必须调李盛铎回京，而允阎都督返太原，晋政乃可收拾。国务总理唐绍仪力玉成其事，袁世凯勉从唐议，晋局始定。

民元后之秦晋革命党 民元后陕西、山西两省有功革命之同盟会员，至今尚生存者寥寥无几。陕西党人已逝世者，有井勿幕、钱鼎、邹炳炎、曹寅侯、宋向辰、张义安、郭希仁、邹子良、张开臣、张乐成、南南山、王绍文、杜友梅、深如测、胡景翼诸人，就中三原邹炳炎系于癸丑（一九一三年）见杀于张凤翔，临潼曹寅侯于癸卯过鄂，被黎元洪逮捕，旋处死。山西党人已逝世者，有李鸣凤、续桐溪等，就中李鸣凤是于护法之役为陈树藩所害。

鄂党人三盗金菩萨

盗菩萨案之缘起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一役之前，黄克强在香港预派谭人凤携款至上海、汉口、长沙各地，分谒苏、浙、皖、赣、湘、鄂各省党人，令准备发难以响应广州革命军。是岁正月二十五日谭到汉口，邀集居正、孙武、杨舒武诸人面授起义方略，及给予运动费八百元。居等受命，乃设置机关三处，以汉口法租界长清里八十八号为总机关，武昌胭脂山某号为分机关，武昌黄土坡某酒馆为军界招待所。三机关成立后，兵士纷纷加盟，食指日繁，不满三月，此八百金遂渐次消耗，黄土坡酒店亦濒于倒闭。党人等深恐无以为继，群聚议筹款方法。乃由居正建议，谓广济县西北邻蕲州，距其祖居约八十里，有地名洗马坡者，其地有一庙宇，曰达城庙，内供金菩萨一座。乡人谓其灵应异常，每年为之许愿装金者，时有所闻，故此像所值不貲。吾党若设法窃取，大可供革命资金之用。众闻之，均甚赞成。议定先派居正焦达峰二人往洗马坡查探庙中情形，以便相机进行。

第一次之失败 居焦二人既受命，遂于是年三月下旬乘舟至武穴，登陆后先至广济居正家一宿，翌晨赴洗马坡，中途经田家河，二人顺道入田桐宅慰问田母。田母杀鸡饗之。比晚抵达城庙，宿庙前一野店。天晓庙门大启，乃市香烛入内，见四壁高耸，结构宏伟。内分三进，每进三大间，左厢有横屋，金菩萨像即位于中间正殿之左一神龛内，装有玻璃门。门外幡幔蛛网交横其上，神像烟熏，几不能辨其真相。居正时已剪去辮发，不便叩头，乃在旁燃香点烛，达峰遂伏地拜叩，默祝菩萨施舍金身，助成革命救民事业，和尚亦喃喃有词，一若相助党人祷告也者。达峰拜罢，捐奉香资一元，请和尚启玻璃门，以便瞻仰神像。和尚许之，达峰以手试探像身，屹然不动。和尚意似不悦。达峰恐其见疑，遂相偕辞

出，仍趲程返居家。居等计议以此事非一二人所能为力，决取道回汉口，向各同志求助，时在三月二十八日，即广州黄花岗一役之前一日也。

第二次之失败 广州革命军既败，湘鄂二省党人仍继续进行，不为少懈。是年四月居正等以经济困乏，仍欲力求菩萨施舍金身，以济军用。焦达峰乃自告奋勇，谓此事必须精练拳棒之大力士任之，乃易为力。湘中健儿好身手者不乏其人，彼可返长沙征调前来，众壮其言，达峰遂行，未几查光佛、刘文锦等数人相继至汉口，各谈运动成绩，咸主张以武昌为发难根据地。继议筹措饷源事，居正谓达峰已回湘调人来，稍候数日，吾等即可再请菩萨金身。查光佛曰，事急矣，不必候达峰，吾闻距达城庙二十里有三角山，属蕲州名胜，山中有小溪，产绿毛龟，小者曰金钱龟，富室多宝之。吾人若入山捕取出售，亦一无本生利之一法。众谓吾人目的殊不在此，菩萨尚未请到，何必节外生枝。光佛曰，三角山距达城庙甚近，上有寺观，吾等多已去辩，到山上即可冒认和尚，隐匿寺中，下山至达城庙，一夜可往返，尽可于夜中请菩萨金身同上三角山，即在山中用炉熔化，炼成金丹，以济众生，岂不甚便。众然其议。遂由居正、查光佛、刘文锦数人取道奔三角山，此行不经武穴，至蕲州城即登陆，行一日始抵山麓，刘文锦偶遇老友陈愚溪，一山居务农之世家子也，坚留信宿，众咸安之。次晨居等别友登山，见山涧险峭，即绿毛龟出产处。山巅有禅林曰三角寺，内进僧房数字，众乃税居一室，每日出资使比丘下山买米粮酒肉，一住经旬，或探取至达城庙道路，或准备安炉熔金工作，事未得当，而资斧已渐告罄，众咸焦急不已。时有蕲州城乡绅张梅溪者，素与居正友善，其家即居三角山西南及达城庙东北，距庙甚近，闻居等在山，乃约至其家度端午节，居等应召而往。乡俗是日例必拜神，达城庙香火尤盛，张梅溪约居等往游，庙僧以张为地方绅董，招待特优。且导往遍观佛像，众于金菩萨最为关切，巡遶不忍去。及归张家，众于饱醉后，即乘酒兴图入夺取菩萨上山，迨抵寺门，则是晚天气酷热，乡人多露坐闲谈，而庙内灯火辉煌，尤难下手，遂各失意而返；越日仍首途返汉口。

第三次之失败 是时鄂省军界运动益臻成熟，需费孔殷，六月初焦达峰、黎先诚（意达）、杨任、邹永成、谢介僧等在长清里八十八号议决作第三次盗金菩萨之举，并推邹永成负责筹款，购买锥斧电器等应用工具，与派人回约人前来之路费。不久由焦派至浏阳之黎先诚率会党中之有膂力者黎大汉等大力士四人莅汉，焦等知居查等第二次盗菩萨事失败，遂谓此次回湘，带来大个子均好身手，若入庙必可邀菩萨低眉，愿施舍金身救苦救难，众咸鼓舞。居正等乃典质衣物充旅费，由达峰率健儿七人作第三次之探险。六月十五日至洗马坡，将及达城庙，大雨如注。达峰谓天助吾辈成功。令众分两路前进。达峰等四人循后山坡逼近庙墙，命出大锥凿通后壁成洞，穴孔仅可容身，众依次爬入，至神龛前，将玻璃门劈开，二人手攀菩萨金身，坚不可动。继以铁锥凿其空，始摇摇倒地，即以三人牵曳至后殿，尽力凿之，久久始断其一手，及零碎小块。达峰命挟全身以走。及

出洞，天将晓，乡人已有巡行田陇间者。达峰曰，败矣，速将菩萨投诸池塘毋为乡人所见，后此有机会可再来取。而此金菩萨遂由刀劫而入水劫矣。达峰既出，中途遇分路来会之四人，指为误事，埋怨不已。行数里，问乡人骇汗相告，谓昨晚有大盗劫去金菩萨，和尚已鸣锣告警，四处追寻云。焦等于是分途疾走，大汉于路上一茶店为粮差四人所捕，闭置土室中，粮差奔赴达城庙报信求赏，大力士乘间逃逸，粮差大愤，乃遣人关照漕河镇各旅店，不许容留生客，查悉达峰等驻宿某店，群相注目。达峰队中有邓二者，湖南哥老会头目也，以粮差多厕身会党，乃用会中海底（哥老会秘密记号谓之海底）与之接谈，渐相昵，达峰出资沽酒，呼粮差共饮，粮差知邓二等谊属同调，遂以中途捕获大汉及脱逃事告之，并出所获包裹，检出电器锥斧等物，曰此非君等所有乎，君等走江湖，须明白本地规矩，敝处规矩与湖南大同小异，此间因达城庙菩萨被盗，风声甚紧，来往不易，我当为君等想一善法。遂嘱购草纸二捆，束一包袱式，并教以手提担负落店安放各种暗号，曰如法炮制，走尽蕲州，无人留难矣。更为焦等雇一小舟，珍重告别而去。是晚舟抵蕲州城，适遇大汉等四人亦至，各相慰问，并述经过。达峰曰，君等贪食贪睡，致有此失，若革命军打仗时如此失误，必难免军法从事也。众唯唯，次日抵汉口，至机关部报告。座中有嘲达峰为吞没金菩萨。达峰愤然曰，岂有此理。而此经营半载之盗菩萨案遂由此结束。

菩萨有灵革命成功 盗菩萨案结束后，不满两月，而武昌革命军猝然起事，一举成功。迷信者谓为菩萨有灵之所致。焦达峰于光复湘省之役，任都督未久，即为奸人谋杀，迷信者又附会为斫偶像一臂之报。以上纪事。多出湘鄂诸老友所述。查光佛字竞生，民元尝佐余任临时稽勋局审议员。所记武汉发难前各种事实，均属珍贵史料，更以梅川居士（居正别署）所著《辛亥札记》证之，异曲同工，益足征信。

女监学荣升监印官

女监学之出身 辛亥革命，鄂军都督府之外，另设总监察一员，位极尊严，群推共进会首领刘公任之，总监察府有监印官曰刘一女士，中华民国开国最初委任之女职员也。女士真姓名，世人多不知之。其母为粤产，寄籍沔阳，夫家属谁，邻里莫悉其底蕴。女生而貌美，雅善交际，其母居为奇货；时引邑中青年至其家茶话，因而得资。沔阳劝学所长某往来至密，一般学子每遇所长在座，咸逡巡不敢前，相率锡女以“沔阳监学”之徽号，是即女监学得此荣称之由来也。女幼字回教徒丁姓，以卖烧牛肉为业。嫁后未几，丁某暴卒，丁之亲属以女多外

遇疑之，群以谋杀罪控之县官。邑有少年侦知其事，仓卒挟女私逃，欲据为己有。女跋涉长途，足痛难堪，乃辞少年曰：吾不能再行，丁某固非余所害，自首当可脱罪。遂强步自投县署。县令提讯时，女泣陈冤曲，悲恻动人，原告丁姓亦俯首无言，沔阳学界闻之，各士争相营救，尤以劝学所长某为最力。县令公子某亦求其母向乃父说项，县令意为之动。劝学所长某乃密派人向丁之亲属疏解，卒以四百金销案。旋由县署宣布堂瑜，就犯妇择配，愿领得者例给官价二十元。卒由新堤富商王某领得之。女既随王某至新堤镇，以室有大妇，颇遭歧视，大妇屡图构陷，均以王某爱护备至，计不得售。大妇愤甚，遽以毒药投诸豆浆，使女呈王某饮之，冀借此陷女于罪。女察知大妇毒计，知不可留，乃乘间逃归母家，相偕乘舟至汉口。旬日后果闻王某暴卒，大妇以女已逃，无所归罪，乃托辞急病身死云。女既偕母抵汉，怅怅无所之，每使其投身妓院作卖笑生活，女以贫甚，亦不能拒。行道上忽邂逅一似曾相识之青年学生，两相问讯，竟是沔阳旧识，遂举前后经过历历告之。青年曰，汉口居大不易，吾当遍告邑中同学，为君谋之。女遂随青年渡江，至武昌，青年安置母女于胭脂山下一小馆，复向同乡饯金送之人校求学。女天资聪颖，课绩良优，沔阳监学所长某得讯，频至武昌慰问，且补助之。时胭脂山下设有党人机关分部，故党人亦多与女相识。

女监学与党人之因缘 刘公，号仲文，原名湘，襄阳人也。家颇富厚，性复慷慨。丁未（一九〇七年）留学日本，投身同盟会，雅为同乡党人所推重。时同盟会员中以利便运动国内秘密会党之故，另有共进会之组织，群推仲文为领袖，盖欲利用其资财以从事革命活动也。庚戌（一九一〇年）仲文自日归国，以家庭束缚，郁郁不乐，会清廷有考试留学生之举，其家命仲文北上应试，仲文颇有效法徐锡麟之志，遂语其家长，谓万一不第，则须纳粟捐道台衔，以为进身之阶。家长许之，辛亥七月仲文身怀白银五千两至汉，将取道北上，党人时正待款济急，闻仲文来，大喜。叩其来意，知将挈金入都，遂极力阻其成行。并告以军界之运动已大有端倪，吾辈应以全力赴之，万不可错过此良好时机等语。仲文甚沉默，迄无表示。诸同志知其囊贮多金，有提议用强逼手段，使其全数捐输充发动费者。杨玉如与仲文感情至厚，谓此举不宜孟浪从事，彼有女友某绰约多姿，现在某校肄业，虽其出身不正，然近与吾党多人结识，已熏染革命色彩，居常辄以红拂红线自居。仲文居此无聊，吾等若预授计某女士，使为吾党效力，由余介见仲文，使互生好感，渐成室家之好，则吾党有此内援，必于筹饷进行大有裨益云云。众咸称善，遂由杨玉如依计行事。仲文一见女监学，大为倾倒，邂逅数日，即营金屋贮之。并邀杨玉如夫妇同居，金屋在武昌雄楚楼，地颇佳胜，女监学得人而事，喜可知矣。

刘仲文、杨玉如迁寓雄楚楼后，雄楚楼遂成一党人机关，每日宾朋满座。仲文如夫人招待如礼，众咸善之。诸同志商戴仲文为湖北革命党首领，预备于发难时推为鄂军大都督。于是由杨玉如、孙武、彭楚藩等先后向仲文进言，请其将北

上纳官之白金五千两尽数提出作发动资金。仲文如夫人亦在旁力为赞助。仲文详询已往运动经过后，乃出汇单交彭楚藩兑银。楚藩曰：吾等只取银五千元，余仍交仲文作日用费。众得此款后，即席商分配之法，决定克日大举。仲文与其如夫人以风声渐紧急，遂先期于八月初旬由雄楚楼移居汉口俄租界宝善里一号，以便与同里之十一号及十四号机关部相联络。至是月十七日晚，十四号机关部因孙武等制配炸弹失慎，猝然爆炸，孙武炸伤面部，一时风声外露，汉口洋务督办吴恺元即会同俄领事率警探同往搜捕，因查悉十一号与十四号有连，遂复搜及十一号，当场捕获住户刘宗耀及少妇等数人，所谓刘宗耀即仲文，而女即监学也。据是月十九、二十等日汉口各报所载，略谓洋务公所吴恺元会同俄领事搜查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机关时，适有无辫者二人在门外窥察，据称住在武昌小朝街，时来访友者，惟据该人报称，此人系本里一号租户，遂即拿获襄阳人刘宗耀一名，又有一人送一少妇来敲门，亦被拘，该少妇作沔阳州口音，据称其夫名龙种纠云。

总监察府之监印官 宝善里之机关破获后，刘仲文夫妇及革命党员先后被逮者三十余人，彭楚藩、刘尧征、杨宏胜三烈士受刑不屈，死之。武昌新军同志闻讯，乃于十九夜大举发动，清吏瑞澄、张彪等闻风而逃，局势大定。众以刘仲文甫在汉口狱中脱出，仓卒不能渡江，黄兴在沪亦难赶到。遂由蔡济民、刘赓藻等奔至协统黎元洪住宅，从床下强牵黎至咨议局，推作革命军都督，黎迟疑未决，蔡济民以手枪拟之，始允署名。都督府既成立，刘仲文初在谋略处主持一切，诸同志以刘仲文既不得任都督，又未任部长，乃推为总监察，以监督都督府以下各职司，仲文于就职日，首先委任刘一女士为总监察府监印官，刘一即仲文如夫人，亦即多年前名动一时之沔阳女监学也。民元春南北统一后，总监察旋即裁撤，民二秋各省讨袁军失败，仲文以忧伤时事，未几亦死。其如夫人身世如何，迄无所闻，或其乡人能知一二耳。

彭家珍事略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人。先世系出湖南，以作宦入蜀，遂家焉。父仕勋官主事，尝一度考察日本，颇有志兴革。家珍生，而母患心疾，其父实兼任抚育之劳。年十六，从父命考入武备学堂，成绩斐然可观。既卒业，复往日本专攻军事学，饶有心得。时留东同乡学生甚众，就中主急激革命论者颇不乏人。家珍与被等游，油然而萌保种救亡舍我其谁之志。尝与同志数四讨论进行方略，以为边省革命不足以制虏死命，因力主投身军政界，实行中央革命之策，同志咸韪其议，而病进取之不易也。乙巳（一九〇五年）春归国，赖其父执某之揄扬，见知于川督锡良。

锡以其丰资英发，学识宏富，甚器重之。初从锡良入滇，供职陆军学堂任教练员，继调赴沈阳，充奉天讲武堂及东三省学兵营讲师。新军第二十镇内军官之有革命思想者，多出其门下，商震、程起陆、熊斌、刘骥数人，其最著也。时清政不纲，南方各省之革命风潮勃发不已。家珍日与同志谋在军界发动，迄未如愿。会赵尔巽代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家珍乃谋充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尔巽许之。因是得与驻滦州陆军第二十镇同志军官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朱霁青、郭凤山诸人暗通声气，密谋大举。站有免费乘车券，乃私赠党人作来往京奉沿路之用，前后罄数万纸。其后滦州义军之反正及京津同盟会之活动，此举与有力焉。

辛亥八月，武昌革命军起，湖南、陕西、山西各省先后响应，清廷震惊，迅令京奉各镇停止秋操，并调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率所部开往长江平乱。时二十镇适驻滦州，绍曾遂按兵不动，与第二混成协统蓝天蔚、三镇统领卢永祥、二十镇统领伍祥祜等乘机联名向清廷要求立宪。家珍与二十镇中将领早有联络，知绍曾等蓄谋进兵南苑以占据北京，故阴为之助。时清廷方由欧洲购取大帮军械，绕道西伯利亚经京奉铁路输送前敌，东督赵尔巽特派彭家珍、刘其达、张允仁等负责押运。道经滦州，家珍利用机会，先与其学生商震、程起陆等商定扣留方法，乃密电绍曾，请其在滦派兵截扣，原电略云：朝廷无立宪之意，不惜购买军火自相残杀，珍恭逢运输之役，苦无挽救之方。军火到滦，望公等妥为保护等语。绍曾得电，乃将军火截留，并电告鄂军政府以扣截经过。清廷得电大骇，因有颁布宪法十九信条及特赦党人之举，惜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与张绍曾、蓝天蔚协攻北京之计划，因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而致瓦解，而清廷亦罢绍曾职而代以潘巨盈。绍曾虎头蛇尾，竟违反众议，自愿解除兵柄孑身以去，致令家珍扣留军械之深意竟成水泡，良可慨也。

张绍曾既解职，家珍虽极失望，仍极力策动施从云、王金铭、冯玉祥以所部举兵反正，时汪兆铭、黄复生已出狱，北方革命同志张煊、赵铁桥、罗伟章、杜黄裳、陈宪民、黄子宾等二十余人组织京津同盟会，以为中央革命之枢纽。并赁天津俄租界洋房为机关，家珍与焉。众议举家珍与黄复生、赵铁桥、罗伟章等往沪，制造炸弹，并联络南方党人请求接济。家珍、复生以是留沪研究制弹方法。四川旅沪党人欲推家珍回蜀主兵事。家珍曰：“北京为清虏根据地，四川枝叶也，拔其根本，枝叶自萎，吾愿任其难，四川之行，非吾意也。”于是江苏都督程德全乃任家珍为北方招讨使。党人亦推之为北方暗杀部部长。由秦皇岛密运军械炸弹入京，是岁十一月抵津，乃锐意进行工作，使同志吕绍、刘应移等分任所事，己则毅然以狙击满清权要自任。

时清廷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且予南北议和全权。世凯挟和议以自重，禁卫军总领兼军咨处副办良弼知世凯有异志，乃组织宗社党以制裁之，目的在拥护清室阻挠共和，世凯威吓清帝退位之计划，因之大受影响。会冯国璋攻下汉阳，而王金铭、施从云等举义滦州，亦如昙花一现。清酋主张顿趋强硬，南北和议以是中断。

家珍奋然曰，事急矣，良弼枭雄也，此獠不灭，终为革命大患，吾不急除之，人其谓我何！遂挟炸弹日夜伺之，以良弼防卫森严，苦不得机会。筹思再三，忽忆前任奉天讲武堂教习时，该校监督崇恭与弼友善，乃拟派其学生熊斌、刘升之兼程赴奉，用崇恭名致电于弼，伪称赵尔巽愤宗社将亡，举恭来京，共图挽救；预计电到后，与同志各怀弹，持崇恭名刺分赴良弼、荫昌、铁良等宅，诱而杀之。以此商诸同志，众虑其谋太险，徒死无益。家珍慨然曰，赴义岂能相强，我一人为之可矣。遂偕杜黄裳、赵铁桥、陈宪民数人入京，税居中西旅社，求良弼小照得之。至十二月初六日，始探悉清室内廷于是月初八日假腊八赏赐喇嘛恩粥典礼，召集诸亲贵密议南北战事，默计机会难得，遂避人作绝命书寄诸同志，并嘱其仆伍焕章次晨将衣物运津交民意报馆。及期乃服标统制服，身佩军刀，乘车诣金台旅馆，言自沈阳来，因军事来京，怀出崇恭名刺予之。遂命车入前门，先至军咨府及良弼旧宅，均不遇，复诣红罗厂良弼新宅。阍人答赴摄政王府未归，乃趋候门外。有顷，良弼施施而来，遂回车踵之。甫入门，弼下车，家珍亦下，出崇恭刺求见。弼曰，夤夜至此，胡勿迫乃尔。家珍乘其不备，掷一弹未中，又掷之，轰然一声，阶石尽裂，良弼被炸断左股，晕绝卧地，弹触石反射家珍头部重伤而殒。同时毙命者有弼卫兵八人马弁一人。良弼久始苏，唤其教读康撰瞿至，谓之曰，我辈军人，死何足惜，吾见政府不可为，故组织宗社党以图挽救，今我死，清室亦亡，刺我者真知我者也。长吁一声，血涌而逝。是役家珍同党均以事前措置有方，未及于难。时袁世凯方谋夺取清室政权，以宗社党作梗，异常棘手，及良弼遇刺，乃私谓庆王奕劻曰，家珍为奉天讲武堂及东三省学兵营教官有年，二十镇中下级军官多出其门，滦州兵变皆其勾结，今近畿迭出暴举，足征革命党势力已及肘腋，此后祸变将防不胜防矣。奕劻以告清太后隆裕，清室震栗，由是逊位之局乃定。是则南北和议阻力之消除及清帝逊位之决心，实家珍一弹之力有以致之，厥功伟焉。

旅美华侨组织空军始末记

吾国人之组织空军，始于辛亥革命一役，在辛亥八月武昌革命军举义之前，孙总理已使美洲致公堂黄三德、唐琼昌、朱三晋及同盟会李是男、黄芸苏诸人合设洪门筹饷局（又称国民救济局）于旧金山，以供国内各省发动军事之需。嗣鄂省军兴，各省纷纷响应。余先期奉孙总理电召，自加拿大至美襄助募款。是岁九月有芝加哥埠党员梅培建议组织飞机队，请由筹饷局拨款购机，并雇用美国机师回国参与战事。余及筹饷局诸干事均赞成之，遂委托梅培以购机及延聘机师等

事，使就近斟酌办理。惟其时党人咸缺乏航空知识，华侨青年在美国飞机学校肄业者，只谭根、林福元二人。谭属同盟会籍，甫毕业而未取得万国航空执照；林系帝国宪政会会员，由《世界日报》供给学费，余等以宗旨不同，未使约其参加。梅在中美经营月余，雇得美人飞机工程师威尔霍斯（Wilcox）一名，及购置寇蒂斯（Curtis）厂制单翼飞机六架。另有同志学习工程助手李绮庵、余夔二人。威机师之雇用条件为期限一年，工资美金一万元。十月下旬威机师及李余同到旧金山，余与细谈，始知威尔霍斯为一修理飞机工程之专家，并不谙练驾驶之术，若无飞行专家同行，则所购飞机等于无用。乃亲访谭根，请其随机返国，专任空军统领之责。谭以万国航空执照尚未颁到为辞；但允于颁到后立即赶回参加。余等遂不得不令威机师等先期至上海候之。时余已受致公堂及同盟会洪门筹饷局三团体之委托，以旅美华侨革命党总代表之名义，回国参与组织临时政府事宜，与威机师等先后率飞机二架莅沪，尚有飞机四架则于两月后由梅乔林等携回。南京政府既成立，各飞机均运抵南京，由总统府拨地开辟飞机场，特令旅美归国党员邝灼等驻守机场四周，以资拱护。二十日后第一飞机装置竣事，然未飞行即已损坏。诂上海各报纷纷记载，竟称余为飞机师，谓冯某第一次试飞，已飞至四千尺以上，孙大总统深为嘉许等语。盖一年前曾有飞行家冯如在粤试演飞机失事，各报以为余即冯如，故有此种误会。某日驻宁美国领事访外交部长王宠惠，谓其夫人毕生未见飞机，欲于定期飞演之日同往参观。王外长以告总统，总统询之于余，余曰：“谭根尚未返国，此间尚无正式飞机师，倘俟飞机装置完善，亦恐无人能飞，暂时似不宜请外宾参观云云。”王外长遂婉辞谢美领事。民元二月第二二飞机装置已妥，惟谭根仍无归国消息，总统以有机而乏人驾驶，深为失望。总统府庶务科长朱卓文自告奋勇，谓在美时曾随美机师某凌空数次，大可借此一显身手。及试飞日，余及总统府各职员同往参观。朱卓文周身是胆，毅然登机，诂此机离地不及三尺，即堕地损坏，朱所戴军帽破毁作数片，头部仅有微伤，亦云幸矣。无何南北和议告成，一日孙总统、唐少川、胡汉民及余闲谈，偶及飞机效用事。余曰：“此次由美带回飞机，因余等绝无航空知识，误以为凡飞机工程师皆能精于驾驶，只雇有修机员，而无驾驶员，遂致此机等于完全无用，非常可惜”等语。唐少川曰：“机虽无用，亦有大效，盖北京各报曾转载沪电，谓革命军飞机凌空数千尺，威力如何伟大，袁世凯即以之威吓清隆裕太后，隆裕为之动色下泪，其退位之果决，此亦原因之一”云。南京政府解散后，美机师即给资遣回本国，此项飞机由朱卓文措置收藏，后无所闻。余任稽勋局长时，尝于民元秋间向袁世凯建议组织飞机队，并荐谭根回国任编练之责。袁飭参谋部向余协议进行，卒无结果。同时谭根在美发起飞船公司，向华侨招股成立，拟遍游檀香山菲律宾各地飞演谋利，纯属营业性质，附股者多国民党员。民二七月赣宁讨袁军起，余于是月下旬脱险出都，莅沪日知谭根方率飞行公司人员在檀香山各埠飞

演，遂电该埠《自由新报》转谭，令速携飞机回国参加讨袁义举。谭复电上海《民立报》转余，索汇旅费三万元，余无以应。民三谭率同伙至日本谒孙总理于东京，总理委任谭为中华革命军飞机队队长，谭后游菲律宾，借飞机营利，以得菲岛国民党员之助，获资甚丰，然其为人赋性忌刻，见利忘义，渐与国民党同志不协。民四归粤，在香港、广州等处飞演，哄动一时，粤督龙济光探悉谭与民党颇有渊源，以其属美国籍民，不敢加害，乃诱以巨利，谭为所动，竟与民党脱离关系，而世人亦不齿之。谭得资后，遂抛弃航空生活，优游自得，卒以暴病身死闻。民三旅美国国民党员张洛川、汤汉弼等组织一秘密团体，曰救国社，尝集款训练航空人才，作二次讨袁军之预备，同志之应募就学者，有朱汉彝、刘恢汉二人，均在美西山的古航空学校毕业。乃朱刘等于学成后同改就别业，无志回国服务，殊属憾事。民四五间旅加拿大各埠国民党分部先后派党员至飞行学校肄业，造就航空人才颇不乏人。民五讨袁军兴，居正奉孙总理命起兵于山东潍县，所部有华侨飞机团，以夏重民、伍横贯为正副团长，参与团员多归自加拿大。然成立未久，而袁世凯已伏天诛，各团员未得一试其技。同时旅美国国民党支部亦拨款养成航空人才，先后应募者有李光辉、张惠长、蔡司度、陈庆云、杨仙逸、周宝衡、黄光锐等数十人。民九九月陈炯明自闽回师讨莫荣新一役，张惠长、杨仙逸、陈庆云陆续驾驶飞机轰炸莫军，立功至伟。回忆当日朱执信孙哲生及余等设立机关部于香港东京酒店，密由美国购入飞机数架，使杨仙逸、张惠长、陈庆云等由澳门飞入粤省，一举而攻陷虎门，再举而克复广州。当飞机飞达广州，投炸弹于德宣街督军公署时，莫荣新、郭桩森、杨永泰、李根源等方集桂系及政学系诸首要在公署开军事会议，及闻一声炸弹爆发，乃仓皇作鸟兽散，是为广州有史以来之飞机炸弹第一声，是不可以不纪也。溯自辛亥以至民九，美洲华侨党员组织空军者五次，一为民元南京总统府之飞机队，二为民三美洲救国社之训育航空人才，三为是年孙总理对于谭根飞机队长之委任，四为民五山东潍县之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飞机团，五为民九讨桂逐莫之飞机队。第一二三四之四次，或以技术欠精，或以组织缺陷，或以时期过短，或以服务不忠，均不能施诸实用。至民九讨莫一役始奏肤功，今之言空军者，饮水思源，当亦知所本矣。

粤记者陈耿夫被害始末

陈耿夫原名友亭，广东南海县西樵乡人，少读书乡塾，学冠侪辈。稍长，以家贫不能自活，乃之越南海防谋生，初依其戚某在商肆司账。岁乙巳（一九〇五

年)旅美华侨冯夏威以愤美政府颁布华工禁约,自杀于上海美领事署门前,各省志士大愤,纷纷组织拒约会及鼓吹抵制美货,以图挽救。耿夫在越南闻之,乃向侨胞尽力提倡,为国内拒约会之声援。侨商刘岐山、甄璧、林焕廷等深为感动,爰假海防台湾街三十二号万新楼为拒约会办事处,风声所及,西贡、堤岸、金边各埠侨胞亦相继发起,耿夫之力为多焉。丁未(一九〇七年)春孙总理自日本莅河内,越南各埠同盟会次第成立,海防党员举刘岐山为分会长,耿夫为书记。丁戊两年革命军先后在钦州之防城、广西之镇南关、钦州之马笃山、云南之河口等处举义,海防实为粤、桂、滇三省交通枢纽,党人购械运饷,多出此道,耿夫力助刘岐山等措置供应,饷械赖以不梗。戊申(一九〇八年)三月河口之役既败,黄克强、胡汉民暨侨商黄隆生、甄吉庭、刘岐山诸人以不容于越南政府,先后他适,党人历年在粤、桂、滇三省边区之军事活动,遂因而停顿。耿夫亦于己酉(一九〇九年)秋赴香港,访余求相当工作。余乃以《中国日报》记者一席处之。庚戌(一九一〇年)正月倪映典以广州新军反正不成,死之。耿夫以在海外宣传革命,功效远不若内地之著,遂决计亲至广州创办报馆,为文字上直接鼓吹。旋发刊《人权报》于城西洞神坊,与《国民报》、《平民报》、《天民报》、《齐民报》、《军国民报》等各倡急激论调,为广州黄花岗一役前后民党报纸一时之盛,耿夫亦视此时代之工作为彼一生最得意事业。及辛亥九月广东反正,耿夫专心在同盟会办理党务,不求仕进,旋同盟会发刊《民谊》杂志,耿夫任编辑人。

民二秋各省讨袁军失败,是冬耿夫亦亡命日本,与余邂逅于东京。尝语余曰:吾在《人权报》执笔时,洞神坊及十八甫等处各商户,无不识吾姓名。每外出商户及路人多啧啧相指,谓此即某报记者陈某云云。时在座同志夏重民等,皆戏言洞神坊居户应为耿夫建立铜像以志纪念。余亦口占一绝戏赠之曰:“铜像巍峨陈耿夫,洞神坊里大规模,却嫌不及西乡胖,辜负昂藏七尺躯。”盖东京上野公园有日本维新伟人西乡隆盛铜像,耿夫身长体瘦,远不及西乡之肥硕也。民三余在旧金山发刊《民口》杂志,耿夫恒撰文寄余,借笔资自给。未几归香港,与林焕廷等创办《现象报》,大倡讨袁救国之论,以措辞过激,为当地干涉,乃偕鄂同志曹亚伯联袂周游南洋英属群岛,向侨胞力辟暂停革命之说。盖自民四日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款之后,革命党分裂为急进缓进二派。孙总理向领导中华革命党主张急进,谓非倒袁不足以救亡。其他欧事研究会及水利速成社一派,则主张缓进,谓因日人亟图侵略,应暂停革命工作,以免增加时局之严重。耿夫亚伯均属中华革命党,性情刚烈,每至一部,辄向缓进派大肆抨击,缓进派俱惮见之。汪精卫、陈璧君时在槟榔屿,态度暧昧,尤触二人之怒。民四春夏间,耿夫谋在吉隆坡组织报馆,以振作侨胞勇气,各埠同志邓泽如、李源水、郑螺生、李孝章诸人咸乐为之助。将有成议,而袁世凯称帝之一幕竟成事实。国内护国之师,风起云涌,耿夫遂放弃办报南洋之计划,仍奔走香港广东之间,有所尽力。

民五年六月袁世凯暴死，帝制瓦解，耿夫乃在广州续办《民主报》，以敢言称。时政学系有言论机关曰《中华新报》，容伯挺为总编辑，中华革命党在粤毫无势力，独耿夫以私人资格挺身作老民党喉舌耳。民六七月孙总理率海军南下建树护法军政府，桂军阀陆荣廷、陈炳焜、莫荣新等深恐粤省地盘动摇，事事加以阻挠，耿夫联络广州报界公会竭诚拥护总理，高唱粤人自治之说，大招桂军阀所忌。民七七月政学系杨永泰及粤督军莫荣新非常国会议长吴景濂诸人合谋推翻军政府，改组大元帅一职为七总裁制，孙大元帅因而去粤。耿夫屡著论斥总裁制为不法，辞甚激烈。时任粤财政厅长为杨某，与督军府参谋长郭某，皆政学会重要分子。杨某尝函聘耿夫充财厅参议，为耿夫所却，知其不屑就范，意甚衔之。会桂系军政界内发生嫌隙，桂籍国会议员曾彦、蒙经皆出身同盟会员，因事与督军府参谋长郭某大生意见，适桂籍驻军将领亦有二派，反对政学系一派忽发布宣言，排击郭等利用军人祸害粤桂之种种罪状，耿夫遽以此匿名传单转载报端，杨某阅之，遂乘机借图报复，即与郭某同向莫荣新进言，谓陈某屡次造谣扰乱军心，非立处重刑，不足以示警。莫荣新谓陈某是老革命党，若杀之，恐孙某见怪，杨某谓□炮已离粤，彼等现皆失势，殊不足虑，请下决心等语。莫遂命郭某立下手令拿捕耿夫枪毙，并封禁《民主报》，而耿夫遂于被逮后两小时以枪毙闻矣。当耿夫在《民主报》被逮之后，其夫人周仲雅及其弟仲猷闻耗，急趋永汉南路余宅求助。余立访曾彦请其援手。曾谓杨郭二人向来心狠手辣，恐此时已来不及，姑试一为之。余复托友人转求海军总司令林葆懌向当局营救。正在奔走间，而护沙统领欧阳荣之自督军府出，谓耿夫业于是日清晨遇害，虽多方设法亦无能为力矣。耿夫既遇害，身后萧条，孀妻惨痛，余乃同港商余威李煜堂及友好廖仲恺、覃超、曾彦、李茂之、欧阳荣之等募捐二千余元以恤之。民八广东报界组织记者团赴日本考察彼国实况。余以香港《大光报》及《香港晨报》代表名义加入该团。舟次上海，尝谒孙总理备述耿夫被政敌惨杀始末，总理为之惋惜不置。

民十一年八月国会二度恢复。谋杀耿夫之杨某郭某，均为参议员。余于民六当选参议院第三届华侨区参议员，至是始获出席会议，与杨郭为同僚。时杨某挟政学系公款数十万，与研究系之王家襄争选第三届议长一席，至为剧烈。凡同僚允投杨票者，杨某概分别报酬一二千元不等。粤籍及华侨议员以乡土情谊，多入彀中。独有余等数人宣言杨某曾主谋推翻护法军政府及陷害民主报记者陈耿夫，实为中华革命党及护法同人公敌，誓必反对其当选议长。杨大窘，乃遣郭某诣香厂东方饭店访余为杨说项，并请勿重提前事，愿贡三千元为余寿。余曰：真正革命党人决不为臭铜钱污损人格，杨于民元夏秋间在北京加入同盟会，乃余签名介绍，故以乡谊友谊而言，余不独应投杨票，且可助其成事。但从公义党义而言，杨某确曾主谋推翻护法军政府及陷害老同志陈耿夫，人所共悉。如余勉强投票举之，既属斲损天良，亦为愧对死友。且耿夫系越南华侨老同志，余之议员乃华侨公

选，倘因此徇私害公，后必为海外侨众所不容云云。郭某曾任莫荣新之参谋长，与杨实为同谋，余答彼之辞，无殊一石二鸟。彼闻余言，乃懊丧抱愧而去。杨某知余作梗，遂向参众两院民党各议员，大讲亲善政策。谓胡汉民如来京就第三届参议员职，彼愿拥胡为议长，今胡既不来，民党各议员若投己票，自远胜于此席为研究系所得。倘民党肯一致助之，彼可助焦某得副议长，以相报酬等语。民党议员多为所动，群劝余勿再破坏杨之好事。余曰：君等皆与耿夫有旧谊，胡为与仇者合作？吾头虽断，不能为仇者助也。老友湘人周某佛然曰：老冯是华侨，华侨多久居外洋，不通达世情，吾等惟有置之可矣。选举之日届，杨某以运动成熟，意气扬扬，其二妾亦高坐旁听席，逖听好音。余知杨势在必得，勉写“三千元”三字于选票上投之，当选票收集将次唱名之际，余忽愤不可耐，遽登发言台上，向议院职员夺取选票，一一撕毁，立将废票纷纷散放于各议员席次，如粤剧之大撒金钱者然。及下台时，更将余票抛掷于华侨议员陈寿如、沈智夫等顶上，扬言曰，吾今日足以报死友陈耿夫矣。于是全场骚然，主席黄锡铨亟摇铃散会。翌晨北京各报标题咸大书曰《参议院议长流产，冯某某天女散花》。美洲及南洋之国民党分部有拍电向余致贺者多起。事后杨某乃授意华侨议员陈寿如等，令提出临时动议，谓余捣乱议场，应受除名处分，卒以各议员多拒绝署名而止，自兹而后，参议院遂无法可以产生议长，直至民十三贿选总统曹锟被逐，犹代以轮值委员制也。

民十六国民政府奠都南京，胡汉民任立法院院长，有人向胡推荐杨某为立法院委员。胡曰：杨某昔曾反对孙总理及陷害同志，吾焉能引用之。后数年，杨某遭逢时会，志得意满，一日遇余于南京中央饭店。傲然语余曰：为君之故，迟余官运十数年，今尚记前事否？余曰：君前反对总理及主谋颠覆护法军政府，故余昔年反对君之当选议长。惟吾党于民十二反对曹锟贿选一役，君曾追随拒贿议员南下，故余对此久已淡然若忘。但老友陈耿夫之血，至今仍未湔涤，则犹耿耿不能去怀耳。呜呼，耿夫九原有灵，其能瞑目否乎？

唐少川之生平

唐少川（绍仪）为手定辛亥南北和议开国四大元勋之一。自中山、克强、秩庸三先生先后逝世，至今岿然独存者，惟少川一人而已。考先生生平，素以骨鲠风节闻，自清季作吏以迄于今，不慕虚荣，不畏强御，数十年如一日。人有以非礼或不义于之者，辄遭白眼，时人莫不敬之惮之，或有以少川为高傲峭直，不合时宜者，余以为此适足以表示其人格之纯洁及伟大，诚非世俗朝秦暮楚争权夺

利之流所可同日语也。

自八一三抗战以还，少川以高年多疾，淹留沪上，足迹不下楼者七八月。日军阀以此老身负中外重望，极欲假其名义以资号召，因贿使少川平日往还素密之友好及世侄某某等，多方游说，饵以伪组织大总统一席。少川既不为动，且语其世侄岑某曰：“汝本身亏欠公款之官司尚未取消。一有拘票，即当重入囹圄，还谈什么政治？”又语其老友温陈二人曰：“国民政府之外不容有第二政府，毋再饶舌。”此种斩钉截铁之辞，殊令热心劝进之某等闻而汗流浹背，然昧者不察，以讹传讹，竟有谓少川将参加伪组织之蜚语。迨伪组织揭晓，真相毕露，而外间尚有感于某某傀儡之招摇，疑少川为别有作用者，是何异谓成王听政，周公犹有不利之图；曾子居家，参母未释杀人之惑乎？

以余所知，自民二十六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少川实为主张抗战最力之一人。当民二十五年秋自沪赴牯岭时，法俄二国适有邀请我国参加同盟之举，少川力劝当局毅然加入，卒因他种关系未果。识者谓苟其时少川建议如得实现，成立中俄法三国同盟，则前年冬之西安事件可不发生，而去岁卢沟桥及上海战争亦不致爆发，为之扼腕不置。于此足见少川之能深思远虑，洞烛机先矣。少川生平事业有益于国利民福世道人心者，指不胜数。今就余记忆力所及，略举其荦荦大者数端如下。

一、保全康梁祖墓 己亥庚子间（清光绪二十五年）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幕僚随任者，有徐麋升、于式枚、王存善（王克敏之父）及少川等数人，而少川年最少。一日清晨，众聚内花厅谒李督闲谈，李子经芳侍焉。忽来廷寄上谕一电，令将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祖墓划毁。李督阅后，问诸幕僚应如何办理。众俱唯唯莫敢置答，独少川起言曰“罪人不孥，古有明训。若株连及于党人祖坟，似太残忍，尤碍各国观瞻。还请傅相三思。”李督作色曰：“你好大的胆子！皇上的谕旨也可以反抗，岂不是大逆不道吗？”座众为之栗然。少川立趋外摒挡行装，拟即日赴天津。李经芳以告乃父，李督即命经芳留少川勿行，并嘱是晚至内室共膳。及时，同席者仅李督及少川二人，各侍役均遣令外出。李督温语谓少川曰：“少年人脾气真大！你当我儿子及众人面前批评皇上的谕旨，岂不是教人犯上？我因此不能不教训你一两句话。其实我对于划毁两人祖坟事，也不以为然。你何必多虑？”云云。由是宾主相安如初。而毁灭康梁祖墓一事，奉以发掘一二无主荒坟虚报塞责。此事底蕴，康梁师徒至民元后始知其详，尝先后向少川竭诚叩谢云。

二、完成辛亥和议 辛亥武昌举义，各省陆续响应。九月六日汉阳失陷，武昌危急。袁世凯别有会心，特向清廷推荐少川为全权代表，与革命军议和。少川抵鄂晤黎元洪，极称袁世凯亦主共和，以碍于清廷势力，一时未能宣布。十月二十八日南北两代表开会于上海南京路市政厅，双方议决展停战期十五日，嗣又展

期七日，时清军利在速战，少川乃倡议停战，以缓冯国璋之进攻武昌，其用意固别有在也。故和议告成后，黄克强尝语少川曰：“君若迟来数日，武昌势必不守。”则当日武昌情势之严重，可概见矣。少川既左袒革命军，名为清廷代表，实则事事为革命军设计。双方代表初议决召集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体之方法，亦为和缓清军攻势之一种策略。袁世凯以清室贵要意见庞杂，遂不允承认所议决国民会议召集办法，少川愤而辞职，世凯允之，致电革命军代表伍廷芳，谓嗣后应商事件宜直接电商。未几南京政府成立，孙中山先生当选临时大总统。世凯诘责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事，和议几致决裂，后知事无可为，仍密使少川与临时政府交涉。孙总统表示如世凯促成共和，愿以总统一席相让。世凯乃下大决心，授意段祺瑞，使联合各将领四十六人迫清廷宣布退位。清隆裕太后慑于威势，遂不得不屈意以从，少川时假上海南洋路老友赵凤昌宅为办事处。黄克强、陈英士、张季直等恒到赵宅探候和议消息。清帝逊位谕旨之文辞即在赵宅起草，乃出张季直手笔，原稿今尚由赵宅保存之。世凯得少川电，即遣梁士诒持逊位电稿入宫，谒清隆裕太后请旨。隆裕读之再三，流泪不止，凄然谓士诒曰：“祖宗三百年基业，如此便了结乎？”士诒跪叩曰：“请太后顾念皇室，勿使罹流血惨祸。”隆裕乃亲笔将电文“退位”二字改作“让位”，并删去数字，挥泪而退。此民元二月十九日事也。少川既完成清帝退位之大功。遂赴南京谒孙总统，陈述一切经过。总统奖誉备至，且邀少川加入同盟会，少川欣然从之。总统复命府中秘书及各部总次长与少川分别拍照，以志纪念。少川自是不独为国宣劳，且亦为党尽力，直至于今。

三、维护约法内阁 中华民国约法规定政府为责任内阁制。少川既任国务总理，事事咸恪遵约法。袁世凯以每有设施，辄为国务总理依据约法拒绝副署，致不能为所欲为，深滋不悦。内务总长赵秉钧常不出席国务会议，财政总长熊希龄因与同盟会不洽，对于借外款事件及发放各省民军军饷问题，时向少川作梗。袁由是与少川感情日渐疏远，一日袁语少川曰：“吾老矣。少川，子其为总统乎！”少川知不可为，浩然有去志。时直隶士绅及谘议局群推王芝祥任本省都督，少川亦赞成之。尝征求袁同意，袁佯面外之，而阴使直隶五路军界来电反对，遂以军界反对为辞，另委以他事。少川不得已提出辞职，袁仍力挽之。又袁批准张勋请发欠饷三十万两。少川谓张勋此人拥兵自固，心不可问，只允给予三万元。袁乃派段祺瑞、熊希龄、梁士诒先后诣少川疏通，要求照给原额。少川持之甚坚，谓欲其非法给予，惟有辞职之一途。会王芝祥督直问题被阻，少川争之不得，而辞职亦为世凯所不许，遂于翌日断然出京，留呈辞职。国民党阁员王宠惠、蔡元培、宋教仁、王正廷等以少川既去，本党政纲不能实行，遂亦联袂辞职。少川与袁数十年友谊，竟因维护约法而一旦中断。此种政治家纯洁高尚之风度，在欧美各国庶几有之，我国则鲜见鲜闻也。

四、首倡反对帝制 袁世凯既解散国民党及国会，帝制自为之形迹，日益显

露，至民四八月，遂阴使杨度、严复等六人发起筹安会，请愿实施帝制，复在御用之立法院发表变更国体之宣言。时汪兆铭夫妇方匿居上海靶子路少川府中。少川乃约蔡元培及兆铭二人联名，率先向世凯严厉警告，使即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电文首称世凯为“慰廷先生”，曾载国内各报。袁得电读之，气呃不语者多时，喟然向梁士诒叹曰：“鹤卿、精卫二人来电如此措辞，殊不足异。独少川以数十年老友，对我如此称谓，如何可堪？”自此电发出后，全国各省反对帝制者纷纷响应，而洪宪伪朝遂以告终。是可见少川牺牲友谊保障民国之一斑。

五、拒就段阁外长 民五，六月，袁世凯忧愤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民元约法及旧国会，任命少川为外交总长。少川北上至天津。国务总理段祺瑞以少川平日守正不阿，虑于己不利，阴使张勋及各省督军通电反对少川就职。少川知祺瑞与跋扈武人朋比为奸，必为国家大患，不欲与之同流合污，乃拒不接事，毅然中途折回南下。翌年夏秋间遂有段系公民团包围众议院，及督军团威胁黎元洪解散国会，张勋拥清废帝复辟等种种暴举，层出不穷。至是中外人士咸服少川之具有先见云。

六、反对政系毁法 民六，七月，孙总理率海军及国会议员赴粤，创立护法军政府，少川偕伍廷芳从之。翌年政学系及陆荣廷系谋牺牲护法，以向北方军阀议和，因改组军政府为总裁制，别选总裁七人，少川与焉。民九，岑春煊、陆荣廷、莫荣新等在粤残杀异己，多行不义，且与北方军阀私订和议条款，取消西南自主。少川及孙、伍、唐（继尧）各总裁咸否认之。是年六月少川与伍廷芳相继离粤，国会亦宣布移云南开会，政学系李根源、杨永泰、章士钊、韩玉辰等乃建议改选总裁以补之，于是改选温宗尧等为总裁，并委任温宗尧兼外交部长，陈锦涛为财政部长。温陈二人就职不及一月，而陈炯明奉孙总理率兵入粤，岑春煊等咸作鸟兽散。于此可知少川与温陈二人在昔实为政敌；且当时七总裁中之粤籍三总裁，既羞与毁法祸粤之岑陆莫等伍，而温陈二人乃见利忘义，腴然从逆，是不独为护法各省所不齿，抑亦为乡人所共弃矣。语有之，“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温陈二人之自甘堕落，固不自今日始，安可与嫉恶如仇终始一贯如少川者薰莠并列耶？

七、拒收不义捐款 民十四段祺瑞任执政时，安福系阁员饥不择食，不惜牺牲国家绝大利益，私向法国收取多年未解决之债款内金佛朗余利。时人称为安福系卖国借款之一种。因之全国文化团体及国民军将领均坚决表示异议。广州之国民党本部亦通电反对之。安福阁员乃提出馐余一部，分别津贴各文化团体，借资疏解，北京及各省之著名大学中学各有所获，咸帖然就范。上海复旦大学亦得分润补助金六万元。少川时任该大学董事长，该校当局持收据请少川签字。少川谓此属卖国借款之唾余，义不当收受，严厉拒绝副署。当时全国各大中学之当局获此意外收入，无不喜气洋洋。就中始终维持正义不徇情面者，独少川一人耳。

八、领导全国统一 两粤自民二十宣布独立，并设置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会议以来，形同割据，已历多载。某等每假西南两机关以自私，粤人莫不怨声载

道。少川蒿目时艰，久有去志。迨民二十五五月，胡汉民逝世未久，某等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耀武陈兵，向中央无故挑衅。少川不能复忍，遂即通电辞退西南政务常委一席，毅然晋京出席中央会议，复与孙哲生领导两粤中委倡议取消西南两机关。某等知大势已去，始仓皇出走，而全国统一之局成矣。此种旋乾转坤救时定乱之绝大手腕，惟少川能之。世间依违两可者流无此魄力也。

就上述八端言之，足征少川崇尚法治，守正不阿，固属难能可贵。而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尤非常人所能企及。今少川年近八十矣，而充壮慷慨，不让青年，忧国热肠，且尤过之。际兹外侮凭陵，危于累卵。昔吕太公以匹夫而兴周，郭汾王以单骑而却虏，同是耄年，同是报国，以古律今，岂遑多让？谨祝此翁，老而益壮，倘能扶杖出山，同任劳怨，扶危定倾，国是庶有豸乎。

（著者按：此文载于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五日出版之香港《大风》旬刊。时在少川在沪遇害前五月。惜哉。）

章太炎阴司听讼述异

民三，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北平龙泉寺时，以愤懑过度，积思成幻，晚间入梦，尝为地府邀往摄理阎罗王判断狱事。当日曾往龙泉寺探候之友好，有听太炎述之者，辗转相告，诧为异事。余于民十七，某日访太炎于沪同孚路同福里，偶询及之。据言：“有一夜朦胧间，见有差官及舆马强迎之至一大衙署，群拥之升公座，即有状类判官者持公文多件，请其署名牍尾，与世上官署之普通公牍略同。事毕，仍由舆马送归，自后每夕皆然。尝在梦中问判官以何事，判官以地府请其摄理阎罗王对。如是者殆及半年，虽日久生厌，决意不去，然到夜身不由主，常为差官挟拥以去，直至恢复自由南下之后，方不作此梦”云云。余素不信鬼神之说，虽太炎言之凿凿，亦只姑妄听之。然太炎向守怪力乱神之诫，非深厚之老友，辄不肯为道只字，度亦不过以梦寐视之而已。民五，三月，太炎答黄宗仰（乌目山僧）书，述此事最详，书云：“仰上人侍者：快接复书，神气为开，所问幻梦事状，今试笔述，愿上人评之。去岁，十二月初，夜梦有人持刺请吃午餐，阅其主名，则王鏊也。（王，震泽人，明武宗时贤相。）走及门外，已有马车，乘车至其宅中，主人以大餐相饷，旁有陪客，印度人欧洲人汉人皆具，各出名刺。汉人有夏侯玄、梅尧臣。余问王公，读史知先生明德，而素无杯酒之欢，今兹召饮，情有所惑。王曰，与君共理簿书事耳。梅君则总检察，吾辈皆裁判官，以九人分主五洲刑事，而我与君则主亚东事件者也。余问王曰，生死为寿量

所限，轮回业力所牵，大自在天尚不能为其主宰，而况吾侪！梅氏答曰，生死轮转，本无主者，此地唯受控诉，得有传讯逮捕事耳。传讯者不皆死，逮捕则死矣。既判决处分后，至彼期满释放，释放后又趣生诸道，则亦非此所主也。余念此论，颇合佛法，与世俗传言焰摩主轮回生死者不同，因复问言，铁床铜柱，谁制此法者？皆答曰，此处本无制法之人，吾辈受任，亦是阎浮提人公举，无有任命之者，法律则参用汉唐明清及远西日本诸法，本无铁床铜柱事也。受罪重者禁锢一劫，短则百年，而笞杖之与死刑，皆所不用，吾辈尚疑狱卒私刑，以铁床铁柱困苦狱囚，曾遣人微往视之皆云无有，而据受罪期满者言，则云确受此痛。余曰，狱卒私刑，非视察所能得，吾此来当与诸公力除此弊何如？王答曰，固吾心也。遂退。明日复梦到署视事。自此夕梦之，所判亦无重大案件，唯械斗谋杀诈欺取财为多，如此幻梦不已。而日曜之夜，则无此梦，余甚厌之，去岁梦此二十日，一日自书请假信条焚之，夜亦无梦，明夕复如故，相续至今已四月矣。余因疑狱卒私刑，一夕尽换狱卒，往询囚徒云，仍有铁床铜柱诸苦，因问此具何在，囚徒皆指目所在，余则不见。归而大悟，佛与本说此为化现，初无有人逼迫之者，实罪人业力所现耳。余之梦此，是亦业感也。今春以人参能安五脏，买得服之，并于晚饭后宴坐观心一小时顷，思欲去此幻梦、终不可得。来示谓不作圣解，此义鄙人本自了然，但比量上知其幻妄，而现量上不能除此翳垢，自思此由瞋心所现故耳。吾辈处世，本多见不平事状；三岁以来，身遭患苦，而京师故人，除学生七八人外，其余皆俯仰炎凉，无有足音过我者。更值去岁国体变更问题，心之瞋患益复炽然，以此业感而得焰摩地位，固其所宜，息瞋唯有慈观，恐一行三昧亦有不著。慈观见涅槃经，虽说其义，而无其法，亦竟无从下手耳，想上人必有以教我也（下略）。章炳麟和南，三月三十日。”等语。观此，则太炎直将所梦公诸笈启，而结语则谓由瞋心及业感所现，有以致之。佛典奥妙，非余末学所知。闻太炎前岁弥留之际，相传在旁亲友多目击有祥光一团自病者头顶上向窗间飞出，则世俗所谓生有自来之说，似非无据。